

# 《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

\*\*\*\*\*

\*第一章 我见证了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交手

\*\*\*\*\*

希特勒建议斯大林分割波兰，而“补充秘密议定书”的知情人却被斯大林下令枪毙了，因为他信奉：只有死人是安全的。 由于入侵波兰的时间日益临近，希特勒不得不给他所仇恨的“世界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亲笔写信。

-----

从乌克兰乡间到克里姆林宫(1)

-----

外祖母如果不是那么固执，我本来可能出生在美国。

斯大林对德军入侵后来莫斯科的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希特勒入侵很突然。其实此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相互都十分欣赏对方。

德国突然入侵，斯大林羞愤难当。

我总有一种感觉，早在一个人的意识觉醒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会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也许，这些近乎活生生的形象，是晚些时候由脑细胞定型的。并且那些没有意识到、似乎没有意义的真实事件、大人们的谈话、听到的故事、旧时的肖像画以及外祖母相册中的照片，也可能来自儿时的梦境。可是现在，当我在脑海里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眼前出现了那些幼年时代亲身见证过的事情，而且还有一些非常清晰的景象，那是我出世之前发生的事件.....

我看见，那是一间非常雅致的客厅，深红色缎子窗幔和绣花窗帘用绳子扎了起来，有舒适的高背椅子，一张小桌上铺着奶油色长流苏餐桌布。地板上铺着厚地毯和白熊皮。熊的脑袋以及尖尖的牙齿活灵活现。壁炉里劈柴在噼里啪啦地燃着。外祖母和妈妈进来了。跟他们一起进来的，是一位佩带圣乔治铁十字勋章的年轻军官。这是妈妈的哥哥——我的舅舅廖尼亚，他刚从前线回来。廖尼亚舅舅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梳成平分头。他坐在钢琴旁边，于是客厅里充满了让我迷醉的音乐，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我。然后，这个画面逐渐暗淡下来，慢慢地消失于无形之中.....

餐厅里十分敞亮，光线充足。桌子头上放着黄铜茶炉，像木桶一般大、闪闪发亮。桌旁有几张维也纳式弯背椅子。爸爸和妈妈吃着美味的家常烤饼，喝着茶。突然，妈妈的妈妈——我的外祖母——快步走了进来，她身穿白色绣花连衣裙，拿同样颜色的阳伞，头戴阔檐凉帽。外祖母酷爱玩跑马。她刚刚从跑马场回来，看上去垂头丧气。

“你又输啦？”妈妈问道。

“别提啦，孩子们。我还会赢回来的。不过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得拿出来。我押上了几个戒指，项链，手链等等。还有你们曾祖父的金表。”

外祖母疲倦地慢慢坐到椅子上。她看上去像是做了错事，非常失落。

“别难过，这你又不是第一次。只是曾祖父的金表要快点赎回来。米沙，”妈妈对爸爸说，“我们现在就去把它赎回来吧。”

“不要，不要，”外祖母抗议说，“这是我的事情。我要自己弥补这个过错。”

父亲微笑着，对母亲点了点头。父亲长着一头黑发，留着小胡子。他衣着讲究，长长的咖啡色礼服裹着运动员一般的身材，雪白的袖口浆得笔挺，条纹领带打成花结。

曾外祖父（我的曾曾外祖父）在家里很受尊重。他是家族的骄傲。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号称是“俄国浪漫歌曲之父”。他叫尼姑拉·阿列克赛耶维奇·季托夫，出生于1800年（卒于1875年），是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和崇拜者。他把普希金的许多诗歌谱上乐曲。我们特别喜爱，也经常演唱由曾曾外祖父谱曲，大诗人1827年11月6日夜创作的《护身符》：

在那大海澎湃的地方

在空荡荡的峭壁上

那儿的月光更暖人

在那暗夜甜蜜的一刻  
穆斯林裹着自己的日子  
在后宫享乐  
女巫，温存地  
赠给我护身符

曾曾外祖父一生谱写了一百多首浪漫歌曲、进行曲、卡德里尔舞曲以及华尔兹舞曲等等。他的几个作品到现在仍在传唱：如《车夫曲》，《神灯》，《亲爱的母亲》，《狡猾的朋友》等等。

直到战前，我们家保存着他的画像：一个长着浓密连鬓胡子，佩带穗肩章，胸前挂星形安德列勋章的赳赳武夫。

我的脑海里另外还有一个幻象：彼得格勒郊外克罗妙吉地方的木头达恰。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挂满葡萄藤的外廊上，藤椅里坐着两个女人——外祖母身穿白衬衣黑裙子，手里拿着莱蒙托夫诗集，而妈妈则穿着宽大的玫瑰长袍。她在给童罩衣缝绣花彩带。家里正在准备增添人口。这是我很快就要出生了。这时，父亲乘马车从近郊火车站来了。平常十分稳当而持重的父亲，今天却掩饰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怎么啦？”母亲感受到了他的心情，便问道。

“我要跟你谈一谈，”父亲回答说，然后转向外祖母，向她道歉。

“你不要激动。”父亲说，“没有什么大事。只不过让我率领一个采购委员会。要去美国采购军舰和商船。去的时间很长，你跟我一

起去。”

“啊呀，”母亲叹道，“真是不巧。我马上就要生了。并且还在打仗.....”

“没关系，我们坐大船去，那上面有医生，有事的话可以帮忙。并且，你还有两个月才生。那时候我们堵到纽约了.....”

那是1916年的早春。而我是7月2日出生的.....

他们回到了外廊。

“出什么事了？”

父亲做了一番解释。

“绝对不行！”外祖母坚决地表示反对，“她这个样子怎么能够飘洋过海？现在正是世界大战，大西洋里有德国的潜水艇。美国那里的情况又怎么样？先让她生了，让孩子长大些，然后再去。”

父亲试图说服她，但是没有用。并且妈妈也开始怀疑：

-----

从乌克兰乡间到克里姆林宫(2)

-----

“要不，你自己去？”

“绝对不行，只能一起走。”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您怎么能让妻子和孩子冒这种危险？”  
外祖母突然换了非常正式的语调责备说。

外祖母出身于一个富足的家庭。她确信，只有在家里，在彼得格勒，才具备一切必要条件保证她的外孙顺利降生。我的母亲也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她毕业于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还不适应这些令人怀疑的冒险，譬如快要临盆的时候坐船去美国。而父亲，米沙，外省中学教师的儿子，一个孤儿，习惯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她不会放女儿走的。

“那么我也留下，”父亲坚决地说，“我放弃这个差事。”

要是他们那个时候知道，内战期间及内战之后我们一家人要经受多少痛苦，飘洋过海，即便有德国潜水艇的威胁，也会让他们觉得像是一次游览而已。就这样，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我一生中意义重大的机会，就跟我开了第一个玩笑。如果外祖母不是那样固执，我会出生在美国。所以，很有可能作罗斯福，而不是斯大林的翻译……

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北翼，在我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非常安静。惟一可以听见的，只是每一刻钟从斯帕斯塔楼上传来的大钟齐鸣的声音。窗户上挂着黑色窗帘：那是1941年7月末，随时都有可能响起空袭警报，通知德国轰炸机正在飞临。已经是深夜了，但是，整个庞大的政府机构还在继续运转。斯大林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所以，每个高级领导人，不管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军方的负责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等待着——“主人”随时可能召

见。

一个小时之前，国防工业人民委员乌斯基诺夫通过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问我，莫洛托夫有没有回家（1940 年春天，我跟乌斯基诺夫一起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工作过）。他直率地说，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所以是可以回家的。但是，“主人”不喜欢自己的下属找不到。而莫洛托夫回家，则是斯大林再也不会叫任何人的准确信号。

“你的头走的时候，请给我说一声，”我听到他疲倦的声音。“我得早起，要去靶场。哪怕有一两个小时合一下眼也好啊。”

但是，据我所知，莫洛托夫还没有打算走。今天，斯大林跟抵达莫斯科的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长谈。斯大林对此次访问抱着很大的期望。德军入侵伊始进展神速，这迫使他寻找盟友，而美国毫无疑问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尽最大努力来说服总统特使：苏联不会投降，并将战斗到完全战胜法西斯。斯大林许诺，在跟霍普金斯的下一次谈话中，将会拿出苏联所需要的军事物资的详细清单。所以，莫洛托夫，以及米高扬还有军事专家等正在忙于准备所需要的文件。

早晨，政治局委员们必须知道斯大林与美国特使——这也是希特勒入侵之后从美国来莫斯科的第一个高级官员——谈话的内容。我的任务，是拿着翻译这次谈话的巴甫洛夫匆匆之间作的笔记，与已经准备好的记录进行核对。

这次谈话，有一个地方使我感到厌恶。斯大林对霍普金斯说，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十分突然。他斯大林曾经认为，现在希特勒不会进攻。虽然对我们大家来说，斯大林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我很难同意他的论断。怎么会这样？要知道，我们驻柏林大使馆掌握了德国人正在准备入侵的准确情报。我们甚至知道确切的日期——6月22日凌晨。大使馆把所有这些情报都送到了莫斯科。难道没有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况且，情报不仅仅来自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而且也来自驻德国武官图比科夫和海军武官沃伦措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并且所有的资料都是吻合的。

最终，6月21日夜间，“主人”的桌子上，送上了一份报告。投诚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在最后一刻警告苏军指挥部，再过几个小时马上就要开始入侵了。

斯大林也没有相信这些东西。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各族人民领袖”突然之间变成了瞎子。

毫无疑问，斯大林明白，霍普金斯至少也知道传递到莫斯科的警示。他用自己“突然袭击”这套说辞，想先发制人，不要让美国客人提出一些困惑不解的问题。而霍普金斯这样深具洞察力的人又是怎么想这个小把戏的？他不能假设，在僵硬的斯大林国家体系中，下属胆敢向“各族人民领袖”隐匿如此重要的情报？霍普金斯应该问一问这个情况。但是，他出于礼貌什么也没有说。

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特殊态度。他们一直未曾谋面。但是，斯大林曾经期待这样的会见，他对纳粹独裁

者有一种独特的向往之情。从希特勒的说法来看，他也高度评价斯大林。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控制大众意志的手段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

-----

希特勒的问题：您是德国人吗？(1)

-----

纳粹德国与苏联有着令人惊异的相同景象——同样的神话领袖，将异见人士投入集中营并彻底消灭。

我跟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周恩来等政要握过手，这样的人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

当我回答自己是俄罗斯人时，希特勒惊呼：这不可能！

1940 年在纳粹德国工作期间，我看到了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同样地在“神化”领袖，举行同样的大规模集会和阅兵，人们手里拿着元首的画像，而孩子们则向他献花。非常相象的宏大的建筑，绘画中也有类似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英雄主义题材。希特勒把所有的异见人士投入集中营并彻底消灭之后，也像斯大林一样，借助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制造一种效果，群众开始神化他。我观察了从法国得胜归来的德军在柏林举行的阅兵仪式。我站在主席台旁边看

到，当希特勒乘坐敞篷“奔驰”驶过人群时，所有的人都涌向他，妇女们举起婴儿让他触摸。希特勒仇视人民，但却善于讨好它，称之为“主宰者种族”。斯大林也一样，慈父般向那些走过列宁墓、颂扬他的游行队伍微笑，也讨好地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然而，在心里却将他们骂作蠢材。

但是，在那时，我还不可能进行这种类比。当时有许多情况我并不知道，所以也无从理解这些不祥的巧合意义何在。因为，德国和我国宣称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斯大林号召苏联人建设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将许多民族全体迁移到西伯利亚，消灭千百万的农民。希特勒宣布了“主宰者种族的千年帝国”。但是，他却将德国民族最优秀的人投入战争的绞肉机，像躁狂症患者般顽固，将德国文化的无价遗产变成了瓦砾。

1940年11月12日，我跟随莫洛托夫进入希特勒在柏林帝国办公厅的办公室，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见到希特勒。当时，元首正处于权力和荣誉的巅峰：他脚下是整个西欧。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人躲在几个岛屿上，预计情况会更糟。希特勒意识到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所以举手投足十分高傲自大。在这一点上，他的表现跟斯大林完全相反，后者总是用装出来的平易近人和完全无意追求效果而使人感到震撼。跟希特勒不同，斯大林认为，如果对千百万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张扬这种权力。

当我们进来时，希特勒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埋头看文件。但他很快抬起头，迅速站起来，迈着

碎步朝我们走来。我们在房子的中央停住了。我们是莫洛托夫和他的副手杰卡诺佐夫，以及巴甫洛夫跟我——我们两人都是翻译。元首跟每个人握过手。他的手掌冰冷而且潮湿，让人感到不舒服——就像触摸到爬行动物，握手有气无力，干巴巴的。这一点跟斯大林非常相像——他的握手非常平淡而冷漠。

也许，现在我属于为数不多的、跟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政治人物握手打过招呼的人之一了：其中有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周恩来等。他们各不相同。丘吉尔的手掌大而温暖，整个包握住人的手，似乎在安慰。罗斯福的握手很有力，伸出一只手，便令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力量。周恩来的握手相当有力，但也是十分客气而友善。可能，这都是些主观感受，但我记得的就是如此。

在帝国办公厅，我受到了元首的特别恭维。当我开始翻译莫洛托夫说，非常高兴见到帝国总理时，希特勒显然没有料到我的柏林口音，仔细地看了看我，突然问道：

“您是哪里人，德国人？”

“不是，”我回答他，然后马上告诉莫洛托夫说了些什么。我以为两位领导人要接着谈下去，但元首却不肯停下来。

“您是德国族人吗？”

“不，我是俄罗斯人。”

“不可能！”希特勒非常惊讶。

他转向莫洛托夫，请他走到一张矮桌前，周围放着沙发和椅

子。我们跟了过去。

莫洛托夫跟希特勒共有过三次会谈。最后一次会谈结束之后，希特勒将客人送到帝国办公厅的门口。我并排走着，一边翻译着他们之间的应酬话。代表团其他成员落在了后面。在告别之前，希特勒握了握人民委员的手说：

“我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并且自信本人也将载入史册。所以，非常自然的是，我们两个政治家应该见一面。我请您，莫洛托夫先生，向斯大林先生转告我的问候，以及关于在不远的将来举行会晤的建议。……”

回到莫斯科之后，莫洛托夫当然将希特勒的提议转告了斯大林，并且，显然这一点在斯大林错误判断德国入侵苏联的时间这个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元首对他的高度评价使“各族人民领袖”感到自豪。不过他本人早就夸赞希特勒了。1934 年，当希特勒消灭了自己的战友、冲锋队负责人恩内斯特 罗姆以及冲锋队其他将领时，斯大林给这场血腥屠杀予以高度评价。米高扬多次给我讲述过，在罗姆被杀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

“你们有没有听说德国的事情？希特勒太棒了！就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

那是1934年的夏天。当年12月份，斯大林的战友基洛夫被杀，而据我们现在所知，这个罪行的线索直指“各族人民领袖”。然后开始了对列宁战友的镇压，消灭红军高级将领和技术专家，知识分子

等等。红色恐怖消灭了千千万万无辜者.....

-----  
希特勒的问题：您是德国人吗？(2)  
-----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和希特勒二人的行为之中也有许多共通之处。罗姆被宣布为“敌人”和“叛徒”，打上了耻辱的印记。而希特勒强迫自杀的隆美尔，则受到厚葬。斯大林宣布列宁所说的“党的宠儿”布哈林为“人民公敌”，并枪毙了他。可是，他强迫自己的朋友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在先，随后又在其棺材旁边发表了动情的讲话，最后亲自抬着他的骨灰盒，就像当年亲自抬基洛夫的骨灰盒一样。

三十年代在苏联所发生一切，不能不引起西方民主国家统治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由于斯大林镇压，他们更是不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希特勒却加倍喜欢这些迫害。一方面，在使用“布尔什维克威胁”讹诈西方政治家时这些迫害提供了进一步的根据；另一方面，减弱了对纳粹迫害共产党人，犹太人和其他异见人士的抗议，使西方政治家深信不疑，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比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要好得多。与此同时，元首一直非常赞赏斯大林的无情与残忍。因

为他本人也具有同样的性格特点。

三十年代下半叶，当时英国和法国已经明显地不愿跟苏联签订条约以预防法西斯侵略，斯大林开始留意柏林。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显示，除了苏联之外，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向合法的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利用西方大国的“不干涉政策”，毫无困难地给佛朗哥将军提供军事援助并最终使其在马德里站稳脚跟，这一切向斯大林表明，实力在哪一方。而他是尊重实力的。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慕尼黑交易更进一步证明，西方政治家愿意饶过希特勒所作的一切，只要他完成在自己的“圣经”——《我的奋斗》一书中誓言，消灭布尔什维克。正是当时，斯大林曾经认真考虑过，能否跟元首缔结和约。李维诺夫因为是犹太人出身，并且在国联发表激烈的反法西斯讲话，已经不适合跟纳粹德国作交易，所以被解职。最接近斯大林的莫洛托夫成了外交人民委员。

而希特勒则得出结论，他更容易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打胜仗。就像历史上任何被战胜的国家一样，法国很快便会彻底丧失斗志，对希特勒而言这并不是秘密。不过，沿着莱茵河有一条稳固的“马其诺防线”，可是可以通过荷兰和比利时进攻，从而绕过它。此外，元首与张伯伦在巴德—格登斯堡以及慕尼黑举行的几次会谈，使元首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个人可以被讹诈。英国中立将使德国可能最终解决俄国。而眼下则必须跟斯大林找到共同语言。

德国与苏联交好的条件越来越适宜了。

然而，克里姆林宫决定再次尝试跟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谈判

开始了，但是，由于英法代表级别太低，缺乏必要的授权，一开始就预示不会成功。

1939 年 8 月初，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能指望跟英法达成重要的协议。此后，8 月 11 日与前来莫斯科讨论采取共同行动阻止侵略的英法军事代表团的会谈，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当苏联国防人员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问道，与波兰有没有协议，一旦与德国开战苏军可以通过其领土时，率领法国代表团的杜门将军回答说，他不知道波兰的打算。伏罗希洛夫问道，为了加强法军，英国可以派出多少部队。英国的赫午德将军回答说，与德国开战的第一阶段英国可以派出十六个师，然后再派出十六个师，而且目前英国在自己国内只有五个常备师，以及一个摩托化师。

德国有 140 个师整装待发，跟德军的军力相比这些数字简直可笑。这跟伦敦和巴黎所认为的，战争一开始苏联应该派出 120 个师，这个数字也无法相提并论。接下来，当苏方提出盟国对比利时的计划时，法国代表声称，只有在接到请求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这个国家，但是，是否将会有请求，现在尚不清楚。所有这些促使伏罗希洛夫于 8 月 14 日发表声明：“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回答，那么继续进行军事谈判毫无意义……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建议自己的政府参加这种注定要失败的行动。”

当柏林传来愿意改善苏德关系的建议时，局势便是如此。但是，更早些时候，在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代办阿斯塔霍夫谈话时，里宾特洛甫毫无疑问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表示愿意为德苏关系确定

“新的性质”。他宣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够被双方满意地予以解决。当阿斯塔霍夫询问帝国部长的具体所指的时候，里宾特洛甫表示愿意就重要问题进行谈判，如果苏联政府也愿意这样做的话。帝国部长在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通报与阿斯塔霍夫谈话内容的电报中，有一点异乎寻常的补充：向苏联代办透露了德国“与苏联就波兰命运达成协议”的意愿。

-----

夜半敲门声：“杀死犹太鬼”！（1）

-----

我母亲领到一周的食品包括：半个黑面包，两条鱼和四个土豆。

父亲巧妙喝退了专门袭击犹太人的劫匪。

我们一家人离开饥饿的彼得格勒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国内当时内战非常激烈。曾几何时，美丽的北方巴里米拉（俄国诗歌中指称彼得堡）变成了阴森、冰冷而暗淡的一堆石头，前沙俄帝国首都的居民们躲在屋子里，苟且偷生。苏联政府迁到莫斯科去了，而涅瓦河上这座“高傲的城市”却成了外省，一直到现在。妈妈拉着我的手。我裹在围巾里，努力加快脚步。涅瓦大街上，风刮起了烂报

纸，广告和瓜子皮。迎面走来一队水兵，肩上的步枪上着刺刀.....

在爸爸的工厂里，妈妈领到了一周的食品：半个黑面包，两条鱼和四个土豆。她急着要赶回家，父亲患伤寒正躺在家里。平常总是强壮精力充沛的父亲，现在是那样的无助.....

父亲，尤其年轻的时候，总是远离政治。不过他还是欢迎二月革命的，所以，进城的时候，他总是在西装上衣的翻领上别着一枚红色胸花。他认为，俄国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将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而他也可以参加这个过程。但是，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混乱，自相残杀的内战，父亲将这些看作个人的灾难。他出身于外省中学教师的贫苦家庭，早年父母双亡，靠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他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从切尔尼戈夫来到彼得堡，以同样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所技校，最后毕业于彼得堡工业学院。作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的名字被用金字刻在大理石牌上。但是，他上学的时候非常穷。他多次讲过，他经常跟其他穷苦家庭的大学生一起到一家餐馆里，那里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壶水，和切成大块的面包，都不要钱。在那里，他们可以拿一份新报纸，什么菜也不点，做出一副正在读报的样子，然后悄悄的就着水把面包吃完。为了维持学业，父亲还作过家教。大学毕业之后，他马上就得到了普梯洛夫造船厂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工资很高。他娶了城里有名望，但已经败落的一家人的女儿。当时觉得，生活似乎将是富足幸福的.....可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破灭了。一个孤儿付出的巨大努力，忍受的苦难全都白费了.....

外祖母变卖了家传的珠宝，从投机商人那里弄到吃的东西。这可以使生病的父亲营养好一些，我们其他人也要想办法支撑下去。房子里已经不供暖气了，所以我们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劈柴烧壁炉，但一个铁皮的小炉子救了我们。它有四个长长的支脚，放在客厅屋子中间的一块铁板上。像排水管一样的管子贴着天花板，弯弯曲曲地通到窗户的透气口。我们已经烧光了一打椅子，还有外公的写字台。现在轮到厨房里的橱柜了。有些精明的商人生产这种小铁炉子。原来富人区的住家户现在就靠这种炉子，因为中央供热系统早就失效了。它很快就能烧得通红，茶壶里的水几分钟就烧开了。但是，小铁炉子凉得也很快。夜里，室内温度在零度以下。

1941—1942 年间，当时莫斯科也没有供热，这种小铁炉子再次出现。1942 年，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后，在彼得罗夫街分给我们那套房子里，这铁炉子也救了急。

父亲在慢慢地康复，他开始能上街了。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材料，也没有订单，他工作的普梯洛夫船厂早已经关闭了，大部分工人被动员上了战场。城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父亲有一个姐姐叫柳芭，她住在乌克兰，在离父亲老家切尔尼戈夫大约一百多里地的一家乡村医院里作助产士。

“要不，到那儿去？”父亲提议说，“那这地方一直都是富裕，好客……”“你们在那儿靠什么生活呢？”外婆表示怀疑。“我随便找一个工作，无论如何，那里比这边好活一些。您看看，您的外孙多么瘦。在这里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他现在需要牛奶，蔬菜和水

果。这些东西在乌克兰多的是……”听着他们说话，我想象自己躺在一个小棺材里。最近几个星期，这种事情我见多了。就像后来四十年代的围城时期一样，悲痛的人拖着小棺材走在彼得格勒冰封的人行道上。我躺在小棺材里一动不动，而他们三个人，弯下腰，撒下了眼泪。于是我开始嚎啕大哭。“你这是怎么啦？”妈妈严厉地斥责道，“闭上嘴，已经都那么瘦了……”

“别那么粗鲁，”外婆干涉了，“他那么弱，而且神经也弱。”

我哭得更厉害了。总是受不了别人可怜我，哪怕有人开玩笑地说“小可怜，小可怜见的”，我马上就会放声大哭。

我这一通发作，再加上虚弱的样子，成了出走的新理由。但外婆固执起来了：

“你们走吧，我留在这里。”

不管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听。

“我一个人能撑下来，”她叫我们放心，“所有东西都卖了，再说我也不需要太多。反正快活到头了。我已经活够了。这里有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墓地。我也要呆在这里……”

最终决定，我们自己走。

收拾上路很简单。妈妈把衣服，毛毯，卧具等等放进一个类似箱子一样的藤筐里。她跟外祖母要了一本家族的相册。我加上几册插图杂志《金色童年》。那里面的插图非常漂亮，类似现在的幽默画。后来，我靠这些杂志学认字。

-----  
夜半敲门声：“杀死犹太鬼”！（2）  
-----

终于该告别了。整整一天，外祖母紧紧地抱着我，她亲手用革命前积攒下来的面粉做了甜馅饼。我头一次看见她流泪。也可能，她感觉到再也见不着我们了：我们离开一年之后，外祖母就饿死了。

南方之行路途遥远，万分艰难，十分复杂：要穿过内战的几条战线，有时要乘坐挤满了人的火车，有时要乘马车，有时候，把行李装在独轮车上，父亲推着车子一路步行到下一站。对于四岁的我来说，路途太艰难了。记得，有时候出现胸部疼痛，就像多年之后心脏病发作时候的那种痛感一样。我自己走不了，甚至连手也活动不了。父亲被长途跋涉折磨得十分疲倦，他生气了，以为这是我在装样子。甚至有一次轻轻拍了我一巴掌。妈妈替我说话，要我们停下来，喘口气。可他还是要我接着往前走。我感觉到再走一步，一切都全完了。我倒在地上，不能动弹。父亲不得不把我放在独轮车上。我知道父亲本来已经很难了，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消失的话，他们会高兴的。当然，这样想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但是，每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自己想死去，解脱他

们。我牢牢记住了几件事情。

.....在一个小站上，一大堆人挤在一列货车旁。所有的人都带着背包，箱子，篮子等等。人们挤来挤去，大呼小叫。火车已经鸣笛，马上就要发车了。我们必须赶上去挤到冷藏车厢里去。父亲头顶上顶着筐子，挤进了车厢，他伸出手来给母亲，母亲一只手拉着我。两边的人挤得我很痛。我刚要挣扎着抬腿上阶梯，突然，人潮一下子把我挤到了一边。我从妈妈的手里滑脱了，摔倒在月台上。人群在挤着，我看见妈妈一点点被推进车厢里边去了。父亲想要挤出来，但周围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火车开动了，我一个人留在了月台上。妈妈从一个人的身后伸出头来，大声喊叫着，但没有人注意她。车厢一节节从眼前闪过，但我的脑子里转得更快：我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就像我在各个车站上见过的许多衣衫破烂，饥饿的孩子们一样。突然，什么人有力的手臂把我捞了起来。最后一节车厢的阶梯上，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水兵衫，敞着呢制服的水兵把我放在了车厢里。他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看见了我被人群分开，听到了妈妈的哭喊？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接下来的我全都不记得了。很快我跟父母亲会合了.....

在破败的国内经过三年漂泊，记忆中留下的是痛苦的饥饿感。

记得已经到了乌克兰的什么地方，村子边上有一座歪歪斜斜的房子。一个犹太人家庭给了我们一个容身之地。时间还不算晚，但天色已经黑了。炉子上烧着水。妈妈准备给我洗头。一家之主在屋子角上，披着条纹布，在低声祈祷。两个儿子围坐在桌子边低头读

课本。父亲对母亲小声说：

“你看看，多么坚强的人。学校现在肯定都关门了。但是他们自己学习，将来一定有出息。”女主人把一个旧木盆放在小凳子上，倒进开水。妈妈加了一些凉水进去，她把我的头摁在木盆上，于是我看见，从头发缝里小小的淡黄色小动物成堆地爬了出来，在热水中挣扎一会，死了。

“快看呀，”我喊道，“这是虱子……”

“天啊！”女主人叹了一口气，“对不起。现在虱子到处都有。没有肥皂，人们营养不良，可不就是要出虱子的。”

“没关系，”妈妈安慰我说，“虱子的确到处都有。现在我们把水倒掉，再用开水烫一遍木盆，都会好的。给你们两块肥皂，这是我们自己存的。”

“太谢谢了。”女主人表示了谢意。

回想着这个遥远的故事，我想的是，1990年，莫斯科由于洗剂用品短缺，以及明显的营养不良，许多中学生的头发里也发现了虱子……

早晨，我跟主人的两个儿子到村子里走了走。村子大半已经废弃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商店。商店的主人，肥胖、上了年纪、典型犹太人长相的约瑟夫叔叔卖给我们一小铁桶煤油，——这是去虱子的最好方法。他送给我了一只粘土作的口哨。

夜里，枪声，马蹄声，喊叫声把我们吵醒了。女主人低声警告说，要我们躲起来。

“这附近有一帮泽廖内的人，”她解释说，“这不，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了……”

突然，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该死的犹太鬼，快开门！”传来了醉醺醺的喊叫声。

“这里没有犹太鬼。我们都是乌克兰人，东正教徒。”父亲还没有忘记乌克兰语，他朝外面喊道。 “那就算了……”

马一声嘶鸣，听见了马蹄声。然后又是几声枪响。

早晨从窗户往外一看，大家都在往商店的方向跑去。我们紧跟着也过去了。在断了一个铰链的门旁边，约瑟夫叔叔躺在血泊之中。他的衣服被掀起来了，肚子高高地鼓着。他的妻子跪在身边痛哭着……

-----

我们的口粮：燕麦粥和青鱼(1)

-----

一家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基辅，谁知昔日富裕的古都正在闹饥荒……

艰难的漂泊之中，年幼的我几乎丧命在土匪的枪弹之下……

火车停在了达尔尼茨。再往前无路可走了。第聂伯河上通往基辅的所有桥梁都被炸断了。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但天色还是黑的。既没有电筒，也没有篝火。勉强能够分辨出来的旅客们，拖着自己的物件，从车厢里挤出来。我们也出来到结着冰的月台上。寒风刮起了雪，扎在脸上像针刺一样。车站的房屋被毁，窗户都打烂了。剩下的一半门悬挂在绳子上，时不时地撞在墙上。我们走进车站，想躲一躲刺骨的寒风。这里也是四面透风，不过在墙角，原来售票处的地方，风小一些。我们席地而坐，等待天亮。妈妈铺开了羊毛毯，安顿我躺下，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起来吧，”我在梦中听见妈妈的声音，“爸爸找到了一辆车。要继续赶路……”

小小的站前广场上积了一层雪，空无一人。乘客们都四处走散了。父亲站在一匹又瘦又小的马拉雪橇旁边。身穿破破烂烂的半长皮大衣的，正是车夫。篮子和包袱已经装上去了，中间把我塞进去，父母亲坐在两边，我们就出发了。到河边只有几里地，但这匹小马拖得很艰难。我第一次发现一种怪事：当我闭上眼睛，老是觉得在往回走。也可能，真的就是这样。是否正因为这样我们怎么也走不到第聂伯河边？我拼命赶走睡意，使劲挣着眼睛，这样才能往前走。这条路通过一片树林。这里的路上坑坑洼洼，雪橇一会儿弹起来，一会儿又滑到路边。这把我逗笑了，有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眼前就是第聂伯河。岸边的河水已经结冰，冰面上露出黑色的

一条小径。但是，在河道中间是窄窄的水面。在这里，几个砖桥墩之间，横着被炸断的桥架。再往前，又是覆盖着一层雪的冰，一直到对岸，紧接着是陡直的山峰，那里可以看见基辅山洞修道院的金顶。

“我们怎么才能到对岸？”妈妈绝望地问道。

“没关系，太太，能过去的，”马车夫不慌不忙地说，一边帮着父亲把东西掣在雪地上。“大家都过去了。你们先走这条小路，然后从桥架上走过去。不过要小心些，慢点走，别掉到水里去。”

我们旁边有几个人，刚从对岸过来。他们证实说，桥梁的桥架非常结实。车夫带上新的乘客，调转雪橇，离开我们走了。

我们在冰面上拖着东西，终于挪到了工字钢铆接起来的桥架。有人在桥架上绑了一根粗铁丝，当作扶手。父亲先帮着母亲过到对岸去。然后分两次把家当拿了过去。现在轮到我了。父亲牢牢抓着我的手，踩着倾斜的工字钢往前走。上面很滑，于是我吃力地侧身走，用一只手抓着铁丝。刺骨的寒风似乎偏偏要把我吹到水里去。我觉得，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桥墩，妈妈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们……

记忆中浮现出下城，犹太人居住区波多的那个房间。收留了我们的那一家人正准备去美国，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可以使用这套房子，里面有两个房间，洗漱间和厨房。在经过长时间的漂泊之后，这是非常好的前景。父亲希望在这里找一份工作，这样我们一家的漂泊就可以结束了。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基辅也闹饥荒。

我们的伙食有稀稀的燕麦粥，一小块面包干，偶尔有一点赤褐色的青鱼。父亲在一个仓库作门卫。妈妈每天一大早就去某个机关，在那里擦地板，报酬是一小袋燕麦。我一个人呆在家里，不知道如何是好。《金色童年》里的插图和文字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我也没有任何玩具。家里人不让出门——街上有坏人。传说他们劫持小孩子，用来炼制肥皂。我最喜欢在铁床上玩火车。床头靠背上的铁条可以当作蒸汽火车头的操纵杆，同时，铁条之间的空间，就是窗户，火车司机从这里往外看。我想象着前边铁轨上有一个人。从铁条之间伸出头去，却什么也没有，这只是我觉得而已。可是，却不能把脑袋抽回来。脑袋似乎钻了过来，可现在耳朵在碍事。不管我如何使劲把铁条扒开一点，根本没用。最终我睡着了。晚上，父母亲看见我的时候，脑袋卡在两个铁条之间，耳朵磨得通红。父亲当然一下子就拉开了铁条，而我却在墙角上跪了两个小时……

基辅时不时地被围困，易手：一阵子是德国人，接着是斯克罗帕茨基的哥萨克首领，彼得留拉匪帮，白军，红军，波兰人，接着又是红军。到处都有烧杀劫掠。甚至燕麦都很难找到了。在符拉基米尔小山一匹马倒下了。它几乎一下子就被分解了。我们家也得到了一块马肉。可是，接下来怎么办？……

“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父亲说，“看来得去柳芭那儿，到乡下去。在那里可以躲过内战……”

当然，父亲没有意料到，内战之后紧接着是“军事共产主义”，农村彻底破产。

.....轮船底舱的一个大房间。沿着船舷是长条椅子。乘客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安顿在一个角落里。我身后是一个圆形的舷窗。我时不时从那儿伸出脑袋，看着从推进轮下飞溅的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漂浮的彩虹，沿着船舷的波浪连同许多漩涡和白色泡沫迅速向后漂走。我整小时地看着这个奇妙的景观。我们往北方去，到留彼其，这是基辅罗斯的古老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它之前，有一个紧靠第聂伯河的村庄——斯塔涅茨克耶，轮船在这儿一般不停靠。但父亲跟船长讲好了，在这里把我们放下来。从基辅到这里的直线距离是一百五十公里略多一些。河道弯弯曲曲，所以在一个陡弯之后，我们的船又向南方走去，然后又是一道道弯。加上轮船速度很慢，所以这一路走了一天一夜。我大部分时间呆在甲板上。那里挤满了没有舱位的乘客，大家都靠在冒着黑烟的烟筒周围。这里暖和一些，风也小一些。而我则喜欢站在四面有风的空旷地方。

-----

我们的口粮：燕麦粥和青鱼(2)

-----

在甲板上溜达的时候，我看见船尾有两挺机关枪，船头有一门小炮。帆布盖着小型火炮，但炮筒露在外面。父亲解释说，这是为

了预防劫匪袭击。我心里当然想着有人来袭击我们.....

早晨，我再次来到甲板上。太阳高高照在草地上，暖洋洋的。甲板上大部分乘客还在椅子上睡觉。也有人把吃的东西铺开放在破布上，正在吃早饭。突然，岸上响起一声枪声，接着又是一下。从灌木丛后面出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他们挥舞着短筒（指截短了枪筒的步枪，这样很容易藏在衣服底下），喊叫着。乘客们都躲到椅子下面去了。离舷梯近一些的人下到底舱。我躲在烟筒后面。船长在舰桥上命令道：

“全速前进！”

这时，我们的机关枪开始哒哒哒地扫射，然后，炮也放了一下。

妈妈躲在舷梯后面，朝着我招手。船长发现了她：

“公民，别让孩子跑出来。他在烟筒后面藏得很好。请您到底舱去.....”

我非常高兴，可以观察到打仗了。轮船很快加速了。但骑士们也没有拉下来。他们躲在灌木丛后面，跟轮船平行地跑着，一边胡乱打着枪。有几颗子弹从烟筒上反弹了回去。我们的机关枪打中了一个袭击者。接下来，在拐弯处，是茂密的橡树林。这是我们的逃生之地。这里马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袭击者落在了后面，后来再也没有出现。

-----  
斯大林与希特勒玩起了捉迷藏(1)  
-----

希特勒建议斯大林分割波兰，而“补充秘密议定书”的知情人却被斯大林下令枪毙了，因为他信奉：只有死人是安全的。

由于入侵波兰的时间日益临近，希特勒不得不给他所仇恨的“世界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亲笔写信。

柏林估计到，愿意共同研究波兰问题，这在莫斯科将会被看作是德国政府态度认真的标志，这个估计没有错。1939年8月3日晚，莫洛托夫接见了舒伦堡。大使重复了里宾特洛甫说过的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套说辞，并补充说，德国愿意“协商利益范围”。莫洛托夫在列举了德国一连串不友好行动之后，即反共产国际条约，支持日本针对苏联的敌对活动，将苏联排斥在慕尼黑协议之外等等，对德国提议是否认真表示怀疑。这里我必须顺便指出，根据现行条约，一旦发生侵略，苏联与法国必须共同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1938年秋天，当这种威胁出现时，苏联已经做好准备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苏联西部地区宣布了动员令。但是，法国却没有履行自己那一部分义务，甚至未与莫斯科磋商，便参加了慕尼黑协定。并且慕尼黑协定本身就具有反苏倾向。莫洛托夫问舒伦堡，所有这些如何能够跟德国政府愿意与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

声明联系起来，并补充说，暂时还没有看到德国改变立场的任何证据。从这次谈话中，大使得出一个结论：苏联政府目前决定要跟英法达成协议。他建议柏林采取新的努力使克里姆林宫发生兴趣。与此同时，斯大林却越来越倾向于同希特勒达成协议。

柏林照着舒伦堡的建议办了，经过双方的努力事情开始迅速发展。8月12日，阿斯塔霍夫拜访了舒努列特使，并通报说莫洛托夫愿意在莫斯科跟德国人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波兰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阿斯塔霍夫说，苏方提议逐阶段进行谈判，不必操之过急。然而，希特勒已经确定了9月1日入侵波兰，对“分阶段”讨论的想法不满意。8月14日，舒伦堡被指令通报莫洛托夫，称柏林认为，“德苏关系达到了转折点”，“已经不存在德苏之间现实的利益冲突”，“两国在过去一直都是友好带来好处，敌意带来破坏”。接下来大使计划要说的是，“英国的挑拨离间政策导致了一种局面，即有必要使德俄关系明朗化”。否则的话，在指令中说，“局面的发展将会使两国政府无法恢复德俄友好，从而进一步共同解决东欧问题”。

正如我们所见，希特勒在这里是大棒和胡萝卜同时使用：向斯大林许诺友好和新的疆土，同时以关系破裂相威胁。“各族人民领袖”依然继续这个游戏：在这一阶段莫斯科对德国的建议态度审慎。莫洛托夫向舒伦堡宣称，苏联政府虽然欢迎德国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愿望，但不打算急于求成。人民委员解释说，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需要相应的准备工作，以便使交换意见更富有成效”。与此同时，在这次谈话当中，莫洛托夫对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表现出

兴趣。其中，人民委员询问道，德国是否愿意对日本施加影响以改善其与苏联的关系，并讨论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保证问题。显然，这里的关键在于，在此前跟英法的谈判中，苏联方面发现，伦敦和巴黎不打算向波罗的海国家提供保证，类似他们对波兰那样的保证。这个立场在莫斯科被判读成，这是给希特勒有关沿着什么路线进攻苏联，同时又不引起英法的敌对行动的一个暗示。现在，斯大林想要希特勒本人切断通过波罗的海国家这条路线。

在计划入侵波兰时，德国政府的目标是消除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莫斯科则认为，互不侵犯条约可以使苏联在一段时间内避免纳粹入侵的危险。8月16日，希特勒答复说：德国愿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向日本施加压力以求改善日苏关系。他没有直接提到波罗的海，但是委托舒伦堡告诉莫洛托夫，即根据元首的意见，“考虑到业已形成的局面以及局势可能复杂化，因为德国不打算无休止地容忍波兰的挑衅，最好就紧要问题对德苏关系进行深入而迅速的澄清”。此外还通报说，从8月18日起，里宾特洛甫愿意随时飞往莫斯科，拥有元首的授权讨论全部问题，并且，如果必要的话，签署相应的文件。

如此坚决的态度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还没有忘记，英法代表团是乘坐普通客车到达莫斯科的，并且还没有任何授权。

同时，他发现希特勒急于求成，决定再来一番讨价还价。莫洛托夫执行了他的意志，对德国大使说，在帝国部长抵达莫斯科之

前，必须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签署贸易和贷款协定，准备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包括一项议定书，对德国此前所提建议的实质加以阐述。这样，第一次提到了后来一直作为“补充秘密议定书”出现的文件，直到现在，这份文件依然引起热烈的辩论。

在谈判的这个阶段里，阿斯塔霍夫从外交舞台上消失了。他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再也没有用了。但是，正如斯大林喜欢说的一句话，他“知道得太多了”。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命运。后来我们知道，阿斯塔霍夫被枪毙了。斯大林非常喜欢的那句中世纪名言再次得到证实：“只有死人是安全的”。

莫斯科还在把谈判开始的时间往后拖。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宣布，里宾特洛甫的访问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并且根本不能大肆张扬。舒伦堡把这个信息传回去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正在波赫特什塔根，元首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官邸里。总是竭力讨好上司的帝国部长感觉到此次他的使命并不令人愉快。真的，希特勒对舒伦堡报告的反应是大发雷霆。原来他预计不难说服的斯大林，正在用自己迟缓的动作打乱了所有的计划。里宾特洛甫的莫斯科之行再也不能往后拖了。希特勒想在入侵波兰之前跟斯大林达成协议。他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更何况面临着秋季道路泥泞的情况，入侵的日期延后，便意味着那一整套计划面临风险。

-----

## 斯大林与希特勒玩起了捉迷藏(2)

---

希特勒再次做出努力。8月19日，舒伦堡接到指示，立即拜见莫洛托夫，并向他通报，虽然德方更愿意在“正常的条件下”，通过外交渠道举行谈判，但是目前形成的非常局面不允许这样做。接下来大使被委托说明，德波关系在日趋恶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冲突，结果将导致公开的对抗。按照元首的意见，不能允许这种冲突给德苏关系制造困难，此外，在给大使的指令中意味深长地强调指出，在这场冲突中“俄国的利益必须得到关照”。

接到这个指令之后，舒伦堡马上前往克里姆林宫。但是，莫洛托夫相当冷淡地接受了这个声明。他重复说，首先应该签署贸易协定并予以公布。只有在此后才可能开始准备互不侵犯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大使刚刚回到自己的官邸，他又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去。显然，斯大林听完了莫洛托夫与舒伦堡谈话的汇报之后，在字里行间猜测出了跟元首做成一笔有利可图交易的极其诱人的可能。于是马上下令把德国大使叫回来。虽然莫洛托夫半个小时之前说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他现在一点也不难为情，客气地向舒伦堡解释说，向苏联政府汇报之后他愿意通报如下内容：

“如果8月20日签署贸易协定，那么帝国部长可以在8月26日或者27日前来莫斯科。”

为了更加明确地证实苏方的立场，莫洛托夫向舒伦堡转交了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文本。

在柏林，这一切被理解成斯大林愿意接受德国的要求。希特勒明白自己跟斯大林达成了相互谅解之后，他赶快要利用这个有利的局面。参加经济谈判的德国代表团接到指令，要表现出灵活性，于是，8月20日，苏德贸易协定签署了。然而，元首不能同意把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日期拖后到26—27日，这距离入侵波兰的日期太接近了。于是，他口授了自己给斯大林第一亲笔信，给那个他所仇恨的“世界布尔什维克”领袖：

1939年8月20日

致约·维·斯大林先生

莫斯科

1 我真诚地欢迎苏德贸易协定的签署，这是修改苏德关系的第一步。

2 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对我个人意味着加强德国的长期政策。如此，德国将回到最近几百年期间对两国有利的政策路线上来。因此，德国政府在此情形之下将坚定地从这个根本性转变之中得出全部结论。

3 我接受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以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先生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认为有必要尽快弄清楚与此有关

的问题。

4 苏联政府所希望的补充议定书，我坚信，实质上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德国负责此事的国务活动家有可能亲自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话。否则德国政府无法想象，如何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谈妥并签署这个补充议定书。

5 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令人无法忍受。波兰对一个大国的行为，使得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无论如何，德国现在将坚定地采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这些要求。

6 我认为，如果两国有愿望的话，不浪费时间进入相互之间新关系是合理的。因此，我再次建议您于8月22日星期二接见我的外交部长，但不要迟于8月23日星期三。外交部长将拥有广泛的、全面的授权起草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议定书等。考虑到国际局势，外交部长在莫斯科逗留一天或者一天以上是不可能的。我将非常高兴接到您尽快的答复。

阿道夫·希特勒

-----

交易(1)

-----

希特勒相当明显地向斯大林暗示了入侵波兰的日期，两个互不信任的人达成了一笔交易。

当时西方惟一想看到的是德国与苏联发生冲突，而希特勒似乎也愿意承担起消灭“布尔什维克瘟疫”的重任。

充满帝国野心的斯大林拿着著名的烟斗指着地图说：旅顺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远东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也都统统没有问题……

希特勒急不可耐地向全世界宣布了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

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该怎么办？现在有人认为，不应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即使签署的话，无论如何也该拒绝那个最初就被称为“不道德的”，“非法”的秘密议定书。虽然这是最近苏联官方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是拿现在的尺度衡量当时的局面。因为，现在大部分进步人类认为是不道德的许多东西，半个世纪之前则是国际行为的准则。并且，譬如现在美国入侵主权国家巴拿马，仅仅是因为华盛顿不喜欢它的总统，许多西方的道德家却认为是完全有道理的。按照现在的标准，对借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帮助推翻合法政府的西班牙事件“不干涉”政策，以及跟希特勒达成出卖捷克的慕尼黑条约，毫无疑问是不道德的。但是现任的英法领导人并不愿批评自己三十年代前任的政策。但是，关键并不在于此。重要的是，必须考虑1939年秋天之前形成的局面。

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两个互不信任的独裁者之间的一笔交易。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考虑，并且这些考虑在当时的时间点上吻

合了。希特勒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白无误地表示，愿意接受苏联更进一步的要求。那个时候，向莫斯科让步对他而言没有特别的意义。在没有放弃自己摧毁布尔什维克这个终极目标的同时，希特勒认为，将来可以加倍弥补现在的损失。现在最主要的，是遵守预定的入侵波兰的期限。于是，他相当明显地向斯大林暗示了这个日期，提到了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不可能呆两天以上。

而斯大林则把希特勒的信件看作与莫斯科长期合作的愿望。并且他非常喜欢信件作者有力而干脆利落的语调，以及具体而明确的建议。跟这样的政治家可以做大事！希特勒的电报与来自伦敦巴黎的那些含混不清、意谓不明、闪烁其辞的信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纳粹领袖一直都使他敬仰。早在他掌权之前，斯大林认为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家社会党，而是社会民主党人，他鄙视地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社会叛徒党人”。他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正统社会民主思想可以打破他在苏联建立的命令体制，并对他无边权力的合法性提出怀疑。而纳粹的方式方法跟他是声气相通！因此，与希特勒德国发展合作关系也就是适当的。那里，元首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在苏联，“各族人民领袖”的话同样也是不容置疑的。那里与这里一样——社会舆论，或者这个“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不会有任何问题。

向莫斯科发电报时，希特勒急不可耐地等着回音，度日如年，坐卧不宁。但是，他始终相信一点，他在斯大林身上找到了正确的路径，并且回答将是他所希望的。

而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正在权衡了各种替代方案的利弊。如果拒绝签署条约，那么如何保证苏联不是纳粹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呢？法国、更早些时候还有波兰，都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之后，宣布整整一代人将享有和平，声称与希特勒可以合作。而罗斯福在致张伯伦的电报中说：从此“欧洲进入了和平时代”。现在，柏林也要跟莫斯科签署不侵犯条约。如果拒绝签署的话，希特勒将向全世界宣布，只有布尔什维克粗暴地回绝了他伸出的拿着橄榄枝的手。驳回了不侵犯的想法之后，布尔什维克表明，正在准备进行侵略。欧洲文明面临巨大的威胁。全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打败这种威胁，而德国愿意担负起消灭“布尔什维克瘟疫”的重任。在英法政府内部绥靖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此类号召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苏联无从指望他们的援助。因为他们惟一想看到的，就是德国与苏联发生冲突。

当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可以防止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起码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奏效。斯大林从未排除，他最终将不得不跟希特勒斗一场。但是，他想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缓冲突。条约似乎提供了这种可能。况且，条约还能够使苏德长期合作。也许，希特勒也是这样考虑的，因为他在电报中指出，现在德国“采取数百年来对两国都有利的方针政策”。无论如何，斯大林考虑，一旦签署条约，德国将决定打击西方，而不是东方。而且那里的战争可能是长期的，这样可以使苏联置身冲突之外，起码可以到斯大林本人决定干涉的时

候为止。就当时的概念而言，类似的思路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每个大国，也就是纳粹侵略的潜在对象，大致都是这样推论的。

在这个意义上，“秘密补充议定书”看来也没有如我们今天所认为具有罪恶的图谋。从希特勒的信中非常清楚地看出，入侵波兰已经预先决定了。毫无疑问的是，波兰军队无法抵挡德军坦克师团的攻击。这样，德军将推进到我国边界线上，抵近明斯克和基辅，而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居民将处于德国统治之下。斯大林跟其他许多苏联人一样，都认为当时跟波兰的边界线是不公正的，是在一个困难时刻强加给我们的。在相当程度上，斯大林本人对产生这个“不公正的边界线”负有责任。十月革命之后，出现了独立的波兰国家，她与苏联的边界线是根据协约国盟国最高委员会的决定确定的，史称“寇松线”（由当时英国外相寇松勋爵而得名）。这条边界线基于种族原则：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聚居区划归苏联。波兰和苏联之间此后不久开战，最初红军得胜。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红军部队围困了华沙。列宁赋予此次战役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地主波兰的失败将破坏整个凡尔赛体制。因此，他要求叶格罗夫率领进攻利沃夫的红军师调转方向前往波兰首都，与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汇合，这样可以确保占领华沙。但是，西南方面军政治委员斯大林却坚持首先占领利沃夫。他没有服从列宁的命令。结果，波兰军队得到了法国顾问和协约国先进武器帮助，重创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后者撤退到了东部。与此同时，利沃夫附近的部队也被迫撤退。波兰人在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之

后，迫使苏联政府于 1921 年签署里加条约，强加了这个远远越过了“寇松线”的新边界。在这个意义上，与希特勒的协议将使斯大林心理上特别舒服。这使他有机会在自己的眼里自我平反，再次将国家的西部边界线大致按照“寇松线”划定。

-----

交易(2)

-----

但是，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还将带来其他的机会。如果 1991 年出版的《与莫洛托夫的一百零四次谈话》正确地复述了这位斯大林战友所说的话，那么 1939 至 1945 年间的许多事件将获得一个新的视角。1974 年 11 月 29 日，与政论作家丘耶夫谈话时，已经退休多年的莫洛托夫承认说：“我认为自己作为外交部长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祖国的边界。并且，我们跟斯大林这个任务完成得似乎不错……”

斯大林对战后的新疆界应该是满意的。有一次，人们把刚刚出版的苏联新边界中学地图送到他的别墅。按照惯例，“各族人民万世领袖”用图钉把地图钉在墙上，然后自满地说：

“看看吧，我们有什么成果……北方完全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芬兰在我们面前犯了大错，于是我们把边境推移到远离开列宁格勒的地方。波罗的海自古就是俄国的土地！现在又成了我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乌克兰人，在一起，摩尔多瓦人，也在在一起。”然后用烟斗在自己帝国的东部划了一道线，接着说，“这里我们有什么？……千岛群岛现在是我们的。萨哈林全部属于我们，看看吧，多好啊！还有旅顺也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远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统统都没有问题……”

然后，用烟斗划过高加索以南地区，说：

“就是这里，我不喜欢我们的边境线……”

斯大林未能夺回列宁 1921 年给土耳其的卡尔斯地区。

他上面所提到的新疆界，部分也是借助与希特勒的同谋，部分则是经过打胜仗，虽然也是流血牺牲，以及争取到反法西斯同盟国同意的结果……

斯大林充满了帝国的野心。他想把原来属于沙俄的土地全部夺回来。对此，他曾经有过公开的讲话。打败日本之后，他讲到过，他那一代人四十年来都在等待旅顺港，大连市，南萨哈林回归俄国。战前，比萨拉比亚在我国的地图上标示为“有争议的地区”。将波罗的海加入苏联也是他的夙愿。补充议定书使得有可能实现这些意图。这些意图也许跟两次大战之间的思维方式是契合的。可是，从现代的立场上看，他们是不道德的，侵略性的。同样不能不承认，8 月 23 日的秘密议定书，以及 1939 年 9 月 28 日的议定书客观上可以看作是产生了未来苏德武装冲突所开始的战线的两个文件。

产生了最前防御线，将这个战线与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敖德萨分割开了大约 200—300 公里。不难想象，如果入侵不是从维堡一带，而是直接从市区开始的话，列宁格勒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也可能，现在，这个北方威尼斯的所在会是碧波荡漾，因为希特勒曾经计划淹没“十月革命的摇篮”。所以说，对待历史事实也要更加审慎。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当时认为是“合法”的政治工具。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是外交采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说法，在当时很少引起异议。

8 月 21 日，斯大林给希特勒的答复交给了舒伦堡。

1939 年 8 月 21 日

致德意志帝国总理

阿·希特勒先生

我感谢您的来信。

我希望，互不侵犯协议将给我们两国政治关系的显著改善创造一个转折点。

我们两国人民需要相互之间的和平条约。德国政府同意签署不侵犯条约，将为消除政治紧张局面，以及在我们两国之间确立和平与合作创造基础。

苏联政府委托我通报您，同意里宾特洛甫先生于 8 月 23 日前来莫斯科。

约·斯大林

当天夜里，中欧时间 23 点刚过，德国电台中断了节目，然后播

音员用庄严的语调宣读了如下声明：

“帝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达成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协议。帝国部长里宾特洛甫将于8月23日抵达莫斯科完成谈判。”

希特勒急于向全世界宣布已经跟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他要切断一切退路.....

-----  
一小卷《旧约》(1)  
-----

“军事共产主义”残酷无情地剥夺了农村，造成物资普遍匮乏。我们一家人想尽办法，才能勉强糊口。

乡村牧师送给我一小本《旧约》，圣经故事令人着迷。

斯帕斯塔楼上又响起了钟声，提醒我们时间一去不复返。应该结束议定书的核对工作了。但我的思绪飞到了遥远的过去，飞到那条小径开始的地方，这小径最终将我带进克里姆林宫里这间小小的办公室来。

.....我们预先准备好在斯塔涅茨基下船。东西都拿到了底层甲板上，等着船头靠上岸。时刻表中没有规定停船，这促使我们动作要快。由于除了我们再也没有人上岸，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五分钟。

柳芭姑妈在跳板旁边等着我们。虽然当时一片混乱，但父亲还是想办法通知她我们要来了。我觉得，她跟父亲一点也不像，所以很难相信他们是兄妹。她整个人黑黝黝的，干瘦干瘦，一张脸神经质地拉长了，显得很孤僻，并且我觉得，她不大高兴我们一家突然投奔到她这儿来。不过后来发现，这个最初印象不大正确。她母亲般地关照了我们一家来自彼得堡的难民，想方设法要使我们在新地方生活得轻松些。我现在觉得，她表情严肃，主要是认为自己被抛弃她的丈夫欺侮了，并且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那个艰难时世的确很困难。不过，主要是醋意折磨着她：她的前夫娶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子，她从不放过机会把人家骂作狡猾而不知羞耻的狐狸精。父亲早在革命前就认识柳芭姑姑的前夫。他就住在切尔尼戈夫，并且带着自己漂亮的金发妻子到我们家住的斯瓦里切夫卡来过几次。每次柳芭姑姑总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从窗帘后面朝着自己的情敌咒骂.....

我的表兄谢尔盖握着缰绳，坐在套着两匹马的平板车上，他差不多也是十来岁。我听说过他，当然是头一次见到他。他长得非常淘气——一头散乱的淡黄色头发，脸上长满了雀斑。我马上就感觉到，我们能作好朋友。

父母亲跟姑姑拥抱接吻，一阵亲热。姑姑抚摸了我的头。我们把东西拿到车上，各自坐好。

我们乘车穿过一片茂密的松林，然后沿着一片土豆田往前走。远处可以看见一排整齐的金字塔状的杨树。

“这是斯瓦里切夫卡，”柳芭姑姑说，“从前整个医院的院子周围也是这样的杨树。为了给病房和宿舍取暖，不得不砍掉了一部分……”

我们穿过戈列克夫卡村，来到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路的两边长着百年柳树。马车咯吱咯吱地走过小河上的木桥，来到了敞开的大门。从这里走进去是长满青草的内院，右手是两座红砖三层楼。姑姑解释说，这是门诊部以及四十个床位的住院部。这就是地方医院，或者现在叫做乡村医院，斯瓦里切夫卡医院，名字取自创办人，当地的一个开明地主。医院开办于上世纪末，它为周围五个村子提供服务，按照当时的标准可以算作模范医院。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都没有破坏到这家医院，所以它依然保持着初创时的原貌。主要医护人员也保留了下来：主治医生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瓦西里耶夫，助产士柳芭姑姑和医士普洛科菲·费奥德洛维奇·乌沙奇。后勤人员基本上也没有变化。

马厩现在空着，原来那里养着医院和医护人员个人所有的牲畜。这样，可以保证工作人员和病人的奶产品供应。远处是草棚和猪圈。院子的另外一处是生活区：主治医生的房子和助产士、医士住的偏房。住院部的楼里有杂役住的几间房子。住人的楼房后面是果园，旁边是菜园子。一条湍急的小河绕着院子，河的两岸长满了柳树。小河湾里的水相当深，河边上设了一个浴场。果园子显然在医院之前早就有了。苹果树枝挂到了厢房上，于是，爬到屋顶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高处摘到苹果。梨树非常之大，简直就像是百年

的橡树。

刚开始，我们住在柳芭姑姑家里，但很快就发现太挤了。大概她跟谢尔盖二人住两间房子还算自在。但我们一来，就将她们的生活复杂化了。她得跟儿子睡在一间屋子里。而且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小的卧室里也转不开身。况且如果产妇情况复杂，柳芭姑姑会把她留在家里，而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个产妇。我们把她安顿在厨房里。晚上阵痛的时候，会传出来呻吟和喊叫声。姑姑从床上跳下来，跑到厨房去，家里一片忙乱。再加上还有我们一家！必须另外找地方住。

医士普洛科菲·费奥德洛维奇替我们解了围。他一个单身汉住一套三室的房子，叫我们搬过去住。我们搬进了两间紧挨着的房间，大家一起在有俄式炉子的大厨房里吃饭。另外，还有一间带窗户的储藏室，父亲后来在这里安顿了自己的鞋子作坊。

医士普洛科菲是个少见的善良客气的人。我们很快跟他处得非常好，事实上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当我们回到基辅之后，普罗沙叔叔，当时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他，在基辅住了三年，完成了自己医学院的学业。

父亲开始找工作，但毫无结果。最先一段时间，妈妈拿自己的衣服跟村里的姑娘们换一些食品。但是，父亲很快就拿出自己天生的精明能干，开始干一些乡村居民需要的活计：用鱼油、炭灰加上其他一些东西炼肥皂。肥皂的气味不是很好，但洗衣服的效果却还不错。然后他回了一趟距离斯瓦里切夫卡大约有一百多公里的切尔

尼戈夫老家。拿来了自己做鞋子的工具，给我带来了格林兄弟的童话，卡尔·曼的几小本德文书和瓦特·斯哥特带漂亮插图的英文书。这些书引起了我对外语的兴趣。

-----  
一小卷《旧约》(2)  
-----

父亲很快就学会了鞋匠的手艺。皮子没有任何问题。许多人在他那儿定做靴子，乡村的时髦女人们则要更讲究一些的鞋子。他用上等的红色山羊皮为我缝制了一双漂亮的小靴子，我喜欢得不得了，睡觉的时候都不愿脱下来。

我们家的情况有了改善。虽然有“军事共产主义”这把硬扫帚，起码我们附近乡村的居民们还是藏了一些东西。我们的饭桌上有了鸡蛋，各种米，牛奶，奶渣，乌克兰家常香肠，有时还能有肉。复活节之前，父亲会画出一批彩蛋，很受邻居们的欢迎。那时的乡村里流行一种古老的风俗：“碰”复活节彩蛋。谁的鸡蛋碰破了，那人就算输了，必须把鸡蛋交给得胜的人。为了让鸡蛋壳子硬一些，饲料里面加了各种东西。但是，效果总不是太好。

父亲想出来了一个牢靠，但未必能够被允许的方法。他用奶

渣，石灰浆和蛋白做出了一种东西，然后涂在鸡蛋的小头上。然后，经过这种方法加工的鸡蛋再画上各种颜色，完全遮盖住人工涂层。这种鸡蛋绝对不怕碰，所以，谢尔盖我们俩用它来玩“碰鸡蛋”的游戏，给家里拿回来不少战利品，给节日的饭桌上添了许多鸡蛋。

大家在医院的院子里住得很和睦。类似的本地或者从饥荒地区逃出来的知识分子绿洲，在距离斯瓦里切夫卡大约几公里的一片大树林子中间的林业所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在第聂伯河畔斯塔涅茨基教区。总林业师叶戈尔叔叔跟几个护林员和雇来的猎人住在一个百年古松围起来的院子里。每个人都有家，以及跟我和谢尔盖一般大的孩子。我们非常喜欢复活节，三一节，圣诞节以及新年前夕的节日。每次都有许多客人，其中许多人是艺术家。节目从自娱音乐会开始，演奏钢琴，吉他，曼陀铃，小提琴等等。然后吃晚饭，各种甜食。孩子们跑到树林里玩捉迷藏，冬天则是滑雪橇。大人们在留声机的伴奏下跳舞。这些节日的气氛可以叫人暂时忘却穷困，相互仇视以及相互残杀的血腥冲突。

炎热夏天的休息日里，也是这么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呆在第聂伯河边。大家一大早套好马车，装上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然后在通往喀帕切夫的林间小道会合。革命前，那里是米洛拉多维奇伯爵的大型养马场。现在，养马场只剩下了屋顶倒塌废弃的马厩，和河岸边一望无际的绿草场。米洛拉多维奇一家逃走了，马匹被那些在乌克兰更迭不断的统治者没收了，庞大的产业无人照料。高高的青草

中，有许多芬芳鲜红的草莓。它的香味，跟正在开花的青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大地上飘荡。再远处，在河流的陡弯处，有一处浅滩，这里的沙子非常细。一个长满藤蔓和野蔷薇的小山包，恰好把沙滩一分为二。一边是男人们在游泳，另外一面是女人们。这样大家都可以脱光衣服。年龄大一些的人在水里呆一会儿，就上岸点燃篝火，准备做饭了。年轻人则继续晒太阳，在水中嬉戏。

第一次野餐时，叶戈尔叔叔的大儿子瓦罗佳叫上了我跟谢尔盖。他大约有十七岁了。身边站着的是他的朋友们。

HJ \*5/9】“小伙子，”瓦罗佳对我们俩说，“去女人那一边跑一趟，看看姑娘们长得什么样。你们是小孩子，她们不会注意的。回来讲给我们听。”

我记得大人们的警告：看到光身子的女人会瞎眼的，所以推托不愿去。

“你们就冒险看一眼吧。”瓦罗佳坚持说，“看到之后，你们自己也会觉得好玩。”

由于我只见过女人穿长裙，所以，我想象着，她们的腿应该很短，也就比裙子下面能看见的那部分略长一些罢了，上面是长长的身子。现在，有机会核实一下，是不是这样。最终我们同意完成这个任务。不过，比我大三岁的谢尔盖也没有怎么反对。

我们俩浑身扎满了野蔷薇，终于来到了沙滩的另一边，走进了水边。我斜眼看着美妙的画面，明白自己对女人身体的概念是大错特错。我们很想看得仔细一些，于是在水里面走过来走过去，拿眼

睛偷偷看着姑娘们。刚开始她们没有在意，后来发现我们不停地溜达，其中一个姑娘整个身子转过来，正对着我们，骂道：

“两个小孩子，别在这儿淌浑水了，滚远点！……”

我们俩挨骂之后，很快跑回去了，躲在灌木丛后面的小伙子们非常仔细地问东问西。

在斯塔涅茨基修建了一个修船基地。那里也为红色第聂伯舰队改装蒸汽轮船。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父亲自告奋勇去帮忙。他利用自己的知识，确定安装火炮的甲板的强度。这项工作的报酬是每月发给他两口袋燕麦。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农民们愿意用任何东西来换燕麦。

格列柯夫卡村里，住着一个年龄很大的老人——奥内舒克爷爷。他原来是制作古代扎波罗热哥萨克独木舟的高手。尖头平尾的小船，是用一根粗柳树的树干凿出来的。然后，给柔和的奶油色木头里外涂上好几层特制的浆，这样船不会透水，而且经久耐用。这样的独木舟可以使用上百年，当时在第聂伯河上可以看见不少这样的小船。浆的制作也很特别，它有点像现在的塑料。先从白桦树皮里挤出树汁来，然后加上胶，细沙子，炭灰和木炭研成的末。所有这些东西要仔细搅拌均匀，不能让它变成沾黏的一团。干透之后，它变成了冲洗不掉的一层皮，非常牢靠，就像燧石一样。船里加上一个座位。这样的独木舟非常轻巧，坐在船尾上，用一支桨可以达到相当的速度。扎波罗热哥萨克乘坐这种独木舟，像一群丸花蜂一样，可以攻击大型船只，而一旦有危险，瞬间便可以躲藏到小河道

里去。

-----  
一小卷《旧约》(3)  
-----

父亲是造船出身，对这些小船发生了兴趣。他跟奥内舒克爷爷一起，给我做了一只小独木舟。它给了我多少乐趣！它飞快，灵活，吃水浅，可以到达任何浅滩。坐在船尾上，船头高高翘起，我可以沿着我们的小河划到天涯海角去。轻松地操着桨，小舟似乎滑过白色黄色的睡莲和巨大的牛蒡。我几乎整天呆在小河上。在小河湾，我停靠在长满芦苇的岸边，游泳，或者躺在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草地上。我不曾有过任何玩具，自己动手，用树条子，水草，小贝壳和松树皮做出许多帆船，里面安排有海盗，被劫持的公主和王子，搜寻他们或者出发去十字远征的骑士们。当我认字之后，当地的牧师送给我了一小本《旧约》，它成了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我在自己乘独木舟一边到处漫游中，一边演习着圣经故事的情节：一会儿在芦苇丛中发现了莫伊赛法老的儿子，一会儿是大洪水中乘方舟渡水的诺亚.....

到处在传说新的经济政策。父亲去了基辅，并且很快就通知我

们，说局势正在好转。已经答应给他在他在一家工厂安排一个好职位，他等着我们过去。妈妈高兴极了，于是我们开始收拾上路。

-----  
斯大林为德国人民的元首的健康干杯(1)  
-----

希特勒宣称，将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斯大林非常喜欢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宏伟建筑，二战之后，苏联修建的类似建筑物的底座，却取自希特勒帝国办公厅废墟上的花岗岩。

1941 年，苏联特务机关向德国遣送了 4000 多名德国共产党员。作为回报，纳粹也向苏联遣送了追捕的人。

正如原来预计的那样，里宾特洛甫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抵达莫斯科，并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由于手里有希特勒尽快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个补充秘密议定书的指令，所以帝国部长没有更多地讨价还价。事实上，他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主要条件，并且在当天晚上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所有这些程序连同来的晚宴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在这之后，里宾特洛甫才得以向希特勒通报自己出访大获成功。

这段时间里，元首一眼未合。他像笼中困兽一般，在自己波尔赫特斯塔根的别墅里走来走去，害怕相信一切会像他计划的那样。里宾特洛甫的沉默变得令他难以忍受。希特勒甚至对自己身边的人宣称，如果他的部长不能跟斯大林达成协议的话，他本人将立即前往莫斯科.....

其时，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正在签署文件，盖章。服务生送来了香槟酒。大家相互恭维敬酒，碰杯的声音，微笑和笑话——所有这些使气氛越发热烈。在场的人们观看了现场举办的“第三帝国”首都新的宏伟建筑的设计方案展览。这些方案是元首所喜爱的建筑设计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的，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大师，善于制造各种震撼大众想象力的宏大建筑群和灯光效果。里宾特洛甫极其恭敬地解释说，这些建筑物的设计创意是元首亲自提出来的，他亲笔画的草图放在单独的展台上。

斯大林喜欢这个展览。这个展览跟他本人就“伟大成就”时期建筑的概念是相契合的。战后，根据斯大林的意愿，在莫斯科兴建了数座与斯佩尔的设想类似的高层建筑——同样的尖顶与圆柱。但是，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些大楼基座所用的花岗岩取材自希特勒帝国办公厅的废墟.....

为里宾特洛甫而设的晚宴在继续进行。热烈的谈话拉近了主宾。事后，向希特勒汇报这次宴会时，对“各族人民领袖”的好客大吃一惊的帝国部长大度地补充说：“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可爱至极。我感到自己跟我们的老党员在一起。”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党，可是这些党派的领袖们多么迅速地找到了共同语言！毫无疑问，这一夜斯大林拿出了自己全部的魅力。在这个“同志式”的气氛中，里宾特洛甫似乎无意躲避“反共产国际条约”。他记得，莫洛托夫援引这个条约，认为这是跟苏联德国新关系不相容的。帝国部长对斯大林半开玩笑地说：“反共产国际条约，实质上不是旨在反对苏联，而是西方民主国家。”尽管这种论断十分荒唐，斯大林接口并用里宾特洛甫的腔调说：

“反共产国际条约实际上主要吓坏了伦敦和英国小店主。”

帝国部长对这种出乎意外的意见一致所鼓舞，他赶快附和对方的意见说：

“斯大林先生跟伦敦和英国的小店主们相比，受到的惊吓要小多了。”

这次简短的交换意见成了一个特别的序曲，即导致了有关苏联加入“反共产国际条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不久签署的三国轴心协议——的谈判。

宴会在进行。斯大林为希特勒干杯。莫洛托夫宣布为里宾特洛甫以及舒伦堡干杯。大家一起为苏德关系的“新纪元”干杯。告别时，斯大林对帝国部长保证说：

“苏联对待这个条约的态度非常认真。我发誓担保，苏联不会欺骗自己的伙伴……”

斯大林期待着从希特勒那儿得到同样的保证。

在波兰远征结束，苏军与德军在1939年8月23日补充秘密议定

书中划定的分界线相遇之后，有必要对新的情况签约。里宾特洛甫再次来到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一个边界协定或者商定勘界线就完全足够了。但是，斯大林极力争取进一步发展跟德国的关系，走得更远。1939年9月28日，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署友好与边界条约，连带还有几个秘密议定书。第一个议定书中，规定双方不得允许“波兰的宣传”。这一条事实上促成了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特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它们不仅仅交换有关“波兰宣传”的情报，而且都向对方交出许多各自想要的人。到1941年夏，苏联特务机关向德国遣送了大约四千多人，其中许多是在苏联被捕并枪毙的德国共产党人的家属（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总共枪毙了242名德国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多位德共中央委员），以及在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跑到苏联来的德国工人。这些人的大部分被盖世太保立即投入集中营，许多人在集中营饿死或者被枪毙。作为回报，纳粹向苏联遣送了内务人民委员会搜捕的人。

第二个补充秘密议定书包含一个条款，根据这一条，对8月23日的秘密议定书的第一条进行了修改。当时，苏联的利益范围包括芬兰。现在，立陶宛也属于苏联的利益范围。同时，卢布林省全部和华沙省的一部分移交给德国，并对分界线作相应修改。此外还规定，德国与立陶宛之间现行经济关系将不受苏联在这个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干预。

-----  
斯大林为德国人民的元首的健康干杯(2)  
-----

又一次上了香槟酒。大家开始祝酒。斯大林毫不掩饰与希特勒新协议的满意之情。他说：

“我知道，德国人民爱戴自己的元首。因此我想为他干杯。”

当送来了标示刚刚协商好的德国领地与苏联之间边界线的地图之后，斯大林将地图在桌子上铺开，拿起一支大号蓝色铅笔，豪放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大笔一挥，盖过了新到手的领土——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而里宾特洛甫则用斯大林的红铅笔签了名。

1989年，莫斯科围绕1939年8月23日秘密议定书发生了辩论，许多参加者不知何故却忽略了同一年，1939年9月28日的秘密议定书。这样发生了混乱，结果戈尔巴乔夫总统也被误导。在一次讲话中，他显然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对8月23日议定书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理由是当时的立陶宛属于德国利益范围，而边界与事实上形成的分界线并不吻合。如果那些专家看过9月28日的议定书的话，也就不会有这个令人惋惜的尴尬。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上对希特勒的称赞，很快就有了回应。十二月下旬，元首电贺“各族人民领袖”六十岁生日。在电报中，希特勒“表达了对友好苏联的幸福与繁荣最良好的祝愿”。斯大

林立即回电：“用鲜血凝聚起来的德国和苏联人民的友谊将会继续保持下去并得到巩固。”

“用鲜血凝聚起来的友谊”，这听上去很奇怪。是否指的是前不久波兰的事件，以及当红军与德军在预先约定的分界线相遇之后，在布列斯特以及其他城市举行的联合阅兵式上所展示的“战友情”？或者这暗示着苏军在芬兰雪原上的惨重损失？也可能，斯大林已经在考虑未来跟希特勒一起瓜分全球利益范围？

不能排除“各族人民领袖”的此类野心。当英法对德宣战之后，斯大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现在，希特勒在西方陷入了长期的冲突之中。冲突可能延续数年。那么，即便德国最终取胜，它也将会被削弱，所以莫斯科将拥有前景广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也许会成熟。而现在最主要的，是保持跟德国现有的关系。

斯大林一般要审核苏德合作之后派往柏林工作的人员名单。1940年12月，任命了塔斯社驻柏林分社的新主任，此人姓尤金。斯大林拒绝批准这个人选，并责备莫洛托夫说：

“你们怎么能够推荐这个姓氏的人到德国工作。要知道尤金听起来像尤德，德语里就是犹太人。”

莫洛托夫承认自己“疏忽了”，但解释说，这个人博学多才，教育背景良好，精通德语。

这时，斯大林拿起自己大号蓝色铅笔，划掉“尤金”，然后写上了“菲里波夫”，甚至没有询问当事人的意见。此人终其一生都成了“菲里波夫”，后来官至苏联驻芬兰大使……

1944 年夏天，我国代表团要出发去华盛顿参加杜巴顿—奥克斯会议，临行之前斯大林将我们所有人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嘱咐了几句话之后，他询问了英美代表团人员情况。当他得知，他们每个代表团里都有两三个陆军海军上将之后，说：

“这么说，我们只有一个将军斯拉文，他能够应付过来的。罗基奥诺夫上校怎么着，要在英美将军面前立正吗？”

莫洛托夫开始解释说，罗基奥诺夫上校在未来的会议上作用不小。

斯大林没有说话，把名单中的“上校”划掉，然后写上“海军上将”，甚至没有想到通知海军负责人。第二天早晨在机场上，我们看见罗基奥诺夫身穿崭新的海军上将军服。回到莫斯科之后，他继续做上将，后来被任命为苏联驻希腊大使。

这并不是斯大林唯一的一次即兴发挥。

纳粹军队闪电出击西欧，法国出乎意料被迅速打败，英军无力阻挡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推进，以及从敦刻尔克仓惶撤退——所有这一切使斯大林不知所措，吓坏了他。他越发害怕跟德国发生冲突，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以便讨好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机器现在将走向何方？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似乎给了一个机会，试探纳粹领导人的意图。

希特勒也明白，是什么事情让斯大林恐慌不安。他展开了一个广泛的假情报行动，以便让莫斯科信服，他正在积极准备入侵英伦三岛。希特勒在跟人民委员会谈时，正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

建议参加分割“英国的无主家产”，也就是由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分享英国的殖民地。希特勒言之凿凿，他表示，大不列颠马上就要被德国占领，这个大国将不复存在。同时，他提出一项建议，要苏联加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也就是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一个半月之前签署的“三国轴心协议”。人民委员表现谨慎，没有被拖进来讨论希特勒提出的建议。他坚持要求德军从苏联边界撤走最近几个月不断增加的部队。

-----

方还是四方条约？

-----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德国期间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制定了战后分割英国殖民地的计划。不巧的是，当时英国轰炸机飞临柏林。

我听到宣布德国军队已经越过边境线的德国外长最后一句话是：请转告莫斯科，我是反对入侵苏联的。

11月13日，苏联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前夕，根据元首的委派，应该由里宾特洛甫结束谈判。就像跟希特勒的多次会谈一样，此次我也作为翻译参与了会谈。

外长的办公室十分豪华，不过比希特勒的办公室略小一些——老式镀金家具，挂满了墙壁的壁毯，沉重的像框里的油画，四个墙角里高高的台架上放着瓷器和青铜的塑像。最初几分钟一般给摄影记者。里宾特洛甫亲切地微笑着，高高抬起头，握着苏联客人的手。他高傲而自尊……

我写着这些文字，并回想起那个办公室，但却想到的是另外一个里宾特洛甫，1941年6月21日夜里他向我陪同的苏联大使杰卡诺佐夫宣布战争开始。帝国部长在宣布这项对于纳粹帝国而言致命的消息之前，显然为了壮胆喝了几杯。虽然，也可能之前里宾特洛甫本来在希特勒的大本营庆贺了又一场“闪击战”的开始。他的脸上布满了红斑，双手在颤抖。

里宾特洛甫宣布，两个小时之前，德军越过了苏联边境线。听完这话之后，大使陡然站起来说，德国领导人正在进行罪恶的侵略，为此将会被严惩。杰卡诺佐夫转过身去，没有告辞便向出口走去。我紧随着他。这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里宾特洛甫紧跟在我们后面，开始小声说，似乎他本人反对元首与俄国开战的决定，甚至劝说希特勒放弃这种疯狂的想法，但后者并没有听他的。

“请转告莫斯科，我是反对入侵的，”当我们出了走廊，正在走下台阶时，我听到了里宾特洛甫最后的一句话。

这个刚刚给另一个大国宣战的外交部长令人惊讶的承认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意料到了上绞架的可耻结局？在纽伦堡审判期间，里宾特洛甫企图减轻罪责，他向法庭提到，通知了苏联政府自己反

对希特勒入侵的决定。但这一点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最终，摄影和文字记者都退出去了。两位部长围着一张小圆桌开始了会谈。圆桌中央的台灯包着一个细皮子灯罩，装饰着各种彩色版画。帝国部长办公室里古代大师们的壁毯和油画显然是刚刚来自法国的战利品。可这个灯罩也是吗？现在我在想，它会不会是希姆莱著名的礼物之一？皮革非常之薄，很像是人皮。

“根据元首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开始了，“应该对会谈进行总结并达成原则性协议.....”

帝国部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接着说：

“这里是德国政府的几条建议.....”

帝国部长开始讲述希特勒此前表述过的有关在英国战败之后分割“无主资产”和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等等，但这句话并还来得及说完，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可以听到，炸弹在附近什么地方爆炸，部长办公室高大的窗户上玻璃在震颤。HJ \*5/9】

英国方面知道莫洛托夫要来柏林，所以积聚全部现有的兵力，对“第三帝国”首都进行猛烈轰炸，以表明英国还有继续作战的力量。后来斯大林开玩笑责备丘吉尔说：

“你们为什么轰炸我的维亚切斯拉夫？.....”

但是，我们当然顾不上开玩笑。

“留在这里不安全，”里宾特洛甫说，“我们下到防空洞去吧，那里安静些.....”

他领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向电梯。下到地下很深的地方之

后，来到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布置也是富丽堂皇。

当里宾特洛甫再次继续自己英国很快就要被打败，以及必须支配其财产的话题时，莫洛托夫用自己著名的那句话打断了对方：

“既然英国被打败，那么为什么我们坐在防空洞里？并且是谁家的炸弹落得那么近，甚至在这里都可以听见爆炸声？”

显然，那些论断莫洛托夫完全没有幽默感的人错了。他有时候说出话来入木三分。但是，当着斯大林的面他更多地不作声，所以得到了缄默者的名号。

里宾特洛甫感到有些困惑，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口气坚决地说，英国人迟早要被打败的。

“根据德国政府的意见，”帝国部长接着说，“必须采取实际步骤分割前英帝国的时刻正在来临。因此，非常要紧的是苏联及时加入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参加的三国条约，并将其变成四国条约。”

柏林提出了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一方，苏联为另外一方的条约草案，宣布四大国愿意合作以保证“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自然利益范围”。同时，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然利益。条约从签字之日起为期十年，根据各方同意可以延长。还规定有两个秘密议定书。其中一个规定了条约各方优先利益范围，并且给苏联划定了“印度洋方向的”南方。第二个议定书涉及与土耳其的关系，并且考虑到苏联的利益，用新的海峡公约替代蒙特利尔公约。

-----  
“帝城城门上你的盾牌”(1)  
-----

在德国大幅度削减了对苏联的供货之后，苏方仍然认真地履行协定的义务。而希特勒则不必要担心英国的封锁。

莫洛托夫对我说，今晚有非常重要的翻译任务，德国大使要来.....

斯大林幻想能实现几代沙皇的夙愿，但他却错了。

回到莫斯科之后，莫洛托夫向政治局汇报了与希特勒以及里宾特洛甫会谈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即最近一段时期可以不必担心德国的进攻。我不认为，莫洛托夫相信了希特勒的解释，即似乎集中在苏联边境线上的德军，入侵英伦三岛之前正在进行休整。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要求德国人撤军。然而，有关“四国条约”的建议，以及德国精心拟定的条件似乎在证明，“第三帝国”政府在某个时期之内有着继续发展苏德关系的意愿。但关键的也许是另外一件事。即莫洛托夫报告给斯大林本人的一件事：希特勒愿意与他举行会晤。

斯大林一直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狡猾而精于算计的政治家。他以为自己可以洞察元首的思路，猜透他的盘算。现在，柏林有关“四国条约”的建议，是这些盘算合乎逻辑的发展。希特勒确信，甚至在德

国大幅度削减了供货量之后，苏方仍在认真履行贸易协定的义务。苏联采购殖民地商品并通过自己的境内转运到德国，使得希特勒可以不必担心英国的封锁。斯大林承诺，不会欺骗自己的伙伴。所以，现在希特勒建议莫斯科加入“三国条约”，并愿意考虑苏联的利益，包括修改黑海海峡制度。所有这些，他们将在希特勒建议举行的单独会谈中进行讨论。而这个脑袋迟钝的莫洛托夫竟然避而不谈如此重要的建议，并且还想拖延。可是为何要拖延？当然要尽快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

“各族人民领袖”就是这样，或者大致这样推论的。

他需要大约一周多一些的时间来准备给希特勒的答复。

11月25日早晨，也就是莫洛托夫从柏林回国仅仅过了十天之后，人民委员叫来了我。

“今天晚上九点钟，”他说着话，一边特别仔细地盯着我，“我将接待舒伦堡。请提前告诉他。这次谈话非常重要。您来翻译……”

我打电话到德国大使馆，并通报说，今天晚上，二十一点整，人民委员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等待大使。

我提前十分钟走出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正门，以便陪同大使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魏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我是很熟悉。我曾经多次陪同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到位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街（从前的列昂捷夫街，1996年之后恢复此名——译注）的德国大使馆，以及位于净街（现在是俄国东正教牧首的住宅）的大使官邸去。最近一次，我在白俄罗斯火车站的月台上见到过舒伦堡，他在那儿欢迎

从柏林回国的莫洛托夫。那天，大使戴着闪闪发亮的圆筒高帽，身穿燕尾服，肩披风衣。今天，他身穿一套深灰色长大衣，细毛毡礼帽，像当时最时兴的那样，帽檐略微朝上翘一点。跟大使一起从黑色“奔驰”出来的还有大使馆的参赞古斯塔夫·辛格尔，他精通俄语，充任翻译。

把上衣留在存衣处之后，我们乘坐红木电梯上到二楼，然后走向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办公室。大使的优雅总是很引人注目。他身穿黑色小细纹西装，上衣口袋里插着雪白的手巾，浆硬的袖口上扣着两枚大型金袖扣，同样浆硬的领口，使他的头高高扬起。所以，打着自由结、别着浅蓝色珍珠别针的宽宽的黑领带十分醒目。剃得精光的脑袋，紧紧包着颧骨的黝黑的皮肤给了他的脸上连同精心修剪的小胡子一种东方风格。也许，这是长期呆在东方的缘故。舒伦堡多年来在德黑兰代表德国的利益。他显然很喜欢伊朗。在他的官邸里，挂满几面墙的是精美的伊斯法罕壁毯，许多古代的兵器，带着许多奇怪而精巧镶嵌物的盾牌，弯刀和短剑等等都非常引人注目。到处挂着小幅波斯画，有许多是色情题材，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都被认为有伤体面，但是表明了这个世袭贵族的大胆和“观点的宽泛”。

舒伦堡自信地沿着克里姆林宫走廊款步走在我们前面——他身材高大，挺拔，非常自傲。谁会想到，没过多少时间，盖世太保的刽子手将把他作为没有得逞的谋杀希特勒的参与者绞死？……

也许，两个大使的悲惨结局是命中注定的：驻莫斯科的舒伦堡

和驻柏林的杰卡诺佐夫。他们在恐怖的流血冲突前夕代表各自的国家，并且后来两人都被各自的政府审判并处死：舒伦堡于 1944 年，杰卡诺佐夫于 1953 年作为贝利亚团伙的成员被处死……

莫洛托夫跟客人们问好，并请他们在靠墙的一条铺着绿色呢子长桌旁落座，之后他说道：

“我邀请您来，大使先生，是为了通报如下事项。苏联政府认真研究了 11 月 13 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提出的建议，并愿意在一定条件之下，肯定地对待签署有关政治经济合作的四国条约……”

接下来，人民委员列举了各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德军立即撤出芬兰，通过签署苏联保加利亚互助条约以保障苏联黑海地区边境的安全，以长期租赁的方式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建立苏联的陆海军基地，承认苏联在波斯湾方向、巴图米和巴库以南地区的优先利益，日本放弃在萨哈林的煤炭和石油租借权等。

-----

“帝城城门上你的盾牌”(2)

-----

莫洛托夫接着说：“根据上述要求，必须对里宾特洛甫先生有关议定书的建议进行修改。我们认为，如果土耳其对苏联在海峡的基

地表示反对，三大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必须制定并实施必要的外交与军事措施。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四国条约应该带有不是两个，像帝国部长所规定的，而是五个秘密议定书.....”

人民委员简要地讲述了这些议定书的内容之后，请求大使立即将苏联政府有关“四国条约”的想法转交给柏林。

“我们希望尽快收到德国政府的回复。”莫洛托夫最后总结说。

送舒伦堡出去时，我激动万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要有我们的基地了！这简直是妙不可言。令人想起了《先知奥列格之歌》中的歌词：“你的盾牌高悬在帝城城门之上”——帝城即君士坦丁堡，后来的伊斯坦布尔。

还有，我想起了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承诺在德国一方作战的土耳其战败之后，将君士坦丁堡连同海峡移交给俄国。

当时，这些并没有做到。现在则可以实现了。

难道俄国沙皇们的自古以来的期望要由斯大林付诸实现？真的，人民将为此称他为智者伟人。一种大国豪气令我陶醉。我完全没有认真考虑过，实现这些计划会有多少苦难，多少血泪.....

1988年，当围绕1939年8月23日秘密议定书开始了辩论时，我进行了一番思考，如何可以避免诸如斯大林同意加入“三国条约”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问题引起不必要的对抗，或者事实真相被掩盖。我致信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提出预先讲述当时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外交部副部长列·菲·伊利切夫的助手打电话给我。伊利切夫的意见是，类似的文章似乎为时过早。我非常熟悉伊

利切夫，所以也没有指望其他的说法。他的回答，是“停滞”时期典型的思维方式。我给《国际生活》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详述了“四国条约”的全过程。这篇文章被接受了，并发表于该杂志 1989 年 8 月号。

现在，我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有一种意见，即斯大林同意签订“四国条约”，只是为了试探希特勒，并且从来没有认真准备与其进行这样一个“不道德的”交易。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尽管莫洛托夫要求舒伦堡尽快从柏林得到答复，希特勒的沉默为何没有使像斯大林这样疑心重重和狡猾的人警觉？柏林对苏方的反复询问也未作任何反应。为何斯大林没有得出应有的结论？我认为，关键在于，斯大林对自己思维方式有信心，根据这个方式，希特勒跟他斯大林本人一样，认为在现阶段与苏联的合作是有利的。

接下来几个月里，如果不考虑 1939 年 9 月 23 日根据一项秘密协定，把一小块立陶宛领土划归德国的话，苏德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即德国放弃对这部分立陶宛领土的要求，而苏联政府则同意向德国政府予以补偿，为这块领土支付“750 万卢布，折合 3150 万德国马克”。1941 年 1 月 10 日，莫洛托夫与舒伦堡在莫斯科签订了与此有关的秘密协定，没有进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

## 塔斯社声明(1)

-----

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斯大林为动摇希特勒进攻苏联而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直接误导了红军将领。1200 架战斗机一夜之间被德国空军炸毁。

入侵开始前一个小时，满载军需物资的苏联专列驶入德国。

斯大林感到，希特勒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羞愤难当，在一周之内他跟任何人都不说话。

希特勒表示，打败苏联之后，最好还是把它交给斯大林来管理，因为.....

1940 年 12 月，苏联新任驻柏林大使符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到达柏林之后，帝国办公厅主任奥托·梅斯内尔就立即跟他交上了朋友。显然，这种交情是得到希特勒批准的。当杰卡诺佐夫陪同莫洛托夫访问帝国首都并参加了在元首办公室的谈判时，希特勒就认识了他。杰卡诺佐夫是个矮个子，但身材结实，胸肌发达，略有谢顶，长着漆黑的眉毛——他在获得新任命时保留了副人民委员的职位，这也强调着他在“各族人民领袖”那里所受到的信任。

十二月底，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开始上班时，杰卡诺佐夫对我非常客气，经常请我去吃晚饭，虽然使馆里也

有专职翻译，他总是带我去参加所有重要的会谈。杰卡诺佐夫不仅给我看涉及到苏德关系的所有电报，而且还有从莫斯科给他这个党中央委员传过来文件。他一边喝着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一边喜欢讲述自己跟斯大林是同乡，因为两人都是卡尔塔林人（高加索的民族之一）。但他首先是贝利亚的人，并且是从安全机关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显然，帝国办公厅考虑到了所有这些情况，所以才许可杰卡诺佐夫与奥托·梅斯内尔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是每月两次，同样小个子、身材肥胖的梅斯内尔到大使这里吃午饭。他斜躺在椅子上，喝着白兰地和咖啡，“机密地”说，帝国办公厅正在拟定重要的建议，安排将来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会见。他声称，这些建议旨在扩大德苏合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十一月份莫洛托夫与舒伦堡谈话时所讲的意愿。这本来是绝对的假情报。可是，杰卡诺佐夫自然地把与梅斯内尔的谈话内容向莫斯科作了汇报，而斯大林则最害怕与德国发生冲突、非常想跟德国保持“友好”关系，更相信了这些报告，而不是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有关德国即将不可避免地入侵苏联的警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出现德国人准备在英伦三岛登陆的迹象，斯大林对局势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希特勒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英国的问题解决之前，他当然要尽量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而德军在苏联边境地区持续集结可以解释为元首想要跟苏联政府讨价还价时拥有“有说服力的理由”。但是，不能排除德军指挥部要求尽快进攻苏联。当时还没有培养出新的高级军官来顶替被镇

压的指挥员们，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也没有开始。与芬兰的冬季战役暴露了苏联准备不足。根据这些情况，德军总参谋部要求不能拖延入侵。德国最高领导层斗争的非常激烈。天平一会儿倾向这一方，一会儿又倾向那一方。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受挑衅，让德国军阀满意，必须尽量将希特勒引到自己一方来。如果能够忍耐，不回应挑衅者的挑战，那么希特勒就会明白，莫斯科不愿意跟德国弄僵，于是他会对自己的将军严加管教。

斯大林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便拒绝了有关制止德国空军在苏联领土上到处乱飞的建议，对德军士兵侵犯苏联边境的令人发指的事实置之不理。甚至当德军士兵杀害我边防军战士时，仅限于由大使馆向里宾特洛甫的副手魏茨泽克提出口头抗议。

德军花了三个月时间出兵巴尔干，以及元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到英国等等一系列情况，使斯大林彻底相信，1941 年打不起来。甚至如果柏林决定要入侵的话，那也不会早于 1942 年春天。因为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役损失了宝贵的时间。像希特勒这样谨慎的政治家不会在夏季中开始入侵苏联，更何况德军——这一点斯大林是清楚的——没有做好冬季作战的准备。毫无疑问，赫斯是派去跟伦敦谈判的。但是，只要丘吉尔还当政，不能指望会达成妥协。而且，如果赫斯的使命彻底失败的话，希特勒也许会首先决定实施“海狮”计划。应该给元首一个信号，即在他与将军们的争论中支持我们。

就这样，1941 年 6 月 14 日，在纳粹军队入侵苏联领土前一周，塔斯社发表了莫斯科的一个声明。其中指出，“根据苏联的情报，德

国与苏联一样严格遵循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件，有鉴于此，苏方认为，有关德国准备撕毁条约、进攻苏联的传闻没有任何根据。”

发表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声明时，斯大林指望从希特勒那里听到类似的东西。但是，柏林一直保持沉默。塔斯社的声明没有动摇希特勒。德国新闻界根本没有提到苏联的正式表态。然而，苏联人，红军则被误导。可是斯大林却还在努力想吸引元首来谈判。

莫洛托夫在跟费利克斯·丘耶维的（《跟莫洛托夫的一百零四次谈话》，第41，42页），谈到了1941年6月14日的塔斯社声明，以及在我的《出使柏林》一书中是如何评论这个声明的。

“别列什科夫指责斯大林，”莫洛托夫说，“称根本没有理由来做这样一个塔斯社声明.....”

-----

塔斯社声明(2)

-----

莫洛托夫在为“各族人民领袖”辩解时，解释说，这个声明是斯大林认真思考过的：“这是一场外交游戏。当然是游戏。只是没有结果。不是任何尝试都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是尝试本身却没有任何坏处。别列什科夫写到，这显然太幼稚了。这不是幼稚，这是特定的

外交步骤，政治步骤。只是在这一次没有结果，但是也没有任何不可接受的，不能容忍的东西。并且这不是愚蠢，而是使问题明朗的尝试。至于他们拒绝对此做出反应，仅仅说明了，他们对我方推行了一条假路线。”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15号或者16号，当发现德国人不作反应时，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而是直到最后一天还在拒绝苏军指挥部任何建议？并且为什么苏军高级将领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边境地带我方的坦克、飞机、大炮进行伪装，结果德军6月22日夜间一举炸毁了机场上1200架飞机和其他装备？

我国所有的人都被塔斯社这个致命的声明解除了武装。这就是所谓的外交游戏！

从五月份开始，德国使馆人员家属开始大规模离开莫斯科。使馆里仅仅留下了最必须的人员。6月19—20日，德国商船离开了苏联港口——其中有些船只甚至未来得及装满。所有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斯大林。但是，他依然抱住自己的想法不放，依然故我相信希特勒。

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人员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不断有新人到来，有些人甚至带着孩子。一艘苏联船只也没有从德国港口返回国。不仅如此，斯大林特别关照，要求对德国的物资供应畅通无阻。满载着石油，锰和粮食的专列在入侵开始前一小时越过了德国边境。伪装好随时等待进攻信号的德军官兵看着这一列货车，应该觉得很奇怪，惊讶苏联当局消息如此不灵通。

甚至在6月21日，入侵的前一天，斯大林依然相信，他可以与希特勒开始对话。那个星期六，从莫斯科给大使馆来了一封电报，要求大使立即会见里宾特洛甫，通知他苏联政府愿意与帝国最高领导人开始谈判，并且“听取德国的有关要求”。事实上，这在暗示，苏方不仅会听取，而且会满足德国的要求。

然而，什么事情都已经无法阻挡希特勒了。

斯大林依然对自己制造出来的幻想深信不疑。6月22日黎明，德军飞机轰炸了明斯克、布列斯特，利沃夫，我方机场上和坦克库里炸弹在爆炸，武器装备变成了一堆废铁，燃料和弹药库飞上了天，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带希特勒军队越过了苏联边境。而斯大林这时还在犹豫不决，拒绝签署命令予以反击。他对围着他的将军们和政治局委员们说：

“也可能，这是德国军阀的挑衅？让莫洛托夫召见舒伦堡。他跟希特勒有直线联系。叫他问一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战争在喧嚣。斯大林的办公室静悄悄。莫洛托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下令给舒伦堡打电话。后者慢吞吞地来到克里姆林宫。宝贵的时间被浪费。大使终于到了，对莫洛托夫的问题回答道：

“这是战争。德军按照元首的命令越过了苏联边境……”

“我们不该受到如此的对待……”这就是人民委员能回答大使的惟一的一句话。

莫洛托夫“这是战争”的通报，对于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里的人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

直到最后一刻，大家都信服斯大林。大家都清楚局势，但寄希望于“各族人民领袖”掌握了某些情况，可以使他排除任何警示。现在很清楚了：“智者斯大林”失算了。战争几乎是劈头盖脑地砸了下来——既在意料之中，却出乎意料之外。

斯大林本人体验到巨大的震荡，使他失语。经过长时间难堪的沉默之后，他签署了反击侵略者的命令。政治局委员们请求他通过广播发表告人民书。

“我不能，”他回答说，“让莫洛托夫讲吧……”

斯大林叫来汽车，一言未发，去了自己位于贡采沃的别墅，几乎一周时间里跟任何人都不说话：他苦恼的是，他竟然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上。直到7月3日，他才有气力发表讲话。

有意思的是，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在会见外国政要或者公开演讲时，从不放过机会贬损希特勒。有一次，他比较拿破仑和希特勒时，称波拿巴是一头雄狮，而希特勒则是一头小猫。他本来可是说出诸如“鬣狗”或者“豺狼”或者其他侮辱性的词。可是，为什么是“小猫”？我们的漫画家们非常作难，如何将这样一个可爱的家庭动物画成凶残的怪兽。斯大林对俄语的感觉足以使他在选择词汇时不出错。也许，他想向希特勒表明，你甚至够不上“豺狼”，这样更加具备侮辱的意味？这样也可以略微减轻屈辱的痛苦。

不过，在战争期间，希特勒一直都对斯大林感兴趣。元首身边的人都可以见证，他一般满怀敬意地提到斯大林，特别赞赏他的“忍耐”和“韧性”。希特勒的“席间谈话”中的奇谈之一尤其能够说明问

题：“战胜俄国之后，最好把国家交给斯大林管理，当然是德国统治之下。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对付俄国人……”。

1945 年春天，处境绝望的希特勒依然指望着斯大林。在日期为 3 月 4 日的日记中，赫本斯记录了希特勒希望与莫斯科达成协议：

-----  
塔斯社声明(3)  
-----

“元首是对的，他说，斯大林更容易实施大转弯，因为他无须考虑社会舆论”。希特勒在自己最后的几天里，正如某些传记作家所写的，他“感受到了与斯大林更大的接近感”，高度评价斯大林是一个“天才”，值得“无限的尊敬”。希特勒拿自己跟斯大林作比较时，“元首不能抑制赞赏之情”，多次重复说，他们两人都特有“伟大和坚定”，而没有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摇摆不定与易于让步。

我只能补充一点，类似的评价跟我们现代的某些斯大林分子的说法十分接近。

希特勒在战争前夕的外交游戏中成功地欺骗了斯大林，但最终却输掉了战争。而斯大林在庆祝胜利时，还是决定对被打败的对手表现出特别的宽宏大量。他非常清楚，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烧焦的

尸体在帝国办公厅附近的掩体中已经被辨认出来。元首的牙医确认了保留下来的自己病人的假牙是真的。但是，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各族人民领袖”却宣布，元首的尸体没有发现。这样，他给许许多多关于希特勒生还的传闻以口实。传说他藏在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出现各种说法，似乎元首乘坐潜水艇到达了某个荒岛，并且在那里找到了藏身之处。有人甚至在某个偏远的修道院见到过他。另外有人相信，在阿根廷的某处见到过他。如此说来，斯大林给了希特勒多年来半神话式的阴间存在。

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残酷的罗曼史”，使德国和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和苦难，就这样结束了。

-----  
红色厂长(1)  
-----

红色厂长符拉基米诺夫是骑兵出身，对生产一窍不通。我父亲是总工程师。

在经历了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艰难困苦之后，基辅的生活就像在天堂一样。

在 1923 年 8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客轮“科尔措夫”号绕过

内战时期被炸毁、还没有修复的铁路桥灰色的花岗岩骨架，驶向基辅。左舷绵延的是切尔托罗伊岛和特鲁哈诺夫岛的浅滩。微风带来了被太阳晒热的红藤的芳香。城市的侧影从甲板上看得很清楚：教堂金色的圆顶，公园浓密的树冠，城市下游波多一带工厂的烟筒等。轮船放慢了速度，船头调转成逆流方向。我们慢慢接近白码头——基辅港的客运码头。

我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栈桥上。他身穿一套奶油色茧绸西服，戴同样质地的帽子。我们分别的这段时间里，父亲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好多了，显得气派了。他的知识和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再也不用靠做鞋子和煮肥皂养家糊口了，可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技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位置上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是当时生产农业机械和制糖设备的一家大型企业。

轮船很快便靠岸了。栈桥上放下来一条宽阔的跳板。父亲挤着穿过旅客人群，飞快地朝我们走来。久别之后的妈妈吊在父亲的脖子上，所以我似乎再也等不着轮到我的时候。这不，父亲抱起我，亲吻着，烟草的气味冲进我的鼻子，精心修剪的黑色小胡子扎着我。搬运工拿着我们的东西——藤条箱，盒子，木板箱子和包袱等。

我们走上了码头前一个宽阔的、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车夫们在这里排成队。在一批久经风雨的四轮轻便马车之中，有几辆非常雅致的马车。虽然经过了革命，内战，破坏以及德国人、斯科罗帕斯基黑特曼、彼得留拉、白军，波兰人、红军等在基辅多次更迭的

当局实施的没收，这些旧社会的残余奇迹般保存了下来。车座上端坐着身穿深绿色坎肩，头戴同色绒布高筒大礼帽，身材结实的车夫们。稍远处，旅客们在跟马车夫讨价还价。壮硕的马匹、带铁钩的平板车可以把大件行李送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货物用帆布盖着，用绳子捆扎好，不论天气多么糟，都会安全地送到主人手里。我们的行李不多，也被装到这个的平板车上。父亲把地址给了车夫，那人立刻就赶了车上路走了。妈妈急了：

“他不会连同我们的行李一起消失吧？”

“这不可能，”父亲安慰她说，“车夫们都是自尊的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

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正派的人。因内战而破产的农村里，每个人都是看见什么就拿什么，父亲的无所顾忌使我感到非常困惑。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城市里，还有不骗不偷靠得住的人？于是我想起来了，父母亲给我讲过革命前的彼得堡的一些事情，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父亲解释说，这是工厂的马车。马厩、马匹和马车是从“布尔什维克”工厂前任主人——捷克资本家格列特和克里瓦涅科——那里得来的。马车夫伊万叔叔从车座上下来了，他非常客气，周到同时自尊。后来，我跟他成了好朋友，在马厩里总是一呆就好几个小时，帮着他照看那些马。来接我们的马车车身是黑色，闪闪发亮，描着金色小花饰，有橡胶轮子红色辐条，缎子枕头，两个闪闪发亮的红铜电石灯。伊万叔叔帮妈妈在后座坐定，然后把我安置在妈妈对面

的折叠小椅子上。

马车沿着鹅卵石马路平稳、静静地走着，一面在富有弹性的弹簧上舒舒服服地摇来晃去。橡胶马蹄铁使得几乎听不见马儿跑起来的声音。伊万叔叔嘴里不停地喊着，时不时地对行人喊道：

“闪...开...了！”

现在似乎很难相信，我童年时代城市里个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依然是为人类服务了数千年的马！直到三十年代初，基辅才有了出租汽车，而马车夫跟卡车的竞争一直持续到战前。

我们走上了符拉基米尔小山的陡坡，来到了克列夏季克。太阳已经偏了西，照亮着大街的左侧。这里的人衣着十分讲究。人行道上咖啡馆的小桌旁，人们随意坐着，呷着冰镇饮料。古罗斯风格的中央市场本萨拉布卡周围的人更多了。西瓜和甜瓜堆到了马路上，到处是贩售水果的摊点，卖冰激凌的棚子和羊肉串的火炉子。

我们在这里向左拐，然后沿着比比科夫花园路（现在已经改名为舍夫琴科）上行，路的两边栽种着高高的、金字塔形的杨树。路左边的槐树枝条上压满了迟开的白花，从植物园铸铁栅栏上伸了出来，散发着另人迷醉的芬芳。接下来是犹太市场，于是我们立即跌进嘈杂拥挤的人群。卖货的人不断地拦住我们的去路，兜售自己的商品，卖力地夸赞着手里的东西，喊出价格，然后马上开始降价。真是一幅浓烈而又色彩丰富的图画！

好不容易走到布列斯特—立陶宛公路上，马车跑得快了些。又走了三公里左右之后，我们到了。左边的墙后，是“布尔什维克”工

厂的厂房。紧挨着是从前属于工厂主的一个庄园。我们的马车在两扇高高的漆成白色的木板门前停了下来。伊万叔叔敏捷地跳下车座，打开大门，牵着马走了进去。马车稳稳地走过门槛，于是我们就到了铺着长条木板的院子里了。

-----

红色厂长(2)

-----

左边，大约有三十米处，是工厂的院子。在右边，金属网栅栏和同样的一扇门隔开了一条林荫道，它通往一幢绿顶小别墅。半圆形的窗户，门口的圆柱和外廊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地主郊外的家居所在。

父亲带着妈妈去看房子，而我马上跑进了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许多寂静的角落，类似竹子一样一丛丛异国的植物，和一个爬满常春藤的凉亭。这里长着观赏树和果木，核桃树，马林浆果树丛，红茶和黑茶草。花园里还有几个水潭，栽种着睡莲，安着小喷泉，有花坛和蔷薇花圃。在爬满野葡萄藤的外廊对面，有一个圆锥一样用矿渣砖砌起来的台子，上面长着许多玲兰。从台子那里，铺着黄沙的小径通向四周。庄园里还有一个花匠。他是个相貌堂堂，

十分体面的人，非常尽心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再往前，花园的深处有一个厢房。我后来知道，里面住的是总会计师舍赫特以及工厂的消防队长，前沙皇军队的军官别列克列斯托夫。我们跟红色厂长符拉基米诺夫合住这幢房子。我们这一半略微小一些，有五个房间——比我们需要的多得多。妈妈说，三间房子——两个卧室和一间起居室就足够了。为这几间房子勉强找来了家具——在无政府状态的几年里，房子里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了，房间里空空如也。当我交了一帮小朋友之后，在两间空屋子里安排了一个业余儿童剧团。我们还有一个洗漱间和小厨房，从那里通往外廊的走廊上放了许多大柜子。妈妈鉴于饥饿年代的惨痛经验，马上在这些柜子里装满了米，面粉，砂糖，土豆，腌菜等其他东西。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个必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基辅，什么也不缺。

随着十卢布票子的出现——大张的票面上画着农人和锻工——卢布变得值钱了，并且可以兑换。我的父母在国内漂泊期间，牙齿全部坏了，所以花二十卢布买来了沙皇时期的三个十卢布金币准备镶牙。卢布可兑换使得我国的企业家、作家、演员出国时没有资金上的困难。到处都愿意接受卢布，甚至比美元更受欢迎。人们当时喜欢唱一支民谣：

卢布啊，我的十卢布，

老百姓和官员都喜欢你……

我跟妈妈每周一次乘有轨电车去犹太市场采购。这种罕见的丰

盛多彩的景象迷住了我，四周水果蔬菜的香味令我目眩。只花两卢布，我们就装满了两个大篮子，非常吃力地弄回家去。有时，我被打发到食品杂货店老板帕莱姆斯基那里去买食品。按照妈妈的单子，他称好肉、鱼，黄油，奶酪等等，把东西放到小篮子里，然后把账记在柜台上的厚本子里。父母一般不给我钱，所以，帕莱姆斯基谢过我买东西之后会说：

“父亲发了工资以后再结账吧……”

附近住的人都在他那儿赊账买东西，并且从来没有发生过误会。卖香肠的朱科也是这种做法。我最喜欢去他那儿了。熏制作坊的味道老远就引诱着，柜台后面，天花板下的橡木梁上挂着火腿，熏肠，一串串的灌肠。但是，我常去朱科作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偷偷爱上了他那金黄色头发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经常在柜台上帮父亲。

基辅的最初几周，就像童话梦境一般。肯定有过下雨，天空布满了灰色的乌云，但是我记得的只有初秋那些温暖、温柔、色彩温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经过一段乏味而简单、没有水电的乡村生活之后，那里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蹂躏过后刚刚开始恢复元气，这里，城里的一切都是我惊异：街上的路灯，铺着柏油的人行道，沿着铁轨飞驰的奇妙的有轨电车等等。更不用说当时不多见的小汽车了！这里的一切是那么地令人难以置信，那么的奇妙！

当我一个人在家时，成几个小时不停地摆弄开关。当时我还不明白，电灯为什么刷地就亮了。我老是觉得，那个让电灯点亮的东

西应该过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灯泡。所以我想要抓住这个空隙。我从未见过的小圆白面包，带红色圆头的荷兰奶酪，西瓜等等样样使我感到惊异。在此之前我只见过甜瓜。客厅里，父亲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玻璃罐子更是完全不可思议了。一根导线接出来到耳机，顶上有一个按钮，可以使小轴摩擦到晶体，这样可以“抓住”人说话的声音或者音乐。这是矿石收音机——那个时代的技术奇迹。

我们的邻居——红色厂长符拉基米诺夫——让我从第一天起就喜欢他。他对我就像是跟大人一样，就像跟自己一般大的人，仔细地听我说话。就凭这一点，他得到了我的好感。而父母还把我当傻瓜，并且我觉得，他们从不放过机会表明这一点。

红色厂长对生产当然是一窍不通了。他应该进行“政治领导”并且监督技术专家，也就是我父亲。我马上就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很信任。符拉基米诺夫把大小事情都交给我父亲，他并不干涉厂里的工作。内战和武装干涉期间，符拉基米诺夫曾经先在比萨拉比亚地区进行游击战，后来加入红骑兵，是柯托夫斯基师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被投送到远东地区跟日本侵略者作战。他战功卓著，获得了红旗勋章，最终从滨海边疆区带回来了一个小巧玲珑、十分可爱的日本籍妻子。她非常和蔼，勤快，从早到晚都在忙活着，每天把浆洗的衣服晾在院子里，还会做各种馅的饺子。他们家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子，名叫佐雅——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她总会从妈妈的手里挣脱出来，光着身子跑到我们这边来，一边喊着“女婿，女婿！”——追

着我满屋子跑。这使我感到万分难为情——除了香肠老板朱科的女儿之外，那个时候我对其他所有女性持怀疑态度。

-----  
红色厂长(3)  
-----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工厂的管理和全部的责任都落在我父亲的身上。甚至工厂的安全保卫他都信不过别人。更何况他也明白：自己是革命前的专家，所以，一旦发生事故，他可能会被指控破坏，后果严重。在父亲被任命到这家工厂前不久，锅炉房燃料用的三个油罐之一发生了火灾。为此，当时的总工程师，也是个旧“专家”，被逮捕并发配到集中营去了，尽管起火的原因始终也没能查出来。这个烧焦的、锈蚀斑斑并且翘得弯弯曲曲的油罐就是可能发生的怠工事件的警示。工厂的消防队长别列克列斯托夫总是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的尽职尽责，每天早晨都要来汇报工作。甚至每个星期天早晨，当我们全家在外廊上吃早饭时，他也会出现，一只手放在制服帽檐上，正步走过花坛和草坪。当他走到近前时，声音洪亮，按照军人的方式报告道：

“请允许向您报告，工厂里一切正常。消防队长别列克列斯托

夫。”

“您这是干嘛，”父亲对他说，“干嘛这么正式？请坐下来，喝一杯茶……”

“不可以。我正在值班。我走了！”

他踩着鞋跟转过身去，迈着同样的正步，沿着一条直线离开庄园。每天早晨都会上演这一幕。别列克列斯托夫一次也没有接受邀请喝茶，父亲称他是个真正的形式主义官僚。但是，父亲终究没有完全指望他，坚持每天晚上巡视厂区，检查在门房值班的警卫等人员。

有一天夜里，我被卧室外面母亲的高声呼叫、非同寻常的嘈杂声和跑来跑去的脚步声惊醒了。窗外是一片漆黑。也就是说，到天亮还有很长时间。为什么父母亲还没有睡觉？

我光着脚下了床，走到门旁，略微打开了一点。我的面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父亲穿着衣服，半躺在椅子上。衬衣的衣领是解开的，衬衣和脖子上可以看见血迹。妈妈身披睡袍，坐在椅子上父亲身旁，正在用一块湿毛巾敷在父亲的脸上。我放声大哭，朝他们跑了过去。

“不要哭，”父亲劝着我，“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厂里检查的时候，我在油罐旁边看见了一个人。我喊了他一声，可是那人却跑了。我去追他。黑暗中没有看见铁梁，一下子撞上了。冷敷之后就没事了……”

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训斥了一通别列克列斯托夫。后

者加强了夜间警卫，但父亲并没有停止夜间巡视，而鼻梁上的伤疤却永远留了下来。

我非常喜欢在工厂里玩耍。这并没有人禁止我。门卫们很快就习惯了，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在意。但不允许我到车间里去。不过，行政楼里我可是常客。红色厂长和总工程师的办公室并排在一起。一个大房间里放着许多桌子，后面坐着厂部的员工，从这里，高高的橡木门通往他们的办公室。玻璃隔墙后面是打字间。这里端坐着身穿白色绣花衬衣，黑色长裙的女士们。她们高高的头发教我想起妈妈家族相册中的相片。她们非常熟练地敲击着“伍德伍德”的键盘，给我的印象一点儿也不比矿石收音机差。女士们用热茶和小面包圈招待我。我们处得很好，于是我见识到了打字秘密。复写纸特别的气味至今令我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年代。内战期间，这些女士们在红军部队的司令部里工作，编辑打印那些粗识文字，或者干脆大字不识的师团长们的命令报告等等。

有一次，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我碰上了红色厂长。他身穿军便服，深蓝色马裤，皮靴擦得雪亮。我已经要溜走，但是符拉基米诺夫叫我过去，把我放在自己的膝头上，开始问东问西。我骄傲地告诉他，已经学会了打字。

“围着裙子转，这可不是男人的事情。”厂长说道，“最好去各个车间，见识见识工人阶级。那里能学到有用的东西……”

父亲支持了这个想法，第二天领着我到工厂几个主要车间走了一圈。我喜欢上了蒸汽机，它转动一个大飞轮，带动一条皮带。墙

后面的车工间里，皮带缠在小一些的轮子上，接着一个长长的转轴——带好多小轮子的传动装置。这些传动装置驱动着连接着旋床的略微窄小一些的皮带轮。

这样的传动装置其他车间里也有。而蒸汽机则带动着一整套复杂的机器。

我花了很多时间跟着翻砂工人和铸造工人。他们对我非常好，让我在空地上自己做东西，借给我手锯，刨子等其他许多工具。我用木板的边角料作蒸汽火车，汽车，飞机等等。铸造车间里，翻砂的过程吸引了我，黑土倒进砂箱里，慢慢变硬，然后取出木头模子，灌进去融化了的金属。电工活我也喜欢，非常高兴地帮他们拿电线，开关，电闸，跑东跑西地帮忙。所有这些都为我日后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当电工做了预备。

-----

汽笛哀鸣<sup>(1)</sup>

-----

人们痛哭，因为列宁逝世了。

父亲担任总工程师的那家工厂的厂长、红军高级将领被枪毙了，惟一的证据是他妻子是日本人。

格列特和克里瓦涅科请来了许多捷克高级技工。革命后，他们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布尔什维克”工厂。几个主人当家时同样的条件也保留了下来。一样地发放工作服——车工和铸造工是皮衣，其他人是厚帆布的。上班来时穿着整齐的西装，然后换成工作服。下班之后先冲澡，然后换上干净衣服。不过，没有食堂，一般都是用铝盒子自己带饭。

不仅仅捷克人，其他民族的工人们基本上都住在小村落里，它位于工厂对面，砖墙后面，每家都有一幢小房子和花园。距离这里不远处，有一家小型啤酒厂，附近的住户们都能享受到上等的捷克啤酒。还有一个俱乐部，里面有电影放映机和舞台，那里上演革命题材，红军总是战胜白军的话剧。有小型住院部的厂医院也为家属看病。格列特和克里瓦涅科在自己庄园里的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应该承认，他们也关心工人。

每当演季开始，父母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剧院，有时也带我去看歌剧。剧院的建筑，豪华的内饰，紫红色座椅，奇巧精致的镀金大烛台，壮丽的大厅，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听过的第一部歌剧，是鲁宾斯坦用莱蒙托夫同名长诗改编的《恶魔》。奇异的剧情，奇异的服装，高加索崇山峻岭那童话般的布景紧紧地吸引着我，我渴望着在家庭剧院里再现这一切。跟学校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我们用图画纸和彩纸做出布景，用妈妈做衣服的小布块做出了服装，然后一边念着莱蒙托夫的长诗，一边用自编的场面代替歌词。一切终于都准备好了，首演定于1924年1月22日

进行。

元月 21 日傍晚，“布尔什维克”工厂突然传出了长长的汽笛声、经久不息。附近工厂也开始应和，汇集成令人心悸的轰鸣声。突然，一下子又静了下来，开始了不祥的沉寂。但是，一两分钟之后，“布尔什维克”工厂惊天动地的汽笛声似乎又在邀其他人加入哀鸣。这样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我们放下了演出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围住了妈妈：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鸣笛？……”

妈妈也慌了神。手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出了大事了，”她声音颤动着说，“可能，战争又开始了？为什么这么晚了父亲还没有回家？”

他早就该从工厂回家了，但是却一直没有回来。我的伙伴们很快穿好衣服，飞跑着回家了。我跟妈妈披上大衣，走出来到凉台上。在外边，轰鸣声大了。我们忐忑不安地回房了。坐在沙发角上，一边听着汽笛声，一边等着。我的思绪浮现出片断回忆——内战的恐怖景象：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机关枪的扫射。妈妈把我藏在门槛后面。周围的人跑来跑去。有人中弹倒下了。妇女和孩子们的哀号。难道又是战争？

父亲进到房间里，他神色凝重，脸上瘦了一圈。我们朝他扑了过去。他说：“列宁死了……”

八岁的男孩子在这一刻体验到了什么？我对于政治从来没有过兴趣。但是，两个名字我从小时候就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流行

的民谣深深印入了脑海：

我在桶上坐，桶里装着粥

列宁—托洛茨基给我们说过，俄国由我们做主

当时，谁也没听说过斯大林。他的名字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

大家把列宁跟新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它几乎在一瞬间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十卢布钞票的出现，以及十亿计，被人们用来当壁纸用的“科伦票”，“苏维埃票”的消失，也是列宁的功劳。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安全感，一种信念，即最坏的已成为过去，今后我们只会过好日子。我不知道列宁生病了，国家由另外的人掌管。虽然遥远，但是列宁一直在莫斯科这件事，让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长久的，并保护着我，使我们家的生活幸福。可是，突然间列宁不在了……

在自己短暂的一生当中，我多次见过死人的事。但是，互相搏斗的人们死了，让人觉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自然的。那是在打仗，到处在放枪，运气好的人活下来了。可是，在那遥远的克里姆林宫，列宁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托洛茨基照看着这一切。所以，只要他们还在，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有某种意义。谁也没有教过我这些，父亲也没有跟我谈过政治。我似乎是自己领悟到了这些东西。可是现在列宁不在了。当父亲说“列宁死了”的时候，我内心深处突然间爆发了。我放声大哭，跑到自己的房间去，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透过半掩的门，我听见父亲压低声音给母亲说，列宁的死是一

个巨大的损失。

“列宁明白，”父亲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试验将国家带进了深渊。但是，他有足够的理智大幅度改变政策。他的继承者会不会走一条新路子？他们全是些狂热分子。又要给人们强加那些可疑的思想。但首先会开始夺权，互相残杀。”

我非常惊讶，父亲对列宁的战友们的看法是如此之差。可是，他的学生，事业的继承人还是有的呀.....

父亲让我坐在沙发上。他问我，我们明天的首演怎么办。

“剧院关门，哀悼。”我坚决地宣布说。

-----  
汽笛哀鸣(2)  
-----

然后马上开始用黑色油墨在一块红布上书写：“因列宁逝世，《恶魔》演出取消。”

符拉基米诺夫来了。他没有遮掩自己的悲哀，眼里泪汪汪的。他拥抱着父亲，伏在他胸前，像孩子一样痛哭：

“我们都成了孤儿，”他翻来覆去地说，“全都成了孤儿。没有人能够替代伊里奇。我们失去了领袖。该怎么办？”

“要鼓起勇气来，”父亲安慰着他，“生活还在继续。不能灰心丧气。”

符拉基米诺夫擦干了眼泪，请妈妈原谅他的弱点。他仔细地听了听汽笛声，说：“该去参加悼念大会了。”

我央求要一起去，于是父亲也带上了我。在工厂的操场上挤满了人。虽然下着雪，刮着寒风，所有的人都去掉了帽子围巾。用红布、黑布围起来的木板搭成的台子上站着几个人。符拉基米诺夫走了上去。我跟父亲呆在不远处。汽笛停了。自发组织的管乐队奏起了哀乐。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冲到嗓子里，我留下了眼泪。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紧紧地握痛了我的手，于是，我觉得略微轻松了点。

最先发言的是站在台子上的几个人。然后，工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讲话。悲痛不是假装出来的。集会一直开到深夜。

整整一周，基辅也跟全国各地一样都在哀悼，痛哭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人们沉浸在痛苦、悲哀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之中。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用臆想出来的乌托邦诱惑了人们，现在，他已经给那架残酷的镇压机器上足了发条，而这架机器将把千百万国人送进坟墓。

莫斯科的领袖们发誓将继续列宁的事业。人们相信了他们。

生活逐渐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布尔什维克”的红色厂长依然为自己的职责而发愁。上班时，他一般只呆上半天。然后，把权力全部交给总工程师之后，匆忙去找伊万叔叔，去看那些马儿，对马的嗜好是从柯托夫斯基骑兵师冲锋陷阵的时候就有的。他特别喜欢一

匹名叫阿伊达的小母马。这是一匹漂亮的母马，枣红色，长着一双火热的深棕色眼睛，挺直的脖子和黑漆一样的鬃毛。符拉基米洛夫亲自给她套上鞍子，在工厂的草场的遛达。然后，他披上白色斗篷，腰间挎上马刀——布琼尼赠送的礼物——飞身上马，驰出工厂大门，朝大路的另一方飞驰而去。在这里，他用马刺刺一下阿伊达，沿着通往天际的田野飞驰而去。他从刀鞘抽出马刀，一路挥舞着，似乎砍剁着看不见的敌人的脑袋，飞驰着，扬起一路尘土，沿着无边无际的田野直到从前基辅的贵族区斯维亚托申。一两个小时之后，符拉基米洛夫骑着大汗淋漓的阿伊达回来了，他看上去幸福无比，精神饱满.....

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跟自己许多战友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过了一段时间，符拉基米洛夫被调到乌克兰当时的首府——哈里科夫。这里，他得到了重型机器制造工业企业设计所所长的职位。三十年代初他被捕并枪毙。他妻子的国籍成了他被宣布为日本间谍的足够证据。

-----

饥饿年代(1)

-----

我在少年时代便亲身经历了出于宣传目的而集体造假的事情。

1929 年，素以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发生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限制消费.....

为了生计，我转调到“国旅”当导游。

乌克兰发生饥荒——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乌克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在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年代，虽然紧张张，但依然能够养活自己，新经济政策伊始，一季的收成就能够让人们吃饱，现在却突然出现了饥荒！并且是在平时时期！

1929 年秋天，当我们从南方回到基辅之后，谁也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每个角落里都是蔬菜水果摊贩，国营和私人店里商品极为丰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随处可见一对对衣着华丽的情人，每到夜晚，剧场、餐厅、咖啡馆和台球室里，挤满了休闲的人。不过，这里时不时也会看见“背口袋的”——这是从集体化“大获成功”的那些村庄逃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被看作是因对抗政府而受罚被没收财产的乡村富人。各个报纸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被成绩冲昏了头脑》一文，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传言中乡村里的过火做法，是那些热情的工作人员干的。现在，当总书记亲自出面纠正了这些人之后，他们会略微节制自己的热情，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人一切照常，根本没有想到，不久会大难临头.....

我们七年级又来了几个新同学。他们的家人从德国迁到苏联，

因为那里纳粹掌权的威胁日益临近。12月，在哈里科夫召开了全乌克兰少先队员代表会，我们学校也应邀参加。巴乌里是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决定将我们班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很可能，他是根据基辅共青团委的指示而这样做的。当时，这类造假活动十分普遍。譬如，每次大型会议上，都有“广东公社”的代表出来讲话。每次介绍这些人刚刚从中国来，实际上他们在俄国已经住了很久。当时，人人都在说广东公社的事，每个人都想在主席台上坐一个中国人。至于我们，巴乌里的主意多少还算符合实际。新来的同学的确是德国少先队员。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所以甚至带来了自己的旗帜。而且巴乌里本人是个地道的萨克森人。至于我们，虽然不是德国人，但完全可以充作德国人。巴乌里严格命令我们在路上装作不懂俄语，只能说德语。

沿途各地都已经得到通知，说德国少先队代表团正在前往哈里科夫，当时乌克兰的首都。我们乘坐火车，占了单独一节车厢。沿途每个车站上，当地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用乐队、旗帜和鲜花欢迎我们。每次都在月台上举行短暂的集会，我们用德语作简短发言。然后，按照通常所说的那样，“进行了友好交谈”，结果是，我们回答所有问题时，都握紧拳头高喊“同志们！”

起先，演出这样一出戏时，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习惯了，甚至在哈里科夫的大型集会上作了一篇反法西斯内容的热烈演讲，赢得全场鼓掌。

当时，我们两人一组被安排住在哈里科夫少先队员的家里，所

以，每天晚上，当全家都聚集在茶炉边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邻家的小孩子们都跑来看“外国少先队员”。由于不懂德语，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费力地解释自己的话。我们当然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同时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样子来。我们拼命憋住了不让俄语脱口而出。非常担心在梦里说出话来，好在我和自己的小朋友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游戏，所以，当自己人在一起时，便拿愚弄周围所有人这些事来取笑。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巴乌里以及其他的辅导员跟我们开了一个龌龊的玩笑：实际上，他们教我们撒谎，装假，口是心非。这里面没有任何好玩的。也可能，这样一种独特的经验为我们做了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全国上下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经常到哈里科夫出差，所以从那儿带回来各种小礼物，装帧精美的书籍，衣服等等。离开的那一天早晨，我也打算给家里卖一些纪念品。走了一个商店，第二个，第三个。到处货架空空如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基辅可是什么都有的。而这里，首都居然是一无所有。后来想在餐厅吃午饭，一那儿也一样，除了煎蛋之外，菜单上的其他各项都被划掉了。

我们乘夜车回到了基辅。我给家里人讲了哈里科夫的事情，但妈妈对我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咱们这儿也是东西全部不见了。我想不通，都弄到那儿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发生“大转折”，并且全面集体化的时代已经开始。它恰似一把尖刀，切断了

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消灭富农阶级”，而实际上是消灭所有私人经济的路线，引发了居民的恐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购。当局则中止了供应。结果是，数日之内，商品被一抢而空。下一步便是大规模关闭私人企业，手工作坊，面包房，咖啡馆等。为了“稳定”局面，斯大林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凭票出售食品，衣服也是凭专门的票证购买。担任技术厂长的父亲领到了“工作卡”，我和母亲领到的是“赡养卡”。但是，领到的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很快，作外国人生意的“外贸商店”开张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榨取居民手里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人们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把自己内战期间保存下来的，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购买的所有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以换取黄油、炼乳、面包等。妈妈将仅存的自己祖父母的纪念物，以及父亲用几十个卢布买来准备镶牙的沙皇金币都送到了“外贸商店”。像内战时期一样，再次面临饥荒。现在，一边写这些文字，我一边在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已经宣布了六十年。结果呢？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看见国家再次依靠票证制度。苏联政权七十年后，我国的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数量稀缺质量低劣的最基本的日用品。庞大的行政机器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肥皂问题。可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我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自己学会了炼制肥皂，因此在我们避难的那个村庄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难题。莫斯科比其他地方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1990 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年多

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

五月底，我们班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因此1930年的9月份，我应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开始上班。儿时在工厂各个车间的迷恋使我具备了某些生产技能。我被招为电工，月薪40卢布，外加一张“工人”食品卡。“布尔什维克”工厂里的人对我很好。许多人认识我父亲，有些人还记得那个整天泡在模具和铸造车间的小男孩，他的儿子。工厂正在进行改造。电动马达替换了传动装置，传动皮带和皮带轮。写着“辛辛那提”字样的新式美国车床带有内置发动机。但是，厂里也在自力更生改造旧设备。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车间，生产发电机和电动机。线圈基本上是妇女们绕的，男人们装配并安装发动机，而我则被派去作整流器的刷子。一整块压缩石墨先用手锯裁成规定大小。然后，再进行电镀，在一端生成一个铜质层，加上接线柱。我喜欢这工作，但每到下班时，我浑身上下沾满了石墨灰尘，活像个黑人。不管我怎么洗都没用，因为石墨吃进眉毛和眼睫毛里。家里人把我戏称为烟筒清扫工。

要想七点之前赶到班上，早晨四点就得起床。五年计划一开始，交通跟城市其他设施一样便不再正常运转了。有轨电车的运行不正常，并且也不是每次都能挤进车厢去。人们吊在踏板、车尾的缓冲板上。简言之，坐电车希望不大。大部分时间我步行上班，但从家里的距离大约有七公里。

-----  
饥饿年代(2)  
-----

夏天天亮得早，还好一些。可是冬天里，早晨一片漆黑，实在不愿意在积雪的街道上一步步挪着走！最令人难忘的是 1931—1932 年的冬天。饥荒已经打倒了市民。基辅市里涌进了一批又一批难民。隔一段时间他们被送走了，但很快又会出现一批批疲惫不堪的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人衣衫褴褛，已经走遍了乌克兰，来到这个曾经富裕好客的城市寻找自己最后的避难所。现在，什么人也帮不了他们。为了缩短路程，我从曾经十分繁华，可现在非常阴沉的路德街，这条路已经改名为恩格斯路，沿着一个陡坡直着走下来，走到比萨拉比亚市场。市场已经被封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可卖了。市场周围平时挤满了流浪的人们。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当时不得不跨过一具具已经冻僵、覆盖着雪的尸体。早晨，警察会来收尸。但是，在我去工厂的清晨，这些被冻僵的一堆堆人体和破烂的衣衫令人毛骨悚然。

在“布尔什维克”上班时，我考入了外语夜校的英语和德语班。当时我的外语已经不错，但还是想进一步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拿到可以做翻译的证书。夜校是三年制的。还没有学完两年的时候，

我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紧赶慢赶，是为了准备报考基辅工业学院。我想跟父亲一样作个工程师。可最终不得不改上夜校。因为“工人”食品卡，以及家里情况困难，无法放弃工厂。况且当时我的工资已经是一百卢布。这已经是一笔钱了。

可是，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已经没有东西卖给“外贸商店”了。有多少钱也不管用。父亲和母亲瘦得很厉害，而我干脆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碰见了一位中学同学。他告诉我，前不久在基辅新开张的“国旅”分部招收懂外语的年轻人上导游翻译班。条件非常诱人：工资 150 卢布，最主要的，是跟旅游团组一起的免费伙食，以及一份相当不错的口粮。我紧紧抓住了这个招工的事。当时是 1934 年初，乌克兰大饥荒的第三个年头。看情形不会有任何好转。当然，无法兼顾工厂的工作，大学的学业和国旅的训练班。经过思考，并跟家里人商量之后，我决定冒险：递交了辞职申请。

HJ \*5/9】不过，风险并没有多大。由于我拥有翻译证书，掌握两门外语，所以毫不怀疑会被录取。在招生委员会经过简短的面试之后，果然是这样。接下来安排了三个月的课程。给我们教授的有基辅的历史，介绍了市里和城区的风景名胜，苏联劳动法和司法体系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专业导游给我们介绍了实际工作的经验。这个课程在一般知识以及基辅罗斯的建筑绘画文化等方面使我颇有收获。此外，加上在国旅两年的工作，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天生的腼腆和拘谨。专门的政治指导，教我们

采用那些手法可以使外国客人对“苏联生活方式”留下良好印象，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坦率地说，这些手法中的某些东西在后来的辩论中派上了用场，其中也有“科学的辩论”，当时我们专门作一件事，就是颠倒黑白.....

初春，当第一批游客来到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34 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国以及外国游客敞开了自己的大门。生活，尤其在乌克兰，依然非常艰难。因此，当局更加细致地为接待游客作了准备。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当时的确作了大量的工作。培训导游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虽然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旅馆和饭店进行了翻修。储备了上等的餐桌布和床上用品，餐具，改建了厨房，购买了冷冻设备。在美国和意大利采购了小轿车和带防雨帆布棚的敞篷客车。装潢精美的旅馆小卖部里，堆满了进口商品。同时，也没有忘记招收一批最漂亮的姑娘作售货员。各个旅馆的接待处里，摆上了从国外进口的办公家具，用油画，非常漂亮的壁画镶板和广告招贴画加以装点。大堂里，有昂贵的地毯，摆放着古董家具。

所有这些是在饥荒年代里搞的！典型的斯大林——波将金式的农村。斯大林喜欢也善于装样子蒙蔽外国人。否则他怎会迷惑那些具有洞察力、善于批评思维的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譬如，巴尔比优斯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斯大林就是今日的列宁。”“各族人民领袖”也善于积聚大量的财产，用来驯服那些需要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人。并且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斯大林是个勤俭的当家人，不能

容忍大手大脚，要求所有人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人们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所以相信他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增加国家的财富。然而，斯大林对于“国家财富”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财富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毫不相干。人们可以一贫如洗，只要国家富裕就可以了！所以，外国游客在导游的密切关注下，看到了一个“繁荣的国家”，这也是要努力展示给他们看的。结果，当他们离开时，并没有获得有关苏联真实生活条件的任何概念。基辅的“国旅”拥有一家名叫“大陆”的豪华饭店，位于尼古拉街，紧挨着克列夏季克（战争期间饭店烧毁，此后在遗址上兴建了音乐学院）。专门请来了沙皇时期的高级厨师，服务生，门僮，为他们专门缝制了制服，镶着金银饰扣和镶条。闪闪发亮的“林肯”，“菲亚特”的司机们穿着运动装。第聂伯河上为外国游客服务的，是雪白的动力帆船，船上的酒吧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凡此种种之外，当时的苏联之旅非常便宜。花 100 美元，可以在一周之内游览基辅，莫斯科，列宁格勒，享受一日三餐和服务。当然，当时的美元比较值钱。但是，许多游客离开时，都确信苏联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国家。正是在那时，我国的外贸官员形成了一个概念，即卢布一文不值，所以为了赚取外汇可以“合算地”浪费自然和人力资源。

-----

饥饿年代(3)

-----

为了生计，我到基辅“国旅”做导游。

苏联政府为了展示集体化的成绩，不惜造假给外国游客看。

80年代初，我在华盛顿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饭店遭劫并被打伤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不禁感叹，需要何等厚颜无耻才能将破产的农业当作繁荣拿给外国游客看。我要讲一讲第一次见识“模范”集体农场的情形。

基辅来了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他们买的是豪华游，所以给他们配有专车和导游。我们最喜欢这种游客了。麻烦比团组少得多，并且翻译跟客人得到同样的伙食，并且在国内旅行时会有卧车“国际车厢”的一个床位，在最好的饭店里有一间客房。我刚刚被招到“国旅”，所以跟着已经有数年经验的翻译克拉拉实习。我们俩负责接待这对美国夫妇。

我喜欢克拉拉。她个子不高，但非常雅致，恰似一个陶瓷娃娃。虽然她要比我大三四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并且在一开始执行指导角色时非常严格。

美国人从头一天起就表示要参观一个集体农庄。克拉拉叫我把这个意思通知给服务处的主任法因伯格，回头他再落实，我们可以参观哪一家农庄。他手里的清单里，总共只有三家农庄可以带外国人去看。但是，每次都必须预先打电话通知农庄的主席，由于电话

线路不好，这往往需要一天时间。到傍晚时，这些事情都办妥了。我将这次行程也通知了我的朋友斯捷潘，他是配给这对夫妇的“林肯”轿车司机。

在导游翻译班培训的时候，我在国旅的车队里打过一阵工，做帮工。我的工作清洗汽车，给散热器里加机油，加水，以及保证出车之前油箱里有足够的汽油。当时，基辅还没有加油站。我跟斯捷潘一起——他也是司机当中最年轻的——每周一次开着卡车去铁路货场附近的油库。把几个大桶灌满汽油，将油桶滚到车厢，然后开回到车队，这批汽油一般保存在单独隔离开地方。油桶放在高处，这样汽车开到跟前之后可以直接将汽油加到汽车的油箱里。先拧开油桶的盖子，把管子插进去，然后在管子的另外一端吸气。然后，一切按照虹吸原理自动进行。但是，有时也会把汽油吸进嘴里，所以得拼命漱口。

我跟斯捷潘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二十五岁，但他把我看作同龄人。他教我开汽车，所以，当没人的时候，他会把“林肯”交给我开。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俩邀上两个姑娘在城里开车兜风。

早晨，陪着美国夫妇去参观大寺院，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参观集体农庄。这两位外国客人原来对农业十分在行。比尔（他一开始就叫我们按名字称呼他和他的妻子——苏西）是一家美国银行的经理，同时在纽约附近拥有一个大型牧场。他读了很多关于集体化惨状报道，所以想来找出私营农场优越性的直观证明。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带他去的那间农庄，叫做

“模范”，并且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看过了中心院子，在宽敞的办公室跟农庄主席谈了话，并且看过了两家农庄庄员的家，这两家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分完美，然后去看几公里之外的畜牧场。沿着坑坑洼洼的一条窄道，“林肯”十分艰难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一路上斯捷潘不停地踩着刹车。这里也是井井有条。客人到来之前打扫得十分干净的牛栏里是一排良种小公牛，时不时低头在满满的食槽里吃食。这些小牛看上去营养良好。然后看了一个养猪场。淘气的小猪围着一个个肥胖的大母猪。

比尔显然被看到的这一切所震惊。他提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询问了牲畜的品种，产奶量，种牛的能力等等。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实习机会。并且，虽然我知道一般农庄，而不是模范农场的情况，但这家农场的状况似乎在说明，集体农庄的事情可以办好，可以使它成为盈利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米丘林神奇苹果”，苏联育种专家培育出的“奇迹小麦”，以及“创纪录奶牛”神话般的产奶量。于是，我们相信，再过一两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国，而她的公民将是最幸福的人民。所以，现在最好给外国游客看的不是悲惨的现状，而是光明的未来。所以，在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我们国家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女主人一边骂街，一边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购买必需品。但是，好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偶尔碰到鱼子酱或者是螃蟹，女主人一般会存起来，不让家里人碰。可是，当要接待外国客人时，却把所有这些东西拿出来。于是，吃着美味佳肴，客人会想：这俄国人日

子过得并不那么糟，有关困难的报道显然是夸大！

所看到的一切给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跟畜牧场负责人告别时，比尔激动地说：“无论如何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切！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读到的，全都是撒谎！现在我相信了，跟个体劳动相比，集体劳动一点也不坏，甚至要好一些。有些地方我们还得向你们学习。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然后，稍微停了一下，问道：“可是，请告诉我，你们的农庄不是个例外吧？其他农庄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合理？”显然，比尔发生了怀疑，这些人是否在欺骗他。

“当然啦，当然啦！”畜牧场的负责人向美国人保证说，虽然他非常清楚，大多数农庄里，由于饲料不足而衰竭得站都站不住的奶牛，都用绳子帮忙拉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轻信的比尔满足了。

在农庄耽搁了太多时间，其时气温骤降。当时是初春，所以天气多变。起风了，开始下小雨。克拉拉不断催促美国人，但他们却不愿意离开。最终我们上了路，但很快就明白了，被拖拉机翻起来的土路已经没法走了。坑洼处变成了一个个水洼，沉重的汽车在路上摆来晃去。斯捷潘决定驶离土路，穿过田野直接开到公路上去。他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走了大约两公里之后，汽车彻底陷入了松软、潮湿的土里。我们试图将“林肯”推出来，结果车轮在泥汤里越陷越深。

[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https://goo.gl/C6xxGf) 看 [禁书](#) [禁闻](#) [禁文](#) [禁网](#) [禁片](#) [禁歌](#) [禁曲](#)

比尔下了车，看了看情况之后平静地说：

“没用了。我们陷得太深了。惟一的希望是俄国的严寒。”他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为自己的玩笑开怀大笑。

但是，这里一点也不可笑。严寒秋天才会有，所以我们根本指望不上。我们三人——斯捷潘，克拉拉和我——都感到非常担心。但美国人却非常平静。

“办法是，”比尔开始议论，“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是你们这里惟一不足的……”

当然，过去，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不光缺乏可靠的道路，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但是，比尔被畜牧场迷住了，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开始商议。周围既没有石头，也没有干树枝可以垫车轮。天开始黑了。刺骨的北风也更大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车里过夜了。可是，基辅那边会多么紧张啊！一对美国夫妇失踪了！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送到饭店去。更何况两位女士穿得很薄。她们应该走到哪怕是有人住的地方，并且要是遇上顺路车的话，回到城里去。

最终我们决定，克拉拉陪着这对夫妇走，我跟斯捷潘在车里过夜。

三个人影朝着地平线方向越走越远，很快消失在暗夜之中。我跟斯捷潘再次巡视了一遍“林肯”，车子在湿淋淋的田野里显得那样的孤立无援。斯捷潘发动了汽车，试着开动。结果是白费力气！最好不要浪费汽油，没办法，就得呆到天亮。我们俩钻进车子，点上烟。时间过得很慢。克拉拉跟美国夫妇是否走到公路上，有没有碰到顺路车，这些想法令人不得安宁。

我刚刚开始打盹，就听见敲窗户的声音。我放下玻璃，发现是比尔。难道出了什么事？出什么事啦？比尔大笑道：

“别担心，没事。我让她们俩坐上一辆去基辅的车。但我自己决定回到你们这里来。想看一看，你们怎么从这里弄出去。”

-----

在“国旅”当导游(1)

-----

我使劲忍住没有对美国人的轻率发火。

“您不该这么做。回城去是最好的了。并且您怎能可以丢下两位女士不管？”

“这有什么？我们美国的妇女是独立的，可以保护自己。难道你们这里不是这样吗？那些人不错，他们答应把苏西和克拉拉送到饭店.....”

“当然了，我们这里的妇女也是很独立的。可是，什么事都会有。现在，拿您可怎么办？上车吧.....”

但我始终感到担心。有关躲藏在森林里“被没收财产的富农”的传言记忆犹新。这些饥饿和绝望的人们往往在夜间袭击单身的路人，有时也会拦截汽车，抢劫钱财和食物。也有过死人的事。现在

平安多了。几乎所有的“林中弟兄”都被抓获了。可是，万一有一两个漏网的呢？并且当地居民也可能晚上出来干坏事。甚至在基辅也发生过抢劫。不过，这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了，父母亲和我遇到了打劫，并且是在市中心。在符拉基米尔街和符杜克列耶夫街的交汇处，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幢整整占了一个街区的大楼在内战时期被烧毁的废墟（这幢大楼后来得到重建，并且作了乌克兰科学院的办公楼）。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跟父母做客回家，从克列夏季克街下来，走过这片废墟。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从一堆瓦砾中窜出两个人，手里拿着手枪。

“举起手来！”我们听见了嘶哑的一声喊。

我们听从命令，都站住了。

其中一个劫匪在几步之外停了下来，用手枪对着我们。另一个走近母亲。

“把手举起来！”他喝道。

她举起了戴着戒指的双手。其中一个订婚戒指，另外一个戒指上镶着一大块红宝石，还有一个是金质花瓣镶满细碎的钻石。

“卸下来……”

劫匪用枪管指了指金项链，然后是耳环。妈妈顺从地卸下来，放在劫匪的手上。劫匪将这些放进口袋之后，转身朝父亲走来，父亲依然举着双手。这一点救了他那老式上等山羊皮钱包，以及证件和钱。在风衣下面未系扣子的西装上衣摆向身后，所以，劫匪在胸

前搜索之后一无所获。风衣的口袋里有几张票子，这使他满足了。劫匪拿枪对着我们，一边后退，慢慢地退到废墟后面去。突然，妈妈天生的自制力又回来了，她喊道：“请把两个戒指还给我吧！订婚戒指和那个红宝石的。这是祖母的纪念物。它对我非常重要.....”并且她端直朝着枪口走了过去。我跟父亲还没来得及喊她回来，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拿走了物品的劫匪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捧戒指，项链，手链，张开手伸过来：“看在您勇敢的份上，请拿走吧，女士。哪些是您的？.....”

妈妈走过去，用两个手指从一堆金银饰品中挑出了自己的戒指。

“谢谢。”她平静地说完，然后便回到我们身边。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劫匪突然之间却表现出了高尚.....

“现在，留在原地十分钟别动。”又是那个嘶哑的声音，接着劫匪消失在废墟之中。

父亲责难母亲的疯狂行动，可是，她抚摸着失而复得的戒指，根本就不听他说的话。

每次，我遇见类似情形时，都会想起来这个场景。类似的情形还不少。我也曾经撞到过劫匪的枪口。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并且不是在什么黑暗的角落或者老旧的废墟里，而是在华盛顿市中心，白宫对面第十六街的豪华饭店“亚当斯”里面。

当时，我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代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

大研究所。我们研究所的所长阿尔巴托夫院士每次来华盛顿都住在“亚当斯”饭店。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国会议员索拉斯郊外的家里呆到很晚，子夜时分才回来。一般我将自己照顾的客人送到旅馆门前，告别之后便回家了。但这次阿尔巴托夫请我到自己的房间去：“好像睡不着。我还留下了一瓶亚美尼亚葡萄酒。如果不是太累的话，我们坐一坐，聊一聊.....”我非常乐意。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互道了晚安。我走出来到空无一人的走廊，叫了电梯。当电梯停下，门打开之后，我面前的情形十分奇怪。跟饭店大厅豪华气氛完全不和谐的四个衣衫破烂的黑人年轻人呆在各个角落。饭店的夜间守门人不自然地弯腰站在柜台前。起先我想着，可能是什么东西出了故障，所以请来了修理工。但他们为什么如此紧张，并且怪怪地看着我：“大家好！这里出了什么事？”我一边走向出口，一边跟大家打招呼。

没有人答话，突然，一个黑人朝我冲了过来。这时，我才看见了他握在手掌中的手枪，非常小巧，枪身一点也不显眼。意识里闪了一下：报纸上刚刚报道过这种“儿童玩具”：有人用儿童玩具作掩护，以零件的方式从德国运进来，然后在美国组装，最后廉价出售。武器却是致命的。平民窟里往往使用这种枪：价格便宜，易于藏匿.....

黑人青年左手持枪，右手开始搜我的身。他想确信，我没有武器。大家都知道，许多美国人枪不离身。我身上当然没有武器。但是，裤子的口袋里却有一个皮夹子。劫匪摸出了皮夹子，然后拿枪

对着我，开始慢慢地向后退。

“把钱拿走，”我对他说，“把皮夹子还给我。那里面有证件……”

我不想失去驾照，加油的信用卡和国务院发的外交官证。没有这些简直寸步难行。可是，要想办理副本明天得花多少时间啊！

不知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不会有“明天”。我大声索要自己的证件。但这个黑人似乎没有听见。其他人也都站着不做声。我在心里想着，现在这些人是否受毒品的作用？他们的反应似乎十分迟缓。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我走近那个劫匪，夺来了自己的皮夹子。他一下子呆住了——显然没有料到我的这种轻率之举。他接着扬起手来，然后用手枪柄击打了我的头部。但我还是来得及打开皮夹子，拿出绿票子——那里面有大约两百多美元。

“把钱拿走。”我将打开的皮夹子伸了过去。他拿走了所有的钱，于是，我对自己的行动非常满意，把皮夹子装到了口袋里。

黑人命令道：“脸朝下卧倒！”

我走开了一些，看见在沙发和椅子之间，面朝地毯趴着两个身穿饭店门僮制服的人。我觉得这种姿势不太雅观。我只是单膝跪下，把头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才感觉到，脸上在流血。显然，某个血管被碰破了。血越流越多。衬衫和椅子上出现了红色的血渍。我侧目看了看前台的方向，那里有两个劫匪正在撬保险箱。血流进了眼睛，于是我想用手绢擦干净。我旁边的年轻人立即神经质地做出反应，他走进我的身边，发现了手上的手表。他拿枪对着我的太阳穴，试图解开金属表链。所幸，表链扣得非常紧，所以他怎

么也卸不下来手表。这时，保险箱的小门咯吱吱响着掉下来了。黑人从我身边跳开去，跑向前台。我利用这个时机，卸下了手表，藏在自己的口袋里。这块表有纪念意义，所以不愿意失去。但是，这样也不无风险。黑人走回来，看见我依然是那种姿势，只是手表不见了。他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我想着再挨一下。但是，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嘟囔了句什么，走开了。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卸下了手表并装进口袋里了。

我在想，下一步会怎样。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劫匪在逃走之前射杀证人。所以才叫我们脸朝下趴着。这样，更方便在后脑勺开枪。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也就无从担忧将来的事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开始琢磨，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毫无疑问，报纸会大写特写对“亚当斯”的抢劫。会讲得十分详细，并且配上照片。我想象着自己血流满面出现在报纸上，外加一句“苏联外交官受伤”。这绝对不行。本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相当糟糕，再加上一个袭击外交官事件。也许还会编出一个对十分接近某某人的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院士的“未遂袭击”事件等等。搞不好，会搞成类似萨拉热窝枪击一样.....

-----

在“国旅”当导游(2)

-----

HJ \*5/9】我毫不怀疑，这纯属巧合。打劫的是饭店的现金，而我不巧正在这时走出电梯。这是听见一声喊：

“十五分钟之内别动。如果有人敢动，我们就杀了他。我们会看着.....”

拿走了保险箱里的东西之后，这四个人一个接一个，背对着大门，端着手枪离开了饭店。所有的人都出了一口气。我们真是太走运了。劫匪没有闹出多余的动静。不管怎么说，白宫就在附近。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周围非常安静。我问道：“是否该叫警察啦？”

“您这是怎么啦！”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别动，时间还没到.....”

又等了一会，我们都站起来了。值班员拨了电话。过了大约一两分钟，就听见警笛声，刺耳的刹车声音。窗户外边闪起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刑事案件的记者匆忙地拍着饭店的入口。我只剩下数秒钟时间了。夜间值班员和门僮挤在大门口的当儿，我悄悄走向电梯，按了电钮。电梯门开了，然后立即在我身后关上了。过了一瞬间，我已经来到了五楼。我走到阿尔巴托夫的门口，按了门铃。

“是谁呀？”

“是我。尤拉，快开门吧，有一件事情.....”

门打开了一条缝。有两条链子挂着。阿尔巴托夫看着我，但没有认出来。毫不奇怪，脸上的血迹已经凝干，衬衣和浅色西装外套沾满了褐色斑点。

“这真的是我。”

“太恐怖了！出什么事啦？”

“这就说给你……”

我简单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我决定不能这个样子碰见警察。然后我到洗漱间，洗了脸，洗净了衬衣，洗掉了西装外套上的血渍。然后，把这些东西挂在落地大台灯上烘干。阿尔巴托夫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美国首都的中心会发生这种事情。大约四十分钟后，我看了看窗外，看见警察正在离开旅馆。只是在街对面还有一辆巡逻车。伤口不再流血。衣服也干了。我们商量好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分手了。下来到前厅之后，我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跟记者说话的夜间值班人没有注意到我。我的汽车就在旁边，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到家了。

虽然我已经收拾妥当，我的妻子列拉马上就明白了：出事了。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她已经习惯了我经常会发生各种糟糕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平静了，帮我清洗了伤口，贴上了膏剂。

早上八点，我已经开车到了酒店。然后我跟阿尔巴托夫一起去国会出席一个工作早餐。电视和《华盛顿邮报》非常简单地报道了“亚当斯”酒店的抢劫以及“没有人员伤亡”……

现在我们回到遥远的1934年。

我们决定，不向比尔解释，为什么替那两个被他轻率地乘别人汽车打发走的女士担心。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开始收拾准备过夜，放下了窗帘，用小地毯遮住前后窗玻璃。我和比尔安顿在后

座，斯捷潘在前座。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所长时间。揭开窗帘的一角，外面一片漆黑。雨停了，天气稍微变冷了。我摇了摇斯捷潘的肩膀：

“也许应该发动机器，打开暖风……”

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就听见了说话声。我弯腰对斯捷潘说：

“有人朝这边走来。坐好别动。让他们以为没有人……”

比尔动了动。我警告他说：

“请您别出声……”

他理解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躺在座椅上。说话声接近了。说话的有两个人。突然，静了下来，然后又听到：

“看看，这是什么！”

“它是从哪儿来的？”

“怕是陷住了。”

车子两边近旁，是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可以听见沉重的呼吸声。我们屏住呼吸，尽量保持一动不动。突然，听见了敲击声。是金属东西，或者是截断的枪托敲的？这样就大事不好了。开始拽前门的把手。斯捷潘一下子明白，再也无法藏着了。

“走开，我要开枪啦！”他拼命喊道。

他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于是就逃跑了。也可能，走过来的不是恶人。但最好是保险再保险。当然，斯捷潘根本没有枪，但心理上他的盘算是对的。后面我们再也没睡。我对比尔解释说，这些人

可能是喝醉酒的恶徒。

“在我们美国这些人一样也不少。应该离他们远些才对。”比尔温厚地表示同意。等到天亮之后，我们下了车。后保险杠挨了一下，但破坏十分细微：金属稍微凹进去了一点。锁好“林肯”之后，我们出发去附近寻找住家户。

村庄坐落在一条大路上，路的两边栽着柳树。前两个房子的窗户都钉死了，里面没有住人。显然，是“被没收财产的富农”抛弃了。第三家的烟筒里冒着烟。我们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老的女人，身穿黑色包发帽，肩上围着一个破旧的方巾。我们问了好。我道歉说，这么早惊扰了，请让我们进屋。

“请进吧。”她略微顿了一下说道。

在正房里，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显然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大块面包。俄式炉子里，看得见盛土豆的铁锅。我解释给他们，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并补充说，跟我们一起还有一位美国游客。

“请坐吧。”那位年长些的说，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们实在是饿坏了，所以顾不得人家的劝让。女主人将铁锅放在桌子边上，给每个盘子里都放了煮土豆，然后浇上向日葵油，给每人倒了一铝杯甜菜茶。我想，对于前来作豪华游的比尔这顿早餐有点太过简单了，并且在这样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用餐之后，他会集体农庄的饮食留下不好的印象。法因伯格那里可有我好看的！就为我们让美国人这样过夜，我们肯定要倒霉！但是，比尔不但没

有抱怨，而且还称赞食物“味美营养”。

从主人的话里我们弄清楚了，我们来的不是昨天参观过的那个农庄。这个根本就不是“模范”式的。我的又一个失误！不过，这里的人帮了我们。吃过东西之后，我们去了农庄管委会，那里给了两头牛来帮忙。

“难道它们能把这个大家伙拖出来吗？”斯捷潘表示了怀疑。

“会拖出来的，它们有的是力气……”

壮硕、沙土色的牛长着黑色斑点，犄角朝两边分开长着，鼻孔里戴着铁环，好奇地打量着同样也是沙土色的海外怪客。挽具上套了缆绳。我跟斯捷潘将缆绳的一端系在“林肯”的前板簧上。比尔坐在车上，发动了汽车。我们俩在后面推。前面喊起了“驾驾”的吆喝声，牛开始使劲，汽车晃动了一下，慢慢地从前一天车轮挖翻起的沟渠里出来，沿着冻实的土地望前移动。这里，我几乎看见了某种象征：乌克兰牛使美国技术的奇迹恢复生机！……比尔微微打开车门，喊道：

“这车本身根本没希望！没有公路和其他设施它毫无用处。我给你们说过了：应该赶快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

现在，当电视上播放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没有道路，在粘稠的泥浆中拖拉机都出不来，每次我都会想起这个场面。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村庄和田野周围依然没有硬质路面的道路。

-----  
在“国旅”当导游(3)  
-----

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结果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大批人员遭到扣押。

我担任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的联络官，收买了看守大使馆的党卫军冲锋队长，成功地把电台交给了地下抵抗组织。

1941年6月21日那个不祥的早晨，在里宾特洛甫官邸门口，帝国外交部长的一辆“奔驰”等着我们——杰卡诺佐夫和我——把我们送回大使馆。从维里海姆大街拐上林登大道之后，我们看见，沿着大使馆正门口有一排党卫军。实际上，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隔绝了，电话不响了。禁止我们进城。没有办法，只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大约在两点钟，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德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埃里赫·佐美尔通知说，在弄清楚哪个国家将代表苏联的利益之前，要求大使馆指定一名外交官跟德国外交部保持联络。杰卡诺佐夫大使将这个职能委派给我，所以，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将这个情况通报给了礼宾司。

“我应该预先告诉您，”电话中对我解释说，“大使馆的代表每次到外交部来，都由看守使馆的警卫负责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

陪同。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他与礼宾司联系.....”

也就是说，我获准仅仅走维里海姆大街，并且得有海因曼的陪同。同时，非常重要是，必须把使馆的有关情况，以及德方有关疏散苏联人员的条件等通知给莫斯科。德国的条件是交换相同数量的人员，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帝国政府最近几个月从苏联召回大部分工作人员及全部家属之后，在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多人。而我们在德国的人数有一千左右。斯大林担心引起希特勒的怀疑，下令禁止削减驻德国的工作人员。不但如此，直到最后一天，都有新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抵达大使馆。现在，按照德国人的方式，我们仅有一百人可以交换，其余九百多苏联人应该留在德国。非常重要是警告莫斯科，在交换的问题圆满解决之前扣住德国大使馆的人。我们试图发电报，但没有成功。当时的外交代表机构还没有使用无线电通讯。

杰卡诺佐夫大使对这个局面非常着急，他认为有必要讨论可能的行动方案。六月二十四日，他将武官图比科夫将军、大使馆随员克罗特科夫——他接替了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情报负责人柯布罗夫——以及我这个惟一的可以进场进城并且与德国外交部谈判的外交官等三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大使开始说，“有没有可能让某人悄悄地溜到使馆外边去？那样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地下组织成员取得联系，并且通过他们通报莫斯科。”“我的人，”图比科夫汇报说，“仔细核实检查了这种可能。整个使馆区都被封锁了。晚上哨兵巡逻时带着

狗。”

“那么，别列什科夫试一试甩掉海因曼？”

“海因曼跟我寸步不离。”我说。

“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海因曼？”

“总体上我跟他的关系十分有分寸。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稳重的人，而不是年轻的党卫军狂热分子。”

“能不能试探他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着手？”

我提议在使馆内安排一次我跟海因曼的午餐或者晚餐。这个主意获得了支持。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克罗特科夫这时加入了谈话，“只有我跟朋友们保持联系。他们跟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发生接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此外，你们大家知道，他们的无线电发射机坏了。日前，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一个新的。可是怎么才能转交出去呢？这是眼下最要紧的任务。”

“因此说，”杰卡诺佐夫总结道，“不论什么样的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安排克罗特科夫与朋友见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是不能原谅的……”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根本不是什么花钱收买的谍报员。经验丰富的苏联情报人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罗特科夫联络的朋友们，是坚定不移的反法西斯斗士。包括大约两百人的地下组织在数年期间认为，自己有爱国主义义务把有价值的绝密情报转交给苏联，把苏联看作可以对抗希特勒奴役各国人民企图的一支力

量。领导这个组织的舒尔茨一伯曾和哈尔纳克可以接触当时最重要的国家机密。

空军上尉哈罗·舒尔茨一伯曾，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军官世家，跟梯尔比茨元帅是近亲。舒尔茨一伯曾受到希特勒最高指挥当局的完全信任。但是，在大学时代，他跟左派组织和德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三十年代初，他一度编辑过一份反法西斯青年杂志。希特勒上台之后，冲锋队洗劫了编辑部，而舒尔茨一伯曾也被投入监狱。身居高位的亲戚们出面干涉，将他弄出监狱，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当作“幼年的错误”一笔勾销。

但是，出狱之后，舒尔茨一伯曾并未中止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明白，现在他必须改变方法。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并且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这种关系。同时，他跟帝国元帅戈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青年军官给戈林元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戈林甚至在舒尔茨一伯曾的婚礼上充当了男傧相，这样，使他不再受任何怀疑。“第三帝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赏识为舒尔茨一伯曾进入航空部创造了条件，在航空部他负责情报司。但是，仕途的顺利并未冲昏他的头脑，没有让他偏离主要目标——推翻纳粹制度。舒尔茨一伯曾领导的组织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继续工作。

另外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斗士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是哲学和法学博士，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在柏林建立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小组的网络。他在讲座和讨论会上，号召与苏联保持友谊，并且警

告德国人民所面临的法西斯威胁。纳粹上台之后，他领导的组织转入地下。为了保密，哈尔纳克加入了国社党，并在经济部就职，在那里很快就作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跟舒尔茨一伯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将两个组织合而为一。由于有机会接触绝密的军事经济情报，舒尔茨一伯曾和哈尔纳克得出结论，即不久的将来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已经不可避免。在就此警告莫斯科（斯大林同样也不愿意相信这些）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在战争开始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联系。所以，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替换出了故障的发报机。

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是比较少见的那种爱说话的人。我们认识的第二天，我就已经知道了，他有一个患病的妻子，哥哥在帝国办公厅警卫处任职，儿子埃里赫马上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然后就得上前线。海因曼说，他请哥哥想办法把儿子安排在后方，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党卫军军官，并且是看守布尔什维克的警卫队长，在与苏联交战期间跟苏联外交官说这种话，令人十分警觉。他是否想挑起我谈及隐私？也可能，在内心深处他对我们并无敌意，并且愿意帮助我们？无论如何，有必要仔细观察这个人。在跟杰卡诺佐夫商议之后，我决定试着跟海因曼建立“友谊”。

有一天傍晚，海因曼巡视完哨位之后，走进使馆询问，我们要不要给外交部转交什么，我请他进来稍事休息，喝一杯。我们在客厅里一张玻璃矮桌前的软椅上落了座。

“您愿不愿意简单吃点东西？”两杯伏特加过后，我对客人说，

“一天下来您可能累了，况且午饭之后已经很长时间了……

海因曼起先谢绝了，称这在值班时是不允许的。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们谈话的内容相当坦诚。几杯酒下肚之后，海因曼开始说，根据他哥哥掌握的情况，帝国办公厅对德军在苏联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抵抗感到担忧。在许多地方，苏军战士拼到最后一发子弹，然后会进行肉搏战。这场战争期间，德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见如此的抵抗，也从未有过如此的损失。

“在帝国办公厅内部，”海因曼说，“有人甚至怀疑，是否值得与苏联开战。”这已经像是反对派了，我绝对没有料到党卫军官会这样说。

-----

在“国旅”当导游(4)

-----

由于对海因曼没有信心，我没有做声，听着他说。只是当他再次说起自己儿子的时候，我说，这场战争本来完全不会发生并且那样不仅他的儿子埃里赫是安全的，许多德国和俄国人都可以保住生命。

“您说得太对了，”海因曼感叹道，“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我邀请海因曼吃早点。他没有多余的客气立即同意了。对我而言，非常要紧的是弄清楚，他对我们能有多大的用场。我想着，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个话题，一旦他的反应是否定的话，可以把一切都当作一句玩笑话。首先我自问，是什么东西会促使他帮助我们？如果说，尽管他属于党卫军，并且是军官，但并不是铁杆纳粹分子，为希特勒效劳也是情势所迫，那么就可以利用他对战争的否定态度以及对儿子的担忧。譬如，可以许诺，一旦埃里赫被俘，对他进行加以关照。如果海因曼是个无耻之徒，仅仅想给我们帮忙，自己挣些外快的话，这也没有问题。可是，万一他试图挑动我们“收买”党卫军军官，然后交给盖世太保？但是，他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也可能有一种选择诱惑着他：那边更合算，给得更多些？但是我想，杰卡诺佐夫不会讨价还价的。

在约定的时间，海因曼到了。他在评论了一番前线的新闻之后，又一次涉及到对他而言十分迫切的话题——自己的儿子。

“最近，”他说道，“埃里赫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了。并且，按照德国现在的习惯做法，我得自己掏钱为他定做军礼服和武器。再加上妻子的病，所有的积蓄差不多都要花光了……”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购买军礼服和武器的这种习惯做法，但是，海因曼说起了钱，这看起来像是朝着我们感兴趣的方向走了一步。我决定利用这一点。

“我非常乐意帮您一个忙，”我漫不经心地说，“我在德国工作了

很长时间，所以攒钱准备买大件东西。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这些钱始终是用不着啦。除了一只手提箱和个人物品，以及一点零花钱之外，当局不允许我们带走任何东西。我真不好意思这样说，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一千马克……”

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1940 年我每次从埃森来柏林商务代表处时住的那家包膳食的小旅馆，一间大客房，公用卫生间，每天仅要五个马克。

海因曼开始思前想后，仔细地看了看我，很长时间没说话。毫无疑问，他在盘算，接着下去是否太冒险了。我若无其事地呷着咖啡。最终海因曼说道：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可是我怎么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拿您这么一大笔钱？这不行……”

“您看着办吧。我给您说过了，这些钱始终是用不着的了。不允许带出境。贵国政府将会连同使馆里的其他钱一起没收。对第三帝国来说，什么一千马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对您这是有用场的。不过，您自己拿主意吧，谁拿到这笔钱，我都无所谓……”我给他加了点咖啡，酒杯里斟满了酒。海因曼点了一枝烟，仰靠在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可以感觉到他内心里的斗争。

“好吧，那么我同意了。”他终于说道，“但是您知道，任何人都不要知道这件事！”

“别担心。这是我的私人储蓄。没有人知道，我有这些钱。我把钱给您，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掏出皮夹子，数出一千马克，把钱放在桌子上。海因曼慢慢地伸手过去拿。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大皮夹子，然后将票子一张一张拂平之后，装到一个夹层里去，最后将皮夹子装回口袋之后，沉重地喘了一口气。

就这样，事情有了转机。

海因曼说：

“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如果您什么地方能够用得着我，我将非常乐意效劳……”

当时，可以立即利用这个机会，但是，我考虑之后，决定今天到此为止。现在，最好就这样了。

“我没有什么事，”我回答道，“不过是您让我有好感，所以我非常乐意帮您。对我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反正这些钱我自己也没法用。”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当海因曼告辞时，我邀请他白天来，一起吃午饭。

根据杰卡诺佐夫的指示，使馆的厨师拉科莫夫为我们准备了一顿极其讲究的午餐。有鱼子酱，招待贵宾储备的鲑鱼肉，牛肉清汤，基辅肉饼，冰激凌，咖啡，当然还有伏特加，格鲁吉亚葡萄酒，亚美尼亚白兰地，烈性甜酒等等。拉科莫夫穿上燕尾服和蝴蝶结，为我们服务。

海因曼到之前，一切已经准备妥当：我可以好好招待他，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我们此前跟杰卡诺佐夫和克罗特科夫预先已经商议

好了，拟定了行动的步骤。吃甜点的时候，海因曼回到了早晨的话题，再次提出愿意帮任何忙，我回答说：

“这样的，海因曼先生，我给您说过了，我自己没有什么事。但是，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办一件事。这纯属个人私事，所以我都没有答应，先要跟您谈一谈。当然，他对我们的关系一无所知。”我安慰海因曼说。

“是什么事？”海因曼问道，“也许，我们一起想一想，怎么帮你的朋友？”

“他跟一个德国姑娘很要好，可是战争突然开始了，他甚至来不及跟姑娘告别。他非常想出使馆哪怕一个小时，好见她最后一面。这不，您也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许今后再也见不着了。这样，他求我帮忙。可是我们被严禁离开大使馆的。看来，要让他失望了……”

“我得想一想，”海因曼不同意，“我觉得，这事情并非没有办法……”

拉科莫夫送来了雪茄盒子。点上烟之后，海因曼陷入沉思。长时间没说话。然后，似乎在高声推论，说道：

“我手下守卫使馆的人知道，如果需要去外交部的话，我跟您一起出去。他们甚至已经习惯了我跟您一起出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般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您的朋友安排在后座，出使馆进城，然后在什么地方把他放下车，他们未必会注意到。过一个小时，我们在约定的地点接上他，然后回到大使馆。大概，这个办法是完全可行

的。您看呢？”为了保险起见，我开始对他说，为根本不认识人的私事而冒险根本没有意义，并且我的朋友也会忍受跟自己的姑娘没有道别的分离之苦。但是，海因曼则更加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方案。我稍微固执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行动的细节。“如果各个方面都考虑周到的话，”海因曼劝我说，“那么行动会很顺利的。”当然，我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即党卫军军官不会欺骗我们，并且他真的愿意帮助我们。告别时，我说，依然在疑虑，是否值得实施他的建议。但无论如何都请他晚上来一趟。海因曼走后，我们开始商议。最后决定了，必须冒险。无论把发报机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多么重要，第一次出去都不能带它。必须确定海因曼是可靠的。不管怎么说，萨沙·克罗特科夫是空手出去，所以，即便他被抓住，他可以讲那个姑娘的故事。最多由礼宾司提出抗议。同时，非常重要确定，没有人跟踪萨沙。最后，从战争已开始，朋友们那儿没有过任何消息。应该首先核实，他们那里一切正常，这点也很重要。当然，第二次出不去的风险也是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决定暂时不扯上发报机。

海因曼像往常一样，准时到了。我跟克罗特科夫一起等着他。

“介绍一下，这是萨沙。我给您说过的.....”

他们握手问好，然后海因曼说：

“那么是您被我们的姑娘给迷住了？好吧，我会尽力帮您的。”

我们在桌旁坐定。海因曼心情很好。开了许多玩笑，谈起了自己的儿子，以及战前他们一起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度假，在那

儿玩得很开心。他时不时开开萨沙的玩笑，一边回忆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法国被俘之后，爱上了一个法国女郎，可后来不得不离开她。

-----  
在“国旅”当导游(5)  
-----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海因曼说，“但非常理解，能再次见到这个姑娘对您有多么重要……”

我们约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海因曼巡视完岗哨之后，进行这个计划好的行动。

“我想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党卫军军官主动说，“别用你们那辆大型苏联汽车。最好是我们开一辆小型德国车去。这样将会不太显眼。”

这个建议非常有道理。真的，我们的“基斯-101”往往非常引人注目。我决定使用使馆车库里的一辆“欧宝”。开这辆车在柏林的大街上没人会注意我们的。海因曼说，他要跟外交部联系，弄清楚早晨是否要召我去外交部。这一切都像是准备一个平平常常的野餐会一样。也许，海因曼真的相信了萨沙女朋友的故事？如果不是的

话，那就是他做出样子，帮助情人约会。

但是，我们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我们很晚才跟海因曼告别，依然没有完全的把握，他明天会怎样以及明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约定时间，海因曼没来。这让我们警觉。如果他欺骗了我们并且盖世太保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怎么办？整整三个小时里，我们内心的紧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下午两点，门铃响了。这是海因曼。他为自己迟到道歉：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得不叫医生来，所以他也得呆在家里。不过他已经跟外交部商定：今天因为他的私事不要安排任何会见。这样，我们可以稳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们进入了接待室。萨沙用冰镇伏特加招待海因曼的时候，我将沙土色的“欧宝—奥林匹亚”开出车库，开到大门口。海因曼非常艰难地坐上了我身边的前座。带着银鞘的长军刀十分碍事。最终，他卸下了扣子，将军刀扔到后座上，萨沙已经坐在那儿了。大门开了。海因曼向党卫军举手行礼，然后我们驶上了林登大街。我看了看后视镜，确定没有尾巴跟着我们。

前几天，我们只去外交部。为了不引起怀疑，现在，没走到勃兰登堡门，我便朝左拐，然后沿着维里海姆大街走了几个街区。柏林的大街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那是个阴天，但温暖而干燥。橱窗玻璃闪闪发亮，行人不紧不慢地走着路，街角到处在卖鲜花，老妇人们在遛狗——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但与此同时，几天来前方一直在激战的情况，给看上去似乎一片和平景象的柏林打上了印记。

我们已经预先约好，在一家大百货商店前把萨沙放下车。那里很容易在人群之中消失。更何况附近就是地铁。两小时之后，我们应该在一个地铁站会合。

车子刚停下，我们的乘客很快下了车，立即消失在大量的行人之中。我们继续望前走，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兜了许多圈。然后，沿着夏洛登堡大街开向著名的广播塔。这是柏林人最喜爱的晚上散步的地方，白天这里空空荡荡，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消磨时间。我们先在广播塔下的公园里散了会儿步。然后坐在露天咖啡馆的凉棚下。海因曼说，现在他想招待我，于是叫了两杯柏林啤酒。在车里他一直都没说话——显然，他神经不安。现在，他的口才又表现出来了，所以他不停地讲述自己中学时代各种有趣的事。我漫不经心地听他说，一边想着，萨沙那里是否一切都顺利。

最后，出发去约定地点的时间到了。接近地铁站时，我远远地看见了萨沙。他站在橱窗旁边，似乎被那里的商品牢牢吸引住了。但是，他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我们。当我刹住车之后，萨沙走到人行道旁，自然地向我们招了招手，然后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不慌不忙地上了车。在旁人看来，这完全是朋友的偶遇。在后座坐下时，萨沙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心中一紧——这意味着，他大功告成了。

“姑娘好吗？”海因曼问道。

“一切都很好，非常感谢您。她见到我之后，是那么高兴……”

海因曼开始说一些双关语的玩笑话，但我们并未注意听。在街

上转了一会之后，我将车开到使馆门口，按了一下喇叭。大门打开了。进入内院之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使馆里已经备好了三人的晚餐。我们想尽快把海因曼打发走，但不得不跟他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听着他没完没了的故事。神经紧张之后的放松终究起了作用：我们感到冷漠。

送走海因曼之后，我们跟这次行动有关的人讨论了结果。萨沙报告说，朋友们一切正常。他通知了他们，无线电发报机已经收到，并且我们争取在最近把它送出去。那时就可以给莫斯科传递信息了。

就这样，事情的一半已经做了。现在，需要完成最主要的任务——将无线电发报机送给朋友们。

次日，我跟萨沙一起招待海因曼吃早餐。他告诉了从哥哥那里听来的最新战报。这些情况跟德国报纸上刊登的喜讯完全不同。苏联部队在顽强抵抗。德军的损失大大超出了预计。所有这些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引起了强烈的不安。然后，我们谈到了昨天的出行。海因曼半开玩笑地问，萨沙想不想再见一次自己的女友。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想了，”萨沙说，“可是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您……”

海因曼表示，虽然这有一定的风险，但也许还可以再来一次。

“既然您同意，”萨沙对他说，“那么这次我想多呆一些时间，三个或者四个小时。并且给她带一些小礼物……”

“我发现，您就跟法国人讲的那样，饭时胃口来，”海因曼开了

一句玩笑。“但我能理解您。明天是星期天，外交部关门。不会召见的，所以整整一天是我们的。那么我们十点左右出发，午饭前回来吧。”

海因曼的无所顾忌使我有些吃惊。要知道，这里也会有问题：既然外交部关门，那么我们离开使馆去哪里呢？显然，他认为，自己的士兵并没有讨论的习惯，会认为，既然长官出去了，那就是应该的。经过考虑，我决定不提醒他，因为如果这次出行拖延的话，也许不再会有第二次机会。

第二天早晨，在约定的时间，“欧宝”已经停在大门内侧。海因曼提前十分钟到了。跟他打招呼时，我发现今天他没有带大军刀。军装上扎了一条宽皮带，上面系着手枪皮套，“瓦尔特”的枪柄闪着暗光。我立即觉得不对头。此前的怀疑又出现了。应该说，海因曼原来也一直带着枪，可能他装在裤袋里，反正我从来没看见过。现在，这枪就在外面，他可以很方便地拿出来。如果海因曼决定将我们在“犯罪现场”抓获，怎么办？我们刚刚驶出大门，将“瓦尔特”顶到我的太阳穴上命令我开往盖世太保的总部？我们的箱子里可是有一台发报机的。

我快速扫了萨沙一眼。显然，他也产生了怀疑。应该试探海因曼。也许，他会露出点马脚？

“您今天怎么没有大军刀？这军刀带着很威风的。”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海因曼随口答道：

“您知道，大军刀在这小小的欧宝里碍手碍脚的。我知道我们今天开这辆车，所以决定把它放在家里。按照条例，如果不带大军刀，腰带上必须带枪.....”

这听起来近乎清理，稍微使我们感到放心。那箱子怎么办？夹层里暗藏着发报机，上面是各种“小礼物”乌克兰刺绣衬衣，手槌，绣花边，套人等等。萨沙将箱子扔在后座之后，似乎随随便便地说道：

“这是给我女友的礼物，一些小东西.....”

海因曼仔细地看了看箱子，没有说话，但最终还是上了车。

我在盘算，这时，他会说：“给我看看，拿什么东西讨女朋友高兴？”或者，更糟的是，把手伸进箱子，扎进挨得很紧的夹层里。我的脊背开始出冷汗，马上就要全完了。

我双腿发软，绕着车子走了一圈，打开车门，请海因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稍微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听话上了车。

“好啦！”他一边坐好，一边说，“整整一箱子礼物。您的姑娘会高兴的.....”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1)

-----

过去啦！但嘴里终究很长时间留有不愉快的余味。

我们出了大门，转向乌兰大街的地铁站。那里一般人比较多。而三个半小时之后，在另外一个地铁会合。我刹住车。萨沙故意轻松地拿起了沉沉的箱子，消失在地铁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于是决定开上环线。后来把车停在森林里。天气非常好。云彩在天空慢慢地漂浮着，这个平和的、安定的景象再次在心中引起抗议。那里，远在东方，正在进行血战，乡村在燃烧，我们的人在牺牲，而我却在这里，在阳光照得暖洋洋、到处青草芬芳的树林里跟党卫军的冲锋队长一起散步！

后来我们回到了城里。海因曼提议找个地方吃东西。我们将车泊在一家饭店的附近，走过玻璃转门，进入宽敞的大厅，开始寻找空位子。

突然传来一声喊：

“哎，海因曼，过来呀！”

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着六个党卫军军官。桌上摆满了啤酒杯。毫无疑问，这些人跟海因曼很熟。军官们招着手，请他入座。怎么办？我们无法走开。但是，如果被发现，被扣留的苏联外交官在柏林到处乱跑，这将会是一桩大丑闻。

这时，我听见海因曼急促地低声说：

“我介绍您是慕尼黑来的我妻子的亲戚。您在一家军工厂工作，所以不谈自己的事情。您的名字叫库尔特·休斯科尔。小心些……”

我们走近桌子，军官们有的站起来，有的欠了欠身子，用“嗨，希特勒！”来欢迎我们。海因曼声音洪亮地回答了他们，而我则嘟囔了一句什么……

海因曼介绍过我之后，我们分别坐下，给所有人叫了一杯啤酒。谈话的题目当然是苏德前线的战事，以及英国空军最近恢复的对柏林的空袭。我有绝对把握，在柏林工作这段时间内，语言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会让我露馅，但依然非常感激海因曼关于我在慕尼黑军工厂工作的杜撰。这使我更多时间不说话。无论如何，没有人发现我不是那个自己冒充的人。

海因曼看了看表。我们该走了。但他的朋友们却不愿放他走。我们迟了半个小时才得以脱身，我不得不开着这辆小小的“欧宝”，尽最大努力赶往会面的地点。

萨沙等着我们，当然已经是神经十分紧张了。坐进车子里之后，他像上次一样，紧紧地握了握我的肩膀，我非常高兴一切正常。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海因曼带着自己一队党卫军将疏散的苏联人护送到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但我是1941年7月2日最后见到了他，那天我们撤离了柏林。早餐时，海因曼给了我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留言。

“也许，”告别时，他对我说，“将来某个时候，我会被迫提起到曾经给苏联大使馆提供过帮助。希望这一点不会被忘记。”

原来，他早已经猜到了，问题不在萨沙女友身上，而有更重要的事情。

战争最初几年，舒尔茨一伯曾和哈尔纳克领导的地下反法西斯组织给莫斯科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既涉及德国后方的状况，也涉及到德国的军事计划。这些密电的内容关涉战略物资的储备，飞机和新式武器的生产等等。在传送有关德军伤亡情况、德军计划中的进攻、向苏联后方投送袭击分队等等极其重要的情报时，对于身处法西斯压迫之下的德国人民而言，反法西斯战士履行了自己的爱国义务。至于苏联军事部门是否有效利用了这些情报，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转交的发报机拯救了我国前线和后方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德国情报部门费尽力气，侦破了这个被希特勒分子称为“红色合唱团”的组织。1942年8月底9月初，该组织成员在柏林的一个监狱被处死。当刽子手将绞索套到哈尔纳克的颈上时，他高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感到后悔。舒尔茨一伯曾在自己的遗书中写到，他终生都是根据理智、心灵和信念而行动的。

回想起这些坚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良心纯净的人们，就不能不想起战后历史。有多少像他们那样的人，为了光明的理想而献身！战胜法西斯之后，这些牺牲似乎没有白费。在德国的土地上，产生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宣布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我这一代人相信这个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尤其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能够达到的，但是，强加给我们的模式却是站不住脚的。强制推行的努力导致了巨大的牺牲和震撼整个东欧的大动乱。而曾几何时，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骄傲”的

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彻底消亡了.....

回到莫斯科之后，萨沙，也就是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克罗特科夫高升了。我很少见到他。1943 年，我们在德黑兰相遇，他当时属于“三巨头”的安全人员。此后，在 1954 年印度支那日内瓦会议上见过他一次。多年来，克罗特科夫在东德一直身居高位。五十年代末，他猝死在莫斯科的一个网球场上。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2)  
-----

1941 年 7 月，我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人员一起撤离德国，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被任命为负责处理外交，财务，人事等工作的副外长助理。

一架“道格拉斯”停在安卡拉机场低矮的候机楼前的水泥机坪上。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和土耳其外交部礼宾司的代表来为我们送行。虽然是清晨，太阳已经很热。晴朗的深蓝色天空像天幕一样，罩住了长满了黄色青草的一片平原。凝重的空气预示着这一天将酷热无风。身穿空军军服的机长伫立在飞机舷梯旁边。

被送的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驻柏林

苏联大使馆负责人员。不过，当时苏联驻柏林侨民区具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并不多：两个参赞，一个一等秘书，四个随员，一个领事，海军武官及其第一副手。还有，商务代表和他的副手也算是外交官。使馆的事务人员也不多。战争开始之前，大约一半的外交官正在休假。早在五月份，海军武官沃龙措夫和参赞科布罗夫携家人回到了莫斯科。他们知道纳粹的入侵不可避免，所以决定提前离开柏林。杰卡诺佐夫也将自己的家人送回了莫斯科。

阿尔马雅克·科布罗夫参赞，贝利亚的第一副手伯格丹·科布罗夫的弟弟，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国机构的负责人。从外形上看，他跟伯格丹恰好相反——伯格丹的长相令人厌恶、丑陋、低矮、肥胖，令人恐怖，恶心。而阿尔马雅克则身材高大、挺拔，一头黑发修剪得十分齐整，是个高加索美男子，非常和气，甚至富有魅力——他是我们这个团体的灵魂，很好地扮演了憨厚的席间提调，以至于很少人能够猜到他的真实身份。当时，谁也没能料到，这个快乐汉子的仕途将如何结束。斯大林死后，1953 年底在贝利亚一案中，他和哥哥伯格丹以及杰卡诺佐夫等人被审判后枪毙。

我们在斯维列格勒越过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而德国外交官从亚美尼亚抵达土耳其之后，大使已经没有必要庇护苏联人员。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馆负责这件事，很快苏联轮船“斯瓦聂地亚”到了，全体人员乘船沿着中立国土耳其的水域出发前往巴图米。我们这一小批外交官，其中除了大使之外，还有参赞谢苗诺夫，武官图比科夫将军，使馆随员克罗特基赫，我和我妻子等一起乘夜间快

车前往安卡拉。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架专机已经在安卡拉机场等着接我们。只是由于安排第二天早晨起飞，所以有了一整天空闲时间。

杰卡诺佐夫，当时还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跟苏联驻土耳其大使一起，带着谢苗诺夫前去拜见土耳其外长。而我跟佳丽雅，图比科夫将军和克罗特基赫决定到城里逛一逛。

安卡拉就像一个大村庄，特别是与宏伟的伊斯坦布尔相比的话，那里的一切都在述说着奥斯曼帝国的富裕和排场。这里的街道尘土飞扬，无人打扫。在首都的主要干道上——阿塔赳克路——长着枯萎的小树。但是，在咖啡馆里，招待我们的是芬芳的土耳其咖啡，美味的甜食，果仁夹心酥糖，每杯咖啡另外给一小杯冰水。

这是革命后按照领袖凯末尔·阿塔赳克的意志新建的年轻城市。我们在这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名胜，如果不算那些异国情调、色彩鲜艳的小店，以及手工艺人的店铺的话。由于我们每个人除了希特勒分子允许携带的一个小手提箱之外，其他东西被迫扔在柏林，于是决定买一些必需品。在当时买到的东西中，保暖内衣和衬衣在战争其间都派上了用场。

跟送行的人们告别之后，我们登上了飞机。沿途只着陆了一次，已经在苏联境内，在列宁纳卡。山峰之间的谷地原来是一片沙漠。跑道则是安放在草土上的金属网。

下了飞机，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哨所。从那儿几个人朝我们这边赶来。这是当地的领导。他们得到通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即将到达，所以他们想安排一个像样些的迎

接。他们用藤编的篮子，带来了整整一只烤乳羊，大饼，一大堆亚美尼亚干红葡萄酒，蔬菜，水果，东方式甜点。就在飞机旁边的草地上铺上了餐桌布，然后开始了招待。

甚至都没有人提到战争。从入侵之时到现在过了不到一个月，在这个远离前线的地方，似乎没有感受到特别的惊扰。显然，领袖关于我们将在侵略者自己的土地上打击侵略者的许诺还在意识中起作用。由于不掌握前线事态发展的情况，所有的人都等待着，红军在击退敌军之后，将攻入德国境内，德国的工农则会调转枪口对付纳粹，战争以我们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在格鲁吉亚首府，我们也受到了隆重欢迎。杰卡诺佐夫调到莫斯科之后，在这里保留了一套房子，他回了家，而我们其他人则住在了“第比利斯”饭店里。我们所住的豪华客房里吊灯地毯镜子大阳台等一应设施齐备，令人想起革命之前第比利斯的奢华场面。当时实力雄厚的法国资本致力于城市主干道的建设和装饰，现在这条街被命名为邵特·鲁斯塔维里。玻璃高顶的餐厅里响着音乐，客人很多，十分吵杂。晚饭之后，我们从阳台上观察着衣着讲究的人，基本上是男人，沿着明亮的大街缓缓散步，街两边是高大、枝叶丰满的法国梧桐。这里，战争给这个南方城市无忧无虑的气氛还没有打上不祥的印记。

次日清晨，我们飞往莫斯科。现在增加了杰卡诺佐夫一家：他的妻子诺拉·提格拉诺夫娜，和两个孩子——娜娜和列吉克。在罗斯托夫的短暂停留之后，我们沿着伏尔加河继续往前飞，因为担心在

乌克兰南部积极活动的德军空军，在古比雪夫地区转向西部，绕着一个大弯。当天下午，在莫斯科的屋顶上盘旋数圈之后，我们降落在列宁格勒大街的中央机场。

首都都在一个温暖、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接了我们。发动机停车之后，我们下了飞机，来到停机坪的绿草地上，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周围的寂静似乎是欺人的。所有这些时间里，我都在想着我国跟奸诈的强敌正在进行酷战。可是，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这种祥和令人吃惊。周围散发着热烘烘的三叶草的味道，云雀在天空自在地飞来飞去。不过，在列宁格勒大道上，却可以看见战争威胁的迹象。一座楼上悬挂的巨幅招贴画十分引人注目——一个俄国妇女表情严肃，高举起的手里是军人誓词，还有一句话：“祖国母亲在召唤！”我们的车子绕过了正在行进中的一队队不齐整的民兵队伍。一幢幢楼的正面描画着绿色与褐色的花纹奇异的图案，窗户玻璃上十字交叉贴着纸条。

就这样，在最初一刻里，莫斯科以严肃的战争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各回各家。而我再次遇上难题，因为已经不在外贸人民委员会部工作，所以不能指望在“大都会”饭店里的客房。杰卡诺佐夫要我们去铁匠桥，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阿拉赫维多夫那里等一等，他会替我们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

出乎我们的担心，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纳粹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之后，斯大林显然是想要讨好希特勒，跟这些

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这些国家代表机构原来的房子都腾出来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街原来属于挪威使馆的一幢小楼成了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宿舍。那些战争刚开始就疏散回国，然后被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被临时安置在这里。阿拉赫维多夫将我们也带到了这里。

我们的房间里空荡荡的，但傍晚已经送来了两个折叠床，卧具，一张破破烂烂的写字台和两把椅子。我们这一层，在同样的几个房间里还住了好些人，只有一个洗漱间，所以早晨必须排队。不过我们两口子在莫斯科什么也没有，所以奥斯特罗夫斯基街的这幢小楼便很好地解决了我们的住房问题。我们在这里住到了1941年10月16日，当时德军攻入莫斯科西北郊，外交人民委员部紧急疏散到了古比雪夫。

第一夜，空袭警报就吵醒了我们。妇女和孩子们下到地下室。其余人上到屋顶扑灭燃烧弹。我军空防部队的高射炮火无法驱赶所有的敌机。有几架轰炸机冲进了市中心，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看得非常清楚。在尼基塔大门一带爆炸了一颗重型爆破弹。赫尔岑街上的一幢房子被夷为平地，提米里亚泽夫的纪念碑被炸成了两半。在我们这里投下了许多燃烧弹。其中有两颗就落在屋顶上，我的身旁。我用沙桶把它们扑灭。

-----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3)

---

早晨，杰卡诺佐夫叫我去上班，并告诉我，已经被任命为他的助理。他问道，我对此是什么意思。

“按照我的理解，副人民委员助理，是很高的职位。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工作。”我回答说。

“好，这值得夸奖。并且，柏林的时候您已经作过我的助理了。这里的工作要复杂些，但我相信，您是能够胜任的。祝工作顺利！”

我谢过他，并问了一下，自己具体的职责是什么。

“首先要熟悉国别及具体问题的材料，这些我的秘书主任马尔克洛娃和她的三个女助手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您必须在我每天上班之前，仔细阅读塔斯社的新闻简报，并替我挑出最重要的，审阅其他传给我的材料和电文，如果需要其他部门的补充材料，可以要这些材料并按照专题分类……”

杰卡诺佐夫接着说明了，归他负责的国家有伊朗，土耳其，阿富汗，蒙古，中国和德国的盟国。此外，他还负责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财务，包括外汇资金，人事和领事事务。所以说，问题不会少。

---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4)

-----

1941 年 9 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

当时，苏联的局面非常危急，纳粹军队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正在逼近莫斯科。而苏军被迫节节撤退。

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局势，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在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则是副主席并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二楼。紧挨着，在楼道的拐角处，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办公室，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苏英关系助理。当 1941 年 7 月底，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飞来莫斯科时，我也在列宁格勒大街中央机场迎接了他。不过，他跟斯大林的谈话是李维诺夫翻译的。两个月之后，由比维布鲁克爵士和阿维列·哈里曼率领的英美代表团到访时，这项工作才交给了我。

后来，哈里曼杜撰出来了关于我出现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则笑话：一开始，苏方翻译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译是查尔斯·波莱恩，美国驻苏使馆的三秘。由于他名字的谐音（俄语中的“生病”一词），哈里曼每次带其他翻译来时，喜欢用俄语重复说，“波莱恩病了”。这总是会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译时出现了一些困难，于是波莱恩便开始帮他。  
斯大林不喜欢这个。他对莫洛托夫说：

“为什么美国人纠正我的翻译？这样不行。维亚切斯拉夫，那个翻译跟希特勒谈判的年轻人在哪里？叫他来帮帮我们。”

“可他是德语翻译……”

“没关系，我告诉他，他将翻译英语……”

就这样，我出现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并成为他的私人翻译。

据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惟一不能的是把男人变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尖刻地讽刺了“伟大领袖”的威严。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1941年9月末为欢迎比维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客人们集中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等着斯大林。终于，一扇高高的门打开了，但这并不是他，而是两个警卫军官。其中一人停在门口，另外一个则站在对面角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大概这里有特定的意义：“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现的时刻，以便使人们更加迫切。

丘吉尔回忆道：“斯大林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当他进入雅尔塔的会议厅时，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声令下，都站起来了，双手贴着裤缝线。”有一次，英国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来。可是，当斯大林进来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从椅子上提了起来。

甚至在1959年，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丘吉尔

在英国下议院就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发表讲话说：“对俄国而言，在面临巨大考验的年代有斯大林这样一个英明和坚定的领袖领导国家，实在是个大幸。”

门再次打开，斯大林进来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感觉到似乎受到了电击。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识之中早已形成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他个子中等偏低，十分消瘦，长着土色而疲倦的一张麻脸。军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条胳膊长，另一条胳膊短——手几乎整个藏在袖子里。难道这就是他？似乎他被偷换了！

从童年时代起，教育我们认识他是一个伟大而智慧，预见万事，无所不知的领袖。画像、青铜塑像、花岗岩石像以及节日游行中的巨幅画像里，我们习惯于看见他君临万众。于是，少年人的想象中描绘出了一个高大挺拔，几乎是神话般的人。原来，他是这个样子，不好看，甚至不显眼。但与此同时，他出现之后所有人都不做声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过招呼。他的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气无力。

当时，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希特勒军队已经深入苏联腹地，打到了列宁格勒，基辅，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进。被迫不断后撤的苏军部队往往连沙皇时期的火枪都没有。我曾经亲身参加过莫洛托夫与守卫莫斯科的一支部队指挥员的谈话。后者抱怨说，他手下五个民兵才有一枝步枪，所以请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熟悉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

“步枪没有，叫他们用瓶子打仗吧……”

就在当时，产生了声名远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装满混合燃液的瓶子。民兵战士藏在堑壕里等着坦克，然后，当坦克走到他头部位置时，跳起来将瓶子投进排气管。如果投进去的话，坦克马上就会起火，但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的枪口顶着打死这个大胆的人。就这样，数万民兵牺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许多的朋友。

惨败，大片领土失守，数百万人被俘及牺牲，尽管斯大林对人的生命十分鄙视，但这些不能不给他的面貌打下印记。但是，尤其使他苦恼的是另外一样东西：自己对临战局势估计的失误。他对所有的预警都没有理睬，因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会开战。前不久他还赞赏希特勒，而现在，则不能原谅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领袖”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这个奥地利上等兵把“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像个小孩子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斯大林无法忘记这种屈辱和经受过的恐惧，现在比从前变得更加多疑了。甚至在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大楼里，两名警卫与他形影不离。连他到莫洛托夫那儿每次也都带着这支护送队伍。

有时候，从人民委员的秘书处，拐过弯要走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从相反方向的那个角里，出现熟悉的警卫。每次这都使我感到慌张。不，那不是恐惧。我知道，这样的相遇对于我个人不会有什么。但是，总是出现难以抑制的下意识要躲藏起来。几秒钟之后，斯大林应该出现。思想在激烈地活动，怎么办？返回秘书处或者快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门后？也许，藏在遮住朝内院的大窗户的窗帘之后？可是，如果斯大林发现，有人躲在这里，会把我当作罪

犯，他会想着，我这是做贼心虚。因为，甚至当谈话的对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他都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谋反：“为什么您的眼睛东张西望？”这样一问之下往往可以决定对方的命运。

在心里掂量过各种办法，并且当我明白时间不再有时，我一般背靠墙等着。一行人缓缓走过。我精神饱满地说：“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作声，用手臂一个的细微动作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转弯过去。现在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不过什么也没有呀。可为何每次遇到这种情形都会如此紧张呢？

此外，每次，当领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者他的某个副手预先告诉我，说马上要跟美国人谈，而且要我作翻译时，也会出现神经紧张。但这里我有解释——马上要进入神殿了。于是神经高度紧张，想要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满意。

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洛托夫身边——作了外交人民委员苏美关系助理。那时的克里姆林宫对公众是关闭的。但我有一张通行证，“到处”可去，除了大楼上斯大林的那一翼。去那里每次都要办理通行证。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总是一种干练、安静的气氛。秘书处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一般在那里等待客人已经通过斯帕斯大门的信号，描着鲜艳花朵的黑色托盘上放着杯子和矿泉水，挨着墙是一排简单的椅子。有些书作者现在断言，在领袖办公室门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莫洛托夫都要被搜身检查，说什么椅子底下安装了电

子仪器，检查是否有人藏了武器。根本没有这回事。首先，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子系统，其次，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几乎四年时间里，从来没有被搜身，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检查。不过，在1941年底特别紧张的几个月里，由于担心城里有空降的德国特务，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手枪。譬如，我有一把小型的“瓦尔特”，很容易藏进口袋里。每天早晨六点左右下班的时候，我从保险柜里把枪拿出来，然后去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在那儿的地下室里可以稍事休息，对时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不加理睬。秋冬季天亮得晚，街道还是一片漆黑。不过，常常会碰见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检查证件。可是当时也完全有可能遇见德国武装突袭队员。到克里姆林宫上班之后，应该将武器放进保险柜。但是，去见斯大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检查过，我是否这样作了或者有没有带武器。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5)

-----

我观察斯大林，完全局限于译员这一特殊的工作性质。我见过他跟外国人客在一起，扮演着殷勤好客主人的角色。当值班军官通知说，外国客人已经通过了斯帕斯大门，数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到

达，这时，我穿过秘书处，那里一般坐着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警卫的房间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那里经常有几个人穿军装或者便服的人，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领袖的主要警卫员伏拉西克将军在打盹。他利用每分钟来打盹，因为昼夜都在“领袖”的身边。我不经通报进入办公室，一般都会碰见有人：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或者部长们。他们坐在长桌旁，手里拿着笔记本，而斯大林则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其时，他要么听人汇报，要么在谈自己的看法。我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该结束会议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会说：

“美国人马上就到。我们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纸笔，站起来，然后离开办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来。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他都在场，只是几乎不参与谈话，基本上不说话。有时，斯大林就某个具体问题会问道他，叫着他的名字“维亚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有人在场时严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应该承认，虽然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斯大林还是善于迷住谈话的对方。毫无疑问，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善于制造出富于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这么一种形象。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觉得苏联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所有的外国高级访客，都非常悲观。可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却充满信心，认为苏联人民将继续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但实际上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敌人不可阻挡地向东部推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躲

在防空洞里。那么，是什么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维布鲁克以及其他有经验的、抱着怀疑态度的政治家们改变了各自的观点？只有跟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局势看起来不可救药，但他善于营造一种随意、安详的气氛……

在永远都很安静的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克里姆林宫钟楼上自鸣钟的声音。“主人”本人则表现出善意待人，稳稳当当。使人觉得，这间屋子之外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惊扰他。他有许多时间，他甚至愿意谈一个通宵。他的谈话对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经采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桥梁和政府大楼下正在布雷，已经建立了首都地下党委，给其未来的工作人员已经发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证件，而让他们觉得无忧无虑的克宫“主人”心里正在盘算着政府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各种安排方案等等。战后有一次坦白心迹，他承认说，当时是绝境。可现在，他牢牢地将这些藏在亲切的微笑和给外人看的镇静后面。谈到红军和工业的需要时，斯大林说出的不仅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制造飞机的金属铝，还有各种企业的设备，整座整座的工厂。起先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组织生产需要数月，如果不是数年的话。

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们断言，苏联的抵抗在最近四五个星期之内就要崩溃。怎么可能谈得上建设新工厂？甚至给俄国人武器都太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落到德国人手里。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厂，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西方民主国家里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庄严宁静的态度，以及他向霍普

金斯的声明，即如果美国人运送金属铝过来的话，苏联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毫无疑问，斯大林更清楚真实情况！于是，霍普金斯，比维布鲁克，哈里曼向丘吉尔和罗斯福保证说，苏联会坚持下来，所以有必要给坚强的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斯大林假装有把握，但幸运的是，他是对的。同样的，当1941年12月下旬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参观完毕莫斯科近郊战线之后，他声明说：

“俄国人已经两次到过柏林，还会有第三次……”

死不悔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

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又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

“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1937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

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6)

-----

我从翻译的特殊角度亲眼观察到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莫洛托夫对自己的下属十分平和，这在当时“领袖”身边是很少见的。

我多次观察到，每当自己的提议未获得斯大林的赞同时，莫洛

托夫都神经紧张。他会接连几天阴沉着脸，十分易怒，所以这时候最好别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莫洛托夫从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维诺夫推行了自己“独立”的政策，他被解职之后这个政策便立即消失。当然，曾经有过许多细微差别，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处，我研究了过去多年期间的案卷，最后确信，李维诺夫每件小事都要征得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这样，有机会顺便与斯大林协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般来说，重要的文件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准备。相应的文件由具体负责某个问题或者国家的副委员签署，然后报告给人民委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最后拍板。当然，这里不排除他预先或者打电话，或者在别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都是独立承担责任。

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准备好的文件当然要传送给斯大林。一般很短时间之后，文件会被返回到人民委员的秘书处，蓝色粗铅笔大大地写着斯大林姓名的两个字母。在斯大林的桌上，跟粗大的文具并排放着一个青铜笔筒，里面总是有一把红蓝双色八棱大铅笔。他把几枝铅笔拿在手里把玩，似乎在练习半麻痹的那只手。整个行政机构将毫无间断地将他的批示付诸实施。

最近几年里，官僚行政机构公然不执行政府的许多决定和总统令，这种情形每每令人惊异。在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形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建立的行政体系，除了信仰和一定的热情之外，基于三样东西：纪律，恐惧和奖励。不过，到四十年代之前，热情略有减退。但恐惧被强化了，铁的纪律得到了加强。同时，奖励体系更为健全——就在当地形成了上层的特权。失去“甜蜜生活”的前景，是完成领袖指示的相当重要刺激手段。但更起作用的是一种意识——从做出了次品的工人，在集体的田地里拾麦穗的农民，到部长甚至政治局委员，不执行“主人”的意志可能会赔上脑袋。所以，这个机制才运转正常。

过了半个世纪，改革的思想才冲破藩篱。而当时，五十年以前，领袖名字的缩写令所有的人战栗并顺从。有时候，文件未加批示被退了回来，不是蓝铅笔，而是用红铅笔划上十字：斯大林没有批准上报给他的文件。这样的严重事件使莫洛托夫感到震动。他非常艰难地承受了许多“失误”。我认为，那不是害怕可能的后果。因为当时莫洛托夫也许是“主人”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无论如何，他显然明白，如果类似的情形重复太多，会引起愤怒甚至怀疑：本来应该跟他有同样思维的人民委员几乎在斯大林的脚下暗中破坏。我想，莫洛托夫大概因此而难过：他掌握着同样的情况与情报，却得出了与“主人”意见不一致的结论。他当然想也不敢想，自己是对的，而斯大林错了。当时，领袖周围的所有人都愿意无条件地承认其正确，有时甚至都不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可能

是，他们真的相信斯大林。也可能是还记得，那些胆敢发表意见人最终的下场。

莫洛托夫对待自己的直接下属平和，冷淡而礼貌，几乎从未提高声音说话，并且从未用过粗话，而这一点当时在“领袖们”的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有时，如果某个年轻的外交官不能有条理地汇报驻在国的情况，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顿，前者会吓昏过去。那时，莫洛托夫用冷水喷这个可怜人，叫来警卫，把他抬出去到秘书处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在把他弄醒。不过，一般也就到此为止。闯祸的人惴惴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几天，然后返回自己的岗位，此后也往往会得到职务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某种宽容，因为这毕竟是缺乏经验的人，他自己亲自参与了挑选的过程，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这些人承担责任。任命不久之后再撤职，这样会被“主人”理解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工作中的严重不足。

不过，也有的时候，莫洛托夫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而强硬的措施。就这样，1939年8月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新任驻德国大使成了什克瓦尔措夫，此君以前是一家纺织研究所的所长，被区党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1940年11月，当莫洛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时，他首先召见了什克瓦尔措夫了解政治局势。可是后者的报告是那样的平庸，经过十分钟谈话之后，人民委员便叫他收拾东西回家。过后不久，苏联驻德国大使被任命为杰卡诺佐夫，并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员一职。而尝到了国外生活甜头、苦于纺织

行业平淡无味的什克瓦尔措夫，战争期间再三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国的危难时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经验”。这些便函当然直接进了垃圾箱。

如果由于行政系统造成的疏忽或者缺点，斯大林发出指示要求“惩办责任人”，那么就应该立即找到牺牲对象，甚至无须进行长时间调查。而那些引起领袖哪怕小小不满的人，则被无情地处置。

我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需要立即答复。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三天，美国方面什么也没有。莫洛托夫派我进行检查，看看电报是否在途中耽搁了。负责传递政府文件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密电司司长，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询，然后通报说，电报顺利到达了对方责任区的终点。接下来是美国人看管线路，由于从他们哪儿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所以应该认为，一切正常。不过我还是要求向美方询问。原来，在他们一方发生了故障，因此电报迟了两天才到华盛顿。考虑到战争时期，可能出现任何问题，于是我得出结论，没有发生事故。我这样向莫洛托夫作了汇报。“这是谁的错？”他严厉地问道。“显然，没有人出错，至少我方没有人出错……”“怎么是没有出错？那我给斯大林同志说什么？他非常不满意，下令调查并惩办责任人。可您却在跟我说，没有人出错。您这个臭知识分子！”我低头站着，无言以对。

“您干吗跟个木偶似的站着！”莫洛托夫怒气冲冲地喊道，“叫维辛斯基过来！”

我飞也似地逃出了办公室。

当时，维辛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但我们记得他是三十年代政治案件时期恶名远扬的总检察长。他可是能够找到责任人，我一边想，一边拨着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

维辛斯基很快就到了：二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秘书处。大家都知道，维辛斯基对下属十分粗鲁，让周围的人感到恐惧。但是，在上级领导面前却是极尽奴颜婢膝，巴结奉承之能事。甚至到人民委员的接待室他进来时像是谦虚的化身。显然，由于自己的孟什维克历史，维辛斯基特别害怕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后者甚至在众人面前骂他为“这个孟什维克分子”。虽然杰卡诺佐夫是第二副人民委员，而维辛斯基是第一副手，并且具体负责处理与英美的关系，可是经常可以看到，对我国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的问询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杰卡诺佐夫：交待任务写回电草稿，亲自签署批示电报，而给维辛斯基给一个副本，然后电报就发出去了。并且维辛斯基从来没有勇气提出抗议。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场时，维辛斯基更是异常恐惧。当这两个叫他去时，他进门时弯着身子，侧着身子，扎起淡黄色小胡子巴结地一笑。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跟着他进去。莫洛托夫要我把自己，就像他所说的，“毫无价值的调查”结果进行报告。这对维辛斯基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即他应该拿出什么样的结果。当我再次说明，没有找出责任人之后，结束了汇报，莫洛托夫对维辛斯基说：

-----  
回归故土(1)  
-----

“斯大林同志要求进行调查并严惩责任人。这个任务交给您.....”

“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可以走了吗？”

莫洛托夫点了点头。我把自己的报告交给维辛斯基，他便无声地从办公室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这时平静地解释说：

“每次失误，一定责任人。电报传送只检查我们一方，那又怎么样！是谁立的这个规矩？应该检查线路全程。是谁制定了这个不完善的规程？可是您却说——没有责任人.....”

过了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密电司的司长被开除出党，丢了工作。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给的任务——找出并严惩责任人——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他经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间里来，他看见我半开的保险箱之后，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看看吧，这个臭知识分子心底外露，保险箱不上锁，桌子上乱

七八糟，进来看看吧。哎呀，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啊！.....”

-----

回归故土(2)

-----

1934 年，我继续在“国旅”作导游。这年秋天，我被任命为苏联波兰边界一个小火车站“国旅”办事处的主任，为过往的外国旅客提供外币兑换，办理车票等服务。

到 1934 年秋天，外国游客明显减少了。来出差的外国人，也是由“国旅”提供服务，基本上都是苏联政府邀请来参加五年计划建设的实业界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帮助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美国人，这是第聂伯河上的第一个大坝，大型的水力发电站。我被指派陪同这样的一个团组。

我们下午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了扎波罗热。由于无法指望路上的正常饮食——餐车里仅仅供应淡茶加一块糖和大麦仁粥，国旅的餐厅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干粮”。一般里边有鱼子酱，螃蟹，火腿，奶酪，黄油，面包，煮鸡蛋，装潢十分漂亮的罐装果酱，袋装茶叶和砂糖——商店里这些东西早就见不到了，可是，食品工业仍然在生产这些东西。我想，不可能说这些东西刚够给外国

人享用。当然，国家高级领导人也享用这些食品。所以，生产出来的食品肯定要多得多。那么都到哪儿去了？当时，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实在是个谜。

由于在秋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基辅“国旅”的导游们各有各的办法。一些人去上进修班，另外一些人学习其他外语。也有人请假作笔译。我被任命为“国旅”舍别托夫卡分部的代理经理，它位于苏波边境，当时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从舍别托夫卡每周三次发运前往巴库的伊朗快车，乘客基本上是西方的商人，阿富汗羊羔皮商人，伊朗的石油工业家，贩卖地毯，鱼子酱的生意人等等。往来过境的有外交官，公司的代表，以及喜欢冒险的人。许多外国游客在苏联境内的旅行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波兰火车把一批批衣着光鲜的游客送到苏联边境。火车开进舍别托夫卡火车站月台的一侧。乘客在火车站大厅里经过边防和海关检查，之后走到对面的月台上，伊朗快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波兰车看起来非常的不体面：沙发座位早已经压坏，车窗玻璃很久没有清洗，车厢的油漆斑斑脱落。不过，服务人员却波兰小贵族似的衣着光鲜令人惊异：蓝色军服式上衣，大红腰带和武装带，带白鹰标记的波兰式四角制服帽，闪闪发亮的帽檐——这一切看起来十分堂皇。

我们的伊朗快车完全符合国际水准。它几乎全部由革命前比利时造的卧车组成，外装饰仿红木，铜制，打得闪闪发亮的把手和拉丁字母的标记“卧车”。革命后最初几年，这类火车厢可以在国内线

路上见到。车厢极其舒适：宽阔的双人包厢，带上下铺位。白天上铺放下来，成了沙发靠背。铺位上套着带长长流苏的淡蓝色套子。包厢里有一张折叠桌，和一张包着红缎子的椅子。黄铜把手、衣帽钩和架子赋予一种富贵漂亮的外形。每两个包厢之间有一个洗漱间，玻璃门是新艺术风格。里面有洗漱盆，布帘之后有淋浴，洗漱盆下面放着一个上釉描花的陶瓷夜壶。

“直达卧车”的列车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经过旧式训练的体面男性，态度殷勤、关心乘客与自尊感兼备。他们身穿褐色制服，带金质饰扣和镶条，戴同色的制服帽。他们煮出来的茶非常香甜爽口，一般用长条的薄面包干招待客人。火车到巴库路上走三天，每天早晨，列车员都要收拾床铺，清洁包厢，擦洗全部铜质的物件。快车上有一节食品饮料充足的餐车，服务员一个个更是彬彬有礼。整个车里能够感觉到井井有条，整整洁洁，纪律严明。这是从沙皇时期保留下来的训练有素，抑或是斯大林的铁道部长卡冈诺维奇的铁腕——只有猜测的份了。

我的任务，是迎接每一列波兰列车，给外国旅客提供方便，如果需要，办理用外汇支付的火车票，代办外币兑换——一句话，根据国旅的规章提供服务。我呆在边境的那段时间里，除了游客和商人之外，来自希特勒德国的难民越来越多——有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犹太人等等。他们通过各种办法越过德波边境，然后前往苏联这个可靠的避难地。我接到指示帮助这些人，借给他们卢布，如果他们到的那一天没有快车的话，安排他们在舍别托夫卡过夜。我的

办公室里有几个房间，这时就成了客房。有时也有老老少少一大家人，但大多数都是独自一人或者夫妇二人。晚上我请他们到我那儿坐或者去看望他们，我们一起谈到欧洲和德国的事情。虽然他们被迫抛弃家产，到我们这里时身无分文，但都很高兴，因为在苏联找到了第二个故乡。他们能想到，将来是什么样的遭遇吗？这个我无法料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最终被指控为间谍以及执行盖世太保的破坏任务，落到了集中营和监狱！ .....

十二月底，“国旅”舍别托夫卡分部的新任经理从莫斯科来了，于是我回到了基辅。我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下一节季节里将会有西班牙游客。城里依然闹饥荒，所以，“大陆”饭店的厨房在淡季发给我们的虽然伙食很少，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仍然是个帮助。食品卡——父亲的工作卡，母亲的供养卡和我的职员卡——仅仅能够买到最少和最必须的东西。不过，规定有的东西，在商店里一直都有。

-----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1)

-----

1935 年 1 月 1 日起，日常消费品的票证宣布取消，普通苏联人

的生活得到改善。直到 1940 年，大城市里的物资供应是正常的。事隔多年之后，我知道了真相。

新年快要到了，又一次无法好好过一回。但我跟我在工业学院的朋友安排得不错。他父亲是基辅附近一个古城白教堂市里面包厂的厂长——由于职务关系家境非常富裕。

面包厂厂长的儿子莫德斯特邀请来过 1935 年新年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俩共同的朋友，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格，他当时在基辅医学院上学。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都带上了各自的姑娘。莫德斯特的女友列娜在白教堂上过技校，她在那儿等着我们。格奥尔格邀请了尼娜，同校的女友，而我则邀请了克拉拉。共事几个月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和斯捷潘和他的女友一起，开着“林肯”到郊外兜风，一起去看戏，冬天一起去“迪纳摩”体育场溜冰。

1934 年 12 月 30 日中午，我们一帮人下了火车，走上了白教堂车站红砖大楼旁边的月台。天气寒冷，但晴朗，阳光灿烂。面包厂派了一辆三套雪橇来接我们。我们把东西扔在干草上，自己则坐在雪橇的两边。莫德斯特的家位于市区边上，面包厂旁边，路程相当远，所以乘雪橇一路走下来使我们非常开心。他家的房子周围的大花园里，高高的椴树结着薄霜。花园往下通向小河，园子里的一条林荫道成了滑雪橇的好地方。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这里玩。莫德斯特是一大家人。除了父亲，母亲，祖母之外，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不过还是给客人腾出了两个房间。我跟格奥尔格住一间，另外一间里住了两个姑娘。

新年之前，全天都在准备年夜饭。姑娘们在厨房帮忙，我跟格奥尔格还有莫德斯特为炉子和壁炉劈木材，在河上凿冰，准备家常冰激凌。然后我们收拾长桌子，放好椅子。在我们来之前，莫德斯特的家人已经打扮好了新年松树。我们只剩下插接上烛台，给里边插上蜡烛。最后，派我们将吃的东西从厨房搬到桌子上。我绝对没有想到，面包厂厂长的工作还能够给人那些年代难以见到的如此的富裕。有烤乳猪，冻乳猪，火腿，各种各样的鱼，鱼子酱，鲑鱼，大篮子装的水果，甜酥糕，蛋糕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从黑市上弄来的，或者拿面粉、粮食、糖果等交换来的。饮料更是数不胜数！于是我又想，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还在继续生产着。可为何要藏在仓库里？

这两天我们既没有看报纸，也没有听广播。所以当莫德斯特的父亲下班回来告诉我们，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起取消所有的面包和其他票证，我们感到非常意外。据说所有商品都将敞开销售。一切都会十分充足。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种事。人民为购买最基本商品排大队而痛苦不堪。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很难想象，就可以直接走进商店，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1935 年的新年在莫德斯特家里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相互道贺，拥抱，接吻。虽然还不太相信好转，还是为了我们生活中的“新的光明阶段”而祝酒，当然也为斯大林干了杯，因为他像此前许诺的那样，把我们带上了富裕之路。我们受的教育要感谢斯大林让我们拥有正常国家里人们应该拥有的一切。然后跑到花园里溜冰，点起了

烟火，燃放了爆竹。然后又回到桌旁，喝香槟酒，跳舞。

这一夜始终也没能睡觉，况且元月一日是工作日，所以我跟克拉拉必须返回基辅。当我们快到六点的时候到达火车站时，面包店门口还排着队。我发生了怀疑，免票证是否会是个恶意的玩笑？

基辅的商店已经开门了，但旁边有许多人。乘着有轨电车在街道上走着，我发现，许多商店在饥荒年代里被封闭起来，最近几个月则搭着脚手架整修，现在橱窗都照亮了，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食品。有趣的是，排队持续了大约一周。顾客可以买任意数量的食品。起先人们成数公斤地购买香肠，奶酪，火腿，面包等等。但是，商店的存货却没有消耗殆尽。从仓库里不断地运来一批又一批新货。当人们终于相信，供应是稳定的之后，人群消退了。应该回家消化那些恐慌抢购来的东西。

此后，直到1940年，起码在大城市里，情况是正常的。战后过了几年，当1947年宣布了货币改革，并取消了票证制度时，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有最初一两周有排队现象。此后，由于食品不断补充，抢购潮消失了，于是商业恢复正常。农民重新获准饲养家畜，并扩大了房前自留地的面积。

在与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道，1935年和1947年的这种结果是如何达到的？当时，他不仅负责外贸，同时也主管内贸，所以十分清楚是怎么回事。“首先，”他解释说，“是厉行节约，同时扩大生产，储备大量的食品和日用品。斯大林本人亲自过问，并严惩了玩忽职守的生产负责人。作了大量的工作把这些物资运送到目的地，

修建了仓库和冷冻设备，保证了分送到商店的运输，尤其在一开始的高峰时期，当人们还没有相信市场稳定的时候。预先修整了商店，并装饰一新，动员售货员上专门的培训班。并且严厉警告商业工作人员，任何舞弊，隐瞒商品和投机倒把都会掉脑袋。最终不得不枪毙几个违法的人。但最主要的是，不能拖延供应，不要一点点放出来，而是一下子在所有的工业中心全面抛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现在，我国某些研究者断言，当时仅仅供应了莫斯科和另外两个大城市。这是不正确的。1935 年夏天，我跟着旅游团到过许多城市。我专门进过许多商店，看看在卖什么。而最主要的是不要排队，也没有人专门到大城市来采购。

当然，当时有特殊的条件。当时有恐惧感和对那些违反商业条例的人进行残酷镇压。也可能采取措施限制外地人进城。但同时农村的情况也在改善。允许私人饲养大牲畜，鼓励经营自留地。而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在铁的纪律的压制之下，看不到别的出路，只有在公共土地上比从前干得更好些。

如果列举1935 年和1947 年间商店里出售的食品，饮料和商品，那么现在苏联人可能会不相信。木桶里放着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价格便宜。货架上摆着大块的鲑鱼肉和干鲑鱼，各种各样的牛肉大肉，火腿，乳猪，许多香肠品种的名字现在好多人叫不上来，奶酪，水果，浆果——所有这些都不必排队，数量不限。甚至在地铁站里有店铺出售香肠，火腿，奶酪，做好的夹肉面包和各种菜肴。

大烤盘上放着煎肉排和煎牛排。而在乡村，就像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热天里任何一家都会拿出一杯牛奶或者冰镇果汁，而且不愿要钱。

也许有人会说，那可是行政系统在运转啊！但是，这个系统仅仅是在强制和恐怖的压力下运转的。并且不应该忘记，在许许多多的集中营里，在种种非人的条件下，千百万被流放的人，像奴隶般劳动，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由这个强硬的调节体制来支配。

在一定额度内自有大牲畜，家禽和猪以及其他等措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1941至1945年艰难的战争饥饿年代过去之后，农民利用了这种机会，所以，虽然集体农庄的产品被国家拿得一干二净，始终还能有东西养家糊口，甚至还可以拿一些东西到城里来出售。这样，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城市里的供应水平得以维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直到后来赫鲁晓夫狂想要消灭城乡差别。

赫鲁晓夫断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能力供养全国居民，他首先砍掉了自留地，并要求大幅度削减个人饲养的牲畜。后来，又产生了荒谬绝伦的主意，要在农村修建城市类型的多层住宅，将农民从独门独院迁入楼房。就这样，许多农耕世家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再也没有可能饲养什么家禽家畜了。

这个冒进的结果很快便显现出来。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度削减。跟当局的盘算完全相反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营生之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并没有比以前干得更好。

-----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2)  
-----

结果，他们无力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的食品供应，而自留地的产出急剧减少，在城市楼房里长大的农家子弟对土地没有感情，也没有学会照看牲畜的技能。长大之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逃进城市。农村人口迅速老化、减少。

毫不奇怪的是，农村居民在乡村衰败这个问题上与其说责难斯大林（因为，那些成年时期经受过强制集体化恐怖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不如说是在责难赫鲁晓夫，因为他剥夺了奶牛，使农村贫穷破产。

自从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什么集体化农业可以使苏联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美国，并且保障苏联居民富足的生活，并且像他肯定的那样，八十年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此后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注入了数百亿卢布的资金。成千上万台拖拉机，收割机拨给了集体农业。花费巨额资金开垦了大批荒地。结果如何呢？现在，我们仍然被迫用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和其他食品，而在国内则被迫实行票证制度。

-----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3)  
-----

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装醉，演出了一场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闹剧。

所幸的是，这次冒险成功了。

除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外，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在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里还占了整整一层。那里也有人民委员的三间办公室：会议室里放着长条桌和几排椅子，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一般举行人数不多的会谈。然后是一间带小型洗漱间的所谓休息室。休息室内设有一张卧榻，可以在上面小睡，还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总是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南方的水果和一小碟核桃——这是莫洛托夫最喜欢吃的东西。新鲜水果每周几次用专机从高加索和中亚运来，并且不仅仅和平年代这样，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最艰难的时候，最基本的食品勉强能够维持军队，千百万苏联人靠微薄的口粮吃得半饥半饱，克里姆林宫宴会和招待会上离奇的丰盛一直都使来莫斯科的外国人叹为观止。桌子几乎承受不了各种

吃食和饮料的重量。红鱼子酱，黑鱼子酱，熏鲑鱼，淡水鲑鱼，鲟鱼，烤乳猪，乳绵羊和乳山羊，填馅火鸡，成堆的蔬菜和水果，成堆和烈性酒和各种葡萄酒，冰激凌蛋糕——按照斯大林的想法，所有这些应该使西方客人信服，我国的局势并不那么糟。

人民委员在铁匠桥的秘书处里，助理们的房间窗户朝着院子。这个房间跟后勤人员的房子挨着。每天早晨，经过我们门前，沿着走廊拿过去大暖瓶和食品篮子，这是预备着万一人民委员在这儿吃午饭。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也照此办理。在政府保卫部门特科的严密监视下，有专门的农场和肉联厂为高级领导人种植和加工专用食品。领导这件奥妙且被认为责任重大事情的，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主人”的大厨师伊格纳塔什维里。斯大林害怕有人投毒，因此千方百计地讨好他，最后给了他将军军衔。

在铁匠桥的那幢大楼里，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缝纫铺。人民委员的高级职员凭一种专门的票证可以在这里定做衣服。1942年，当时我已经作了莫洛托夫的助理，我领到了两张票，于是便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深褐色和一套细纹浅灰色。新衣服很快就作好了，一个春天的日子我穿了一套灰色西装去上班。收拾好给人民委员报告的文件之后，我进入办公室，看见莫洛托夫穿这同样的一套浅灰色细纹西装。我立即感觉到了这个巧合的难堪和不妥当。莫洛托夫相当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并说：“您真不该作跟我一样的一套衣服！这叫怎么回事？我们就像穿着制服去接待外宾……”

事情搞成这样，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裁缝铺里再没有其他浅颜

色的衣料，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不是您的问题。那个蠢货裁缝朱拉夫斯基在给人民委员建议流行的衣料时，就应该想到的。”

午休时，我换上了深褐色西服，此后再也没有穿过那一套灰色西装。莫洛托夫也很少穿那一套条纹西装。也可能，就在那时，就开始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缝制专门的制服？

在跟莫洛托夫共事的那些年里，我仅有一次看见他非常激动。那是在 1944 年，瑞典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与芬兰的合约进行谈判。我跟此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知道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瑞典人来往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穿梭外交，从苏方的观点来看，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并且芬兰人坚决拒绝接受苏联的条件。

根据种种情况判断，当时苏联领导人真的想要解决与芬兰的冲突。正在准备在波兰的大规模进攻，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将在北方驻防的部队腾出来，在突击德军奥得河上和东普鲁士的工事之前，加强中央集团军群。与此同时，间谍情报显示，里宾特洛甫前不久去过赫尔辛基，试图说服芬兰人不要跟苏联媾和，并许诺追加军事援助。报告说，又有一批德国新式武器和军团到达芬兰。所有这些都延长与芬兰的战争，这是莫斯科所不愿看到的。在最近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几封信函中，华盛顿也表示，愿意看到在对芬兰不太苛刻的条件下解决苏芬冲突。苏方已经愿意放弃芬兰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依然坚持要移动边界线，给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这样便在总

体上符合 1940 年 3 月和谈的条款。在这种条件下，芬兰的固执就完全不合时宜了。

已经记不得了，为何在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里举办招待会。来宾之中，有驻莫斯科的外交官，苏联领导人，红军高级将领以及瑞典代表团。起先的气氛是彬彬有礼，非常优雅。几个大厅里，一些客人围着放满饮料和菜肴的长桌吃东西，另外一些客人则手里拿着酒杯，站在一边说话。

我看见莫洛托夫跟土耳其大使一起进入红色大厅。陪同他们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里职位次于科西列夫，莫洛托夫的助理波德策洛普。他懂得法语，可以翻译那些不懂英语的外交官的谈话。因此，我可以利用空闲的几分钟吃点东西。

突然，从红厅里传来了喧哗声，听见有人大声嚷嚷，其中莫洛托夫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他结巴得很厉害——这意味，是什么事情激怒了他。

我赶了过去，进入大厅，看见美国、英国、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以及瑞典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围在人民委员的身边。莫洛托夫动作很大打着手势，这本身很少见，喊道：

“我们再也不打算忍受芬兰人的固执了！如果这些混账继续固执下去的话，我们会将他们捻成灰！我们将彻底摧毁！不要以为我们头脑简单！我们知道他们跟希特勒的阴谋勾当。没人能糊弄得了我们！如果他们想打下去，他们会如...如...如愿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红军.....”

助理和警卫们试图劝阻大发雷霆的人民委员。有人在劝导他：“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很晚了，您还得回克里姆林宫去……”“别拦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这些犟驴会为自己愚蠢的固执而后悔的。我们会收收收拾他们……”客人们也许从来见过这种场面，惊讶小心地看着原来总是不动声色的莫洛托夫。我一开始也想着，他可能喝多了，所以失态了。一切都是那么怪怪地。我们终于把他从客人那里挤开，弄到走廊，然后走向出口。他一边还在继续喊着骂芬兰人，当他被弄上车之后，还想要挣脱出来。

最终他在两辆轿车的护送下走了。各国大使随即立即离去了。他们显然想给各自的政府报告这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关于消灭芬兰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将我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情绪非常好，调皮地笑着。“您昨天出席招待会了吗？”他问道，并且不等我回答，继续说，“请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我开始大致重复昨天所见到的事情。“不对，”他打断了我，“照原样子说，不要删减。我说了些什么，大家的反应如何？”我不好意思重复他的粗口，但不得不几乎逐字逐句说了一遍。

“我以为，客人们都被惊呆了，甚至吓坏了。”我结束了汇报。

莫洛托夫非常满意。他放我走时说：“非常好，太好了。”于是我明白了，昨天那出戏是他特意演的，并且大半是跟斯大林协商过，或者干脆是“主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莫洛托夫非常高兴，很好地完成了领袖交给的任务。他把瑞典人，然后是芬兰人吓坏了。

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被震惊了。现在，他们将向赫尔辛基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任何人也不能怀疑苏军有能力快速解决芬兰人，甚至占领其全境。所以，如果他昨天的“爆发”被当真的话，那只会更好。现在芬兰人将会变得好商量些了。

果真，很快瑞典人通报说，赫尔辛基愿意进行认真的谈判，过了一段时间，芬兰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最终签订了和约。

类似的政治手段在过去的外交史上并非罕见，而按照现代的标准可能是冒险和不道德的。因为很清楚，如果莫洛托夫的威胁兑现的话，这会严重影响苏联与英美的关系。经过了“冬季战争”的血腥经验，斯大林毫无疑问地明白了，征服芬兰人并非那么容易。这里应该寻找这样一个原因，即在获得希特勒同意芬兰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后，他没有给芬兰准备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

-----

与莫洛托夫共事(1)

-----

莫洛托夫在已经退休之后，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绕过了芬兰.....做得很聪明，没有让她加入我们。否则会有一个长久的伤口.....那里的人非常执拗。那里，哪怕是少数人也

很危险。那么现在可以略微加强关系。正像奥地利一样，没能将其变成民主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把伯克拉乌德给了芬兰人。要是我们的话，未必会给.....”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企图给芬兰和奥地利准备东欧“人民民主”的命运。但克宫的主子们没能做到。所以，如果芬兰人顶住莫洛托夫的讹诈的话，斯大林也未必会下令占领芬兰。但那样便会出现“丢脸”的危险，这也会是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已经被迫悄悄地将与库西宁的影子政府 1939 年秋天当着他，斯大林的面签署的不长久的“条约”藏起来。他以为，苏军占领了特里奥卡之后，整个芬兰都会处在他的手掌心里，但他失算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可以说带着高尚的目的冒了险：促使芬兰人尽快媾和。这出戏演成功了。虽然，也应该清楚的是，其时芬兰人自己也得出了结论，是该跟苏联谈判了。

-----

与莫洛托夫共事(2)

-----

从1935年起，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38 年春天，我通过答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基辅一家大型

军工厂。本来我这一辈子要制造武器的，但上苍却另有安排.....

1935 年的头几个月里，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快到夏天时，完全正常了。虽然没能达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足水平，但大家感到呼吸自由了些，吃的也好些了。于是斯大林“生活好些了，生活轻松了”这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印证。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当生活轻松之后，工作也顺手了”，似乎也慢慢兑现了。与二十年代不同的是，不允许私人经营。但国营商业和服务也开始正常运转，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乌克兰政府从哈里科夫迁到了基辅。这件事不仅仅被看作是对古代斯拉夫历史中心的重视，同时也见证着苏联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加强，她不再顾忌资产阶级波兰这个近邻了。我们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三十年代初那些巨大牺牲并非枉然，斯大林最终是正确的，他大幅度地改变了国家制度，使她走上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的路子。

一个夏日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国旅的“大陆”饭店里，是一片紧张忙乱的气氛。一批陌生的，身穿便服，但明显军人做派的年轻人在前厅里布置着从市立美术馆借来的中国花瓶，插上新剪来的鲜艳欲滴的红玫瑰。旅馆的门僮们在铺地毯，在橡木楼梯扶手上打蜡。小商亭的女售货员在练习最迷人的微笑。最富有的外国游客也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跟从前不一样，这次也要求我们出示证件。

我一溜穿过前厅，来到服务处，问法因伯格，是怎么回事。“我们正在替哈里科夫来的贵宾准备豪华客房，”他压低声音说道。“他

是谁？”“波斯德舍夫临时在我们这儿住一阵。给他的房子还没有收拾好。不过我建议你此事不要扩散。有外国人问，就说不知道……”

从那时起，跟高级领导人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搞得神神秘秘。虽然，当时担任乌布共（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巴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德舍夫本人非常平易近人。他住在“大陆”的一两周里，我好几次在走廊和楼梯间碰见他。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有时还会问一问，游客都是些什么人，想看什么地方，喜欢不喜欢基辅等等。

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科西奥尔，留布切科，丘巴里，彼得洛夫斯基等——一开始就搬进了为他们预备的小楼。波斯德舍夫官邸的装修没有完工。这幢别墅位于里普基一带，正对着马利亚花园，紧邻我们家住的那栋楼。革命前，它属于糖厂的大老板扎伊采夫，它的建筑是巴洛克风格，十分雅致，轻灵。在我觉得，对无产阶级领袖来说，这有点太过奢侈了。不过，其他领导人的别墅与之相比并不逊色。譬如，担任乌克兰中央执委会主席，相当总统职位的彼得洛夫斯基住在一个宫殿里。这位老革命家，坐过沙皇的监狱，流亡期间生活难以为继，现在毫不客气地住进了这幢酷似苏格兰城堡的房子里——灰色的花岗岩，高高的尖拱窗，锯齿状的塔楼，正门口有一排大理石拱柱。乌克兰的领袖们用“别克”，“林肯”代步。斯大林用这一套资本家的生活方式腐化了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们。可能，他们之中有人起先还对这些远离人民“公仆”生活的各种福利感到苦恼，但很快就弄明白了，拒绝会引起领袖的愤怒，他会

刻薄地指责这些是“廉价的迎合取巧”和“假模假式的民主作风”。斯大林的特权系统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这些宫殿连同众多的奴仆并不属于“红色高官”。当他们还拥有“主人”好感的时候，他们能够使用这些设施。他随时可能——由于“不听话”，真的或者假的谋反——让他们一无所有。一般来说，他同时也会剥夺他们的生命。

波斯德舍夫当时还是党的市委书记，虽然很快就搬进了别墅，但依然十分平易近人。有时独自在自己的别墅旁散步。乘坐的不是进口车，而是带帆布顶棚的苏联造“小嘎斯”。在亨利·福特帮助下建设起来的高尔基汽车厂刚开始生产这种汽车。在波斯德舍夫的努力下，许多色彩鲜艳的花坛把基辅装点得十分美丽。鹅卵石马路铺上了沥青。在玛丽娅花园里，修建了一个“贝壳式”音乐厅，每到夏天的晚上，那里举行免费的露天音乐会。街头出现了许多贩卖各种吃食的小摊贩。在游廊市场里，“大陆”饭店附近以及各个城区开办了儿童咖啡屋，出售各种各样的冰激凌——草莓，果仁，巧克力，李子等等。

波斯德舍夫经常到各个工厂去，叫得出许多工人的名字，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受欢迎。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俗语：活要干得好，书记过来跑。这一切显然让斯大林有所戒备。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声誉，把这个看作一种危险的“竞争”。也可能是乌克兰领导层中波斯德舍夫的同事们暗中向“各族人民领袖”报告了乌共（布）书记的“非正统”的行为。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在1934年举行的被斯大林称为“胜利者大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波斯德舍夫，还有丘巴里，科西奥尔等人作报告，要求用基洛夫——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替换斯大林做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基洛夫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选票。并且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更喜欢基洛夫，而不是斯大林。然而，基洛夫谢绝了担任总书记的提议。不仅如此，他把这些情况告知了斯大林。

“谢谢，”“各族人民领袖”表示了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事情……”他倒是真的没有忘记。十二月初，基洛夫被杀害。斯大林名字被划掉的选票被全部销毁。过了不久，开始逮捕那些斯大林怀疑“不忠”的“胜利者大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镇压也波及到了乌克兰领导层。

内战英雄，在远东战胜过日本人以及其他入侵者的波斯德舍夫第一个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消失是怎样发生的。负责人被紧急召往莫斯科。他在基辅（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首府）毫不怀疑地登上夜间快车的“国际软卧”车厢。途中列车只停一次。深夜，在米哈伊洛夫镇车站，几个身穿内务人民委员会制服的武装人员进入车厢，领头的人命令列车员敲开那个包厢门。门开了，出发前往莫斯科的领导人面对几枝黑洞洞的枪口。其他乘客静静地睡着，这时，“囚犯”被武装押送到车尾加挂的一节挂窗帘用铁条封死窗户的特别车厢。在莫斯科，注定要死的这个人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卢比杨卡（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楼，后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现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译注）的地下室。波斯德舍夫之后，丘巴里也被送到这里。留布切科——他当时是乌克兰人民委员

苏维埃主席——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于是跟年轻貌美的妻子诀别，将自己锁在豪华别墅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稍晚些时候，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也被逮捕并枪毙。这发生在斯大林将自己的代理人赫鲁晓夫派到乌克兰之后不久。彼得洛夫斯基比较走运。他仅仅受了牢狱之灾。斯大林死后被释放，后来甚至得到了革命博物馆馆长的职位。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晚一些，而 1935 年夏天几个月真是非常幸福，光明灿烂。饥饿年代已经过去。生活预示着美好的前景。我们跟父亲一起凑钱买个一只小小的帆船——仅仅能够容纳四人。休息日里，朋友们男孩子女孩子们顺风时可以沿着第聂伯河溯流而上走得很远很远，走过梅日格列和维石戈尔，那里的山丘上从前是符拉基米尔大公——后来的圣徒，他使罗斯皈依基督教——的宫殿以及有三百个嫔妃的后宫。在第聂伯支流杰斯纳河的河口，我们燃起篝火，烤肉串，焖土豆。我们把红藤的枝条扔进篝火，呼吸着芳香的烟味，它就像那熟透了的苹果的味道。每到晚上，在玛丽娅花园枝叶曼曼的榭树下，听着基辅交响乐团演奏的古典音乐。

我在“国旅”工作的最后一个夏天特别有意思。游客比 1934 年更多了，所以得陪着他们，在国内走很多地方。各个车站上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妇们出售着浆果，水果，陶罐里装着浆果汁，煮玉米，熏鱼等等。可以感受到集体化的震荡之后农村在逐步复苏。在我们到过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哈里科夫，敖德萨等地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看来，国家终于进入了一个顺利的时

期。当开始逮捕乌克兰领导人时，代替被捕的来了一批人，后来这批人也遭到逮捕，结果人们已经来不及记住自己一个个新任领导的名字，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这并未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暗淡无光。

-----

## 苏波边境小站的故事

-----

也许，只有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内战英雄雅基被捕引起了我的疑虑，他最终与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有才干的红军指挥员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为雅基感到惋惜——他身材高挑，是个美男子，还非常年轻。雅基在里普基也有一幢别墅，所以我常常看见过，他乘坐一辆蓝色敞篷“别克”，在一个淡黄色头发美女的陪伴下从我们楼的窗户下驶过。很难相信，这个勇敢果断，为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贡献良多的统帅会成为“间谍”，“破坏分子”，“人民公敌”。

在“国旅”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从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休息日，而在国内旅行时实际上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在跟游客打交道。但是，期待见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英国，美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印度等等，跟他们交谈，了解到新的东

西，以及还有把我们国家介绍给他们——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满足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根据他们的愿望，我们安排同行聚会。有时甚至整天都得呆在法庭上，或者消防队里，翻译与作家，画家，音乐家，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谈话。也有许多次第聂伯河上的游玩。游客当中有许多的农艺专家和农场主们，我们将这些人带到戈罗谢耶夫森林，那里有一所新开办的乌克兰农学院。去那儿的一路上风景如画——数不清的急转弯，上下坡，湖泊和一丛丛茂密的野蔷薇。参观古老的修道院和教堂不仅对游客，而且对导游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其中许多的建筑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样子。

基辅近郊，位于库列涅夫卡的基里尔教堂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座教堂建于十三世纪，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拜占庭壁画以及镶嵌画上数百年的灰尘与烟黑，空白的墙壁和穹顶用当时最好的水彩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装饰。符鲁贝独创性的壁画《圣灵降临》在人的心灵深处引起震撼。教堂高高的围墙后面，有一所精神病医院，而为忧郁病发作所苦的符鲁贝，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他在医院的病人之中为基里尔教堂壁画创作挑选了模特儿。最终得到了一批具有极强烈心理影响力的肖像画作品。从穹顶上，十二个圣徒观望着访客。在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活动。对即将面临的惨剧——导师耶稣基督受难，每个人都有个人化的感受。

当载着游客的意大利邮轮“尤里·凯撒”抵达时，对所有导游来

说，敖德萨港之行就像是过节一样。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乘船进行环地中海和黑海旅行。基辅也是其中一站。需要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导游。由于基辅“国旅”人手有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行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青年人。

敖德萨之行兴奋而愉快。意大利邮轮极其奢华，乘客衣着打扮新潮，意大利菜非常异国情调，然后是乘坐完全由一等卧车组成的快车，在城里游览两天，然后返回到意大利邮轮上。也许，就在当时我最初强烈地感觉到，我国的生活距离西方有多么遥远。但这并不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的优越。当时我们以为，只有富人才能参加这种海上旅行，而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贫困交加之中苟且偷生。当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我们苏联人相信，我们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制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西方资本家所满足的那种奢华……

随着游客流量的不断增加，导游人数也增加了。新来了一个懂得五国语言的季亚加·李普曼，他是个非常快乐聪明的小伙子，比我大五岁。但这并未妨碍我们交朋友。季亚加很快将我引入自己非常浪漫热闹的社交圈子，里面都是些非常有天分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等。他们之中一个漂亮姑娘瓦莉雅·库拉克娃非常引人注目。她会唱歌，弹钢琴，画画。她周围总是有一批崇拜者。季亚加夸口说，曾与她有过一段恋情，但我却不相信：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可望而不可即。她父亲是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为乌克兰所有高级领导人治病，生活十分富裕。他

们加在列瓦绍福斯卡雅街和路德街口有一套富丽堂皇的住宅，夏天则呆在梅日格列的别墅里。市里的房子里只剩下了瓦莉雅一个人，于是季亚加的一帮快乐朋友们经常在那儿聚会。瓦莉雅对任何人都没有钟情，但却喜欢揶揄自己的追逐者：譬如，客人到家里来，她却收拾箱子，肯定地说要去莫斯科。大吃一惊的崇拜者哀求她不要离开。然后又演出一个分别的场面，有人甚至掉了眼泪，然而最后她对大家宣布，说是开了个玩笑，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高高兴兴吃晚饭。然后，有一次宣布要出嫁了，请所有的人参加最后一个处女聚会，最后这也是个臆造。有一次，我们圈子里的人传说瓦莉雅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请我们去与她告别。在约定的时间里，一群哀伤的人聚集在门口。季亚加袖子上戴着黑纱，站在门口，请大家走近瓦莉雅卧室的阳台。

“这是死者的遗愿。”季亚加解释说，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们顺从地挤在人行道上，仰起头看着。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阳台上出现了瓦莉雅，她几乎完全裸着身子——只穿着便鞋和带面纱的黑色宽檐帽。

我们笑骂着跑进二楼，挤在客厅里。过了一两分钟瓦莉雅身穿黑长裙出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给大家沏茶。

现在年轻的一代，在书本上读到三十年代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以及血腥镇压，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是暗无天日，极其艰难，充满了恐惧、苦难和泪水。这个对，也不对。恐怖残酷的镇压没有触及到的那些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有着

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人们看到情况好转时，都会寄希望此后的进步，并且认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大多数年轻人重新充满着热情，在工作，学习，开心，恋爱——一句话，活得很充实。

但是，我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记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做好准备来应付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苦练跳伞，也有些人参加自愿训练班，准备当飞行员。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加入了通信兵班。在这一行我已经略有所知，因为几年来一直都在自己动手作无线电收音机，此外，我的专业是电工。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这种制服很像德国共产党人的军便服。指导我们的是一个通讯团，于是夏天里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帐篷，参加野战演习。

1935 年九月，工业学院夜校四年级的课程开始了，所以必须转调作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国旅”。我被“列宁铁工厂”设计局接受为技工。我父亲参与设计的船坞已经建造完毕，于是在波多附近的江边开始建造客轮和拖轮。那是船身两边带推进轮的那种船。我的工作，是绘制推进木轮叶运转的那个机械的图纸。图纸画好之后，再交给女描图员进行复制。我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可爱，快活的姑娘佳丽亚。我跟她做了朋友，1940 年12 月我们结婚了，就在那时，经过许多曲折和麻烦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工作和学习占用了整个白天。时间过得飞快。只有在星期天，

也是当时惟一的休息日里，可以休息娱乐。夏天我们玩帆船，冬天玩雪橇，滑雪，溜冰。

这几年开始了新一轮镇压。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被捕之后，许多技术专家，学者，作家，演员也开始消失。这架绞肉机仅仅触及到了我熟悉的几家人。所以，因此我当时一直觉得，在新的恐怖浪潮中由某种意义：因为它并未触及其他人。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也可能真的是有罪的？ .....

1938 年春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顺利地大学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被派遣到富于革命传统的基辅“阿斯纳尔”工厂，在国防企业名录中，它的编号是 393。那里生产火炮。我将来会作军械工程师。

-----

在白教堂迎新年(1)

-----

然而，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

-----

## 在白教堂迎新年(2)

---

斯大林以为美国总统跟他本人一样，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无所不能。

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决定创设新杂志。

在那些我本人有机会接近观察的外国国务活动家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我国，人们把他看作一位现实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雅尔塔的一条主要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现代史上以及二战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充满魅力、反应敏捷、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在雅尔塔，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所有在场的人都发现，总统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锐。

我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被委派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 1943 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的谈话。当时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在我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启程赴伊朗首都。我在基辅徒劳地试图找到自己的父母，因此被迫追赶代表团。我深夜起飞前往巴库，快到晚上才到达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乘飞机前往德黑兰。当天中午，我刚刚赶到苏联大使馆，便得知我马上要翻译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如

果我的飞机晚到一个小时，那么我便会赶不上这次会见，不用说这会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因为每次会谈都是他自己挑选翻译。

当我进入与大会议厅相连的房间时，身穿元帅服的斯大林已经在那里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于是我赶紧道歉说稍微迟到了，并解释说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斯大林微微点了点头，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拿出一支烟，点上。他眯缝着眼睛，已经不那么严厉地看了看我，问道：“路上累不累？能不能翻译？此次谈话责任重大。”“能，斯大林同志。在巴库那一夜休息得很好。感觉良好。”斯大林走向桌子，漫不经心地将烟盒抛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已经熄了的烟卷。然后，慢慢摀灭了火柴，用它指了指沙发，并说：“这里。我坐边上。他们会把罗斯福用轮椅送来。让他坐在沙发的左边，您就坐沙发上吧。”“明白了。”我回答道，我已经不止一次为斯大林翻译，但我从未听到他如此重视这类细节。也许，在会见罗斯福之前他有些紧张。

斯大林当然很清楚，对于经他的努力在苏联取胜的制度，罗斯福总统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对于罗斯福而言，斯大林帝国内部那些血腥的犯罪、专断、镇压和逮捕——摧毁农民的家业，导致千百万人饥饿和死亡的强制集体化，对那些被宣布为“危害分子”的高级专家、学者、作家的迫害，残杀杰出将领，所有这些都不能是什么秘密。斯大林政策的恐怖后果，在西方造成了苏联极其负面的形象。跟罗斯福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否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能否克服疏离感？斯大林不能不自问这些问题。

我想，总统也明白，在当时的局势下与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找到共同语言何等重要。并且，他处理与斯大林关系的方式，使得这疑心重重的东方暴君似乎相信了，国际民主社会愿意接纳他。在跟苏联领袖的第一次会谈中，罗斯福就努力建立信任的气氛。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他没表露出任何的紧张，小心翼翼，没有任何不自然的长篇大论。

斯大林也决定施展自己的魅力——在这方面他可是个高手。战前，我们的领袖很少接待外国政治家，所以也不具备相应的经验。但是，他很快弥补上了欠缺，1939年8月在会见里宾特洛甫时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希特勒入侵之后，斯大林直接参加了谈判。与霍普金斯、哈里曼、赫尔等人的谈话，与罗斯福频繁的信函来往使他有机会充实自己有关美国人的概念，并且操练出跟他们处事的一套特殊方式。但是，从旁边终究能够看出，1943年秋第一次会见美国总统之前，斯大林感觉并不十分自信。

是否正因为这一点，他这次关注要如何落座更好？显然，他不想把自己长满天花豆的脸过分暴露在灯光下？元帅服和带红色镶条的裤子仔细熨烫过，柔软的高加索皮靴（他平时将裤子扎进去）明光锃亮，脚后跟下鞋垫里加衬的垫子使他比平时高些。而与罗斯福的谈话，他是从典型的格鲁吉亚客套话开始的。总统在公馆里可感到满意？有没有什么事情疏忽了？他能否为总统作些什么等等。罗斯福加入了这个游戏，向斯大林敬了一支烟。后者回答说，习惯了自己的。总统也问道了“著名的斯大林烟斗”。

“医生不让抽了。”全能的领袖双手一摊。

“医生的意见必须要听。”总统用过来人的口吻说。

接着两位领导人互相通报了身体情况，谈了谈吸烟的坏处，户外新鲜空气的好处。总而言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挚友相见。

当斯大林应总统的请求谈到前线的状况时，他没有隐瞒乌克兰的困难局势，德国人占领日托米尔，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之后，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再次受到威胁。

而罗斯福也照样表现出了坦诚。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他提到了殖民帝国的问题。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

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罗斯福政府遵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当天美国国务院声明中的表述，即“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遵循这样一种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苏联对德国作战的事实，并不表示，在国际关系中它维护，争取或者遵循着与我们同样的原则”。

在战争期间，罗斯福对苏联，以及斯大林本人多次发表了友好的意见。但这里，我想，他仅仅对反希特勒联盟范围内的盟友关系、顶住了希特勒战争机器大规模攻击的英勇顽强的红军表示尊重。同时，从苏德前线的战事中总统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继续抵抗侵略的苏联人民，如罗斯福认为的，证明了体制的牢固性。如果这个体制能够坚持下来并维持到战后，那么再次企图摧毁它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可以共处。但这些根本不意味着，罗斯福赞成苏联的现实。

斯大林的不信任也有其自己的原因。在16年的不承认之后，罗斯福建立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有关愿意向反抗希特勒侵略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声明，总统愿意给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所有这一些都可以列为罗斯福政府的优点。但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实践中，却也有不少事实，强化了斯大林对美国的怀疑。并且，在意识之中根深蒂固的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敌意，不断地使他保持警惕。

我多次有机会听到，斯大林借各种理由对莫洛托夫说：

“罗斯福拿国会来推诿。他以为我会相信他真的怕国会，因此不能向我们让步。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反倒拿国会来做挡箭牌。

真是一派胡言！他是军事领导人，最高统帅。谁胆敢有异议？他躲在国会后面方便些。但他糊弄不了我.....”

斯大林同样也不相信，当他抱怨英美报刊上针对苏联的不友好文章时，罗斯福和丘吉尔解释说，他们无法控制报纸和杂志，并且对他们，新闻界往往也不买账。所有这些，斯大林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狡诈，两面游戏。但他看到，苏方处于不利地位。每当我国媒体上出现小心翼翼的针对西方盟国政策的批评时（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军事供货不能保证按期进行，单独媾和谈判的传言等等），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进行抗议，向斯大林提出意见，因为这里是苏联官方新闻机构的材料。

-----

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1)

-----

为了平衡这种状态，斯大林决定在 1943 年创办一份新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并且表面上似乎是工会组织在出版这份刊物。这家杂志的实际编辑是莫洛托夫，虽然在杂志的封面上是某个工会活动家充当主编。莫洛托夫委派我处理编委会会议的技术准备工作，于是我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莫洛托夫，往往是斯大林仔细地斟酌一

些批评性文章。这样一来，对英美的抱怨他可以回答说，苏联政府对这些材料不承担责任，所以任何意见请提给工会组织。斯大林相信，这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操纵媒体的手法毫无二致。

早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就在争取与罗斯福建立联系。米高扬给我讲述了与此有关的一个情况。事情发生在1935年，在莫洛托夫的别墅，当时米高扬很快就要出发去美国购买设备。一个名叫库恩的美国人也在别墅——他是莫洛托夫妻子的亲戚。很快，斯大林来了。晚饭之后，他跟米高扬一起来到花园，并说：“这个库恩，是资本家。你在美国跟他见一见。他可以帮助我们跟罗斯福展开政治对话。”

抵达华盛顿之后，米高扬弄清楚了，资本家库恩拥有六个加油站，但是不可能跟白宫有任何关系。库恩做中间人的事想也不用想。同时，在会见亨利·福特时，后者主动向米高扬提议说，可以介绍他认识罗斯福。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立即将此事通报了莫斯科，但却没有接到答复，于是米高扬也没有见到罗斯福。我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这样做，须知斯大林曾经争取要跟罗斯福对话。

“您太不了解斯大林了，”米高扬解释说，“他可是指派通过库恩的。如果未经他批准利用了福特的帮助，他会说：‘这个米高扬比我们都聪明，干起了大事。他便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一定在某个时候想起来，用来收拾我……’”

这件事证实了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的机警，也证实了多年之

后在莫斯科流行的、专指米高扬的一句顺口溜：“从一个伊里奇到第二个伊里奇，没有梗塞，没有瘫痪”，意思是他在一个暗流汹涌的时代里全身而退——从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烈日涅夫。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有关美国的概念何等幼稚。他认为，既然库恩是个资本家，那么他就跟总统常来常往。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美国观，斯大林曾经分别向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建议派遣美军到乌克兰的苏德前线作战。自然而然地，他得到了拒绝，但令人惊异的是，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最怪异的还是此后不久罗斯福的一项动议。1942年元月12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跟刚刚到华盛顿的新任苏联大使李维诺夫谈话时说出了一个意见，即美军可以替换在驻扎在伊朗、外高加索以及极圈外港口摩尔曼斯克地区的苏军，而苏军士兵可以被投送到前线正在激烈作战的区段。总统用一个独特的诱惑来加强这个建议：“美方，”他对苏联大使说道，“对于苏联在北方，挪威的某个地方，譬如纳尔维克，获得一个不冻港不会有任何异议。”罗斯福解释说，“为了跟这个港口联系，可以通过挪威以及芬兰领土划出一条走廊。”

从现代道德的角度看，类似的建议，况且挪威人和芬兰人都不知情，至少是厚颜无耻的。何况，当时纳尔维克以及整个挪威都被已经被德国占领。

苏联政府谢绝了美国的建议。莫洛托夫在元月18日的电报中，

委托大使答复罗斯福，即苏联“现在和过去对挪威从未有过领土或者其他要求，因此也不能接受苏军占领纳尔维克的建议”。至于用美军替换在高加索和摩尔曼斯克的苏军，那么，这个“不具备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地方目前没有军事行动”。接着在电报中说：“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罗斯福使用美军进行的援助，其目标将是与我军并肩作战打击德军及其盟军”。

但是，美国并没有军队用于此目的。

所有这些事情，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快之感，并且使斯大林产生了新的怀疑。他将罗斯福的建议看作是想染指苏联领土完整。他记得很清楚革命后不久对苏俄的干涉，当时美军占领了我国几个地区。与此同时，这也看出了华盛顿靠苏联人流血保存自己力量，并且削弱冲突的两个主要参与者——德国和苏联的图谋。

我想仔细谈一谈对斯大林和罗斯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关键问题。

虽然我们的西方盟国对莫斯科在法国实施登陆的多次呼吁没有响应，但是，华盛顿从1941年秋天起就在研究这个战役的可能性。翌年春天，攻入法国北部的美国方案已经准备妥当。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时指出，在这个地区实施登陆，是对俄国战线最大的帮助。然而，此次战役实施却被置于两个条件之下：

如果俄国前线的局面令人绝望，也就是说，德军获得全胜，即出现了俄国抵抗不可避免崩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的进攻可以看作是为了共同事业的牺牲。

如果德国人面临危局。这份文件能够说明美国对于“第二战场”的设想：当苏联和德国有能力继续作战时，华盛顿更愿意袖手旁观。最主要的，是战争结束时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

哈里·杜鲁门（他当时是参议员）对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反应也很典型。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他说：

“如果德国人将获胜，我们必须帮助俄国人，如果俄国将获胜，我们必须帮助德国人，那么就让他们互相残杀的更多些吧”。

斯大林牢牢记住了未来美国总统的这段直言不讳的话。

1942 年底，希特勒动员了庞大的军力，预备向苏联纵深发动新攻势。而我们的西方盟国依然无所作为，以减缓苏德战线上的局面。李维诺夫大使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于1942 年1 月31 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出了问询：“在希特勒可能的春季攻势之前，为此他正在积蓄庞大军力，已经剩下不到两个月了，并且如果我们希望在此时之前获得英美的援助，那么就必须马上向他们提出这一点。我们要么必须要求在大陆实施登陆，要么声明，我们需要多少飞机和坦克，敌人在这个或者那个方面有多少优势。”

2 月4 日，李维诺夫收到了如下答复：

“我们欢迎我们的盟国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但您知道，我们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已经三次被拒绝，所以不愿再遭到第四次拒绝。因此，您不必在罗斯福面前提出第二战场的问题。我们等待时机，届时，可能我们的盟国自己会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否对罗斯福发生了影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影

响。无论如何，很快美国人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1942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向苏联政府首脑通报说，他认为有必要就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与苏联权威代表交换意见。他询问，苏联政府是否愿意派遣莫洛托夫到华盛顿来进行谈判。苏方立即表示同意。为了保密，此次访问以“布朗先生代表团”的代号进行。

莫洛托夫先行抵达伦敦，签署了英苏结盟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作战以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然后前往华盛顿。在跟罗斯福总统的谈话中，主要涉及到了西方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以及苏德前线的战事。

“如果，”莫洛托夫说，“盟国1942年能够从我方战线吸引哪怕40个师，力量对比会发生极大变化，对我方有利，并且希特勒便死定了。”

听到莫洛托夫带着他并不特有情绪洋溢的声明之后，罗斯福总统问马歇尔将军：

“目前的准备工作是否足够，使我们可以告诉斯大林元帅，说我们愿意开辟第二战场？”

将军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总统郑重地说：

“请报告自己的政府，说他可以期待在本年内开辟第二战场。”

这样，总统，以及附和了他的丘吉尔，正式承诺实施登陆。此外，也确定了具体的期限。共同声明称：“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等问题上全面达成了协议”。

-----  
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2)  
-----

华盛顿和伦敦当时是否真的打算登陆？这个决定是否是个失误或者轻率，不过，这对于成熟的政治家而言是不允许的。当时，他们未必认为，苏联的抵抗力已经接近衰竭，并且做出“牺牲”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么很快便可以得出结论，即不必急于“牺牲”。

过了一段时间，当罗斯福和丘吉尔拒绝了给斯大林的承诺之后，总统感觉到困窘。因为在华盛顿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总统以军需品转拨到准备中的在法国的登陆为由，说明要大幅度削减苏联亟需的军品供应。当莫洛托夫问道，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供应削减了，第二战场也不会开辟，罗斯福再次向莫洛托夫保证，1942 年法国登陆一定会发生。大概，当丘吉尔自告奋勇在莫斯科执行如此不愉快的使命时——通报斯大林，入侵不会进行了——美国总统松了一口气。

有鉴于上述这些事实，值得援引总统的儿子艾略特写的书《用他的眼睛看》中的一节。它可以表明罗斯福对美国在战争中角色的

理解。

“你想一想，”父亲对儿子解释说，“这是一场足球赛。譬如说，我们是坐在板凳上的替补队员。现在，主力队员是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英国人。我们被预定的角色，是在关键时刻加入比赛的队员……我想，我们会正确选择时机的”。

罗斯福跟儿子交流的想法可以说相当坦诚。

在我国的文献中，德黑兰会议就此做出的决定通常都被看作是苏联外交的重大胜利。并且，实际上，西方盟国终于确定了进攻的具体日期并且大体上做到了。三年以来独自跟希特勒战争机器作战的红军，终于得到了实际的援助。试问，美英同意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时，对甚至威胁离开德黑兰的斯大林坚决要求真的做出了让步吗？或者他们首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他们是否认为，美国计划中规定的第二条——德国崩溃的局面正在来临？

当德黑兰会议召开之时，已经形成了决定。乘坐巡洋舰渡过大西洋前往伊朗首都时，罗斯福总统将自己最重要的助手召到军官室，把自己有关第二战场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苏军，”他说道，“距离波兰边境仅有60英里，并且距离比萨拉比亚仅有40英里。如果他们强渡德涅斯特河，这可能在最近两周之内发生，红军便到达罗马尼亚的门口了。”总统已经得出结论：该行动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他解释说，“必须占领尽可能多的欧洲领土。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南部归法国。美国应该派遣自己的军舰将军队运送到不来梅港、汉堡港，到挪威和丹麦。我们应该到达柏林。那时，就

让苏联占领柏林以东的领土。但是，柏林应该由美国占领。”大约在同一时间，罗斯福下令预备空降兵团占领“第三帝国”的首都。

罗斯福与丘吉尔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不可继续拖延进攻，否则苏军可能大幅度推进到西方。但是，在这一点上也不无重大的分歧。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总统认为，通往柏林最短的路线是通过法国。不列颠首相则出于其他的考虑。他力争不使苏军在苏联国界之外推进的太远。达到此目的的最佳途径——便是通过巴尔干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方向进攻。

至于斯大林，他猜出了邱吉尔的图谋之后，多次声明说，对红军最根本的帮助是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

综合以上所述，我认为，德黑兰会议有关第二战场的决定中，最主要的不是协调进攻的日期，而是确定登陆地点。至于最终选择了诺曼底——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立场一致的结果，并且这一点得到了苏联领袖的高度评价。

-----

战前岁月的反差(1)

-----

斯大林对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抱有好感。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身边的德国谍报窃取了诺曼底登陆的绝密情报，但纳粹并未能加以利用，并且用 30 万英镑假钞打发了获得这一绝密情报的谍报员。

在陪同罗斯福出席德黑兰会议的军人之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特别引人注目。我是在 1943 年 11 月 29 日早晨三方代表团军事代表会晤时认识他的。伏罗希洛夫元帅预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之后，请我做苏方译员。

在此次会晤期间，讨论了英美军队在西欧进攻的时间表和地点等问题。罗斯福总统的幕僚长莱吉海军上将主持了会议。他首先请英国的布鲁克将军发言。

就在这个阶段，英国人更愿意在地中海地区组织战役的意图已经清楚了。布鲁克将军谈了很多关于在该地区的驻有大量英军，以及指挥部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这些部队的愿望等等。同时他提到了可能在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地区组织战役。

在英国代表之后发言的马歇尔将军，以相当礼貌、但坚定的方式谈到了诺曼底登陆的优越性，指出，进攻诺曼底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法国南部的登陆予以支持。

伏罗希洛夫元帅也谈了类似的意见，当然他在执行斯大林的指令。

此后讨论了战役的各种细节问题，包括在太平洋战场的行动。但此次会晤廓清的最主要问题，是华盛顿和莫斯科有关诺曼底行动上的立场极为接近。

在会议的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斯大林听取了伏罗希洛夫的汇报，当然在自己的心头记住了马歇尔将军的话。

在全体会议期间，军事专家们被多次请来，以便使“三巨头”能够在这个或者那个具体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马歇尔将军的论据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让斯大林喜欢。将军把自己的想法表述得清晰明确，没有英国代表所特有的词义未尽和模棱两可。马歇尔将军始终一贯坚持通过英吉利海峡登陆优越性的立场也使苏联领袖印象深刻。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时，斯大林邀请马歇尔沿着苏联大使馆主楼花园的林荫道散步。我作为译员陪伴着他们。

起先，谈话围绕着刚刚结束的辩论。后来，苏联领袖指出，他喜欢马歇尔的报告，并且询问了他的职业生涯。

马歇尔谈及自己短时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战争快结束的几个月才参战，并指出，美国军人在战后最初和平年代里的境况并不好。当然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威尔逊全面和平计划的破灭，接着则是孤立主义时代的来临。马歇尔本该于1917年得到第一颗将星，但他却等了十八年。他在军队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加上甲状腺出了严重问题，他开始考虑打报告，转到国民警卫队——那是军事仕途失意者的最后归宿。然而，就在这时来了一道命令，任命马歇尔担任位于太平洋岸边、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兵营的司令官。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毕竟还是在军队里。

马歇尔以前的许多战友非常走运，在总参谋部和其他首脑机关

获得了高级职位。而他仿佛是被遗忘了，连马歇尔本人也认为，温哥华兵营——这是他军人生涯的最后一站了。但是，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斯大林仔细的听着马歇尔的叙述，并不打断他。但这里，利用他的一个间歇，问道：“出什么事了？”

“这一天我终生难忘，”马歇尔继续讲道，“我给您仔细得讲讲这件事儿。1937年6月20日，星期天，早晨八点三十分，一阵敲门声把我叫醒。门口站着三个陌生人，他们头戴飞行帽，身着黑色皮夹克：疲倦不堪，没有洗脸，显然饿坏了。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三个人是苏联飞行员：契卡罗夫，巴伊杜科夫和别里亚科夫。他们当时进行跨越北极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的不着陆飞行，但由于燃料不足实施了迫降……”

“怎么，这之前没有发现他们吗？”斯大林吃惊地问。

“由于当时搜索设备简陋，加上美军人员训练无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他们认为温哥华兵营的阅兵场比较合适，所以便决定在那儿降落。我家的房子就在旁边。于是他们便来到我家了……”

斯大林被这个故事逗乐了。他发自内心地笑了，最后问道，接下来怎么着了。

马歇尔接着讲道，他把三个疲倦的飞行员安置在自己家里：好在他家有好几个卧室和浴室。快到中午时，午饭准备好了，可此时房前已聚集起了好几十号记者和电影摄影师。马歇尔非常恰当地把

自己家的不速之客做了介绍，帮助他们应付了记者的采访，并对他们的回答做出了巧妙地解释，由此一下子变成了世界名人。很快，苏联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杨诺夫斯基和美国国务院以及军事部门的高官们来到了温哥华兵营。随后组织了这几位著名飞行员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表演，马歇尔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很快，首都的高官们想到了马歇尔将军，他被调到华盛顿，并于 1938 年初被任命为军事计划局的局长。由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仕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计划的创始人.....

“您知道，在新岗位上我有何发现？”马歇尔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讲道，“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一年，美军在世界上只占第十九位，排在保加利亚和葡萄牙后面.....”

“那么，我只能祝贺您工作成绩斐然，在如此短时间内把美军发展成如此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这样结束了这次有趣的会面.....

经过长时间辩论，德黑兰会议决定于 1944 年 5 月实施登陆，同时由英美军队在法国南部空降予以支持。

此后，斯大林问道，何人将被任命为登陆行动的指挥官。

“这个人选还没有定下来。”罗斯福回答道。

“这样的话，登陆行动将一事无成。”斯大林断定。

“英国将军摩根负责登陆的准备工作。”罗斯福解释说。

“那么谁负责实施呢？”斯大林继续坚持问道。

“除了指挥官之外，我们已知所有将实施登陆的人员。”罗斯福歉意地说道，并感觉到了这个局面的困窘。

继续交换意见之后，斯大林表示：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误解。俄国人并不想要参与决定指挥官人选问题。但俄国人想要知道，这个指挥官将是何人。俄国人想使他尽快得到任命，可能的话，就在这里，并想要他既负责准备，也负责实施登陆行动……”

德黑兰会议结束后不久，登陆行动的指挥官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斯大林接受了这个人选。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在会议期间在此问题上如此坚持，是因为倾向于马歇尔的人选。

与会各方约定对德黑兰会议的决定严格保密。为此采取了特殊措施。查尔斯·博林，会议期间的美方译员，回到华盛顿之后发现，家里的电话被窃听。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参加德黑兰会议的所有人，根据罗斯福总统的一项命令，被置于特别监控之下。

但是，终究还是发生了泄密……

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从德黑兰回到伦敦之后，将“三巨头”会议的决定详细通报给了英国驻安卡拉大使赫奇贝尔·休杰森爵士。在密电中，不仅有涉及土耳其的情报，这是十分自然的，还有其他重要的信息，其中包括登陆的日期。全部的情报，通过德国收买的间谍艾里亚斯·巴兹纳，休杰森爵士的贴身仆人落到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手里。因为他向纳粹党卫军的情报机构提供了盟国大量的重要情报，巴兹纳得到了西塞罗的代号。他将休杰森大使的外交密电拍照

并转交给党卫军驻安卡拉的间谍头子摩西什。而爵士的疏忽大意令人惊叹，他往往将装着文件的黑色公文箱随意留在自己的卧室里。摩西什在其战后回忆录中谈到，整夜在暗室冲洗巴兹纳送来的胶片时，发现他手里有了德黑兰会议的纪录。

-----

## 战前岁月的反差(2)

-----

希特勒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后来回忆道：

“西塞罗的情报在两个理由上十分珍贵。其一是，发给英国大使的德黑兰会议决定的简明概要。这揭开了德国战败之后盟国有关德国政治地位的意图，并且向我们显示了，他们之间有哪些分歧。但是，这份情报最重要之处在于，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敌人的行动计划准确资料。”

奇怪的是，纳粹头子们没有利用这个无价的情报。一方面，他们有怀疑：是否英国人为了蒙骗而将这些文件故意送上门来；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清楚西塞罗所获得情报的价值，因而不愿扩大知情者的范围，避免暴露情报来源。无论如何，德军指挥当局在考虑作战计划时，没有利用这些文件，并且他们干脆就不知道这些文

件。1944 年 6 月 4 日拂晓，英美在诺曼底的登陆对德军指挥部成了真正的突然袭击。

可是，西塞罗本人在此次行动中也没能发财：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跟他清账的三十万英镑是假钞。

-----  
战前岁月的反差(3)  
-----

1938 年底，我被应征入伍，到太平洋舰队。

斯大林一纸命令，我当上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英文老师。

我的“学生们”记住了“老师”，最终，我被调到莫斯科的。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的世界大战的乌云越来越浓，但我们却尽量不去想它。基辅活跃的文化生活给人歌舞升平的感觉。外国演员经常来这里巡回演出。苏联音乐家、歌手、象棋运动员们在国际比赛上赢得了许多荣誉，于是，对我们密不透风的国界之外那个世界的归属感在增加。我们一班朋友们从不错过一场音乐会。索比诺夫、澳伊斯特拉赫、吉列里斯、科兹罗夫斯基、波兰女歌手艾娃邦德罗夫斯卡雅—图尔斯卡雅、捷克爵士乐齐格列，以及观众喜爱的爵士乐手乌杰索夫等人的音乐会，一般都在克列夏季克街和亚历山

大街角从前商人公会的圆柱大厅里举办。这里的街角，从前有一座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苏维埃政权的前几个月里，便炸毁了它，但留下了大理石的基座，浅浮雕刻画着俄帝国各族人民，以及碑文：“俄罗斯谢忱沙皇解放者”。

我们的传统习惯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改革创始人，一般都死在宣称自己是人民之“友”的人手上。1861 年取消了农奴制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民粹分子”投掷的炸弹炸死。俄帝国首相斯托雷平推行了土地改革，许诺给农民土地和兴旺的农场，却被狂热的革命分子射杀。在基辅歌剧院内，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所在包厢的对面响起的一枪，打断了俄国这位优秀政治家生命。斯托雷平被杀，不仅中止了大有希望的改革，反而使反动势力得到加强，最终导致了 1917 年的革命……

不祥的音调闯入每天的生活之中：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失败，暴君佛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武力扶持下在马德里登位，奥地利被合并以及希特勒凯旋进入维也纳，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讹诈以及慕尼黑阴谋……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也在急遽恶化。我当时在“阿斯纳尔”工厂上班。我的工作岗位在设计室的一张大绘图板后面，在季莫菲耶夫工程师领导的小组里。他对我十分关怀，帮助我掌握工作要领。但是，跟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乌克兰宣布了动员令。预备役军官，其中也包括季莫菲耶夫，被征召加入红军。他来看过我们一两次，已经身穿军服，神态端正，表情肃然。他对我们说，已经拿到

派遣证，要到波兰边界的军区去。根据苏联与法国的协议，一旦发生入侵，我们应该共同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一切都在表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新闻媒体对希特勒威胁布拉格的报道，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在苏台德地区的挑衅，预示着纳粹分子将采取新的占领行动。莫斯科在乌克兰军区宣布了动员，以此证实已经做好准备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密切关注着慕尼黑会谈，并确信，假如希特勒不做出让步，苏联和法国将履行诺言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国人民，正如我所感觉的，心理上已准备好了这样做。并且我们也希望，最终德国法西斯统治会失败。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导演的歇斯底里的一幕却使西方列强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不允许苏联红军越过自己的领土。乌克兰的动员被取消，工程师季莫菲耶夫也脱去军装，由回到了“阿斯纳尔”工厂的设计室.....

每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经过玛丽娅公园，望着展现在面前的第聂伯河左岸，浅沙滩，水淹的草地，远处地平线上与教堂，钟楼交织在一起的树林。难道那个时刻真的会来临，德国士兵真会占据这块陡坡，而我军则顺着这块草地退到很远的地平线以外，纳粹分子蜂拥而至，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或者被俘，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村庄被烧成灰烬？

我读过神秘的恩内斯特·亨利刚刚出版就轰动一时的名为《希特勒反对苏联》一书。作者在书中预言，德军将会短暂地占据苏联广阔的领土。但是，我所见到的却是，希特勒建立起了强大的德意志

帝国，不无西方政治家的帮助。我已不能排除，一旦与德国交战，我们将承受巨大的损失。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个人而言也一样。基辅工业学院的夜校部设有军事教研室，我们大家在学习期间都被延期服役，而现在则要接受真正的军事训练。我们大学毕业后享有优惠：陆军一年顶两年，而海军两年顶四年。我们能在战前服完兵役吗？

1938年11月初，军事委员会的通知书到了。首先要体检，然后去征兵委员会报道。我体检没查出任何毛病。委员们只问了与个人简历有关的几个问题。在走廊里略微等了一会儿，我就又被叫了进去，我得知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并于本月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浪漫的大海一直都令我神往。但对征兵委员会的决定一点也没感到高兴。因为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被编入乌克兰军区的陆军部队。他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服役，经常可以请假回家，不顾规定，换上便服，在熟悉的环境里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而我远在海参崴，这些都享受不到，并且我的服役期是两年，不象他们只有一年。我和佳丽亚也不得不长期分开。还有一点令人不舒服，命令我剃光了头去集合地点报名。

出发前的那段日子乱作一团：办理各种证明，领取车票，证件。与佳丽亚告别是那么难过。况且我还从没有离开过父母这么长时间，现在要离开他们真是很难受。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情不好。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使我预感到一种莫名的东西将会改变我的一生。我羡慕朋友们留在了乌克兰，但却根本没想到，他们几乎全部

战死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如果我和他们留在一块儿的话，大概我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在集合点，我意外地遇到了两个和我一起毕业的校友——阿尔嘎沙·爱尔立贺曼和伊格尔·别里亚列夫。我们几个月没见过面，现在得知他们也被派往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在一起总会好一些。征兵办公室的人对我们进行了训示，并通告了报到地点，最后一次放我们回家。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了莫斯科，然后乘坐西伯利亚特快列车前往远东。

我们这些新兵只能依靠自己和手里那一点点钱。但我们仍然决定在首都呆两天。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并且说实在的，对我们来讲，过十天，还是十二天到达指定地点并没多大区别。

莫斯科的早晨阴沉而潮湿，这跟我的情绪差不多。站前广场上挤满了人，雨稀稀落落地下了起来。我慌了起来。我们没有栖身之地，又不能住旅馆。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在基辅被军委会收去了，作为新兵我们应该不停留直接到达指定地点。

“也许，只好今天走了？”伊格尔犹豫不定地说，他显然像我一样有些胆怯。

“伙计们，别丧气！”阿尔嘎沙是我们中最有办法的一个，他提议说，“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手续问题。先到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确认车票，把箱子交到寄存处，然后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每个人的东西并不多：两床换洗的被子，几双棉袜子，路上御寒的帽子和体贴的父母事先准备的一份干粮。往远东方向去的

火车都是从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出发的。当然首先要订好票。并且空着手在城里溜达总是会轻松些。总之一句话，阿尔嘎沙的建议被采纳了。

在莫斯科呆的这两天过的还真不错。我们参观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历史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我们在莫斯科饭店的餐厅吃饭，花钱买上等葡萄酒到这个豪华餐厅吃了一顿饭。

所到之处人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的光头，或许把我们当成在逃犯了。而我们尽管喝得略有些醉意，但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加入到保卫祖国海疆的队伍中去了，可以傲视周围的人。大剧院慈悲的票务员看了我们的乘车证，对我们非常同情——天知道要把我们派到哪里去，于是开了三张楼座的免费入场券。我们的一天在鲍罗廷的歌剧“伊格尔公爵”的乐曲声中结束。但最后只能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的地板上过夜，拿报纸作床单。

-----

战前岁月的反差(4)

-----

第二天早晨天气好了，我们在火车站的公厕里洗漱完毕，又去城里转悠。开往海参崴的火车下午发车。这回我们是在莫斯科艺术

剧院旁的卖羊肉串的摊儿上吃的午饭，饭后很快就回到了火车站。

莫斯科到海参崴路上走了九天时间，期间的事情可以大书特书。我们所乘坐的车厢里面的条件，跟我所习惯的国际卧铺不可同日而语。车厢是敞开的，隔板上只是薄薄的床垫，睡上去很硬。我们这个隔间里——过道横着摆着两个上铺，两个下铺——还有一个新兵，也是去太平洋舰队的。他比我们都大，30 岁上才从列宁格勒船舶制造学院夜校部毕业，跟我们一样由于上学而推迟了服役。我们的新战友叫彼得，他用自家制的香肠款待我们，香肠是老家的人寄来给他路上吃的，他父母在老家的集体农庄工作。

到第三天，车厢里所有的人相互都认识了。在一些车站，停靠的时间长的话，乘客就跑到小卖铺或者道边的小摊上去打水，买吃的东西，然后在站台上转悠，等着列车鸣笛。再往前走，西伯利亚有一段是单行线。有时在岔道口要等很久，给迎面来的列车让道。海参崴的早晨雾蒙蒙的很温暖。起初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像俄罗斯中部的省城。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很有特色。当时那里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有几条街看起来颇像纽约或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还有一家中国剧院。许多街头小贩向行人兜售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宫灯，折扇，奇异的象牙制品等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蔬菜基本上都是勤劳能干的中国和朝鲜农民提供的。其中许多蔬菜品种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

我在那儿服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驱逐中国人。很快他们就全都被赶走了，滨海区的经济由此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手工业

衰落，中国剧院被封，蔬菜彻底不见了。从那时一直到今天，蔬菜基本上都是从乌拉尔和乌克兰运来的。

我们打定主意不马上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将行李交存之后，便出发去市里参观。由于我们身着便服，随处可见的陆军和海军纠察队并不注意我们。我们在最好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喝了一杯，庆贺抵达服役地点，看了一场刚刚上演的反法西斯影片《奥本海姆一家》，下午才到司令部报到。

值班军官教训我们没有从火车站直接来报到。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想到，从莫斯科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于是可以轻易地推测出，我们在城里逛荡了一整天。他叮嘱我们今后不要违反纪律，此后是简短的面谈，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们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程处。这时，专门管我们的军士长米谢科也来了。他把我们四人领到位于列宁大街的红海军宿舍，按照海军的术语，宿舍被称作底舱。

在大楼一层的一间大屋里，放着十几排铺位，铺着军用被子。我跟阿尔卡沙的床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放个人用品的小柜。早晨，我们领到了红海军军服——常服、厚防水布工作服和礼服。整整两年里，底舱应该是我们的家。我们统共是四十多个有高等工科教育背景的年轻小伙子。每天早晨，米谢科带着我们排着队去上班，这样，我们身穿水兵服，在八小时之内作工程师，而下班之后，又重新变成普通水兵，排着队唱着军士长起头的歌。

米谢科关照着，让我们及时领到必需品，每周两次带我们去澡

堂，每个月一次去理发馆。这里允许我们留头发，使人的情绪略好一些。与此同时，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兵们要求非常严格，认为这些人应该严加管教。

逐渐地，我们习惯了值班、因为每个小过失而被罚做班务，军士长非常喜欢的夜间紧急集合，以及少有的放假等等固定的程式。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这些休息日。渴望身穿崭新的军装美一美，在城里的主要街道列宁大街上逛一逛，观赏金角湾的美丽风景，以及样子别致、似乎剪纸一样小山包的侧影，它们围绕着城市，在远东出奇明净的冬夜天空下，横空出世一般。

如果外出的话，我们一般都要提早做准备。头天晚上，把裤子压在床垫下，使裤缝笔挺，擦洗水兵军服的铜扣，皮鞋打得锃亮。弄好无檐帽底上的绳箍需要特别的技巧——这样帽子戴在头上十分好看。写着令人自豪的“太平洋舰队”字样的飘带要压得平平展展。最主要的装饰是蓝底带白道宽宽的水兵服领子。要想看起来像个久经风浪的水手，领子必须让它变成退色的，好像被海浪浸透、被热带的太阳晒焦似的。所以，领到军服之后，要马上把领子放到盐水里，让颜色达到所需要的程度。

太平洋舰队的俱乐部时不时举办冷餐舞会。我们尽量不错过机会。这里也有司令部各处，其中包括我们工程处的外聘工作人员：女打字员，女复写员，女秘书等等。一句话，献殷勤的对象是有的。跟我们同一路来的彼得没有花眼，很快就找到了意中人。我没情绪谈恋爱，而只限于跟漂亮的、长得白里透红的打字员玛沙之间

柏拉图式的友谊，她成了我的舞伴，经常跟我一起散步。我们在俱乐部里迎接了新的1939年，装扮了新年松树，凑份子吃了晚饭，跳舞和抽奖等。然后，利用军士长不在的机会——他那天晚上在家过，在底舱里闹了一会儿。有人拿来了一瓶纯酒精。当第二年兵，有经验的小伙子们，教我们这些新兵对付这种暴烈的酒水：干完一杯，不吸气，喝一口水，然后再吃东西。我们大吃大喝，而值班的人站在哨位上，一旦领导突然出现便发出警报。大家都彻底放松了，插科打诨，说各种笑话和趣闻。“躲开啦！……”值班员向我们示了警。但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变得迟钝。我们奔向铺位，想盖好被子装睡，但是做得不老道，但最主要的，是在桌上留下了“犯罪”痕迹：没有喝完的酒精和杯子。

在门口，值班员试图挡住军士长的视线，大声报告道：“军士长同志，底舱一切正常，红海军战士都在……”

但是，米谢科锐利的目光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起床，”他声音洪亮地下命令，“在一甲板集合！”

军士长指的是门口床铺之间的过道。我们不得不掀掉被子去排队，大家的样子十分滑稽：有人穿着内衣裤，也有人穿着水兵衬衫和工作裤。

“向右看齐！”军士长下着命令。

接着便是一顿臭骂。他真是骂得我们狗血喷头！他威胁要给每个人写一份报告，关到禁闭室去，发配到“岸上”去（好像我们的底舱在船上一样）。出完气之后，他接着讲我们的良心，数说我们这

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配的行为。他特别喜欢用这一点来压我们。最终宣布，明天，新年，所有人都不放假，给每个人派了额外的班务。有人要清洗底舱的地板，有人要清洗厕所，其他人清理院子等等。早晨，我穿好衣裳，拿着拖把和一桶热肥皂水，开始擦洗地板，一边不停地骂着鬼。对我来说，新的一年从未这样开始过！我没有想到，这一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变化。

元月份快要过去了，有一天军士长叫过我说，晚上八点我必须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事出意外，我忍不住问道：什么人为什么叫我去？军士长叫我别多嘴，快些准备礼服。

于是，我一边准备，一边一刻不停地想着，这个传唤意味着什么？两个月服役期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叫上司注意到的事情。我左思右想，只是事后才明白，这些猜测都离题太远。事情是这样的。

如上文所述，我是1938年被征召到太平洋舰队的，也就在斯大林在陆海军的清洗开始后不久。一大批陆军高级将领被审判和枪毙之后，镇压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各个军区和海军。这个浪潮也波及到了远东，舰队的指挥人员全部被撤换掉。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他的参谋长伯格杰科海军上校，工程处处长工兵中校沃龙措夫到任之后发现，他们被要求学习英语。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潜在的敌手是日本。而美国可能成为潜在的盟友，最终事情也就是这样。因此，预计可能跟美国海军进行合作。这样，司令部指挥人员掌握哪怕最基本的英语知识也是好的。前任

的将军们要么懂语言，要么吸引旧知识分子作教员，曾经学习过。教员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是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出来的，但不知何故没来得及撤到哈尔滨或者上海去，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当然，这些人在1937年之后全都被作为“日本间谍”关起来了。由于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放进司令部，新的指挥官开始在军人中寻找懂英语的人。叫干部处的负责人看一看，有没有合适人选，于是他注意到了我的档案。就这样，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不幸之上.....

\*\*\*\*\*

## \*第二章 德国军火大王是同性恋

\*\*\*\*\*

我陪同造船工业部长到鹿特丹出差，有机会见到高级领导人露出人性的一面。但总体而言，斯大林时期高级官员仅仅需要三样东西：狗一样的忠诚，盲目热忱和恐惧感。

-----

欢迎各位将军先生

-----

我们采购委员会前往德国验收武器装备，为了保密，全体成员的护照上一律为商人。但却被德国海军司令轻易识破。

一顿饭的教益：不要吝啬，不要贪财，不要对外汇发怵。

1940 年二月初，前往德国的政府采购委员会是由经济专家、经验丰富的武器装备设计师、陆海军将领以及大企业的厂长等组成的。其中的几个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譬如德·菲·乌斯季诺夫。当时，他是列宁格勒一家国防工厂的厂长。作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和优秀的管理人才，他引起了率领委员会的造船工业人民委员特沃祥的注意，斯大林后来也从他那里知道了乌斯季诺夫的情况。战争伊始，乌斯季诺夫被任命为国防工业人民委员，为组织生产比德国更先进的现代武器作了许多工作。他最后官至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1979 年参与了出兵阿富汗这样一个可耻的决策。

由于斯大林时期非常普遍的保密作法，采购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护照上都写着“商人”。这就闹出了一段笑话。

到达柏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德国海军司令列德海军上将接见了我们。我们跟在特沃祥身后进入办公室之后，看见了大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身材消瘦，已经年迈，面部表情刚毅的老人。他身穿黑色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绶带。列德从椅子上慢慢地站了起来，挺直了高大的身躯，向特沃祥伸出手来，大声说：

“欢迎各位海陆军将军们！”

特沃祥没有意料到这样一个称呼，本想解释，代表团成员都是

“商人”。但是，列德做了一个反对的手势，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了一张《真理报》。他把报纸展开，好让我们都看见第一版。那里刊登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实行新的军衔制和第一批授衔的决定。接下来是照片，其中不难辨认出我们采购委员会里的几个“商人”。

这次保密就这样难堪地结束了。特沃祥别无办法，只能摊开双手，露出自己无往而不胜的微笑……

我们乘火车从白俄罗斯火车站离开了莫斯科。早晨到达了里加——资本主义拉脱维亚的首都。

我们将要在这里换乘德国火车，深夜经过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旧称——译注）前往柏林。我们把行李交到寄存处，在城里游逛了一整天。当时，莫斯科的供应要比八十年代，更不用说九十年代初好得多，但是，与里加相比却逊色多了。这里日用品和食品之丰富令人吃惊。我们从自己的报纸上了解到，在资本主义的拉脱维亚，工人和农民生活艰难，而早已经定居在拉脱维亚的德国地主们剥削普通人的廉价劳动，后者当然是勉强糊口罢了。在我们的概念中，那里的生活一点也比不上工农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莫斯科。但是，我们在车站附近市场上所看到的一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所有这些是我们也买得起的。各式各样的鞋子，长短皮大衣，西服和绒线衫，唱片，唱机，收音电唱两用机，收音机，堆成小山一样的水果，蔬菜，肉铺里挂着的整片的肉——简直叫人眼花缭乱。

我开始思量：如果德国也是如此丰富的话，那不应该错过机

会，要给家人买一些好的礼品，而且我自己也要好好打扮一番。于是我决定省钱。预先发给我们的美元马上变得值钱了，所以我已经后悔，在苏联拉脱维亚边境过境之后花 50 美分买了一块瑞士巧克力。

逛街之后，回到了车站，大家决定在车站附近的咖啡馆吃点东西。当时我们共有五人——其他人都在城里，还没有回来。俄语流利的服务生给我们分发了拉脱维亚语、英语和俄语的菜单，然后开始推荐店里最好的菜：荞麦米饭烤乳猪，乳山羊肉包土豆，苹果馅火鸡，还有其他许多叫我流口水的东西。但是我记得已经发誓不乱花外汇，所以称自己没有胃口，只叫了一份鸡蛋肉汤。其他人显然没有发过这个誓，所以很快，在我这一碗可怜的汤旁边出现了烤乳猪，还有火鸡，还有修士鲤鱼，此外还有一瓶冰镇伏特加，李子咖啡。就在身旁人大吃大喝时，我拼命只看自己的汤，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拖着时间。终于，服务生拿着小本子走了过来，准备结账。没等到我开口，坐在身旁的工程师瓦列金·彼得洛维奇·赛列茨基爽快地建议说：“一起算！”

然后对桌旁的人说，“回头我们平分，如何？”“当然了。”听到的是不整齐的回答。我嘟囔着说了声同意，但知道已经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当然不能承认说自己是为了省钱而叫的汤。因为大家都听到了，我说过自己不饿。我不得不慷慨解囊。起先，我很是生赛列茨基的气，但后来明白了：对我来说，这一课上得很好——不能做吝啬鬼，不要贪婪，不要对外汇发怵。后来，我跟赛列茨基成了

好朋友。

-----

在克虏伯工厂

-----

我作为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的译员第一次来到柏林，任务是验收德国政府向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当时苏联也向德国大量供货，斯大林帮助纳粹储备了进攻苏联的战略物资。

1940 年 2 月，我第一次到柏林，当时我看到的城市，根本不像此前到过这里的同事们所讲的那样井井有条。街上，肮脏的雪堆正在融化，风刮起了垃圾，空中飘着帝国首都取暖燃烧的褐煤的烟雾。到处可见半年之前开始的战争、大规模动员造成人手不足的迹象。在“萨克森赫夫”饭店里，除了钥匙之外，门房给每个客人还发了一个发磷光带别针的圆牌子。这个牌子应该别在上衣上，这样夜间走路的人看见了光亮之后不至于互相碰撞。每到夜晚，城里一片漆黑。既没有发光的广告牌，也没有五颜六色的橱窗。商店、咖啡馆和各个机关的入口，都被厚厚的双层毡帘子遮着，合起来成了一个窄窄的入口。只有进到第一层之后，才可以掀开第二层遮挡亮光

的毡帘子。汽车前灯上蒙着黑布，只有几个窄窄的小孔透出几束光线。我们看到的“第三帝国”首都便是如此。最近几年，我们这里写了许多有关苏联向德国供货的文章，并公正地指责斯大林向希特勒供应了粮食、石油、稀有金属、帮助纳粹储备后来用于打击苏联的战略物资。但是，应该说，我们得到的不仅有亟需的设备，而且还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只有在这个条件下，苏联政府才同意向德国提供其所需的原料。我们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与“叶夫根尼王子”同类型的“留特措夫”号巡洋舰——这两艘军舰是为德国海军建造的；30架飞机，其中包括歼击机“梅赛施密特—109”，“梅赛施密特—110”以及俯冲轰炸机“容克—88”等，野战火炮，最新的火控系统，坦克及其装甲防护公式，爆破装置等等。此外，德国还必须提供石油以及电力工业设备，火车头，涡轮机，柴油发动机，商船，金属切磨机床，压缩机，铸造设备等其他重工业产品。

苏联采购委员会的任务，如上所述，是监督德方合同的执行情况，验收成品。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工作。我跟赛列茨基被派去接收“留特措夫”号巡洋舰上的炮塔。

当时我已经自问：既然德军在准备入侵苏联，为何德国人还同意给我们最现代化的装备？显然，这里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希特勒在提供假情报的同时，试图让斯大林信服，他已经放弃了《我的奋斗》中宣称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并且领导德国与苏联合作。其次，由于对苏联的科技实力估计不足，柏林认为，苏联无法掌握最新式武器，而获得一两件新式武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无

论如何，就算某些新式武器最终投入生产的话，德军将在新式武器开始大量生产之前打败苏联。第三，由于英国的封锁，德国亟需战略原料，而苏联的谈判者，尤其是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作为苏联供货的交换条件，要求提供最现代化的装备，其中也包括武器装备。当时，希特勒不能跟苏联把关系搞僵，因为互不侵犯条约和友好及边界条约保证他不仅可以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且可以绕开英国的封锁。

从当时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军指挥当局反对向苏联提供军备。海军上将列德尤其激烈地批评了希特勒的决策。但是，元首对军方的抗议未加理会，认为苏联畅通无阻的供货至关重要。更何况苏方非常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贸易协定签署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40年春天到1941年6月——德国获得了一百万吨小麦，九十万吨石油产品，十万吨棉花，五十万吨磷酸盐以及大量的战略物资。我们还保障德国从满洲里经过苏联境内过境运输一百万吨大豆，大量来自东南亚的橡胶，锡等其他物资。此外，苏联同意替德国在第三国采购金属材料和原料等。正如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的德国特使尤里乌斯·什努列所指出的，“斯大林在这方面多次慷慨相助”。什努列强调说，贸易协定“对我们意味着通往东方的大门敞开...这样最大限度地削弱了英国封锁的效果”。

斯大林还允许德国人利用北方海路，以及德国海船在苏联的扎波良列加油，修理。德国人从1939年9月份起使用这些便利条件。

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充分利用从德国获得的东西。譬如，“留特

措夫”号巡洋舰拖运到波罗的海之后，仅仅来得及装上四个炮塔中的两个。而且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它便被德军炸毁了。但是，苏联专家还是掌握了 1941 年 6 月我们遇到的武器。他们在设计新武器时考虑到了这些情况，并且应该认为，这也最终有助于在 1942 年底之前制造出性能大大优越于德国产品的坦克，大炮和飞机。

-----  
美妙的克列夏季克(1)  
-----

在基辅，幼年的我见识到了当时初创之中的飞机工业。

基辅市中心的电影院里上演着好莱坞的影片。

大街上时不时出现一对裸体年轻人，标榜“拒绝羞耻”。

“布尔什维克”工厂红色厂长符拉基米尔诺夫当年骑马驰骋的那片田野上，现在早已经盖满了房子。其中多甫仁科电影制片厂占了一大半。周围是一幢幢高层住宅楼。但是，二十年代里，我们家院子后面那家工厂在这片空地上试验生产的飞机。那是一些轻型的双翼飞机：油布蒙皮的木制机身，一个小发动机以及牢固地粘起来的木质螺旋桨。附近的小男孩们都等着崭新的飞机从工厂的车间推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围着它，知道很快就需要我们帮忙了。所谓帮

忙，就是当机械师摇着螺旋桨，让气缸打火时，我们一大帮人压住机尾，摠住飞机，等飞行员加速到足够的推力。在某一刻，机械师一声令下，我们应该跳开去。飞机在草地上滑行，不断加速，最后在我们的欢呼声中爬上天空。在空地上转几圈之后，飞机准备着陆，我们四散跑开，然后再次围着它，兴奋地看着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他身穿皮衣，带着头盔和护目镜，活像个蜻蜓。

飞机工厂后面，还有一个好玩的所在——一家属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资本家斯米尔诺夫的生产体育用品的工厂。快到冬天的时候，父亲要在那里定做了一副长滑木高座位的“芬兰式雪橇”。他去找斯米尔诺夫时，也带上了我。这个厂子并不大，那里大约有二十多个人，但他们都是些高级技工。小工厂的主人——身材高大，像个运动员——给我们看了生产过程。参观是从木材仓库开始的，在特定的温度下，木材在那里存放数月，有时甚至是数年。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将来东西会翘的。在斯米尔诺夫这里，也按照飞机工厂的定单做螺旋桨。紧靠仓库的是木器车间，然后是五金车间，修整间和油漆房。成品的外观非常好，质量上乘。在这家小工厂的基础上本来可以发展成一个生产体育设备的大型企业。但是，三十年代初，斯米尔诺夫的工厂被关闭，主人则被发配到了西伯利亚，技师们一哄而散，组织得很好的体育用品的生产停止了。我此后在别的地方再也没有见到过斯米尔诺夫生产的東西。

“布尔什维克”工厂所在的那个区，不仅是工人聚居区。附近，在绿色林带里，是基辅工业学院的大楼。这里四周建造了一批教授

的小楼和学生宿舍楼。所以，在对面那个有夏天露天剧场，冬天是溜冰场的普希金公园里，各色人等都有。那时的基本上都是美国电影：十三集的《世界女王》，五集的《森林女王》，四集的《纽约鲨鱼》，鲁道夫·华伦天奴主演的《血与沙》，道格拉斯·菲本科斯主演的《巴格达小偷》等。不过，也放映一些欧洲影片：《尼伯龙根》，《多罗提·维农》，《欢笑的人》等。美国著名电影明星——梅丽·彼柯福特和道格拉斯·菲本科斯访问基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两人到我国来拍摄喜剧片《梅丽·彼柯福特之吻》和有伊格尔·伊林参加演出的《一杯茶》。这些很快就拍摄完毕的影片，在普希金公园里吸引了许多观众。当然了，首场演出是在克列夏季克的豪华电影院里进行的，这家电影院的旧名称“山采尔”为基辅人所熟悉，它是革命前电影院主人的名字。

克列夏季克当时还不似现在这么宽阔，堂皇而冷冰冰。它有着自己的可爱之处，尤其是从杜马广场（后改名为十月革命广场）和福杜克列耶夫街（后改名为列宁大街）这一段。在这块不大的空间里，包括“山采尔”在内，共有五个电影院，每个里面都有宽敞的前厅，大理石圆柱，镀金框的大镜子，新艺术风格的墙灯座。除了外国影片之外，那里也上演苏联年轻电影工业的出品，譬如，《谢尔盖神甫》，《阿丽塔》或者《砖瓦工》，这个电影的剧本的蓝本，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说的是一位女工和一位装卸工谢卡之间的爱情。谢卡后来被任命为红色经理，成了“谢尔盖同志”。在克列夏季克街上，几乎每幢房子的地下室里都有挂奇巧精致招牌“台球

一啤酒”的去处。男人们下了班便在这里消磨时间，玩着台球，呷着泡沫丰富的啤酒。人行道上，在特制的小车里制作奶油华夫饼干。男孩子们在兜售吹气的，可以吱吱尖叫的“小鬼”，以及木头小盒子包装的奶糖。咖啡—甜食店更是数不胜数。附近的街道上，它们的名字也随处可见。许多咖啡店属于私人所有，这些人各自都有自己的糖果厂。这样的咖啡店一般有两进。在前头的柜台上一般是外卖。而在里面的店堂里，放着许多大理石小桌和藤椅。顾客在这里可以从容地吃点心，蛋糕，冰激凌，喝柠檬水，咖啡，茶，可可和巧克力。并且这些场所一般都很宽敞，总有空位子。在大楼的门口，橱窗旁边，那些现在应该叫做个体劳动者的人们，兜售着当时非常时髦的各色皮夹克，鞋子，女士背包等等。而且皮革制品之多令人惊讶。看来，内战时期死去的大牲畜给私营皮革匠提供了大量的皮子。原来，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皮子并没有损失，而是被鞣制出来，所以，当新经济政策允许开设工厂时，裁缝们和皮匠们马上动手，并在短短数月之内向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皮革制品。

克列夏季克当时还是最流行的散步和约会的地方。未来派的画家们在那里展示自己的作品，自发的演出小组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着欢快的歌谣，小丑和魔术师们给过路人表演。还有一景吸引着大家：这里时不时会出现赤身裸体的一对年轻人——他们的肩膀上仅有一条细带子，上面写着“拒绝羞耻”。

-----  
美妙的克列夏季克(2)  
-----

总而言之，那个年代的克列夏季克以新潮怪异而出名的。

-----  
苏联姑娘吉娜和德国姑娘马维纳(1)  
-----

当我与同组的年轻女翻译情不自禁拥抱在一起时，她却厉声喊道：“工会教我们要自重”。她是典型的苏联道德教育的产物。

跟她相比，德国姑娘马维纳便表现得十分自然。在一个小站的旅馆里，夜里她悄悄走进了我的房间.....

“克虏伯”的负责人把我们安排在公司旅馆“埃赛涅霍夫”，它虽然有些老旧，但布置得十分堂皇，此外还有一间装饰漂亮的餐厅。客房宽敞，天花板很高，不过每层楼只有一个洗漱间。当时，即便在昂贵的饭店里并不是每个房间都有洗漱间的。

在“埃赛涅霍夫”，洗澡有一整套规矩。有两个年纪轻轻、面色

红润而健壮的清洁女工为预定的洗浴作准备工作：把刚刚熨好的、温热的毛巾和床单叠成一摞，拆开香皂的包装，将装有香脂的罐子放在小架子上，在瓷砖地面上铺好雪白的小地毯，给浴缸放满热水，加上针叶松精，然后，敲开客人的房门，郑重宣布，一切都准备好了。

饭桌安排在通往古老花园的玻璃凉台上。身穿金银饰边制服的服务生们举手投足彬彬有礼而庄重。不过，我们却没有时间欣赏这等奢华：一大早吃过早饭之后，我们便去各个车间，午饭时回来匆匆吃一点东西，便又赶回工厂去了。

在德国的旅程结束之后，率领采购委员会的人民委员特沃祥来到埃森，了解我们组的情况。有“克虏伯”代表参加的会见，是在旅馆的大堂进行的。服务生送来了冰镇饮料和饼干，分放了香烟和雪茄的盒子。特沃祥请乌斯季诺夫谈谈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困难是，由于工厂延误了零配件，所以“留特措夫”号巡洋舰上用的炮塔的试装配进展缓慢。德国人显然延误了。炮塔是非常复杂的机构——甲板下三层，数不清的送弹机构和液压炮膛移动机构等等。但事情还是可以快一些。几周之内，第一个炮塔甚至都没能安装完毕。此外，工作的地方特别拥挤。我们所在车间的那个角落里，像一堵墙一样，用巨大的帆布掩盖起来。应该说，这样做，是不想让我们看见这个车间里在干什么。

乌斯季诺夫说：“我们不打算探究德国的秘密，但是，炮塔周围的场地不妨扩大一些”。

克虏伯的代表用德国政府增加的订货来为延误装配而辩解。特沃祥说，不能接受这种解释，并补充说，他不得不跟克虏伯公司的最高领导来谈这些事情。然后他向公司代表询问了炮塔结构的细节。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陪同人民委员的女翻译对技术词汇不熟练，所以，德国工程师解释的许多东西她未能翻译成俄语。

我自告奋勇来帮助。

当会议结束，大家开始离开时，特沃祥叫住了我。他请我详细谈了谈自己的情况，问我在哪儿学的语言，是什么专业等等。显然，我的回答使他感到满意。他要我把克虏伯工厂的事情先放一放，陪同他去德国、荷兰，很快他就要去那里了解苏联订购的冷藏船建造进度。两周之后，他会叫我到柏林去。

就在这时，第一个炮塔终于装配好了。我们开始试验炮塔的各个机构。德国工程师弗兰茨·休斯科帮助我们作这件事情，我跟他成了好朋友。他在曾经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工作过好长时间。他经常请我到家里去——他收藏了一大批印度尼西亚艺术品：雅致的人像，皮影戏的人物，稀罕的贝壳，奇妙的竹编和草编物品。他的妻子科苔和两个读中学的女儿也对我很好。访问这一家人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愉快的新鲜印象。

休斯科一家人酷爱自行车。他们给我也找到了一辆车子。当周日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风景如画的郊区游玩。但是，天气不好的

休息日里，只有呆在房间里看书了。离我们饭店不远有一家书店，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豪华的插图本《杰卡麦隆》。有一天晚上，我在翻阅一周积攒下来的报纸，我们组的女翻译济娜进来了。

“对不起，打扰你了，”她说，“你这里有什么可读的东西吗？”

我指了指桌边上的一堆书。她开始翻检，并且我发现，《杰卡麦隆》吸引了她的注意。

“可以拿这本书。”

“但是，它似乎不体面。”

“胡说八道！”我愤怒地说，“这可是经典，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她在犹豫——她心里想拿，但却有点不自在。

“那么，把它拿过来，坐在旁边，我给你念一篇小说。”

济娜把书递给我，自己坐在远处沙发上。书当然是用德语写的，但对我们根本不成问题。我已经不记得挑的是哪一篇了，但是，济娜认为有伤体面，她开始斥责我不知羞耻。按照当时的情况，再加上考虑到我们所受的清教徒式的教育，那几乎是黄色读物了。我挨着济娜坐下，然后我们开始看图片，其中许多的图片相当轻佻。然后，济娜自己也想读一篇了。

迄今为止，我们之间相互十分冷淡，但是，共同阅读《杰卡麦隆》似乎使我们接近了。其中许多双关的，而往往是十分明显的场景让我们发笑。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不知不觉地我们将对方拥进怀抱。突然，她鼓起劲，用尖尖胳膊肘顶着我的胸部，推开了我。“怎

么回事，怎么啦？”我小声说。

“工会教会我自重。”她不自然地厉声喊道。

-----  
苏联姑娘吉娜和德国姑娘马维纳(2)  
-----

“这干工会什么事，工会干我们什么事？”

“笨蛋，你怎么不明白，”她略微平静一些，退后了一点，然后压低声音解释说，“工会就是党。在国外禁止承认自己入党，而为了让我们相互知道，就说是工会成员。并且我们应该是道德上坚定的。你怎么不是党员？”

是的，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此外还是单身，并且不知道有工会无所不在的监视。

我紧张了一段时间，害怕济娜打我的小报告。因为向有关部门报告“同志的错误行为”，这也是工会成员的义务。但是，终于还是过去了。我们俩再也没有一起读书。

过了不久，济娜被调到柏林的商务代表处去了。

复活节那几天，我跟瓦列金·彼得洛维奇·赛列茨基决定游一趟莱茵河。我们计划先乘火车到达留登海姆，然后步行沿河走到戈登斯

堡。

火车很快就加速了。铁路两边闪过一幢幢舒适的瓦顶小房子，绿色小草坪，围绕着花坛是小巧的陶瓷塑像。突然，就像是电影一样，长长的军列，包着套子的大炮，围着帆布的坦克，满车厢头戴钢盔的士兵打破了这种田园的恬静：所有这恐怖的东西一路朝着法国、比利时、荷兰边境方向开去。

小站停车时，我们车厢里进来了一个姑娘。她长着长长的栗色头发，高高的小鼻子，浅绿色眼睛。看到我们这里有空位子——我站在窗户旁边，包厢里只有赛列茨基——她小声问道，能不能坐在这里。我赶快打开了玻璃门。姑娘挂起风衣，将小旅行包放在沙发上方的架子里，然后坐在了窗户旁。这时，餐车服务员拿着热水壶走过去。我叫住她，要了三个咖啡，给赛列茨基和我们的新旅伴。“非常感谢。”她简单地说了一句，拿起了杯子。

我作了自我介绍，只说了自己的名字。

“马维娜。”她回答说。

我们聊了聊莱茵河的美丽以及早春等。我重新回到过道的窗户前。过了一会，马维娜也过来了。当她知道我们是俄国人，来到克虏伯工厂时，非常惊讶。她父亲也在克虏伯工厂工作过，不过已经被征召入伍。现在，他所在的部队正在法国边境上，而她是去探望父亲的。

“我跟我的朋友决定游览莱茵河。”我对她解释说。

“我非常喜欢这些地方，”马维娜说，“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步行

走遍了这些地方。您的德语为什么这么好？”

我介绍说，在乌克兰上过德语学校。

“难道俄国也有德语学校？”她很惊讶。

“我上学的时候有的……”

我知道，我们的学校被关闭了，而学校的奠基人和校长弗里德利赫·菲比赫被当作“间谍”和“人民公敌”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但這些我没有告诉她。

又一系列满载坦克和军人的军列超过了我们。

“我非常替父亲担心。他身体不好。但是谁管这些呢？他们需要更多的士兵。整个冬天和春天我们都在希望波兰之后战争将会结束，父亲会被放回家。现在看来，这是长久的。我的专业是护士，看来也免不了要上前线。”

天开始黑了，包厢里亮起了灯。赛列茨基打手势叫我们过去。但是，在半明半暗的走道里有什么东西拴着我们。我们说了许多话。相互交流使人感到愉快。广播宣布了下一站是留德海姆。

“我们在这里下车，”我说。并且突然间感到寒冷，不舒服。

“遗憾。”马维娜简短地回答说。

我想着这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机械地说出来：

“您在这儿跟我们一起下车多好？”

她没有做声，然后盯着我说：

“就是，为何不呢？这样，我明天早晨可以继续走的。”

她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她不慌不忙

地走进包厢，拿起风衣和包，又回到走道里。

我走进包厢，伸手拿箱子时，对赛列茨基小声说：

“她跟我们一起下车……”

“岂有此理！”他温和地嘟囔了一句。

我耸了耸肩。

夜晚非常美妙。月亮还没有出来，但透明的银色照亮了天空。我们沿着静悄悄的小街道走着，寻找旅馆。几乎每家的栅栏上都写着：“出租房间”。

我们停在一家高高的屋顶上有两排窗户的一家楼门口。女主人给我们看了顶楼上的三个房间，我们非常满意。女主人还准备了晚饭——煎鸡蛋和一瓶莱茵葡萄酒。我们相互道过晚安之后，便各自回房了。我跟马维娜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留了门。晚上，她到我这儿来了。她当然根本不知道什么工会以及那些教条……

月亮升上了河面，在天空中划出古老城堡的侧影。夜晚宁静，恰似暴风雨的前夜，也许，这场暴风雨将把护士马维娜和她的士兵父亲化为乌有。

早晨，我们匆匆喝了点咖啡，吃过面包之后，把马维娜送到了火车站。

告别，火车窗口挥舞的头巾——然后火车在拐弯处消失了。

我跟赛列茨基前往莱茵河的左岸。阳光灿烂，天气温暖，中午时分变得更热了。到处是绿色的葡萄园。几乎每过一公里，就有一个地窖，那里的农民们用冰镇家酿葡萄酒招待路人。莱茵河上大小

船只穿梭来往，山冈上是歪歪斜斜地竖着古老的城堡。但是，也有保存完好的城堡，其中有一些是私人博物馆。进入这样的博物馆，就像回到了中世纪。数百年的历史似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们还参观了巨大的钢质塑像“德国”——大而丑、佩剑的瓦尔基利亚女神。这真是得胜的军国主义的纪念碑！我们在小山坡上的一家小餐馆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之后，继续上路。到傍晚，我们赶到了巴德—歌德斯堡。

-----  
苏联姑娘吉娜和德国姑娘马维纳(3)  
-----

在计划行程时，我们决定在这里过夜，并且给“德雷森”饭店发了电报。这家旅馆吸引我们的是，1938年，在慕尼黑交易之前不久，希特勒在这里会晤过英国首相张伯伦。饭店前的停车场上汽车很多。从开着的窗户里传出了杂乱的喊声。

进到大厅之后，我们发现有许多党卫军。我们走到前台，通报了姓名。门房核对过记录之后，客气地说，在等着我们，给了我们登记卡。我们把护照放在台子上，开始填写。突然，我身后冒出了一个党卫军军官。

“什么人？”他粗鲁地问道。

门房紧张地把我们的护照递了过去。

“他们不可以住在这里，”党卫军军官喊道，“叫他们滚蛋！……”

我转过身去，平静地对他说：

“您得客气些。您似乎忘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

党卫军粗短的脖子涨得通红。他似乎都想要跟我动手了。但还是忍住了，低声嘟囔了一句：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会收拾的……”

他刷地一下转过身去，开步走到一边去了。

门房非常歉意地解释说，现在，巴德—歌德斯堡正在举行一支党卫军的集会，旅馆都客满了。所以他非常抱歉发生了误会。不过，他马上给了我们附近出租房间的人家的地址。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

早晨，在邻近的咖啡馆吃过早饭，我们出发沿着起伏不平的菜茵河岸行进。沿途我们数次遇见骑着良种马，穿着非常得体的军服，歪戴军帽，戴着鹿皮手套的年轻军官。他们快乐，无忧无虑，骑马显示着自己的技术，相互之间比试着。很显然，由于长达半年无所事事，他们精力饱满。在我们吃午饭的“彼得斯堡”饭店里，也遇见了许多年轻快活的军官们，身穿当时最时髦的花色鲜艳裙子的姑娘们陪伴着他们，这样，他们坐的桌子几乎成了花坛一样。显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接下来是什么等待着他们。他们还沉浸在

闪电出击的浪漫之中。可是，六年的血腥战争才刚刚开始。

从餐厅的凉台上，展现出美妙的河景，以及遮掩在烟雾之中，当时毫不起眼的小城波恩。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走下去，周围是平静的、绿色的暮色。

突然，森林的寂静和庄严被高声喊叫打破了：一群德军士兵朝我们过来。跟他们一起的有两个姑娘。所有人都喝得烂醉如泥。一个士兵边走边喝，啤酒流到了下颌和军服上。姑娘用手指着他的胸脯，大笑着。我们让开了路。

赛列茨基看着他们的背影，极不愉快地说：

“难道这群醉鬼什么时候会闯到我们国家去？……”

我们不曾想到，这个“什么时候”会来得如此之快。

-----

在军火大王的豪宅做客(1)

-----

我陪同苏联造船工业部长特沃祥到德国枪炮大王克虏伯的别墅进行谈判。

克虏伯的别墅里隐藏着枪炮大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原来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手下忠心可靠的人负责把他喜欢的年轻男子送到

这里来.....

在特沃祥召开会议之后，克虏伯工厂当局把我们工作的场地扩大了：车间里的帆布棚被移开了一点。而有关炮塔配件延误的问题，则是特沃祥在克虏伯家族的庄园——“休根”别墅里谈的。

在预定的时间，“埃赛涅霍夫”门口两辆插着旗子的黑色奔驰在等着我们。身穿黑色制服、制服帽的司机非常恭敬地打开了车门。我跟特沃祥上了第一辆车，乌斯基诺夫和赛列茨基坐第二辆车。出城之后，我们很快走上了很窄的一条路，在山丘之间绕来绕去，最终通向公司首脑的庄园。在庄园门口，身穿金银丝线制服的仆人们一动不动站着。

踏着大理石阶梯，我们来到宽阔的大厅里，迎着我们出来了一位身材消瘦，面皮干瘪，目光刚毅的老头。这就是古斯塔夫·克虏伯·冯·伯伦·乌特·海里巴赫——德国的军火大王。以前，他是希特勒的反对者，并在他于1933年被任命为帝国总理之前曾经警告过兴登堡“这种愚蠢的做法”。但是，后来当他发现希特勒的德国军备重整计划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利润之后，他转到了纳粹一方，并成了元首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而希特勒也需要工业家的支持，给了古斯塔夫·克虏伯无数的奖章，甚至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

跟苏联客人问过好之后，克虏伯挽起特沃祥的胳膊，将他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我们跟着进去，这里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大厅，织花壁毯挂满了一面墙，到处挂着镀金框的油画，瓷器和铜器堆成了小山。那里已经有不少客人——“克虏伯”公司的负责人员，

军人，其中有几位将军和党卫军的高官。

主人把我们介绍给在座的客人们，解释说，特沃祥部长在莫斯科的党务系统中身居高位，并且他本人也是个冶金专家，在德国，其中包括在克虏伯所属的工厂中实习过。作为回应，听到了稀落的掌声。

仆人用托盘送上了香槟酒。古斯塔夫·克虏伯举杯为“德国和俄国的合作”干杯，他没有忘记说，两国的新关系将给他的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这番祝酒辞在大厅里引起了一阵活跃和善意的笑声。然后，特沃祥说了几句祝辞，并以苏德合作的祝词结束。

大家都被请到隔壁的大厅，那里的长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大家明显活跃起来，里面有些吵闹，空气热烈起来。过了一会，我发现主人正在朝特沃祥走去。我马上赶了过去。古斯塔夫·克虏伯请苏联客人到旁边安静一些的办公室去。

这是一间不大的，光线略微弱一些的房间，放着几个深深的，深红色的皮沙发。墙壁是用橡木板装修的，暗暗地反衬着壁炉中的火光。矮桌上摆着银质咖啡具，糖罐和牛奶罐。那里还有几个装饮料的高级水晶杯。

“我希望，您的同事对跟我公司的合作是满意的？”我们围着桌子坐定之后，古斯塔夫·克虏伯问道。当然，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不满，但还是用一种轻松愉快的语调开始了。

特沃祥也没有马上提意见。

“我们高度重视跟贵公司这样一个驰名企业的合作，”他说，“效

率，质量，现代技术——这是整体的概念。对我们来说，购买的设备非常重要。”特沃祥呷了一口咖啡，探究似地看着对方。

略微停了一会，克虏伯指出，这样的合作，是新的事业，所以像任何新事物一样，可能会有摩擦和困难。

特沃祥微微一笑，公司主人第一个开始谈到困难，他感到满意。

“您是对的，”他接上话题说，“在这种事情上困难和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有达成的协议，有供货时间表，双方都应该遵守才是。”

“您是什么意思？”克虏伯的声音中听出了强硬。

“我们在德国购买的巡洋舰‘留特措夫’号很快就要被拖往波罗的海的某个港口去。可现在它只是个船体，没有武器。我们想在最近得到哪怕四个其中的一个炮塔。但事情进展缓慢。您的公司为能够遵守零配件供货进度安排。”

这时，进来了一个仆人。他给杯子里添满烈性甜酒，沏好咖啡，然后鞠躬退出。

“我们还是先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吧。”克虏伯和藹一般地说。

大家举起杯子，尝了尝又甜又酸又涩的饮料。

“合同的义务当然应该执行，”古斯塔夫·克虏伯说，“我们的传统便是如此。但是，对这里的情况我们无能为力。虽然我们亲爱的元首不懈努力，以及斯大林先生在这方面的支持，试图说服英国人、法国人结束战争，但媾和的努力没有被接受。伦敦和巴黎继续坚持好战的方针。东欧的问题似乎已经顺利解决了。惊动全世界的波兰

问题也解决了，并且我们两国达成协议，保障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些英国人想要什么？他们想消灭德国，顺便还有俄国。他们敌视我们。欧洲的局势依然紧张。随时都可能爆发新的武装冲突。因此，德国必须使德军维持在特定的水平上。元首要求我们为此而尽力。所以，我们在履行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

-----

在军火大王的豪宅做客(2)

-----

“所有这些都不错，”特沃祥反驳说，“但是您也得理解我们。我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向德国提供粮食，石油，战略金属材料，帮助你们绕过英国的封锁。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人民也承担着义务，我们也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安全。作为我方供货的交换，我们购买了巡洋舰。我坚决请您，总裁先生，采取措施，以便使贵方的义务按照进度的要求严格得到执行。”

仆人出现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可能这是特意安排的，好让克虐伯有时间想出自己的论据。

“好的，”略微停了一会，他说，“我过问一下这件事。但是，应该知道，现在为德国海军建造的同类型巡洋舰“叶夫根尼王子”号的

装配正在接近尾声。这项工程结束之后，我们将加快巡洋舰“留特措夫”号炮塔的供货进度。”

特沃祥表示了感谢，看了看表。克虏伯捕获了他的目光，说：

“时间已经晚了，我今天还有其他事情。”

我们出来到了大厅，乌斯基诺夫和塞列茨基也过来了。跟古斯塔夫·克虏伯告别，并向大家致意之后，我们走出台阶上，司机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汽车旁边。

月光非常明亮，照亮了铺着卵石的小道。寂静，和平的夜晚，似乎并未预示临近1940年4月有新的流血事件。

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我有机会去过卡普里岛。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红色别墅”吸引着苏联人前往那里。我对这个“无产阶级经典作家”的栖身之地表示了尊敬之情。但是，那幢占据了小岛南岸一大片地方，厚厚的墙壁上铜牌写着“克虏伯别墅”字样的房子，也同样使我感兴趣。战后，克虏伯家族将这块庄园移交给了卡普里市政府。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个禁区，除了军火大王最信任的人之外，其他人无法接近。高高的围墙，日夜严密的守卫保护着它。从南面峭壁垂直地投向大海。在那里，凿出了陡峭的台阶，通往一个小小的人造码头。克虏伯手下忠诚可靠的人把他所喜欢的年轻男子送到这里来，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的面目，姓名。在那个时候，同性恋等于是一种不道德的病，所以，克虏伯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虽然人们到处都在悄声议论着……

古斯塔夫·克虏伯在某种程度上信守了诺言：炮塔的装配加快

了。快到 1940 年底的时候，前甲板的两个炮塔已经装到了巡洋舰上。但后来再次拖延下来。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巡洋舰始终没有装配完毕。德国空军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就炸毁了它.....

古斯塔夫·克虏伯的理由中，也有真话。1940 年最初几个月，希特勒的确在准备西方的战事，他计划在打败法国之后，入侵英伦三岛。但是，另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元首当时并没有背叛自己挥之不去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虽然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同意向苏联提供现代化武器，但却千方百计地拖延供货。他绝不想看到“留特措夫”号巡洋舰建造完成。

-----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1)  
-----

在富裕的乌克兰，强制集体化造成了千百万人死亡。

服务业等的基础设施遭到彻底破坏。

集体化不仅伤害了农民，而且也伤害了渔民。

设防严密的国境与其说是为了防谍，不如说是怕自己的国民逃离。

1923 年 10 月份，我到“布尔什维克”工厂隔壁的学校上一年级。

每周两个晚上，我跟着来家里的补习老师学习德语和英语。我抵抗这些课程，绝对也不会想到，外语知识在我的一生之中将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但是，父母亲牢牢地看着我，他们坚信，不论我将来作什么，这些会有用的。我只能认了，而父母则答应带我进城去玩，作为表现好的补偿。

当妈妈计划大采购时，父亲允许叫一辆车子，所以，伊万叔叔把我们送进城，然后在约定的地方等着我们。除了私人小商店之外，在克列夏季克和邻近街道上，还有许多橱窗非常漂亮的大商场。最考究的商店是租给外国人的那些。富杜克列耶夫街上的纸张文具店大家都叫哈默商店。那里不光有上等的铅笔，钢笔，羽毛笔，笔记本和学生作业本，图画纸和画图工具盒，还有其他许多好东西：插明信片 and 记录诗的本子，花花绿绿的扎带，上面有挤压出来的花和小动物的形象。这里还有各种色彩的光面纸，形状非常好玩的橡皮，水彩画和油画的颜料——一句话，无所不有。印刷精良的电影明星，主要是好莱坞明星的照片吸引着电影爱好者。在阿特曼的奥地利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用毛线编制的东西——男女式毛衣，袜子，甚至鞋子。捷克人科西诺尔的铅笔跟哈默竞争。并且那里也不排队。

同时，当时也有许多失业的人。劳动市场总是排着队，工作安排得很慢。但是，做完一件事之后，可以挣到糊口的钱。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总是让人难受。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快活的孩子们。几乎大家都在兜售些什么，帮人家拿东西，

当然也会掏空那些呆人的口袋。内战之后，一直在整理市容，整修街道，人行道。到处都是庞大的铁桶，在里面融化沥青。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靠着铁桶取暖，晚上在那里过夜。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警察不打扰他们，每天早晨这些人则各自走散。

有许多次，在市中心买完东西之后，我们会绕到波多去。这是靠近第聂伯河的市区，原来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犹太人区。此后，犹太人定居区事实上不复存在，而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富人，搬到基辅上游部分去了。其中有些人拥有相当大型的工厂，建筑公司等。百万富翁金斯堡在距离克列夏季克不远的地方建造了基辅第一幢豪华的高层住宅。人早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房子依然在市区高耸着，依然叫做“金斯堡大厦”。从前的梅林街也是大家熟悉的，他在革命前不久建造的漂亮公寓楼占了好几个街区。附近就是“俄罗斯”保险公司建造的、挤满了商店和咖啡馆的封闭市场。这些建筑物装扮了基辅的市中心。

随着苏联政权建立，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不复存在。相反，城里有了犹太学校，剧院，教堂，出版了一份犹太语报纸。但是，波多依然主要是犹太区。这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作坊：缝纫店，鞋店，珠宝店，钟表店，钳工铺，皮货铺等等。这里对顾客十分客气，定做的东西要么立等可取，要么可以送到家里去。在热闹的十字路口和大商店门口那些所谓的“红帽子”们在兜揽生意——这些人年龄不一，戴着紫红色制服帽，非常熟悉城里的道路，可以按照制定地址送信件，鲜花，蛋糕甚至更大一些的物品。此外，还有一个

气压传送装置。电报，紧急信件或者小包裹装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沿着管道在空气压力的作用下可以迅速传递到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由送信的人送到收件人手里。

波多地方的鱼和水果蔬菜非常出名。每天一大早，码头上停靠着平底船，自从扎波罗热—谢恰[15—17 世纪俄国哥萨克——译注]时代起，这种船也叫做“大木船”。每条船大多有八到十个桨手，顺风的时候，则有土耳其三角帆。但是，大部分路程走的是连水陆路。这里也有自己的“排档”：新打上来的鱼在船底扑腾着，水果和蔬菜装得快要满出来了，没有一点疤痕的安东诺夫苹果和琥珀苹果的香味盖过其他所有的气味，来自赫尔松地区的大西瓜堆满了远处的驳船。接下来，在契约市场大楼方向是一排排小店铺，贩卖各种吃的东西。站在五彩木头柜台后面的，是白里透红，身材健硕的乌克兰姑娘。她们围着彩色围裙，身穿绣花毛衣，挂着珊瑚和玻璃串珠项链。姑娘们头上总是戴着鲜花编成的花环。她们抢着招呼过路的人：

“先生，夫人，看看我们的腌肉，香肠，面疙瘩，甜陷饺子吧。”

的确，家常香肠、果汁，加大蒜熬出来的大油，樱桃馅饺子足以诱惑任何一个清修教徒。

每年秋天在波多举办集市的日子，人出奇的多。就像下诺夫格勒得的市场一样，有来自全国和国外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参与贸易的不仅有私人公司，也有国家企业。卖的东西无所不有——从粮

食，肉类，水果到各种工业品，消费品，家具，居家日常用品等等。但是，一般人买主在专门划出的地方也可以买到任何数量的任何商品，譬如茶具，地毯，自行车，乐器等等。武器不仅批发，而且也零售：猎枪，小口径步枪，芬兰刀，子弹等。虽然内战刚刚结束，武器的自由买卖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不安.....猎枪在业余俱乐部登记，而小口径步枪根本就没人注意。父亲送给了我一枝这样的步枪，它叫做“蒙特—克里斯托”，所以我拿着它在郊外的树林里打鸟，然后把它们做成标本，装饰我的房间。

-----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2)

-----

1929 年，我的中学同学克卡·尤什科夫跟他母亲去阿纳帕——黑海上的一個儿童度假村。他们邀请我也一起去。父母亲最初不同意，但在我的不屈不挠的要求下最终还是让步了。我们坐火车到静河站，然后度假的人们用汽车拉走，这段路我记得很清楚。当地居民在沿途车站上大量兜售水果令人惊讶万分。沿着月台，在绣着公鸡的方巾上，麦秸编的托盘上的，深褐色树皮盖着的陶罐里装着煮过的牛奶，放着家常香肠，腌猪油等。铁罐里是热乎乎的土豆，盘

子上放着有名的小罗斯荞麦煎饼。那里也有熏文鳊鱼，大量的水果。热乎乎的家常面包，点心和圆面包买了喝茶时吃，而每个车站的月台上都有开水。警察也不驱赶自来卖东西的人，不过集体化开始后不久，警察驱赶小贩则变得司空见惯了。

我跟克卡拿着装满了樱桃的袋子沿着火车在月台上逛着，熟练地吐着果核。

“听我说，”我对他讲，“自从我跟父母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到基辅之后，我再也没有坐过火车了。那时，车厢里根本挤不进去。地板上，所有的架子上，甚至天花板下面都躺着人。停车的时候，谁也不敢下车，害怕丢了自己的位子，或者干脆再也挤不进车厢了。而且车站上也空荡荡地，连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我同意克卡所说的，但绝没有想到，我们俩都错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都将统统消失。被没收了财产的农民，被迫害的匠人和手工业者又将重新挂在车厢的踏板上，在空荡荡的、饥饿的国家里跑来跑去寻找一口饭和容身之处。

集体化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农民，而且还有渔民。国境与其说是对外国间谍关闭，不如说是锁住了自己的国民，以免使他们逃离苏联。每天太阳下山时，小船被锁在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渔网被征用。土耳其渔民没有了营生，很快，他们和希腊人、鞑靼人等其他许多人不知被迁移到哪儿去了。新鲜捕捞的鱼再也见不到了，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大家都非常惊讶，为什么在列宁格勒一条鲜鱼都

买不到，而赫尔辛基港面对各种海产品眼花缭乱）。果园和菜园都没有了，手工业也消失了。并且整个阿纳帕都荒凉了。

阿纳帕的生活与基辅相比一点也不差。克卡的母亲在一家希腊人那里租了有三个房间的厢房，外带厨房。他们家里还有一个照料得很好的果园，还养了许多家禽。我们从他们那里拿山羊奶，鸡蛋，蔬菜和水果。这一家勤劳的人种出来的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找不到了。城里的小铺里出售各种肉，新鲜的鱼，每天晚上土耳其渔民驾着自己的小帆船出海捕鱼。捕到最多的是鲱鲤——红色鳞片的小鱼，如果跟土豆和洋葱一起煎烤的话，味道十分鲜美。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小虾。当时，渔民们晚上出海可能逃到土耳其这个情况，似乎当局对此并没有担心：渔民们总是回来，带回新鲜的海产品。当时，高加索和克里木一带这些东西非常之多。

在沙滩上呆一个上午之后，我们——克卡，他妈妈和我——去库扎拉餐厅吃午饭。那真是个大饭堂。餐厅和花伞下放桌子的楼台凉台面积之大，令人惊讶。身穿奶油色柳斯特林西服，凸纹布马甲，打着领结，浆过的餐巾搭在胳膊上的服务生们保持着旧时的气派。菜单异常丰富，服务无可挑剔。入口右边有一个酒吧，于是我们羡慕地看着那些用开胃酒招待时髦姑娘的小伙子们。

每天晚上，库扎拉都放电影，举办舞会。我跟克卡在呆在那里，欣赏着优雅的舞姿，感到自己非常孤独。不过，我们俩很快就在沙滩上认识了两姐妹。其中一个，淡黄头发的尼娜跟我们一般大，第二个黑发的维拉十六岁。不知为何，她青睐我，而克卡则喜

欢上了尼娜。从外面看，我们这两对看起来十分好笑：克卡长得高，跟自己的年龄不相称，而尼娜则是小巧玲珑，非常灵活。我的姑娘不光比我大三岁，而且个头也高得多。不管我怎么使劲，刚够着她的肩膀。维拉整个是完全长成大人的姑娘，并且，很快就清楚了，她有跟男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她游泳不错，并且当她穿着紧紧包裹着清秀身材的黑色泳装时，特别吸引人。克卡和尼娜主要在浅水区玩，而我们俩游得很远，在大海中体验到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有时，海豚会游到我们身边嬉戏。海豚非常温顺，它们从海水中一跃而出，光滑的皮肤闪闪发亮。

在热热的沙子上舒服一阵之后，我跟维拉沿着绵延一两公里，一直通到秃头山的浅滩散步。这里的沙滩没有被分开，也没有所谓的卫生日光浴场。人们随意呆在各处。

我给维拉讲了父亲的故事，当年他从航海工程学校毕业之后进行了一次从彼得堡到敖德萨的环欧洲旅游。我特别着重描述了直布罗陀和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它那蓝色清真寺和拜占庭的大教堂。多年之后，当我每次到伊斯坦布尔和南斯拉夫的亚德里亚海上小岛上，都会想起我跟维拉 1929 年在阿纳帕那个美妙的夏夜里孩童的幻想……

所有这些富足，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集体化之前。至少在乌克兰，在任何一个乡村，炎热的夏日里可以敲开任何一家的门，要一口水喝。而人家会从地窖里拿出来一罐冰凉的牛奶，一大块家里的黑面包，外加一块腌猪油，一小块蜂蜜。招待是“诚心”的，所

以一般都拒绝收钱.....就在这个一切都很富裕的地区，两年之后强制集体化造成大面积饥饿，千百万人死亡！ .....

-----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3)  
-----

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批评残暴的集体化方式的人，议论说，二十年代末，在农民个体经济条件下我国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用于出口，以换取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外汇。所以，他们说，应该采取某种方式使农业社会化。也许他们是对的。虽然问题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粮食。个体经济给国家生产出了肉类，牛奶，水果，蔬菜。个体经营涵盖了服务业，食品生产，手工制品，裁缝和钟表匠，鞋匠和点心师等等。但是，我在此并不是要进行理论上的争论。我仅仅想展示的是，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由于彻底集体化的结果，在基辅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亲眼所见。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完全遭到破坏，手工业者，小店铺，鞋匠，裁缝，钟表匠都消失了，集贸市场关闭了，很多地方的小商店都拆除了，招待过路人吃甜馅饺子的白里透红的姑娘们被赶得无踪无影了。平底船被没收了，很快这些船在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岸边化成了朽木。城里空空荡荡，

恰似吹过一场龙卷风。

而且还有一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们的改革进行了多年，可是在我们这个人才及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大国里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糟。而二十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自相残杀的内战结束和外国武装干涉过去四年之后，在“军事共产主义”毫不留情的没收之后，只需要那么短短的一年半两年时间，就可以不仅养活人口，并且重建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并且实现了迄今从未见过的富足。

当时，在二十年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公开性。当时有相当严格的公民行为准则。中央政府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使群众感到不安。经过多年的内战，生活困难，饥饿之后，人们竭力争取过上平静，安详，最主要的是富足的生活。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这一切，几乎是闪电般给的，于是人民安定下来了，开始做事情。一切发生在短时间之内。我想，当时有必需的人力资源。被多年战乱所折磨的农家子弟，拒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作战，对敌方表示同情，逃离前线。可是，当他们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给土地的许诺之后，愿意继续忍受四年内战的痛苦与恐怖，保证了苏联政权的胜利。当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劳动时，农民用一季收成便让全国人吃饱饭。手工业者和服务业的人们也期待着顺利发展生产。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苦难还没有摧毁人们的心理。大多数人们渴望着能够带来快乐富足的劳动。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挣到钱，食品和商品的丰富显示了好好劳

动的意义。

当然，就在当时，党的官僚机构已经进行了抵抗。现在我们知道，列宁曾经跟这种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赢得了胜利，因为他的威望不容怀疑，而官僚机构的影响尚未稳固。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不满八年，而后来残酷地剥夺农民渴望了几百年的土地，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迄今仍在滴血。

那么，在现代条件下，为何不能重复二十年代初的经验？起先，许多人以为，在现代条件下利用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成分，可以很快扭转局面。从1985年4月起，拿出过多少大胆的设想，在最高当局通过了多少决议——但是，事情依然如故。

除了我们所知道阻碍改革的根源之外，主要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因素：在各个层次上没有触动的行政命令体制妨碍了劳动的解放，以及大部分居民被斯大林体制所扭曲的思维方式。禁止机制和平均主义心理，对那些愿意劳动，也要挣大钱的人们的否定态度，对生活质量要求水平太低，惯性与无所谓——所有这些被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以及卢布购买力的下降更进一步加剧了。

如果说，农民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否在分给他的土地上继续劳动这一点没有信心，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情况会好转呢？

-----

鹿特丹之行(1)

-----

我陪同造船工业部长到鹿特丹出差，有机会见到高级领导人展露出人性的一面。但总体而言，斯大林时期高级官员仅仅需要三样东西：狗一样的忠诚，盲目热忱和恐惧感。

我没有料到，跟造船工业部长短暂的交往，会对自己的前途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40 年 4 月初，我陪同特沃祥参观了位于基列的德军潜水艇基地。我感到惊诧的是，对于苏联人民委员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地方。他可以看到任何想看的东西。这个“开放”游戏原来是希特勒假情报行动的一部分，它旨在让斯大林相信，德国在最近并不打算与苏联打仗。毫无疑问，特沃祥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对参观德国军事设施情况的汇报，在斯大林评估希特勒的计划时发生了特定的影响。

莫斯科对人民委员参观访问德国造船工业感到满意，并委派他在回国之前去一趟鹿特丹。

当时，我们跟荷兰没有外交关系。在海牙只有一个粮食进出口公司和远洋公司的代表处。但是，在荷兰驻柏林大使馆很快就给了我们签证，于是 1940 年 4 月 6 日我跟特沃祥一起乘坐柏林—海牙快车出发了。

一等卧车里，有宽敞的单人包厢，带洗脸池。除了床铺和小桌

子之外，里面还放了一张椅子和小吧台和各种饮料。特沃祥，跟斯大林时期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习惯在夜里工作，凌晨才睡觉。在餐车吃过晚饭之后，他请我到自己的包厢，然后我们就各种话题聊了几个小时。

人民委员认为，前线无战事的“静坐战”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人神经受不了——马上就会打起来。问题是，谁先开始？而且，接下来怎么办？双方用“马其诺”防线和“齐格菲”防线进行对抗。两条防线建造并加固了多年。从芬兰战争的经验中我们知道，冲破“曼耶海姆防线”如何困难，虽然它跟“马其诺防线”无法相提并论。西方的战争将会是非常持久的阵地战。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尽可能长时间地不要被拖下水。让资本家们之间互相打吧……

“当然，”人民委员接着说，“德国人可能破坏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并绕过马其诺防线。但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尊重小国家的中立的话，这将导致大混乱。我想，希特勒不会这么干的……”

对我这样一个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议论似乎是有根据的。这些议论使我弄清楚了苏联政府，以及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的立场。现在清楚了，为什么尽管德方没有执行供货进度安排，但苏联的物资还是源源不断地向德国发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安慰希特勒，并且同时也向他表明，德国与苏联开战，除了使自己失去物资供应渠道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跟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之一，并且是十分接近“主人”的一位在一

起，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这一夜略微揭开了遮挡着领导人的那层幕障。他们所有人都假装严肃，坚定，不过问普通人的小事——只有为党服务，只有工作，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听着特沃祥热诚可爱地讲述他在白天和夜晚的不眠之间回家呆一两个小时，饲弄自己的小儿子，看到他提起自己度过童年的亚美尼亚家乡山村时眼睛闪闪发亮，我明白了，这些普通人的快乐他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他极少这样敞开自己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的样子是在全神贯注完成党中央、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所有这些“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都是思想的奴隶，这既是自愿的选择，同时也是被迫的。为了这些思想，他们可以像花岗岩一样坚硬，残酷，甚至没有人性。那些愿意完成上峰指示的人，受到奖励。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的人，则应该被清除掉。

他们对于自己的功能也是如此不打折扣的概念。如果他们一直工作，不知道睡觉，不知道休息，仅仅抽空享受天伦之乐，那么他们是在如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在完成自己职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享用斯大林的规章和“官阶表”中所规定的那些特权和好处。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或者不听“主人”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下台，并且毫无怨言地认可自己被撤职的事实。

不过，“主人”却善于讨好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他大把地撒出奖章，勋章，英雄的金星，代表的身份等等，给那些创造了好纪录的工人和农庄庄员。后者则顺从地在最高苏维埃举手表决，满

足于他们参与了按照列宁“任何一个厨娘”都能行的方式“管理国家”。他奖给杰出的武器设计师们和院士们的是占地数公顷的别墅。歌颂“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的作家诗人们则允许他们出国访问。谱写和演奏领袖喜爱乐曲的作曲家和演员们赠给普通大众可望不可及的汽车。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专门为上层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疗养院等等。在享受这些设施的时候，“上层”人士在思考着，千百万囚徒，其中许多是他们不久前的同事，在沃尔库塔、克雷马、马加丹等地正在挖掘冰封的土地，开采黄金，钻石和其他宝藏，充实国库，而“各族人民领袖”从其中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自己听话的臣民。

斯大林时代，他所建立的行政命令体制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定势：即结合了狗的忠诚，盲目的热忱和...恐惧感。当“领袖”不在，恐惧感消除，热情减退之后，这个体制开始空转，并将我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我觉得，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尤其在地方上依然运转的斯大林体制，在完全缺乏热忱和没有恐惧感的情况下，成了前进的主要障碍.....

-----

鹿特丹之行(2)

-----

一大早我们到了海牙。站台上来接我们的是粮食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利沃夫，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结实的中年人，还有远洋公司的代表，我的老朋友科斯加·耶若夫。此前我不知道他在海牙，所以非常高兴能够见面。我们想多聊一会，但人民委员决定尽快到利沃夫的办公室去，以便取得有关国内情况的信息，以及谈妥第二天去鹿特丹的事情。

晚上很晚，我才跟耶若夫相聚。我们进去的咖啡馆里人很多。没有人相信，荷兰可以依靠中立而自保。但是，暂时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利用这种局面。我相信，在那个咖啡馆里有许多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秘密谍报人员。德国人尤其活跃。他们似乎在准备某个行动.....

科斯加询问了莫斯科的情况，芬兰战争结束之后是否好了些。“最近来柏林的人讲，”我回答说，“好了些。”“这就好，”科斯加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在列宁格勒的家人也会好一些了.....”

到达鹿特丹之后，我们在旅馆呆了两分钟便出发去船坞了：公司的领导已经在等着特沃祥。我们被引到一间房子里——布置得非常简练，但很雅致——打了香味蜡的木质墙裙，舒适的皮椅子和沙发，低矮的小桌等等。整个房间里充斥着昂贵雪茄和浓咖啡的味道：几张小桌上摆着香烟和雪茄的盒子，还有咖啡。

特沃祥询问了冷藏船建造的进度。对方的解释未能完全使他满意。

“我们想，”他说，“尽快拿到船。现在的局势复杂，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工程结束得越早越好。我们甚至愿意为冷藏船提前供货拿出一笔奖金。”

“这个建议十分诱人，”公司总裁抽着雪茄说，“我们会考虑的。但正是由于国际形势紧张，我们的订单大幅度增加了，而且所有订单我们都必须按期完成。因此，在研究问题之前，提前交船的事情说不上来。至于您的担心，那么荷兰是中立国。我不认为，在本世纪会有人胆敢破坏中立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交战国，其中包括德国不止一次的承诺。况且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战事了，我们在想，这场无用的战争是否就要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特沃祥对战争可能尽快结束表示了怀疑，相反，战争会升级：目前这场冲突中，涉及到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和利益。

我们前往造船的工地。一艘冷藏船还在船架上，另外一艘早已经下水了。特沃祥跟工人们和领班们谈了谈，夸奖他们活干得认真仔细。真的，所有的地方都做得结实、牢靠。在基辅船坞，我有一点造船的经验，所以可以评估荷兰造船工人的技艺。

公司领导建议第二天乘坐快艇去阿姆斯特丹和扎丹姆，那里我们想看看彼得大帝的小木屋。在船厂会谈结束之后，我们简单地参观了市容，乘坐摩托艇走了很多运河。骑自行车的人数之多时我惊叹不已。似乎这是这座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一群群姑娘们在沿着运河专门开辟的小道上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特沃祥发现我脑袋转个不停，便鄙薄地哼了一声：

“不要为这些傻事分心……”

然后，船厂方面安排了简短的讲话和晚宴。我们一边琢磨着明天的行程，回到了旅馆，并约好明天早晨在特沃祥的房间吃早饭。

我醒来之后，冲了澡，然后打开收音机开始刮脸。出于意外我把自己的脸刮破了：播音员说，这天夜里德军在挪威和丹麦登陆了。

“静坐战”就这样结束了。快速收拾停当之后，我跑到特沃祥那里去。人民委员已经坐在了桌旁。早饭上的不是一小块火腿，而是整只火腿和一大块奶酪，所以客人自己动手为自己切了一份。另外还有满满一篮子水果，咖啡和茶的开水壶，一罐牛奶。

“您可迟到了。”人民委员开玩笑说。

“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似乎不会有地震。”

“比地震还要糟！德国人入侵了挪威和丹麦！”

人民委员的好情绪一下子消失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是应该可以预料到的。我昨天还给他们说过，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一个劲地说什么中立。这些人真幼稚……”特沃祥总结道，其实此前他自己跟我说过，德国人将遵守中立原则。

“现在怎么办？”我问道。

“旅游当然是谈不上了。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柏林。”

“为什么？”

“您真是个怪人！英国人现在马上就要到荷兰来了。并且会问：‘苏联的人民委员在这里干什么？’我可不愿意在这里碰见他们。”

特沃祥不做声了，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走近窗户，掀开窗帘。街上十分平静。

“这种平静是骗人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停了一下之后果断地说，“马上雇一辆车，然后我们抄近路，不进海牙，往德国边境去。给旅馆的人留一个字条，就说我被紧急召回到莫斯科。”

我喝了一口咖啡，然后跑下去执行人民委员的命令。雇车没有费任何力气。我们将行李扔到后备箱里，就上路了。桥梁和船闸都有荷兰士兵守卫。有些十字路口上有小型坦克。但公路上空无一人。没有发现紧张的气氛。

傍晚时分，我们赶到了一个边境车站，跟司机结账之后，我们便进入到德国境内。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肮脏的小站上呆了很久等火车。不过次日早晨我们就已经到了柏林。我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跟人民委员短暂的接触会对我今后的命运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  
“快乐角落”  
-----

1926 年春天，父亲担任了基辅一家大型造船厂的总工程师。这也许是战前最幸福快乐的一段日子了。

1926 年春天，父亲得到了新的任命。他是个造船工程师，所以被请去参与设计在第聂伯河上建造的一座新船坞。这个船坞是在“列宁铁工厂”机器制造厂的基础上建设的，他成了这家厂的总工程师。我们不得不放弃“布尔什维克”工厂厂长漂亮的别墅，搬到市中心去。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巡视了一遍自己在花园草丛中的“领地”，爬上枝叶繁茂的橡树，树杈上是我跟小朋友们做了的一个窝棚，在前不久铃兰开花的地方跟地穴道了别。没有忘记跑过去看一眼别墅栅栏外面的那辆单轨小火车。这辆内战时期被废弃的小火车，给了我的小伙伴们许多欢乐，我们玩“红色装甲火车”，向包围它的“白色”军团射击，一切像是真的一样。我确信，我即将离开的这个神奇世界将不复存在。

很快，“布尔什维克”工厂的重建开始了。在厂长别墅的地方，计划修建新的锅炉车间。树木被连根拔出，古老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当 1930 年秋天七年制学校毕业之后，我来到“布尔什维克”工厂当了电工，我喜欢的花园已经没有一点痕迹了。我想，难道就不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扩建工厂吗？因为花园的对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可那时谁会想到，这个美丽的果园还能有用，巨大的核桃树还能结果？一切旧的东西在劳动人民国际歌的乐曲声中，怀着热情将一切“破坏殆尽”，以便建设“我们新的世界”……

父亲加入了住宅建设合作社。这家合作社刚刚在从前基辅的贵族区里普基建造了一幢两层四户的小楼。这个名称略有点轻率（俄语名称是“快乐角落”）的合作社，在列瓦绍夫斯基街和学院街交叉处看中了一块地方，这两条街后来分别改名为卡尔·李布内赫特街和十月二十五日街。合作社的组织者们没有料想到，新楼住户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快乐。

我们家得到了一层的一套房子，里有三间屋子，一个带柴火灶的厨房，以及卫生间，里面有热水用的大桶。各个房间的角上都有炉子：当时集中供热还非常少见。每家在地下室都有一大块地方，用来存放劈柴和煤。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地窖。在那里，整个冬天存放着渍苹果，腌白菜和腌黄瓜。所有这些妈妈秋天都准备好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天一亮就醒来，所以我的任务是从地下室取劈柴和煤，烧炉子，在父母起床之后，把炉子和卫生间里的热水桶点着火。距离我们楼不远的大寺院修道院的僧人了准备一个冬天的劈柴。他们给父亲一种芬芳的露酒草叶，父亲用这种草叶泡伏特加。大寺院里，烤制一种巨大正方形的黑面包，上面压制着一个十字架。我们经常修道院的面包房里买这种面包。

新地方也有自己的好处。院子不大，但玩足球是足够了。我们楼的对面，是商业工会的夏花园。那里有一个露天剧场，没有演出的时候总会放电影。革命前，这个花园里是基辅总督的官邸。为了不让走在鹅卵石路上的马车惊醒楼里的主人，这一块铺上了沥青——这在当时也许是基辅全市惟一的沥青路面了。官邸在内战时期烧

毁了，但沥青路留了下来，所以小伙伴们都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快，父亲也送了我一辆自行车。多次摔破膝盖和胳膊肘之后，我也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始熟练地玩大撒把，让男孩子羡慕，女孩子高兴。我们家的邻居是希腊人波波杜伯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家，他有一家小型金属件厂。他的女儿长着黑头发，叫塔玛拉，迷住了我。应该说，他的工厂收入不错。给塔玛拉穿的衣服时髦而昂贵，她身上总有昂贵香水的气味。她父亲有自备车马——一匹马和一辆车。他漂亮的妻子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阔沿帽和面纱，他们晚上一起坐车到克列夏季克在众人面前招摇。斜靠在座位上，吸着芬芳雪茄的资本家总是引起人们复杂的情感反应。有些人又赞叹又羡慕，另外一些人恶狠狠地看着，似乎要跟这些“没有杀光的资本家”算账。

我们家的另外一个邻居是扎多罗日内教授，乌克兰历史和文学专家。他模仿上个世纪的古典作家塔拉斯·舍夫琴科蓄着小胡子，穿着绣花的衬衣，灯笼裤扎到靴筒里。他跟父亲交上了朋友，所以，每次到我们家，喝上几杯露酒之后，便会弹着板都拉唱几曲乌克兰民歌。他也培养了我对乌克兰民间创作、历史和传说的兴趣，乌克兰事实上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楼的第四个住户，是合作社管委会主席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罗特斯坦。苏联当时还没有身份证，并且谁也没有料想到很快会有。何况许多人还记得，沙皇时期的身份制度是多么侮辱人。

当我们搬进房子之后，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只是将我们登记到

住户登记册，全部的手续就此结束。他是个非常客气的老头，非常乐意对各种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总是乐于助人。正是借助他的关照和善于交往，“快乐角落”合作社里总是一种相互帮助、关怀的友善气氛。合作社打算再建几栋房子，罗特斯坦甚至经常来找我父亲商量，比较这个或者那个方案的优劣。

我喜欢我们这个区在第聂伯河峭壁下美丽的公园：玛丽亚公园，沙皇花园，商人花园，符拉基米尔小山上绿色的山包，那里有俄国洗礼者符拉基米尔大公的青铜塑像和一个大十字架。这里，在一个玻璃穹顶的大圆房子里，有基督殉难地峨尔峨他的全景画。世纪初最好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基督生活和受绞刑的现实主义绘画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从以前读过的旧约中得到了景象，在这里变得有血有肉，引起心中的赞叹和皈依感。三十年代初，“峨尔峨他”楼被毁，巨幅的全景画也消失不见了。可是，也许这幅画没有遭到破坏？说不定它会被找到，这样现在的人们可以欣赏到这幅以巨大的力量再现了圣经传说的艺术品？

-----

我的补习老师乌伯先生

-----

我在乌伯先生家见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德国人的整洁与认真。

新建的体育场以乌克兰克格勃负责人的名字命名，过了不久，这位负责人却以“间谍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枪毙。

秋天快要到了，该考虑我上新学校的事情了。父母亲想让我继续学外语，刚好这里附近的几个街区很早就住的是德裔基辅人。德国人聚居的那条街道叫路德街（后来被改名为恩格斯街）。这条街上有一所七年制德语学校，全部课程用德语讲授，俄语和乌克兰语几乎成了外语。学校附近有一所路德教堂，乌伯先生，一个年迈而仪表优雅的德国人是教堂的管风琴手。他答应做我的补习老师：虽然我平常德语说得很流利，但这对专科学校的三年级还是不够。开学前的两个月，以及第一个学期里，我经常去乌伯夫妇一家，在那里沉浸于宗法式德国家庭的气氛之中。他们家里的整洁、擦洗得闪闪发亮的厨房和餐具，窗户上绣着花边的窗帘，男主人书房里打了蜡的橡木墙裙叫我赞叹不已。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受到富足。原来，乌伯先生并不是职业风琴手。他前不久刚退休，而在此前，甚至在革命前在一所德语中学教授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和文学。他对我很严格，但能够让我有兴趣，培养了对知识的兴趣。他有许多彩色图片，上面是德国各个城市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描绘着各地的人做各种事情：手工艺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等。这可是学习语言和扩充词汇的直观教材。

我特别记住了图片上莱茵河的风景，葡萄园，古老的城堡，风

景如画的渡口，有高高钟楼的小教堂等等。我每每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乌伯教授的图片，在我有机会亲自徜徉莱茵河畔之前，早早地给了我德国气氛的感觉。

除了语言之外，我的补习老师自己决定教我其他许多有用的东西：压制铜质材料，制作立体地图，木刻等。乌伯总是衣着正式：他穿着常礼服，雪白的衬衣，挺括的浆衣领，宽宽的领带上带着别针，上面镶着一颗珍珠，他喜欢抽雪茄。空的木质雪茄盒被我用来练习木刻。富杜克列耶夫街的哈默商店里，出售薄薄的铜片，上面用特制的小模子压制出各种图案，还有厚厚的硬纸板以及白色的纸浆板等。当立体地图上的地形凹凸成型之后，我用油彩描出白皑皑的山峰，绿色的山坡，黄色的沙漠等等……这些事情迷住了我，培养了我对绘画的兴趣。

我们家搬到里基辅之后不久，父母的朋友之中出现了一位非常和蔼和亲的小老头，父亲的芳香露酒让他着迷。但是，在喝醉之前，他表示愿意每次来都教我绘画。大家都叫他萨维里叔叔，是圣彼得堡的一个什么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是个很有希望的肖像画家。但是，他慢慢变成了一个酒鬼，住在玛丽亚和沙皇花园的小山包之间的一个歪歪斜斜的小木屋里。革命之前，这里曾经是大花房和一家法国餐厅。我小时候餐厅已经没有了，花房还在，四周飘着玫瑰和丁香的芬芳。花房的南端，就是萨维里叔叔的破屋子。他是个能人。不仅能漂亮地画出风景和肖像，还可以自己动手装配照相机，修复老式的钟表和老式小提琴。萨维里叔叔教给我绘画的基本

知识，这也成了我终生的嗜好。

三十年代初，萨维里叔叔突然消失了。当他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时，我们已经知道花房要关闭了，而附近的建筑物，包括萨维里叔叔的小屋，统统都要拆掉，那里要建设一个综合体育场，包括足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等等。另外还要建一座办公楼外带餐厅。

这对萨维里叔叔是最沉重的打击。那一天他喝了很多，咒骂了决定要建体育场的所有人，离开的时候心思重重，失神落魄。此后，再没有人见到过他。

而体育场建成了。它的主人，是代表安全机关的“迪拿莫”体育俱乐部。用乌克兰内务负责人巴里茨基的名字为体育场命名，他也是在花房旧址建设体育场的倡议者。可是，硕大的圆柱上，人民委员的名字并没能长久。很快，巴里茨基连同乌克兰其他领导人被捕，并作为“间谍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被枪毙了。

难道上天真的听到了萨维里叔叔的诅咒？……

经过我跟乌伯教授共同努力，我被录取到德语学校的三年级。这也是一所七年制学校，跟当时苏联其他的“劳动学校”一样，给青少年初等教育。但是，这里的气氛跟“布尔什维克”工厂附近的那所学校完全不同。大半孩子出自德国人家庭，其余的孩子则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按照社会构成来说，学生们的成分复杂。有工人、职员、科技人员、手工艺人和私人企业家的孩子。我们瞧不起一二年级的学生，但是，四年级的学生却是我们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  
斯大林与罗斯福(1)  
-----

当我在指定时间，收拾干净服装整洁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时，所有这些情况我并不知道。司令部所在的大楼，是沙皇时期留下来的。深色橡木的墙壁，铺着厚地毯的走廊，值班警卫的军容和礼貌，宽大的，挂满油画的参谋长办公室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到了特别的激动。内心里有某种预感，似乎我现在踏上了一条诱人而神秘之路。

从桌子后面站起了一个身材沉重、但很年轻的海军上校。他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伯格杰科。桌旁的椅子上，坐着工兵中校沃龙措夫。

“参谋长同志，红海军战士别列什科夫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我精神抖擞一口气说出来，举手抬向帽檐。

伯格杰科随便吩咐了一声“稍息”，请我坐下。然后拿起一个黄色文件夹，开始翻阅。“这里写着，您熟练掌握英语，”他开始说话，“是这样吗？”

“是！”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一一作了解释。

伯格杰科又开始翻阅文件夹。从军装口袋里抽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洒过香水的手绢，抹过上唇。然后问道：

“您能不能教英语？”

“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我的专业是工艺工程师。”

“这个我们知道，可是您总记得，是怎么教你们的吧？”

“记得。”

“这样的话，显然您可以教其他人了。”

“我从未教过，但是，如果您有命令，我试一试。”

“这就对了嘛。现在有一条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司令员，参谋长和工程处长必须学英语——大洋的另一边是美国。明白了？”

“明白了，海军上校同志。”

“我们想，让您给我们教英语。”

“是的。”我回答道。

“那我们谈谈细节问题吧。”沃龙措夫说。

我当时便得知，每次课为两个学时，每周上两次课。每个课时付给我 25 卢布。如果有必要另外备课的话，我的顶头上司会得到命令，给我时间去市立图书馆。

我几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了司令部。我边走边想，我的生活中真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不再完全依赖于军士长，此外还能小挣一笔：在红海军战士每月 12 卢布津贴之外，我还可以

再有额外的400卢布——真是太好了！

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备课。当然，熟练的英语知识，还有，我没有忘记是怎么教我的，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此外，我的学生也是非常认真。事情开始走上了正轨。过了不久，我买了一台“费德”牌照相机，它是捷尔任斯基劳改营的犯人们按照德国“莱卡”公司的许可制作的。这个一下子使我变得非常受人欢迎。我不断地重温，生活是美好的，令人惊异的。其他更好的事情想也不能想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过了不久，库兹涅佐夫上将被任命为苏联海军总司令，去了莫斯科。很快，伯格杰科和沃龙措夫也随他而去。新任领导眼下看来顾不上学英语。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没有表示兴趣。

我重新落到军士长的手里，他当然绝不放过机会，在我身上捞回老本，不断给我额外的活计。从前上班的日子又回来了，仅有偶尔一次去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岛公干，才会有新鲜感觉。有时，在休息日，我们会到“十九公里”去，彼得大帝湾，这里天气转暖开始游泳。

国际局势迅速恶化。远东地区，日本的挑衅从未停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有关新的义务兵役期的命令颁布了。取消了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优待办法。另外，海军的服役期也延长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当五年的红海军战士。我感到灰心丧气。别里亚耶夫和艾尔里赫曼申请编入正规军干部序列。这样，他们会自动被授予军衔，以及相应的物质待遇。但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我。我在等待着……

八月底，来了一封电报。我被紧急召往莫斯科的海军总司令部。

-----  
斯大林与罗斯福(2)  
-----

波兰被西方和斯大林当作了一个缓冲地带，双方都在争取对波兰的控制权。

波兰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的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按照当时莫斯科的解释，苏联的立场整体而言是很明智的。斯大林多次声明，乐于看到复兴之后的波兰成为一个强大、独立、民主、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同时，他坚持承认 1939 年新的苏波边界，跟协约国 1919 年提出的“寇松线”大致相当。在这些条件下，莫斯科同意跟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丘吉尔在德黑兰提出的建议也大致类似。他提交给斯大林和罗斯福审议的表述如下：“原则上确认，波兰人民和国家的中心应该位于所谓的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本省。”

苏方支持了丘吉尔的建议。至于罗斯福，他原则上同意上述划

线，但警告说，在1944年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之前，考虑到波兰裔选民的反应，他将避免任何公开的谈话。两位西方领导人也理解苏联政府让波兰作自己友好邻邦的愿望。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立场消极，事情毫无进展。然而，到1944年夏天，出现了达成协议的可能。在跟美国大使哈里曼的一次谈话中，莫洛托夫提出了新的妥协方案，为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其内容是，由居住在英国、美国、苏联——没有法西斯色彩（以及实际上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中）、对苏联友好的波兰人组建政府。作为这样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的成员，他提到了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过学的兰格博士，领导过美国斯拉夫大会的工会领袖科尔瑞斯基等人。米克拉伊丘克可以留任这个政府的总理。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给奥斯卡·兰格颁发了前往苏联的护照，他在那里应该参与讨论波兰问题，而讨论则应在丘吉尔和米克拉伊丘克前来莫斯科之时安排进行。

然而，在前往苏联之前，米克拉伊丘克决定访问华盛顿。见到罗斯福之后，他问道，波兰人应不应该接受苏联的方案。于是这里出了一桩怪事。前不久还在德黑兰同意了丘吉尔有关“寇松线”边界表述的罗斯福总统，却要米克拉伊丘克“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紧接着，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坦梯纽斯给波兰人解释说，目前，美国无法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回到自己基本道德原则上来，届时可以强有力地并富有成效地支持波兰”。

美国政府如此出人意料的转变，帮了波兰倒忙。在华盛顿取得的教导鼓舞了波兰流亡政府。米克拉伊丘克对奥斯卡·兰格达成协议的理由听也不要听。他决定不达成任何协议。而流亡活动家避开苏联政府准备的、未能成功的华沙起义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对我而言，迄今仍然不清楚，白宫建议米克拉伊丘克回避协议时，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似乎跟大选的考虑有关，因为，大选之后，华盛顿对波兰问题的兴趣明显减弱。就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谈判期间，米克拉伊丘克打电报给罗斯福，请求支持流亡政府的立场。直到11月7日，也就是总统大选结束之后，他才得到答复，并且也不是他所期待的内容。总统冷淡地回答说，他支持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达成的任何协议。有关边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提起，但是，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的“强硬”立场却被透露给媒体，于是美籍波兰人投了罗斯福的票。

当然，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1944年莫斯科谈判结局积极的情况下，事件会如何发展。同样不能排除的是，如果有关各方当时得以达成协议，由米克拉伊丘克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流亡政府便可以在苏军解放华沙之后，从伦敦迁回来，并且波兰人民可以避免许多动荡和牺牲，同时盟国之间的关系会少许多戏剧性。

-----

斯大林与罗斯福(3)

-----

罗斯福总统多次警告斯大林日本将进攻苏联，结果这些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因此强化了斯大林对罗斯福的疑心。

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没有把日本即将进攻珍珠港的情报转交给美方。

在回绝了斯大林关于派遣美军到苏德前线作战的建议之后，罗斯福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对与苏联合作对付日本表现出兴趣。1941 年秋，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一封信，其中指出，根据美国政府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情报，日本打算在近期进攻苏联滨海地区。因此，罗斯福建议斯大林讨论有关在远东地区建立美国空军基地的问题。总统想了解，苏联领导人对于一个美国特别军事使团前往莫斯科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有何看法。同时，罗斯福还建议通过阿拉斯加和楚克奇向红军转运美制飞机。

美国有关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相当准确的。况且，柏林向东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促使日本政府加入对苏联的战争。这个问题也使斯大林感到担忧。但是，总统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怀疑。关键在于，苏联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的情报对局势有不同的说法，这渠道其中也包括苏联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驻东京，并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报告的副本是上报给莫洛托夫的，因此，很自然地，我在向人

民委员报告之前阅读过。报告的内容是，在东京的领导层内部，在选择主攻方向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有一批人主张在苏联远东展开军事行动，另外一批人则坚持打击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向东南亚方向推进。在最后的几封电报中，佐尔格报告说，天平向南方倾斜。最近，用拉姆扎伊为绰号署名的密码电报中，他报告说，必须等待对美国的打击，因此，起码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莫斯科可以不必担心日本的进攻。这使得斯大林将部分部队从远东抽调到莫斯科地区。1941年12月初，这些部队参加了首都保卫战，而在莫斯科，德国人第一次遭到了惨败。

在某一封电报中，拉姆扎伊更详细地报告了日本人的计划。他指出，日军很可能会打击美军在夏威夷群岛上的海军基地。这个情报上报给斯大林时，正当罗斯福总统仍在坚持警告苏联领导人，日本可能对滨海地区发动进攻。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没有将理查德·佐尔格的情报转送给罗斯福。为什么？可能，他以为，罗斯福会将这个情报看作是斯大林企图挑拨华盛顿参战，恰如斯大林将罗斯福的警告看作是白宫企图将克里姆林宫拖入对日作战。但我觉得，斯大林多半出于其他的考虑。他认为，日本的攻击越是突然，越是阴险，破坏越大，美国人民对法西斯“轴心”作战便会越凶猛。

调兵到苏德前线，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是个十分艰难的决策。他们被迫冒险。在这种局面下，罗斯福的警告以及共同对日采取行动的建議更需要小心对待。罗斯福警告莫斯科滨海地区即将可能受到威胁的努力是真诚的吗？或者是，当知道了日本即将打击美国领土

之后，罗斯福想利用俄美在远东地区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协议，以便使日本的计划改为北方？斯大林的多疑，使得他得出一个结论，正如在与德国作战的情形一样，罗斯福希望避开日本的打击，并将其转移到苏联身上。也许，这样设想美国总统的动机根本就不公平，但斯大林已经得出了结论。他拒绝了罗斯福总统有关在滨海地区为美军轰炸机准备基地的建议。斯大林同意美国特别军事使团来莫斯科，但却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如何将美方向苏联提供的歼击机投送到苏德前线这一个问题上。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斯大林得出结论，他正确地评估了罗斯福信函的实质意义。有趣的是，此后罗斯福数次警告斯大林似乎日本人正在准备攻击苏联。譬如，1942年6月17日，新任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斯坦利向斯大林转交了总统的亲笔信，其中称，太平洋北部，以及阿拉斯加地区局势的发展，不能排除日本对苏联滨海地区采取行动的可能。“如果发生类似的入侵，”信中说，“那么美国愿意使用空军对苏联进行援助，条件是苏联向美空军在西伯利亚地区提供合适的着陆场，当然，为加快行动的实施，必须认真协调苏联和美国的努力……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因此有理由授权给苏美双方的代表开始工作并拟定专门的计划。”

这封信也使斯大林警觉。他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并对美国大使解释说，当苏德前线仍在激战，德国师团向伏尔加和高加索高原推进之时，苏联政府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以避免增加与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显然，在得到此次交换意见的信息之后，罗斯福明白了，他无法推动莫斯科采取真的会使苏联远东局势复杂化的步骤。无论如何，8月5日，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信件，其中说，“我得到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可信的资料，即日本政府决定，目前将不采取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如我所见，这表示，在明年春天之前，对西伯利亚进攻的已被推迟。”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不断询问，苏方何时可以加入美国对日本的战斗。并且，莫斯科哪怕是在原则上何时可以决定参战的问题。

斯大林很长时间没有对这些问题作任何答复。但是，在美国国务卿赫尔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做出决定，时间到了，可以使局势明朗化了。

1943年10月30日晚，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厅，斯大林为祝贺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工作结束举行了宴会。最长的一张桌子沿着一面墙，这边的窗户正对着莫斯科河。斯大林居中，他的右首是赫尔，左首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我作为译员坐在赫尔的右首。

宴会以许多人的祝酒词开场，其中大多数时间是斯大林在祝酒。在讲话的间隙，斯大林与赫尔谈的基本上是战争前线的局势，以及刚结束的这次会议的成果。时不时会说一些长句子，这样，我也来得及吃几口饭。

突然，我发现，斯大林在赫尔背后弯下身子朝着我，用一只手

指示我。我弯下身子，离他近些。这时，他压低声音说道：

“仔细听我说。给赫尔翻译如下内容：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且做出决定，在盟军打败德国，欧洲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对日作战。让赫尔将这个情况作为我方正式立场转告给罗斯福总统。但是，我们暂时想保密。所以，您自己小声说，不要让别人听见。明白了？”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我小声回答说。

这个消息使赫尔万分激动。美国人早就在期待着莫斯科的决策。现在，美国政府获得了对华盛顿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权威声明。白宫将苏联对日参战与保存百万美军士兵生命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在 1945 年波茨坦会议期间也曾经使杜鲁门总统十分感兴趣。在得到斯大林确认苏联对日作战之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如此一来，他达到了会前给自己立下的最主要目标，并且他考虑的是，现在美国青年的生命可以保存。

为什么斯大林在 1943 年 10 月初次将这个决定告诉美国人？我想，这里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和德军在库尔斯克大败之后，红军飞速向西方推进。因此，甚至即便日本人得知了苏联的决定，其在滨海地区先发制人采取行动的 danger 微乎其微；其二，将对日作战的日期与战胜德国的日期联系起来，斯大林让华盛顿明白，在法国登陆越早，加速战胜“第三帝国”，苏联也就能够早日加入对日本作战。可以认为，正是这一点促使西方盟国做出了在法国登陆的决定。

-----  
斯大林与罗斯福(4)  
-----

“曼哈顿工程”伊始，苏联便掌握了相关的情报。但美英领导人却决意独霸原子弹的“秘密”。

这不能不使莫斯科感到威胁。“冷战”缘此而起。

虽然在杜鲁门总统时期，原子弹才成为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其制造过程中，这个武器甚至在未经试验之前，已经对罗斯福总统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并且间接地在美国制定战后政策，其中也包括对苏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性，首先使从事建造工作的科学家们感到担忧。他们就原子弹出现的危险后果多次提出警告。然而，美国与英国的最高领导人最初显然认为，这只不过是新型且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而已。他们忽略了核弹制造者的警示，正如此后萨哈罗夫院士对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警告被忽略如出一辙。尤其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恼火的，是科学家们要求向苏联公开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当然，在历史上，某个国家与别国分享新式武器资料的事情，从来不曾有过。相反，任何类似的发明都被严加保密。但这里却是

一种特殊情形。首先，核弹是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制造的，当时盟国之间广泛地交流军事情报和新式武器。雷达，复杂的通讯系统，导弹技术，新式坦克，飞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似乎是共同的财产。为什么原子弹是个例外？其次，不仅是美国，而且有英国，也就是联盟的两个重要成员，知道建造核弹的工作，对第三方伙伴隐瞒，便是不祥之兆。其三，科学家们十分清楚的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武器。它的建造需要全新的方法，实际上，是全新的世界观。但是，这些新的观点在那种情况下能否产生呢？未必。因为过了几乎多半个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才开始打通道路。

虽然，由于保守原子弹的秘密，华盛顿和伦敦感到不自在，但依然决定不听从“幼稚”科学家的劝说。与战后对苏联态度有关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立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决定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所有这些，不仅仅关涉战时美国外交，而且涉及战后时期，同样也涉及“冷战”产生的原因。

我想，关键在于，当时美英领导人有这样一种信心：即核垄断将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从别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苏联，争取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让步。

这一点，从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对自己的任务如何理解这一点，也反映了出来：“从我开始负责这个工程之初过了两周之后，我已经确信无疑，即俄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曼哈顿工程是

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我完全不赞同国内流行的，什么苏联是英勇盟友的观点……当然，对此多次向总统做过汇报。”

那又如何？最高统帅并未宣布不同意自己的下属。

1943 年夏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协议指出，原子弹是“战后世界上决定性的因素，并且赋予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以绝对控制力”。总统与首相承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任何资料。

必须提到的是，魁北克会晤，是为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以及“三巨头”首次德黑兰会晤做准备的期间举行的。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谈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几个大国维持和平的责任。在德黑兰，在与斯大林谈话时，罗斯福总统多次指出了战胜法西斯之后，作为维持和平，保障世界安全决定性因素的美苏合作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曼哈顿工程的背景下。罗斯福谈论到了有义务维持全面和平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但是，总统却避而不谈，这四个警察之中，其中仅有两个将拥有原子弹。

早在这个阶段，华盛顿和伦敦已经采取措施，封锁其他国家获得裂变材料的途径。1944 年 6 月 13 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了监护宣言，其中指出，美国与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将合作以期建立对现有铀以及钍的储存的监督。接着，宣布了两国政府的意图，即“在各自司法管辖地区的疆界之内，以及其他两国政府、印度和缅甸自治政府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内，尽可能全面地监督铀及钍矿石的供

应”。

丹麦物理学家尼斯·波尔——美国原子弹的建造者之一——于1944年采取最后一次尝试说服罗斯福总统，有必要向莫斯科通报有关制造新武器的工作。然而，9月中在自己的庄园海德园会见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一起确认不改变保密规定的决定。此外，两位领导人得出结论，即“不能信任波尔”。1944年9月19日签署的文件中，最后一段写道：“必须调查波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以免通过他发生泄漏情报，尤其是泄漏给俄国人。”至于波尔建议的实质，在这份文件的第一段有明确的回答：“建议让全世界（实际上是苏联——作者注）知道合金（原子弹的代号——作者注），以签署对合金，以及使用进行国际监督的协议，是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应该严格保密。”

在里瓦迪亚，1945年2月三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期间，罗斯福曾经询问丘吉尔，是否应该在此次会晤期间将曼哈顿工程的情况通报给斯大林。丘吉尔坚决反对，称这种建议“有伤体面”。罗斯福再也没有坚持。这样，为战后与苏联合作建立更加良好气氛的最后一次机会被错过了。

还必须补充的是，苏联领导人在曼哈顿工程的早期阶段，就从自己的谍报人员处获得了情报。也许，斯大林应该通报罗斯福，曼哈顿工程对他并不是秘密。应该认为，这也许会使我们的盟友困窘。但也许有可能促使他们讨论对原子弹以及原子能进行共同监督的问题。

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对美国人而言意义重大。美军正在太平洋地区苦战。盟军在西欧的局面也不轻松。雅尔塔会晤前夕，他们甚至请求斯大林提前开始苏军新攻势，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当时情况下，与苏联对抗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美国和社会舆论强烈倾向于保存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罗斯福能够依赖这些情绪，对付极右势力的压力。

西方盟国的沉默，被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威胁。他委派贝利亚负责建造苏联核武器的工作。核军备竞赛便是这样开始的。同时，斯大林的怀疑，以及“他对战后可能合作的疑虑”进一步强化了。

-----  
马歇尔将军与俄国飞行员(1)  
-----

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高级军官教授英语，这个简短的经历，后来直接把我送到了斯大林的身边：当时国内外语人才奇缺。

一般苏联人对1939年8月23日与希特勒德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与纳粹的协议使人感到有伤体面。从极端敌视到合作这个急转弯，由于多年的反法西斯宣传，在我们的意识里不能接受。

另一方面，不管这有多么离奇，与德国哪怕是短时期的关系正常化，也使人们感到轻松。战争的威胁如箭在弦上，西方民主国家对我们态度冷淡，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我们充满敌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武装挑衅，所有这些产生了孤立无援、不祥的隔绝之感，兆示着新的牺牲和苦难。

消除法西斯进攻的直接威胁，使许多人产生了希望，即我国哪怕在短时间内可以置身战争之外。现在，当希特勒将自己凶残的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时，我们似乎可以指望，和平的喘息会继续下去。如果德国在西方开战，而且大家都认为，战争将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而我们将置身事外。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法国在几周之内即被打败，并且到1940年夏天时，几乎整个西欧都处在纳粹的统治之下。

此外，我国——当时惟一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可以获得不少好处。在互不侵犯协议签署前几天达成的苏德贸易协定，规定了向苏联供应现代设备和新技术，这对我们海军而言也是有好处的。正是这个情况，在我的命运中起了作用，把我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普通一兵推到了斯大林政权金字塔的最顶层。

当时，需要懂德语的人才。从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期，我的“学生”之中有人推荐了我——于是，我被召到了莫斯科。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深夜抵达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这里挤满了转车的乘客。长椅上挤着大人和小孩。单身旅客则头枕着简单的行李睡在地板上。我费了很大劲，才在一个候车室找到了小角落，我安

顿下来过夜：铺开一张报纸作床单，装行李的包袱则作了枕头。当时，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

在石板地上睡觉当然不很舒服。此外，还得操心——被人偷走了写着“太平洋舰队”字样的无檐帽，或者从脚上脱走了公家发的皮靴。并且，心里一直还在想着，在首都会有什么事等着我，干吗叫我到这儿来。

一大早，掸去灰尘，在站前盥洗室匆匆刮过脸，便出发前往果戈里路的海军人民委员部。我用自动电话上拨了预先给我的号码，然后在门卫室等待。过了大约 10 分钟，大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位打扮非常利落、身穿海军中校军服的中年男子。我飞快地站起来，行了礼：

“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

“稍息。”一个悦耳的低音打断了我。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感觉到，现在应该决定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坐下来，我们谈一谈……”

此人和蔼可亲的语调，客气的举止消除了我内心的紧张。我们在一张小桌子边上坐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跟我谈话的，是叶里扎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扎伊采夫，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且因为战功卓著被授予当时非常稀罕的红旗勋章。在卫国战争期间，扎伊采夫海军中校是海军人民委员部外事局的局长，所以，很自然地，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贝利亚指控扎伊采夫为英国间谍，并将他投

入监狱。党的二十大之后才得以出狱，其时他已经疾病缠身，精神崩溃。

扎伊采夫用赞许的语调询问了我在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情况。我告诉他，入伍之前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在哪儿学的外语。当得知我如何过了一夜之后，他说，在距离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警卫宿舍给我留了一个床位。他并解释说，有关我的具体任务，将在最近几天定下来，并建议我利用空余时间熟悉莫斯科。他当即给了我临时证件，这也是宿舍和海军总部的通行证，我可以在水兵食堂吃饭。很快，扎伊采夫再次叫我过去。这次，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里面的装饰是各种军舰的模型。这里我得知，我被借调到海军总部作外勤。

扎伊采夫接着介绍说，他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决定带我一起去。这次，扎伊采夫身着便装。他解释说，有时要执行一些任务，军装不方便。并且，现在我们两个都必须穿便衣。

“您当然没有合适的衣服了。”他半是询问，半是肯定地说道。

“是的，海军中校同志！”

“干嘛要这么正式！您必须习惯老百姓的角色。请按照名字父称称呼我。”

“是，叶里扎尔·亚历山大洛维奇。”

“这不，这样就好多了。并且可以不必说是。现在我们来办理您的装备。”扎伊采夫叫了车，于是我们出发去特种服装仓库。

扎伊采夫为我挑选了一套蓝色条纹西装，半打白色和浅蓝色的

衬衣，几套内衣，手绢，袜子，黑皮鞋和一只不大的皮手提箱。所有这些~~都是~~外国货。

“明天晚上，”扎伊采夫说，“我们将要乘坐红箭去列宁格勒。您必须穿上便服，习惯新服装，带上箱子，22 点整到海军人民委员部。”

-----

马歇尔将军与俄国飞行员(2)

-----

斯大林愿意为希特勒提供任何方便，而“不来梅号”，便是这样一个机会。这也是我调到莫斯科之后，第一次执行秘密任务。

火车上，我们在“国际车厢”的一间双人包厢里。我以为，扎伊采夫一边喝茶，一边会告诉我任务的内容。但是，他只是讲了讲巴黎的事，然后就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给了我几个建议。我谢过之后，补充说，1934 到 1935 年间，我在基辅“国旅”做导游，这方面有一点经验。

“我知道，”扎伊采夫说，“所以我带上了您。”

从谈话之中，仅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见外国人。

在列宁格勒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海军上校纳乌姆·所罗门诺

维奇·符卢姆金接待了我们。他大致介绍了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后的局势，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为保障苏联海上边境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在接下来跟符卢姆金的谈话之中，我大致弄清楚了出差的目的。原来，一艘德国客轮“不来梅”号应该抵达摩尔曼斯克港。这艘船经营着汉堡—美国航线，并且恰好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抵达纽约。

“不来梅”号，以及同类型另外一艘船——“欧罗巴”号——是当时最先进，最舒适的客轮，跟英法的客轮成功竞争。当时，内燃机船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

英法对德国宣战之后，英国当局请求美国扣留“不来梅”号抵债。港口方面通知“不来梅”号船长阿列斯，称他的船被扣押了。但是，阿列斯船长却利用了美国人的疏忽大意。夜里，“不来梅”号悄悄离开了码头，驶出哈德逊湾，消失在大西洋中。英国人组织了追捕，但白费力气。后来才发现，“不来梅”号驶向北方，在浓雾之中幸运地避开了冰山，小心翼翼地沿着极圈行驶，到达苏联的领海。在接近莫尔曼斯克时，阿列斯船长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与柏林联系上了。柏林向莫斯科求援，并很快获准让德国班轮停靠苏联港口。

当“不来梅”号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我们跟扎伊采夫、摩尔曼斯克港口负责人以及地方政府的代表已经在栈桥上等候着。排水量三万四千吨、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湾的庞然大物，停歇在锚地。我们乘快艇跟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代表赫尔瓦特女士一起来到船舷边。舷梯放下来了，我们登上了主甲板。

阿列斯船长对摩尔曼斯克港提供了躲避的机会表示感谢，用桶装冒着泡沫的啤酒、可口的灌肠和腌白菜招待我们，然后安排参观客轮。豪华的餐厅，音乐厅，吸烟室，游泳池，带着一排排躺椅的露天和封闭的甲板，运动场，以及设施齐全，装修典雅的客房—这些舒适说明了对旅客特别的关心。但是，船上并没有旅客。可是，船员几乎有一千人。在为准备后送办理手续期间，船员们留在船上。晚上，快艇将“不来梅”号的船员送上岸，这样，他们可以在摩尔曼斯克的国际俱乐部消磨时间。类似的俱乐部几乎在苏联各个港口都有。

我们也去过几次摩尔曼斯克国际俱乐部。那里的气氛非常有意思。国际俱乐部的常客，是进入摩尔曼斯克的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等国船上的海员。虽然俱乐部里有一个小型阅览室，里面的桌上放着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苏联建设》等杂志，以及“国旅”的广告小册子，主要的娱乐是喝酒、跳舞。举止放肆的当地女郎点缀其间。打架的事也经常发生，这时，经常在俱乐部执勤的海军纠察队便会礼貌但坚决地将打架者分开。造访俱乐部，可以有机会结识海员，跟他们喝啤酒聊天。对于掌握德语英国的我来说，开始这种话头毫无困难。任何一个海员都会讲其中的一种语言。我也帮助不懂外语的扎伊采夫在俱乐部聊天。中立国对战争的态度，海员们可能掌握的情况，英法对德采取积极军事行动的准备等等，他都感兴趣。每次回到旅馆之后，他都会将所有这些仔细地记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

终于有一天，在栈桥上出现了两列硬卧专列。其时，德国海员名单已经拟定，旅行证件也办理妥当。除了船长阿列斯，他的两个大副，以及一小批轮机工和海员之外，其他所有人都离开了“不来梅”号。后送的海员被安排在各个车厢里，此后，两个专列分别出发了。扎伊采夫委派我将德国海员送到边界，自己则回了莫斯科。我乘坐第二辆专列，帮助车长跟德国人交流，并且自己也努力作个殷勤的主人。我从一个车厢转到另一个车厢，询问身体情况，排解餐车里的误会，于是一路上跟许多海员交了朋友。这种交流，也是很好的语言实践。

“不来梅”号直到十二月中留在摩尔曼斯克，后来，在极夜的掩护下沿着中立国挪威的海岸驶往德国领海，并且回到了自己的注册港——汉堡。在这里，这艘船被改装为浮动医院，但它作为医院船服役的时间很短。不久，它便被英国空军击沉。

在摩尔曼斯克掩护“不来梅”号是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后，苏方向德国提供的第一次重要帮助。总体而言，与苏联改善关系，使希特勒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

在太平洋舰队(1)

-----

斯大林需要知道对手的一切，甚至连丘吉尔丢弃在垃圾筐里的废字条也不愿放弃。

这里讲述了 1945 年三巨头会晤期间的一桩趣事。

英国工党政府外相与斯大林在厕所的有色笑话。

1945 年 2 月 4—11 日之间，在克里木举行的“三巨头”第二次会晤，标志着反法西斯联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将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也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新姆菲罗波尔附近的沙卡机场乘车前往雅尔塔，也使总统亲眼看见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占领的苏联土地上破坏的规模。我觉得，当时他非常诚恳地对斯大林说，他对纳粹分子变得“更加残忍”了。总统还强调说，胜利之后，美国应该首先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如果罗斯福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就会向我们提供美国设备，美国专家会帮助我们掌握新机器，而两国的关系也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并且，当时在里瓦地亚，与斯大林单独会谈时，罗斯福总统继续谈到了未来的计划，他似乎是从苏美战后可能合作出发的。斯大林同样对这种可能表示了欢迎。

整体而言，雅尔塔会议的气氛是良好的，这也促成了在日程的各个问题上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接近结束，联盟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出现。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罗斯福多次指出，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反对美国与苏联战后合作的力量也会活跃起来。因此，总统一直在推进战后建设的设想，加快了制定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行动原则。

当时，三位领导人一致声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三大国的一致，保障三国共同维护持久和平的机制。

他们是否相信了这种可能？或者他们郑重宣布的目标跟他们的真实想法远非一致？

斯大林满心疑虑地接受了英国人提出，并得到美国人支持的、新的国际组织安理会投票规则的表述。他坚持保留“否决”权，于是，雅尔塔会议之后，就互相可以接受的程序达成了协议，苏方将此看作华盛顿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在战后发展关系的迹象。

有关雅尔塔会议，现在已经写了很多。那里讨论过的问题，以及做出的决定，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是，在雅尔塔似乎发生了对欧洲的分割。这完全不对。当时谈的是对德国的分割。并且，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坚持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小国家，而在这一次态度则相当软化。

苏方对分裂德国设想的现实性表示了怀疑。结果是，在雅尔塔决定，将此问题转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此后，这个问题从议程撤掉了。至于其他的东欧国家，除了此前提到的波兰问题之外，在划分势力范围这个意义上根本就没有谈到过。

有关领土问题只是决定把盖尼科斯别尔克以及东普鲁士与此接壤的地区转交给苏联，另外达成协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条件的，把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交还苏联。

有趣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两位都把这次会议当成是权力平等的典范。罗斯

福总统说它是美国历史中，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宣布说此次会见应该勾画出单方面行动，封闭性联盟，实施影响的范围体系的轮廓。总统还讲到，所有这一切将被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所代替，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能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

我认为，雅尔塔的经验，当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所建立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在处理国际事务以及苏美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能够引起巨大变化并朝好的方向发展。显然，雅尔塔开辟了通往这一切的道路。不管怎么说，莫斯科是这么感觉得。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三巨头”会议上气氛异常紧张。但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像我此前提到的那样，作为翻译不仅要口头翻译领袖之间的交谈和主席团会议的争论。还要编纂所有会议和会面的备忘录，准备起草发给莫斯科政治局成员和驻华盛顿、伦敦大使的电报文稿。此外还要负责翻译代表团之间交换的备忘录和留言。有时忙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德黑兰会议期间，有一次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和丘吉尔进便餐。那时翻译的位置不像现在是在领导人背后，而是在桌旁第一排。服务生给翻译的盘中上了所有异常讲究的饭菜。那一天我没来得及吃早饭，加之前一天晚饭也没吃，所以非常饿，但仍然顾不得吃，老是忙于翻译席间的闲聊。但当一份最好吃的菜上了之后，我不能自制，趁没人说话，赶快切了一大块，很快塞到嘴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要问丘吉尔问题。我既不能吞下，也不

能再把它吐回到盘子里，只是哼哼唧唧地说了些什么。

斯大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严厉地盯着我低声埋怨道：“你怎么搞的，难道是让你来这儿吃饭的吗？你在这儿是翻译，是工作来的。真不像话！……”好在罗斯福、丘吉尔对此反应很诙谐。两个人大笑了起来。斯大林跟着也笑了，这下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从此之后在正式宴会上我再也不敢吃东西了。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有这么一件事。当激烈辩论有关开辟第二战线的问题时，许多人都发现，艾登给丘吉尔写了一个小纸条。首相读了纸条，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又交给了艾登。后者读了丘吉尔的纸条，把纸揉成一团，扔到了旁边的废纸篓里。会议结束，与会者都散去了，斯大林让我搞到那个纸条并向他汇报，纸条上写的什么。显然，他认为纸条上所写的会涉及英国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我和斯大林保安部队的一名军官一起找到了那张纸条，并迅速拿着纸条去找斯大林，当时他跟莫洛托夫一起在使馆的花园里散步。我打开纸条，读了出来：“温斯顿，您裤子的拉链开了。”接下来是丘吉尔的手笔：“谢谢。老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的。”斯大林乐坏了。1945年夏天，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失利。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了他的职务。和他一起前来波茨坦的新任英国外相，英国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恩内斯特·贝文。有一次在洗手间（有时翻译也要陪同自己的上司去洗手间），贝文站在离斯大林的小便池不远，开玩笑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公厕是惟一地方，只有在这里劳动人民才能够用双手掌握到生产资料。”斯大林狡猾地笑了一下，也开玩笑道：“在社会主义

世界也一样。”

我和扎伊采夫到摩尔曼斯克出差的报告得到了海军总部的批准。接着，我又有新任务——去基辅，归第聂伯军区舰队调遣。

能够到基辅，真是让人高兴。已经有一年多我没有去那儿了，而现在可以见到父母，跟朋友们重聚。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按照命令的规定，我不能见任何人，必须立即赶到舰队司令部，那里会给我详细的说明。此外，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我也必须穿相应的服装。此次我应该身穿海军军服，但不是我在舰队服役时的红海军战士服装，而是海军上尉军服。连同制服一起发给我的证件上写着海军上尉。不过，有人立即告诉我，军衔仅仅是此次出差期间有效。

火车于清晨到达基辅。站前广场上空荡荡的。我看见了如此熟悉的车站大楼的正门，是现代乌克兰巴洛克风格，于三十年代建成。下着雨，感觉很冷。接送外国游客时，我到过这儿多少次啊！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僻巷，每个通往站台的过道。并且，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阳光明媚的夏日，鲜艳的黄色无棚大客车，衣着鲜亮而快活的少男少女们来到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

一台淡绿色“嘎斯”开了过来，帆布顶棚被雨水淋成黑色，于是，无忧无虑的1935年夏天的景象消失了。我坐在后座上，竖起风衣的领子，将帽子压低，以免有人认出来。

位于波多拉的司令部在等着我。他们向我通报了出差的目的。两天前，舰队沿第聂伯河逆流而上，然后抵达普里毕亚蒂的波兰边

界。而我们——一小批水兵，其中也包括我——几个小时之后，也应该乘快艇沿着同样的路线进发。

-----  
在太平洋舰队(2)  
-----

9月17日，连同其他红军部队，我们越过了苏波边境，并向宾斯克方向进发准备参加占领这个城市。

在拿给我们看的秘密文件中介绍说，红军执行苏联政府的命令，应该保护居住在波兰东部各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居民。对我们解释说，虽然红军陆军部队和海军在前波兰领土上是解放者，他们必须坚决镇压波兰白匪的任何抵抗。文件中最后指出，苏军的前锋部队，本着与德国新关系的精神，将与德军部队在相应的战地地图上所表示的界线战友般相遇。

对我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我国会成为希特勒德国打击波兰的军事行动的同谋。不过现在清楚了，为何派我参加这次行动。原来在某个预先协商好的界线上，我军与德军将有“战友式”的相会，于是再次用到了我的德语。而且，此次出差的秘密气氛现在也可以理解了。

早在9月17日拂晓之前，第聂伯区舰队的海军重炮海防艇和快艇逆流而上，抵达普里毕亚蒂，并越过了边境。由于没有意料到我军入侵，波兰边防军首先开了火，但很快被舰队的炮火压制住。此后，与受德军逼攻向东撤退的波兰部队有过几次交火。但是，波军的抵抗没有组织，十分软弱。并且，我方的传单和无线电广播宣称，投降者将会得到和平、善待并被很快放回家。实际上，大多数波兰俘虏未能与家人团聚，而进了集中营，其中许多人遭贝利亚的刽子手屠杀。

如果不算几个轻伤的话，我军几乎毫无损失便到达宾斯克。在往前走，河水太浅，只能使用小型快艇。并且，距离我军应该与德国人汇合的界线，仅剩下了几公里。

这次汇合就像是“战友”相会。我军和德军指挥员相互道贺，为各自的“领袖”干杯。行动结束之后，在宾斯克、布列斯特等其他地方苏德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红军和德军将领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的检阅了部队。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指示，这种事便绝不可能发生。毫无疑问，苏德两国政府预先就波兰领土上的分界线达成了协议，并且很可能这个协议是在希特勒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期间达成的。

在二战开始五十周年之际，围绕着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件如何评价，展开了激烈争论。

关于希特勒与斯大林“分割波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两个独裁者“不道德阴谋”的文章连篇累牍。但是，作为1939年

秋天事件的见证者，我无法忘却那些日子里，充斥着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气氛。所到之处，人们用鲜花、面包和盐的欢迎我们，拿出水果、牛奶来慰劳我们。一些小型私人咖啡厅免费招待苏军军官。那些感情绝不是装出来的。人们认为红军可以保护他们免遭希特勒的迫害。在波罗的海沿岸，情况也类似这样。许多人逃离了德军占领区，到红军控制区寻求庇护。

-----  
在太平洋舰队(3)  
-----

里根总统的助理帕布斯坚决反苏，但是，当年他们一家人是难民。而我曾经帮助过他们。时隔多年，我们在一个著名学府的研讨会上唇枪舌剑！

记得是在八十年代，有一次，在波士顿附近的威斯利学院举办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我应邀发言。我的辩论对手，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帕布斯教授，后来他做过里根总统的助理。

在论坛上就美苏关系问题发言的邀请，是该校主持俄国中世纪史，其中包括伊凡雷帝时期历史的尼娜·图曼金娜教授发来的。据尼娜后来向我介绍，她出身于彼得堡的大工厂主家族，拥有几家通心

粉工厂，并以属于“皇室供应商”而自豪。但主要的收入，却来自垄断了俄军通心粉和其他面制品的供应。革命之后，图曼金家族移民国外，尼娜出生在美国。“五十年代，当我第一次到苏联，来列宁格勒大学就读时，”尼娜回忆说，“马上按我手里的地址去寻找，想看一看家族的工厂是什么样子。跟我熟悉的照片相比，外观上基本上是老样子，只是年久失修的主楼大门上面挂着一个新招牌‘红色通心粉工厂’。父母告诉我，我们的产品享有盛誉。不过，学生食堂里我吃过的通心粉味道蛮不错的……”

尼娜邀请帕布斯，则因为早先听过他关于伊凡雷帝时期的课程。

讨论之后，安排了晚餐，我跟自己辩论对手的妻子坐同一张桌子。跟帕布斯夫人的谈话最初彬彬有礼。然后，我们说起了论坛的题目，这里，我从她那里听到了出乎意外的一句话。她对自己丈夫谈到苏联时措辞尖刻表示了遗憾。我对她说，由于熟悉帕布斯教授的观点，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我总是感到不自在。”帕布斯夫人坚持说。“这是为何？”这个坦白真使我非常吃惊。

她解释说：

“我一直非常感谢红军，1939 年救了我父母一命。当时，我还很小。我们住在华沙，所以当德国入侵波兰时，逃往了东部，到了宾斯克，白俄罗斯西部的红军控制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的官兵对我们及其他难民有多么好。给我们饭吃，安排住宿。然后，苏

联政府帮助我们转道维尔纽斯——当时的立陶宛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父母跟美国的亲戚通了信。这样，我们到了这边。如果不是红军，我们就完蛋了。留在华沙的所有亲戚，都被纳粹分子屠杀在犹太人区。里查德也是通过波罗的海国家逃出波兰的，但是，他不喜欢回忆这些……”

当时，在宾斯克等其他地方，我们的确帮助许多人逃离纳粹虎口。由于掌握几门外语，我被留在西乌克兰从事难民事务，在利沃夫他们人数非常之多。譬如，当时我们帮助了美国著名小号手艾迪·罗兹内，希特勒入侵波兰时，他和自己的爵士乐队正好在波兰巡回演出。他愿意转道苏联，并且最初一段时间演出效果不错。我们也帮助世界著名的女歌唱家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在利沃夫安身。我们努力减轻许多其他难民的不幸。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料想到，在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人之中，会有未来美国总统助理的家人。

这些难民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帕布斯教授和他的夫人成了美国公民，进入了所谓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而艾迪·罗兹内和他的同伴们却不得不饱尝位于马加丹边疆区首府附近克累马集中营生活的种种美妙之处！在那里，他被迫用自己优美的演技愉悦集中营的头目们。

见到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对我是很特别的一件事。1937 年春天，她曾经来基辅巡回演出，在从前的商人公会大堂举行了几场音乐会。我带着一束红玫瑰，跟其他年轻的崇拜者一起

挤到后台，并且把花送到了她的手中。奇怪的是，她记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一刻，因此，在利沃夫见到我之后，非常高兴。我弄到了第一排的票之后，请她观看红军战士的业余文艺演出。这对我而言，这实在是太轻率了。因为，当走近自己的座位时，我们发现旁边坐的是利沃夫的国家安全首脑谢罗夫。他欠了欠身，用厚颜无耻的嘲笑表示了问候。她略微一点头，然后，熄灯之后，在我耳边悄声说：

“有人曾经介绍我认识他……我怕他。”

幕间休息时，跟其他观众一样，我们在近邻演出大厅的前厅溜达。还没来得及走两圈，就见一个身穿内务部队军服的年轻军官走到我们跟前：

“抱歉，”他对我说，“谢罗夫将军请您过去一下。”

我向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道过歉之后，便跟着这位军官走了。我们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走进了一间小屋。居中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各种饮料和冷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工作人员在围着桌子吃喝。谢罗夫将军站在一边。

“将军同志，您好！”

“您跟夏娃·图斯卡娅有什么关系？”

我解释说，我是两年前她在基辅巡回演出时认识的，而现在偶然在难民之中遇见了她。

“这样的话，您必须立即结束这种交往！”将军严厉地命令说。

“为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并且按照您的军阶不该向我提问题。”

当时，要是他知道，跟他说话的不是海军上尉，而不过是个普通战士，他会将我关禁闭的。但我并未退让：

“我不明白，在她困难的时候保持这种老关系有什么可指责的？”

“既然不明白，那我解释给你听：我们打算与她合作，所以任何人都不得插手。明白啦？”

“明白了，将军同志。”我回答说，并且感觉到这事将对我不利。

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将歌唱家送回饭店，并答应最近几天给她打电话。但我并没有做到。

谢罗夫将军没有局限于仅仅跟我谈一次话。次日，我接到了莫斯科首长发来的密电：停止跟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的一切接触。

我不知道，谢罗夫将军与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合作”的意图最终是什么结果。很快，她被送往基辅，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保尔·苏多普拉托夫在《特殊任务》一书中写到，谢罗夫跟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有恋情，而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知道之后，教训了他一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谢罗夫粗鲁地要求我停止与她之间任何交往，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之后，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局势开始逐步恶化。

这跟斯大林加快新领土苏维埃化的决定有关联。开始了没收富农财产，强制集体化，取消私人企业和手工作坊。尤其是，将卢布与金兹罗提等值的做法，对当局居民是个打击，因为后者的实际价值要高得多。苏联的物价比西部各地区高出许多。譬如，手表在莫斯科的价钱是300—400卢布，而在利沃夫只有三十兹罗提。其他许多商品的价差也大致如此。结果，在短短几周之内，商店里的东西被一抢而光。我方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潮水般涌进新解放区，将莫斯科短缺的东西全部买走。小店铺和手工业者破了产。很快，所有东西，包括食品的价格飞涨，而当地居民的工资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并且用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译注）支付。

所有这些，很自然地引起了抗议。爆发了大学生示威。不满情绪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但是，由贝利亚的暴吏谢罗夫将军负责的国家安全机关，却将这些基本有理的抗议活动宣布为反革命、反苏联的暗中进攻。接踵而来的逮捕，残酷迫害参加示威者，驱逐出境等等，使局势更加紧张。

当时，由于处理与难民有关的各种事情，我数次去过谢罗夫将军的部门。一般而言，在解放区，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都占用从前属于宪兵的房子，对于仇恨波兰特务机构的许多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说，这一点显得不祥。显然，使用这种房子的确比较方便，因为那里有地下监牢。然而，从政治角度，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侮辱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可是，谁还会想到这些细节！

-----  
在太平洋舰队(4)  
-----

而且，在谢罗夫的机构里，我曾经看到过一些被打得浑身是血，大学生制服被撕烂的年轻人。他们在半昏迷状态中躺在地上。显然，地下监牢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谢罗夫暴政的受害者不断地从侦查员的办公室被拖出来扔在走廊上。

1939 年 9 月，人们用鲜花、面包和盐，像胜利者一般迎接了苏军战士。到了 1940 年秋天，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已经开始欢迎德国人了。由于 1939 年底和 1940 年的粗暴残酷作法，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迫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对付本德罗夫分子。尽管有加快苏维埃化，1939 年底的利沃夫地区，依然保留下来了“往日奢侈的残迹”。在我住的“乔治”饭店里，餐厅有一支庞大的爵士乐队，经过严格训练的服务生送上波兰和法式菜肴。每天晚上，大百货商店屋檐下的“鸽子窝”咖啡店里，坐满了人。而喜欢异国情调的人，则可以拿一杯香槟，坐在昏暗的“小曲”夜总会里，那里的墙壁、包厢、椅子都包着深红色缎子，半裸的女舞蹈演员与演唱法国罗曼斯的歌手轮流上台献艺。不过，商店里已经是空空如也，而在大玻璃屋顶下的市场里，全天都在热热闹闹地买卖各种最时髦的玩意儿，

虽然是投机价，但还是比莫斯科便宜。

当时的利沃夫，还可以夸耀的，是活跃的文化生活。许多小型画廊里挂着现代油画作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展览会等等，这些事物都吸引着观众。波兰的许多著名剧团，为了免遭纳粹毒手，纷纷逃往东部，现在都落户在利沃夫。无怪乎当时一支波兰小曲《只有利沃夫》非常流行.....

当时，也有不少瑞士、挪威、丹麦的剧团，在波兰巡回演出，却碰上了战争。我们帮助其中许多人取道苏联回国。

我在这种独特、梦幻般的气氛之中，呆了不长一段时间。莫斯科来了一道命令。那里在就新的贸易协定跟德国人进行紧张谈判。参加谈判的，也有海军的代表。作为翻译，我派上了用场。

-----  
波兰问题  
-----

1940 年的新年，我与父母亲短暂相见。不曾想，这次跟父亲的分别成了永诀。

五十三年之后，我才找到了他的墓地.....

三十年之后，我才得以再次见到母亲。

1940 年初，我第一次去德国公干，这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回莫斯科途中，我在基辅作了逗留。这次可以多呆几天。利用这次机会，我想跟父母和朋友们一起过 1940 年的新年。

基辅似乎用一个阳光灿烂、天气寒冷的早晨迎接我。车厢窗外一闪过的，是童年起非常熟悉的名称——伊尔本，密林、水，沃伦信号站。基辅火车站终于到了。在月台上看见父亲时，喜悦的心中一阵发紧。他曾经在信中写到，身体不大好，但还是来接我。父亲老了许多，从前漆黑的头发现在全白了。他穿了一件旧的夹大衣，戴着一顶老式的，革命前的工程师制服帽。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自在。在利沃夫，我置办了一些好衣服，所以从“国际”车厢出来时，可以说是衣着入时。我身穿时髦的、带毛皮里衬的斗篷，头戴英国细呢子礼帽，浑身上下散发着日本男用香水的气味。在拥抱和亲颊礼之后，父亲甚至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在他看来，我这副行头在挤满车站的灰色人群之中显得太招摇，与周围的环境太不相称。但是，到家之后，父亲很快就释然了，然后我们在一起过了几天好日子。

久别之后回家，实在让人高兴。妈妈作了一顿乌克兰风味的年夜饭：蜜饭，甜羹，家常香肠，面筋火腿，填馅狗鱼，当然还有她的当家菜——“细麻花”，一层一层之间夹着香气扑鼻奶油的脆生生的“拿破仑”蛋糕。

新年夜，我们一帮朋友们聚在了一起。新鲜的松树枝散发着针

叶的香味。烛光闪烁。父亲的家酿酒在水晶杯里呈现出琥珀色。我们的老搭档三重奏——父亲拉小提琴，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科·费比赫拉大提琴，我弹钢琴——也有节目。在那遥远的三十年代中期，夏天温暖的傍晚，行人每每会在我们家窗户旁的椴树下驻足，听我们自办的家庭音乐会。

这一次我们又重逢了。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安详！我想起了在德语学校背得烂熟的赞美诗“寂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

我跟父亲之间一直不大亲近。他整天都在上班，而夜里还要绘图，挣钱补贴家用。他是个熟练的绘图工，旧彼得堡教育出来的出色工程师。而我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工业学院的夜校部上课，在“国旅”上班。休息日也是各过各的。但是，在1939年最后的那几天里，我们变得十分亲密。所以，1940年新年那一天的分别令人万分痛苦——我们俩似乎都预感到了，这将是永诀……

我出差的这段时间里，莫斯科的生活明显地困难多了。城市看起来脏乱不堪，在有些地方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由于我们在苏芬战争中的失利，首都的情绪非常压抑。斯大林过度自信，企图一下子打败执拗的芬兰人，结果却成了一场血战和耻辱的原地踏步。他被迫动员新的部队来突破敌人的防线。军用物资占用了各种交通工具，结果城市的供应立即受到影响。

我在阿尔巴特街与威斯宁街的角上军官宿舍里分到了一个床位。小小的房间里住了四个人。不过，在纽霞大婶的照看下，倒是很干净，很暖和，也很安静。走廊里有一个热水器，旁边的小桌子

上，放着煮茶的一应用具。

我的同屋原来都认识。他们马上给我介绍了莫斯科生活的种种  
难处。

跟德国人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谈判接近了尾声。谈判是在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大楼里进行的。我们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小组每次也到这儿来。我们跟什努列率领的德国代表团认真地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也在组建苏联采购委员会，准备去德国监督协定的实行情况，验收德国提供的物资。我也被列入委员会的名单，显然是由于我在太平洋舰队工程处的工作经验，最主要的，当然是我通晓德语。

1940年2月11日，新的贸易协定终于签署了，于是，我们很快就出发前往柏林。率领采购委员会的，是苏共中央委员，造船人民委员部委员特沃祥，他与政治局委员、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甚至大家认为，与斯大林本人关系密切。

-----

斯大林的秘密(1)

-----

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某种信任关系。

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前竭力争取保持这种关系。

但他去世之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

在罗斯福临终前的几周里，英美的代表在伯尔尼与盖世太保驻意大利的头目、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进行谈判，这给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参加这个谈判的还有美国驻瑞士情报负责人阿伦·达拉斯，因此使谈判具有特殊的性质。虽然伯尔尼谈判2月中就已经开始了，但哈里曼大使直到1945年3月12日才将这种接触的有关情况通报给了莫洛托夫。

斯大林对这个谈判做出了激烈反应。他将这个看作是西方盟国背着苏联与德国人单独媾和的企图。苏联政府有关让苏军代表参加谈判的要求被驳回了。

由于事情可能演变成一桩丑闻，于是惊动了罗斯福。3月25日，罗斯福的亲笔信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在信中，罗斯福援引哈里曼与莫洛托夫就此事的信件来往，试图说服斯大林，“由于误解，跟此事有关的事实未能正确地转告给您”。罗斯福在信件的结尾以和解的语气写到：“...我希望，您会向苏联有关负责人解释清楚此事的愿望和必要性，即为何我们急于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以便促成在战场上对抗美军的任何敌军的投降。”

3月29日，斯大林通报美国总统，说他不仅不反对，相反地，完全赞成德军在任何战场上的投降。“但是，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我才能同意与敌人谈判，”斯大林继续说，“即如果这类谈判不会导致敌人境况的改善，如果能够排除德国人耍手腕并且利用这个谈判将军

队投送到其他战场，首先是苏联前线的可能。”

斯大林掌握的情报是，在伯尔尼谈判的掩护下，德军统帅部开始将部队从意大利投送到苏德前线。事情变得严重了。1945年4月1日，罗斯福对莫斯科的激烈反应做出回应。他在信中写到，围绕与德国人有关其在意大利的部队投降问题的谈判，“已经造成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担忧和不信任的气氛”。

不能排除的是，罗斯福总统可能不知道伯尔尼谈判的全部细节，而且被隐瞒了事情的根本。现在，有不少关于美国情报部门的各种秘密“倡议”。譬如，1934年10月份，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美国特工特奥多·A·莫德在土耳其会见了德国大使冯·巴本并向他转交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应该成为美英德三国政治协议的基础。其中，表示愿意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包括波兰，波罗的海和乌克兰等的霸权。

这份文件的作者提议肢解苏联，并将其部分领土移交给德国。而德国人则许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东方开辟战线。

当罗斯福了解到这些之后，便禁止继续进行试探，并下令收缴了莫德的出国护照。然而，甚至在此后美国情报机关与敌方密使的秘密接触从未中止过。

罗斯福给斯大林有关伯尔尼事件的最后一封电报，是1945年4月13日送达莫斯科的，也就是总统去世之后的第二天。电报中说，这件事情“已不再新鲜，没有带来任何益处，并已成为过去。无论如何，不应该相互不信任，所以，类似的小误会今后不应该再次发

生。我相信，当我们两军在德国建立接触，并联合进行完全协调一致的进攻时，纳粹军队将会崩溃。”罗斯福通过这个类似临终遗书的信件强调了信任关系的重要意义，尽管有各种困难，但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信任的成分还是可以观察到的。要是罗斯福活得长一些的话，那么，有可能战后时期的关系会更更好一些。不排除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存在信任的前提下，可以避免走极端，以及“冷战”的危险对抗。罗斯福过早辞世，杜鲁门入主白宫，引起了苏方相应的反应，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

-----

斯大林的秘密(2)

-----

反共老手丘吉尔迫于情势，与斯大林进行合作。

西方盟国出于自保的考虑，决定推迟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自告奋勇到莫斯科，把这个决定亲自通报给斯大林。

两个对立世界代表的会见充满了火药味.....

斯大林与丘吉尔第一次会见时，局势相当不妙。英国首相抵达莫斯科，是为了通知苏联政府首脑，西方盟国决定放弃两个多月之前所作的关于 1942 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这个义务是莫洛

托夫 1942 年 6 月访问伦敦和华盛顿时，以正式联合声明的方式表述的：“有关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紧迫任务方面双方达成了协议，”——公布的文件中是这样写的。

对苏联而言，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虽然希特勒的“闪击战”未能奏效，而 1941 年 12 月德军在莫斯科郊区的失败，也显示了红军有能力重创侵略者。但纳粹德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实力。如果没有第二战场，这样德军可以于 1942 年春天之前在苏德前线集中庞大的军力。在南方，德军在夏季迅速推进到了伏尔加和高加索。苏军部队经过血战后，被迫向敌人让出一块又一块地盘。莫斯科担心希特勒军队对防线有新的突破。

抵达伦敦之后，莫洛托夫向丘吉尔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红军在 1942 年坚持不住，英国将作何反应。首相回答说，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联军最终将会占上风，但补充说：“不列颠人民和军队期望着尽快与敌人厮杀，并用这种方式帮助勇敢的苏联军队和人民。”这样的声明当时可以解释为，英国政府准备将部分德军师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莫洛托夫与艾登当时签署的苏联与联合王国关于结盟和在欧洲对德国及其轴心国作战，以及战后合作与互助的条约，是双方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敌人的重要义务。

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以及总统关于在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坚定承诺，更加鼓舞了莫洛托夫。终于初露曙光的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鼓舞了前方的将士和后方的劳动者。胜利的信心恢复了，给人们补充了新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被无休止的失败和撤退

弄得十分沮丧。现在，他们即将受到新的精神上的打击。出发前往莫斯科时，丘吉尔不能不考虑所有这些情况。

1942年8月12日下午，像往常类似的场合一样，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聚集在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中央机场。在迎接的人当中，还有红军总参谋长沙博什尼科夫元帅。天气很热，没有一丝风。所有人都呆在这个小机场的遮阳棚下。空气中弥漫着热烘烘的艾香味，听得见蜜蜂的嗡嗡声和小鸟唧唧的叫声。但是，这幅外表上安静的景象却不能使在场的人无忧无虑。这场残酷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年，苏联人民事实上在单独对付强大而残忍的敌人。集中在机场的文武官员直接负责组织抵抗希特勒侵略者。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情况糟到了极点，所以都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天空，等待来自英国的贵宾。他为什么要进行突然访问？他在公文包里带来了什么？

天空出现了一个黑点。它画着一个大半圈，迅速扩大，很快便显出了飞机的外形。在屋顶上划过之后，飞机触到了混凝土跑道，稍微减速之后，开进草坪。飞机平稳地移动着，穿过绿地，停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飞机显得非常笨重，机身几乎要挨到地面。我等着飞机舱门打开，然而飞机腹部的一个盖子却打开了，一架小梯子伸到草地上，沿着这架梯子，丘吉尔穿着笨重皮靴和皱巴巴裤子开始下飞机。他双腿蹲下，以便让庞大的身躯从机舱里出来。这就是丘吉尔的脑袋。他用手扶着帽子，小心地四周看了看，似乎在判断局面。此事

可是非同小可！他第一次身处布尔什维克的国度，“十月革命”之后他曾经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组织协约国以武装干涉来对付它。何况，他这次使命远非愉快。

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时，他将要解释，为什么曾经许诺的在法国的登陆被取消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斯大林如何看他。作为古老而骄傲的马尔伯勒家族的后裔，丘吉尔并不在乎这个贫苦鞋匠的儿子、半吊子中学生、血腥独裁者的意见。苏联报刊没有全部转述他丘吉尔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当天的广播讲话。苏联人民仅仅了解到，英国准备支持她抗击希特勒侵略者。但是，斯大林当然知道讲话的全文，包括其中有一段说“纳粹制度与共产主义最坏的特点毫无二致”。没有人像他丘吉尔这样，在二十五年期间一贯地反共。丘吉尔没有收回自己曾经说过的哪怕一个字。

斯大林把丘吉尔这些话都当作了耳旁风。此外，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自己第一次讲话中称，大不列颠进行帮助的意愿，在“苏联各族人民心中只会唤起感激之情”。况且，丘吉尔本人也认为，并不止一次地给自己的同僚讲起过，现在不是思考苏联体制、共产国际的时刻。应该向深处困境的国家伸出援手。

斯大林毕竟在战争中坚持了一年。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始终在消耗着德国的战争机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俄国人丧失信心。俄国人的抵抗是英美迫切需要的。这可以使英美积蓄力量，在适当

的时刻打击希特勒.....

丘吉尔走出机舱时，莫洛托夫已经站在了他面前。他们像老友般相互致意。人民委员向首相介绍了沙博什尼科夫元帅。丘吉尔立即说明，无法向元帅介绍英国的军事专家，因为他们乘坐的飞机从德黑兰飞出之后，因为故障被迫返航，所以，英国军事负责人与外交部常务次长卡多冈只能明天抵达。跟丘吉尔一起抵达莫斯科的，还有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曼。接机的人们认识他，上次他来过莫斯科。英国首相在麦克风前发表讲话，赞扬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希特勒的入侵，承诺将予以支持，并表示相信，盟国的共同努力最终将粉碎纳粹。

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和苏联国歌。丘吉尔和莫洛托夫检阅了仪仗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纹丝不动地站着，只是头部随着首相的背影转动。丘吉尔仔细审视着他们，似乎想要证实他们是否坚强。

丘吉尔从机场被送到专门为他准备的、位于贡采沃的官邸。哈里曼被安排住在奥斯特罗夫街的一幢别墅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入住“民族饭店”。丘吉尔对别墅的舒适大为感叹，这是他在遭到围困的莫斯科没有料到的。当时为他预备了浴缸和热水，在经过令人疲倦的长途飞行之后，他在浴室里边呆了好长一段时间。餐厅已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宴。经过严格训练的侍应生、各种花色的冷盘、红黑鱼子酱、冷乳猪肉、高加索式、俄式和法式菜肴、葡萄酒、各种烈性酒和清凉饮料、昂贵的餐具——所有这一切，保守党

领袖在布尔什维克国家都没有预料到。为了以防万一，他甚至从伦敦带来了三明治，想着克里姆林宫里的人肯定吃不饱。后来，他把这些告诉了斯大林，并承认说，他根本没有指望得到如此丰盛的款待，所以在飞机上先吃了几个夹肉面包，结果把胃口倒了。事后，斯大林在一个小范围里谈起这件事时，说道：

“丘吉尔真是个伪君子！他想让我相信，他这种体质在伦敦就靠着三明治……”

莫洛托夫则说，1942 年春天在英国首都丘吉尔请他吃午饭，除了麦片粥和咖啡之外，没有上其他任何东西。“维亚切斯拉夫，这就是廉价的民主游戏。他简直愚弄了你。”——斯大林肯定地说道。他不能想象，在某个别的地方领袖可以与自己的人民共患难。

丘吉尔并没有多少时间欣赏官邸的美仑美奂。当天晚上，他便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场谈话。

-----

核子外交(1)

-----

当斯大林得知英美拒绝于 1942 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之后，非常震怒。他教训英国人不要害怕德军。

其实，在内心深处，斯大林最恐惧的事情，就是与希特勒发生正面冲突。正因为如此，希特勒的入侵才打得他措手不及。

七点刚过，丘吉尔的汽车越过红场，经斯帕斯门驶入克里姆林宫，停在了人民委员会正门口门廊下，斯大林一般经过这里进入自己的办公室。陪同英国首相的，有阿维列尔·哈里曼，英国驻苏联大使阿其巴里德·克拉克·库尔和译员登禄普。巴甫洛夫作为苏方正式译员在门口迎接了一干人，将他们引入二楼，沿着走廊进入苏联政府首脑的办公室。客人到来之前不久，我也被叫过去作记录。我的出现，也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表示外国人马上就到。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中断了他们有关英国首相来访的谈话。我只听到了斯大林的最后一句：

“别指望有什么好事。”

他看起来脸色阴沉，神情专注。他身穿往常的那件半军服式制服，扎到高加索高筒靴的裤子很久没有熨烫了。

门开处，丘吉尔肥胖的身子出现在门口。他停了一下，环视四周，目光扫过挂在墙上的著名俄国将领的画像——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库图佐夫、苏沃罗夫，以及放大的列宁像，最后停在斯大林的身上。后者僵立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仔细地打量着这位海外来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一刻，斯大林想了些什么？这个从未掩饰过对斯大林体制不友好态度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光临克里姆林宫，他是否感到了满足？

当然，只是危急情况才能使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在希特勒入侵

苏联之前，大不列颠的局势令人绝望。丘吉尔本人认为纳粹占领英伦三岛是可能的，并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将从加拿大领土上继续作战。

苏德武装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伦敦松了一口气。这场冲突的时间越久，那么英国避免入侵，最终忝列胜利者的机会就越大。但他丘吉尔也不要昏了头——俄国人不会如此轻松就打能赢。他也得要拼命，也得要流血。如果他想就第二战场的问题讨价还价，那就应该向他表明，这对不列颠也孕育着危险。

斯大林保持着严肃的表情，慢慢地沿着地毯向丘吉尔走过去。他有气无力地伸出手，丘吉尔则用力地握了握。

“欢迎您到莫斯科来，首相先生。”斯大林闷声说道。

丘吉尔绽开微笑，充满信心地说，他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俄国，并会见她的领导人。首相的微笑让我觉得十分做作，无法掩饰他的神经过敏。我有机会多次观察到外国访客会见斯大林时类似的反应。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他看作残忍、血腥的暴君，谴责过他残酷的毫无人性的统治。但是，跟他接触时，许多人却不能摆脱某种景仰之情。也许，他对自己千百万臣民所拥有无限权力的感觉，而不论这种权力是如何得到的，在“各族人民领袖”周围制造了出某种光环，不由自主地唤起某种卑躬屈节。也可能，这是在恶魔面前恐惧感的无意流露。斯大林善于扮演殷勤主人的角色，他具有迷惑谈话对手的能力，使人愿意与他一起寻找共同语言。

斯大林请大家在铺着绿呢绒的长条桌旁落座。他自己坐在顶端。丘吉尔坐在他的右手，哈里曼在左手。其他人在两边依次坐下。在问过丘吉尔的身体情况，路上的辛苦和安排的官邸是否满意等几个礼节性问题之后，斯大林转入了正题。在自己阴沉的外表之外，他加上了更加阴沉的有关前线战事的叙述。

“作战部队的消息是不利的。”他开始说道，“德国人投入巨大力量向巴库和斯大林格勒推进。难以保证，俄国人会顶住他们新的攻势。红军在南方无法阻挡德军的进攻……”

丘吉尔显然想为自己的对手鼓气，指出，没有足够的空军，德国人未必能够在沃罗涅日及其以北地区展开新攻势。

“这不对，”斯大林反驳说，“由于战线太长，希特勒完全有能力抽调 20 个师，组成强大的突击兵团。为此目的，二十个师，再加两三个装甲坦克师足够了。考虑到希特勒目前掌握的军力，他不难抽调出这些部队。我以前完全没有料到，德国人能够从欧洲各处抽调这么多的部队和坦克……”

这已经是对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直接暗示了。丘吉尔无法再拖延声明，他正是为此而来莫斯科的。

“我想，您是要我转到有关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吧？”英国首相问道。

“这将是首相的意愿。”斯大林含糊地答道。

“我来此，用最开诚布公的方式谈现实的东西。让我们像朋友一样说话吧。我希望，您同意这一点，并且同样愿意说出您现在认为

是正确的东西。”

“我愿意。”斯大林声明道。

丘吉尔首先提到，莫洛托夫前不久在伦敦和华盛顿访问期间，讨论过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然后他开始论述，称部队和登陆装备不足迫使英美得出结论，他们无力在 9 月份采取行动，虽然这对于登陆而言是天气最佳的月份。此后，首相开始列举充实西方盟国决定的详细计算结果。

斯大林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用一个问题打断了对方的话：“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第二战场今年不会有了？”

“可是，您理解的第二战场是什么？”丘吉尔问道，他明显地在拖延令人不快的解释。

“第二战场，我的理解是大部队在年内攻入欧洲。”斯大林不无愤怒地答道。

“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人做不到。但是，他们认为，第二战场可能在另外某个地方开辟。在法国海岸的战役，在今年之内将会带来更多的害处，而不是益处，并且可能会对 1943 年大规模战役的准备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担心，这对您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但我必须声明，即如果战役在年内能够极大地帮助俄国盟友的话，我们将愿意承担任何损失，以吸引开敌人的兵力。但是，如果这个行动不能够吸引开任何敌军，那么它便会破坏未来战役的前景，因而，这便会是个大错误……”

丘吉尔请哈里曼谈谈自己的意见，后者立即附和了首相的立

场。显然，罗斯福总统也放弃了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斯大林说话了，他慢慢地说出每一个字，带着故意加强的格鲁吉亚口音：

“我对战争持另外一种观点。不愿冒险的人，便不会赢得战斗。英国人不该害怕德国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超人。为什么你们这么害怕他们？部队要想成为真正的军队，那么它就必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部队在未经战争检验之前，谁也不能说出，他们所值几何。现在，开辟第二战场，正好给了用火来检验部队的机会。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只会这么做。不应该仅仅害怕德国人……

丘吉尔认为这番话是侮辱人。他喷着雪茄烟，激动地开始说道，1940 年英国单枪匹马地面对了希特勒入侵的威胁。这样，他相当明显地暗示，当时莫斯科与德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英国首相接着说，然而，英国人却没有动摇，而由于英国空军的成功行动希特勒也没有下定决心登陆。

但是，这段激烈冗长的话却没能打动斯大林。他提醒说，虽然英国的确单独对抗了德国，可她无所作为。英国没有立即帮助波兰，对希特勒占领挪威和丹麦未作任何反应，1941 年春，巴尔干战役期间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没有积极干涉，只有英国空军采取了行动，但这并不够。在通知斯大林 1942 年法国北部不会登陆之后，丘吉尔补充说，“我认识到，有关第二战场我所说的一切对我们的俄国朋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见到您本人，而没有通过大使或者采用通讯的方式……”

当时，在给伦敦的信中，丘吉尔表示相信，尽管这是个打击，俄国人“不会停止与敌人的战斗”。

然而，此时此刻的斯大林尽管外表十分平静，但却没有排除大难临头的可能。

-----

核子外交(2)

-----

作为战争可能的结局之一，斯大林曾经考虑一旦战败，流亡到印度去。从那里发号施令，指挥留在国内、转入地下的党组织。

我是这个秘密的惟一知情人。

1942 年的那个令人焦心的夏天，德军向伏尔加和北高加索不断推进，其精锐部队则依然呆在通往苏联首都的要冲部位。空荡荡的莫斯科市内是一种令人产生错觉、不祥的寂静。天气异常温暖，阳光灿烂，所以，莫斯科的林荫道铺满了厚厚的绿色。

外交人民委员部依然留在古比雪夫，但有一小批人，其中也包括我，于去年 11 月被调到莫斯科来，落户在位于铁匠桥属于外交部的一幢又老又旧的小楼里，其中有几个房间作了宿舍。我只是在那儿过夜，工作时间全部都呆在克里姆林宫。大约在早晨五点，斯大

林一般这时回家，我们，莫洛托夫秘书处的人，才得以结束自己的几乎是一昼夜的工作日。

在寂静的清晨，披着色彩斑斓伪装色的克里姆林宫墙在斜阳的光束下被染成了金色。我穿过空无一人的红场和猎人市场走向铁匠桥，似乎很难相信，现在，在我们的土地上正在打仗。但这个意识一直存在。因为，全部的时间都被那些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填满了。特别是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这几天里。

伦敦和华盛顿拒绝前不久有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而不是如罗斯福与莫洛托夫五月份他们在美国首都会见时所说的，从俄国前线吸引至少 40 个德军师，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应。

现在，在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争吵之后，斯大林外表上显得很平静。他邀请英国首相到自己的家中之后，不断地开着玩笑，扮演着好客主人的角色，他想让人相信，胜利最终将属于对抗纳粹的人民。

不列颠首相可是说是满头雾水。为什么会见的最初几天如此刻薄，甚至粗鲁的苏联领袖突然成了殷勤的化身？最终，丘吉尔找到了十分有趣的解释。

“我想，这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在他的日记中读到，“他（斯大林）的委员会或者委员们没有像他一样接受了我带来的消息。可能，他们的权力比我们推测的更多些，而知识更少些。所以，他似乎想庆祝一下，也趁便放松一下。”

这段话显示，伦敦对于苏联领导层实际情况的概念是如何的模糊。斯大林根本就是权力无边的主子、不容置疑的权威。

当然，斯大林不会不明白，西方盟国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之后，我国的局面有多么困难。但是，他也认识到无论如何保存反希特勒联盟有其必要性。对西方盟国的立场进行激烈批评之后，他明白了，他无法改变其决策。为了避免全面破裂，斯大林决定做出一个和解的姿态，邀请外国贵宾到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此前他从未这样做过。

这一年间，红军且战且退，经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但最终还是减缓了敌人的推进。同时，在乌拉尔以东地区，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企业、以及从西部地区连同工人一起搬迁去的工厂，正在制造新式的、比德国更好的武器。许多地方由全体男性人口组成的补充兵力，正在组建新的师团。大后方正在训练新兵，培养指挥人员。

但是，谁也没有把握，在这些新鲜力量成军之前，在苏军做好准备进行大规模反攻之前，战线会不会崩溃？

罗斯福关于从苏联前线吸引 40 个德军师的决策，原本可以使局面得到缓和。西方盟国承诺 1942 年在北非登陆而不是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对苏联的局面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斯大林预见到了，并且他把这一点告诉了丘吉尔。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丘吉尔在谈到英美军队准备不足，以及数量不足时，如果没有过分渲染的话，那么诺曼底行动真的有

可能成为一场灾难。

无论如何，在既成的局面下，我国只能依靠自己。应该说，正是这一点促使苏联领导者说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我无意中成为其见证者。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与丘吉尔的一次谈话于凌晨三点结束之后，我的同事巴甫洛夫被派去送英国首相到他住的官邸，即所谓的七号国家别墅，而我则必须为致华盛顿的苏联使馆起草电报文稿。电报一般由斯大林签署。

我的第一稿他不完全满意，所以，在提出几处具体的意见之后，他要我坐在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条桌一端，将文本誊写一遍。当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斯大林一边沿着花纹斑斓的地毯走来走去，一边抽着烟斗。莫洛托夫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跟丘吉尔谈判时，他就坐在那儿。

就在当时，我从我们的领袖嘴里听到了，在此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流亡政府清单上的新成员，”斯大林低沉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推进到乌拉尔以东，这就会成真……”

“但这等于死亡，”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应道。“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值得思量一下，有哪些可能的方案。丘吉尔可说过，一旦纳粹占领英国，他的政府将从国外，譬如加拿大，与敌人继续作战。” 斯大林走近沿着墙壁卷起来的布幔，拉动绳子，展开了东

半球的地图。

“一旦德国战胜苏联，这样日本也会参战，”斯大林继续说道，“这意味着法西斯轴心国得到极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何英美将更多地需要苏联人民和我党的帮助。去年底，当敌人逼近莫斯科时，我们建立的地下党委还没有解散，正在为全面的游击战做准备。我们的人民相信党和它的领导，并将执行我们的指示，即便这些指示来自远方……”

斯大林用自己有力的右手划过苏联，继续说道：

“当然，我们不必重复伦敦之行，那里已经有一打以上的流亡政府。我昨天不是偶然地告诉丘吉尔，已经去过了伦敦，与列宁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我来说，去一次已经足够了。但是，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地方……”他接着轻松地用烟斗划过巨大的次大陆。

听到的一席话使我震惊万分。但我做出一副专心工作的样子。我飞快地写完了电文，然后毫不拖延地离开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没想到在这里突然我会听到如此可怕的建议。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偏爱印度。他是否认为，远离伦敦的英国政府他更方便些？或者他以为，在这个沸腾的殖民地印度可能出现革命的形势？……

须知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呆在瑞士，把自己看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们愿意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只要那里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些国家可以是德国、法国、英国、甚至美

国。但情况是，俄国，按照列宁的说法，“孕育了革命”，所以布尔什维克赶到那儿，领导革命.....

或许，斯大林依然相信开始于“第三世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起这个离奇的计划。莫洛托夫显然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这件事情，他将它带进了自己的坟墓。

-----  
我奉调来到莫斯科  
-----

斯大林曾经幻想着与希特勒单独秘密媾和，他派苏联副外长与希特勒的特使秘密会晤，企图割地求和。但希特勒似乎并不为所动。

然而，战局的变化很快就使斯大林处于有利地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

1942 年 9 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委员杰卡诺佐夫突然消失了。我是偶然知道这个情况的。莫洛托夫要我弄一份关于美国通过波斯湾向苏联供应武器和其他材料等的详细清单。由于杰卡诺佐夫负责整个区域，我用克里姆林宫内线给他打了个电话。

一般当头儿不在时，电话由他的副手伊利亚·切尔诺舍夫接听。但这次我听到了秘书泽娜的声音。她告诉我，杰卡诺佐夫，还有切尔内舍夫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她不知道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在柏林跟杰卡诺佐夫共事期间，我跟他有深交。所以，我决定了解一下，他是否在家。从厨师（厨师平常也看门）处知道，杰卡诺佐夫到某地去了。我不得不向中东司司长卡夫塔拉泽求教。他也不知道杰卡诺佐夫没上班的原因，但给了我需要的材料。

向莫洛托夫汇报他感兴趣的问题时，我顺便提到，跟杰卡诺佐夫联系不上。人民委员没有任何反应。他当然知道点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杰卡诺佐夫出现在莫斯科，但是我们对于他不在的原因却依然一无所知。

多年之后，伊利亚·切尔诺舍夫告诉我，1942年中杰卡诺佐夫执行了什么样的使命。原来，在那个令人不安的夏天，斯大林另有一个更加机密的计划。

我跟切尔诺舍夫相识多年，一起在杰卡诺佐夫的秘书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切尔诺舍夫是我的副手。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切尔诺舍夫是我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参赞。大使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非常器重他，并推荐他到联合国担任秘书长助理。六十年代，切尔诺舍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巴西大使。在这里，他的生命凄惨地猝然中断。一次，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游泳时，他遭到了鲨鱼的袭击。他的尸体最终未能找到。

在我们谈论杰卡诺佐夫的秘密使命之前，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

书有关战时军事外交的专著，所以切尔诺舍夫明白，我的问题不是无聊的好奇心引起的。此外，他也知道，我永远不会让他为难。

表面上，那只是外交人民副委员秘密访问瑞典，了解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情况。但是，甚至连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大使都不知情，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跟希特勒的密使什努列特使举行秘密会晤。杰卡诺佐夫认识后者，战前他们在柏林经常见面。我记得，1942年间，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多次提到过1918年与德国人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宛和约。同时，他总是强调，列宁不顾托洛茨基和其他同事的反对，签订了和约。列宁本人称这个和约是“卑鄙无耻的”。

斯大林总是在说，列宁一贯正确。拒绝和平意味着丧失一切，而接受和约则可以使布尔什维克保存最主要的东西——权力，即便是在被割去一大块的俄国领土上的权力。由于担心局面可能会更糟，斯大林显然没有排除与德国在苏方做出某些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和解的可能。按照切尔诺舍夫的话，当时会谈的内容，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以及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等。

切尔诺舍夫不能解释，有关此次会见的建议是如何转交给柏林的。无论如何，希特勒的密使在约定的地点等待着苏联代表。显然，协议是通过某个中立国，譬如瑞典，经过特殊渠道达成的。

后来，我考虑了很久，是什么促使了斯大林向德国人提出这种

交易。他是否认为，1942 年夏天的局面是灾难性的，因此足以证明如此冒险的一步是有用的。或者他自己已经接近于惊慌失措？那时我经常见到他。他经常看起来是信心十足、非常平静。但是，他也非常善于控制自己……

在德军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的条件下，这些建议又有多么现实呢？斯大林的诱饵能否让希特勒上钩呢？

1941 年 6 月 21 日，在纳粹入侵的前一天，斯大林试图阻止希特勒，许诺“研究德国可能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让希特勒明白，自己愿意让步，但元首却没有做任何反应。6 月 22 日前夜，当我跟杰卡诺佐夫到达官邸时，里宾特洛甫甚至拒绝接受来自莫斯科的信函。那么希特勒现在有必要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吗？斯大林是否有些轻信？

我认为不是的。斯大林从早年起便表现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显然是从下列情况出发的：希特勒必须明白，他与英国还将有一场大战，而主要的，则是美国，其时正在展开庞大的军力。为了准备好与美国作战，非常重要的，是尽早打垮并占领英国，这样，美国人便不能在那里建立基地，用于在法国北部登陆。但是，要想处理英国的事，希特勒必须将大部分部队从东方抽调回来，在此之前，要么彻底打败苏联，要么，如果战事拖延下去的话，与克里姆林宫达成某种交易。而斯大林正是向他提出这个交易……什努列特使答应立即向希特勒汇报斯德哥尔摩会谈的实质内容。但柏林一直在沉默。当时，德军向东部的推进慢了下来。很快，在斯大林格勒

城下，鲍卢斯元帅的希特勒第七军大败。此后，德军一直在向后撤退，虽然往往经过激战。

斯大林的这个1942 方案彻底失去了意义.....

-----

斯大林给希特勒提供方便

-----

斯大林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英美的决定，所以换了幅面孔，与丘吉尔玩起了“友谊”游戏。

但丘吉尔的访问，给两人的关系之中留下了很深的不信任的气氛。

斯大林谈笑间提到强制集体化期间被镇压的农民人数高达千万。

丘吉尔讲述的英美军队 1942 年在北非登陆的计划稍微缓和了气氛。斯大林甚至认为这次战役有某些积极意义。可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圈子里，拒绝在法国登陆所引起的苦痛，直到丘吉尔访问结束前夕，都占了上风。甚至在斯大林为了庆祝客人来访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举行的宴会结束之后，这种气氛依然没有改变。丘吉尔声称疲劳，没有出席传统的晚宴之后的电影晚会，在克里姆林宫

内部被看作是盟国之间关系不睦的标志。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斯大林来了个急转弯。他明白，已经无法改变任何东西，无法迫使英美履行有关第二战场的承诺，并且关系的继续紧张只会带来不利后果。尤其不能不考虑的是，盟国之间关系失和的消息可能会透露出去，会被戈培尔的宣传所利用。斯大林决定，既然已经无可作为，那就必须和解，只能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三大国的一致，表明他们愿意合作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何况在北非的登陆，如果最终会发生的话，不可能不使德国人的局面变得困难，也许，会迫使他们从苏联前线抽调部分军队。总而言之，继续与丘吉尔争吵，已经没有意义。用这种方法改变不了事态。

8月15日，丘吉尔飞离莫斯科之前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谈，真可以说是亲切友好。斯大林殷勤好客，周到仔细，一开始使丘吉尔惊讶万分。但是，很快他也加入与克里姆林宫主人玩“友谊”的游戏。他们谈了很多，斯大林再次强调了盟军在北非登陆的重要意义，这样使人明白，他容忍了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且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

“上帝会保佑你们。”

“上帝当然在我们这一边。”丘吉尔表示同意。

“那么魔鬼当然在我这边，我们协力战胜敌人。”斯大林接着话题，暗示着丘吉尔从前曾经声称过的，他愿意与魔鬼结盟，如果魔鬼将对德作战的话。

然后，丘吉尔提醒到，他曾经通过克利普斯大使就德国准备入

侵俄国向莫斯科示警。斯大林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说，他一直在提防侵略，但以为可以将其拖到 1942 年春天。他可不会承认，他曾经在维辛斯基与克利普斯的谈话记录上亲笔写道：“英国人的又一次挑拨离间”。

谈到战前时期，丘吉尔表示同意，1939 年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英法代表团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并且没有签署重要协约的足够授权。斯大林大致谈到了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与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谈判，以及，有一次在跟德国外交部长谈判期间，帝国首都响起了空袭警报。

“你们为何要轰炸我的维亚切斯拉夫？”斯大林用开玩笑的口吻问客人。

“我一直认为，永远不应该放过幸运机会，”不列颠首相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

时间已经接近半夜。丘吉尔次日凌晨应该出发去飞机场。但斯大林却不想放他走。

“我们为何不到我克里姆林宫的家中去喝一杯？”斯大林问道。

“我从不拒绝这类建议。”丘吉尔同意了。

这样，他们立即沿着克里姆林宫的过道，出来到了一个小院，穿过一条马路，来到了斯大林的家里。英国首相称之为“简朴和大小适当的”：有餐厅、客厅、办公室和一个大的卫生间。斯大林没有告诉客人，从前这是布哈林的房子。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丽卢耶娃自杀之后，他们换了房子。

邀请丘吉尔到自己的家中，斯大林给了他特殊的关注。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政治家有幸获此姿态。毫无疑问，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强调，虽然由于第二战场的事情发生了冲突，他依然珍惜与大不列颠的合作，以及伦敦愿意将苏联看作平等的伙伴。为了更进一步强调对英国贵客的好感，使这个晚上更加亲密些，他叫来自己的女儿——还是中学生的斯维特兰娜，充任女主持人在桌旁张罗。过了一段时间，莫洛托夫也出现了，他的任务是席间劝酒。他开始说出各种祝酒词。

“莫洛托夫有一点是天生的，”斯大林快活地说，“他是办宴会的专家，他本人也很能喝……”

桌上不断捧上新的菜肴和各种饮料，丘吉尔明白了，这将是一顿丰盛的、长时间的晚宴。

在许许多多的话题中，也说道了苏联的集体化问题。“请告诉我，”丘吉尔问道，“目前这场紧张的战事对于您本人也是如此困难，就像集体化的负担一样？”

“呃，不，”“各族人民领袖”回答道，“集体化政策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你们必须打交道的，不是一小批贵族和地主，而是百万计的小地主……”

“是上千万的，”斯大林挥着手，感叹道，“这是非常恐怖的。持续了四年。但这对俄国是绝对必须的，要想避免饥饿，给乡村提供许多拖拉机……”

斯大林所说的集体化期间被镇压农民的数字，与最近苏联报刊中提到的数字大致吻合。如果承认，大约一半人从祖居地被赶走，在国内流离，后来加入集体农庄，或者新建的工业企业，那么死亡或者被杀的人大约在500万人左右，跟大多数研究者认同的600万的数字差别不大。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最勤劳的、最有本领的、最能干的庄稼人和牧人，他们都有一份家产，正因此他们才积极抵抗没收财产，为此而失去了生命。可以理解的是，经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之后，我国迄今无法摆脱农业危机。农村到处是拖拉机，但却失去了土地真正的主人，不能养活全国的人口。

“那么，他们都是富农？”丘吉尔问。

“是的，”斯大林回答说，稍微停了一下，他重复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必需的……”

“他们最后怎么啦？”

“怎么啦，”领袖似乎想回避，“其中许多人同意跟我们走。有些人我们在托姆斯克、伊尔库茨克和北部地区给了土地。但他们在那里没能呆得住。当地居民不喜欢他们。最终，他们被自己的雇农给收拾了。”

当然，既不是当地居民，也不是雇农，而是人民内务委员部的特别小分队消灭了不幸的农民——强制集体化的受害者。丘吉尔相信了斯大林的一面之词？他一句话也没有反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仅仅写道，听着斯大林的解释，想到千百万的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他禁不住打了个冷颤。

斯大林和丘吉尔在一起呆了大约共七个小时。午夜三点过后，英国首相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八月十六日凌晨五点三十分，他的飞机从莫斯科中央机场升空，飞往德黑兰。

英国首相的访问结束在和解的，甚至友好的调子上。在立即发表的共同声明中说，“谈话是在热忱、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再次证明了苏联、英国、美国之间存在着密切合作与谅解，完全符合他们之间现行的结盟协议。”

但是，西方大国拒绝于 1942 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在莫斯科始终留下了不快之感。斯大林对丘吉尔的不信任也保留了下来。1942 年，通过北部路线向苏联供应的军用物资被大幅度削减之后，这种不信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1943 年 11 月到 12 月之间，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没有像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那种程度的信任。实际上，丘吉尔提出了斯大林完全满意的波兰向西部推进，以及按照“寇松线”划定苏波边界的思路。但是，英国代表团首脑拼命抵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决定，用尽各种办法鼓吹通过巴尔干推进。斯大林猜透了丘吉尔的意图，原来他不愿放红军进入东欧。甚至当苏联代表团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争取到了在法国北部登陆，丘吉尔仍然企图将土耳其拉入战事，以此破坏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

-----

“丘吉尔，你裤子的拉链开了”(1)

-----

不列颠首相的盘算是，在土耳其对德宣战之后，德国人会进攻伊斯坦布尔，并且可能占领之。届时盟国除了采取紧急措施拯救土耳其之外，别无他法，而在法国的登陆自然而然会被放弃。与此同时，在巴尔干开始的军事行动，则正是丘吉尔所想要的。丘吉尔从德黑兰回来的途中会见了土耳其总统伊斯梅特 伊涅纽，但后者并不愿对德宣战，所以，英国首相的巴尔干冒险彻底破了产。

1944 年夏天，在制订未来国际安全组织宪章的杜巴顿—伊克斯（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代表团的立场也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怀疑。英国人在把美国人拉到自己一边之后，提出一项建议，要几个大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出现涉及到他们的争议时不要投票。由于当时苏联是惟一的非资本主义大国，可以推断，在这后面隐藏着一个企图，即向苏联强加它无法接受的来自国际组织的决定。因为，美英在这个组织里拥有绝对多数，他们随时都能够用来对抗苏联。苏方最终保住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但斯大林当然没有忘记，伦敦曾经企图将苏联置于易受打击的地位。

-----

“丘吉尔，你裤子的拉链开了”(2)

-----

丘吉尔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内容是一份十分肮脏的文件，即战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比例。

双方用一个个的百分比，便决定了这些国家数千万人的命运。

1944 年 10 月，在苏联与英国领导人的关系中似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丘吉尔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主要议题是波兰问题。英国首相竭力使苏联政府首脑相信，他将尽最大可能，说服在伦敦避难的波兰流亡政府接受苏联的要求。这可以使得最终达成互相可接受的协议，并创造条件，使改组之后、愿意与苏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按照“寇松线”承认苏波边界的波兰政府，在红军解放华沙之后，迁到华沙来。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地说，这样一来，波兰的发展可能会按照芬兰和奥地利的方式走，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而，在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米克拉伊奇科也呆在苏联首都，但他却未能利用时机与苏联领导人达成协议。英国首相声称将尽力建议波兰流亡活动家与莫斯科达成协议时是否诚实，或者他像美国人一样，在幕后的谈判中建议米克拉伊奇科不要让步？然而，我觉得，斯大林当时更愿意相信丘吉尔。无论如何，当时，莫斯科谈判期间毫不拘束的气氛透着相互信任。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首相开始的一个话题，直到现在还引

起历史学家和记者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因此，尽可能详细地重现1944年10月9日在斯大林办公室发生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哈里曼是美国驻苏联大使，所以罗斯福委托他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谈判中作观察员。同时，总统在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强调说，哈里曼不应该参加谈判，美国将不认为自己与此次会谈期间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有任何关系。所以，哈里曼没有参加所有的谈判，虽然英国首相让他知道发生的一切。

这里所说的那次谈判期间，不仅没有美国大使，甚至没有陪同首相来访的英国外相艾登。苏联和英国领导人只带着翻译进行了单独会谈。

丘吉尔开始说，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澄清几个问题，有关这些问题两国领导人最近一直在通信。

“我愿意讨论任何问题。”斯大林说。

“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谈，”丘吉尔开始阐发自己的思路，“其中一个希腊，另外一个罗马尼亚。就这点，英国人并无特别的担心。不列颠应该是地中海的一个大国，所以，我希望斯大林元帅承认我们对于希腊的发言权，因为我愿意承认斯大林元帅对罗马尼亚的发言权。”

斯大林对英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并表示，如果英国不能控制地中海的话，它将会有大麻烦。因此他同意，即丘吉尔在希腊有发言权。

“我以为，”英国首相接着说，“我们必须用外交术语表达这些东西，避免使用‘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表述，因为这样会使美国人认为是不体面的。一旦我跟您达成谅解，我会跟总统解释明白的.....”

斯大林提到了罗斯福的愿望，即此次会谈的任何决定将被认为是“初步的”。

“但是我跟您之间说，”首相接着自己的思路说，“美国为自己夺得了太多的权益，给苏联和大不列颠留下很有限的机会。我们之间可是有互助条约的.....”

在这个表示信任和不无潜台词的交换意见之后，丘吉尔说：

“我这里有一份非常肮脏的文件，其中包含着伦敦某些人的想法。”丘吉尔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四叠的纸片。将纸片在桌上展开之后，他推给了斯大林：

文本无须翻译。纸上内容的仅有几行：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10%

希腊

大不列颠.....90%（与美国协商）

俄国.....10%

南斯拉夫.....50%

匈牙利.....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25%

斯大林仔细地看了一遍数字，从青铜杯子里拿出一枝自己喜爱的红蓝双色粗铅笔，在右上角划了一个不大的蓝色对勾。然后，一言未发，推回了纸片。

随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停顿。丘吉尔首先打破了沉默。

“将来会不会认为这是厚颜无耻的，我们如此简单就决定了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问题？最好让我们烧掉这纸片吧.....”

“不，留在你那儿。”斯大林说。

丘吉尔折起纸片，藏进自己的口袋。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就这个无言的场合已经写了很多。苏联官方断然不同意将其解释为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苏联的高层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与帝国主义的大不列颠进行此类可疑的交易”，因为这“将会与苏联列宁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矛盾”。我本人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类似的理由。无法接触苏联档案材料使得非常难以弄清真相。在苏联外交部1983年公布的题为《1941—1945年卫国大战期间的苏英关系》文件汇编中，根本没有收入斯大林与丘吉尔1944年10月的谈话记录。虽然，此次谈话之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可能存在着某个秘密协议，但却很难做出最终判断。

现在，情况明朗了。

根据上面所述的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即在丘吉尔向斯大林展示

自己的纸片之前，显而易见，他们二人倾向于确定双方在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优先影响力。莫洛托夫次日与艾登的会谈更能说明这一点。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我方的译员是巴甫洛夫。他的记录同样没有收入前文提到的苏联外交部文件汇编，但是前不久这个记录却在西方公开发表了。

莫洛托夫援引了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向英国同行声明说，有关比例的建议值得注意。

“能否达成这样一种协议，”莫洛托夫继续说道，“即不仅保加利亚，而且还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比例都为 75 比 25？”

“但是这比此前谈到的要差好多。”艾登反驳说。

“那么，保加利亚就按照 90 比 10，南斯拉夫为 50 对 50，而匈牙利另行商定……”

“我们同意您有关匈牙利的建议，但想在保加利亚拥有更多的影响。”

“如果匈牙利的比例为 75 对 25，那保加利亚也保持这个比例吧。但是，南斯拉夫应该是 60 对 40。这是底线，我们不能走得太远。”

艾登建议在保加利亚的比例为 80 对 20，但却继续坚持要 50 比 50 的比例对南斯拉夫。莫洛托夫则声明，如果接受英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那么对保加利亚应该是 90 比 10。同时他补充说，在建议对南斯拉夫按照 60 比 40 时，他的意思是，苏方对海岸线没有兴趣，他想在国家中部有更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在这场辩论中根

本没有被提及。可见，苏方没有反对英国最初的建议。

被讨价还价所累的艾登，最终声明，他对数字不感兴趣。他理解苏联对在保加利亚的利益关心，并且英国愿意同意这一点。至于南斯拉夫，不论铁托与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能否达成协议，重要的是盟国必须在那里推行同样的政策。

在丘吉尔别墅的晚宴上，艾登汇报自己与莫洛托夫的谈判时说，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他没有牺牲不列颠的利益。然而，似乎在原则上已经就东欧的势力范围达成了协议。

次日早晨很晚醒来后，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床上消闲自在的丘吉尔，口授了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在其中说明了有关比例关系的协议。显然，他感到了不自在，因为交易是背着罗斯福进行的，他向前来看望首相的哈里曼看了信件的草稿。

美国“观察员”坚决反对发出这样一封信，声称总统将会非常不满意所有这一切。

哈里曼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丘吉尔的清单中，一切也是从此开始的，美国的份额标示得十分模糊，这当然不会使华盛顿感到满意。丘吉尔听从了哈里曼，最终没有发出这封信。而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签署的发给罗斯福总统的联名电报中，仅仅提到：“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更好地协调对巴尔干国家的政策，其中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

-----  
帕布斯夫人推心置腹的一席话(1)  
-----

至于土耳其，提到它，是由于斯大林与丘吉尔就海峡制度交换过意见。同时，英国首相对苏联领导人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使其对苏联有利的愿望持谅解态度。

海峡问题使斯大林无法安宁。他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西方盟国承诺战胜敌方联盟，其中也包括土耳其之后，将达达尼尔和波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君士坦丁堡移交给沙俄帝国。而斯大林在吞并了波罗的海，本萨拉比亚以及波兰的一部分之后，对海峡依然是梦寐以求。他向希特勒提出过这个要求，却毫无结果，而现在则指望借助反法西斯联盟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算计最终落了空。斯大林终究未能得到海峡。

此后，希腊发生的事件，即英国人相当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队伍，可以使我有理由认为，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得到了遵守。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人的求援呼吁装聋作哑，平静地注视着伦敦对他们采取的镇压措施。照样地，丘吉尔对佛林·奥菲斯有关对罗马尼亚局势进行积极干预的要求不加理睬，这里，按照英国外交机构的意见，莫斯科施加了粗暴的压力。从莫斯科协议的角度看，后来西方大国开始干涉匈牙利事件时，斯大林的愤怒也可以理

解。

-----  
帕布斯夫人推心置腹的一席话(2)  
-----

斯大林做出种种姿态，向丘吉尔示好：亲自到英国大使馆出席宴会，陪同丘吉尔到大剧院看戏，为丘吉尔设家宴，亲自到机场送行等等。

但丘吉尔却不为所动，他坚持认为，苏联惟一能够理解的语言便是武力。

英国首相在苏联首都期间，斯大林给予的十二分尊敬，也可以证明与丘吉尔达成的协议使斯大林感到完全满意。斯大林不仅再次邀请丘吉尔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家里共进晚餐，而且整个举止异乎寻常。记得，当斯大林接受了丘吉尔的邀请与其在大使馆共进晚餐时，莫洛托夫秘书处，尤其是索非亚沿岸街（后来的莫里斯托列兹沿岸街）的英国大使馆里是何等的忙乱。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前“各族人民领袖”从未去过任何大使馆。莫洛托夫早早派我送去主客名单，以便让大使馆准备请柬。我方出席晚宴的，除了斯大林，还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维诺夫，卡冈诺维奇等人。

莫洛托夫带着我跟巴甫洛夫，比其他人早到了。我们站在迎客的丘吉尔身后。不知为什么，莫洛托夫想到要介绍我，叫着我的名字，他说道：

“你们没有听说过他吧？没关系，很快就会听到的……”

他想说些什么，我始终未能了解。也许，想把我从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职位推到某个更高的岗位上，或者转到驻外的高级外交职位上，并且他想让在场的高官们注意到这个尚不为人知、却已经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年轻人。不管怎样，可能是由于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这些都与我无缘。对此下面有专文交待。

在宴会开始之前，侍者分送饮料，交谈的气氛非常热烈。丘吉尔在人群中串来串去，一边跟客人们说一两句话，而我和首相的译员比兹跟着他。巴甫洛夫则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身边，一批英美的外交官围着他们。走近人民交通委员卡冈诺维奇的近旁，首相问道，他是如何使俄国的运输系统高效运转的。“如果机车司机不能完成任务，我就这么处理他。”卡冈诺维奇咧开嘴巴大笑，然后用大拇指横着划过咽喉部位。

应该承认，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敌机轰炸、机车车辆、燃料和熟练技工严重不足的条件下，铁路运输虽然非常紧张，但也经受住了考验。但我想，支配铁路员工的，不仅仅是恐惧，而且是对前线 and 后方所承担义务的理解。

正在宴会进行的时候，听到了礼炮齐鸣：莫斯科在向占领了匈牙利城市塞盖德的红军致意。丘吉尔在莫斯科期间，多次目睹了莫

斯科人的欢呼。人们聚集在红场上庆祝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苏联军队解放了里加，逼近了东普鲁士。在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正在朝莱茵河推进。所有这些，造成了昂扬的情绪，这也影响了在英国大使馆那次令人难忘的晚宴上的气氛。

丘吉尔兴奋地说起了自己前不久的意大利之行，以及那里的人民如何热情地欢迎他……

斯大林给首相泼了点冷水，他指出，同样的那些人前不久在颂扬墨索里尼。丘吉尔不喜欢这些，所以他把话题转移了。

丘吉尔开始论述，三大国在战后保持合作关系是如何重要。他是真诚的吗？我想，这不见得。因为正是 1946 年他在伏尔顿的那篇演说，事实上第一个宣布了“冷战”的开始。但是，1944 年，当苏联承担着对希特勒作战的主要部分，重要的是使斯大林相信，他已经被接纳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伙伴。

“在我们的士兵在无数战场上为之流血的未来世界里，”英国首相的讲话意在载入史册，故而十分激扬，“我们三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正在向全人类展示，不论在战争，还是在平时时期，我们都将忠于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的原则。这也是为何我如此重视复兴的波兰与苏联之间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

“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斯大林突然打断了丘吉尔的宏论。

英国首相一下子哑了。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所谈论的是教皇不仅仅在波兰，而且是在全球范围的精神影响。但是，斯大林再次表明了，他只尊重实力，将丘吉尔从九霄云外拉回到地面上。

还涉及到了南斯拉夫问题。斯大林警告说，按照铁托的意见，黑山和斯洛文尼亚人决不会同意跟国王彼得和他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合作。艾登说，彼得国王涵养非常之好，而丘吉尔则补充说，他非常年轻，还可以积累经验。

“他多大了？”斯大林问道。“二十一岁。”艾登回答说。

“都二十一岁了！”斯大林激动地叹道，“彼得大帝十七岁就开始统治俄国了……”

我们的领袖经常提到俄罗斯帝国的沙皇统治者。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哈里曼在战败的“第三帝国”首都火车站迎接苏联代表团时，询问斯大林，他作为胜利者来到柏林是否感到愉快。

“亚历山大沙皇都到了巴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这是句玩笑话，抑或是这里有着某种隐秘的意思？法国解放之后不久，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来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之后，问他：

“戴高乐要求抵抗运动成员向当局缴出武器。我们怎么办？”

“把武器藏起来！”“各族人民领袖”回答说，“可能你们还能帮着我们呢。”

斯大林是什么意思？他是否在担心，从前的西方盟国将对苏联

开战？或者他自己期望将红军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话题又转到了英国下年即将进行的议会大选。斯大林想奉承丘吉尔，便说道：

“我毫不怀疑，保守党人将会获胜……”

在波茨坦会议上，与出发前往伦敦的丘吉尔告别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当首相对自己能否重新回到蔡奇利耶霍夫，或者艾德礼将会替代他表示出疑虑时，斯大林坚定地表示，胜利者不会输，并且选民会支持作为战时领导人的丘吉尔。这是什么——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情报不足或者只是想给丘吉尔说些好听的话？

丘吉尔造访大剧院也被安排得十分排场。大厅用英苏两国的国旗装饰。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当丘吉尔出现在中央“沙皇”包厢时，观众向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并且，这一次斯大林破了自己的规矩，也来到了大剧院，不过比英国首相晚到了五分钟。他从包厢深处走到丘吉尔身边，这时，事先经过挑选的观众看见两位领导人之后，变得更加热烈。斯大林稍微停留了一下，便退到了后面去，以便让掌声对着首相一个人。欢呼在继续。丘吉尔发现了这个谦恭的姿态，转过身去叫斯大林过来。后者重新走近包厢的栏杆，这又使观众爆发出新的雷鸣般的掌声。

灯光慢慢暗了，大厅里响起了前奏曲。当晚的节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芭蕾舞“吉赛尔”第一幕，第二部分是红军歌舞团的演出。

幕间休息时，在与中央包厢相连的一个小厅里，准备了简单的

便餐：冷菜，鱼子酱，乳猪，伏特加，白兰地和葡萄酒，甜点，水果，茶和咖啡。席间的气氛非常轻松。宾主互相祝酒，开玩笑，讲笑话。不知是谁，在谈到“三巨头”时，将他们比作圣三位一体。斯大林接着这个玩笑说道：

“如果是这样，那么丘吉尔先生当然是圣灵了，他总是飞来飞去的.....”

饭后，丘吉尔和艾登请人带他们去卫生间洗手。第二幕开始的第三遍铃声响过，贵宾却没有回来。斯大林开始着急，派我去找他们。当我们回来之后，艾登发现了斯大林询问的目光，就解释说：

“关于波兰问题首相在那里有了一些想法。我们只顾了讲话，没有听见铃声.....”

这个解释把大家都逗笑了。回到包厢时，情绪更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和艾登到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家里出席晚宴。在门厅迎接客人时，他指了一扇门说：

-----

与父母重逢

-----

“这是卫生间，如果想讨论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你们可以在这

儿洗手……”

每次会见丘吉尔，斯大林总不放过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好感。也许，他认为英国领导人终于愿意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与苏联发展关系，愿意将他斯大林看作平等的伙伴。当时丘吉尔所作的许多声明和姿态，似乎在不断证实这个结论。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丰盛的晚宴之后，两位领导人单独呆在一间不大，但非常雅致、绿色调的房间里，它与举行宴会的叶卡捷琳娜厅相连。当时英国贵宾的态度十分软化。呷着白兰地和咖啡，抽着巨大的缅甸雪茄，丘吉尔不止一次地自怨自艾，请求斯大林不要为了英国曾经参加过对年轻苏维埃的干涉而记仇。

“谁提起旧事，就让他滚蛋。”斯大林和解地说。

“可是您能不能原谅我本人曾经亲自组织协约国的征讨？”丘吉尔继续坚持道。

“不该由我饶恕您，”“各族人民领袖”宽宏大量地答复说，“让上帝宽恕您吧。”

10月19日早晨，当丘吉尔准备出发去机场时，给他送来了两个大纸盒子，还有斯大林的亲笔便函。盒子里面装着两个图案精细的花瓶：其中一个给首相夫人的，上面画着“舟中舵手”，第二个称作“挽弓射熊的猎手”。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隐秘意义？丘吉尔夫妇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通信中，把斯大林称作“老熊”。只是，克里姆林宫的主子怕是不得而知的了？

我早早出发到机场送丘吉尔。天气非常糟糕，突然变冷了，下

着小雨。机场的遮阳棚容不下所有的人。政府保卫部门军人和便衣人数之多使我惊讶。但是，没过五分钟，便明白了，这样的保安措施是为什么。一大串汽车停在了阳棚前。从第一辆和第三辆车上跳下来了身穿长军大衣的军官。其中一人打开了第二辆的车门——我们看见了斯大林。他身穿绿色带肩章的风衣，戴着元帅帽。从风衣下看得见带鲜红镶条的裤子。斯大林出现在机场，是他想最后给丘吉尔的又一个非同寻常的殷勤姿态。

英国人还没有到，但是，斯大林拒绝走进房子，站在雨中等着。丘吉尔一行终于出现了。跟他们一起，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也到了。

看见斯大林之后，丘吉尔感到惊喜。两位领导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后英国领导人决定照样做出一个客气的姿态：邀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观自己飞机的座舱。座舱的设备装饰非常好。斯大林不禁感叹说，现在他明白了，为何首相如此喜欢周游世界。

1944年12月底，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与丘吉尔保持密切关系的努力。当时，英美军队在阿登地区处境艰难。德军使用大兵团反攻，将盟军逼向西方。出现了战线崩溃、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部被歼的危险。丘吉尔吁求援助。他派遣空军元帅特德前来莫斯科，要他向苏联领导人描述盟军所处的绝境，并弄清楚，红军能否提前展开冬季攻势。“西方正在激战，”丘吉尔向斯大林通报说，“我们能否在元月份之内指望俄军在维斯杜拉河地区或者其他任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我认为事态紧急。”

苏军指挥部当时没有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天气情况极为不利。攻击提前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和伤亡。但斯大林决定向盟军展示“善意”，并且提醒对方，当 1942 年夏天红军处境困难时，英美并没有驰援。“考虑到西方战场我们盟军的处境，”他给英国首相的电报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加速完成准备工作，并不顾天气情况，不迟于元月中在中央战场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您可以不必怀疑，我们将做任何可能做到的一切，向我们强大的盟军部队提供援助。”

这个承诺兑现了。一月十二至十五日，红军在 700 公里的正面向西推进。截至到二月一日，红军在主攻方向上推进了 500 公里，解放了华沙，来到了奥得河，即德国的新国境线。截止到二月四日，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红军距离柏林只有 60 公里。盟军距离他们还有 500 公里。

在利瓦地雅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感谢斯大林帮助了艾森豪威尔，并通报说，阿登地区的局势已经改观。但是，雅尔塔会议上，讨论重要问题接下来的进程却显示，斯大林与英国领导人达成“互谅”的希望落空了。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上，在波兰问题上，在联合国宪章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和对立。与倔强的保守党领袖相比，斯大林更容易与罗斯福相处。

就在打败德国的前夕，英美与希特勒密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秘密谈判，使局面暗淡。

就这件事，正如前文所述，在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信件来往之中

有过激烈争吵。但克里姆林宫认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并且，丘吉尔避而不答并非没有缘故。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感觉到，杜鲁门总统，其对苏联的敌意态度早已经不是秘密，认为丘吉尔是真正的同道。在波茨坦用原子弹讹诈莫斯科的图谋尤其使斯大林警觉。对这个威胁，斯大林采用对东欧国家施加强大压力作为回应，结果，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激烈反应。丘吉尔在伏尔顿的演说受到杜鲁门的称赞，显示斯大林与丘吉尔“合作”的希望不过是幻想而已。

此后，从一系列文件中显示了丘吉尔的真正立场。

丘吉尔的私人医生摩兰爵士回忆了 1946 年跟自己著名病人的一次谈话，当时美国依然独霸着原子弹。

“我们不应该等到俄国做好准备的时候，”英国前首相说，“我认为，他们获得这些核弹还得七年。美国知道，俄国百分之五十二的机械工业企业在莫斯科，并且可以使用一颗炸弹摧毁它。这也许意味着三百万人的死亡，但对他们（美国人）而言，这根本无所谓（他微微一笑）。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性建筑，譬如克里姆林宫的被毁。”

1948 年，在与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谈话时，丘吉尔指出：

“现在是最恰当的时机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退出柏林，不离开东德，我们将从地球上抹掉他们的城市……他们唯一能够接受的语言，便是武力的语言”。

-----  
罗斯福临终前的一封电报  
-----

斯大林向美国人建议两国情报机构互设代表处，定期交换情报。实际上，这是罗斯福的想法，只不过斯大林“偷听”到了，决定“先发制人”。

罗斯福出于大选的考虑，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战争年代，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与来访的美国人士会见。这里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其中有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怀登·威尔基，前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美国商会主席艾里克·詹森，美国战略署（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主任威廉·多诺万等等。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美国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苏联领袖认为，与他们进行哪怕简短的谈话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多诺万的莫斯科之行便十分有趣。

1943年11月中，威廉·多诺万为了处理自己机构的事务到了当时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多诺万从那儿来到伊朗首都，赶上了“三巨头”德黑兰会议的最后几天。会议结束之后，他跟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一起，乘坐轰炸机改装的美国大使专机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

的最初目的，是苏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就纳粹德国的局势交换资料。

莫洛托夫派杰卡诺佐夫跟我代表外交人民委员，代表内务人民委员到机场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我在柏林时期的同事萨沙·克罗特科夫，他当时从事对外情报工作——在伏努克沃机场迎接多诺万。

维廉·多诺万完全符合美国人给他的诨号“野牛比尔”：他身材胖大，体壮如牛，说话大嗓门，非常活络，从一见面，他好像认识我们几个很久似的。虽然他在飞机上呆了一夜，但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疲劳。当杰卡诺佐夫问他，中午去见莫洛托夫有没有困难时，多诺万回答，他愿意现在马上就去。多诺万在哈里曼的陪同下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我翻译了这次谈话。

在相互问候之后，多诺万讲述了自己来访的目的：在目前局势下，即美国与苏联是盟国，并且正在与共同敌人激战，必须动员所有的资源加速胜利。秘密机构获得的情报在这里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多诺万，高度评价苏联的情报机构，并且认为，美苏两国情报机构之间交换资料，将有助于盟军在前线作战。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感兴趣，并说，多诺万应该与苏联有关机构实际讨论这个建议，此后可以做出相应的决策。

就在这时，莫洛托夫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进来。他身穿元帅服，右手拿着那个无时不有的、熄了火的烟斗。我们从铺着绿呢绒的长桌旁边站了起来，由于事出突然，多诺万竟然一时语

塞，但莫洛托夫显然知道斯大林要来。他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多诺万终于说得出口来：

“我非常高兴，能够荣幸地见到您，斯大林元帅……”

“请坐，”斯大林请我们大家坐下，自己坐在了桌子中间，“我多次听说过您，多诺万先生，所以决定利用您来莫斯科的机会，亲自与您结识。听说，您负责的那个机构，干得非常出色……”“我也想说，”多诺万连忙回应，恭维道：“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正因为如此，我向莫洛托夫先生建议，安排两国机构之间交换情报……”“为何我们不采用固定的方式进行这种合作？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这些机构的代表处？”斯大林提议说。

多诺万转向哈里曼，似乎要他第一个回答苏联领袖的建议。

稍事停顿之后，哈里曼声明说，他认为这个意见是有益的，并表示支持。多诺万迅速附和了美国大使的意见。

奇怪的是，在如此微妙的问题上，两个美国人未经与华盛顿的事先磋商就表示了同意。从哈里曼的回忆录中我们现在知道，在德黑兰时，他跟罗斯福总统讨论过类似的想法，并得到了总统原则上的同意。哈里曼了解苏联对秘密的癖好，他考虑了很久，采取何种方式向莫斯科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出人意料主动提议，大大减轻了大使的任务。但也可能，“主人”决定先发制人，并以此证实苏联情报机构神通广大。因为，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尽最大努力使总统免遭窃听，但是，在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罗斯福下榻的房间里，克格勃的“小甲虫”一直在正常运转。每天早晨，我替莫洛托夫连通行证一

起，领到一叠克里姆林宫专用“直纹”纸打印的谈话内容，上面用笔补写着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每个人的姓名。同样的文件也送给斯大林，所以，他当然知道哈里曼与罗斯福有关美苏情报机构可能合作的谈话.....

在这个问题原则上解决之后，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又呆了一会儿。多诺万接着讲述了自己的印度之行，以及在当地民族主义圈子里十分流行的日本宣传口号：“亚洲人的亚洲”。在这个旗号下，某个辛格少校领导了印度民族军，向英国人宣战。斯大林仔细地听着，也许这时回忆起了现在已经失去意义的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多诺万与内务部的领导举行了会谈。双方顺利地达成协议，即在对方的首都建立特别代表机构，由一名军官以及几个技术性人员组成。

哈里曼和多诺万非常兴奋。但是，两个月之后，罗斯福总统抛弃了这个想法。哈里曼认为，这是白宫幕僚长莱盖海军上将背后捣了鬼，后者根本就不喜欢他。

实际上，总统只不过改变了主意。1944 年到了，这对于罗斯福而言，是第四个新的大选年。在已经展开的激烈的竞选期间，克格勃一中情局的合作协议，可能被罗斯福总统的对手巧妙利用。

\*\*\*\*\*

### \*第三章夜入克里姆林宫

\*\*\*\*\*

大清洗的浪潮终于波及到了乌克兰，党政领导人全部遭到镇压，普通人也不能幸免。一天夜里，我父亲被政治总局的人带走。

-----

柏林阅兵(1)

-----

1940 年 5 月 10 日，希特勒军队不宣而战，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

战事结束之后，希特勒在柏林举行了阅兵式。我就站在主席台附近。希特勒与斯大林在运用各种制造气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局势变化神速。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德军不宣而战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希特勒将自己又一次侵略行径解释为有必要为这两个国家“加强中立”。当然，没有人相信这个。这一次，“闪击战”也奏效了。德军几天之内就占领了荷兰。比利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随后开始了法国战役。

五月中，我被召到柏林。苏联驻德国商务副代表科尔米里岑前往鹿特丹了解我国冷藏船的下落，因为我曾经去过鹿特丹，所以要陪同他一起去。

柏林与海牙之间的铁路交通迅速恢复了，所以在火车的豪华餐车里，只有大量的军人令人想起正在打仗。在荷兰境内，由几座铁路桥被炸毁。火车减慢了速度，似乎摸索着在铁轨上前进，铁轨下是德军工兵修筑的临时支撑物。

海牙看不到战事明显的痕迹。个别地方站着德军哨兵，但大体上是荷兰警察在维持秩序。

我们顺路到了粮食进出口公司，科尔米里岑听取了利沃夫的情况介绍，后者仍然被德军闪电般占领一个国家而受到强烈震撼。然后我们开车前往鹿特丹。在公路上才出现了外敌占领的明显迹象。一个个十字路口，桥梁和船闸处，停着德军装甲车，有手持冲锋枪带钢盔的德军士兵。涂成伪装色的德军汽车往来疾驶。有几次，武装巡逻队拦住我们，检查证件。

快进城时，我们看见了城市上方的乌云。闻到了焦糊味，烧糊的咖啡味。鹿特丹被炸毁的地区，以及保存来自殖民地货物的港口仓库等地仍在冒烟。

在船坞，我上次来时认识的公司代表迎接了我们。在工厂厂部舒适的办公室里，科尔米里岑得到了坏消息：造船台上的那条船在轰炸中烧毁了，而已经下水的那条船则安然无恙。于是我们出发去看船。走过从前的造船台时，看见了被大火烧成一堆的废铁。保全

下来的冷藏船上，上层建筑和船体整修接近完成。到处是铅丹，润滑油和油漆的味道——这些特殊的气味令我想起遥远而和平的 1937 年，当时我曾经参加过基辅船坞拖轮的试航。

公司负责人许诺加快速度完成冷藏船的建造。果真这条船在秋天之前便建好，然后自航到达列宁格勒。

鹿特丹的事情办完之后，我们开车去了布鲁塞尔。由于战事，比利时使馆商务代表处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了。上面要求科尔米里岑在当地弄清情况。在荷兰境内，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在边境上，只有跟荷兰和比利时边防军并排站着的德军军官，才使人想起占领。我们没有任何签证，只有临行之前从德国外交部拿到的一纸证明。这是我们过境所需的全部东西。但是，当我们刚刚深入比利时境内，立即感觉到战争近在咫尺。许多地方显然进行过激战。公路两旁横七竖八地放着打坏和烧毁的军车。时不时会碰到一堆人马，自行车上装着一点可怜的行李，推着童车和独轮手推车等。情况好一些的驾着四轮大车，上面装满了箱子，包袱，家具什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难民开始了漫长而悲伤的路程。

在布鲁塞尔的大使馆，卢比宁大使是一个契切林式干练的外交官，三十年代末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清洗之后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他通报说，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处没有任何损伤，所有的工作人员平安无事，并且完全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

卢比宁用鱼子酱和奶酪的面包片，咖啡和饼干招待了我们。然后提议看看市容。

布鲁塞尔的情况使我非常惊讶。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根本不曾有过战争一样。比利时警察在指挥交通，衣着考究的人群挤满了漂亮的林荫道，人行道上花花绿绿的阳伞底下大理石小桌旁衣着光鲜，穿着裘皮女士男士从容地说着话。空气中飘荡着咖啡，昂贵的雪茄和雅致香水的芬芳。排场的商店里满是各种各样的商品，蔬菜和水果堆成了小山，糖果店里诱人的橱窗。只是偶尔遇见一小群德军军官，以及完全看不见的比利时军服令人想起，国家处于德国占领之下。

后来当然一切都变了。开始了对西方占领区有组织的抢劫，虽然规模没有在东方那么大。但是，在被占领的最初几天里，布鲁塞尔依然保持着正常的生活。

晚上，卢比宁邀请我们去一家夜总会。这里也是热闹非凡。一对对男女在打着底光的玻璃圆盘上跳舞。然后，在这个圆盘上出现了一个胸部丰满的美丽女郎，跳了一阵脱衣舞。接着表演的是魔术师。过后是舞蹈。按照规矩，在这种场合只供应香槟酒和葡萄酒。除了坚果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一群德军军官占据了最大的包厢，其中还有一个戴单眼镜的将军。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傲慢观察着失败者在消遣。

在商务代表处过夜之后，早晨我们出发去滑铁卢——参观标志拿破仑时代结束的历史性战役的纪念物。很快过去的战事没有触动到这里，但就在附近的小城诺缪则完全变成了废墟——残垣废墟仍在冒烟，窗户像空洞洞的眼睛般幽幽地看着我们。天空飘荡着浓浓

的压在废墟下正在腐化尸体的味道。整个这个死亡地带被德军士兵包围着，只是德国外交部的一纸证明才把我们放了过去。

-----  
柏林阅兵(2)  
-----

法国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德军指挥部的每天公布的战报中，报告着占领一座又一座城市。“马其诺防线”始终也没有起到它预定的不可逾越堑壕的作用，被德军绕道而过。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柏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次世界大战骄傲自高自大的胜利者漫无秩序地在后撤，甚至在恐慌之中在前不久的战败者的突击下逃跑。这是对不公正的、强迫订立的凡尔赛条约的复仇。比利时和法国是一群群疲惫不堪、饥饿、衣衫褴褛的难民，以及整齐端正、纪律严明、充满自信的德军官兵！这是何等惊人的反差！难道就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股侵满欧洲大陆的洪流？并且这股巨浪现在又要走向何方？

在鼓点和呼喊声中，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辉煌的胜利。巴黎陷落了。电影纪录片再现了凯旋门，德军隆重地成队走过。希特勒在拿破仑墓前摆着姿势。英国远征军被包围在敦刻尔克。英军士兵

们抛下武器弹药，利用元首大度地给了他们的间隙，泅渡英吉利海峡。法国投降了。在又一部电影纪录片中，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在福熙元帅那个历史性的车厢边上手舞足蹈，1918年11月11日，这里接受了凯撒德国的投降。现在，1940年6月21日，希特勒德国给法国强加极其苛刻的投降条件。

柏林终于举行了远征西方归来部队的阅兵。希特勒亲自进行检阅。我站在距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在胜利大道上，看到，当元首乘坐敞棚汽车缓缓驶过时，人群向他伸出手来。如此大规模的疯狂！希特勒终于站在主席台上，他身穿十分简单的制服，挂着一枚铁十字勋章，身旁是一群元帅，将军和党卫军的高级将领。

希特勒举起手臂，作法西斯欢迎手势，似乎在祝福一排排走过他身旁完美无瑕的部队。这个场面威严而恐怖。

商务代表处收到了“克罗歌剧院”外交官包厢的请柬，这是从前的歌剧院，帝国议会失火之后希特勒任命的“议员们”在这里开会。我们提前到了，所以观察到大厅逐渐坐满了人。大多数是穿制服的——陆军，海军，党卫军等等。穿便服的人极少。舞台上，戈林身穿专门为他设计的银白色帝国元帅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和奖章。跟他站在一起的，是赫斯，海本斯，希姆莱，里宾特洛甫以及其他的纳粹高官。希特勒还没到。大厅里的人静下来等待着。突然，这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我们包厢的下方，希特勒出现了。他旁若无人，慢慢地沿着过道朝舞台走着，右手举起来，作法西斯欢迎姿势，左手放在军便服的皮带上。他似乎对大厅里的狂

喊，和“嗨，希特勒！”，“嗨，元首！”等听而不闻。

看着这一切，我想着，并且老实说，被这个念头吓住了：这跟我们那里各种会议上斯大林出现时的情景何其相似。也是一模一样，雷鸣般的掌声转变成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也是这样全体起立。也是同样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喊叫声：“斯大林光荣！”，“领袖光荣！”

希特勒登上舞台，走向戈林。人们依然站着，唱着“德国高于一切”。又是一片欢呼声，叫喊声。希特勒等待了几分钟之后，然后作了一个手势。大厅变得静悄悄。戈林请“伟大德国的元首和帝国总理”讲话。重新响起了掌声。希特勒开始讲话，于是大厅静下来了。

打败了法国，并且让将近五十万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希特勒以为，英国将会求和。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表演技能，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有分寸，甚至谦逊，随和，愿意让步的人。没有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没有一句生硬的话——简直是客气至极。不过，他十分尖刻地挖苦了一番前不久出来领导英国政府的丘吉尔。但是，元首宽宏大量地给普通英国人指出了一条体面的结束战争的出路，保证将保留帝国。“在这一刻，”希特勒庄重地宣布，“我认为自己有良知和义务再次呼吁英国保持理智。我认为，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不是作为战败者祈求什么，而是作为战胜者呼吁理智。我看不到有任何继续战争的理由。”然而，伦敦的回答却是坚定的“不”。

希特勒失望之余签署指令，加快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行动的

准备工作。开始了对英国城市的猛烈轰炸。考文垂被炸毁。西敏寺——英国议会遭到严重破坏。但英国人的抵抗也在强化，大量的德国飞机被击落。柏林经常响起空袭警报。英国轰炸机不断突破帝国首都的防空网。

早在夏天伊始，我在一家裁缝铺定做了一套西服和一件风衣。那里答应我很快就能做好。但是，裁缝被征召入伍，于是事情拖下来了。我到裁缝铺警告他们，再也不愿意等了，但意外地打听到，我的师傅受伤复员，现在又回来了。当他拿着做好的衣服出来见我时，我没能认出他。前不久他还是个营养良好的小伙子，现在他成了个衰弱无力的老头子。他发现了我非常吃惊，对我说：

“战争能把人变成这个样子。我听了满脑子胜利的战报，兴奋地上了前线。别信这些报告。那里只有地狱和死亡。身体上我活着，但内心早已经被杀死了……”

他眼里流出了泪水。显然，他见识过从未打过仗的人不可能想象的东西。我这一代人暂时也还没有体验到。不过很快，千百万苏联人将被迫遭遇这个可怕的秘密。

-----

柏林阅兵(3)

-----

八月份，我被召回到莫斯科。我必须立即去向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报到。

-----  
德语学校(1)  
-----

我在基辅的德语学校上学。

小伙伴们不能忍受体育老师的折磨，决定进行报复。

国内的大清洗也波及到了这所学校，德裔的校长和老师们接连被捕。

基辅德语学校纪律严明，但这纪律不仅仅是对老师的尊重。虽然我们所有人被灌输，在苏联时代鞭答处罚和其他体罚是难以置信的，并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在路德街的学校里不会背课文或者不听话的学生不仅被罚站，在教室罚跪一节课，而且还揪耳朵，至于打后脑勺更是家常便饭了。谁告状，谁倒霉。一年级所有的课程由年纪轻轻，高个子淡黄头发的萨克森人巴乌里担任。他刚刚从德国过来，不知为何他被迫紧急离开那里。有传说他是德国共产党的“战斗队员”。在完成了领导交给的某个重要任务之后，他被迫躲藏起来。

我们还不清楚，什么是“战斗队员”，但这个词听起来挺吓人的，所以我们大家对他都怕怕的。他给高年级教体育课，绝不饶恕那些他不满意的学生。他最喜欢的方法，就是用有力的胳膊夹住不听话的学生的脑袋，然后用灰色的洗衣肥皂擦他的嘴。肥皂是用鱼油做的，所以气味很难闻。受害者想要把恶心的泡沫吐出来，不停地吐出肥皂泡，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喊着。这更加挑起了折磨者的好斗心理，他更加忘我地继续刑罚。周围的学生们吓得发抖，一动也不敢动。但是，有一次我们终于下决心报复他。

我刚到学校的时候，便得知两个高年级的男孩子们——德语学校成立时间不长，所以只有四个班——从去年起就分成两帮。每一帮人都有自己的头领。一个叫廖卡，另外一个叫久卡。我立即加入久卡这一帮，他很像我喜爱的电影演员道格拉斯·费尔本克斯。班里的绝大多数人相互势不两立，所以经常会发生激烈的斗殴。我不止一次回家时鼻子流着血。妈妈吓坏了，她叫父亲去学校，制止这种胡闹，而父亲则说会句笑话敷衍过去，他说，真正的男人应该自己会保护自己。可是，当出现了共同的对手，譬如临近一所学校名叫马扎率领的一帮欺负我们的女孩子时，我们当然会合起来。就在这样的一次停战中，报复的计划成熟了。

“巴乌里的侮辱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久卡对自己的对手说，“应该教训他一顿，哪怕我们要为此受一阵罪。”

廖卡开始思考，他开始使劲啃指甲，他注意力集中时，一般都是这个样子。最终他回答说：“我有个主意，我们商量商量吧……”

他们躲进了厕所.....

很快，这个计划连同细节都详细订出来了。参加的每个人都有具体的任务。最后决定在下一次体育课上实施这个计划。

当巴乌里给我们演示助跑时，廖卡使了个拌子。他倒下了，一大帮人马上飞扑到他身上，把他的手脚摁在地上。也许是太突然了，也许是恐惧给我们大家添了劲，这个大力士一动也动不了，试了试想要挣脱，安静下来了。久卡骑在他身上，也用同样的洗衣肥皂擦他的嘴。当折磨我们的人也开始吐肥皂泡时，孩子们是多么的兴奋啊！我们知道，狂怒的他如果不会杀死我们话，也会打伤任何一个落到他手里的人。所以我们预先已经约好，应该大家一起同时从他身上跳开，逃出大厅。巴乌里狂喊着，活像一头受伤的公牛，肥皂泡刺痛了他的双眼。这时，久卡一声呼哨，我们放开了受难者，四散逃掉了。巴乌里始终也没能抓住谁。我们逃脱了。

我们预料他会向校长告发，将会进行调查，然后我们会被学校开除。但是，过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什么事也没有。显然，巴乌里想过之后认为公开此事有伤他的体面。也可能，他见识到了我们保护自己以及同伴的疯狂勇敢和舍己的决心。在下一次体育课上，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过一样。于是我们对他非常尊重。不过他本人也变了——以后再也没有采用肥皂刑罚，而是像其他老师一样，轻轻地打一下后脑勺完事。

但是，严格的规章和纪律也有它的优点：学生们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教的东西，可以凭记忆复述整

篇整篇的课文。而德语更是与我终生相伴，成了我的第二母语。显然，正因为如此，父母们虽然确切知道体罚的事，但并未提出抗议，也没有把自己的孩子从学校领走。

我没能上高年级，这件事刺伤了我。我感觉那些伙伴们在精神上更接近些。我觉得，在总体发展上我跟他们一样，而不是跟那些三年级学生。所以，我最好的朋友不是在自己班上，而是在四年级。他叫米海里。他是个正宗德国人，确切地讲，是巴伐利亚人，虽然姓氏是沃隆诺夫。他的故事不一般。米海里出生在风景如画的小村庄佐特霍枫，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他比我大一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父亲在前线战死，后来派来了一个俄国俘虏沃隆诺夫帮着干活。一开始，他只是在他们家当雇农，照看奶牛，在地里干活。但很快他就跟米海里的母亲同居了，并生了一个男孩叫汉斯。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后，沃隆诺夫带上一家人回到了乌克兰，办理了结婚手续，在基辅安了家。就这样，米海里姓了沃隆诺夫。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期待着回到巴伐利亚，兴奋地给我讲述阿尔卑斯山，教我唱巴伐利亚歌曲。我跟他非常要好，有一年请他的父母让米海里跟我们一家一起在斯瓦里切夫卡过暑假，夏天我们跟母亲总是到那儿去。米海里一家非常穷，父亲在一个什么铺子里工作，挣钱不多，而且酗酒。他的父母非常高兴可以一两个月少一张嘴。我的父母亲也非常欢迎这个主意，因为这样有人跟我玩，并且可以有机会练口语。

-----  
德语学校(2)  
-----

但那年夏天我可顾不上玩。对上过四年级，马上要转到五年级的娜塔莎少年恋情，使我更加迫切希望升入高年级。而新经济政策时期发了财的希腊人的女儿塔玛拉被我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娜塔莎在我心目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儿。我总想呆在她身边。我给她写了许多热烈的情书，喜悦的眼泪打湿了信纸。但却没有得到回报。我说服自己，当我赶上她时，她会注意到我的。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暑假期间把四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秋季考五年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何以会有那么样的意志与力量，牺牲休息和乡村的娱乐，放弃骑马和夜间钓鱼，不去采蘑菇，也尽量不去游泳。

屠格涅夫曾经说过，爱比死亡强大，比死亡的恐惧强大。我当时也体验到了类似的情形，非常高兴地牺牲一切，为的是达到既定的目标，不曾怀疑，不曾害怕会失败和全部的努力会白费。某种神秘的激情给了我力量和顽强的精神。从来到斯瓦里切夫卡的头一天起，我就拿着米海里带来的书本用功。他是个真正的朋友，帮助我对付那些似乎是力所不能及的课程。但我做到了，通过了考试，上

了五年级，并且以得胜者的权利跟娜塔莎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冒险，不能不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从四年级跳到五年级，我的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会晚一年从七年制学校毕业，也就是1931年，而不是1930年，也就是乌克兰开始大饥荒的那一年。而这样，我会在卫国战争开始的那年大学毕业。一切都会挤成一团，乱成一团。如何能不相信，说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偶然编织而成的？

五年级那一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对娜塔莎柏拉图式的爱情，每天能够跟她坐在一起，使上学成了一连串的节日，并使我轻松地完成功课。此外，还有不少的娱乐。赫德维克小姐教我们唱歌，音乐和绘画课，指导我们的业余话剧活动，我们大家都参加了。我们的演出在克列夏季克的商人工会俱乐部进行，那里有一个带舞台的大厅。观看演出的不光是家长，我们自己动手画的色彩鲜艳的海报吸引来了市里的公众。我们的常客是魏玛共和国的总领事。他剪着平头，外加硕大的后脑勺，非常像金登堡，他有着军人的作派，显然曾经是德军的将军。基辅郊区驻扎着一支部队，官兵都是德裔。他们负责指导我们学校，所以我们也经常去他们那儿。那里所有的地方——各种标语，口号，图表等全使用德语，命令也是用德语下达。

德国总领事经常参观这支部队。当时，红军总参谋部与德军指挥机关合作密切，经常与其在基辅近郊举行联合演习，其中我们的指导员，德裔的官兵也参加这类演习。每年夏天，我们会在基辅近

郊德达尔尼茨军营里住一两周，照看马匹，在演习充任侦查员的角色。

我还记得在同班同学舒尔卡·蔡特林的宽敞的家里举办晚会。他住在距离学校不远的格罗杰茨基大厦里，那幢房子的建筑奇异，不同寻常，往往引起行人的注意。革命前，格罗杰茨基也许是当时最时髦的建筑师了。在基辅，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建造了带希腊式廊柱，多利斯式圆柱以及宽阔的阶梯旁有两个石狮的历史博物馆，摩尔式银行大厦等其他建筑物。但是，最别致的却是位于银行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格罗杰茨基是个酷爱打猎的人，每年都要去非洲，用鹿，老虎，狮子，兀鹰等装饰自己巨大的别墅，屋顶几个角上是尾巴朝上翘起来活像精巧蜡烛一样的美人鱼。苏联时期，那里安排住进了几家人，舒尔卡的父亲，曾经是私人执业妇科医生，占了整整一层楼。我们喜欢在那儿玩，还因为他们家里养了一只小猴子。它在各个房间跑来跑去，从五斗橱跳到衣柜上，从一张椅子跳到另一个椅子上，逗我们开心。不过，它身上的味道不太好，但因为它那非常令人感动的鬼脸和罕见的奇异，其他地方都被原谅了。

在这些晚会上，我们朗诵德语、俄语和乌克兰语诗歌，自办音乐会，玩罗托，玩木雕象形，以及革命后保存下来、在知识分子家庭孩子中间十分流行的游戏“鲜花风情”，即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卡片上花的名称下面写着经典作品的片断。把花的名称说出来，并交给女同伴，传递纸条时，不能大声说出来..

那是多么快乐，无忧无虑的年代啊！

但是，从下一年开始进入了黑暗时期。我对娜塔莎突然冷淡了，变得孤独而失望。而她也在偷偷地难过。米海里的母亲跟沃隆诺夫离了婚，然后要带上孩子们，回自己的佐特霍枫。这是第一个打击。我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永远失去了。因为当时觉得外国太遥远了，就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一样。我们俩最后一次去了一趟以前常去玩的第聂伯河峭壁，向着阿斯柯德墓鞠躬，希望它神秘的力量以后会让我们再见……我们非常伤心，甚至愿意一起跳进漩涡。但是，不得不认命。

学校里也开始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赫德维克小姐被捕了。有传闻讲，似乎她参加了某个破坏组织。没过几个月，数学和物理老师席林也消失了。赫德维克小姐似乎作证说他就是这个“破坏小组”的负责人。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够破坏我们国家，但依然相信听到的传闻。很快，“战斗队员”巴乌里也被捕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来了一些德语很差的新老师。部分课程开始用俄语讲授。我们大家都喜爱的校长菲比赫是最后一个被捕的。路德街上的教堂也被关闭了。我在想，好在乌伯夫妇已经回了德国。否则他们也会被认为作间谍的。事情发展到了要解散德语学校，很快学校被解散了。我们之后，仅毕业了一个年级。

-----

父亲被捕(1)

-----

大清洗的浪潮终于波及到了乌克兰，党政领导人全部遭到镇压，普通人也不能幸免。

一天夜里，我父亲被政治总局的人带走。

在德语学校升到六年级之后，便很少见到父亲。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船坞的设计和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他早出晚归，而我要上第二个学：早晨在我们楼里有一所乌克兰七年制学校。休息日更是杂乱无章。显然，当局为了让人忘记星期天的宗教意义，不习惯教堂，实行了五天工作制：每五天是一个休息日——五号，十号，十五号，二十号，二十五号以及三十号都是休息日。工厂企业实行灵活工作日制度，保证连续生产。结果，许多家庭成员的休息日各不相同，所以，实际上几乎没时间交流。

很快就发现，在工厂企业里，往往不能找到某个当时需要的员工。出现了过度频繁的变动，最后“不间断生产”被迫取消。结果是，克里姆林宫的试验家们给家庭和生产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失之后，又回到了正常的六天工作制，星期天休息。

这也许是党和政府最初的唯意志论决策之一，而苏联时期这种东西数不胜数，直到八十年代后起的反酒精运动，结果彻底搞乱了商业。惟一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所有决议和行动有科学根据的领导们，如何却不能预见到自己决策的后果。最有意思的是，人民永

远不能知道，谁人将用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造福于他们。

有几次，父亲带着我乘快艇在第聂伯河上旅行。他跟来自莫斯科的政府委员会一起，挑选建造船坞的合适地方。我们乘船一直逆流而上，走得很远，然后顺流而下。大地测量专家考察适合建造厂房的一个个浅滩和小港湾。这都是些美妙、风景如画的地方，长满红藤蔓的人迹罕至的沙滩，以及接近峭壁的水淹草地，小河湾和小树林。但当时国家醉心于工业化。人们奇妙的梦境中都是建设工地的脚手架，工厂冒烟的烟筒和四处可见的输电线。很少有人认真想过，类似正在设计的船坞这样的工业庞然大物出现之后，将意味着第聂伯河沿岸自然景观的消失，人类与动物自然生活的终结。

好在父亲的影响起了作用：为船坞最终挑选的地点位于河湾处，伯多对面，从前那里曾是修船车间。基辅上游和下游的第聂伯两岸未遭到破坏，直到战后，在维什戈尔附近，由于博德戈尔内等乌克兰领导人错误理解的“体面”而修建的水电站大坝，破坏了周围环境，淹没了数十万公顷的良田和牧场。

一直让父亲醉心的船坞终于开工建造了。对他而言，这段时间一点也不轻松。在审判了著名学者，蒸汽锅炉设计师拉姆辛等一批工程师的所谓“工业党案件”之后，开始逮捕革命前的技术专家。在父亲周围，消失的不仅仅有工程师，而且有许多高级技工。在又一个同事被捕之后，父亲脸色阴沉回到家里，话很少。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干破坏。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里有个可怕的秘密。大家都像是着了魔一样。他们干吗要破坏？他们的职位不

错，工作很好。为什么要让自己丢掉这一切？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算在他们头上的破坏行为，并不是恶意所为的结果，而是操之过急或者水平有限，随便那个建筑项目这种事情都少不了……”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也没有逃脱这种下场。一个出色工程师，从少年时代就追随革命运动，他的儿子别佳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经常看见别佳的父亲和母亲，漂亮的黑发女人，出席我们在商人俱乐部的演出。别佳的父亲蓄着胡子，胸前戴着一个当时十分稀罕的红旗勋章，大概是内战期间某个勇敢的行动而获得的。他怎么会是个破坏分子？

“他不是破坏分子，”别佳见过马上就要被发配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父亲之后，哽咽着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承认从未干过的破坏活动，就是这一生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最后一次做贡献。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还有内部敌人。人民应该保持警惕，并相信光明的未来。认罪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在加强革命所创造的制度，支持了人民对斯大林信任，而后者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

许多坚定的共产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自己相信权力机关绝对正确。绝对不可以认为，正在发生绝对的专断。必须让人们相信，政府永远不会错。如果某个人被捕了，也就是说，他有罪。任何辩白自己无罪的做法等于是企图怀疑政府的行为，也就是怀疑制度的公正。许许多多的刽子手和受害者都是这么想的。一般来说，当内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或者政治总局——抓走了某个人，他便再也不会回来，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从未有过这么

个人。党内最显赫的活动家的名字从人民的意识中被慢慢彻底根除掉。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德舍夫，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留布切科，内务人民委员巴里茨基，以及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等人就这样消失了。在我直接的熟人之中，新经济分子勃勃杜波罗全家，以及被宣布为“最危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扎多罗日内教授被捕。在搜查和逮捕他们时，我们合作社“快乐角落”的主席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曾经作证人，这个名字刚好合适改为“灾难角落”。

我父亲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但可以看出，迫害的浪潮烦扰着他。他对我什么也没说，但是，他大概也在等待着夜半敲门声。街上偶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深夜驶近大楼的汽车都会使他浑身哆嗦。我们全家整日生活在从未有过的恐慌不安之中。于是，最可怕的事情终于也轮到了我们头上... 母亲神经质地拉扯着我。在睡梦中，我意识到这应该是在深夜，只是不明白，她为何叫醒我。我清醒过来，看见了不祥的场面。母亲哭成了泪人。父亲在睡衣上披了一件长袍，穿着裤子，却光着脚，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间。在吊灯几个灯泡明亮的光线下，父亲平常就有的眼泡，现在似乎变得肿大，凸出来了。两个证人——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和我们楼看门人马特列娜，缩在墙角里的瓷砖炉子旁边。通往门厅的门口站着两个红军战士，还有一个站在窗户旁边，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爸爸的写字台旁边，一个身穿政治总局制服带肩章的人从容地在抽屉里翻

来翻去。这是搜查！我似乎被闪电的强烈闪光刺醒过来，但依然不愿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又一次，我的胸中像从前的受到震惊一样，但更强烈地翻腾起来。

-----  
父亲被捕(2)  
-----

可能，这只是搜查？找不到什么，他们会离去，放过我们？没有结果的希望。身穿政治总局制服的那个人抬起头来，目光朝着父亲的方向：

“您还站着干吗？穿衣服！……”然后对妈妈说，“帮他收拾东西，可以带一点棉衣……”

这就是说，不仅是搜查，而且是逮捕，并且是长时间的：现在是晚秋，我们这一带温暖而湿润，而棉衣是过冬用的……

搜查在继续进行。从五斗橱里拉出抽屉，翻检内衣，然后开始搜书柜。我们家有好多书柜，得搜一阵子。显然没时间把所有东西放回原地，政治总局的人非常职业化地用手翻着每本书，然后把书扔在地上。很快就堆成了小山。红军战士帮助搜查者挪动碗橱，钢琴。他朝里头看着，用手摸来摸去，搬动琴弦，弦发出长长而可

怜的声音。我的心简直都要碎了，勉强忍住没有哭出来.....

押送队转到父母亲的卧室。我们一直看着他们。父亲已经穿好衣服。我钦佩父亲的泰然自若。他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却如此平静，似乎这些都与他无关。士兵们用手电照着床底下，察看衣橱。妈妈的三扇镜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家庭相册，里面是我们一家三代人的记忆。政治总局的人停留在那张我孩童时起非常熟悉的阿列克赛舅舅的照片——妈妈的哥哥，沙皇军队的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两枚圣乔治勋章。照片的背面是用黑墨水匆匆写下的留言——“永别了，亲人，明天我就要被枪毙了”。

读完这句话，政治总局的人问妈妈：“这是什么？.....”

她解释说：

“我弟弟投奔了红军，后来被白匪杀害了.....”

我知道，妈妈说的不是真话，但知道为什么。

政治总局的人疑心重重地把照片在手里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照片放在相册上面，说：

“为了以防万一，您还是收好它吧.....”

难道真的他身上出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

妈妈默默地把照片藏进睡袍的口袋里。诀别的最后时刻到了。

妈妈紧紧抱着父亲，不愿放他走。

“好了，到此为止吧！”政治总局的人厉声喊道。

父亲抱了抱我，亲我的时候，在耳边小声说：

“记住，我没有罪.....”

这句话唤起了我心中的波涛，眼泪滚滚而下。他将我放下，拿起包袱，头也不会地朝门口走去。押送队打开门，先走出去。父亲跟着他们，然后是政治总局的人以及两个士兵。两个证人弯了弯身子，一言未发就消失了。我们被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不能意识到已经降临的苦难，甚至都没有关门。妈妈把我拖到窗口。昏暗的路灯照着一辆其丑无比，被称作“黑乌鸦”的篷车。这车子没有窗户，后边有铁栅栏的小门。他们把父亲往门里塞进去。然后押送队上了车。政治总局的人爬上了驾驶室。马达轰鸣，就这样“黑乌鸦”带走了亲人……

难道是永诀吗？

父亲被捕似乎在我们从前的生活之下画了一道线。我们从正常的家庭变成了被镇压的。现在，许多人都要躲着我们了。我从自己遭到同样命运同学的经验里已经知道了，学校里我的日子将非常难过。谁也不会直接说什么，但能感觉到疏远。一些人确信政府绝对正确，将我们看作象像感染了鼠疫的人一样。另外一些人，虽然不相信被镇压的父母亲有罪，但为自己保险期间，尽量躲远些。当时，一家之主被捕之后，还不会把一家人一起都发配到集中营去，但无论如何，阴影涉及到被捕者的所有亲人。不要提帮助，根本无从指望会有人同情。所以，我预见到了这些，决定第二天不去上学，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也就没有反对。

略微收拾了房间，喝了浓茶之后，我跟妈妈一起出发去罗莎·卢森堡街，那里是政治总局基辅市局的所在。在问讯处了解到，再过

几天“疑犯”将被转送到卢基扬诺夫监狱，那时可以每周两次送东西进去。

这个悲伤的程序我终生难忘。监狱在基辅的远郊，那里曾经是非常富有的郊区，以基辅富人所有的漂亮别墅和庄园而闻名。这个地区我很熟悉。那里有一个革命前的军官射击场，我们跟父亲一起看过狙击枪手比赛。而其中的一个庄园里，在一幢老房子的小房间里住着妈妈的裁缝，所以我们也去过她那儿。妈妈试衣服时候，我一个人在花园里长满青草的小道和无人照看的花坛之间跑来跑去，我非常满意，这里可以随便乱跑。花园里有许多希腊雕塑的复制品——美丽的女神和恐怖的半人半神像。虽然其中许多塑像缺胳膊少腿，但确实花园充满了生机，给它一种神秘之美。从那时起，卢基扬诺夫卡给我心中保留着最美好的印象。现在这些印象黯然失色，被卢基扬诺夫监狱接待室的小窗户前默默的队列这个悲惨的景象所替代。

妈妈早晨四点叫醒我，然后我们收拾好要转交的东西，出发去车站，以便赶上通往卢基扬诺夫卡的第一趟有轨电车。我们坐上半空的车厢，沿途上车的都是跟我们一样带着包袱和篮子凄凉的人们。我们在窗旁面对面坐定，在玻璃叮叮作响和车轮敲打声中打盹，时不时哆嗦着醒过来，担心地四面顾盼——是不是坐过了监狱这一站。同一种幻觉总是折磨着我：我们走近小窗口，它却老也不打开。敲了再敲——突然，大门洞开，迎着我们走出来的是父亲，快乐，神采奕奕，就像他老早在波多的白色码头接我们那时一样。

这个鲜艳、快乐的景象之后，在监狱围墙边上冬天漆黑的早晨猛醒过来，在大铁门口的小窗口排队——这一切在心中总是引起剧烈的痛楚。

-----  
父亲被捕(3)  
-----

妈妈没有钱，所以不得不出租一个房间。这个决定对妈妈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没有其他的办法。幸好，碰上的房客不错。他大约四十五岁左右，消瘦，大个子，非常和气，尽量不麻烦我们。不仅如此，还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罐装红烧牛肉，我觉得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他经常外出，回来的时候总带一些吃的东西：蔬菜，土豆，白菜，有时还有鱼和向日葵油。我们跟他慢慢处得很好。原来他是工人出身，是个职业革命家，参加过内战，在当时乌克兰首府哈里科夫的某个中央机关工作过，而现在被派到基辅郊区建立集体农场。他经常外出就跟这有关。他天生是个善良的人，所以交给他的事情让他苦恼。夜里醒来之后，我有时会听见他在叹气，有时还有可怕的呻吟。

有一次妈妈问过他。他犹豫了一会，没有做声，但最终回答

说：

“我的工作非常艰难。组建集体农场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是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我必须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你们很难想象，什么叫没收富农财产，把人们从老家迁出去。这是巨大的人性惨剧。因为不仅仅有男人富农，另外还有妻子，老人，孩子——所有人都必须遣送走。你们要是看见，他们是如何跟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牲畜，自己的土地诀别，为了保卫这土地，内战期间他们站在我们一边的！看过这种场面，不光晚上会喊出来，——我愿意逃得远远的……”

但他继续作这件枯燥乏味的工作，虽然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停地抽着烟，嘶哑地咳嗽着。直到首都迁到基辅之后，我们还一直跟他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在我区新建的大楼里分到了一套好房子。但他的身体垮了，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临死前不久他对我说：

“你还小，所以你将来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不论你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曾经，并且还在承受着空前的苦难，但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惨痛的意识，即在执行上面交给的任务时，他用自己的行动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所以现在，临死之前，无法原谅自己。是啊，作这样的总结实在太可怕了……

-----  
海关检查(1)  
-----

苏联海关认真检查旅客携带的每一个纸片，我给母亲和女友的小礼物被当作走私物品没收了。

就这样，在国外半年之后，现在我要从柏林回到莫斯科。突然召回祖国一般会在苏联人的心中引起警觉：是否有人汇报了你，家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虽然发到商务处的电报中，要求我到外贸人民委员秘书处报到——那也不能排除某种诡计——免得吓跑“犯了错误的人”，免得导致他采取某种当局不愿见到的出轨行为。我们那些管理出国干部的人练出了不少这样的诡计。不过，我自己在工作方面没有重大的失误，但是，也有越轨的时候，因为我太过自由，认识了太多的人，所以在内心深处感到一些不安。

在德国工作的几个月里，我也购置了一些东西。出国之后，每个苏联人一定会买一些任何正常国家的人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大件物品他可以在国内买。但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就像半个世纪之后一样，从西方带回来的是家电——电冰箱，电唱收音两用机，收音机，照相机，丝袜，时髦的衣服等等。肥皂，牙膏，剃须的须沫和剃须刀不用带回国。这些东西家里很多。我当然买了些好

衣服，买了一台电唱收音两用机，以及当时最好的照相机“康塔克斯”，手表，还有一些小东西。

在弗里德里赫大道火车站上，瓦列金·彼特洛维奇·赛列茨基为我送行。他帮我在包厢里安顿好，一直等到开车。

“真羡慕，你要回苏联了，”他说，“可是我们还得在这儿呆多久！希望你在那儿一切都好。如果有事，请告诉我……”

他还是在替我担心，别碰上某个不能预见到的意外情况了。与外国人太密切的接触都可能变成麻烦。这点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我毕竟想回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重新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这次的路程穿过波兰境内。在奥得河的法兰克福，大桥还没有完全修复。德军工兵正在桥上干活。接下来，农村地区看起来是安宁的，但城市里可以看到战争毁坏的房屋。波兹南火车站是一片废墟，而华沙则是绕道而行的，只是在远处看见了城市的轮廓。

终于到达了苏德分界线。火车没有开到桥边便停下了。一名警卫军军官以及两名戴淡绿色钢盔的士兵上了车。他们检查证件，相当仔细。但却没有检查行李。一声哨响，于是我们继续上路了。在桥上咯吱咯吱走了一阵，列车慢慢地走到了布加河的东岸。这不就是带条纹的界桩，小牌子上写着“苏联”。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小兵，穿着退了色的军服，船形帽上带着一个红星。当我看见他时，一团热气冲上嗓子眼。心里一阵快乐的痛楚，于是，不管我如何忍着，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但心里非常愉快。

但这种心情并未保持多久。火车停在了边界车站的月台旁，这

里我们应该等两个小时，等着把车轮换成宽轨。

广播里嘶哑地喊着：

“乘客们，请大家都带着行李下车接受海关检查……”

人们带着箱子，盒子，手提箱等等，在灰色大楼前排起了长队。从行李车里卸下来一大堆东西。所有这些都堆放在一排长长的，铁条包着的矮桌上。海关人员一个个忘我地在内衣里翻来翻去，把西服上衣和裤子的口袋翻转出来。检查像是搜查。书，报纸，杂志，信件，纸张，如果上面写得有东西，都交给一个边防军，后者将这些东西叠成一堆，然后不知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在实际上兑现“边境上锁”的口号。

终于轮到我了。在箱子里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海关关员对我说：“打开盒子。”“那里边是个收音机……”“请你打开盒子，”他严厉地重复了一遍。“这可是原厂包装。”我解释说。我实在不想剪开细绳子，撕开胶带。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跟海关官员顶嘴有多么危险。那人严厉，怒气冲冲地说：“给您说了打开箱子，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

本想给他提醒应该相互尊重，但我决定，最好不要理他，于是动手打开盒子。他看了看收音机抛光的上盖：

“卸下来！”

我这才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他就要折腾我了。必须忍着。他命令卸下电唱收音机两用机的后盖，手指在线圈、灯管、电容器之间搜寻了很长一段时间，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似乎在玩一个儿童

游戏：冷，暖，热...摸到一个藏东西的地方，会在我的眼里看到“热”。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挺直身子，满脸厌恶。“带了几块表？”他皱起眉头，突然问道。“这不！”我挽起西服袖子，把表露出来。“口袋里还有几块？”他从哪儿知道的，难道是千里眼？要不就是柏林有人打了小报告？但我并不害怕。两块女坤表，不过是小玩艺而已。“给母亲买了一块小表.....”“还有吗？”“还有一块给女友的.....”“拿出来！”

我将两个小盒子放在了桌上。

海关关员打开了一个盒子，然后又打开了另一个。“这不好.....您怎么着，想偷偷把这些走私物品带进来？”我的折磨者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拖长了声音，一个字一个顿地说道。“这不是走私。我都拿出来了.....”“是我要求的。并且不允许带一块以上的手表。看来要做笔录了。”现在我明白了，争辩没有用处。从自己手上摘下手表，跟一个盒子一起放在桌子上，第二个盒子盖上盖子，推到一边上——这个带给母亲。“应该通知您的工作单位。不过，算啦。我只开一张罚没收据。”这还得谢谢他，我心里骂了一句，动手包收音机。兴奋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了。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还是那样拥挤。出租车站上毫无希望排着大队。我说通了“吉斯”车的司机——官方的豪华轿车，相当于现在的“海鸥”。这种车是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生产的，所以叫“吉斯”。坐车走并不远，只要到斯摩棱斯基广场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自作主张先在阿尔巴特街角的军官宿舍里住下来。

-----  
海关检查(2)  
-----

纽霞大婶高兴地接着了我。在我原来住的房间里，有一个空床位。我占了这张床，答应随后去海军总部补办住宿手续。我用冷水擦过身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新衬衣和一双袜子，拿着跑到纽霞大婶那儿，——她高高兴兴地接下了。然后我出发去人民委员会去报到。

-----  
给外贸部长作助手(1)  
-----

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直接结果，便是人才凋零。  
这样，年仅 24 岁的我成了苏联外贸部长的苏德经济关系问题助手。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当时位于古比雪夫大街，综合技术博物馆的对面。我在门卫室给秘书处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对我说，过几分钟有人下来接我上去。也就是说，真的是人民委员召见。可是，法力无边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的战友、苏联核心领导之一的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是如何知道我的呢？只能是特沃祥对我的翻译水平有好评。现在，我的命运将会有什么转折？

“瓦列金·米哈伊洛维奇？”一个略有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面前站着一个中等个子，身穿无可挑剔的灰色细条纹三件套西装，深蓝色衬衣，打着蝴蝶结。能感觉到，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请来吧，人民委员在等着您……”

我们乘电梯上到四楼，走进秘书处，他将我介绍给一个中年，但衣着非常雅致的女士——人民委员的私人秘书。

“请坐吧，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马上就好。”她对我说，一边指了指靠窗户的椅子。

天已经快要黑了，广场被灯光照得通明，综合技术博物馆楼顶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点亮了：“大家都来尝一尝，螃蟹是如何美味细嫩”，“我只吃甜果泥和果子酱”，“您需要给家里买些小礼品？买顿河鲱鱼吧”。这是当时主管内贸的米高扬主意。他邀请了许多著名诗人，每人拟一句醒目的广告词，类似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除了莫斯科农工，别无分店”。您可别以为那是装样子的。不光在莫斯科，其他大城市的橱窗里螃蟹罐头堆得像小山，柜台后面是装红鱼子酱和黑鱼子酱的大木桶，大厚木板上，是鲱鱼，鲑鱼等大块鱼肉。各

种各样的奶酪，火腿，香肠。葡萄酒更是品种繁多。除了普通的品种之外，还有新酿的酒——标签上一个荷兰海员在微笑的杜松子酒，苏联威士忌。并且根本不排队！在苏芬战争几个月期间略差一点之外，国内的供应明显改善。

从办公室出来了三个人，秘书身后的铃声立即响了一下。她消失在门后，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皮质文件夹，对我说：“请进去吧。”

第一道门之后还有第二道。打开门之后，我走进一间不大的，用深褐色木板装饰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面积之小令我吃惊。后来我才知道，人民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和人数较多的会议一般在五楼的圆形大厅里举行。

米高扬坐在高窗户旁边的桌后。青铜文具上是一只张开翅膀的鹰，绿色灯罩的台灯和一堆文件几乎遮住了他小小的身材。他仔细地看着我，表情严肃，甚至有些敌意。我觉得，他似乎有点不满意。他是否要开始训斥我？

“人民委员同志，根据您的命令我前来报到。”我赶紧报告说。

米高扬微微一笑，精心保养的小胡子下露出了一排多年吸烟发黄而不整齐的牙齿，于是，严肃的表情马上消失了。他这个迷人的微笑，往往还是与外国人艰苦谈判时独特的避难所。而弯鼻子和嘴巴周围深深的皱纹给了他脸上生气的表情。

“请坐。”传来了闷闷的一声。

我坐在了桌旁一张皮椅子上。

“什么时候从德国回来的？您有地方住吗？”

我解释说，住在了出差去德国之前住过的宿舍。米高扬按了铃。女秘书进来了。“请告诉费奥多，让他给别列什科夫同志准备好住处。”然后，转向我，接着说，“我负责后勤的助理今天就安排您住好。”

我谢过他，嘴里嘟囔着说，住在宿舍也可以的。

“简朴能给布尔什维克增光。”他一本正经地说，“但在这方面过分热心也没什么意思。现在请谈一谈德国那边的情况。战胜法国之后是不是彻底骄傲自大起来了？”

我讲述了柏林阅兵时看到的情况，以及在帝国议会会议上希特勒的讲话。我尽量把德国大规模狂热和过渡兴奋的气氛转达出来，通报了我们小组在克虏伯工厂验收设备的工作情况。“特沃祥说，您跟他一起去过荷兰，后来再次去了鹿特丹，似乎还有布鲁塞尔。那边的情形如何？”

米高扬认真地听完了我简短的汇报之后说，那艘保存下来的冷藏船将从鹿特丹开回列宁格勒港。

“特沃祥对您很满意。”人民委员补充了一句。

这时出现了一段沉默。米高扬从桌上拿起了一包刚刚开始发售就马上变得十分流行的“三套车”牌香烟，打开盒子递给我。

银色箔片下面，是一排没有动过的金色过滤嘴。我拿定主意，对自己说，在人民委员的办公室吸烟太放肆了。也可能，他在故意考验我。

“谢谢，刚戒了。”我说了一句假话。

“非常明智。”米高扬赞了一句，然后从盒子里拿出一支烟，点上了。空气中散发出一种蜜的芬芳。

在米高扬探究的目光下，我觉得不太自在。这段沉默要持续多久？但他把没有吸完的香烟在沉重暗色的烟灰缸了熄灭了。显然，他拿定了主意。

“您对于调到外贸人民委员会来工作这件事怎么看？”米高扬问道，“跟德国人马上有重要谈判，所以我需要个有德国工作经验的好翻译。特沃祥认为您能够胜任。”

“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我将努力不辜负您的信任。”我回答说，“但是，跟我的上司怎么办？因为我现在还在海军服兵役。”

-----  
给外贸部长作助手(2)  
-----

“这个我知道。我们回头跟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达成协议，临时调您到外贸人民委员会来。顺便说一句，您还不是党员。建议您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您向所在的部队递交申请，您将会被接受

为预备党员。考虑考虑吧。明天早晨到我的秘书处报到，去德国组。那里托齐林和奇斯托夫会把所有情况介绍给您。再见……”

接待室里，那个衣着得体的男子，负责后勤的人民委员助理正在等我。

“我们走吧。我给您准备好了住处。”他请我一起走。

大门口等着的一辆黑色“别克”将我们沿着古比雪夫街拉到红场方向。当时，这条街上还是双行道。汽车在列宁博物馆旁边向右拐，然后停在了“大都会”饭店门口。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住到如此奢华的饭店里来。在二楼，给了我两间套的客房，带电话，有浴室和宽大的玻璃阳台。后来我才知道，布哈林曾经在这个房间住过，当时他把鸟的标本和猎物放满了整个阳台。“我不合适占用这么大的地方，有没有小一点的房间？”我问道。“没什么不合适的。”陪同我来的人反驳道，“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房间。人民委员会出钱。在没有分到房子之前，就好好住这儿吧。”“我能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拿来，东西在阿尔巴特街，斯莫棱斯基广场附近？”“当然啦。我步行回去，车子归您使用。这是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值班汽车。您有事可以调用……”

一切就像在梦中一般：跟人民委员的谈话，他关于递交入党申请的建议，这间豪华客房，以及我可以随时调用的汽车。当然，米高扬已经跟有关方面商量好了我的预备党员一事。显然，海军政治部也知道这件事。我是否愿意入党？我能够胜任在米高扬这样一个要求严格的老人身边的工作？很显然，入党是调入人民委员会的条

件之一。但是，我自己如何下定决心走这关键的一步？不能仅仅为了进入人民委员秘书处而这样做吧？不过，我明白，我已经得到了任命。同样清楚的是，米高扬毫不怀疑，我将递交入党申请并被接纳。可是，人是应该有原则的。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些。1934年，在乌克兰纪念列宁逝世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在没人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我被列入“列宁共青团”的名单，后来又忘记了给我们办理有关手续，所以我仍然不是党员。另一个方面看，我总是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党引导国家走上正确道路，从未怀疑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合法的接班人。那么，我作一名列宁党员，并在给我安排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又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哪里能想到，五十年过后，在1991年元月份维里纽斯流血事件之后，我却要退党了！……

我这样思量着，坐在“大都会”房间的阳台上，被夜间莫斯科的声音包围着。底下可以听见从小剧院出来的观众压低声音在说话，有轨电车的铃声。左边，不断有汽车驶入“大饭店”。那里的几个餐厅开到凌晨四点。“大饭店”里的菜声名远扬，服务极其出色：老式的服务生还没有绝迹——这些人一方面十分自重，同时也非常认真仔细。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人民委员会。向托齐林作了自我介绍，他是个非常温和而有礼貌的好人，领导着人民委员的助理们。托齐林给我看了米高扬签署的命令副本：从现在起我是外贸人民委员的苏德经济关系秘书助理。

-----  
父亲获释(1)  
-----

1928—1929 年冬天，我父亲被关在监狱里。

母亲没有工作，只能靠作家教补贴家用。

父亲被捕以及后来被释放，使我相信，无辜的人终究不会有事。

我怀着这种信念，坐在斯大林身旁，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

1928—1929 年的冬天对我们一家来说特别难熬。天不亮乘坐冰冷、叮叮作响的有轨电车赶往卢基扬诺夫监狱，为父亲的事情担忧，我们家周围形成的几乎是完全隔离状态，学校里的戒备态度使人心寒，压抑。更何况市里面一切照旧，似乎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话说回来，为何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只有我们遭了难。

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还在继续，基辅的生活条件表面上没有变化。克列夏基克大街已经改名为沃洛夫斯基——这是个外交官，1923 年被白匪移民在瑞士杀害——这里咖啡馆里坐着衣着讲究的人们，电影院里挤满了好莱坞影片的影迷，马戏团里的演出节目欢快逗人。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当时我们实在穷得叮当响。父亲被捕

之后家里没有一分钱。没有存款，也没有人想要帮助我们。妈妈靠教授英语德语才能挣些钱。

过了不久，基辅山洞修道院事件震撼了基辅人平静的生活。报纸和广播报道说，修道院的某个修士将一个姑娘骗进山洞，强奸了她，然后用斧子肢解了尸体。报纸上登出了被肢解女体的恐怖照片，罪犯的斧子和修士本人的照片。修士蓄长发，消瘦，眼睛像疯子。开始准备进行公开的法庭审理，有一大批证人，以及“淫荡”僧人们的受害者。当局制造出了一种假象，似乎在修道院内的金顶之下发生骇人听闻的恶行。

也许，在目前公开性条件下可以弄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在寺院之内有许多的龌龊勾当，或者是一起个别事件被利用来进行公开审理，以便此后对教会发起新的攻击。很久以来，基辅山洞修道院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俄罗斯帝国全国都被看作圣地。尽管有强大的反宗教宣传，对教士们多年的迫害，毁坏教堂和大量取消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却保全了下来，并继续在居民之中享有威望。所以，在当局看来，需要使它威信扫地。修士犯罪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成了发动针对修道院猛烈斗争的最佳理由。对恶徒的审理是公开进行的。就像观看演出一样，当局组织工人，学生以及附近农村的农民前来参观。组织了“劳动人民的要求”：立即关闭“淫乱与血腥犯罪的巢穴”，将僧人发配到劳改营进行改造等等。至少，挑动了部分居民反对修道院，结果，修道院被改成了民俗学博物馆。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父亲偶尔写来的每封信。当然，从这些信中无法了解他的情况。但是，从卢基扬诺夫监狱能够不断地收信，我们起码能够猜想到，他因之被抓起来的那个“案件”的审理，还没有结束。至于其他的，他在信中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很快就可以见面，叫我们不要气馁，叫我在学校好好学习。

三月初他来了一封信，叫我们非常激动。父亲说，调查马上就要结束了，因此答应他可以跟家人见面。我的心里真是悲喜交加。

“我们什么时候，在哪儿见父亲？”我问妈妈，“如果见了一面之后，我们永远失去他，我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自己对内心的情感无能为力，忍不住会掉眼泪，甚至有点害怕这次相见。我能否勇敢地坚持下来，不会当着父亲的面大哭一场？他已经非常艰难了。

见面之前，母亲给我吃了许多镇静剂，她指望我在药物的作用下会变得不那么敏感。

见面被指定在跟我们所住的卡尔·李伯内赫特街平行的罗莎·卢森堡大街上政治总局大楼里。这里，两个受苦受难的德国革命家就像1919年在柏林的兰德维尔坎那遇难时一样，并肩在一起。在罗莎·卢森堡大街那幢楼的地下室里，俄国革命者以及移民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譬如我们学校的拉德什多克等人，成了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这真是命运的嘲弄。走向这幢不祥的大楼时，我在想，父亲是否也会遭到如此的命运，在这座大楼的山墙上可以刻上这样的字句：“放弃希望吧，每个进来的人……”

哨兵在桌上的名单中找到了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等一等，然后用电话向里边报告。过了几分钟，出来了一个穿便服的人。

“请跟我来。”他干巴巴地说完，便开始上楼。

走过有许多门的长长的楼道，拐过了一道弯。陪同者将我们引入一个小房间，窗户上挂着可以透光的薄布。我想说什么，但妈妈把手指压着嘴唇警告了我。我明白了，那里到处都是耳朵。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强压住激动的心情。门终于开了，父亲走了进来。我拼命用牙齿咬着嘴唇，右手指甲抠着手掌，把自己弄痛，以免暴露心迹。

父亲瘦得很厉害，脸上尤其消瘦。他生出了更多的白头发，只有胡须还是黑的。眼泡明显地下垂着。由于在牢房里呆得太久，他看上去脸色灰暗。但他依然努力做出精神饱满的样子。在危急关头，他总是努力给我们勇气。但我看到他之后，更难控制自己了。

带父亲来的，是个小个子，肩章上两道杠，显然是个大官。他长着淡黄色卷曲的头发，似乎很久没有梳理了。

-----  
父亲获释(2)  
-----

“侦查员福克斯，阿布拉木·约西佛维奇。”他作了自我介绍。

他叫父亲坐在桌旁，母亲的对面，他自己则坐在旁边。父亲伸出手来，握住了妈妈的手。然后握住我的手掌，紧紧地握着。“这不，我们最终还是见面了吧，”他开始说话，努力地在脸上显出开心的微笑，“你们看见了，我很好，只是当然非常想念你们。说说看，你们过的怎么样。”“亲爱的米沙，我已经绝望了，都快等不到这次见面了。”母亲扬声说，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讲述我们的生活情况，当然是尽量说得好一些。

父亲开始询问我学校里的情况，夸奖我顺利念完六年级。

“现在，”他说，“你应该在七年级，在最后一个年级里有更好的表现，作为前几名毕业。如果我在这里耽误了，你得养家了……”

侦查员福克斯似乎奇怪地哼了一下，于是这些话刺痛了我。难道父亲一年之后还不能回家吗？难道这就是他要让我们明白的吗？

妈妈跟我一样理解了父亲的话。她开始神经质地对父亲说，我们一切都好，叫他不要操心。然后突然说道：

“我们相信，我们苏联的政法机关能够把所有事情查清楚。他们不会让无罪的人受苦的。这不，久别之后我们重逢了。可是我此前已经不寄希望了。事情清楚之后，你就回到我们身边。我相信这一点……”

她真的相信这一点？或者只是想给父亲打打气，最主要的，是让侦查员福克斯听了高兴？她这点把戏未必会有结果。但是，过了

几分钟，福克斯说，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告别，然后就出去了。父亲紧接着母亲的话题说：

“对，对，当然了，我们国家不审判无罪的人。我也相信，会把我放出去的……”

说这些话时，他再次握住母亲的双手，于是我发现了，一个紧紧卷成小筒状的纸条从他的指间滑到母亲的手掌心里。

“亲爱的米沙，你要保重，”母亲似乎对着对门外偷听的人大声说，“别担心我们。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团圆的……”

我们还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

福克斯进来并宣布，见面结束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我激动至极，甚至没有发现父亲是怎么走的。只是突然间又剩下我们两人了。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

那个穿便服的人再次出现，送我们到出口。值班士兵在名单上作了记号，然后我们就落到了街头。

到家之后，妈妈打开了字条。父亲用高级制图员十分漂亮的细小笔迹写了几行：

“从我这里没有掏出任何伪证。

全部指控都落了空。

现在，要么发配……要么放出来。吻。”

我们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伤心。但是，我们感觉到，如此折磨我们的未知状态即将过去。

又过了一个月——还是去卢基扬诺夫监狱，在转交东西的窗口

前排队，等待那个决定性的消息……

现在很少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有时，一连几周电话都不响。不过，四月中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我是谁。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请转告母亲，”话筒中的声音说，“明天十一点让她必须到罗莎·卢森堡大街政治总局的总部来。明白了？”

“明白了。”我回答说，当时便非常紧张。

晚上回家知道了电话的事情之后，母亲忙活起来了。把面包切成小片，然后放进烤箱烘干。然后开始收拾棉衣物：毛衣，几双毛袜，手编的厚围巾，毡靴，皮帽等。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言不发，注意力集中。我着急了：“你这是干吗？也许，他们会把爸爸放出来？”“别这么说，”她严厉地打断了我，“最好预备有更坏的事情，要不然我会受不了的……”

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急不可耐地等着，时钟走到了十点半。装着东西，面包干和其他食品的小箱子早就收拾好了。妈妈拿起箱子，我们便出发前往政治总局的大楼。进到了楼里。像上次一样，我们被送到二楼的小房间里。跟上次一样，父亲也是由侦查员福克斯送出来的。我跟母亲站着不知所措。父亲微微笑着，没有说话。最终福克斯对妈妈说：

“您用不着拿箱子来。得把它拿回去……”

我的心往下一沉。难道不许父亲带着保暖衣物去流放？或者有更可怕的事情——将他弄到那个什么东西也用不着的地方去……

这时，福克斯停了停，继续说道：

“我们就对米哈伊尔·巴甫罗维奇提出的指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受到了诽谤。他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向他道歉，并祝贺他回家，以及恢复原职。这是个误会。就当作什么也没有过吧。你也一样。”福克斯对我说，“你得知道，你的父亲没有被收审，并且没有被捕过。我重复一遍，他只是被请到这儿来，弄清楚出现的误会……”

我惊呆了。妈妈也不能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也就是说，父亲自由了！而且不仅自由了，似乎他没有过任何事情！母亲抱住父亲，不住地亲吻。然后，她走近福克斯，弯了弯身子，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我身子一蹿，勾住父亲的脖子。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如此巨大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而我们还在准备最坏的情况……

-----  
父亲获释(3)  
-----

父亲冷冰冰地跟福克斯道了别。这使我感到难为情。因为这个福克斯一直同情地对我们微笑着。我觉得，他也很高兴，我们最艰难的考验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侦查员也是个人。我愿意原谅他，

甚至他有时对父亲不好的话.....

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取得“供认”，他们殴打父亲，一连数天让他站在狭窄的单人禁闭室里，不让他睡觉，把他跟刑事犯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采用了许多其他更加精巧的方式进行拷打。但是，父亲的意志坚不可摧，他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板。这些东西帮助他熬住了所有的侮辱。他多次昏迷过去，但没有在侦查员塞给他的任何一个纸片上签字。

父亲非常不情愿地，也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自己在狱中遭受过的事情。父亲要我跟妈妈发誓，任何时候不给任何人说起这些事情。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要他留下了“不对外传播”的字据。父亲明白，知道他的秘密会使我们受到威胁。

他讲述的事情震撼了我，这些事情令人非常难以置信。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找到了安慰和解释，即只有那些最不正常和凶残的侦查员们才能做得出这些事情。

父亲被放了出来，甚至没有任何恶化他此后生活的后果，这几乎是个奇迹。当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这件事情使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那要么不会碰他，要么甚至逮捕之后，最终一定会放出来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多年之后，毫无顾忌地进出斯大林的办公室，坐在他身旁，同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危险.....

-----  
贸易谈判(1)  
-----

1940 年 9—10 月间，苏联德国两国政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的贸易谈判代表遇到困难便会直接找斯大林，并且往往能够达到目的。

在米高扬的秘书处，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现在的条件下，想要任命一个年纪轻轻、仅仅在德国克虏伯工厂工作过几个月、知识仅限于海军装备的工艺工程师担任外贸人民委员助理这个重要职务，实在是太离谱的事情。因为这里需要商业、苏德经济关系史方面的广博知识，需要熟悉数不清的先例，各种法律条文，知道现行条约，市场行情和国际贸易的特点等等。1940 年 8 月，当我坐到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办公桌旁时，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知。只是少年人的过度自信才可以解释，我何以轻率地同意了米高扬的建议。但是，为何这个有经验的活动家选择这个年轻人做自己的助手？显然，他急需要哪怕略微有点德国工作经验的翻译。我多少是符合这条要求的。最主要的是，外贸人民委员会跟其他机关一样，受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几乎被“掏空”了。急需一批新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要求也降低了。

公平地说，米高扬还是保全了一些老专家。我记得很清楚，在

会议上激烈讨论过某个问题之后，如果意见不一致的话，他会非常尊重地征求坐在远处的两位专家——克林和夫列伊的意见。

“那么现在问一问我们的智者，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会认真听取他们对所讨论问题冗长的陈述，以及对此前所提出意见的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一般来说，两位专家会给出相同的建议。但也有的时候，克林和夫列伊会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会使米高扬生气。他要求两位专家再次掂量自己的意见，其时会议则转到日程的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两位专家在一边耳语，有时会离开会议室。如果他们回来之后，仍然没有一致意见的话，人民委员会求助于与会者，后者经过简短讨论之后最终赞同某个方案。

这两个专家对我来说活像圣经里的先知或者古代的辩士：夫列伊身材胖大，衣着邋遢；而克林则身材高大，像个运动员，略有谢顶，西服笔挺，打着蝴蝶结。

我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知识多么贫乏。我不得不研究近年来的商务信函，商务谈判的备忘录，苏联驻外商务代表的电报，以及党中央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决定。我还阅读了苏联与德国从魏玛共和国时期以来的协定与条约。而所有这些都应该在日常工作、每天作为翻译参加与德国人谈判的同时仔细加以研究。我的职责范围还包括写出米高扬的谈话纪录，然后这些材料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以及起草给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的电报文稿。

1940年9月份和10月份，与德国进行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方面除了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参与准备过贸易协定的特使什努

列之外，大使李特也参加谈判。他身材结实，胸部发达，宽肩膀，更像个武士，而不是外交官。所以，他有真正的武士的虚荣，坚毅而耐劳。我有一种印象，米高扬同样具有出色的武士特质，对李特非常高看。德国人要求扩大苏方的供货。他们对比萨拉比亚的油料作物和战略原料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我方定购的设备德方一直在拖延发货。现在已经清楚了，当时希特勒开始对登陆英伦三岛的适宜性发生了怀疑。

九月七日，德国空军对英国许多城市实施了袭击。伦敦的船坞遭到严重破坏。首都的几个区以及其他城市变成了废墟。所有这些鼓舞了元首，于是他决定将登陆延后，希望借助空袭打败英国。德国海军上将列德的报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英国军舰集中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天气情况转坏，海军上将对实施入侵可能的不利后果向希特勒提出了警告。结果，元首预定在十四日进行登陆的“最终决定”未能实施。

九月十九日，希特勒下令撤回集中在法国北部准备入侵时使用、且未受英军空袭破坏的登陆设备。十月份，当英国空军重创了戈林的德国空军之后，元首不得不将“海狮”行动推迟到 1941 年的夏初。在相关指令中说，如果再次提出登陆英国的话，届时将发布新的指令。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入侵计划。

柏林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希特勒重新回到了那个从未离开过脑海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早在六月三十日，在伯格霍夫接见德军将领时，希特勒宣布：英国的全部希望在于俄国和美国。如

果对俄国的希望落空，那么对美国的希望也将落空，因为消灭俄国之后日本在东亚的局面将大大改观。只要俄国被打败，英国最后的一线希望便会破灭。德国将在欧洲和巴尔干称霸。结论：在这场冲突中俄国必须被消灭。

根据这些目标，德国总参谋部下令开始在东部地区部署部队，于是八月二十六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向苏联边界投送了一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九月初，以过境到挪威为借口，德军部署到了芬兰。德军开始沿着苏联边境线集中。

一个重要的细节：1940年8月14日，希特勒要求提供“到1941年春天”的苏联供货清单。这是进攻苏联的大致时间。当李特以及什努列坚持要求扩大苏联向德国的供货时，毫无疑问知道元首的这个任务。而德方向苏联供货的延迟，以至最终停止，也与此有关。当时，米高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希特勒的企图，这个我很难下结论。无论如何，作为政治局委员他能够看到苏联驻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据我们现在所知，这个机构的消息十分灵通。不管怎么样，米高扬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我方任何一个微小的让步都要求对方做出回应。有时候，当李特在外贸人民委员会一无所获之后，跟大使舒伦堡一起直接找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往往会大度地满足德方的愿望。他用这个姿态表明。只有“主子”本人可以决定一切。同时，他也给了希特勒一个信号，即他斯大林是靠得住的。

-----  
贸易谈判(2)  
-----

在类似情况下，我发现米高扬脸色阴沉，于是，在跟德国人庆祝又一个“协议”的晚宴上，他会多喝几杯。

十月底，李特大使就要离开莫斯科了。虽然他未能全面完成柏林交给的任务，但他仍然有理由感到满足。似乎斯大林也相信了对德国延迟发货的解释，以及在完成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之后，供货不足的部分将大大得到补偿。根据“主子”的承诺，苏联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以优待的方式研究德国追加的要求。所以，李特想，他终于玩了一把这个倔强狡猾的亚美尼亚人。不过，他现在有的只是许诺，但是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所以米高扬未必胆敢与“主子”争辩。

在德国代表团临行之前，米高扬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举办了告别招待会。李特和什努列两人都是情绪高昂，甚至有些戏谑。

就这样，我来到了早已经想来的这个美丽的别墅。

三十年代末的一个暑假里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住在了过去的一个同学那儿，他搬到莫斯科之后，在招待大楼对面分到了一间房。每天晚上去牧首池塘滑冰时，我们不止一次出门时赶上客人陆续前

来参加招待会：外交官们闪闪发亮，插着旗帜的汽车，人民委员们深色玻璃的“别克”轿车，红军的高级将领们——我们认出了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耶格罗夫等元帅。这是那些练达的政治家、获得最高奖章的将领和周游世界的外交家们的诱人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般的世界。冬日的初夜，当水晶吊灯已经点亮，而奶油色窗帘还没有放下时，可以略微探究一下我们命运主宰们的神秘王国的内部。那时谁能够料想到，这些声名远扬的元帅们，以及其他许多参加这些招待会的人们，很快就将成为血腥镇压的牺牲者，而这幢别墅好客的主人李维诺夫死于斯大林统治时期频频发生的不明不白的一场车祸。

但是，暂时那里的一切似乎如此稳固而牢靠。

就这样，我跟着人民委员米高扬走进来，沿着宽阔的大理石台阶走上来。无论是建筑，还是内部的装饰，这幢小楼都可以说是真正的艺术品。革命前，它属于富裕的工厂主萨瓦·莫罗佐夫——一个艺术鉴赏家，当时非常著名的艺术赞助者。二十世纪初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装饰了莫罗佐夫这幢房子。前厅的玻璃绘画和楼梯，其雅致令我惊叹不已，出自伏鲁贝之手。风格各异的大厅里装点着荷兰、西班牙和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到处是堆成“小山”一般的中国瓷器，小型塑像和银质餐具。

门厅右手的绿色客厅里，已经有一群客人。其中有几位是外贸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站在一边的一位个子矮小、身材结实、头圆而略微谢顶、长着暗白色凸出虾眼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身

穿做工精细的一套黑色西服，雪白的衬衣和深色带斜道的领带。他显得十分自信，甚至有点随便，当米高扬走进大厅时，跟其他马上忙活起来的人不同，他不慌不忙地，懒散地走到人民委员身旁，随便跟他握了握手打了个招呼，然后像跟老朋友似地开了个玩笑。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寻常，所以后来当我跟托奇林站在一旁时，我问他这是何人。

“杰卡诺佐夫，贝利亚的人，前不久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他小声回答说。

我绝对没有想到，很快我得跟他打交道。

德国代表团到了。服务生开始分送饮料。米高扬和李特就谈判顺利结束而相互道贺，虽然各人的理由并不同。斯大林的许诺使李特感到高兴，而米高扬满意的是，我们仅仅承诺研究德方的愿望。

服务生领班请大家去餐厅。我们再次穿过前厅，来到一个亮灰色调，带一个大型壁炉的宽大的房间里。绕着桌子摆放着高背雕刻椅子。大家按照每套餐具前的卡片就座。我本来以为，在如此隆重的招待会上，仅仅担任翻译任务的我会被安排在第二排，位于主人与主客之间。但是，我的餐具跟其他人一样，位于米高扬的左手。

次日，塔斯社的一条简讯说，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为李特大使举行的晚宴，是在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喜欢上了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工作，学会了许多有用的东西，那些不明白的地方，托奇林和比我更有经验的德国问题第二助理奇斯托夫总会帮我。但这个工作我干得并不长……

我急不可耐地期待着 1929 年的暑假。我们升入了最后一个年级，七年级，感觉到自己是大人了，虽然我们都不满十四岁。但是，当时七年制中学毕业之后一般马上就要工作。那些想继续上学的人，晚上到工人夜校上课，准备参加技校或者大学考试，后两者招生的年龄分别是十六岁和十七岁。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还有整整一年时间。现在，父亲答应我的乘轮船到黑海亚热带的旅行吸引着我。

暑假最初几周我跟尤什科夫一家人在阿纳帕度过的，从这里我计划乘小船前往诺沃罗西斯克，我的父母乘“格鲁吉亚”号客轮将从敖德萨到达那里。我拿上自己小木板行李箱，上到甲板上，靠着船舷安顿好。

“解缆。”船长从舰桥上高声喊道。

每次，当生活的一个段落突然截断，开启了通往另外一段大门时，心里总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当那些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去时，尤其如此。所以，当人们每次迈进将会是更好的门槛却仍不明朗时，长期的经验教会了人们，每次转折之后不会更好，只会更糟，人们都会感受到内心的焦虑和对即将消失的过去的怀恋，无论这个过去是如何艰难。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改革方案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引起的正是这种感受.....

-----

接近诺沃罗西斯克时，海上和沿岸的景致明显地变了。从阿纳帕起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海豚落在后面，朝着停泊在港湾的油轮和货轮游过去。

走上码头，投进父亲的怀抱。父亲一边仔细端详着我，一边说：

“太好了，晒黑了，长大了，只是瘦得像个挨饿的印度人.....”

这个绰号从少年时起就有，因为我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大部分儿童一样，实在太瘦了。不过，许多人后来长胖了些。我还是那个“干瘪老头”样子。这是我的第二个绰号。

“没关系，”父亲微笑着，牵着我的手说，“我们现在会把你养肥的.....”

父亲被捕期间我们受穷挨饿，到现在他还感到内疚。

我们沿着陡直的舷梯走上甲板。妈妈在这儿等着我们。她显得那么年轻，容光焕发，非常快乐。她身穿薄薄带花边的白色衣裙，戴一顶奶油色阔檐草帽，蒙着面纱。她弯下腰来，亲吻我的额头。熟悉的“洛丽绀”香水的气味飘了过来，将我带向遥远的童年.....

-----  
夜入克里姆林宫(1)  
-----

1940 年一天深夜，我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

我加入了即将前往柏林与德国进行重要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在柏林，我翻译了莫洛托夫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会谈。

十一月的节日过后不久的一个深夜（当时我们一般都工作到早晨五六点），米高扬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又有新任务了。但是，我要面对的，是又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

“您必须马上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秘书处报到。我的汽车就在楼下。请您就用这台车，免得办通行证耽误时间。您会被送到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前。那里正在等着您。马上就走！……”他生硬地说。

我觉得他似乎对什么事情不满意，似乎不情愿地打发我走。当然了，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情况：今后我再也不会跟他一起工作了。

出了办公室，我跑进自己的房间，锁好保险柜，然后下楼。司机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等我说明情况，他已经沿着古比雪夫大街飞驰而去，穿过空无一人的红场，直接开向斯帕斯大门。人民委员苏

维埃大楼门口的值班员已经得到了通知，所以草草看了看我的证件，说了一句：二楼右拐，楼道走到底。很快，我来到了一个门前，标牌上字金光闪闪：“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接待室”。

对于我这一代人，这个职位当时意义非凡。它里面所集中体现的，既有最高权力符号，也有革命浪漫主义，还有内战时期的英雄主义，以及我们直接参与的新生活的建设。但最主要的是，人民委员苏维埃这个职位与列宁的名字密切相连，所以，现在担任这一职务的莫洛托夫，就像是他的直接继承人。

莫洛托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首席助理柯西列夫接待了我。他客气地请我坐下，然后就在通往隔壁房间的门后消失了。过了大约四五分钟，他回来对我说：

“莫洛托夫同志在等着您……”

可以想象，我是怎样心里突突跳着打开了门。但莫洛托夫并不在这里：那是警卫的房间，这使我略微松弛了一下紧张的神经。开下一道门时，我已经不那么紧张了。然而，就在这间大厅里，靠墙放着一条长桌和几排凳子，也没有人。大厅的另一头上一扇门半开着，于是我朝着走了过去。进入办公室，我看见写字台后面正在低头看文件的莫洛托夫，是画像上非常熟悉的：硕大的、苏格拉底式的额头，夹鼻眼睛闪闪发亮，兔唇上一撮小胡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学者，甚至智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只有列宁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斯大林及其忠诚、坚不可摧的战友才能在资本主义敌人的包围之中，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而当时我们都

相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国家走的是正确道路。当时我们经过强大宣传的处理，对所有这些都深信不疑。所以，在被莫洛托夫召见前不久，我被接收为苏共（布）预备党员时，我没有昧着良心，把作为列宁斯大林党的一员看作无上的荣誉，并愿意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员。

莫洛托夫终于抬起头来，眯缝了眼睛，看了看我，然后请我坐在桌子并排的椅子上。

接下来是详细询问，在哪儿，哪一年出生，哪个学校毕业，在哪儿学的外语，对德国的印象如何等等。然后，他突然地问道：

“什么人在哪儿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掌握所有形式，学会以最快速度用一种形式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替换另外一种形式，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不由我们的阶级、不由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替换？’”

由于事出突然，我一开始张皇失措，更何况我明白：回答是否正确将决定我的命运。莫洛托夫考究似地看着我，我在脑海里开始翻腾最近一段时间里读过的经典作家。这段语录十分熟悉，我前不久还见到过……我最终想起来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

“正确。”莫洛托夫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走运了。要是莫洛托夫选了另外一段我所不熟悉的，那我肯定完了。为什么他单单选了这一段？也许，这跟前不久与德国关系中的大转折有关联吧？列宁这段话刚好能够证明强加给我国的策略

转换是正确的。而对我来说，仅仅是走运而已。

莫洛托夫对我“深厚的理论素养”感到满意，最终决定向我解释，他为何叫我来。

“米高扬跟我说起过您。他认为，您很好地完成了翻译的工作。明天，由我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就要去柏林与德国政府进行重要谈判。您有在德国工作以及跟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您同意吗？”由于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我站起身“立正”，然后清楚地说：

“为苏联服务……”

莫洛托夫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手，微微一笑：

“您可以走了。”

我跟莫洛托夫，当时斯大林之后的国家第二号人物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了外交护照，当天晚上便乘坐苏联政府代表团的专列从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出发前往德国。

在帝国办公厅的谈判中，德方参加的人员有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以及两名翻译——施密特和辛格尔。苏方人员为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同样也是两名翻译——巴甫洛夫和本书的作者。第一天的谈判中，在跟希特勒第二次谈话之后，在帝国办公厅举行了招待会。莫洛托夫带了巴甫洛夫，而委派我起草给莫斯科的电文。当时，既没有录音机，谈判时根本没有速记员，所以翻译必须在会谈期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

-----

## 夜入克里姆林宫(2)

-----

我首先从解读这些记录开始。我坐在与莫洛托夫卧室相邻的办公室里，当时他被安排住在德国政府接待贵宾的贝维宫里。这件事上费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我请来了人民委员秘书处的打字员——秘书处的部分人员也随我们来到柏林。女打字员刚刚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门突然打开，莫洛托夫出现了。他看了我们一眼，突然发作了：“您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明白吗？您...您已经口述了几页啦？”他神经紧张时，口吃得特别厉害。

虽然还没弄明白他光火的原因，我赶快回答说：“刚要开始。”“马上停下来，”人民委员喊道。然后走近我，抽出那张一个字也没有写的纸，看了看旁边一叠纸，然后略微平静地说：“您走运了。想想看，有多少耳朵想听到我们跟希特勒单独谈了些什么？”

他环视了墙壁，天花板，然后将目光停留在插着芬芳玫瑰的中国花瓶上。于是我全明白了。这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麦克风，导线则可能通向英国、美国间谍，或者德国人那儿，他们都知道，希特勒跟莫洛托夫谈了些什么。我的背上冒出了冷汗。

我再次走运了。但我明白了，不能仅靠运气，应该自己注意。

莫洛托夫发现了我张皇失措之后，用平静公事公办的语气说：

“拿上您的记录，跟我走……”

这段时间一直呆坐着的打字员一溜烟跑出去了，我们俩来到卧室，并排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我来草拟电文，然后一张张转给您，您拿记录进行核对。如果有什么想法，直接写在纸片上或者给我写纸条。我们工作时不能出声。明白了？”“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原谅……”“别浪费时间了。”

现在我们了解了莫洛托夫许多从前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没有追究这件事？因为在当时普遍怀疑的气氛下，他可以推测，我故意用高声口述的办法给什么人传递秘密情报。但他显然将这归结为我缺乏经验。

回程的路上，莫洛托夫将我请进自己的包厢。杰卡诺佐夫跟他在一起。

“我们这里商量了一下，”莫洛托夫开始说，“我认为，既然您参加了与德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谈判，就没有意义再回到外贸人民委员会去了。对于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您怎么看？”“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但我没有受过专门教育，能胜任吗？”“这并不重要，我们大家都得干各种事情。回到莫斯科我跟米高扬谈一谈。我想，他不会反对的。跟德国人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也许，斯大林同志也需要您作翻译。我调您到我的秘书处，作德国问题助理……”我的外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期——1939—1940 年间——外交人民委员会里来了许多新人。莫洛托夫招来的一批外交官，战后都出了名，譬如葛罗米柯，索波列夫，扎鲁宾，古谢夫，维诺格拉多夫，斯米尔诺夫等等，都是理工科出身，鲜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他们甚至从未想过外交的前程。他们都是区党委的派遣，或者像我一样，由于偶然的机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所以，有时会莫名其妙，他们的命运为何是这样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问，他是个经济师，何以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并提出可能的解释说，他有时就有关国际问题开讲座。但关键在于：三十年代末，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清洗与其他政府机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承办斯大林交给的任务。这四人挑选并批准了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包括葛罗米柯在内，虽然他在回忆录中仅仅想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1940 年，当我转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时，那里跟奇切林、李维诺夫共过事的外交官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占据了前不久被镇压的“列宁式”外交官们余温犹在的位子。我是特别委员会的两个成员——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接收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显然，马林科夫对此没有特别关心。但贝利亚记住了。难道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我身上才出现了跟他有关的问题？

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十二月底，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卫国战争开始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莫洛托夫的苏美

关系助理。这一次我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从那时起，斯大林叫我去做翻译，不过不是莫洛托夫所预计的那样，跟德国人的谈判，而是跟美国人，英国人会谈。

-----  
斯大林与丘吉尔(1)  
-----

斯大林死后多年，米高扬透露出了惊人内幕：新疆军阀盛世才几乎成为苏共党员。

苏联前外长因为跟美国人来往密切，最后被斯大林下令悄悄处死，安排车祸原来是“领袖”的专长。

我最初感到万分惊讶，为何中国的新疆省在外交部的登记册上被单独列项，并且归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负责。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个省事实上是莫斯科在控制。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当时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阿普列索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跟新疆的统治者“督办”盛世才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使后者将中国的这个省变成为苏联的一个区。盛世才多次携家人来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见到了“各族人民领袖”。有一次，“督办”请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

“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

于是，这位“督办”真的把自己看作苏联的人，他曾是位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这个交易当时属于高度机密。

斯大林高度评价了总领事阿普列祥在新疆的活动，给了他各种荣誉称号，赞扬他能够在这个省的大众之中培养对苏联的好感。稍晚些，米高扬告诉我，当我们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改变，新疆被归还给重庆之后，斯大林在一个小圈子里说过：“阿普列祥知道得太多了。”这是一个信号：有功劳的总领事失宠了，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但这次，“主人”想避免多余的动静。他决定悄悄除掉阿普列祥。此后，事情便按照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式发展。

从乌鲁木齐回来例行休假的阿普列祥出发去了阿布哈兹。在那里，在山道上，出了车祸，于是阿普列祥死了。“领袖”周围的任何人都怀疑，车祸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杰卡诺佐夫曾经几次去乌鲁木齐见“督办”，那里已经是新任总领事巴库林，典型的党务人员。在他的任内，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副人民委员的一次次旅行于事无补。

很快，蒋介石用自己的方式惩处了“督办”，下令将他砍头，将新疆彻底收回。

后来，我跟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有过几次保密谈话。

这些谈话，似乎是偶然进行的，也就是当我每次就一些具体问题找他时，在问题解决之后，他一般会请我呆一会儿，坐一坐，叙叙旧。通常，他会要来茶和小面包圈，我们面对面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开始讲述某个与斯大林有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六十年代，当时米高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子上，他的秘书会预先告诉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给我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所以，我尽量在所给的时间之内办完事，然后马上准备开溜。所以，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留我的时候，我会借秘书的话。而他则带着滑头的微笑说：

“那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并且他们可以等嘛。”他似乎以此在强调，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职位的礼仪性质。

当我最终走出他的办公室时，守在接待室的访客们恶狠狠地看着我。

这里想讲述的那次谈话，特别长，并且十分坦率。这是在 1972 年，米高扬被解除了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当时，我担任主编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准备刊登米高扬回忆他三十年代中期出访美国的一篇文章。我找米高扬讨论编辑部提出的几处细节问题。跟文章有关的问题解决之后，米高扬像往常一样，请我坐一坐，“叙叙旧”。这次他回忆了李维诺夫和契切林。“李维诺夫，”米高扬开始了自己的叙述，“是个聪明而且精明的外交家，斯大林对他不错，当然，只是在某些时间之前。可是，莫洛托夫根本就容不下李维诺夫，当斯大林夸奖后者的时候，

莫洛托夫妒忌他，并且想方设法于三十年代末除掉了李维诺夫，虽然李维诺夫还能够给国家和党做许多工作。莫洛托夫也不喜欢契切林。正是他说服斯大林除掉契切林的。并且斯大林本人对契切林也不满意。遗憾的是，这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本来可以作譬如外交部副部长或者部长顾问。可是他却呆在科利亚兹莫的别墅里，弹钢琴，早逝于忧郁病和无所事事。不过终究是善终。李维诺夫的命运要更加悲惨.....”

最后这句话使我警觉。“更加悲惨的命运”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病死在自己的别墅里。这时，米高扬接着说：

“实际上，在打算与希特勒签约时，就已经决定要换掉李维诺夫。他一个犹太人，并且是在国际联盟，以及在整个国际舞台上体现我国与希特勒德国斗争的这么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长）的职位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但是他可以继续作副人民委员。他的经验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莫洛托夫却想方设法使他被彻底解职。莫洛托夫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因而不愿在身边有一个比他更有经验，更熟悉的人。结果，1941 年秋天之前，李维诺夫被解职。只有当我们的情况非常糟糕，当斯大林拚命捞每根稻草的时候，他决定利用李维诺夫的经验，派他到华盛顿作大使。李维诺夫在那里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以说，是他在危难时刻救了我们，争取到将租借法案扩大到苏联，筹借到了十亿美元。现在可以轻松地说，租借法案没有什么意义。但 1941 年的秋天，我们已经输光了，因而，如果不是租借法案，如果没有武器、食品、军队的冬

装以及其他装备，事态的发展还真不知会怎样呢。所以，这里有李维诺夫的功劳，他利用罗斯福和其他美国人士对他的好感，安排了军品供应，正如他当年争取了美国承认苏联和建立外交关系一样。可是，一旦事情安排妥当，莫洛托夫就开始了与李维诺夫的倾轧，结果他被从华盛顿召了回来。我想，不应该这样做。李维诺夫还能有用，因此，不应该用一个平庸的、缺乏主动性的人替换他。回到莫斯科之后，李维诺夫虽然形式上得到了外交副人民委员的位子，实际上已经靠了边，后来干脆被解职退休。并且他死得很惨。他死的那场车祸，并非意外，那是斯大林背地里安排的……”

我从未听到过的关于车祸的说法，所以感到万分震惊。我感叹道：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这不可能，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但我立即道歉打断了他。

米高扬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非常熟悉那个地方，离李维诺夫的别墅不远。那里是个急转弯，所以，当李维诺夫的车拐弯之后，路上横着一台卡车……所有这些是事前安排好的。斯大林是干这一行的高手。他把内务部的人叫来，当面布置任务，然后就出了车祸，最终斯大林想除掉的那个人死了。类似的情况有不少。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赫艾斯，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等等一批人都死于这种车祸……”

“斯大林有理由惩罚李维诺夫，”米高扬继续说道，“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当时李维诺夫基本上已经靠了边，住在别墅里。来莫斯科

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一般按照老习惯利用机会，经常看望他。他们的话题各种各样，其中也包括了政治.....”

“其中的一次谈话中，美国人抱怨说，在许多问题上苏联政府立场十分固执，美国人跟固执的斯大林很难打交道。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不必感到无望，这种固执也有某种限度，因此，如果美国人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苏联领导人也会让步的。这次，以及李维诺夫的其他谈话都被窃听并记录。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我也读了这个报告。李维诺夫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实质上，这是叛国罪，变节。李维诺夫向美国人提建议，如何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以损害苏联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先，斯大林想审判并枪毙李维诺夫。但后来决定，这会引来国际丑闻，使盟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所以，他一直拖着这件事。但他没有忘记。他根本就不会忘记这类事情。因此，多年之后，斯大林决定不显山不露水地执行自己的判决。结果，李维诺夫死于车祸.....”

-----

斯大林与丘吉尔(2)

-----

考虑到米高扬给我讲述的这一切非常重要，我问道，我能否，当然是援引他，在自己的某本书里使用这段话。“我希望，”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说，“如果能够走到这个时期的话，我将来亲自有机会把这一切讲出来。但是，如果我来不及的话，那么您可以根据情况和理性的考虑，使用这个信息。”

回到编辑部之后，我立即把米高扬的谈话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这些年来，记录稿一直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现在，当我公开这段话时，我没有违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意志。

至于事情的实际情况，我想，没有理由对米高扬那番话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斯大林血迹斑斑的受迫害者名单上，又添上了一个蒙难者，揭开了又一个残忍的犯罪。

我想补充的是，关于李维诺夫从苏联驻美大使任上被解职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质在于，在莫洛托夫 1942 年春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期间，西方大国，正如前文所述，承诺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后来又拒绝履行诺言。这在英美社会各界引起了愤怒的浪潮。在美国举行了各种示威、游行等等，其中邀请了李维诺夫前往演讲。自然地，他批评了美国政府的行为。在跟斯大林的某次谈话中，美国大使哈里曼表示，罗斯福总统对苏联大使的类似讲话不满意。哈里曼补充说，大使不应该批评所在国的政府。

这看起来，是宣布了李维诺夫为不受欢迎的人。对于本来就不喜欢李维诺夫的斯大林来说，找到了召他回莫斯科的借口。可能，如米高扬所说，莫洛托夫的倾轧也起了作用。同时，美国人将大使

赶出去，也刺激了斯大林。显然，华盛顿认为，为了接替李维诺夫，将会从莫斯科派一个职位更高的人。但这里，斯大林决定要给美国一个难看，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将大使馆的参赞安德列·葛罗米柯提升为大使了事。

-----

“别怕德国人！”<sup>(1)</sup>

-----

我费尽周折回到基辅，家里却是一片狼藉，父母亲早已经不知去向。

我回到莫斯科，马不停蹄地赶往德黑兰。

这件事情暂时似乎过去了，但最终还是被贝利亚所利用.....

1943 年 11 月 6 日，红军解放了乌克兰的首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即请莫洛托夫批准我飞一趟基辅，以便弄清楚父母的下落，因为从希特勒军队占领基辅之后，我便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去吧，”莫洛托夫说，“让科西列夫了解一下，什么时候情况允许，并跟军方谈妥，让他们用顺路的飞机带您过去。当然，1941 年您没有采取措施及时疏散他们，是太轻率了。”

此前，我曾经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过，事情是怎么回事。从德国回来之后，我立即告诉了父母，后来我们经常通信。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没有人料到德国人会占领基辅。在信中能够感觉到父亲的信心，即乌克兰的首都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的。跟我一起离开柏林的图比科夫将军，在西南方面军获得任命，做了守卫基辅的方面军参谋长。我请他在必要时关照一下父母。我从他处得到的惟一音讯是，一切正常，叫我不要担心，因为基辅的防御坚固，牢不可破。那是不可饶恕的太过自信。事件的发展比预料要快。古德里安的坦克师团迅速从两侧包抄基辅。在某个时刻，还有可能将部队带出包围圈。那样的话，图比科夫就有可能在最后一台车上安排我的父母。指挥部队的基尔博诺斯将军哀求大本营批准有秩序地撤出乌克兰首府。但是，斯大林禁止撤退，并要求部队拼死抵抗。成千上万的官兵陷入包围，牺牲或者被俘，而不是撤退、在别的战场继续战斗。当希特勒的坦克冲进方面军司令部时，基尔博诺斯和图比科夫开枪自杀。我跟亲人的联系就此中断。

1943 年 11 月 11 日，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去基辅，机上为我找到了一个位子。我准备了一些食品——面包、黄油、腌猪油、香肠，把所有东西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考虑到部分路段可能要步行，给我办了一张由外交人民第一副委员维辛斯基和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签发的通行证，要求各军政机构向外交人民委员助理别列什科夫在基辅出差期间提供各种协助。

莫斯科快到 11 月的时候，天气已经变冷了，所以我决定穿上毛

皮大衣。这是我从德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寄卖店买的，因为我的全部冬装都留在了柏林。这件毛皮大衣非常奢华——这样的衣服在革命前的俄国只有富人才穿得起：结实的黑色厚呢子，缝着貂皮围脖，海龙皮领。跟大衣一起卖的还有一顶黑色缎子底的海狸皮帽。这两件一套，跟沙里雅宾著名画像上的一模一样，价钱非常便宜——总共1100卢布，而当时我的月工资是1800卢布。有意思的是，当时莫斯科的寄卖店里塞满了这样的毛皮大衣和女大氅。提前从首都疏散走的人们，卖光了带不走的东西。原来，在革命、内战和三十年代的饥饿之后，莫斯科的居民手里还剩下不少财产。

但是，我随身带着如此奢华的大衣，却是一个错误。飞机在第聂伯河的左岸布罗瓦雷着陆之后，我一路上搭各种卡车、马车、或者步行走在难民、一队队受伤的散兵、走出森林的游击队员、甚至那些绝望的、衣衫褴褛、被战争变成居无定所的人流中。我一副发国难财暴发户的样子，往往引起敌视，因此每个手里有枪的士兵，或者头戴扎红带子的高加索皮帽、身穿用机枪子弹链交叉扎着的棉短大衣的游击队员，都认为有职责拦住我，检查证件。我手里的证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产生必要的效果。但也会有某些人怀疑其真实性，拖着我去找“大官”进行检查。我应该说，许多人对我的上司怀着巨大的敬仰。看到证件之后，会问道：

“您真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助理？”……并且会尽力帮忙。然而，无休止的检查终究用去了许多时间。晚上9点左右，我才来到了第聂伯河岸边。在浅沙滩，到处弃置着被打烂的、

扭曲的武器装备——德国的和国产的，房屋烧焦的框架冒着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满月照亮着前不久这场苦战的景象。基辅著名的链桥无助地耷拉了下去。钢质拱桥掉进了河中。砖桥墩孤零零地竖着，就像大地测量标记一样，向对岸渐渐远去，消失在迷雾之中……我回想起，1920年我们跟父母亲也是在这个地方，在12月的严寒里，看着被波兰人炸断的链桥架在冰层中凸出。我们一家在内战翻腾着的国家里，从我出生的饥饿的彼得格勒，前往似乎是幸福的乌克兰，基辅是这条漫长、艰难旅途的目的地。当时我才4岁，这番折腾之中的许多场景，就像断桥的那个画面，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记忆，而现在则分明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艰难地在冰上走着，费力地爬上结了冰的金属梁。当我们经过新的漂泊，于1923年重新回到基辅之后，链桥当时刚刚开始修复。我的父亲也参加了，桥的梁是在“布尔什维克”工厂用连接件接起来的，后来父亲做了这家厂的总工程师。可是现在，二十三年之后，我重新又站在链桥的废墟旁边。我们的人民承受了多少苦难，多少回周而复始地修复遭到破坏的一切！我问旁边走过的士兵，怎样才能过河。

“往下走，两公里左右，有浮桥渡口……”

这不，终于到了轧平的、通往渡口的大道。汽车川流不息。岸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片汽车等着过河。浮桥在水浪中摆来摇去，在满载的卡车的重压下嘎哑地呻吟着。我在其中一辆上找了个位子。这不就是第聂伯河的右岸，实际上，我已经在基辅了。车队向左转了。我跳下车箱，朝右走。这附近应该有“弧形转弯处”，——弯弯

曲曲通向大寺院修道院的公路。

温暖的夜晚，周围是湿润的树叶和树皮的气味。寂静和荒无人烟使我感到大吃一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死了。穿着毛皮大衣很热，所以我脱了它。上到山上，顺着马利亚花园走着。草地上是厚厚一层没有打扫的树叶。沿着人行道——是稍微枯萎的菊花。不知是谁在围城里种的。这是利普基，当年基辅的贵族区。看不到任何破坏。

我沿着“阿森纳尔”工厂的围墙走着。1938 年，我从这里去了太平洋舰队。右手是忠于彼得大帝的伊斯克拉和科丘贝纪念碑的底座。革命之后，纪念碑被拆毁并拿去回炉，在其底座上竖起了“马可沁”机枪以纪念阿森纳尔工厂工人的起义。德国人没有动这机枪。这是如此熟悉的地方！我从这儿走过多少次去“阿森纳尔”上班！这不是红军之家吗，从前的军官俱乐部，再往前，一幢别致的、全白色、像块砂糖一样的房子，那是糖厂主人扎伊采夫的别墅。三十年代，那里住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战争开始之前按照斯大林命令被枪毙。

在列瓦绍夫街的拐角处（改名为卡尔·利普内赫特街），是从前的波兰总领事馆的大楼。我此后还得回忆起它，回答莫洛托夫与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有关的问题。我向左拐，走向学院路方向。在那儿，在十字路口，就是我的家。等着我的是什么？在透明的月光下，我如此熟悉的街道显得陌生，甚至敌意。几天之前，在这个人行道上走着纳粹分子。现在他们已经无踪无影了。

城里没有电，但我却希望在位于一层的我家的房子里，某个窗户里闪烁着烛光。然而，玻璃后面是地狱般的黑暗。我在门口停下来。门敞开着。旁边的墙上粗大地写着一行“已检查——无地雷！”用颤动的手指敲了敲窗户玻璃——我们家的老暗号：三下，三下，两下。没有回应。走近第二个窗户——那里是父母的卧室。再次敲了敲玻璃。还是没有回应。进到楼里。短短的走廊，两级台阶往上，便是人造革包着的门。机械地按着门铃。没有铃声——没有电。我敲着门——但人造革下面是厚厚一层棉絮。敲门框，先是轻轻的，再用力敲。没有回应。一拉把手——门便开了。我喊着母亲，父亲。无人回应。走入门厅——我随身带着一把小手电。进入客厅，照着墙壁，地板。光线照亮了肆意破坏的痕迹：被劈下来的钢琴盖子仍在墙角，被劈开的没有画布的画框，橱柜的玻璃打碎了，到处是粪便——已经风干了。这意味着，住户离开房子至少有几个星期了，并且，德军士兵，或者在短暂的无政府时期无法无天的盗贼逃跑之前，有过一番肆意纵行。

-----

“别怕德国人！”(2)

-----

进到睡房——这里也有过同样的浩劫。我的房间里也好不了多少。我精心收藏的书，从书柜被扒拉到地上。书已经不多——大部分都消失了。

我用笤帚清理出一块地面，铺开报纸，上面铺上我那奢华的毛皮大衣，想睡一觉。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但睡不着。这几个小时的震撼太强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母早已不在这里了。难道他们遇难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毛病。他可能承受不了纳粹占领时期遭受的新困苦。但妈妈远非年迈之人，她总是精力充沛。她完全可能保全下来。如果她被赶出家门，那会给我留下信息的。早晨，天亮之后，开始仔细搜寻，在床和家具下摸索，探究窗框和家门框。可能，那里会划出点什么，好让我猜透这个谜。一无所获之后，便到城里去找。找遍了所有留在基辅的熟人。有人看见过父亲，有人看见过母亲。但这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活着。心里一阵轻松。但他们在哪儿呢？

渐渐地，我开始有把握了，也就是父母亲不在城里，并且他们根本不在战线我们这一方。他们是被德国人带走了，或者是自己决定去西方了，因为他们知道在占领区呆过之后，苏联政权回来之后会有大麻烦？实际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脚底下现在有了一枚定时炸弹。我知道我们的习惯做法，因此十分清楚，我早晚会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会，然后被安排在某个不显眼的机构里，并且更坏的结果是，被发配得远远地，或者“找一个什么事”，干脆被清除，因为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这样的人，斯大林是不

会让他活在世上的。

后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了不让我冒险，更换了姓氏，用了母亲娘家的姓。虽然他们生活经验多多，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十分幼稚。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眼线，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这点小把戏。而在后来，父母的这种“防备措施”只不过更加挑动了贝利亚。

当我明白父母找不到之后，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每次，遇到“险情”时，我不知为何总是很平静。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时，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某个车站上，拥挤的人群把我和父母挤开，我一个人被丢在了月台上，眼看着贴满难民的火车车厢晃过眼前，将父母带向不知何方。后来，当我长大些时，嗓子里的一块脓肿使我窒息，我同样平静地听到有人对父母说，“自己保重吧，他活不到天亮的……”天亮之前，脓肿自行冲破，于是我活过来了。

但是，我心头却十分沉重。这既是对父母的担心，也是明白必须尽快向莫洛托夫汇报这件事情。然而，想离开基辅并非易事。没有定期的航班，于是必须等着搭顺路的飞机。我手里的证件帮了大忙。警备司令给了我一部“威利斯”，把我送到左岸，布罗瓦雷，到了苏联英雄拉盖耶夫将军指挥的空军部队驻地。他有一架运输机，不定期飞往莫斯科。但是，天气却不适于飞行：低云，大雾，甚至歼击机都停止了战斗出航。

拉盖耶夫请我到 he 住的农舍里。每天，我跟他下棋到深夜，喝着女主人用甜菜作的家酿酒，然后在正房的小铺上睡觉。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这种无奈的滞留使我着急。我知道，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莫洛托夫可能在我回去之前离开莫斯科。此外，我知道，这件事汇报得越早越好。如果从其他途径知道了，那结果可能是在企图隐瞒真情。而这一点，按照当时的规矩，是最大的罪过。

天气没有好转，但有消息说，库尔斯克地区的云层散开了。我当然不能告诉拉盖耶夫，为何在我们代表团出发去德黑兰的特定日期之前回到莫斯科如此重要。但是，他感觉到事情十分紧急。于是自作主张派了一架歼击机，把我送到库尔斯克附近的军用机场。次日，我从这里飞往莫斯科。

我紧赶慢赶，还是迟了。莫洛托夫已经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一起两天之前乘火车前往巴库，再从那儿飞往德黑兰。同时我得知，我的外交护照已经办妥，并且当天夜里有一架运输机从伏努克沃机场飞往阿塞拜疆首府，机上为我预留了一个位子。这样，我跟任何人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一天之后便抵达了伊朗首都。我打定主意，在完成自己最后一次翻译任务之后，在德黑兰会议结束时把所有情况告诉莫洛托夫，以便不影响工作。开会的日子里，参加全体大会和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的双边会谈，翻译“三巨头”的席间谈话，作记录，准备各种文件，总之非常忙碌，差不多会忘记自己的事。但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想象着自己的“被逐出乐园”将如何发生。

会议结束之后，我国代表团分乘几架飞机回到了巴库。从这儿

乘火车往莫斯科。我在莫洛托夫的车厢里，利用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他讲了，在基辅未能找到父母。出乎我的意料，莫洛托夫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报告。

“您及时报告给我，这样做很对，”他稍事停顿了一下说，“这种事不能拖。他们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了基辅？”“我不清楚。也许是被德国人赶走了？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一点也不能排除。我想，他们是会找到的。那么您继续工作，并且再不要跟任何人讲什么。告诉了我，这就足够了……”于是，我继续工作。我照常被叫去翻译斯大林的谈话。1944 年春天，我被列入参加在杜巴顿伊科斯制定联合国宪章草案的苏联代表团，这样，我在华盛顿工作了几个月。我以为没事了。

但是，这不过是我的想当然而已。

-----

斯大林更喜欢印度(1)

-----

贝利亚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其卧室的笔记本里，记录着 500 多个供其发泄淫欲的女性名单。

他一直在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了”。

莫洛托夫请斯大林在我的工作调动文件上签字，而他的前四位助理，有三位被枪毙，第四位从卢比杨卡监狱的电梯井跳了下去.....

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在各自机构的办公室之外，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公用住房。这些房子位于人民委员苏维埃(即苏联政府——译注)大楼的二层。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只不过在不同的走廊罢了。距离“主人”最近的是贝利亚。1941 年 10 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员会疏散到了古比雪夫市，当时所有外国的外交代表机构也都搬到那儿。贝利亚却去了高加索为军队安排石油供应。实际上，他可能是想远离莫斯科，躲过危险时刻。

1941 年 12 月上旬，我和巴甫洛夫被莫洛托夫从古比雪夫召回到莫斯科之后发现，我们的房间已经被占用了，而贝利亚的办公室依然空着。莫洛托夫要我们暂时先在这间办公室安顿下来。

我们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他不太乐意地执行了莫洛托夫的命令，为我们打开了空置的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完全没有使用过，收拾得一干二净，既没有文件夹，也没有一片纸，似乎主人根本不打算回到这儿来。但电话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克里姆林宫内线和政府长途电话。

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我们禁不住诱惑，对法力无边的斯大林秘密机关头子的房子进行了一番检视。

访客首先进入接待室，这里有警卫。右边的门通往秘书办公室，那是两间不大的房间。左边的门通向宽敞的会议室，这里有一

张长桌子。后边是首长本人的办公室，连着一间起居室。再往前是卫生间和一小间类似厨房的房间，有自来水和煤气灶。莫洛托夫本人的休息室比这要简单的多，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和斯大林，以及其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有住房。当莫洛托夫生病而又有紧急公务需要请示时，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苏联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之后，革命领袖们搬进去的房子相当难看，屋顶低矮，房间窄小，家具都是革命前的旧货。以前这些房子住的，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宫当差的，以及沙皇偶尔到旧都来时为其一家人服务的差人。

年轻的革命领袖们十分简朴，因此沙皇前任差役的房子已经使他们很满意了。

但是，从第比利斯奉调来到莫斯科的贝利亚却没有搬进这种房子。传说似乎他说服了斯大林，要求作为国家安全机构的首脑最好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以防发生敌方突袭或暴动时可以负责救援政治局成员。不管怎么说，“主人”允许他在卡恰罗夫街和花园环线交叉口处占了一幢别墅。结果是，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时间都呆在克里姆林宫，而贝利亚本人却拥有一定的自由并不受监督。贝利亚利用了这一点，用自己的亲信组建一个小队，专门在大街上寻找漂亮的年轻妇女和姑娘。这些人行动起来完全无所顾忌：汽车停在毫无防备的女人之前，身穿国家安全机关制服的军官和颜悦色地以有重要事情为借口请她上车，车门关上——就这样，贝利亚淫欲的又一个牺牲品被带到别墅的内院。通常，女人会先被带到餐厅招待吃

喝，然后留下她一个人呆着。

受害者一般不会困惑很长时间。画像上非常熟悉的、活像癞蛤蟆似的那人出现在房间里，戴着夹鼻眼镜，身穿浴袍。贝利亚向女人提出那个要求，如果女人不同意，便强奸了事。护送女人出别墅的军官则会警告女人，如果“泄漏机密”，她本人和家人就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只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人们才开始谈论。

贝利亚在这方面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他的卧室发现了一本记录，上面写着五百多名受害妇女的名字。

然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发现了最高领导人现行“住房制度”中的危险。所有政要随时都可能成为身处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贝利亚的阶下囚。因此，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员迁出克里姆林宫，在列宁山上为他们建造了高级住宅。但是，领导们又很快从那里迁了出去。空置的高级住宅似乎成为领袖们“出”克里姆林宫的纪念物。

斯大林时期，最高领导人的住房根本不成问题。克里姆林宫内的房子，只要他们还在位，是配给每个人的。如果某人在斯大林那儿失宠，那么莫斯科的房子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失宠的领导人首先会被投入监狱，然后很快会升天。同时，他的家人会被发配到克累马集中营（位于苏联远东，雅库梯亚境内——译注）。

斯大林死后，情况有所变化。失位的领导人不再被枪毙，但必

须搬出位于列宁山上的高级住宅。当时便有这样一个设想：设立特别建筑局，在首都最好的区段建设豪华的高级住宅楼，这样，在位的领导人都可以入住。若降职或者退休的话，也不必搬出这些专门按照其趣味和要求建造的房子。

这便是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住房问题历史的简单回顾。

在贝利亚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惟一令人满意的，是经常有热水的卫生间，还有政府长途电话。有时我们必须与留在古比雪夫的维辛斯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英国处和美国处联系，询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有时我们俩甚至还可以与各自留在古比雪夫的妻子通电话。有一次，正在通话当中，我发现有人接入。我与妻子佳丽亚简短告别后，挂上了电话。很快，政府专用长途电话响了起来。

“喂……”

“你有什么权力使用首长的电话？”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能不能先通报一下？”

“我没时间跟你客套。谁批准你进入这间办公室？你是谁？”这个声音威胁道。

我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想示弱，因为我是合法地呆在这里的。

“请先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使用政府电话线？”

“我是谢罗夫将军。我负责政府通讯。我接到报告，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政府线路进行私人通话了。”

我的确曾经两次有私事打电话到古比雪夫。佳丽亚当时怀孕不久。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就要出生了。佳丽亚身体非常不好。我在为她搞各种药，有时顺便捎过去一些能买到的食品，用电话通知她具体带东西的人，以及询问身体状况等等。这样的通话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所以我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就像上次在利沃夫一样，我再次碰上了谢罗夫将军。他肯定已经忘记我是谁了。因此我答道：

“我是别列什科夫。如果记得的话，我跟您曾经在利沃夫见过面。贝利亚同志不在时，我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命令在这里办公，我是他的助手。您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现在古比雪夫，所以不知道情况。”谢罗夫慌里慌张地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然而，我想他肯定将这起“事件”报告给了贝利亚，并且，如果莫洛托夫事先没有将我们搬进他办公室的问题与贝利亚协商的话，他会给我们提醒的。所以，当我们最终在莫洛托夫办公室隔壁得到自己的房间时，实在是太高兴了。

表面上，在我们偶尔打交道的时候，贝利亚对我很客气。参加德黑兰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中，正式成员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但是，与他们一起呆在苏联大使馆的却还有贝利亚。每天早晨出发到举行全体会议的大楼时，我都能看见，贝利亚坐在装有深色玻璃的“别克”车里，竖起风衣领子，将细呢礼帽压在额头上，巡视大使馆的院子，只有夹鼻眼镜的镜片偶尔反光。一次，我

与他在餐厅旁的警卫室附近偶然相遇。他和气地与我打过招呼，询问了会议上的一些情况，然后重复了日前在军事专家会议上伏罗希洛夫所说的斯大林喜欢我，因此我应该利用他的好感考虑自己的前程之类的话。我谢过他，并回答说，我非常重视自己目前的工作，并没有奢望其他东西。

-----  
斯大林更喜欢印度(2)  
-----

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座位的次序一般是，斯大林居中，他的右手是主客，然后是翻译，其身后是贝利亚。这样，我便时不时地与国家安全首脑并坐。他几乎从来不动食物。但是，每次席上都会给他准备一盘小红辣椒，他就像是嗑瓜子那样一个接一个送入口中。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小辣椒，我将它放送到嘴边，就感觉到人整个似乎着了火。贝利亚笑了，并且坚持要我吞下去。我不得不做出样子，而后悄悄把辣椒抛在桌下。

“这很有用。男人每天都要吃一盘这种辣椒。”贝利亚用教训的口吻说。

他每次都要问，我为什么那么瘦。

“我的体格构造就是这样的。”我回答道。我当然不能说，我们每天在克里姆林宫卫兵食堂吃的两根小灌肠，无论如何也不会增加我的体重。

总而言之，每次有贝利亚在场我都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他随时都会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记得那是 1944 年秋天，我向莫洛托夫汇报华盛顿来的一份电报。人民委员一边听着，一边继续看桌上的文件。然后，他盯着我问道：

“1934 年你在波兰驻基辅领事馆干了些什么？”

我一下子张皇失措，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莫洛托夫盯着我。我明白了，必须马上回答。

“在波兰领事馆？”我开始回想，“我的确去过那儿。当时我是基辅国旅的导游。游客一般经波兰回国。我收起他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办理过境签证……”“这个我们知道，”莫洛托夫冷冷地说，“但是，这里谈到的造访波兰领事馆，并不在旅游季节，而是迟些，是秋天的事，并且你也不是从正门进去，而是走了后门。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

想想看，这已经都过去了十年。在这期间基辅遭到占领，解放时有过激战。古老的克列夏季克街遭到破坏，圣母升天大教堂被炸毁，不计其数的艺术珍品被烧毁，成千上万的基辅人牺牲。而 1934 年监视过我的某个人写的东西保存了下来，现在成了一个危险的物证。

“我去找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前是‘国旅’的汽车司机，所以我经常跟他一起载着客人在市内游览。后来他转到领馆工作，当然是经过有关部门的推荐。我偶然在街上碰见了她，他请我去车库坐了坐。我们坐了一会，聊了聊会天，抽了根波兰香烟，喝了杯德国啤酒——就这些了……”

莫洛托夫的目光稍微缓和了些，后来他说：

“我接受你的解释。因为这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你去波兰领馆的事。你可以走了。”

我似乎很幸运。因为我完全可能被宣布为混进圣地——斯大林办公室的“波兰白匪间谍”。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叹，这世界真小。波兰驻乌克兰领事是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的父亲。如果当时对我立案，强迫“承认”的话，结果似乎是老布热津斯基策反了我。

然而，与莫洛托夫的谈话并不是没有后果。1944 年是在胜利的礼花中结束的。当时我们已经住在莫斯科维亚街的一套两居室里。房子是 1944 年春天，我的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前分到的。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保姆，这对佳丽亚非常重要，因为她不想放弃塔斯社的工作。1945 年新年我们决定在家里过。来了许多朋友和同事，非常热闹。客人们在凌晨才散去。

1 月 1 日，在人民委员秘书处值班的是巴甫洛夫。他从我家直接去了克里姆林宫。而我当天休息。我们整理好房间，出去到街上逛

了一会，带谢尔盖玩了玩雪橇，便早早睡下了。元月 2 日的凌晨大约三点，电话响了。莫洛托夫紧急召我去克里姆林宫。我毫不迟疑，叫了车，几分钟之后便进了秘书处。我向在场的人问了新年好，但很快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做声，表情阴沉。像往常一样，我想不经通报见到人民委员，但是科西列夫请我稍候，自己进了首长办公室。这一切都有些怪异。科西列夫终于回来，非常正式地对我说：

“别列什科夫同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罗维奇正在等您。”

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些一下子让我感到很陌生，包括有一张长条桌和几排椅子的接待室，还有人民委员的办公室，似乎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不曾每天来过这里。

莫洛托夫，就像 1940 年我第一次看见他一样，低头看文件，桌上是一盏绿色灯罩台灯。

我停在屋子中间，手足无措。

莫洛托夫抬起头来，定睛看着我。最终他打破了沉默。

“走近些，请坐。”

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心里七上八下：我做错了什么？但我已经明白：出事了。“你最近没有父母的消息吧？”莫洛托夫问道。

“43 年 11 月去过基辅之后，我向您汇报过，在那儿没有找到他们。可能，他们死了或者被纳粹赶到德国去了，许多基辅人都是这样的。最近我也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可是贝利亚认为，他们是自愿去了西方。”

“他有证据吗？”“他有自己情报人员的报告作证据。贝利亚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再次提到了你与波兰领事馆的接触。结合到你父母的失踪，他认为，出现了新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因此，他提出你不合适继续目前的工作……”

莫洛托夫停了一下，考究般地看着我。我似乎僵住了。贝利亚的“进一步调查”意味着什么，不难明白。也就是说，贝利亚本人曾经建议我利用斯大林的好感认真对待大好前程，而现在我的前程全在他的手里了。我突然感到很漠然：一旦事情发生了，再努力争取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时，莫洛托夫接着说道：

“我跟斯大林同志商量过您的事情。他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下您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在最高层的身边。您必须马上将所有文件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在没有决定您的问题之前，必须呆在家里。再见……”

完了。我就像在云雾中，摸索着走了出来，机械地打开了保险柜，取出了所有的文件夹，列了一张清单，我跟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们两人甚至没有告别，一下子就消失了。

留下我一人在房间里。我坐在凳子上，努力地想理清纷乱如麻的思绪。我穿上了自己带着人民外交委员顾问将军肩章的制式大衣，戴上有帽徽的高顶帽，然后走向出口。

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大门口，值勤军官拿过我蓝色的小本。

它可以使我通过任何一道门进入克里姆林宫，非同寻常地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

“我奉命收回您的通行证。”

这句话似乎永远彻底地关上了我身后通往过去的大门。

我一言未发，来到了红场上，然后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我不能马上回家。就像梦游患者一样，我在空旷的大街上走了几个小时。妻子上班之后，我才回到家里。谢尔盖睡着，保姆在厨房里忙活。家里我不能呆。每天，我都出去在城里逛游几个小时。整整两周，没有任何消息。前不久的同事和许多“朋友”一阵风似地都吹跑了。夜里，我等着敲门声——因为贝利亚许诺要进行“调查”。

最终，1月17日，电话响了。是请我去《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编辑部。我松了一口气。我跟这家杂志打过许多交道。有段时间莫洛托夫曾是实际上的总编，他托付我为编委会准备材料，看文章，给编辑部转交清样和版式的修改。我也非常熟悉副总编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列昂捷夫，他负责杂志的实际工作。

他非常亲切地迎接了我，让我坐在自己办公室小桌前的椅子上。

他说：“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斯大林同志签署的决定的抄件。那上面说，您不再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职务，转调到《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工作。事实上，我此前已经知道了这个决定，但还是想等到正式文件，然后再请你来。”

-----  
杰卡诺佐夫的秘密使命(1)  
-----

我感谢了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告诉我的情况，并说，虽然没有经验，但将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

列昂捷夫抢先说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我向您转告一些想法。他建议在私下场合尽量不要谈及您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不要谈您在他的秘书处的工作内容。非常简单：您在人民委员会工作过，就行了。要避免与以前因公交往过的外国人有任何接触。如果要发表文章，请使用笔名。”

我明白了，莫洛托夫给我这些忠告，是为我免遭贝利亚的迫害。我应该尽量不显眼，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传媒上，以免再次提醒那个没有完结的“调查”。

“现在谈谈您在编辑部的工作，”列昂捷夫继续说，“现在已经决定，我们的杂志要出英文和德文版，因此莫洛托夫提议您一开始先负责这两个版本的工作。您看如何？”

“好的，这似乎比较接近我的能力。非常感激地接受这个建议。”

“我想，您不需要刻意避免作者的身份……当然要用笔名。”列

昂捷夫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向莫洛托夫表示了谢意。他并不常保护别人。在死囚的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容易。“B M”这个缩写——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多次与同样的一个批示“B M”意思是“极刑”，即枪毙，一起出现。在我之前，莫洛托夫的四个助理已经死了：三人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院里被枪毙，第四个人受不了酷刑，从卢比扬卡的电梯井里跳了下去。莫洛托夫没有保护他们。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决定救我一命，甚至为我的未来给了指示。我想，他甚至与斯大林谈妥了，在我转调到杂志工作的决定上有“领袖”本人的签字。显然，这一点挡住了贝利亚的“调查”。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被枪毙之后，这期间已经过去了十年时间。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从未有过接触，但莫洛托夫还是想着我，并去掉了我身上“不可靠”的标记。然而，在这些年里，他本人也曾经命悬一丝。

-----

杰卡诺佐夫的秘密使命(2)

-----

贝利亚亲自动手，用铁链严刑拷打苏联副外长，逼着他承认是

英国间谍。

苏联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大着胆子问斯大林：为什么要逮捕我的妻子？得到的回答是：他们连我的亲戚也全都给关起来了……

贝利亚对莫洛托夫悄声说：你的妻子波莉娜还活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马伊斯基二战期间担任苏联驻英国大使。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我们曾经见过最后一面。他基本上一直住在位于莫斯科郊外莫仁卡的科学院别墅里。

我是在一个暖和的夏日去看他的。他住的房子位于花园的深处，花园精心养护，花坛里鲜花如画，地上玫瑰盛开。只有花丛中间飞来飞去的蜜蜂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还有远处一颗高高的松树枝上啄木鸟的叩击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马伊斯基坐在外廊上的轮椅里，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大开本旧书，腿上盖着一条色彩鲜艳的苏格兰呢毯。服务员送上来了马林果酱和茶水。马伊斯基自己动手把茶沏到薄瓷茶杯中，把果酱放到小盘里。

通常，我们的谈话总是从回忆遥远的战争年代开始的。我最早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认识他的，那是1941年12月下旬，他陪同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到达莫斯科。他们从苏格兰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再换乘火车直达目的地。在前不久结束的莫斯科战役中，我军首次大获全胜。但在首都周围依然有希特勒的“别动队”在活动。艾登和马伊斯基身穿白色高领短皮大衣，戴着毛茸茸的帽子。那年的冬天很冷，所以他们从伦敦出发之前准备的行头刚好适合。从此

后，我跟马伊斯基在莫斯科常常见面——包括在丘吉尔来访，1943年秋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期间，以及此后马伊斯基回到莫斯科，作了副外长之后。但后来我离开了外交部，而马伊斯基则身陷卢比扬卡。“实在是太恐怖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带着轻微的距离感回忆道，“贝利亚亲自审问了我。他用铁链，短鞭抽打我。他要我承认一直在为军情局工作。但我最终还是招认了，说早就当了英国间谍。当时我想，如果不被枪毙，便会流放，让我安生。但我被一直关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审问从未间断。我从其中很快明白了，这里不仅仅事关我本人，贝利亚在准备干掉莫洛托夫……”

早在1940年底，莫洛托夫的地位已经不稳。维辛斯基接替了他的外长职务。莫洛托夫的妻子也已经被捕——波莉娜曾经主管香料工业，她作了许多工作，使得苏联的妇女终于有了女性美。传说她是以色列的间谍。苏联积极参与了以色列的建国，两国建交之后，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是高达·梅厄。她与波莉娜曾经是中学同学，因此在莫斯科见面时已是老朋友了。她们经常互相走动，很多时间都呆在一起。这使得贝利亚有理由说服斯大林，称波莉娜早就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工作。所以，尽管莫洛托夫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他的爱妻却被投入卢比扬卡的地下室。据称，莫洛托夫曾经大着胆子问斯大林，为什么逮捕波莉娜，得到的却是一个半开玩笑的回答：

“我一无所知，维亚切斯拉夫，他们连我的亲戚全都给关起来了……”

的确，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斯瓦尼泽和第二任妻子阿里卢耶娃

几乎所有的亲戚，要么坐过牢，要么已被枪毙。对于全能的领袖这个“玩笑”话莫洛托夫无以为答。何况，我们的主席加里宁和“主人”的主要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都坐过牢。后来，莫洛托夫说，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走廊里遇见了贝利亚，两人走近后，贝利亚在他耳边轻声说：

“波莉娜还活着……”

莫洛托夫能够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爱妻就在贝利亚的牢狱中！莫洛托夫还回忆起，就在斯大林刚刚死后，贝利亚客客气气地将波莉娜送了回来，他是多么幸福。当时，马伊斯基也被从牢房带到了贝利亚的办公室。那里的桌子上放着一盘水果，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只酒杯。贝利亚当时客气至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他对嫌疑人说道，“看看您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些什么呀？您怎么会是特务呢？这真是胡说八道……”

马伊斯基对当时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他认定，这是斯大林总管的又一个狡猾的圈套。他想，如果说自己不是特务的话，一定会挨打的。

“不，拉夫列基巴甫洛维奇，我是特务，英国人招募了我，这是真的……”

“您别说这些傻话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根本不是什么特务。这是他们在诬陷。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挑拨离间者会得到惩罚。而您现在可以直接回家了。”

马伊斯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

他在考验人，并且马上就会开始嘲笑他？

一个军官走进办公室，将嫌疑人进牢房之前收走的衣服物品放在他的面前。

贝利亚将马伊斯基让进卧室换衣服。

“这样了，”贝利亚向马伊斯基伸出手来说，“请您宽宏大量，原谅吧，这是个误会。车下面在等着您.....送一送。”他对军官吩咐了一句。

在斯大林死后和贝利亚被捕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贝利亚将自己打扮成揭发者，指控自己手下人滥用职权，越权，残酷对待人犯。为了推脱自己，他匆忙逮捕并枪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侦查部门的负责人柳明和其他刽子手。

但是，当时，为了捏造“莫洛托夫英国特务案”，马伊斯基和波莉娜却是有用的。从马伊斯基讲述的贝利亚主持的审问中，大约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情景：

莫洛托夫似乎在其 1942 年春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期间被英国人招募。当时巴甫洛夫担任他的翻译。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安全军官。他们乘坐临时改装的苏制远程轰炸机先飞抵苏格兰北部，然后换乘夜间专列快车从格拉斯哥到达伦敦。为了安全起见，苏联代表团的代号为“布朗先生使团”，安东尼·艾登在机场上迎接了他们，也由他陪伴客人抵达英国首都。莫洛托夫与艾登一样，各有一节高级车厢。车厢里，除了部长专用的宽敞包间之外，还有翻译和警卫的单间卧房。深夜，艾登带着自己的翻译来到莫洛托夫的车厢。他敲

了敲人民委员的门，门开了，他们二人走了进去。

当时，我们国家有一条严格规定：任何人，甚至政治局委员，必须在至少有一名，最好是两名苏联“证人”在场方可与外国人进行谈判。这种“证人”一般由翻译充任。但是，当时莫洛托夫却跟艾登及其翻译单独呆了近一个小时。他们谈了些什么？只能是“串通”。这个情况当时即被随从中的某人记录了下来。在某个时刻，相应的报告一直放在贝利亚的文件中。现在，它成为“证据”，即就在当天夜里艾登招募了莫洛托夫，使后者成为英国军情局最有价值的谍报员。正是当夜在夜行快车里进行的那场谈话的“机密性质”，可以解释为何莫洛托夫严重违反了斯大林有关不得与外国人单独相处的严格规定。

多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斯大林早已经不再拿自己周围人的意见当回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必须要考虑社会舆论。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虽然有某种意义，但仍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因为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在监狱里。所以，在最后几年，斯大林在一步步地破坏莫洛托夫的威信。在中央全会上，以及其他更小范围内，他谈到了莫洛托夫的“错误”，谈他没有顶住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向西方“投降”等等。与此同时，他逐步将莫洛托夫往后推，把他排斥出政治局。为了最后的打击，逮捕和宣布此前的亲密战友是特务和人民公敌，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然而斯大林之死，止住了这次打击。

在最后的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住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卡

的别墅里，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敬三杯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莉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当有人问道：“怎么可以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莉娜，并且差点害了您本人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如既往：“斯大林是个伟人……”

-----  
“上帝会保佑你们”(1)  
-----

一个普通刊物改名，也要斯大林亲自批准。

“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恐惧，他担心上百万到过西欧的苏军官兵们会像十二月党人一样发动起义。

斯大林再次开始逮捕、迫害，将国家再次置于残酷恐怖与极端排外的窒息氛围之中。

截至到1945年3月份，翻译和编辑的挑选已经完成，我们开始准备出版《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英文和德文版。不久又决定出版法文版。我是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编辑，但我的法文知识不足以保证翻译的质量和正确性。我不得不另外寻找合适的人选。外交部推荐了切格达耶夫，他在战前曾在苏联驻法国使馆工作过，法语流

利。

在打败德国以及战争在欧洲结束之后，我们杂志的名称过时了。写着《战争与工人阶级》的封面无论如何不适应已经开始的和平时期。列昂捷夫要我们大家都想一个新的名字。

很快，我们拟出的各种各样的名称形成了一个清单。讨论的结果，其中的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再次形成了一个清单，列昂捷夫转给了莫洛托夫，后者则转给斯大林定夺。

应该说，我们的思路集中在仅仅几个非常表面化的名称上。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方案：《和平与工人阶级》、《国际生活》、《国际综述》、《国际事件潜望镜》、《世界轨道》、《政治与生活》等等。我们等待答复的时间大约有两周多。新一期的出版日期一天天接近，编辑部里大家都十分着急，因为都看到了战后保持旧名称的不妥。

终于，信使出现在我们位于卡拉什街的编辑部（后来，这栋别墅成了日本大使馆）。他带来了有五个火漆封印的大型红色信封。我们都知道，这来自斯大林的秘书处。签收之后，列昂捷夫剪开信封，取出了写着我们建议的那张纸。在右下角有“新时代”几个大字，和斯大林签名的缩写。我们的方案，没有一个让“领袖”满意，所以他自己给杂志起了名。

问题解决了。但是，“主人”的选择却使列昂捷夫左右为难。当时，许多人对革命之前极端反动的、由黑帮分子苏沃林出版的报纸《新时代》记忆犹新。列宁曾经用各种骂名与其进行过激烈辩论。

大家都知道，列宁与自己的对立面辩论时善于使用各种激烈的修饰词和标签。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是美籍俄裔阿姆菲加特洛夫。记得有一次，他找到我，骄傲地对我说，他祖父的名字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到。出于好奇，我查阅了《列宁全集》中提到美国记者祖先的那一页。原来，列宁称呼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娼妓阿姆菲加特洛夫”。这位引起了列宁辩论怒火的作者，大部分文章就发表在《新时代》上。同时，让我们总编特别恼火的是，这个苏沃林报纸的编辑和他是同姓，也姓列昂捷夫。

我们已经订制了俄文、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而列昂捷夫的疑虑更重了。他不能违抗斯大林，同时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类似不能释怀。将来，当杂志出版之后，一旦有人向“主人”提醒到这个不巧之处，斯大林的怒火一定会降到编辑部头上，他会问：为什么没有预先提醒。

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列昂捷夫最终还是下决心向斯大林报告。这在技术上非常简单，因为编辑部里就有连接克里姆林宫的直拨电话。这个电话响起来时，一般斯大林本人接听。但是，惊动领袖，并且怀疑他的决定这可非同小可！

斯大林听完了列昂捷夫的想法，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样的，当时是一个新时代，现在是另一个。战争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了。敌人被打败了。我们的周围都是朋友。新的时代到来了……”

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列昂捷夫的疑虑烟消云散。

在那一刻，斯大林是否真的相信，新时代已经到来，与西方列强的合作关系可以保持下去，在国内也将不再追寻“敌人”，苏联和全世界的好时光已经来临？国家辽阔的土地上一片废墟。千百万人蜗居在土屋里，物资匮乏。并且还要完成加入对日作战的承诺。但这被看作一场短暂的战役。最主要的，是尽快为居民创造基本生活条件，重建遭到破坏的一切。也可能，当时斯大林相信，美国人将会帮助我们。也可能，他已经打算节制自己的胃口，进行妥协？因为，刚刚入主白宫的杜鲁门使人相信，在国际事务方面他打算继续罗斯福的方针。

前不久的盟友间关系紧张，这是谁的责任？西方的某些研究者认为，反希特勒三大国联盟的所有领导人在同等程度上都已经对继续这种盟友关系不感兴趣了。在我看来，战争刚结束时，苏联领导人极力在保持信任气氛，然而在一系列情况下却又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这种气氛。这里的原因是，斯大林的疑心太重，他倾向于用“上一场战争”的概念进行思考。他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在苏联周围有几个国家建立一个地带，而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他可以完全放心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英美相应的反应。但是，那里也并不大关心保持良好的气候。杜鲁门对前来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莫洛托夫进行粗鲁攻击，使斯大林有理由认为，美国新政府正在放弃罗斯福的政策。此后在波茨坦，杜鲁门企图用原子弹讹诈苏联，在

莫斯科制造出了一种受到严重威胁的气氛。由此，斯大林的行动在西方被解释为苏联威胁。对抗开始加剧，“冷战”展开，并有演变为“热战”的危险。

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作为回应，苏联也展开了更残酷的反帝斗争。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合作斗争中形成的相互好感依然存在，而双方却都在让各自的人民准备对抗。正是在四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发起了与“世界主义”和“崇拜外国”作斗争的宣传运动。我觉得，这里企图达到两个目标：驱使人民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侵略者”，在国内重新制造恐怖气氛。

我想，是“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不得安宁。在 1812 年的卫国战争期间，数十万俄军官兵到了巴黎。沿途他们了解到了西欧各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条件，与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有天壤之别。他们感受到了甚至在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依然处处散发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俄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这些，并带回了彼得堡。几年之后，参议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现在，成百万的苏军官兵到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走过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土地。他们看到，甚至在五年战争的破坏和希特勒的占领之后，那里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暗淡无光，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比苏联人活得好。不仅仅在东普鲁士，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农家的地窖里挂着整块火腿，还有香肠和奶酪。身处斯大林国家农奴制下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早就不记得这些东西了。所以，令“各族人民领袖”非常不安的是，当他禁锢在

隔绝和无知中的这一大批人回到家里，并开始比较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情况也使他不安。战争期间，许多人克服了自卑综合症，和党组织灌输的等待上级指示的无条件反射。甚至普通士兵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往往必须自行决定作什么和怎么作，根据情况采取行动。这等同于斯大林一直企图在自己的臣民心中打消的自由感。这也促使人们克服了恐惧感。可是，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恐惧感之上。如此一来，出现了对体制的威胁。必须拯救这个体制。

于是，官方的新闻宣传开始诋毁所有“外国”的东西，甚至旧俄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法式面包”被改名，成了“城市面包”，列宁格勒十分著名的咖啡馆“诺德”被改为“北方”。在所有地方都要有“本国优先”。任何没能体现本国优先的东西，就应该受到排斥。遗传学和控制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任何人，只要他胆敢正面评价西方的某个发现，会立即被贴上“世界主义的丧家之犬”，以及在“外国事物”面前奴颜婢膝的标签。那些曾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生活过的人，遭到了怀疑。在各种表格上专门加入了这一栏。似乎当时人们是自愿呆在德国人那儿似的，因而是他们自己的错，而许诺在敌人的领土上消灭侵略者，而后造成红军撤退到伏尔加和高加索的苏联领袖们，则与此无关。数十万人被捕，由于“领袖”的意志在战争最初几天未能撤退，陷入大包围的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又开始了随便抓人，许多无辜的人被立案调查，先是“列宁格勒案”，此后

则有“医生投毒案”。

-----

“上帝会保佑你们”(2)

-----

斯大林可以满意了。他又一次将国家置于恐怖之中。但是，这个成就最终反过来对付他自己。当他临死时，居然无人可以帮他。因为他所有的主治医生早都被投入监狱。

-----

划分“势力范围”(1)

-----

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

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时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

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帅，总司令，“各族人民领袖”，正处在成就和荣誉的顶峰。

斯大林之死，我感受到十分难过。因为，对我而言，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创造了我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属于直接接触他的少数人之一，曾经坐在他身边，认真倾听他说出来的每个词，努力将他的意思连同全部的语气和音调传达给他的谈话对手。被他排斥之后，我甚至没有感到难过。与我国人民，全人类所承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够赢得他的留恋？我也没有伤心，虽然我知道，这个孤独、病态般疑心重重的人，连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根本都从不曾有过留恋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他收留的孤儿。我曾经相信，那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像宝贵的遗物一样，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使我能够在他的身边工作。那四年时间恰似一个瞬间。

苏共二十大沉重地打击了这些观念。当我最早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不愿相信那里面所讲的一切。但是，一旦深入细节，在脑子里检视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见

证，我觉得自己被那个已经推倒的偶像严重欺骗了。

党的二十二大我已经能够比较平静和清醒地接受：我们所有人，包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成了一场大骗局和大蛊惑的受害者。幼稚的大众相信了那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神化的对象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当我开始回忆战时见证过的人和事时，我对自己所听到、所看到的尽量保持客观：避免多余的感性，严格尊重自己所理解的事实。

现在，当我们面临着新的一波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风潮时，当他建立的体制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出来时，我认为，在谴责和痛斥斯大林时代的血腥事件时，客观地讲述所经所见的人事也同等重要。

根据我的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杰卡诺佐夫的第一次降职也是这个原因。而战争结束之后，他引诱了与莫洛托夫常来常往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这次，斯大林没有保护自己的亲信。杰卡诺佐夫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并且被从人民外交委员部解职。

但是，正像我们这里“任命制官员”一般情形一样，没有让他落得太低：他得到了无线电委副主席的位置。不久，他又开始新的升迁。他的一个朋友——梅尔库洛夫，苏联境外资产总局的局长，将杰卡诺佐夫任命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外资局不仅仅管理着战后我国得到的庞大的战利物资，并且事实上鼓励了在东欧国家进行的有组织抢劫。从那儿，整栋的别墅和宫殿为高官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运了

回来——先分解成块，而后在莫斯科郊外装配起来。置于汽车、雕塑、名画那更是不在话下，一般这些东西都是用整列的火车装运回来的。战后某些无产阶级官员之间出现的所谓“个人收藏品”的源头正在这儿。资产局的行动为战后东欧国家的后续发生的灾变播下了种子。

但是，资产局并不是杰卡诺佐夫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阶梯。

斯大林死后不久，贝利亚任命他为格鲁吉亚克格勃的主席。1953 年夏，他和贝利亚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其中也有提拔过杰卡诺佐夫的梅尔库洛夫。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他们，并且判处死刑。同年12 月，判决被执行。

这个案件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向被告所提出指控的细节和实质内容。据说，杰卡诺佐夫似乎按照贝利亚的命令组建了“枪手”小组，并将其秘密派遣到莫斯科来参加贝利亚准备的政变。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五十年代之前，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一旦斯大林去世，必须尽最大力量不使贝利亚在党内占据主要位置，否则党会完蛋。我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他会将国家的发展转到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贝利亚被捕之后，传说他打算解散集体农庄，建立个体农场。阴谋分子们似乎被指控赞成在苏联建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公司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出生在离苏呼米不远梅西午里小村的贝利亚，特别关照过这个城市，当时开始建造一条新的华丽的沿岸街，在“斯

大林山”上修建娱乐设施。所有这些，如人们所说，为了使苏呼米湾变成“阿布哈兹的尼斯”，“高加索的里维拉”，将其“预售”给外国资本用于建造国际饭店和赌场。在党员秘密会议上宣读的中央委员会有关“贝利亚案件”的秘密信件中说，贝利亚企图将苏军撤出奥地利，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向铁托派去了密使。当时，在 1953 年，这一切被描绘成可怕的谋反，其谋反小集团的成员被枪毙是罪有应得。

然而，1955 年就已经与奥地利签署了国家协定，外军，其中包括苏军全部撤出。同一年，赫鲁晓夫亲自去见铁托，并对他声明说，因斯大林挑起的与南斯拉夫中断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传说中对阴谋分子指控中的许多问题，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结果似乎是，我们在四十年之前曾经有机会重建农场经济！也许，这完全有可能解决至少一个问题——粮食问题。那个领导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许诺超过美国的赫鲁晓夫，不仅仅剥夺了农民甚至在斯大林时期都保留着的微不足道的家产。

当然，贝利亚是个嗜血的刽子手。令人恶心的暴虐之徒，强奸犯，淫棍。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手同样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在贝利亚之前，有亚戈达、叶若夫，以及成千上万无名的刽子手。他们毫不犹豫地枪决无辜群众，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带着虐待狂般的快意折磨斯大林镇压期间上百万的受害者。所以，应该将贝利亚案件的材料彻底公开，让世人了解，是否有过争夺权力的上层斗争，或者其中夹杂着有关国家发展道路问题

的原则性分歧。

-----  
划分“势力范围”(2)  
-----

《新时代》杂志社的福利远比莫洛托夫秘书处好得多，但被逐出“领袖”身边的事实却噩梦一般纠缠着我，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莫洛托夫亲自指示我，以记者的身份去维也纳面见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前德国总理约瑟夫·维特，这个活的历史向我透露了苏联与西方和解的秘诀，以及列宁当年与德国签署合约的秘闻.....

回顾我在《新时代》编辑部的最初一段时间，必须承认，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很快，我被列入编委会，并被任命为编辑部的责任秘书。各个外语版本都有了编辑，我的任务只是对他们进行一般的监督。责任秘书的职能范围很广——从纯粹属于记者的事情、编务一直到人事、财务等等。在经济方面我没有理由抱怨。因为以作者身份发表文章，还有稿酬。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47 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被欺骗的一代》——内容是英国青年的现状。我们当时非常同情英国男女青年的困难，但是却没有想到，事实上我们的几代人同样也被欺骗

了，终生都在被灌输什么再过三两个五年计划，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就会到来，资本主义国家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等等鬼话。

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可当时我对自己的第一部，并且被译成英文的大作非常自豪。

编辑部指定由某个特别食品基地保障食品供给，给编委会的每个成员规定的份额花样多，质量好。在这个意义上，在杂志社远比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好得多。但我并没有满足感。心里对过去的回忆，对于国家大事虽然是间接的参与，以及，我毫不隐瞒，接近“领袖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的特别感受依然鲜活。每天夜里，这些感受在诱惑我，但大部分时间噩梦在纠缠着我，在梦里，光明与跌落到无底深渊交织在一起。在多少个不眠之夜，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被“领袖”召见之前脑力勃发的那一个个无可比拟的瞬间。似乎就在我眼前，那个密藏心头、通往他办公室的走廊消失在迷雾之中。这不是吗，我走过哨兵，他向我行礼。这不是吗，这就是那扇门，像往常一样，伏拉西科将军在打盹。我开门，但是，门不听话。伏拉西科长身而起，用一只手拨开我。从深处传来的声音说：“您绝对不能进去！”地板在我脚下裂开，我飞速跌入深渊……每天夜里，“被逐出天堂”的场景以各种变化重复出现。

多年以来整夜工作到早晨的习惯，使我不能按时回家。当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编辑部收到的塔斯社新闻简报，英美国家的报纸。那上面时不时会出现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们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一切

在不断地在提醒着，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应该抛开这些报纸，不要看见它们，但手就像伸向发痒的伤口般伸过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们，当年是我接受了他们，当时他们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里迈出最初的几步，可现在都成了总领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对我而言这条路却永远关闭了。他们毫无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乐的胜利日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我，没有一个人打过电话。而前不久，所有人争先恐后地请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两个海军的战友带着香槟酒来编辑部看我，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红场，那里到处是狂欢的人们。

特别难受的，是读到从雅尔塔会议发来的报道。似乎就在昨天，会议的参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克里木，进入拉瓦地宫，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话。四年来，我已习惯于一个念头，即在这些场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万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么是翻译？没有他，谈判的参加者就像聋子哑巴。翻译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发现，需要他仅仅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而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个人。人消失了，但专业人员还在，但已经是另一个的躯壳。从前的那个从未有过，并且无关紧要。

理智上我能理解，但无论如何不能释怀。触及伤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断：我根本不仅仅是翻译，并且还是外交部长助理。不过，我虽然勤勤恳恳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个职位上作用有限。我当时过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们不能就

这样简单地抛开我。我记得“领袖”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没有不可替代的人”。许多比我更有才华、国家更需要的人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遭到肉体上的消灭。我还活着，并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内心骄傲的小虫子在继续吞噬。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我感觉到浑身酸痛，冷漠的粘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三十岁的我觉得自己衰老、无助。

我夜间的失眠使家庭生活变得复杂。1947 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无可挽回地走向离婚。此后，有近乎于疯狂的迷恋，有不断的吃醋，和解和爆发。不过这些心灵上的创痛治好了病症，并压制了对“失乐园”的思念。

1953 年 3 月，当斯大林死后，我像千百万苏联人一样，哀悼了他，但已经没有了被无辜开除的情绪。

在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不久，1954 年 4 月初，在我的单身汉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科西列夫，他的声音我已经十年没有听到了，若无其事地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马上来一趟……”

“领袖”死后，不久前还命悬一丝的莫洛托夫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由马林科夫担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贝利亚，同时担任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被委以党中央书记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认为并不重要。

最近几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几座类似克里姆林宫塔楼那样的高层建筑，斯大林非常喜欢。在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其中的一栋

里，搬进了外交部。为我准备的出入证放在大门口值班员处。我一方面激动，另一方面却不理解部长突然约见的原因。我来到七楼，这里是他的秘书处。我想，外交部从铁匠桥搬过来很好，并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宫我所熟悉的办公室接见我。否则的话，我的心里又会酸痛。在这里，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一切都不一样。

当进到秘书处时，科西列夫要我直接进到办公室，部长正在那里等着我。

莫洛托夫还是那样坐在桌子后面，向我点头问好，并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里毫无二致。几乎这期间并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还见过他。他既没有问我的身体情况，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直截了当地说：“明天，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将在维也纳开幕。我们想派您去执行一项任务。据信，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前总理约瑟夫·维特将出席会议。您必须结识他。最好作为报道会议情况的《新时代》记者前去。您将以这个身份向维特作自我介绍，请他就保卫和平运动为题接受采访。但我们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我们正在重新评估国际局势。我们有被隔绝的感觉。所以应当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局面。制订新的欧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维特在1922年的拉巴罗时期，积极看待与苏俄的合作。有关我们如何解决欧洲问题，其中也包括制定对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谈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您的意思。”

“是的。我会尽力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听着莫洛托夫说话，我一边在想：我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某种转折。他当然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外交部的任何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决定了叫我来。也许是因为我还有战前与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最近几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务和外交部机关之外。可他本人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给了我。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事跟出国有关。不过，当时在奥地利驻有苏军，可那里也有美英法的部队。而维也纳在四个占领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奥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个方向，包括西方。在当时，这种出国，尤其考虑到我的情况，是特别受信任的信号。并且现在是多年没见我的莫洛托夫对我表示了信任。这事，以及他事实上使我免遭贝利亚的毒手，让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毫无怜悯之心、以自己坚不可摧的“坚强”而自豪的人所不常见的。他从来不曾软过心肠。但是，我还是在想，改正对我不公的时机到了？可能是由于那些对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不公正而态度软化了？

-----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1)  
-----

“当然，维特不必知道您带着政府的任务。”莫洛托夫解释说，“只需作一个暗示，即莫斯科的重要人物想了解他的意见，将会尊重他的意见。回来之后，向我提交一份详细报告。现在会给您发一个到奥地利的有效证件。明天早晨出发。维也纳的旅馆已经订妥。祝你成功。”

“谢谢对我的信任。”按照我们的老习惯，我对党表示感谢，即便她——这非常少见——仅仅是在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们的体制有时真的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运行！我刚刚从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出来，科西列夫就将贴着我的照片、带国徽图章和出境签证的一本深红色小本交到手上。原来，这些年来，我的档案一直保存在秘书处，这里面有几张照片。同时我领到了机票。

飞机早上七点从伏努克沃机场起飞。我甚至来不及给编辑部说一声。但后来才知道，列昂捷夫从莫洛托夫那儿知道了全部情况。

大使馆事先得到密码电报通知，派人在机场接了我。我住在被苏军司令部没收的“帝国”饭店里，它由经济部队管理，一切都是马马虎虎。在德国占领时期，这曾是一家豪华饭店，现在的样子令人失望。两部电梯中有一部趴了窝，房间隔三差五整理一次，水池和浴缸里是损坏的水龙头长时间滴水的留下的水渍锈。餐厅和咖啡厅关张，甚至没有办法烧水煮茶。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经过不许出国的十年之后，我来到了维也纳，并且肩负政府的重托。

晚上，我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开幕式。会场旁边的休息室

里挤满了与会者，客人和记者。到处散发着新鲜咖啡、昂贵雪茄和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香水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我们尚未见过的“夏奈尔5号”。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有当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在那儿，我见到了罗素、约利奥-居里、伊利亚·爱伦堡，当然还有约瑟夫·维特。我决定不着急，不必过早操办自己的采访，而是先在陌生的环境里搞熟悉了，并且跟尽可能多的与会者建立联系。

我在这里遇见了当时非常风行的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在基辅时我们就认识。战争一开始，他就成了前线记者，但常来莫斯科，因为他的妻子、波兰作家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波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她身材庞大、年纪已经不轻、身穿军便服，骑兵马裤，足登高筒长靴。跟她在一起，科涅楚克显得小巧而年幼。当时，在前线流行着这样一首四句歌谣：

来了一份电报，措辞激烈，  
指挥部里，有人心里颇为紧张。  
来人是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  
她可是——科涅楚克的妻子。

战争快结束时，科涅楚克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斯拉夫国家事务的副委员，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参加部委会。他一般坐在长桌的顶头上，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寡言。莫洛托夫则带着滑头的讥笑说：

“这个科涅楚克坐在这里，观察着，随后会把我们写进戏里去

呢……”

在维也纳，上午和下午举行会议，晚上安排有文艺节目。市政当局的代表邀请我们到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后宫诱逃》，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以及政治性的夜酒会。我记住了那里上演的一个小型剧：舞台中央，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坐着一个演员，服装十分特别——左脚穿着红军的淡绿色军裤，扎在厚军靴里，右脚上则是美军军靴和高尔夫球裤。一边的胸襟、肩章和袖臂是英国式的，另外一半则是法国式的。一个戴阿尔卑斯帽的奥地利人跑进舞台，喊了声什么，演员的一部分身子，譬如说苏联的脚，有所反应，而整个人则身子坐在椅子上，保持不动。然后又跟美国脚、英国胳膊和法国胳膊重复了同样的事情。部分身体各自活动，但身穿四种军服的士兵却原地未动。最后，又一次跑进来的奥地利人绝望地大声喊道：“中国人来了！”这时，坐在椅子上的士兵跳了起来，在笑声和掌声中跑到幕后去了。当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奥地利人急于摆脱四国占领的愿望。

有一次，苏军政委邀请驻会记者到自己的官邸观看攻克柏林的纪录片。在休息期间，安排了有冷冻伏特加和各种冷菜的招待。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侍者送来各种饮料。我仔细看了一眼，竟意外地呆住了。他原来是拉克莫夫——战前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的厨师。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能够相遇，相互拥抱互吻，因为我们已经十三年未见了！我们一起回想起，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6月底，曾经一起被扣押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内，我跟拉克莫夫一起为党卫军

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安排早餐，后者曾经帮助我跟萨沙·克罗特科夫离开使馆与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会面。

约瑟夫·维特立即回应了我为《新时代》杂志作采访的要求。我们在他下榻的“大使”饭店见了面。这里跟“帝国”饭店完全不同，到处是奥地利员工保持的标准环境，到处闪闪发亮，前厅有地毯和植物装饰，电梯旁则是身穿制服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侍应生。他用无声的快速电梯将我送到需要的层次。总体而言，奥地利人在战后几年里已经安排好了生活。在装潢十分漂亮的商店里，商品和食品的丰富使顾客高兴。咖啡屋和街上的人们穿着考究得体，甚至可以说很新潮。到处都是鲜花。汽车当时还很少，但城里到处都是相对便宜、非常时髦的摩托车。年轻小伙子和头发搭在背后随风飘扬的姑娘们成为维也纳一景。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透过维特房间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圣斯捷潘大教堂色彩斑斓的高顶。客气的主人要了咖啡，我们在矮圆桌旁的藤椅上坐定。谈话首先涉及的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维也纳会议。维特就保卫和平和参加这一运动的著名人士的意义谈了很多。与此同时，他对于运动未能取得群众性而表示了遗憾。这也是为何各国领导人能够忽视裁军的呼吁，并继续军备竞赛的原因。新闻界本来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眼下新闻报道更多地歪曲，而不是阐明争取和平运动的目标。维特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复杂的，“冷战”束缚了欧洲，她目前依然未能从第二次大战中恢复元气。这里，我得以十分恰当地提出最主要的问题。

“我想，”维特说，“欧洲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德国问题。现在，有两个德国。而我认为，华盛顿不会接受你们的任何有关邦联或者其他另外的两个德国的联合形式。美国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西部，并不会放弃它。你们现在与波恩的关系非常糟糕。你们的宣传把阿登纳描绘成为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新法西斯分子。这在实质上是错误的，并使事情复杂化。事实上，阿登纳本人在过去曾经是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他远非如此单纯的人物。当然，他是反共的，但同时也是德国独特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友谊成了他的包袱，他想与莫斯科展开对话。但是，贵方也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那么，总理阁下，按照您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联手里有几张重要的牌。首先，这是数十万战俘，这些人的命运令德国人担忧。战死在苏联领土上德军士兵的墓地问题也同样重要。当然，它更多地带有象征性的意义。许多的墓葬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种姿态，在道义上，这对阿登纳十分重要。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第二个德国，在波恩它依然被看作苏联的占领区。这里有家庭团圆，财产争执等一系列问题。我想，你们应该试探与西德建立关系的可能。可以先从战俘归国的问题开始。平行地可以探讨在莫斯科与波恩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一旦在首期接触期间有了进展，阿登纳便会准备访问莫斯科，这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都将是一件大事。”

这些看法我以为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譬如，解决战俘问题的

时机早已成熟。从被俘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最近一段时期，我见过其中的许多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巴甫什诺村，建有各种作坊，掌握各种民用专业的德国战俘，裁缝、木匠、钳工等，在那里干活。各个机关，其中也包括我们编辑部里，发放票证，凭票可以在这些作坊定做许多东西。有的人甚至购买了整套的厨房或者餐厅家具、卫生洁具、木雕等。我定做了两套西装，并且质量非常好。在试衣的过程中，我们跟裁缝用德语聊了一会，后来跟他交上了朋友。

-----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2)

-----

总体上，这些俘虏的生活不错。他们按照各自的专业工作，精神饱满。由单独的房屋组成的小村里，环境良好，有俱乐部，运动场，花坛，细黄沙铺设的道路两边种着小树。与战时在德国苏联战俘的非人条件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但是，在经过如此长期的俘虏生活之后，他们渴望回到家乡，而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维特先生，您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有何看法？”

“首先，你们应该打破孤立和敌意的包围圈。在战后年代，敌人

的形象在西方人深入人心。应该努力用相应的行动来展示并证实，苏联对西欧不构成威胁。首先应该解决所有占领军撤出奥地利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恢复战胜国外长磋商机制。印度支那虽然遥远，但那个地区冲突的解决将促进欧洲局势的正常化。法国人在那里陷进去了，他们想尽可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你们的中国朋友可以有所帮助。最好当然是组织一个有关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借助这样的会谈，各大国主要政治人物之间可以建立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目前许多问题有待于苏联采取主动。”

我得到了一整套的建议。我有东西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但还想跟作为过去重大事件见证人的维特谈一谈。在我面前的正是活的历史！拉巴罗……1922 年春，契切林带着列宁签署的授权前往直意大利与协约国领导人谈判。盟国要求他们尚未正式承认的苏俄政府支付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只有这样才会谈到承认。契切林坚决反对满足这些要求。在谈判者身后隐约可见战败国德国的影子。重要的政治家之间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英国首相洛德 乔治，法国外长巴图，德国总理维特，德国外长拉特瑙。操熟练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契切林也在进行非正式会谈。西方列强企图将苏俄孤立起来。但契切林有所突破。他向被英法虐待的德国提出诱人条件。德国外交部负责东部事务的马里察说服拉特瑙接受苏俄的条件。维特也表示同意。1922 年 4 月 16 日，签署了拉巴罗条约。德国与苏俄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迅速得到恢复。

我问维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的局势的确非常紧张。全部的问题在一夜之间谈妥，黎明之前签署了条约。它具有爆炸性。英国和法国人非常愤怒，要求撤销协议。我们的情况也不轻松。埃伯特总统倾向于跟西方盟国达成协议，因此我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他。但整体而言，这是个好的、正确的条约，它使德国松了一口气。”

“总理阁下，您在我国受到尊重，正是与您本人在签署拉巴罗条约中的作用有关。”

“那么，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们告了别，然后我前往“帝国”饭店，以便将这次谈话详细记录下来。

回到莫斯科的次日，我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与约瑟夫·维特的见面，并将谈话的记录交给了他。

莫洛托夫快速看了一遍之后说：

“我以为，您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有什么打算？是不是想回到部里来？”

我没有信心是否会得到类似的建议。但以防万一还是仔细考虑过一遍。现在，记者的工作完全能够使我满意。这里也比外交部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性和表现主动性的机会。无论给我什么样的职位，在经济意义上编辑部要好得多。更何况在经过多年的被贬之后重拾旧事似乎不太愉快。我谢过他的建议，并说愿意继续作记者。“您自己定吧。”莫洛托夫没有坚持。

我需要在杂志上发表有关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报道和

对维特的采访。但迄今为止，我一直用的是笔名，而去维也纳以及向维持自我介绍则用了真名。所以我不得不请示莫洛托夫怎么办。

“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他果断地说，“再没有必要用笔名了。”

莫洛托夫不再为我担心了。贝利亚已经被枪毙。可是，莫洛托夫熟知我们官僚的习性，认为有必要再保护我一段时间：他将我列入了1954年印度支那问题维也纳会议和1955年夏维也纳高峰会议记者组的名单，以及1955年“冷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七人记者组。

接下来一切便自然而然了。

至于维特的建议，他所谈到的许多东西得到了实施。1954年在柏林举行了两个大国的外长会晤，当年夏天举行了印度支那会议。接着，1955年与奥地利签署条约，占领军撤出其领土。此后，阿登纳访问了莫斯科，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战俘回国.....

-----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3)

-----

蒋介石政府的顾问鲍罗廷亲口向我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秘闻，

以及有关周恩来的个人情况。

由于我采访的名单将周恩来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剧院里会见我。

我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出版。

回到莫斯科，一位惊人美丽的姑娘打破了我对女人的特殊原则。

筹办《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外文版，是从寻找高水平翻译开始的。莫斯科有两个机构里的翻译人才较多：后来改名为《进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部。这家报纸的俄文版仅出几份，为的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监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MoscowNews》——以为它只有英文版。该报的主编是鲍罗廷——我正是找他咨询。

我刚开始对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无所知。鲍罗廷和他的员工们态度友善，随时准备帮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奥妙之处，结果我实际上在《MoscowNews》实习了几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报纸的编辑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维街的同一栋楼里。

我跟鲍罗廷成了好朋友。对我而言，与他交往特别有教益，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得知他就是那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鲍罗廷。当时，他是我们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顾问，在调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他们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

分领土，政府搬到重庆之后，鲍罗廷也到了那里。他的官邸紧挨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处。

鲍罗廷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儒雅的领导者，理性、平和，同时又坚定，顽强。从鲍罗廷那里，我得知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那时中国的两位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蒋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谈判，逮捕了他并打算枪毙他。中共领导明白，国民党的内讧将会弱化抗日斗争，所以，虽然共产党人受国民党之害不少，但认为不能除掉公认的国家领导人。这件微妙的事情交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这边，周恩来与二位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实施自己的意图，为了中国的前途释放这个囚徒。最终，将军们同意了释放蒋介石。

鲍罗廷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事情，培养了我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后，才知道鲍罗廷被捕了。他被宣布为日本特务，后来就失踪了。

多年之后，我因为记者的事务到了中国。除了其他城市，我还去了重庆。那里就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周恩来和鲍罗廷的总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日用物品。这里还有鲍罗廷身穿制服、镶在铁框里的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勇毅，眯缝着眼睛，面带微笑。我记住的他就是这个形象——一

个忠诚的战士，遭到斯大林刽子手毒害的许多人中的一个。

我还去过西安。蒋介石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城里，而是在离城四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华清池、有温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骊山脚下，有一个异国情调的花园，而在池边耸立着明皇的宫殿，住着他的妃子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贵妃亭旁边有一排房子，蒋介石就住在那儿。夜里，将军们决定逮捕他。蒋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开始了对射。听到枪响之后，蒋介石跳出窗户。他企图爬上山崖，却卡在了石缝当中，就在那儿被抓住了。

1957年初，作为《新时代》的记者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之后，我立即请外交部帮我安排采访某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我没有指望会见到毛泽东，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元帅。信发出去之后，我便出发去旅行。参观完重庆之后，突然想起了与鲍罗廷的谈话，非常想见周恩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答复。在出发去满洲里之前，我决定在首都再呆几天，并且在饭店订了两张（我自己和翻译）看京剧的戏票。

剧场与平常一样是爆满的。开演之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检票员从一个巨大的茶壶里给观众沏茶。我们的座位是右边起第五排。但是，我发现自己右手边一个座位空着。灯熄了，剧场里只有舞台脚灯微弱的灯光。这时，一个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我只能看清，这人跟剧场里的观众一样，身穿类似军服一样的中山装，同样的帽

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观众的脸。我斜眼看见，旁边这个人非常像周恩来。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剧场里会惊动起来的。人们会开始鼓掌、呼喊。何况他如何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到剧院来——没有警卫，没有特设的包厢，坐在普通观众之间？但我还是弯腰问身旁的翻译，坐在旁边的是何许人也。他立即答道：“这是周恩来。”

我感到震惊。观众们紧张地关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们一点也没有因年轻的共和国著名而且受人欢迎的领袖、国务院总理的在场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被猴王与怪兽的搏斗，一个名叫杏花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被强盗劫持等情节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演员的噱头，一边想着，中国领导人坐在我身旁该如何解释？我能够与他谈话？幕间休息时他会呆在这里，或者像来时一样消失在暗色中？

大幕放下，灯光亮起了。中国的剧院里一般没有前厅。幕间休息时，观众直接走出剧院。剧场里很快就空了。甚至没有人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我马上想到：没人认出他来！周恩来继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紧张。怎样跟他开口？从何开始？

没等我下定决心，他转过来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说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他当然知道我的一切。因为我事先在饭店订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边，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须有个话题来开始。当时，我已经做了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

了已经半年。我这样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

“你们的总编是谁？”

我回答说，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为总编，而在此之前，从杂志创办之时起，他一直是副总编。

“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经济学家。我很熟悉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东方干部学院听过他的课。请转达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一定。谢谢您。”

“您知不知道，鲍罗廷还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提出来时，仍然浑身一震。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悲惨遭际？我讲述了我们在《MoscowNews》编辑部的多次相见，讲他对重庆工作的回忆，以及他给我谈及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

“是的，当时很困难。如果他们杀了蒋介石，中国又会重新开始内讧。而日本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并且对我们共产党会造成不利的局面.....鲍罗廷到底出了什么事？”

“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许多人一样消失了。”

“可惜，鲍罗廷真的太可惜了。他是个好人，诚实的朋友，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跟他多次遇险。他无畏，性格坚强.....”

斯大林的绞肉机消灭了多少性格坚强的好人啊！我们谈到幕间休息结束为止。但第二幕之后，周恩来还没有走。开始讲述在中国建设新生活如何困难。

“我们这里，”他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过匈牙利事件……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都有过严重的骚乱，参加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当然，我们自行处理了这些事。但是，仅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既在匈牙利，也在波兰，东德和我们中国。在领导与被领导者间的关系中发生了问题，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矛盾——在党与人民之间，在党内……”

-----

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流产的合作(1)

-----

周恩来说，他跟前不久由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周恩来继续说道，“对此十分轻松。‘你们的紫禁城，和我们的克里姆林宫外面都是高墙，’伏罗希洛夫说。可我回答说，这些墙并没有能够保护中国的皇帝。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没有不满意。”

总理问我到过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我说，在东北我想参观大连和旅顺，此后想去南方看一看，云南省，海南岛。另外还想到中国原子能基地的兰州去看一看。但我发现，这些地方不大愿意放

外国人进去。

“我会过问您的行程。我认为，您的要求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

的确，他信守了诺言。在此后的行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后，灯亮了，但观众无人动身。

周恩来站起来，握着我的手，祝愿在中国旅途愉快，此后便走出了剧场。只是现在，观众似乎明白过来了，开始离开剧场。他们都知道，并且看见了，我们在两个幕间休息时在谈话，但是没有人作任何表示，没有任何动作，任何声音妨碍我们的谈话。

后来有人对我解释说，周恩来经常去看戏，坐在池座的观众中间，所以北京人都习惯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规矩，所以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打算到剧院去，那么票子事前会发给可靠的人。他们乘车到专门的入口，乘专用电梯上去。而他们所在的包厢装饰得严严实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剧场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包厢旁边的小厅里，预备有各种吃食、甜点和饮料等。与哪怕是经过挑选的观众，从未有过任何交流。穿制服和便服的安全官员到处走来走去。周恩来身旁没有看见警卫，这使我感到不安。安全机构的人肯定在附近。但他们的举止使人绝对看不出来。

次日，外交部新闻司通知我，朱德元帅将接受采访。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必须保密的。

好奇心始终困扰着我，为何他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当地的几

个中国通的解释是，由于我的单子里总理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因此他要用独特的中国礼节来弥补自己不能接受采访。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我想，是否周恩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鲍罗廷的敬意？

在中国呆了将近半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跟总编列昂捷夫讲妥，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在打字机上敲出旅行札记。

有一次，出得办公室，给热水瓶灌开水时，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

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

-----  
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流产的合作(2)  
-----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

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 1956 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

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

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

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

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

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

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

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麼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共产主义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

-----

米高扬谈李维诺夫之死(1)

-----

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内森·洛克菲勒当着我的面按了一个按钮，世界上最早的电视雏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为了跟英美军事代表团的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将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义请我转告莫斯科美国将从越南撤军的步骤与要求.....

1944 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便结识了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顿—伊科斯庄园里，苏联、美国、英国三大国举行了反法西斯联盟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国际安全组织，也就是未来的联合国的宪章。

我当时担任由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我们与英美代表团的秘书——安吉尔·希斯和格莱德文·杰布密切合作。由于在会议上，大量的问题中间涉及到拉美国家，其中包括阿根廷参加未来组织的问题，担任罗斯福总统中南美问题助理的内森·洛克菲勒出席了数次会议。

会议的日程十分紧张。但是，每逢星期天，主人总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游览和娱乐节目。有一次，在会议闭幕前夕的一个星期六，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梯纽斯宣布，这个周末洛克菲勒家族邀请与会者参观纽约。

“晚上六点，”斯特梯纽斯说，“我在机场等你们.....”

我们升空时，太阳还没有落山。飞行高度很低，所以下面可以看清楚从巴尔的摩绵延到纽约的庞大工业区：这里曾经铸造了战胜共同敌人的武器。一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拉加地亚机场。我们被安排入住“沃尔道夫·阿斯托丽亚”，这是当时纽约最豪华的饭店。

刚刚在客房安顿好，斯特梯纽斯邀请我们到这家一个名为“星际之巅”的大餐厅吃晚饭。大厅的里面乐队在演奏，女歌手热烈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

晚宴非常考究，但夜间的节目并未结束。

夜里11点，斯特梯纽斯又出现在饭店，邀请我们到一家名为“钻石马掌”的俱乐部去。厅堂面积不大，用金色红金丝绒装饰，宽阔的舞台上五光十色、穿插着十分轻佻的表演。显然，我们的主人是这里的常客。起码，门僮，领班，侍者等人都非常熟悉他。我们在俱乐部坐到了深夜。

第二天是游览市容：帝国大厦，华尔街，纽约交易所，博物馆等等。晚上，我们出发到第五大道，参观庞大的摩天大楼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成了已经十分熟悉的内森的客人。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除了我们几个代表团之外，还有一批美国的贵宾。

主人迟到了。这时，经理请我们到各色饮料齐全的酒吧。气氛无拘无束，只有身穿带金银边饰的侍者保持着正式气氛。突然，经理拍了几下手掌，高声唱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内森·洛克菲

勒.....”

内森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大厅，看起来与众不同：淡棕黄色头发，晒黑的脸上线条分明，有点像北美印地安人的长相。他向众人鞠躬，与各个代表团团长握手，并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而后走到斯特梯纽斯旁，开始跟他说话。

内森·洛克菲勒的穿着非常随便：上身的深棕色西装穿在他身上大得像口袋，西裤的膝盖处皱巴巴，大概好久没有用过熨斗了。可是他本人一点儿也没有不好意思。他无拘无束，然而在场的许多美国人对他表示了关注。

我走近内森，感谢他邀请我们参观纽约，并请他讲一讲洛克菲勒中心。他建议我们登上摩天大楼的顶部，以便得到这个独特建筑物规模的有关概念。原来，内森本人直接参与了他的建设。

“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当我们走向电梯时，内森说，“三十年代初开始建造 70 层的摩天大楼，当时我刚满 24 岁。不过，我已经有一些大型建筑的经验，但这里有自己的复杂性：大楼在交通繁忙的市中心建造。我们家族买到了曼哈顿的这片土地，但不能越出它的范围。建筑工地周围街道通行车辆的部分，包括人行道，必须由行人和车辆自由通行。必需的材料和金属件夜间运进去。最终，建设按期完成，并且在第一个演季无线电城音乐厅接待了观众。”

走出电梯，我们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内森打开了一扇金属门，在我前面沿着陡峭的金属楼梯走上了摩天大楼的顶部。我走到

边上，停在栏杆旁。从这里展开了一幅梦幻般的景观。底下是巨大的、闪烁着七色彩虹的灯火。空气是透明的，因此可以看见在街道狭窄的缝隙间汽车的红黄色灯光在运动。左边，在透明的月光下，是像针一样尖尖的“克莱斯勒”大厦，前方在深蓝色的天空下升起的是庞然大物帝国大厦。在往前，在哈德逊和伊斯特河两条银带之间，是弯弯曲曲灯火辉煌的百老汇，在它的尽头可以看见华尔街上老摩天大楼的侧影，在大西洋上闪闪发光的月色道路的背景下，层层错错地竖着。

在顶层散了一会步之后，走了下来。在电梯里，我终于向内森问了那个使我十分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向他这样富有的人，穿着如此随便？

“是这样的，”洛克菲勒回答说，“没有一百万的人，当然必须认真注意自己的外表，而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则可以允许自己有某些怪异……”

当我们回到大厅时，经理立即走到洛克菲勒跟前并问道，是否可以开始参观中心。他点头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无线电城”。首先给我们看了录音师、灯光师和电影放映机的场地，然后带我们到了后台，这里，美女“罗赛特”演唱组正在进行下一场演出的排练，她们一个个浓妆艳抹，但在近处看起来远不像从观众席上那样好看。斯特梯纽斯与洛克菲勒一起尽地主之谊，向我们介绍了芭蕾舞群舞的负责人，原来他来自敖德萨，俄语流利。

看过舞台设备之后，我们又去看了无线电台，这里没有任何特

色。然而，旁边的房间却使我发生了兴趣。内森解释说，这是试验电视台。我们跟着他走过隔墙。那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带暗淡玻璃屏幕的方盒子。内森按了一个按钮，这个窗户开始发出淡蓝色的光亮。过了几秒钟，在这个神秘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人影，轮廓迅速清晰起来。这原来是斯特梯纽斯，以及与他谈话的英国代表团团长亚历山大·卡道冈。往隔墙上面一看，我在相连的房间看见了他们，并且他们所有的动作都重现在屏幕上。此前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电视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它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的普通用品了。

从此往后，每次我来到美国时，经常与内森·洛克菲勒见面。

在纽约州州长任上时，内森常常请我到他的官邸。战后过了许多年，有一次，在一个明媚的夏日，饭后我跟他坐在他位于奥巴尼家中的阳台上，一起喝着卡布其诺酒，回忆过去的事情。我给他讲述了与我们在杜巴顿—伊科斯代表团有关的趣闻。当时，为了跟美国代表团的高级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将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罗基奥诺夫从“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这个故事，作为“各族人民领袖”古怪行为之一的见证逗乐了内森。

时间飞逝而去。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坏时好，但是我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会面，有时可以相隔几年，一直是稳定和得体的。

水门丑闻的结果，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下台。福特入主白宫，而内森·洛克菲勒则成了美国副总统。其时，我已经在苏联科学院美

国加拿大研究所主办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当了五年的主编。1974 年秋到达华盛顿之后，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是否跟从前一样给内森打电话，或者不必惊动美国副总统。我征求了多布雷宁大使的意见。他说我应该自行决定该怎么办，但表示相信，副总统找不出时间来见我。

最后我还是打了电话，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得知，内森·洛克菲勒当天下午三点在白宫旁边的独立宫见了我。

-----

米高扬谈李维诺夫之死(2)

-----

就像以前多次一样，见面是无拘无束的。只是在一开始，有了一个正式的“照相程序”（这张跟美国副总统的照片稍后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给我）。此后，身穿海军陆战队礼服的侍者送上了茶点和一小杯烈性甜酒。

谈话像往常一样，从各自的身体状况开始，然后交换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新闻。难以避免地谈到了越战，那里美国人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失败。

“我应该告诉您的，”内森强调指出，“我们坚决打算撤出越南。

但北越军队向西贡施加的压力，造成了我们撤退的困难。我们打算就此事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我们也在极力争取避免采取强大回击的必要性，这样只会拖延战事。但是，由于早就认识您，”洛克菲勒强调说，“我想以私人的方式向莫斯科转告一个意愿，请转告你们河内的朋友们，让我们安排有秩序地撤出大使馆，以及我们的越南朋友，这样使我们能够适当地结束越南这段历史。”

我拿出“外交官”的分寸，对内森说，非常理解他的意思，但是，由于跟政府没有直接的联系，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们接着聊了一会，然后便告辞了.....

当然，就在当天，我的备忘录被用密电发往莫斯科。只是到现在仍不知道，洛克菲勒的呼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我们的越南朋友是否考虑了他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美国人最终离开了西贡，越战结束了。

一段时间之后，我接到了老朋友内森·洛克菲勒不幸早逝这个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

-----

故宅瓦砾场(1)

-----

“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用放大镜在地图上，找出了我可以去一所大学讲学的路径。

回绝了阿富汗司法部长的任命，熟悉阿明的阿裔美国法学教授告诉我，阿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背景，他在阿推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苏联像美国当年陷入“越战泥潭”一样陷入阿战。

对驻美的苏联外交官而言，“冷战”期间在美国的旅行并非小事一桩，当然，对驻苏的美国外交官也一样。许多城市和地区是“不开放的”，甚至到“开放”城市的旅行也需要国务院的特许。有时，城市也许是“开放的”，但附近的机场和公路却是“不开放的”。

我就曾经遇到这一次这种情况，当时我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一秘，1979 年夏天应邀到明尼阿波里斯大学讲学。在收到我的申请之后，国务院认为，虽然明尼阿波里斯对苏联外交官开放，但周围的道路和机场却是不开放的。但是，邀请单位并不打算取消我的这次讲学，自行坚持要求国务院找出可以使我成行的办法。此后，专程到华盛顿处理此事的大学代表告诉我，他们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将地图摊开在桌上，借助放大镜，终于发现明尼阿波里斯市周围的红线并未合拢，而在缺口处正好有一条铁路线穿过。这也许是监督人员的疏忽，没能将红圈画圆，但这却使我有可能乘火车抵达明尼阿波里斯。实际上，在这条荒废的支线上旅客列车在离城最近的车站每天仅通过一次，并且在凌晨四点。

我不得不先飞到开放的罗彻斯特市机场，然后乘汽车到荒无人烟的小站“红翼”，等待这趟火车。

我的讲课很成功，课后，我应邀与该校教授们一起共进晚餐。席间我的邻座是一位中年东方人。我们攀谈了起来。我的邻座告诉我，他是阿富汗人，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该校教授法学。当天早晨已经知道，塔拉基在喀布尔被杀，阿明成为阿富汗新总统。自然地，我与邻座的话题——他名叫阿赫麦德——转到了这些事件。

“我很熟悉阿明，”我的邻座说，“他也在美国上过学，曾是阿富汗留美学生组织的主席。我们大家都清楚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新交在革命和塔拉基掌权之后没有回到阿富汗。

“曾经给过我司法部长的职位。但是，在了解到新政权上层的争斗之后，我回绝了，并决定暂时留在美国。”

“我喜欢塔拉基。他似乎是个著名学者，可惜他死了。现在会怎样呢？”

“我毫不怀疑是阿明组织了这起谋杀。”阿赫麦德说，“我还可以预测，现在会发生什么。他会将你们拖入阿富汗的战争。”

“我们如何以及为何要这样作呢？”

“您有没有想过，阿明从中央情报局领受了这样的任务？接下来，阿明马上会将自己打扮成莫斯科的忠诚朋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他会在国内开始加速社会改造，而这个国家依然生活在古老的教规和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之下。建立“集体农

庄”，没收大多数阿富汗人看作自己善主的地主领地，限制宗教自由，甚至试图过早地改变阿富汗妇女的地位——这一切就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也许，阿明的“改革”将会引起这个国家非常脆弱的行政机构内部分裂。将会开始逮捕那些阿明认为在“消极怠工”的人。同时，阿明会请求莫斯科派遣顾问进行援助。来自“不信神国家”的人将会进一步增强反对阿明制度的力量。届时喀布尔会向你们发出新的呼吁：派遣军事专家，此后是派军队。而克里姆林宫内部则未必会想起英国人“征服”阿富汗的厄运，和阿富汗人民抵抗域外奴役者的力度。你们的军队会很快进入，而你们也会在阿富汗得到自己长期和血腥的越南。可以设想，白宫内部将会如何高兴？对付“罪恶帝国”的说辞将会获得无限可能……”

对这个趣味盎然的阿富汗分析我以外交官的沉着回答说，虽然阿赫麦德的分析听上去有先见之明，但这些未必会兑现。

但是，回到华盛顿之后，我把此次与阿赫麦德的谈话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多布雷宁大使。他的反应相当特别：

“你怎么能够让我把这种东西传到莫斯科去？昨天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阿明，拥抱了他并且许诺在阿富汗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会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这样，我拟好的密电始终没有发出。可是即便克里姆林宫收到了，事情的进程会改变吗？就凭我国当时老朽昏庸的领导，1979年12月开始在阿富汗血腥的冒险未必会被制止……

1983年，当我结束自己的外任回到莫斯科时，向当时的美国加

拿大研究所负责人阿尔巴托夫也讲述了此事，他嘱我就此为安德罗波夫写一份详细报告，其时后者在勃列日涅夫死后已经成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不久，阿尔巴托夫告诉我，安德罗波夫认为这个信息有意义，并对它未能及时上报表示了遗憾。

然而，我再次自问，它会改变什么吗？毕竟安德罗波夫当时说话算不了数。

-----

故宅瓦砾场(2)

-----

作为苏联驻美国的外交官，我刚上中学的儿子却给里根总统写信，要求政治避难！

时值“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各大小媒体的歇斯底里毫无限度.....

为了我的儿子不被秘密送回苏联，里根总统亲自下令关闭美国的出境通道！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我的家庭跌入了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的漩涡。

狂徒的子弹撕裂了我儿子的生命，仅留下了一岁半的孙子，这是苏联解体之后。

此外，我还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是叶利钦总统的翻译。

“人的一生，绝不是坦途”，这是俄国民间智慧。每个人都会有沉浮苦乐。一个人的生活之路越长，便会愈加相信，每个顺利的时期之后命运一定会带来新的考验。

我差不多活过了这多事和血腥的世纪。在这期间经过多少事件！但人的天性，却在回顾往事时，首先想起来的，是风和日丽，虽然有不少的风暴急雨，乌云密布。正如许多国人一样，我本人曾经不只一次坠入深谷，而后似乎又一次开始新生活。所以，似乎可以原谅和忘却许多事，拿出勇气获得平衡。但是，有些伤口却在不断滴血，因为我们终究无法复活死者。

当我在华盛顿的“亚当姆斯”饭店奇迹般躲过了打劫者的子弹之后，似乎这是幸运再次垂青我的家庭。我继续自己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工作，代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这使我有许多机会与美国学术界建立广泛联系。美国各地的同行经常邀请我讲座或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与妻子瓦列莉娅，或者她自己喜欢自称列拉，我们到过许多州，建立了友谊，并且尽管有各种过度渲染的“冷战”因素，到处遇到了好感和热情款待。我们争取不漏过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和纽约林肯中心的每一个新剧目的演出，看了许多的新电影——当时有过不少的好影片。

我与列拉唯一的儿子，出生于1967年的安德列，在使馆的中学上学，课余时间与邻居的美国伙伴呆在一起。我们的房子不在用高墙与外界隔绝的使馆内，而是在首都绿茵茵的郊外切维·切斯，在一

幢美国人的大楼里。与当地伙伴的交往帮助安德烈很快掌握了语言。但这种交往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其中，我们对他热衷摇滚乐表示担忧，虽然他与同龄的孩子没有两样。在新年之前我们送给了他一把吉他，不久他已经弹得有模有样了。

在我们家住的楼旁边有一个公园，每逢星期天那里会爱好者举办的音乐会。安德烈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苏汉，黑发，25岁左右的东方年轻人。安德烈其时已经满16岁，因此列拉非常惊讶，这二人之间何以有共同之处。安德烈解释自己与苏汉的交往说，他们都喜欢摇滚乐，并都喜欢当时青年人的偶像麦克·贾柯尔。

记得，有一次，这是在1983年的8月初。我像往常一样12点左右开车回家吃午饭。将汽车泊在地下的停车场，乘着列拉准备午饭的时候，我打算上到楼顶游泳池。穿浴袍时，听见隔壁房间里安德烈的声音：

“爸爸，给我车钥匙，我想去拿放在车厢里的磁带……”

“钥匙在门厅的小桌上，赶快上来，一起游游泳……”

从这幢20层高的大楼上，可以看到城里的美妙风景，以及地平线那边的绿色山丘。游泳池边放着藤椅和躺椅，地面铺着花花绿绿的橡胶毯。在阳光下呆了一会，然后游了一会，没有等到安德烈便下楼回房了。

“为什么安德烈没有来呢？”我问列拉。

“难道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吗？他没有上这儿来。去车库看看，他可能在听那个麦克·贾柯尔。” 在车库里，我在泊车位置没有看到

汽车。也许，安德烈刚刚学会开车，他想玩会车，然后停在另一层？走遍了四层的车库之后，还是没有找到他。

安德烈在哪儿？他会不会出事？车库的大门自动开关，汽车进来时的缝隙足以使坏人潜入。发现男孩之后，他可能将其捆起来，推入后货箱，然后驶出车库。这种事情曾经有过，但我不愿往坏处想。我走出门外，绕楼一周，又走了几个街区，但是安德烈和汽车都无影无踪。

回到家里，我问了列拉，安德烈有没有回来。她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会去哪儿，那辆庞大的“奥尔斯摩比”又会到哪儿去？它可是用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资金购买的。不过，汽车有保险，如果它被盗，钱还可以收回来。

最重要的，是安德烈怎么啦？

我们一口饭都没有动，作了各种猜测。我们翻看了安德烈的记事本，偶尔找到了苏汉的电话号码。也许，他知道些什么？我拨通电话之后，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我是苏汉。”

“非常抱歉打扰你。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最近见过他吗？”

“是的，我见过他。”

“问题是，他现在不知去哪儿了。我的车也不见了。他会出什么事吗？”

“我今天见过他。他好像打算去纽约……”

这真是胡说八道！我们一家三口前不久去过纽约，所以我没有

计划再次去那。把这个情况讲给了苏汉。

“这可能是安德列的幻想。非常遗憾，我帮不了你们。”

如果安德列坚持自己可以开车到纽约，又该怎么办？我听说，麦克·贾柯尔将在那里举办音乐会。可是，安德列没有驾照，他勉强能够开动汽车，根本弄不清楚复杂的路线。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的道路大多是收费的，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在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先不打电话到使馆引起恐慌，而是先找当地警局。十多分钟之后，来了一位交警。我解释了情况，并告诉他，尽管这不大可能，但安德列现在可能正在通往纽约的某条路上。

“他多大了？”警察问道。

“十六岁……”

“噢，这个年纪的人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他们脑子里有时会有些怪念头。不要担心，我们会很快找到他的。您的车很容易发现，您是外交牌照。有特别巡逻队观察这类车子。您还来不及回头，我就会把您的小逃兵送回来……”

他满有把握，这使我们打起了精神。真的，像我那样的车子不难找到，何况驾车的是个男孩子。但是，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而交警并没有打电话来。又等了一个小时，我又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我们正在办理您的事情，”他回答说，“不要着急，会通知您的……”

列拉已经彻底失神了。不得不通知我们的领事。那边当然会惊慌：苏联孩子失踪了！领事说，马上到我们这儿来。要我们不出家门。又过了一个小时。显然，大使馆的领导们讨论了别列什科夫家里的“意外事件”。

领事最终还是来了。

“安德列回来了吗？”他在门口精神抖擞地问道。

知道了安德列还没有回家后，他开始安慰我们，列举了各种类似的、顺利解决的事例。列拉讲述了安德列与苏汉有些怪异的交往，以及后者推断，安德列可能驾车去纽约。

“让我跟这个苏汉谈一谈。”领事说。

我拨通了熟悉的号码。一个女人声音答了话。“我能否跟苏汉说几句话？”

“苏汉已经也不在这儿住了，他出国了。”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这很奇怪。”领事说，“如果苏汉真的跟安德列的失踪有关，那么就大事不妙了……”

这一点不用他说我们也明白。为什么警察到现在不能查清楚安德列的所在？为什么外交牌照的汽车没有被发现？要不这苏汉是个强盗，劫持了安德列做人质，将他连人带车藏在了什么地方？或者，是些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大使馆的工作日结束了。领事跟我们一起又呆了一会，告别时，要我们如果得到什么消息，立即给他打电话。

剩下我们两人，完全不知究竟如何是好。我尽量安抚列拉，虽

然我也明白，我们倒霉了。我们的打算全都被打乱了。

-----  
故宅瓦砾场(3)  
-----

我在美工作的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安德列也将从使馆的八年制中学毕业，应该在莫斯科升入九年级。由于美加研究所还没有物色到接替我的人，我们已经定下来，八月底列拉和安德列回莫斯科，我留下来在华盛顿等待接任者。我已经替他们订了机票。可现在这一切都悬在了空中。我们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大约夜里两点，电话铃响了。

“我在这儿，在大堂里。你们下来吧，”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这是安德列，”我急忙告诉列拉。“教训他一顿.....”

安德列站在大堂里，有些失神，并且我觉得眼睛有些浮肿。

“汽车在门口.....我开不进车库来。”

我们出来走到“奥尔斯摩比”跟前。似乎一切正常，只是速度表上显示，在最近12个小时里，汽车跑了几百英里。看见他可怜的样子，我什么也没有问安德列，泊好汽车，上楼回到家里。列拉，她

忘记了要“教训”，扑上去亲吻拥抱儿子。可他站着，不做声，无动于衷。我最后问他：

“是不是说说，你到底怎么啦？”

“最好明天再说。给我水。”

他一口气喝了两大杯水，用手背擦干了嘴唇，很勉强地说出来一句话：

“我困死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衣服都没有脱，一下子就睡着了。

那一夜，我们当然是一眼未合。我给领事打了电话。他也没有睡。他的一句话使我感到刺痛：“我们希望，这事就这样结束……”

早晨，无论我如何查问，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要么故意不回答，要么坚持说，什么也不记得了。列拉和我本来应该去上班了，可是能不能把安德列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得不带上他。将儿子送到使馆的小餐厅后，我上到二楼，向奥列格·索科洛夫通报情况，大使多布雷宁在莫斯科期间，他是临时代办。

奥列格也对于此事是否会这样过去，表示了疑虑。实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个失踪的苏汉的结识，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车，还有安德列怪异的举止……

我们决定，为以防万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苏航有班机飞往莫斯科。我们跟奥列格关系相当好，我觉得，他在诚心诚意地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

电话响了，奥列格拿起了听筒，但是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在变。他用感叹词作答，挂上电话之后，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纽约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的莱斯里·盖博。他刚刚拿到了安德列写给里根总统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请求在美国避难。这封信将在报纸的晚间版上刊登出来……”

我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但这种打击实在是出乎预料。那时，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里根把我国斥为“罪恶帝国”。并且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即便他还是个孩子，向美国总统请求政治避难！这对于那些“冷战”斗士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安德列跟我什么都没有说？

也可能，这只不过是挑拨离间？不过，骚扰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突然之间，我的儿子成了一桩丑闻的对象，况且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将是毫无限度的……

奥列格打断了我苦痛的思绪：

“我想，最好你们全家马上搬到大使馆生活区来。记者和穿便服的家伙们很快会到你在切维切斯的家里去的……”

我的脑子一下子还不能消化我们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后果。就向在云雾中一样，我下到小餐厅，安德列正在那里安静地喝着可口可乐。很难不跟他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必须平静，这样才能弄清所有情况。首先得去新闻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儿的《苏联生活》杂志社工作。然后赶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赶到使馆去。

我和安德列走到车旁。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你真的给里根写信啦？说实话。”

“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国。我不喜欢在莫斯科的生活。这里好玩多了。”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啦？”

“开车去纽约，想去找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拿了妈妈放在床垫底下的钱缴路桥费。实际上，全程都有巡逻车跟着我。警察冲着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没有拦我。”

“你看他们是否知道你的打算？”

“也许。但是，在纽约他们不见了，而我迷了路，吓坏了，后来决定回家。”

“你要这些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中学毕业，上大学，受教育。然后再来这里工作的。”

“可是谁会放我来这儿？这会是惟一的机会。”

“你在这儿没有专业，没有受过教育，谁会用得着你？他们自己的失业者也够多的了！”

“我想试一试。要么成功，要么死了。这比在家里混日子强多了。你运气好，你可以到这儿来。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的。”

“可是你想没有想过妈妈和我？”

“想过，所以才回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也是这个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剧，“冷战”冲突的产物。由于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进行竞争，我们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老一代的人，经受过艰

难的岁月，可以继续忍受，坚持英国人的说法：“不管对与错，这是我自己的国家”。但是，甚至我们这些人，也喜欢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里，伤心于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辈。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组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公开地谈论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能容忍这些颠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处国外时。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却难得多。从学校给他们灌输的，是应该讲真话。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套。

安德列对于假话和虚伪那一套的反感特别强烈。

有一次，大使馆中学的八年级学生要画一幅画，反映苏联维护和平的斗争，安德列画了苏联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国生活的作业，则用了这样一幅画：饭桌上是一张《真理报》，报上是一瓶伏特加。

学校的校长，此人每逢革命节日都要写诗颂扬祖国，顺便也颂扬一番多布雷宁大使，对安德列的画大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释。我试图让孩子明白事理，可劳而无功。

“爸爸，”儿子回答说，“可这是真的呀。在学校教我们要做诚实的人……”

接上列拉之后，我们迅速收拾了必须的物品便很快来到使馆区，这里临时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正如莱斯里·盖博所警示的，安德列亲笔写的信件当晚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第二条早晨

则上了《华盛顿邮报》以及美国的其他报纸。不知为什么，签名不是“别列什科夫”，而是“别尔什科夫”。我拿报纸给安德列：“仔细看，这是你写的吗？”

这次他没有抵赖。

“那为什么姓氏写错了？”

“我发慌了，弄错了……”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我对他说，我明白，一旦对他动粗，他就不再会开口。

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但是，事先我必须说服安德列放弃留在美国的企图，并且要他坚决答应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这之后，我才能向使馆领导提出行动计划。我提出了各种方案，安德列不说话，只是仔细听着。

“记着，”我警告说，“我们可以体面地解决这事，只有跟你谈妥所有的细节，并且只有你信守诺言，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同意。”

“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们再谈。那现在去睡觉吧。”

我们及时离开了位于切维·切斯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新闻”社的代表告诉我，在底层的大堂里和走廊里挤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等着我们出来。如果我们在那儿的话，我不得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不知道如何从这种局面下脱身。如果美国政府拒绝安德列出境，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清楚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什么？我们自己走，留下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经验

的孩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或者跟他一起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出国不归者”？这可是 1983 年，早在“改革”开始之前。的确，勃烈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国内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旧的教条基本上仍然有效。何况在当时，无论我，还是列拉从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准备走这一步。此外，我与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还在莫斯科。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在外交部工作。他会出什么事？我们在莫斯科有许多朋友。我的书用苏联各族的语言，并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版，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读者。不，我们当时不能留在美国。如果安德列在美国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会两个人回到莫斯科。现在，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可当时，向许多苏联人一样，我们曾是理论的囚徒。

\*\*\*\*\*

#### \*第四章 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

\*\*\*\*\*

1941 年 9 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当时，苏联的局面非常危急，纳粹军队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正在逼近莫斯科。而苏军被迫节节撤退。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局势，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  
贝利亚的报告(1)  
-----

整个晚上，电视新闻节目里，有关“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写信给里根总统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以及政府打算满足申请的新闻作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时，加上一段背景画，上面是镰刀和锤子在追逐一个跑着的男孩。

这起事件中的许多环节显然十分古怪。信是在他失踪前一天发出的。白宫和《纽约时报》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邮件。安德列的两封信如何能够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里分别到达收信人，被人拆阅，报告给里根总统，并准备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是什么人专门将这两封信送给收信人的？什么人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丑化安德列的父亲？可是，我在苏联大使馆里的位置并不高。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我曾经在美国走过许多地方，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讲课，阐述苏联就这些或者那些国际问题的立场。从我的书里许多人了解到，四十年代我曾经作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助理，斯大林的私人翻译。而这个苏联外交官的儿子爱上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愿回家。如何可以相信苏联的宣传家，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第二天早晨，我跟安德列进行认真的谈话。使馆的领导，特别是克格勃的驻馆负责人坚持认为，安德列要否认信的真实性。我费了很

大的劲，才说服了儿子，必须这样作。他同意跟我们回到莫斯科。出发到使馆之前，我问他：

“我能不能确信，你不会糊弄我？”

“是的，爸爸，我答应了，会守信的。”

这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是援引安德列八年之后写给《华盛顿邮报杂志》（1991年10月27日）的关于1983年8月时间的片断。夜里开车到达纽约之后，他迷了路，非常害怕，并决定回家。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在干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不认识一个人。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在这儿找到工作吗？我住在哪儿？我一直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自己从未一个人呆过。我的父母——我如此爱他们！我们的争吵是那么傻。在我的心里，我最爱我的父母。只是现在，当我一个人呆着时，我才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没有他们我不能生活。为什么我没有先考虑他们？他们会出什么事？他们会在蒙羞之后回到俄国？大家都会斥责他们。并且没有我他们会怎么生活？他们也爱我。我的父亲工作太多。他在努力使我的生活容易些。他在尽力帮助自己的国家。他的讲座在美国——是苏联宣传的黑暗中一束亮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会毁坏他的一切。我的妈妈——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不管她怎样骂我，不管我跟他怎样争吵——她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事先没有想到这些……我必须回去。”

这个片断我作为一项证据来列举，即在我的说服之前安德列在内心深处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他自己已经决定了要跟我们一起回

到莫斯科。

在使馆高级领导会议上，我们详细地研究了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建议立即在使馆生活区举行有安德列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声明，打算跟父母一起回家。这会立即缓和气氛。此后，安德列和列拉飞往莫斯科，我留下来等待替代者。最主要的——是在媒体上的宣传活动开始之前尽快解决此事。

但我的同事没有支持我。可是如果安德列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想留在美国，那该怎么办？我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不必担心这一点。他们决定为自己留后手，向莫斯科请示。

不巧的是，多布雷宁大使刚好不在。我想，他会当场决定此事的。而向莫斯科请示，等于把我们家的问题转移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当时被吸进“冷战”漩涡的国家关系领域。

结果，安德列立即离境可以结束这起事件的时机被错过。莫斯科的答复拖延了几天，其时，针对安德烈的宣传活动却已经全面展开。

在使馆生活区上头昼夜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用探照灯将整个地方照亮。大门口挤着记者和大批的群众。正对这大门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横幅“给安德列自由”。通过扩音器喊的也是这个要求。“安德列事件”成了每日电视新闻的头条。美国总统助理埃德文·米斯宣布，根据里根总统的命令关闭美国的边境——这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措施。每天晚上，所有的电视频道播放着八面威风的律师们的辩论——如果美国允许将安德列带回苏联，等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惩

罚。刚刚从莫斯科移民到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萨摩斯，手持苏联刑法典，言之凿凿地说，不光是安德列，而是别列什科夫一家都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所有这些，安德列每天都看见听见。我不得不一次有一次地问他，在回家的决定上有没有动摇。但是他表现很坚强，说：“不管怎么样，我会信守诺言。”

我安慰他，让他相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自己明白，各种麻烦没有完全排除。应该说，美国的恐吓宣传活动对使馆的一些员工见了效。有人建议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改名换姓，搬到外地的小城，尽量不要抛头露面……

过了几天，国务院“受总统委托”正式通知大使馆，称美国移民当局坚持要求将安德列移交给他们以便核实他的意愿。大使馆代表关于安德列想跟父母回家的声明，没有起作用。当局坚决要求交出他来。

最终，莫斯科同意了举行记者招待会。此后，与国务院达成协议，一旦安德列确认自己回到祖国的意愿，我们一家可以立即离开美国。

就这样，在使馆的俱乐部里挤满了记者。其中有我的朋友莱斯里·盖博。也有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使馆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主持记者招待会。安德列表现很好，回答问题十分简洁，重复了好几次要跟父母一起回莫斯科。

记者招待会之后，由奥列格·索科罗夫和克格勃驻馆负责人、以

及美国国务卿的两名助理陪同、在警察摩托车队护送下，我们前往达拉斯国际机场。全程都为我们开了绿灯。刺耳的警笛声时不时响起来。

机场大楼的所有阳台上，挤满了文字、摄影、摄像记者。他们显然在期待着某种轰动性的东西。海湾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机在跑道上已经等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未能马上登机。

大使馆的同事们跟我们告别之后，国务卿助理理查德·贝特将我们跟安德列带入一间装饰非常漂亮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三个阴沉的陌生人坐在那里。我们被邀请坐在桌子前，他们的对面。其中一个人提问。另外两个人在作记录。可能他们是心理专家？显然，委派他们来，是要检查一下，安德列是否处于某些药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觉决定离开美国。可能，当局以为，如此隆重的、几乎是“总统式”的送行会冲昏安德列的头脑，他会在最后一刻又想留在美国。但是，这里安德列表现得十分坚定，很快我们被送上了飞机。

我们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领事的机票被登记在头等舱。我担心，其他的旅客会因为航班耽误时间太久而对我们持敌意态度。可是当我们一千人进入机舱时，却响起了友好的掌声。乘客当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当然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和好感：毕竟我们是胜利者，争取到回到家庭的怀抱。“波音”机长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实质的：一瓶香槟酒和一罐黑鱼子酱。飞机刚刚升空，我们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原来，飞机

上的记者多过一打。对于我们免打扰的请求根本无人理睬。他们用各种问题来烦安德列，照相机的闪光灯使人目眩。最后，可怜我们的机长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风一样把我们隔起来。

在巴黎，我们立即转乘苏航直飞莫斯科的班机。但是，在布尔热国际机场上，上这架飞机并非易事。那里也有一大批记者在等着我们。他们试图把我跟安德列分开，所以我们一下子远离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没有人扶她站起来。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图在最后一刻把他跟家人分开。四面八方都是标语：“安德列，你还在自由世界。请选择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亚。”没有人为父母考虑。

-----

贝利亚的报告(2)

-----

终于到达半空的飞机上，安德列躺在三个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

在舍列梅杰沃，这里同样也有外国记者，我的儿子谢尔盖和我的朋友们来接机。他们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伏龙芝沿岸街的家里。在西方，围绕着我们一家又热了一阵，后来媒体的注意力全都

集中在失事的南韩航空公司 007 航班上去了。

虽然当时苏联的局势在逐步改善，我还是发现，“以防万一”，我的书从图书馆和书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来。我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在一部有关战争年代外交的新的电视纪录片中，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我的采访，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紧急剪掉了。小心的人们在等待，不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

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是忠实的。特别是阿尔巴托夫帮了大忙，他跟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关系非常好。

很快，我被任命为《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的主编。我的书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并且书也出版了。1985 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向人民说明，我们国内的情况一团糟。“改革”开始了。

1986 年初，我被派往美国短期出差。这是彻底的平反。

安德列很快中学毕了业，上了航空工业学院。毕业之后，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试验员。但是，生意吸引着他，因此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结了婚，1990 年春天，他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了。有一段时间，安德列与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儿出差去过几次。

1993 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资公司的副总裁，销售钻井设备。他幻想着能够有大的成就，他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当他自立之后，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静地住在达恰，读历史小说，随意写点东西：他会照顾我跟列拉的。

但是，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这发生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弹撕裂了我们儿子的生命。当时他年仅26岁。安慰我们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孙子小丹尼尔，那年他才三岁半。

感谢命运，我的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阿列克赛。

谢尔盖使我高兴的是，他沿着我的足迹走：我曾经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翻译，谢尔盖则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翻译。并且谢尔盖的女儿，我的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同声翻译。

阿列克赛更喜欢我的第一个专业——工程师。他有一双巧手。他可以做出任何的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卡嘉和儿子别佳。

-----

贝利亚的报告(3)

-----

“斯大林专职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这就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

而在当时的美国，有亲戚在苏联也断送了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有多少亲情被意识形态的巨磨碾碎？

53 年过去了，一束白菊和一束红玫瑰让我找到失散了半个世纪的妹妹。难道这是父母在天之灵的庇佑？

我一直想找到父亲和母亲的下落。但是，我搜寻的全部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别列什科夫一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却一直觉得他们还活着。我设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应该从我在西方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在西方出版并在报刊中得到评论的书认出我来。此外，他们可能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看见我。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我呢？显然，他们认为，在“冷战”和激烈对抗时期相互之间最好不来往，尤其是在斯大林身边工作。我的父母可能还活着，这一点不仅从贝利亚调查我的企图中得到证实，此外，在 1945—1954 年间不放我出国，只是根据莫洛托夫的亲自推荐我曾经到维也纳、日内瓦和美国出差，但此后的 1954 至 1955 年间苏共中央境外干部处再次关上了我前往西方的路，仅仅偶尔在米高扬的坚持下“铁幕”为我略微开启。

与此同时，时不时有一些微弱的信号传给过来，我将其看作是来自父母的消息。1955 年，我本人 10 年来首次参加鲍利斯·波列沃伊率领的记者作家七人代表团出访美国，他们每个人都获赠许多纪念品：各种书、小册子、明信片、旅行指南等等。我最初没有注意到，在送到我下榻的洛杉矶“大使”饭店房间有关加利福尼亚的画册中，有一小本书是我儿时最喜爱——德国作家卡尔·曼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维耐通》。只是在事后我自问，如果不是亲人，会是什么

人寄来这本书呢？而最近我才打听到，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到“大使”饭店附近来，混在围着“红色记者”的人群中，并且戴着墨镜，否则我会认出他们来，为的是看一眼他们的儿子与同事一起坐进大型房车。看见我就在身旁却害怕显身，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几年过去后，在《新时代》杂志众多的外国读者来信中，有一封信来自瑞士的诺尔女士。她请我们给她寄一本卡明斯基医生有关理疗方法的书。我立即回想起，20 年代卡明斯基曾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正是他采用水疗法为儿时的我治过病。为什么这个瑞士女士会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信封上的地址写着：露伊莎 别列斯，日内瓦疗养院。通过这位女士我应该转交卡明斯基的书。我完成了这个使我万分好奇的请求。

几年之后，又一封来自日内瓦的信，还是同样的回信地址。这一次，这位诺尔女士未提到我的名字，却在信中罗列了我童年的时代的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只有我的母亲才知道。1966 年在德国出差时，我第一次写信给日内瓦，询问诺尔女士何以得知这些细节。我也请她告诉我，是否知道我父母亲的情况。

两年之后的又一封来信更加详细地写了过去岁月的细节，但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诺尔女士打算 1969 年夏天呆在瑞士，并且可以按照原先的地址给她回信。

1970 年列宁诞辰 100 周年之际，苏联记协组织了数个赴瑞士参观团，寻访 1917 年革命之前列宁流亡的地方。我和妻子也参加了其中一个参观团。

1969年初夏抵达瑞士之后，我们马上前往疗养院造访露伊莎·别列斯，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我可以跟她用德语交谈。她说，诺尔女士经常过来拿信件。我们将自己饭店的地址留下，并请求转告诺尔女士我们已经到访，然后便加入参观团去寻访“列宁的足迹”。

第二天早餐之后出得饭店，我们在门口遇见了一位穿着优雅，满头银丝的女士，我当时一下子未能认出是自己的母亲：离别的三十年完全改变了她的外貌。见面使人非常激动，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三人找了间咖啡馆坐定之后，才终于能够开口说话。妈妈告诉我，父亲五十年代末去世了，我妹妹在占领期间失踪。妈妈曾经上专门的训练班，所以作过美容师。现在已经退休，虽然不算富裕，但有钱可以到处旅行，这已经成为她的爱好。

当时，我问不出口，为什么她姓诺尔，我想着可能父亲去世之后她改嫁了。我妹妹失踪的情形她也没有细说。当时，我对于她的各种说辞有所怀疑，但感觉到她认为有必要隐瞒什么，因此也没有加以深究。开始写这本书时，决定不提到妹妹，只是认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免得使她难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人小心翼翼，避免为自己的亲人招祸。对我们而言，海外关系，正如对西方的许多人有亲属在苏联一样，都会带来麻烦。

看见母亲的拘谨之后，我也不再询问，她用哪国护照周游世界。当时觉得，她可能有某种发给迁徙人士的证件。

也许，知道我的工作地点，为了保护我，父母亲改换了姓名。

正因为如此，我通过红十字组织的寻找他们的努力始终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周围有许多人，同样流落到西方，认识我父亲，并且会向贝利亚的谍报人员揭发他们的“小计谋”，并且显然是这样的。我想，克格勃早就掌握了我所不知道的一切。

在我此后几次出国期间，我与母亲数次会面。后来，直到八十年代初又没有她的任何音讯。

有一天早晨，来到编辑部之后，我在自己办公室的桌上发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女秘书告诉我，信是在我到之前一位先生送来的，但没有说自己的名字。打开信封，我掏出了母亲工整的笔迹写满的几张纸。心中充满了激动和不祥的预感，我请秘书不要打扰我，关起门来开始读信：

“.....当这封信到达你那里时，我将已经不在人世。因此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此前不敢说的情况。是你中学时代的好朋友米海里帮助我们到西方的。他当时是德国海军军官。他在短期休假期间前来找你。我们告诉他你失踪了。父亲病得很厉害，走路十分困难。我们面临饥荒。米海里看见你父亲的情形——他被经常发作的心脏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折磨得不成样子——便自告奋勇帮我们搬到巴伐利亚佐霍夫市他母亲家去住。过后不久，战列舰‘第尔彼茨’号被英国空军击沉，他也牺牲了。后来不久，我们顺利地来到了美国。刚开始我们的日子很苦，但慢慢便安顿下来了，取得了美国国籍，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栋小房子，并一直住在那里.....”

原来，这就是我母亲精心掩饰的事情。即他们成了美国人。现

在的人也许会问，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斯大林前任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那又如何？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本人宣称，她是如何高兴和骄傲她获得了美国国籍，而她的女儿，斯大林的孙女，生下就是美国人。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柳芭·勃烈日涅娃、勃烈日涅夫的侄女，住在加利福尼亚，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旧金山都有房产，又当如何？

现在这些看来是稀松平常。在当时，在斯大林时期，有美国父母等于宣判死刑。在美国也一样，在麦卡锡时期，“抓妖魔”和反共歇斯底里时代，在苏联有亲戚可以断送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母亲在信中提到最后一段时间跟父亲住在加利福尼亚，以及寄到“大使”饭店卡尔·曼的那本小书，促使我在洛杉矶地区寻找他们的踪迹。

1991年9月，我应邀来到位于洛杉矶附近的大学城克莱门蒂学院讲学。1992年春，我开始寻找父母亲的墓地。很快就查明，本地东正教堂的牧师认识他们，而他们就安葬在洛杉矶市中心的鹰林墓地。现在不难找到墓地了。他们的遗骨安葬在绿色小山包上的一棵百年古松下，花岗岩墓板覆盖其上。他们漫长苦难的人生之路在这里终结。我将一束白色菊花带到墓地，却看见了墓碑旁边的一束新鲜玫瑰。

-----

## 贝利亚的报告(4)

---

谁人放的花，谁在照看墓地？公墓办公室的人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是五十三年来我没有见过、杳无音信的妹妹。她有一大家人：儿女、孙子，并且已经有了一个重孙女。我妈妈保护的正是这一家人，杜撰出妹妹失踪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残酷、悲惨和血腥的世纪里，有多少家庭不得团圆？又有多少亲人害怕相见，不愿被意识形态的巨轮碾碎？仅仅少数人得以体验久别重逢的喜悦.....

---

## 波莉娜还活着！(1)

---

我一岁半时，沙俄帝国覆灭了，当这本书完稿时，苏联早已经灰飞烟灭。

当苏联帝国覆灭之时，我的孙子也是一岁半，等待他的将来会是什么.....

我的叙述，始于苏联社会建立伊始，当时内战是腥风血雨，国内满目苍夷，人民流离失所。当结束这本书时，我看到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那个国家正在崩溃、消失。

在 70 多年期间，苏联对全球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其周围的世界里唤起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有人赞叹地球六分之一的居民勇气，因为他们竟狂妄到认为可以建立“理想社会”并向其他人提供可资效仿的前例，也有人谴责、拒绝、完全不接受这场前所未有的试验的基本思想，只因这种试验，是“克里姆林宫幻想家”在人民的活体上进行的。

苏联政权的灭亡，恰如其在本世纪初的诞生一样震撼了世界。一样地，有前苏联各族人民的苦难，一如莫斯科所诱惑或强加“社会主义模式”的其他国家人民的苦难相随其中。

贫困、绝望、对“光明未来”的失望、充满人民心中的空虚与无助，所有这些在前苏联的各个角落以暴力的可怕形势浮出表面，并完全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兄弟相残的全面内战。

正如 70 多年以前，“红色十月的孩子们”祈望“美国赈灾署”在苦难的俄国发放进口肉罐头和罐装牛奶一样，现在我们的下一代也依然只有期望来自西方的援助。

1991 年 8 月，用莫斯科满街的坦克“强化十月革命思想”的流产政变之后，苏联土崩瓦解，并于 1991 年 12 月底消失了。而这一切在此前不久无人能够想象得到。可是沙俄帝国 1917 年的灭亡也是同样的迅疾。导致沙俄灭亡的因素和现在苏联崩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还

是有某种共同之处：依靠武力和恐惧、迫害与虚假宣传的国家体制，一旦恐惧感消失，普通民众能够了解真相便顶不住内部的压力。

所有这些在此证实了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稳定靠镇压机关无法达到，不论这个机关的运转如何灵敏。稳定同样不能单靠武力。任何稳固的国家体制基于社会意见一致的程度之上。无论在沙俄，还是在共产主义的苏联，起码在其最后几十年里，这种一致并不曾有过。因此，一旦旧的架构开始崩坏，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加固这个人造的构造了。

回首往事，回首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的自己见证或参与过的历史事件和灾变时，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自己活到了矛盾重重、甚至是非凡的“苏联时代”的终结，毫无疑问，这个时代将作为建立公正社会的又一次大胆而失败的尝试载入史册。为了这个理想，千百万人自觉不自觉地付出了生命。正如奥斯卡·怀特曾经说过的，如果一个人为了理想付出了生命，这完全并不意味着他是为了正义事业而死的。我们的经验中，有着太多的牺牲、太多的破坏、身心两面太多太多的痛苦和损失。与此同时，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希望、热情和献身精神——不为自己，而是为下几代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过。

同时，我们的生活中终究也有所建树：虽然存在大量半途而废、失误和错误，但还是消灭了上千万人的文盲，实行了全民教育，免费的高等教育，免费医疗，而沙皇治下边远地区当时的某些

落后民族接触到了本国和世界文化的成果。

我们的牺牲并没有白费。社会发展不会停留在“先进技术”、“信息社会”等等现代资本主义的成绩之上。进步的人们将来依然会为改进生活而奋斗。而我们国家的经验，我们的成与败可以给人类未来的路途充当标志。

在沙皇制度废墟上建立新的社会体制需要巨大的牺牲。帝国的残余当时对新政权进行了武装抵抗。现在，行政命令体制及其代表同样也会拼命扼杀新生活的萌芽。他们的破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制造了改革者个人的悲喜剧以及从政治舞台的退出。然而，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如果俄国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正在成长中的民主遭到失败的话，这不仅仅对我国人民，对全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大悲剧。唯有希望发达国家不再重犯世纪初的错误，当时在二月革命之后他们迫使临时政府继续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而没有援助饥饿和被前线失利所折磨的俄国，结果造成了俄国民主制度的失败。

现在，正像从前那样，西方傲慢的野心可能使俄国脆弱的民主处境危险。北约向俄国边境缺乏策略的扩张正在给那些得到贫困群众支持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以口实。

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过渡已经在国内制造了譬如犯罪和酗酒滋生，一小批超级富人和千百万贫困人口之间差别巨大，官员腐败以及宠臣当道等等许多丑恶现象。

如果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俄国目前正在上演的悲喜剧漠然处之或

者仅限于口头表达好感，继续将俄国看作是原料供应地，那么他们可能会大大地失算。俄国内的核武器和大批核电站的后果，可能会比1918—1921年时期的内战和干涉要可怕得多。

我愿意相信，我国各族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不会为苏联消失之后替代出现的问题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当我一岁半的时候，沙俄帝国灭亡了。苏联帝国覆灭之时，我的孙子丹尼恰好也是一岁半。但愿他不会经见我们这代人所受过的这一切。一般俄国人在城市郊外夏季住的房子，旧译作“别墅”，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别墅，西文均采音译，为Dacha——译注。

图注：

A

1.苏斯洛夫(70-8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译注)与斯大林握手。1952年。

2.第一排：从左至右-什基里亚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斯大林；

第二排：从左至右-日丹诺夫，马林科夫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期间，1938年

3.米高扬、赫鲁晓夫、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一起走向列宁墓主席台，40年代末

4.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盟国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1945年2月

5.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

诺维奇（从左至右）在莫斯科的图什诺机场观看航空表演，40 年代末。

## B

- 1.胜利阅兵开始之前：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加里宁，1945 年
- 2.斯大林与女儿斯维特兰娜
- 3.贝利亚的妻子-尼娜
- 4.斯大林与冯·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1939 年 8 月
- 5.沃兹涅先斯基、贝利亚、马林科夫、斯大林、布琼尼与战友们在一起

## C

- 1.奥尔忠尼启则
- 2.基洛夫
- 3.贝利亚-契卡工作人员

## D

- 1.波茨坦会议期间，邱吉尔临时回到伦敦参加选举，斯大林与杜鲁门等人在休息。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别墅里无拘无束的气氛。
- 2.瓦列金 别列什科夫，1998 年

## E

- 1.希特勒在新的帝国办公厅。柏林，1939 年。

-----

波莉娜还活着! (2)

-----

-----

《新时代》杂志(1)

-----

-----

《新时代》杂志(2)

-----

-----

斯大林之死(1)

-----

-----

斯大林之死(2)

-----

-----

维也纳之行(1)

-----

-----

维也纳之行(2)

-----

-----

维也纳之行(3)

-----

-----

维也纳之行(4)

-----

-----

在北京(1)

-----

-----

在北京(2)

-----

-----

在北京(3)

-----

-----

“百花齐放”

-----

-----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

-----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2)

-----

-----

明尼阿波里斯的预言

-----

-----

永不愈合的伤口(1)

-----

-----

永不愈合的伤口(2)

-----

-----

永不愈合的伤口(3)

-----

-----

永不愈合的伤口(4)

-----

-----

永不愈合的伤口(5)

-----

-----

永不愈合的伤口(6)

-----

-----

父母的墓地(1)

-----

-----

父母的墓地(2)

-----

-----

后记(1)

-----

-----

后记(2)

-----

-----

饥饿年代(1)

-----

我在少年时代便亲身经历了出于宣传目的而集体造假的事情。

1929 年，素以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发生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限制消费.....

为了生计，我转调到“国旅”当导游。

乌克兰发生饥荒——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乌克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在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年代，虽然紧张张，但依然能够养活自己，新经济政策伊始，一季的收成就能够让人们吃饱，现在却突然出现了饥荒！并且是在和平时期！

1929 年秋天，当我们从南方回到基辅之后，谁也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每个角落里都是蔬菜水果摊贩，国营和私人店里商品极为丰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随处可见一对对衣着华丽的情人，每到夜晚，剧场、餐厅、咖啡馆和台球室里，挤满了休闲的人。不过，这里时不时也会看见“背口袋的”——这是从集体化“大获成功”的那些村庄逃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被看作是因对抗政府而受罚被没收财产的乡村富人。各个报纸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被成绩冲昏了头脑》一文，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传言中乡村里的过火做法，是那些热情的工作人员干的。现在，当总书记亲自出面纠正了这些人之后，他们会略微节制自己的热情，所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人一切照常，根本没有想到，不久会大难临头.....

我们七年级又来了几个新同学。他们的家人从德国迁到苏联，因为那里纳粹掌权的威胁日益临近。12月，在哈里科夫召开了全乌克兰少先队员代表会，我们学校也应邀参加。巴乌里是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决定将我们班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很可能，他是根据基辅共青团委的指示而这样做的。当时，这类造假活动十分普遍。譬如，每次大型会议上，都有“广东公社”的代表出来讲话。每次介绍这些人刚刚从中国来，实际上他们在俄国已经住了很久。当时，人人都在说广东公社的事，每个人都想在主席台上坐一个中国人。至于我们，巴乌里的主意多少还算符合实际。新来的同学的确是德国少先队员。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所以甚至带来了自己的旗帜。而且巴乌里本人是个地道的萨克森人。至于我们，虽然不是德国人，但完全可以充作德国人。巴乌里严格命令我们在路上装作不懂俄语，只能说德语。

沿途各地都已经得到通知，说德国少先队代表团正在前往哈里科夫，当时乌克兰的首都。我们乘坐火车，占了单独一节车厢。沿途每个车站上，当地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用乐队、旗帜和鲜花欢迎我们。每次都在月台上举行短暂的集会，我们用德语作简短发言。然后，按照通常所说的那样，“进行了友好交谈”，结果是，我们回答所有问题时，都握紧拳头高喊“同志们！”

起先，演出这样一出戏时，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习惯

了，甚至在哈里科夫的大型集会上作了一篇反法西斯内容的热烈演讲，赢得全场鼓掌。

当时，我们两人一组被安排住在哈里科夫少先队员的家里，所以，每天晚上，当全家都聚集在茶炉边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邻家的小孩子们都跑来看“外国少先队员”。由于不懂德语，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费力地解释自己的话。我们当然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同时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样子来。我们拼命憋住了不让俄语脱口而出。非常担心在梦里说出话来，好在我和自己的小朋友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游戏，所以，当自己人在一起时，便拿愚弄周围所有人这些事来取笑。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巴乌里以及其他的辅导员跟我们开了一个龌龊的玩笑：实际上，他们教我们撒谎，装假，口是心非。这里面没有任何好玩的。也可能，这样一种独特的经验为我们做了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全国上下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经常到哈里科夫出差，所以从那儿带回来各种小礼物，装帧精美的书籍，衣服等等。离开的那一天早晨，我也打算给家里卖一些纪念品。走了一个商店，第二个，第三个。到处货架空空如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基辅可是什么都有的。而这里，首都居然是一无所有。后来想在餐厅吃午饭，——那儿也一样，除了煎蛋之外，菜单上的其他各项都被划掉了。

我们乘夜车回到了基辅。我给家里人讲了哈里科夫的事情，但

妈妈对我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咱们这儿也是东西全部不见了。我想不通，都弄到那儿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发生“大转折”，并且全面集体化的时代已经开始。它恰似一把尖刀，切断了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消灭富农阶级”，而实际上是消灭所有私人经济的路线，引发了居民的恐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购。当局则中止了供应。结果是，数日之内，商品被一抢而空。下一步便是大规模关闭私人企业，手工作坊，面包房，咖啡馆等。为了“稳定”局面，斯大林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凭票出售食品，衣服也是凭专门的票证购买。担任技术厂长的父亲领到了“工作卡”，我和母亲领到的是“赡养卡”。但是，领到的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很快，作外国人生意的“外贸商店”开张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榨取居民手里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人们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把自己内战期间保存下来的，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购买的所有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以换取黄油、炼乳、面包等。妈妈将仅存的自己祖父母的纪念物，以及父亲用几十个卢布买来准备镶牙的沙皇金币都送到了“外贸商店”。像内战时期一样，再次面临饥荒。现在，一边写这些文字，我一边在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已经宣布了六十年。结果呢？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看见国家再次依靠票证制度。苏联政权七十年后，我国的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数量稀缺质量低劣的最基本的日用品。庞大的行政机器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肥皂问题。可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我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自己学会了炼制肥

皂，因此在我们避难的那个村庄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难题。莫斯科比其他地方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1990 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年多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 .....

五月底，我们班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因此 1930 年的 9 月份，我应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开始上班。儿时在工厂各个车间的迷恋使我具备了某些生产技能。我被招为电工，月薪 40 卢布，外加一张“工人”食品卡。“布尔什维克”工厂里的人对我很好。许多人认识我父亲，有些人还记得那个整天泡在模具和铸造车间的小男孩，他的儿子。工厂正在进行改造。电动马达替换了传动装置，传动皮带和皮带轮。写着“辛辛那提”字样的新式美国车床带有内置发动机。但是，厂里也在自力更生改造旧设备。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车间，生产发电机和电动机。线圈基本上是妇女们绕的，男人们装配并安装发动机，而我则被派去作整流器的刷子。一整块压缩石墨先用手锯裁成规定大小。然后，再进行电镀，在一端生成一个铜质层，加上接线柱。我喜欢这工作，但每到下班时，我浑身上下沾满了石墨灰尘，活像个黑人。不管我怎么洗都没用，因为石墨吃进眉毛和眼睫毛里。家里人把我戏称为烟筒清扫工。

要想七点之前赶到班上，早晨四点就得起床。五年计划一开始，交通跟城市其他设施一样便不再正常运转了。有轨电车的运行不正常，并且也不是每次都能挤进车厢去。人们吊在踏板、车尾的

缓冲板上。简言之，坐电车希望不大。大部分时间我步行上班，但从家里的距离大约有七公里。

-----  
饥饿年代(2)  
-----

夏天天亮得早，还好一些。可是冬天里，早晨一片漆黑，实在不愿意在积雪的街道上一步步挪着走！最令人难忘的是 1931—1932 年的冬天。饥荒已经打倒了市民。基辅市里涌进了一批又一批难民。隔一段时间他们被送走了，但很快又会出现一批批疲惫不堪的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人衣衫褴褛，已经走遍了乌克兰，来到这个曾经富裕好客的城市寻找自己最后的避难所。现在，什么人也帮不了他们。为了缩短路程，我从曾经十分繁华，可现在非常阴沉的路德街，这条路已经改名为恩格斯路，沿着一个陡坡直着走下来，走到比萨拉比亚市场。市场已经被封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可卖了。市场周围平时挤满了流浪的人们。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当时不得不跨过一具具已经冻僵、覆盖着雪的尸体。早晨，警察会来收尸。但是，在我去工厂的清晨，这些被冻僵的一堆堆人体和破烂的衣衫令人毛骨悚然。

在“布尔什维克”上班时，我考入了外语夜校的英语和德语班。当时我的外语已经不错，但还是想进一步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拿到可以做翻译的证书。夜校是三年制的。还没有学完两年的时候，我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紧赶慢赶，是为了准备报考基辅工业学院。我想跟父亲一样作个工程师。可最终不得不改上夜校。因为“工人”食品卡，以及家里情况困难，无法放弃工厂。况且当时我的工资已经是一百卢布。这已经是一笔钱了。

可是，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已经没有东西卖给“外贸商店”了。有多少钱也不管用。父亲和母亲瘦得很厉害，而我干脆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碰见了一位中学同学。他告诉我，前不久在基辅新开张的“国旅”分部招收懂外语的年轻人上导游翻译班。条件非常诱人：工资 150 卢布，最主要的，是跟旅游团组一起的免费伙食，以及一份相当不错的口粮。我紧紧抓住了这个招工的事。当时是 1934 年初，乌克兰大饥荒的第三个年头。看情形不会有任何好转。当然，无法兼顾工厂的工作，大学的学业和国旅的训练班。经过思考，并跟家里人商量之后，我决定冒险：递交了辞职申请。

HJ \*5/9】 不过，风险并没有多大。由于我拥有翻译证书，掌握两门外语，所以毫不怀疑会被录取。在招生委员会经过简短的面试之后，果然是这样。接下来安排了三个月的课程。给我们教授的有基辅的历史，介绍了市里和城区的风光名胜，苏联劳动法和司法体系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专业导游给我们介

绍了实际工作的经验。这个课程在一般知识以及基辅罗斯的建筑绘画文化等方面使我颇有收获。此外，加上在国旅两年的工作，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天生的腼腆和拘谨。专门的政治指导，教我们采用那些手法可以使外国客人对“苏联生活方式”留下良好印象，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坦率地说，这些手法中的某些东西在后来的辩论中派上了用场，其中也有“科学的辩论”，当时我们专门作一件事，就是颠倒黑白.....

初春，当第一批游客来到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34 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国以及外国游客敞开了自己的大门。生活，尤其在乌克兰，依然非常艰难。因此，当局更加细致地为接待游客作了准备。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当时的确作了大量的工作。培训导游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虽然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旅馆和饭店进行了翻修。储备了上等的餐桌布和床上用品，餐具，改建了厨房，购买了冷冻设备。在美国和意大利采购了小轿车和带防雨帆布棚的敞篷客车。装潢精美的旅馆小卖部里，堆满了进口商品。同时，也没有忘记招收一批最漂亮的姑娘作售货员。各个旅馆的接待处里，摆上了从国外进口的办公家具，用油画，非常漂亮的壁画镶板和广告招贴画加以装点。大堂里，有昂贵的地毯，摆放着古董家具。

所有这些是在饥荒年代里搞的！典型的斯大林——波将金式的农村。斯大林喜欢也善于装样子蒙蔽外国人。否则他怎会迷惑那些具有洞察力、善于批评思维的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譬如，巴

尔比优斯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斯大林就是今日的列宁。”“各族人民领袖”也善于积聚大量的财产，用来驯服那些需要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人。并且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斯大林是个勤俭的当家人，不能容忍大手大脚，要求所有人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人们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所以相信他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增加国家的财富。然而，斯大林对于“国家财富”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财富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毫不相干。人们可以一贫如洗，只要国家富裕就可以了！所以，外国游客在导游的密切关注下，看到了一个“繁荣的国家”，这也是要努力展示给他们看的。结果，当他们离开时，并没有获得有关苏联真实生活条件的任何概念。基辅的“国旅”拥有一家名叫“大陆”的豪华饭店，位于尼古拉街，紧挨着克列夏季克（战争期间饭店烧毁，此后在遗址上兴建了音乐学院）。专门请来了沙皇时期的高级厨师，服务生，门僮，为他们专门缝制了制服，镶着金银饰扣和镶条。闪闪发亮的“林肯”，“菲亚特”的司机们穿着运动装。第聂伯河上为外国游客服务的，是雪白的动力帆船，船上的酒吧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凡此种种之外，当时的苏联之旅非常便宜。花 100 美元，可以在一周之内游览基辅，莫斯科，列宁格勒，享受一日三餐和服务。当然，当时的美元比较值钱。但是，许多游客离开时，都确信苏联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国家。正是在那时，我国的外贸官员形成了一个概念，即卢布一文不值，所以为了赚取外汇可以“合算地”浪费自然和人力资源。

-----

## 在“国旅”当导游(1)

-----

为了生计，我到基辅“国旅”做导游。

苏联政府为了展示集体化的成绩，不惜造假给外国游客看。

80年代初，我在华盛顿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饭店遭劫并被打伤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不禁感叹，需要何等厚颜无耻才能将破产的农业当作繁荣拿给外国游客看。我要讲一讲第一次见识“模范”集体农场的情形。

基辅来了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他们买的是豪华游，所以给他们配有专车和导游。我们最喜欢这种游客了。麻烦比团组少得多，并且翻译跟客人得到同样的伙食，并且在国内旅行时会有卧车“国际车厢”的一个床位，在最好的饭店里有一间客房。我刚刚被招到“国旅”，所以跟着已经有数年经验的翻译克拉拉实习。我们俩负责接待这对美国夫妇。

我喜欢克拉拉。她个子不高，但非常雅致，恰似一个陶瓷娃娃。虽然她要比我大三四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并且在一开始执行指导角色时非常严格。

美国人从头一天起就表示要参观一个集体农庄。克拉拉叫我把

这个意思通知给服务处的主任法因伯格，回头他再落实，我们可以参观哪一家农庄。他手里的清单里，总共只有三家农庄可以带外国人去看。但是，每次都必须预先打电话通知农庄的主席，由于电话线路不好，这往往需要一天时间。到傍晚时，这些事情都办妥了。我将这次行程也通知了我的朋友斯捷潘，他是配给这对夫妇的“林肯”轿车司机。

在导游翻译班培训的时候，我在国旅的车队里打过一阵工，做帮工。我的工作清洗汽车，给散热器里加机油，加水，以及保证出车之前油箱里有足够的汽油。当时，基辅还没有加油站。我跟斯捷潘一起——他也是司机当中最年轻的——每周一次开着卡车去铁路货场附近的油库。把几个大桶灌满汽油，将油桶滚到车厢，然后开回到车队，这批汽油一般保存在单独隔离开的地方。油桶放在高处，这样汽车开到跟前之后可以直接将汽油加到汽车的油箱里。先拧开油桶的盖子，把管子插进去，然后在管子的另外一端吸气。然后，一切按照虹吸原理自动进行。但是，有时也会把汽油吸进嘴里，所以得拼命漱口。

我跟斯捷潘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二十五岁，但他把我看作同龄人。他教我开汽车，所以，当没人的时候，他会把“林肯”交给我开。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俩邀上两个姑娘在城里开车兜风。

早晨，陪着美国夫妇去参观大寺院，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参观集体农庄。这两位外国客人原来对农业十分在行。比尔（他一开始就叫我们按名字称呼他和他的妻子——苏西）是一家美国银行的经

理，同时在纽约附近拥有一个大型牧场。他读了很多关于集体化惨状报道，所以想来找出私营农场优越性的直观证明。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带他去的那间农庄，叫做“模范”，并且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看过了中心院子，在宽敞的办公室跟农庄主席谈了话，并且看过了两家农庄庄员的家，这两家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分完美，然后去看几公里之外的畜牧场。沿着坑坑洼洼的一条窄道，“林肯”十分艰难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一路上斯捷潘不停地踩着刹车。这里也是井井有条。客人到来之前打扫得十分干净的牛栏里是一排良种小公牛，时不时低头在满满的食槽里吃食。这些小牛看上去营养良好。然后看了一个养猪场。淘气的小猪围着一个个肥胖的大母猪。

比尔显然被看到的这一切所震惊。他提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询问了牲畜的品种，产奶量，种牛的能力等等。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实习机会。并且，虽然我知道一般农庄，而不是模范农场的情况，但这家农场的状况似乎在说明，集体农庄的事情可以办好，可以使它成为盈利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米丘林神奇苹果”，苏联育种专家培育出的“奇迹小麦”，以及“创纪录奶牛”神话般的产奶量。于是，我们相信，再过一两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国，而她的公民将是最幸福的人民。所以，现在最好给外国游客看的不是悲惨的现状，而是光明的未来。所以，在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我们国家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女主人一边骂街，一边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购买必需品。但

是，好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偶尔碰到鱼子酱或者是螃蟹，女主人一般会存起来，不让家里人碰。可是，当要接待外国客人时，却把所有这些东西拿出来。于是，吃着美味佳肴，客人会想：这俄国人日子过得并不那么糟，有关困难的报道显然是夸大！

所看到的一切给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跟畜牧场负责人告别时，比尔激动地说：“无论如何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切！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读到的，全都是撒谎！现在我相信了，跟个体劳动相比，集体劳动一点也不坏，甚至要好一些。有些地方我们还得向你们学习。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然后，稍微停了一下，问道：“可是，请告诉我，你们的农庄不是个例外吧？其他农庄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合理？”显然，比尔发生了怀疑，这些人是否在欺骗他。

“当然啦，当然啦！”畜牧场的负责人向美国人保证说，虽然他非常清楚，大多数农庄里，由于饲料不足而衰竭得站都站不住的奶牛，都用绳子帮忙拉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轻信的比尔满足了。

在农庄耽搁了太多时间，其时气温骤降。当时是初春，所以天气多变。起风了，开始下小雨。克拉拉不断催促美国人，但他们却不愿意离开。最终我们上了路，但很快就明白了，被拖拉机翻起来的土路已经没法走了。坑洼处变成了一个个水洼，沉重的汽车在路上摆来晃去。斯捷潘决定驶离土路，穿过田野直接开到公路上去。他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走了大约两公里之后，汽车彻底陷入了松软、潮湿的土里。我们试图将“林肯”推出来，结果车轮在泥汤

里越陷越深。

比尔下了车，看了看情况之后平静地说：

“没用了。我们陷得太深了。惟一的希望是俄国的严寒。”他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为自己的玩笑开怀大笑。

但是，这里一点也不可笑。严寒秋天才会有，所以我们根本指望不上。我们三人——斯捷潘，克拉拉和我——都感到非常担心。但美国人却非常平静。

“办法是，”比尔开始议论，“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是你们这里惟一不足的……”

当然，过去，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不光缺乏可靠的道路，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但是，比尔被畜牧场迷住了，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开始商议。周围既没有石头，也没有干树枝可以垫车轮。天开始黑了。刺骨的北风也更大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车里过夜了。可是，基辅那边会多么紧张啊！一对美国夫妇失踪了！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送到饭店去。更何况两位女士穿得很薄。她们应该走到哪怕是有人住的地方，并且要是遇上顺路车的话，回到城里去。

最终我们决定，克拉拉陪着这对夫妇走，我跟斯捷潘在车里过夜。

三个人影朝着地平线方向越走越远，很快消失在暗夜之中。我跟斯捷潘再次巡视了一遍“林肯”，车子在湿淋淋的田野里显得那样的孤立无援。斯捷潘发动了汽车，试着开动。结果是白费力气！最好不要浪费汽油，没办法，就得呆到天亮。我们俩钻进车子，点上

烟。时间过得很慢。克拉拉跟美国夫妇是否走到公路上，有没有碰到顺路车，这些想法令人不得安宁。

我刚刚开始打盹，就听见敲窗户的声音。我放下玻璃，发现是比尔。难道出了什么事？出什么事啦？比尔大笑道：

“别担心，没事。我让她们俩坐上一辆去基辅的车。但我自己决定回到你们这里来。想看一看，你们怎么从这里弄出去。”

-----  
在“国旅”当导游(2)  
-----

我使劲忍住没有对美国人的轻率发火。

“您不该这么做。回城去是最好的了。并且您怎能可以丢下两位女士不管？”

“这有什么？我们美国的妇女是独立的，可以保护自己。难道你们这里不是这样吗？那些人不错，他们答应把苏西和克拉拉送到饭店.....”

“当然了，我们这里的妇女也是很独立的。可是，什么事都会有。现在，拿您可怎么办？上车吧.....”

但我始终感到担心。有关躲藏在森林里“被没收财产的富农”的

传言记忆犹新。这些饥饿和绝望的人们往往在夜间袭击单身的路人，有时也会拦截汽车，抢劫钱财和食物。也有过死人的事。现在平安多了。几乎所有的“林中弟兄”都被抓获了。可是，万一有一两个漏网的呢？并且当地居民也可能晚上出来干坏事。甚至在基辅也发生过抢劫。不过，这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了，父母亲和我遇到了打劫，并且是在市中心。在符拉基米尔街和符杜克列耶夫街的交汇处，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幢整整占了一个街区的大楼在内战时期被烧毁的废墟（这幢大楼后来得到重建，并且作了乌克兰科学院的办公楼）。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跟父母做客回家，从克列夏季克街下来，走过这片废墟。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从一堆瓦砾中窜出两个人，手里拿着手枪。

“举起手来！”我们听见了嘶哑的一声喊。

我们听从命令，都站住了。

其中一个劫匪在几步之外停了下来，用手枪对着我们。另一个走近母亲。

“把手举起来！”他喝道。

她举起了戴着戒指的双手。其中一个订婚戒指，另外一个戒指上镶着一大块红宝石，还有一个是金质花瓣镶满细碎的钻石。

“卸下来……”

劫匪用枪管指了指金项链，然后是耳环。妈妈顺从地卸下来，放在劫匪的手上。劫匪将这些放进口袋之后，转身朝父亲走来，父

亲依然举着双手。这一点救了他那老式上等山羊皮钱包，以及证件和钱。在风衣下面未系扣子的西装上衣摆向身后，所以，劫匪在胸前搜索之后一无所获。风衣的口袋里有几张票子，这使他满足了。劫匪拿枪对着我们，一边后退，慢慢地退到废墟后面去。突然，妈妈天生的自制力又回来了，她喊道：“请把两个戒指还给我吧！订婚戒指和那个红宝石的。这是祖母的纪念物。它对我非常重要……”并且她端直朝着枪口走了过去。我跟父亲还没来得及喊她回来，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拿走了物品的劫匪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捧戒指，项链，手链，张开手伸过来：“看在您勇敢的份上，请拿走吧，女士。哪些是您的？……”

妈妈走过去，用两个手指从一堆金银饰品中挑出了自己的戒指。

“谢谢。”她平静地说完，然后便回到我们身边。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劫匪突然之间却表现出了高尚……

“现在，留在原地十分钟别动。”又是那个嘶哑的声音，接着劫匪消失在废墟之中。

父亲责难母亲的疯狂行动，可是，她抚摸着失而复得的戒指，根本就不听他说的话。

每次，我遇见类似情形时，都会想起来这个场景。类似的情形还不少。我也曾经撞到过劫匪的枪口。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并且不是在什么黑暗的角落或者老旧的废墟里，而是在华盛顿

市中心，白宫对面第十六街的豪华饭店“亚当斯”里面。

当时，我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代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我们研究所的所长阿尔巴托夫院士每次来华盛顿都住在“亚当斯”饭店。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国会议员索拉斯郊外的家里呆到很晚，子夜时分才回来。一般我将自己照顾的客人送到旅馆门前，告别之后便回家了。但这次阿尔巴托夫请我到自己的房间去：“好像睡不着。我还留下了一瓶亚美尼亚葡萄酒。如果不是太累的话，我们坐一坐，聊一聊……”我非常乐意。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互道了晚安。我走出来到空无一人的走廊，叫了电梯。当电梯停下，门打开之后，我面前的情形十分奇怪。跟饭店大厅豪华气氛完全不和谐的四个衣衫破烂的黑人年轻人呆在各个角落。饭店的夜间守门人不自然地弯腰站在柜台前。起先我想着，可能是什么东西出了故障，所以请来了修理工。但他们为什么如此紧张，并且怪怪地看着我：“大家好！这里出了什么事？”我一边走向出口，一边跟大家打招呼。

没有人答话，突然，一个黑人朝我冲了过来。这时，我才看见了他握在手掌中的手枪，非常小巧，枪身一点也不显眼。意识里闪了一下：报纸上刚刚报道过这种“儿童玩具”：有人用儿童玩具作掩护，以零件的方式从德国运进来，然后在美国组装，最后廉价出售。武器却是致命的。平民窟里往往使用这种枪：价格便宜，易于藏匿……

黑人青年左手持枪，右手开始搜我的身。他想确信，我没有武

器。大家都知道，许多美国人枪不离身。我身上当然没有武器。但是，裤子的口袋里却有一个皮夹子。劫匪摸出了皮夹子，然后拿枪对着我，开始慢慢地向后退。

“把钱拿走，”我对他说，“把皮夹子还给我。那里面有证件……”

我不想失去驾照，加油的信用卡和国务院发的外交官证。没有这些简直寸步难行。可是，要想办理副本明天得花多少时间啊！

不知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不会有“明天”。我大声索要自己的证件。但这个黑人似乎没有听见。其他人也都站着不做声。我在心里想着，现在这些人是否受毒品的作用？他们的反应似乎十分迟缓。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我走近那个劫匪，夺来了自己的皮夹子。他一下子呆住了——显然没有料到我的这种轻率之举。他接着扬起手来，然后用手枪柄击打了我的头部。但我还是来得及打开皮夹子，拿出绿票子——那里面有大约两百多美元。

“把钱拿走。”我将打开的皮夹子伸了过去。他拿走了所有的钱，于是，我对自己的行动非常满意，把皮夹子装到了口袋里。

黑人命令道：“脸朝下卧倒！”

我走开了一些，看见在沙发和椅子之间，面朝地毯趴着两个身穿饭店门僮制服的人。我觉得这种姿势不太雅观。我只是单膝跪下，把头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才感觉到，脸上在流血。显然，某个血管被碰破了。血越流越多。衬衫和椅子上出现了红色的血渍。我侧目看了看前台的方向，那里有两个劫匪正在撬保险箱。血流进了眼睛，于是我想用手绢擦干净。我旁边的年轻人立即神经质

地做出反应，他走进我的身边，发现了手上的手表。他拿枪对着我的太阳穴，试图解开金属表链。所幸，表链扣得非常紧，所以他怎么也卸不下来手表。这时，保险箱的小门咯吱吱响着掉下来了。黑人从我身边跳开去，跑向前台。我利用这个时机，卸下了手表，藏在自己的口袋里。这块表有纪念意义，所以不愿意失去。但是，这样也不无风险。黑人走回来，看见我依然是那种姿势，只是手表不见了。他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我想着再挨一下。但是，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嘟囔了句什么，走开了。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卸下了手表并装进口袋里了。

我在想，下一步会怎样。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劫匪在逃走之前射杀证人。所以才叫我们脸朝下趴着。这样，更方便在后脑勺开枪。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也就无从担忧将来的事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开始琢磨，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毫无疑问，报纸会大写特写对“亚当斯”的抢劫。会讲得十分详细，并且配上照片。我想象着自己血流满面出现在报纸上，外加一句“苏联外交官受伤”。这绝对不行。本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相当糟糕，再加上一个袭击外交官事件。也许还会编出一个对十分接近某某人的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院士的“未遂袭击”事件等等。搞不好，会搞成类似萨拉热窝枪击一样.....

-----

### 在“国旅”当导游(3)

-----

HJ \*5/9】我毫不怀疑，这纯属巧合。打劫的是饭店的现金，而我不巧正在这时走出电梯。这是听见一声喊：

“十五分钟之内别动。如果有人敢动，我们就杀了他。我们会看着.....”

拿走了保险箱里的东西之后，这四个人一个接一个，背对着大门，端着手枪离开了饭店。所有的人都出了一口气。我们真是太走运了。劫匪没有闹出多余的动静。不管怎么说，白宫就在附近。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周围非常安静。我问道：“是否该叫警察啦？”

“您这是怎么啦！”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别动，时间还没到.....”

又等了一会，我们堵站起来了。值班员拨了电话。过了大约一两分钟，就听见警笛声，刺耳的刹车声音。窗户外边闪起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刑事案件的记者匆忙地拍着饭店的入口。我只剩下数秒钟时间了。夜间值班员和门僮挤在大门口的当儿，我悄悄走向电梯，按了电钮。电梯门开了，然后立即在我身后关上了。过了一瞬间，我已经来到了五楼。我走到阿尔巴托夫的门口，按了门铃。

“是谁呀？”

“是我。尤拉，快开门吧，有一件事情.....”

门打开了一条缝。有两条链子挂着。阿尔巴托夫看着我，但没

有认出来。毫不奇怪，脸上的血迹已经凝干，衬衣和浅色西装外套沾满了褐色斑点。

“这真的是我。”

“太恐怖了！出什么事啦？”

“这就说给你……”

我简单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我决定不能这个样子碰见警察。然后我到洗漱间，洗了脸，洗净了衬衣，洗掉了西装外套上的血渍。然后，把这些东西挂在落地大台灯上烘干。阿尔巴托夫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美国首都的中心会发生这种事情。大约四十分钟后，我看了看窗外，看见警察正在离开旅馆。只是在街对面还有一辆巡逻车。伤口不再流血。衣服也干了。我们商量好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分手了。下来到前厅之后，我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跟记者说话的夜间值班人没有注意到我。我的汽车就在旁边，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到家了。

虽然我已经收拾妥当，我的妻子列拉马上就明白了：出事了。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她已经习惯了我经常会发生各种糟糕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平静了，帮我清洗了伤口，贴上了膏剂。

早上八点，我已经开车到了酒店。然后我跟阿尔巴托夫一起去国会出席一个工作早餐。电视和《华盛顿邮报》非常简单地报道了“亚当斯”酒店的抢劫以及“没有人员伤亡”……

现在我们回到遥远的1934年。

我们决定，不向比尔解释，为什么替那两个被他轻率地乘别人

汽车打发走的女士担心。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开始收拾准备过夜，放下了窗帘，用小地毯遮住前后窗玻璃。我和比尔安顿在后座，斯捷潘在前座。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所长时间。揭开窗帘的一角，外面一片漆黑。雨停了，天气稍微变冷了。我摇了摇斯捷潘的肩膀：

“也许应该发动机器，打开暖风……”

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就听见了说话声。我弯腰对斯捷潘说：

“有人朝这边走来。坐好别动。让他们以为没有人……”

比尔动了动。我警告他说：

“请您别出声……”

他理解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躺在座椅上。说话声接近了。说话的有两个人。突然，静了下来，然后又听到：

“看看，这是什么！”

“它是从哪儿来的？”

“怕是陷住了。”

车子两边近旁，是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可以听见沉重的呼吸声。我们屏住呼吸，尽量保持一动不动。突然，听见了敲击声。是金属东西，或者是截断的枪托敲的？这样就大事不好了。开始拽前门的把手。斯捷潘一下子明白，再也无法藏着了。

“走开，我要开枪啦！”他拼命喊道。

他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于是就逃跑了。也可能，走过来的不

是恶人。但最好是保险再保险。当然，斯捷潘根本没有枪，但心理上他的盘算是对的。后面我们再也没睡。我对比尔解释说，这些人可能是喝醉酒的恶徒。

“在我们美国这些人一样也不少。应该离他们远些才对。”比尔温厚地表示同意。等到天亮之后，我们下了车。后保险杠挨了一下，但破坏十分细微：金属稍微凹进去了一点。锁好“林肯”之后，我们出发去附近寻找住家户。

村庄坐落在一条大路上，路的两边栽着柳树。前两个房子的窗户都钉死了，里面没有住人。显然，是“被没收财产的富农”抛弃了。第三家的烟筒里冒着烟。我们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老的女人，身穿黑色包发帽，肩上围着一个破旧的方巾。我们问了好。我道歉说，这么早惊扰了，请让我们进屋。

“请进吧。”她略微顿了一下说道。

在正房里，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显然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大块面包。俄式炉子里，看得见盛土豆的铁锅。我解释给他们，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并补充说，跟我们一起还有一位美国游客。

“请坐吧。”那位年长些的说，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们实在是饿坏了，所以顾不得人家的劝让。女主人将铁锅放在桌子边上，给每个盘子里都放了煮土豆，然后浇上向日葵油，给每人倒了一铝杯甜菜茶。我想，对于前来作豪华游的比尔这顿早餐有点太过简单了，并且在这样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用餐之后，他会

对集体农庄的饮食留下不好的印象。法因伯格那里可有我好看的！就为我们让美国人这样过夜，我们肯定要倒霉！但是，比尔不但没有抱怨，而且还称赞食物“味美营养”。

从主人的话里我们弄清楚了，我们来的不是昨天参观过的那个农庄。这个根本就不是“模范”式的。我的又一个失误！不过，这里的人帮了我们。吃过东西之后，我们去了农庄管委会，那里给了两头牛来帮忙。

“难道它们能把这个大家伙拖出来吗？”斯捷潘表示了怀疑。

“会拖出来的，它们有的是力气……”

壮硕、沙土色的牛长着黑色斑点，犄角朝两边分开长着，鼻孔里戴着铁环，好奇地打量着同样也是沙土色的海外怪客。挽具上套了缆绳。我跟斯捷潘将缆绳的一端系在“林肯”的前板簧上。比尔坐在车上，发动了汽车。我们俩在后面推。前面喊起了“驾驾”的吆喝声，牛开始使劲，汽车晃动了一下，慢慢地从前一天车轮挖翻起的沟渠里出来，沿着冻实的土地望前移动。这里，我几乎看见了某种象征：乌克兰牛使美国技术的奇迹恢复生机！……比尔微微打开车门，喊道：

“这车本身根本没希望！没有公路和其他设施它毫无用处。我给你们说过了：应该赶快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

现在，当电视上播放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没有道路，在粘稠的泥浆中拖拉机都出不来，每次我都会想起这个场面。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村庄和田野周围依然没有硬质路面的道路。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1)  
-----

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结果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大批人员遭到扣押。

我担任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的联络官，收买了看守大使馆的党卫军冲锋队长，成功地把电台交给了地下抵抗组织。

1941年6月21日那个不祥的早晨，在里宾特洛甫官邸门口，帝国外交部长的一辆“奔驰”等着我们——杰卡诺佐夫和我——把我们送回大使馆。从维里海姆大街拐上林登大道之后，我们看见，沿着大使馆正门口有一排党卫军。实际上，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隔绝了，电话不响了。禁止我们进城。没有办法，只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大约在两点钟，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德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埃里赫·佐美尔通知说，在弄清楚哪个国家将代表苏联的利益之前，要求大使馆指定一名外交官跟德国外交部保持联络。杰卡诺佐夫大使将这个职能委派给我，所以，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将这个情况通报给了礼宾司。

“我应该预先告诉您，”电话中对我解释说，“大使馆的代表每次到外交部来，都由看守使馆的警卫负责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陪同。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他与礼宾司联系.....”

也就是说，我获准仅仅走维里海姆大街，并且得有海因曼的陪同。同时，非常重要是，必须把使馆的有关情况，以及德方有关疏散苏联人员的条件等通知给莫斯科。德国的条件是交换相同数量的人员，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帝国政府最近几个月从苏联召回大部分工作人员及全部家属之后，在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多人。而我们在德国的人数有一千左右。斯大林担心引起希特勒的怀疑，下令禁止削减驻德国的工作人员。不但如此，直到最后一天，都有新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抵达大使馆。现在，按照德国人的方式，我们仅有一百人可以交换，其余九百多苏联人应该留在德国。非常重要是警告莫斯科，在交换的问题圆满解决之前扣住德国大使馆的人。我们试图发电报，但没有成功。当时的外交代表机构还没有使用无线电通讯。

杰卡诺佐夫大使对这个局面非常着急，他认为有必要讨论可能的行动方案。六月二十四日，他将武官图比科夫将军、大使馆随员克罗特科夫——他接替了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情报负责人柯布罗夫——以及我这个惟一的可以进场进城并且与德国外交部谈判的外交官等三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大使开始说，“有没有可能让某人悄悄地溜到使馆外边去？那样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地下组织成员取得联系，

并且通过他们通报莫斯科。”“我的人，”图比科夫汇报说，“仔细核实检查了这种可能。整个使馆区都被封锁了。晚上哨兵巡逻时带着狗。”

“那么，别列什科夫试一试甩掉海因曼？”

“海因曼跟我寸步不离。”我说。

“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海因曼？”

“总体上我跟他的关系十分有分寸。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稳重的人，而不是年轻的党卫军狂热分子。”

“能不能试探他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着手？”

我提议在使馆内安排一次我跟海因曼的午餐或者晚餐。这个主意获得了支持。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克罗特科夫这时加入了谈话，“只有我跟朋友们保持联系。他们跟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发生接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此外，你们大家知道，他们的无线电发射机坏了。日前，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一个新的。可是怎么才能转交出去呢？这是眼下最要紧的任务。”

“因此说，”杰卡诺佐夫总结道，“不论什么样的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安排克罗特科夫与朋友见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是不能原谅的……”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根本不是什么花钱收买的谍报员。经验丰富的苏联情报人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罗特科夫联络的朋友们，是坚定不移的反法西斯斗士。包括大约两百人的地下

组织在数年期间认为，自己有爱国主义义务把有价值的绝密情报转交给苏联，把苏联看作可以对抗希特勒奴役各国人民企图的一支力量。领导这个组织的舒尔茨一伯曾和哈尔纳克可以接触当时最重要的国家机密。

空军上尉哈罗·舒尔茨一伯曾，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军官世家，跟梯尔比茨元帅是近亲。舒尔茨一伯曾受到希特勒最高指挥当局的完全信任。但是，在大学时代，他跟左派组织和德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三十年代初，他一度编辑过一份反法西斯青年杂志。希特勒上台之后，冲锋队洗劫了编辑部，而舒尔茨一伯曾也被投入监狱。身居高位的亲戚们出面干涉，将他弄出监狱，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当作“幼年的错误”一笔勾销。

但是，出狱之后，舒尔茨一伯曾并未中止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明白，现在他必须改变方法。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并且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这种关系。同时，他跟帝国元帅戈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青年军官给戈林元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戈林甚至在舒尔茨一伯曾的婚礼上充当了男宾相，这样，使他不再受任何怀疑。“第三帝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赏识为舒尔茨一伯曾进入航空部创造了条件，在航空部他负责情报司。但是，仕途的顺利并未冲昏他的头脑，没有让他偏离主要目标——推翻纳粹制度。舒尔茨一伯曾领导的组织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继续工作。

另外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斗士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是哲学和

法学博士，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在柏林建立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小组的网络。他在讲座和讨论会上，号召与苏联保持友谊，并且警告德国人民所面临的法西斯威胁。纳粹上台之后，他领导的组织转入地下。为了保密，哈尔纳克加入了国社党，并在经济部就职，在那里很快就作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跟舒尔茨一伯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将两个组织合而为一。由于有机会接触绝密的军事经济情报，舒尔茨一伯曾和哈尔纳克得出结论，即不久的将来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已经不可避免。在就此警告莫斯科（斯大林同样也不愿意相信这些）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在战争开始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联系。所以，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替换出了故障的发报机。

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是比较少见的那种爱说话的人。我们认识的第二天，我就已经知道了，他有一个患病的妻子，哥哥在帝国办公厅警卫处任职，儿子埃里赫马上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然后就得上前线。海因曼说，他请哥哥想办法把儿子安排在后方，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党卫军军官，并且是看守布尔什维克的警卫队长，在与苏联交战期间跟苏联外交官说这种话，令人十分警觉。他是否想挑起我谈及隐私？也可能，在内心深处他对我们并无敌意，并且愿意帮助我们？无论如何，有必要仔细观察这个人。在跟杰卡诺佐夫商议之后，我决定试着跟海因曼建立“友谊”。

有一天傍晚，海因曼巡视完哨位之后，走进使馆询问，我们要不要给外交部转交什么，我请他进来稍事休息，喝一杯。我们在客

厅里一张玻璃矮桌前的软椅上落了座。

“您愿不愿意简单吃点东西？”两杯伏特加过后，我对客人说，“一天下来您可能累了，况且午饭之后已经很长时间了……”

海因曼起先谢绝了，称这在值班时是不允许的。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们谈话的内容相当坦诚。几杯酒下肚之后，海因曼开始说，根据他哥哥掌握的情况，帝国办公厅对德军在苏联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抵抗感到担忧。在许多地方，苏军战士拼到最后一发子弹，然后会进行肉搏战。这场战争期间，德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见如此的抵抗，也从未有过如此的损失。

“在帝国办公厅内部，”海因曼说，“有人甚至怀疑，是否值得与苏联开战。”这已经像是反对派了，我绝对没有料到党卫军官会这样说。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2)

-----

由于对海因曼没有信心，我没有做声，听着他说。只是当他再次说起自己儿子的时候，我说，这场战争本来完全不会发生并且那

样不仅他的儿子埃里赫是安全的，许多德国和俄国人都可以保住生命。

“您说得太对了，”海因曼感叹道，“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我邀请海因曼吃早点。他没有多余的客气立即同意了。对我而言，非常要紧的是弄清楚，他对我们能有多大的用场。我想着，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个话题，一旦他的反应是否定的话，可以把一切都当作一句玩笑话。首先我自问，是什么东西会促使他帮助我们？如果说，尽管他属于党卫军，并且是军官，但并不是铁杆纳粹分子，为希特勒效劳也是情势所迫，那么就可以利用他对战争的否定态度以及对儿子的担忧。譬如，可以许诺，一旦埃里赫被俘，对他进行加以关照。如果海因曼是个无耻之徒，仅仅想给我们帮忙，自己挣些外快的话，这也没有问题。可是，万一他试图挑动我们“收买”党卫军军官，然后交给盖世太保？但是，他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也可能有一种选择诱惑着他：那边更合算，给得更多些？但是我想，杰卡诺佐夫不会讨价还价的。

在约定的时间，海因曼到了。他在评论了一番前线的新闻之后，又一次涉及到对他而言十分迫切的话题——自己的儿子。

“最近，”他说道，“埃里赫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了。并且，按照德国现在的习惯做法，我得自己掏钱为他定做军礼服和武器。再加上妻子的病，所有的积蓄差不多都要花光了……”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购买军礼服和武器的这种习惯做法，但是，海因曼说起了钱，这看起来像是朝着我们感兴趣的方向走了一

步。我决定利用这一点。

“我非常乐意帮您一个忙，”我漫不经心地说，“我在德国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攒钱准备买大件东西。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这些钱始终是没用啦。除了一只手提箱和个人物品，以及一点零花钱之外，当局不允许我们带走任何东西。我真不好意思这样说，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一千马克……”

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1940 年我每次从埃森来柏林商务代表处时住的那家包膳食的小旅馆，一间大客房，公用卫生间，每天仅要五个马克。

海因曼开始思前想后，仔细地看了看我，很长时间没说话。毫无疑问，他在盘算，接着下去是否太冒险了。我若无其事地呷着咖啡。最终海因曼说道：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可是我怎么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拿您这么一大笔钱？这不行……”

“您看着办吧。我给您说过了，这些钱始终是没用的了。不允许带出境。贵国政府将会连同使馆里的其他钱一起没收。对第三帝国来说，什么一千马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对您这是有用场的。不过，您自己拿主意吧，谁拿到这笔钱，我都无所谓……”我给他加了点咖啡，酒杯里斟满了酒。海因曼点了一枝烟，仰靠在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可以感觉到他内心里的斗争。

“好吧，那么我同意了。”他终于说道，“但是您知道，任何人都不要知道这件事！”

“别担心。这是我的私人储蓄。没有人知道，我有这些钱。我把钱给您，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掏出皮夹子，数出一千马克，把钱放在桌子上。海因曼慢慢地伸手过去拿。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大皮夹子，然后将票子一张一张拂平之后，装到一个夹层里去，最后将皮夹子装回口袋之后，沉重地喘了一口气。

就这样，事情有了转机。

海因曼说：

“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如果您什么地方能够用得着我，我将非常乐意效劳……”

当时，可以立即利用这个机会，但是，我考虑之后，决定今天到此为止。现在，最好就这样了。

“我没有什么事，”我回答道，“不过是您让我有好感，所以我非常乐意帮您。对我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反正这些钱我自己也没法用。”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当海因曼告辞时，我邀请他白天来，一起吃午饭。

根据杰卡诺佐夫的指示，使馆的厨师拉科莫夫为我们准备了一顿极其讲究的午餐。有鱼子酱，招待贵宾储备的鲑鱼肉，牛肉清汤，基辅肉饼，冰激凌，咖啡，当然还有伏特加，格鲁吉亚葡萄酒，亚美尼亚白兰地，烈性甜酒等等。拉科莫夫穿上燕尾服和蝴蝶结，为我们服务。

海因曼到之前，一切已经准备妥当：我可以好好招待他，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我们此前跟杰卡诺佐夫和克罗特科夫预先已经商议好了，拟定了行动的步骤。吃甜点的时候，海因曼回到了早晨的话题，再次提出愿意帮任何忙，我回答说：

“这样的，海因曼先生，我给您说过了，我自己没有什么事。但是，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办一件事。这纯属个人私事，所以我都没有答应，先要跟您谈一谈。当然，他对我们的关系一无所知。”我安慰海因曼说。

“是什么事？”海因曼问道，“也许，我们一起想一想，怎么帮你的朋友？”

“他跟一个德国姑娘很要好，可是战争突然开始了，他甚至来不及跟姑娘告别。他非常想出使馆哪怕一个小时，好见她最后一面。这不，您也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许今后再也见不着了。这样，他求我帮忙。可是我们被严禁离开大使馆的。看来，要让他失望了……”

“我得想一想，”海因曼不同意，“我觉得，这事情并非没有办法……”

拉科莫夫送来了雪茄盒子。点上烟之后，海因曼陷入沉思。长时间没说话。然后，似乎在高声推论，说道：

“我手下守卫使馆的人知道，如果需要去外交部的话，我跟你一起出去。他们甚至已经习惯了我跟你一起出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般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您的朋友安排在后座，出使馆进城，然后

在什么地方把他放下车，他们未必会注意到。过一个小时，我们在约定的地点接上他，然后回到大使馆。大概，这个办法是完全可行的。您看呢？”为了保险起见，我开始对他说，为根本不认识人的私事而冒险根本没有意义，并且我的朋友也会忍受跟自己的姑娘没有道别的分离之苦。但是，海因曼则更加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方案。我稍微固执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行动的细节。“如果各个方面都考虑周到的话，”海因曼劝我说，“那么行动会很顺利的。”当然，我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即党卫军军官不会欺骗我们，并且他真的愿意帮助我们。告别时，我说，依然在疑虑，是否值得实施他的建议。但无论如何都请他晚上来一趟。海因曼走后，我们开始商议。最后决定了，必须冒险。无论把发报机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多么重要，第一次出去都不能带它。必须确定海因曼是可靠的。不管怎么说，萨沙·克罗特科夫是空手出去，所以，即便他被抓住，他可以讲那个姑娘的故事。最多由礼宾司提出抗议。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确定，没有人跟踪萨沙。最后，从战争已开始，朋友们那儿没有过任何消息。应该首先核实，他们那里一切正常，这点也很重要。当然，第二次出不去的风险也是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决定暂时不扯上发报机。

海因曼像往常一样，准时到了。我跟克罗特科夫一起等着他。

“介绍一下，这是萨沙。我给您说过的……”

他们握手问好，然后海因曼说：

“那么是您被我们的姑娘给迷住了？好吧，我会尽力帮您的。”

我们在桌旁坐定。海因曼心情很好。开了许多玩笑，谈起了自己的儿子，以及战前他们一起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度假，在那儿玩得很开心。他时不时开开萨沙的玩笑，一边回忆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法国被俘之后，爱上了一个法国女郎，可后来不得不离开她。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3)  
-----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海因曼说，“但非常理解，能再次见到这个姑娘对您有多么重要……”

我们约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海因曼巡视完岗哨之后，进行这个计划好的行动。

“我想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党卫军军官主动说，“别用你们那辆大型苏联汽车。最好是我们开一辆小型德国车去。这样将会不太显眼。”

这个建议非常有道理。真的，我们的“基斯-101”往往非常引人注目。我决定使用使馆车库里的一辆“欧宝”。开这辆车在柏林的大街上没人会注意我们的。海因曼说，他要跟外交部联系，弄清楚早

晨是否要召我去外交部。这一切都像是准备一个平平常常的野餐会一样。也许，海因曼真的相信了萨沙女朋友的故事？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他做出样子，帮助情人约会。

但是，我们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我们很晚才跟海因曼告别，依然没有完全的把握，他明天会怎样以及明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约定时间，海因曼没来。这让我们警觉。如果他欺骗了我们并且盖世太保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怎么办？整整三个小时里，我们内心的紧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下午两点，门铃响了。这是海因曼。他为自己迟到道歉：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得不叫医生来，所以他也得呆在家里。不过他已经跟外交部商定：今天因为他的私事不要安排任何会见。这样，我们可以稳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们进入了接待室。萨沙用冰镇伏特加招待海因曼的时候，我将沙土色的“欧宝—奥林匹亚”开出车库，开到大门口。海因曼非常艰难地坐上了我身边的前座。带着银鞘的长军刀十分碍事。最终，他卸下了扣子，将军刀扔到后座上，萨沙已经坐在那儿了。大门开了。海因曼向党卫军举手行礼，然后我们驶上了林登大街。我看了看后视镜，确定没有尾巴跟着我们。

前几天，我们只去外交部。为了不引起怀疑，现在，没走到勃兰登堡门，我便朝左拐，然后沿着维里海姆大街走了几个街区。柏林的大街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那是个阴天，但温暖而干燥。橱窗玻璃闪闪发亮，行人不紧不满地走着路，街角到处在卖鲜花，老妇

人们在遛狗——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但与此同时，几天来前方一直在激战的情况，给看上去似乎一片和平景象的柏林打上了印记。

我们已经预先约好，在一家大百货商店前把萨沙放下车。那里很容易在人群之中消失。更何况附近就是地铁。两小时之后，我们应该在一个地铁站会合。

车子刚停下，我们的乘客很快下了车，立即消失在大量的行人之中。我们继续望前走，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兜了许多圈。然后，沿着夏洛登堡大街开向著名的广播塔。这是柏林人最喜爱的晚上散步的地方，白天这里空空荡荡，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消磨时间。我们先在广播塔下的公园里散了会儿步。然后坐在露天咖啡馆的凉棚下。海因曼说，现在他想招待我，于是叫了两杯柏林啤酒。在车里他一直都没说话——显然，他神经不安。现在，他的口才又表现出来了，所以他不停地讲述自己中学时代各种有趣的事。我漫不经心地听他说，一边想着，萨沙那里是否一切都顺利。

最后，出发去约定地点的时间到了。接近地铁站时，我远远地看见了萨沙。他站在橱窗旁边，似乎被那里的商品牢牢吸引住了。但是，他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我们。当我刹住车之后，萨沙走到人行道旁，自然地向我们招了招手，然后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不慌不忙地上了车。在旁人看来，这完全是朋友的偶遇。在后座坐下时，萨沙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心中一紧——这意味着，他大功告成了。

“姑娘好吗？”海因曼问道。

“一切都很好，非常感谢您。她见到我之后，是那么高兴……”

海因曼开始说一些双关语的玩笑话，但我们并未注意听。在街上转了一会之后，我将车开到使馆门口，按了一下喇叭。大门打开了。进入内院之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使馆里已经备好了三人的晚餐。我们想尽快把海因曼打发走，但不得不跟他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听着他没完没了的故事。神经紧张之后的放松终究起了作用：我们感到冷漠。

送走海因曼之后，我们跟这次行动有关的人讨论了结果。萨沙报告说，朋友们一切正常。他通知了他们，无线电发报机已经收到，并且我们争取在最近把它送出去。那时就可以给莫斯科传递信息了。

就这样，事情的一半已经做了。现在，需要完成最主要的任务——将无线电发报机送给朋友们。

次日，我跟萨沙一起招待海因曼吃早餐。他告诉了从哥哥那里听来的最新战报。这些情况跟德国报纸上刊登的喜讯完全不同。苏联部队在顽强抵抗。德军的损失大大超出了预计。所有这些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引起了强烈的不安。然后，我们谈到了昨天的出行。海因曼半开玩笑地问，萨沙想不想再见一次自己的女友。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想了，”萨沙说，“可是我不不好意思再次麻烦您……”

海因曼表示，虽然这有一定的风险，但也许还可以再来一次。

“既然您同意，”萨沙对他说，“那么这次我想多呆一些时间，三

个或者四个小时。并且给她带一些小礼物.....

“我发现，您就跟法国人讲的那样，饭时胃口来，”海因曼开了一句玩笑。“但我能理解您。明天是星期天，外交部关门。不会召见的，所以整整一天是我们的。那么我们十点左右出发，午饭前回来吧。”

海因曼的无所顾忌使我有些吃惊。要知道，这里也会有问题：既然外交部关门，那么我们离开使馆去哪里呢？显然，他认为，自己的士兵并没有讨论的习惯，会认为，既然长官出去了，那就是应该的。经过考虑，我决定不提醒他，因为如果这次出行拖延的话，也许不再会有第二次机会。

第二天早晨，在约定的时间，“欧宝”已经停在大门内侧。海因曼提前十分钟到了。跟他打招呼时，我发现今天他没有带大军刀。军装上扎了一条宽皮带，上面系着手枪皮套，“瓦尔特”的枪柄闪着暗光。我立即觉得不对头。此前的怀疑又出现了。应该说，海因曼原来也一直带着枪，可能他装在裤袋里，反正我从来没看见过。现在，这枪就在外面，他可以很方便地拿出来。如果海因曼决定将我们在“犯罪现场”抓获，怎么办？我们刚刚驶出大门，将“瓦尔特”顶到我的太阳穴上命令我开往盖世太保的总部？我们的箱子里可是有一台发报机的。

我快速扫了萨沙一眼。显然，他也产生了怀疑。应该试探海因曼。也许，他会露出点马脚？

“您今天怎么没有大军刀？这军刀带着很威风的。”我勉强挤出

一丝笑容。

海因曼随口答道：

“您知道，大军刀在这小小的欧宝里碍手碍脚的。我知道我们今天开这辆车，所以决定把它放在家里。按照条例，如果不带大军刀，腰带上必须带枪.....”

这听起来近乎清理，稍微使我们感到放心。那箱子怎么办？夹层里暗藏着发报机，上面是各种“小礼物”乌克兰刺绣衬衣，手槌，绣花边，套人等等。萨沙将箱子扔在后座之后，似乎随随便便地说道：

“这是给我女友的礼物，一些小东西.....”

海因曼仔细地看了看箱子，没有说话，但最终还是上了车。

我在盘算，这时，他会说：“给我看看，拿什么东西讨女朋友高兴？”或者，更糟的是，把手伸进箱子，扎进挨得很紧的夹层里。我的脊背开始出冷汗，马上就要全完了。

我双腿发软，绕着车子走了一圈，打开车门，请海因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稍微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听话上了车。

“好啦！”他一边坐好，一边说，“整整一箱子礼物。您的姑娘会高兴的.....”

-----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4)

-----

过去啦！但嘴里终究很长时间留有不愉快的余味。

我们出了大门，转向乌兰大街的地铁站。那里一般人比较多。而三个半小时之后，在另外一个地铁会合。我刹住车。萨沙故意轻松地拿起了沉沉的箱子，消失在地铁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于是决定开上环线。后来把车停在森林里。天气非常好。云彩在天空慢慢地漂浮着，这个平和的、安定的景象再次在心中引起抗议。那里，远在东方，正在进行血战，乡村在燃烧，我们的人在牺牲，而我却在这里，在阳光照得暖洋洋、到处青草芬芳的树林里跟党卫军的冲锋队长一起散步！

后来我们回到了城里。海因曼提议找个地方吃东西。我们将车泊在一家饭店的附近，走过玻璃转门，进入宽敞的大厅，开始寻找空位子。

突然传来一声喊：

“哎，海因曼，过来呀！”

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着六个党卫军军官。桌上摆满了啤酒杯。毫无疑问，这些人跟海因曼很熟。军官们招着手，请他入座。怎么办？我们无法走开。但是，如果被发现，被扣留的苏联外交官在柏林到处乱跑，这将会是一桩大丑闻。

这时，我听见海因曼急促地低声说：

“我介绍您是慕尼黑来的我妻子的亲戚。您在一家军工厂工作，所以不谈自己的事情。您的名字叫库尔特·休斯科尔。小心些……”

我们走近桌子，军官们有的站起来，有的欠了欠身子，用“嗨，希特勒！”来欢迎我们。海因曼声音洪亮地回答了他们，而我则嘟囔了一句什么……

海因曼介绍过我之后，我们分别坐下，给所有人叫了一杯啤酒。谈话的题目当然是苏德前线的战事，以及英国空军最近恢复的对柏林的空袭。我有绝对把握，在柏林工作这段时间内，语言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会让我露馅，但依然非常感激海因曼关于我在慕尼黑军工厂工作的杜撰。这使我更多时间不说话。无论如何，没有人发现我不是那个自己冒充的人。

海因曼看了看表。我们该走了。但他的朋友们却不愿放他走。我们迟了半个小时才得以脱身，我不得不开着这辆小小的“欧宝”，尽最大努力赶往会面的地点。

萨沙等着我们，当然已经是神经十分紧张了。坐进车子里之后，他像上次一样，紧紧地握了握我的肩膀，我非常高兴一切正常。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海因曼带着自己一队党卫军将疏散的苏联人护送到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但我是1941年7月2日最后见到了他，那天我们撤离了柏林。早餐时，海因曼给了我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留言。

“也许，”告别时，他对我说，“将来某个时候，我会被迫提起我曾经给苏联大使馆提供过帮助。希望这一点不会被忘记。”

原来，他早已经猜到了，问题不在萨沙女友身上，而有更重要的事情。

战争最初几年，舒尔茨一伯曾和哈尔纳克领导的地下反法西斯组织给莫斯科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既涉及德国后方的状况，也涉及到德国的军事计划。这些密电的内容关涉战略物资的储备，飞机和新式武器的生产等等。在传送有关德军伤亡情况、德军计划中的进攻、向苏联后方投送袭击分队等等极其重要的情报时，对于身处法西斯压迫之下的德国人民而言，反法西斯战士履行了自己的爱国义务。至于苏联军事部门是否有效利用了这些情报，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转交的发报机拯救了我国前线和后方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德国情报部门费尽力气，侦破了这个被希特勒分子称为“红色合唱团”的组织。1942年8月底9月初，该组织成员在柏林的一个监狱被处死。当刽子手将绞索套到哈尔纳克的颈上时，他高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感到后悔。舒尔茨一伯曾在自己的遗书中写到，他终生都是根据理智、心灵和信念而行动的。

回想起这些坚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良心纯净的人们，就不能不想起战后历史。有多少像他们那样的人，为了光明的理想而献身！战胜法西斯之后，这些牺牲似乎没有白费。在德国的土地上，产生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宣布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我这一代人相信这个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尤其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能够达到的，但是，强加给我们的模式却是站

不住脚的。强制推行的努力导致了巨大的牺牲和震撼整个东欧的大动乱。而曾几何时，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骄傲”的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彻底消亡了……

回到莫斯科之后，萨沙，也就是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克罗特科夫高升了。我很少见到他。1943 年，我们在德黑兰相遇，他当时属于“三巨头”的安全人员。此后，在 1954 年印度支那日内瓦会议上见过他一次。多年来，克罗特科夫在东德一直身居高位。五十年代末，他猝死在莫斯科的一个网球场上。

-----

回归故土(1)

-----

1941 年 7 月，我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人员一起撤离德国，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被任命为负责处理外交，财务，人事等工作的副外长助理。

一架“道格拉斯”停在安卡拉机场低矮的候机楼前的水泥机坪上。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和土耳其外交部礼宾司的代表来为我们送行。虽然是清晨，太阳已经很热。晴朗的深蓝色天空像天幕一样，罩住了长满了黄色青草的一片平原。凝重的空气预示着

这一天将酷热无风。身穿空军军服的机长伫立在飞机舷梯旁边。

被送的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驻柏林苏联大使馆负责人员。不过，当时苏联驻柏林侨民区具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并不多：两个参赞，一个一等秘书，四个随员，一个领事，海军武官及其第一副手。还有，商务代表和他的副手也算是外交官。使馆的事务人员也不多。战争开始之前，大约一半的外交官正在休假。早在五月份，海军武官沃龙措夫和参赞科布罗夫携家人回到了莫斯科。他们知道纳粹的入侵不可避免，所以决定提前离开柏林。杰卡诺佐夫也将自己的家人送回了莫斯科。

阿尔马雅克·科布罗夫参赞，贝利亚的第一副手伯格丹·科布罗夫的弟弟，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国机构的负责人。从外形上看，他跟伯格丹恰好相反——伯格丹的长相令人厌恶、丑陋、低矮、肥胖，令人恐怖，恶心。而阿尔马雅克则身材高大、挺拔，一头黑发修剪得十分齐整，是个高加索美男子，非常和气，甚至富有魅力——他是我们这个团体的灵魂，很好地扮演了憨厚的席间提调，以至于很少人能够猜到他的真实身份。当时，谁也没能料到，这个快乐汉子的仕途将如何结束。斯大林死后，1953 年底在贝利亚一案中，他和哥哥伯格丹以及杰卡诺佐夫等人被审判后枪毙。

我们在斯维列格勒越过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而德国外交官从亚美尼亚抵达土耳其之后，大使已经没有必要庇护苏联人员。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馆负责这件事，很快苏联轮船“斯瓦聂地亚”到了，全体人员乘船沿着中立国土耳其的水域出发前往巴图米。我

们这一小批外交官，其中除了大使之外，还有参赞谢苗诺夫，武官图比科夫将军，使馆随员克罗特基赫，我和我妻子等一起乘夜间快车前往安卡拉。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架专机已经在安卡拉机场等着接我们。只是由于安排第二天早晨起飞，所以有了一整天空闲时间。

杰卡诺佐夫，当时还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跟苏联驻土耳其大使一起，带着谢苗诺夫前去拜见土耳其外长。而我跟佳丽雅，图比科夫将军和克罗特基赫决定到城里逛一逛。

安卡拉就像一个大村庄，特别是与宏伟的伊斯坦布尔相比的话，那里的一切都在述说着奥斯曼帝国的富裕和排场。这里的街道尘土飞扬，无人打扫。在首都的主要干道上——阿塔赳克路——长着枯萎的小树。但是，在咖啡馆里，招待我们的是芬芳的土耳其咖啡，美味的甜食，果仁夹心酥糖，每杯咖啡另外给一小杯冰水。

这是革命后按照领袖凯末尔·阿塔赳克的意志新建的年轻城市。我们在这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名胜，如果不算那些异国情调、色彩鲜艳的小店，以及手工艺人的店铺的话。由于我们每个人除了希特勒分子允许携带的一个小手提箱之外，其他东西被迫扔在柏林，于是决定买一些必需品。在当时买到的东西中，保暖内衣和衬衣在战争期间都派上了用场。

跟送行的人们告别之后，我们登上了飞机。沿途只着陆了一次，已经在苏联境内，在列宁纳卡。山峰之间的谷地原来是一片沙漠。跑道则是安放在草土上的金属网。

下了飞机，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哨所。从那儿几个人朝我们这边

赶来。这是当地的领导。他们得到通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即将到达，所以他们想安排一个像样些的迎接。他们用藤编的篮子，带来了整整一只烤乳羊，大饼，一大堆亚美尼亚干红葡萄酒，蔬菜，水果，东方式甜点。就在飞机旁边的草地上铺上了餐桌布，然后开始了招待。

甚至都没有人提到战争。从入侵之时到现在过了不到一个月，在这个远离前线的地方，似乎没有感受到特别的惊扰。显然，领袖关于我们将在侵略者自己的土地上打击侵略者的许诺还在意识中起作用。由于不掌握前线事态发展的情况，所有的人都等待着，红军在击退敌军之后，将攻入德国境内，德国的工农则会调转枪口对付纳粹，战争以我们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在格鲁吉亚首府，我们也受到了隆重欢迎。杰卡诺佐夫调到莫斯科之后，在这里保留了一套房子，他回了家，而我们其他人则住在了“第比利斯”饭店里。我们所住的豪华客房里吊灯地毯镜子大阳台等一应设施齐备，令人想起革命之前第比利斯的奢华场面。当时实力雄厚的法国资本致力于城市主干道的建设和装饰，现在这条街被命名为邵特·鲁斯塔维里。玻璃高顶的餐厅里响着音乐，客人很多，十分吵杂。晚饭之后，我们从阳台上观察着衣着讲究的人，基本上是男人，沿着明亮的大街缓缓散步，街两边是高大、枝叶丰满的法国梧桐。这里，战争给这个南方城市无忧无虑的气氛还没有打上不祥的印记。

次日清晨，我们飞往莫斯科。现在增加了杰卡诺佐夫一家：他

的妻子诺拉·提格拉诺夫娜，和两个孩子——娜娜和列吉克。在罗斯托夫的短暂停留之后，我们沿着伏尔加河继续往前飞，因为担心在乌克兰南部积极活动的德军空军，在古比雪夫地区转向西部，绕着一个大弯。当天下午，在莫斯科的屋顶上盘旋数圈之后，我们降落在列宁格勒大街的中央机场。

首都都在一个温暖、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接了我们。发动机停车之后，我们下了飞机，来到停机坪的绿草地上，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周围的寂静似乎是欺人的。所有这些时间里，我都在想着我国跟奸诈的强敌正在进行酷战。可是，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这种祥和令人吃惊。周围散发着热烘烘的三叶草的味道，云雀在天空自在地飞来飞去。不过，在列宁格勒大道上，却可以看见战争威胁的迹象。一座楼上悬挂的巨幅招贴画十分引人注目——一个俄国妇女表情严肃，高举起的手里是军人誓词，还有一句话：“祖国母亲在召唤！”我们的车子绕过了正在行进中的一队队不齐整的民兵队伍。一幢幢楼的正面描画着绿色与褐色的花纹奇异的图案，窗户玻璃上十字交叉贴着纸条。

就这样，在最初一刻里，莫斯科以严肃的战争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各回各家。而我再次遇上难题，因为已经不在外贸人民委员会部工作，所以不能指望在“大都会”饭店里的客房。杰卡诺佐夫要我们去铁匠桥，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阿拉赫维多夫那里等一等，他会替我们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

出乎我们的担心，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纳粹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之后，斯大林显然是想要讨好希特勒，跟这些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这些国家代表机构原来的房子都腾出来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街原来属于挪威使馆的一幢小楼成了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宿舍。那些战争刚开始就疏散回国，然后被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被临时安置在这里。阿拉赫维多夫将我们也带到了这里。

我们的房间里空荡荡的，但傍晚已经送来了两个折叠床，卧具，一张破破烂烂的写字台和两把椅子。我们这一层，在同样的几个房间里还住了好些人，只有一个洗漱间，所以早晨必须排队。不过我们两口子在莫斯科什么也没有，所以奥斯特罗夫斯基街的这幢小楼便很好地解决了我们的住房问题。我们在这里住到了1941年10月16日，当时德军攻入莫斯科西北郊，外交人民委员部紧急疏散到了古比雪夫。

第一夜，空袭警报就吵醒了我们。妇女和孩子们下到地下室。其余人上到屋顶扑灭燃烧弹。我军空防部队的高射炮火无法驱赶所有的敌机。有几架轰炸机冲进了市中心，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看得非常清楚。在尼基塔大门一带爆炸了一颗重型爆破弹。赫尔岑街上的一幢房子被夷为平地，提米里亚泽夫的纪念碑被炸成了两半。在我们这里投下了许多燃烧弹。其中有两颗就落在屋顶上，我的身旁。我用沙桶把它们扑灭。

-----  
回归故土(2)  
-----

早晨，杰卡诺佐夫叫我去上班，并告诉我，已经被任命为他的助理。他问道，我对此是什么意见。

“按照我的理解，副人民委员助理，是很高的职位。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工作。”我回答说。

“好，这值得夸奖。并且，柏林的时候您已经作过我的助理了。这里的工作要复杂些，但我相信，您是能够胜任的。祝工作顺利！”

我谢过他，并问了一下，自己具体的职责是什么。

“首先要熟悉国别及具体问题的材料，这些我的秘书主任马尔克洛娃和她的三个女助手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您必须在我每天上班之前，仔细阅读塔斯社的新闻简报，并替我挑出最重要的，审阅其他传给我的材料和电文，如果需要其他部门的补充材料，可以要这些材料并按照专题分类……”

杰卡诺佐夫接着说明了，归他负责的国家有伊朗，土耳其，阿富汗，蒙古，中国和德国的盟国。此外，他还负责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财务，包括外汇资金，人事和领事事务。所以说，问题不会少。

-----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1)  
-----

1941 年 9 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

当时，苏联的局面非常危急，纳粹军队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正在逼近莫斯科。而苏军被迫节节撤退。

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局势，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在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则是副主席并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二楼。紧挨着，在楼道的拐角处，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办公室，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苏英关系助理。当 1941 年 7 月底，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飞来莫斯科时，我也在列宁格勒大街中央机场迎接了他。不过，他跟斯大林的谈话是李维诺夫翻译的。两个月之后，由比维布鲁克爵士和阿维列·哈里曼率领的英美代表团到访时，这项工作才交给了我。

后来，哈里曼杜撰出来了关于我出现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则笑话：一开始，苏方翻译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译是查尔斯·波莱恩，美国驻苏使馆的三秘。由于他名字的谐音（俄语中的“生病”一词），

哈里曼每次带其他翻译来时，喜欢用俄语重复说，“波莱恩病了”。这总是会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译时出现了一些困难，于是波莱恩便开始帮他。斯大林不喜欢这个。他对莫洛托夫说：

“为什么美国人纠正我的翻译？这样不行。维亚切斯拉夫，那个翻译跟希特勒谈判的年轻人在哪里？叫他来帮帮我们。”

“可他是德语翻译……”

“没关系，我告诉他，他将翻译英语……”

就这样，我出现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并成为他的私人翻译。

据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惟一不能的是把男人变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尖刻地讽刺了“伟大领袖”的威严。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1941年9月末为欢迎比维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客人们集中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等着斯大林。终于，一扇高高的门打开了，但这并不是他，而是两个警卫军官。其中一人停在门口，另外一个则站在对面角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大概这里有特定的意义：“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现的时刻，以便使人们更加迫切。

丘吉尔回忆道：“斯大林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当他进入雅尔塔的会议厅时，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声令下，都站起来了，双手贴着裤缝线。”有一次，英国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来。可是，当斯大林

进来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从椅子上提了起来。

甚至在1959年，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就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发表讲话说：“对俄国而言，在面临巨大考验的年代有斯大林这样一个英明和坚定的领袖领导国家，实在是个大幸。”

门再次打开，斯大林进来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感觉到似乎受到了电击。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识之中早已形成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他个子中等偏低，十分消瘦，长着土色而疲倦的一张麻脸。军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条胳膊长，另一条胳膊短——手几乎整个藏在袖子里。难道这就是他？似乎他被偷换了！

从童年时代起，教育我们认识他是一个伟大而智慧，预见万事，无所不知的领袖。画像、青铜塑像、花岗岩石像以及节日游行中的巨幅画像里，我们习惯于看见他君临万众。于是，少年人的想象中描绘出了一个高大挺拔，几乎是神话般的人。原来，他是这个样子，不好看，甚至不显眼。但与此同时，他出现之后所有人都不做声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过招呼。他的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气无力。

当时，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希特勒军队已经深入苏联腹地，打到了列宁格勒，基辅，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进。被迫不断后撤的苏军部队往往连沙皇时期的火枪都没有。我曾经亲身参加过莫洛托夫与守卫莫斯科的一支部队指挥员的谈话。后者抱怨说，他手下五个民兵才有一枝步枪，所以请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熟悉情况，

他斩钉截铁地说：

“步枪没有，叫他们用瓶子打仗吧……”

就在当时，产生了声名远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装满混合燃液的瓶子。民兵战士藏在堑壕里等着坦克，然后，当坦克走到他头部位置时，跳起来将瓶子投进排气管。如果投进去的话，坦克马上就会起火，但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的枪口顶着打死这个大胆的人。就这样，数万民兵牺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许多的朋友。

惨败，大片领土失守，数百万人被俘及牺牲，尽管斯大林对人的生命十分鄙视，但这些不能不给他的面貌打下印记。但是，尤其使他苦恼的是另外一样东西：自己对临战局势估计的失误。他对所有的预警都没有理睬，因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会开战。前不久他还赞赏希特勒，而现在，则不能原谅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领袖”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这个奥地利上等兵把“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像个小孩子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斯大林无法忘记这种屈辱和经受过的恐惧，现在比从前变得更加多疑了。甚至在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大楼里，两名警卫与他形影不离。连他到莫洛托夫那儿每次也都带着这支护送队伍。

有时候，从人民委员的秘书处，拐过弯要走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从相反方向的那个角里，出现熟悉的警卫。每次这都使我感到慌张。不，那不是恐惧。我知道，这样的相遇对于我个人不会有什么。但是，总是出现难以抑制的下意识要躲藏起来。几秒钟之后，斯大林应该出现。思想在激烈地活动，怎么办？返回秘书处或者快

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门后？也许，藏在遮住朝内院的大窗户的窗帘之后？可是，如果斯大林发现，有人躲在这里，会把我当作罪犯，他会想着，我这是做贼心虚。因为，甚至当谈话的对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他都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谋反：“为什么您的眼睛东张西望？”这样一问之下往往可以决定对方的命运。

在心里掂量过各种办法，并且当我明白时间不再有时，我一般背靠墙等着。一行人缓缓走过。我精神饱满地说：“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作声，用手臂一个的细微动作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转弯过去。现在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不过什么也没有呀。可为何每次遇到这种情形都会如此紧张呢？

此外，每次，当领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者他的某个副手预先告诉我，说马上要跟美国人谈，而且要我作翻译时，也会出现神经紧张。但这里我有解释——马上要进入神殿了。于是神经高度紧张，想要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满意。

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洛托夫身边——作了外交人民委员苏美关系助理。那时的克里姆林宫对公众是关闭的。但我有一张通行证，“到处”可去，除了大楼上斯大林的那一翼。去那里每次都要办理通行证。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总是一种干练、安静的气氛。秘书处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一般在那里等待客人已经通过斯帕斯大门的信号，描着鲜艳花朵的黑色托盘上放着杯子和矿泉水，挨着墙是一排

简单的椅子。有些书作者现在断言，在领袖办公室门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莫洛托夫都要被搜身检查，说什么椅子底下安装了电子仪器，检查是否有人藏了武器。根本没有这回事。首先，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子系统，其次，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几乎四年时间里，从来没有被搜身，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检查。不过，在1941年底特别紧张的几个月里，由于担心城里有空降的德国特务，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手枪。譬如，我有一把小型的“瓦尔特”，很容易藏进口袋里。每天早晨六点左右下班的时候，我从保险柜里把枪拿出来，然后去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在那儿的地下室里可以稍事休息，对时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不加理睬。秋冬季节天亮得晚，街道还是一片漆黑。不过，常常会碰见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检查证件。可是当时也完全有可能遇见德国武装突袭队员。到克里姆林宫上班之后，应该将武器放进保险柜。但是，去见斯大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检查过，我是否这样作了或者有没有带武器。

-----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2)

-----

我观察斯大林，完全局限于译员这一特殊的工作性质。我见过

他跟外国人客在一起，扮演着殷勤好客主人的角色。当值班军官通知说，外国客人已经通过了斯帕斯大门，数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到达，这时，我穿过秘书处，那里一般坐着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警卫的房间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那里经常有几个人穿军装或者便服的人，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领袖的主要警卫员伏拉西克将军在打盹。他利用每分钟来打盹，因为昼夜都在“领袖”的身边。我不经通报进入办公室，一般都会碰见有人：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或者部长们。他们坐在长桌旁，手里拿着笔记本，而斯大林则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其时，他要么听人汇报，要么在谈自己的看法。我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该结束会议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会说：

“美国人马上就到。我们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纸笔，站起来，然后离开办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来。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他都在场，只是几乎不参与谈话，基本上不说话。有时，斯大林就某个具体问题会问道他，叫着他的名字“维亚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有人在场时严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应该承认，虽然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斯大林还是善于迷住谈话的对方。毫无疑问，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善于制造出富于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这么一种形象。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觉得苏联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所有的外国高级访客，都非常悲观。可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却充满

信心，认为苏联人民将继续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但实际上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敌人不可阻挡地向东部推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躲在防空洞里。那么，是什么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维布鲁克以及其他有经验的、抱着怀疑态度的政治家们改变了各自的观点？只有跟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局势看起来不可救药，但他善于营造一种随意、安详的气氛……

在永远都很安静的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克里姆林宫钟楼上自鸣钟的声音。“主人”本人则表现出善意待人，稳稳当当。使人觉得，这间屋子之外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惊扰他。他有许多时间，他甚至愿意谈一个通宵。他的谈话对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经采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桥梁和政府大楼下正在布雷，已经建立了首都地下党委，给其未来的工作人员已经发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证件，而让他们觉得无忧无虑的克宫“主人”心里正在盘算着政府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各种安排方案等等。战后有一次坦白心迹，他承认说，当时是绝境。可现在，他牢牢地将这些藏在亲切的微笑和给外人看的镇静后面。谈到红军和工业的需要时，斯大林说出的不仅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制造飞机的金属铝，还有各种企业的设备，整座整座的工厂。起先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组织生产需要数月，如果不是数年的话。

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们断言，苏联的抵抗在最近四五个星期之内就要崩溃。怎么可能谈得上建设新工厂？甚至给俄国人武器都太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落到德国人手里。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

厂，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西方民主国家里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庄严宁静的态度，以及他向霍普金斯的声明，即如果美国人运送金属铝过来的话，苏联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毫无疑问，斯大林更清楚真实情况！于是，霍普金斯，比维布鲁克，哈里曼向丘吉尔和罗斯福保证说，苏联会坚持下来，所以有必要给坚强的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斯大林假装有把握，但幸运的是，他是对的。同样的，当1941年12月下旬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参观完毕莫斯科近郊战线之后，他声明说：

“俄国人已经两次到过柏林，还会有第三次……”

死不悔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

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又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

“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 1937 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

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

与莫洛托夫共事(1)

-----

我从翻译的特殊角度亲眼观察到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莫洛托夫对自己的下属十分平和，这在当时“领袖”身边是很少

见的。

我多次观察到，每当自己的提议未获得斯大林的赞同时，莫洛托夫都神经紧张。他会接连几天阴沉着脸，十分易怒，所以这时候最好别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莫洛托夫从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维诺夫推行了自己“独立”的政策，他被解职之后这个政策便立即消失。当然，曾经有过许多细微差别，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处，我研究了过去多年期间的案卷，最后确信，李维诺夫每件小事都要征得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这样，有机会顺便与斯大林协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般来说，重要的文件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准备。相应的文件由具体负责某个问题或者国家的副委员签署，然后报告给人民委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最后拍板。当然，这里不排除他预先或者打电话，或者在别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都是独立承担责任。

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准备好的文件当然要传送给斯大林。一般很短时间之后，文件会被返回到人民委员的秘书处，蓝色粗铅笔大大地写着斯大林姓名的两个字母。在斯大林的桌上，跟粗大的文具并排放着一个青铜笔筒，里面总是有一把红蓝双色八棱大铅笔。他把

几枝铅笔拿在手里把玩，似乎在练习半麻痹的那只手。整个行政机构将毫无间断地将他的批示付诸实施。

最近几年里，官僚行政机构公然不执行政府的许多决定和总统令，这种情形每每令人惊异。在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形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建立的行政体系，除了信仰和一定的热情之外，基于三样东西：纪律，恐惧和奖励。不过，到四十年代之前，热情略有减退。但恐惧被强化了，铁的纪律得到了加强。同时，奖励体系更为健全——就在当地形成了上层的特权。失去“甜蜜生活”的前景，是完成领袖指示的相当重要刺激手段。但更起作用的是一种意识——从做出了次品的工人，在集体的田地里拾麦穗的农民，到部长甚至政治局委员，不执行“主人”的意志可能会赔上脑袋。所以，这个机制才运转正常。

过了半个世纪，改革的思想才冲破藩篱。而当时，五十年以前，领袖名字的缩写令所有的人战栗并顺从。有时候，文件未加批示被退了回来，不是蓝铅笔，而是用红铅笔划上十字：斯大林没有批准上报给他的文件。这样的严重事件使莫洛托夫感到震动。他非常艰难地承受了许多“失误”。我认为，那不是害怕可能的后果。因为当时莫洛托夫也许是“主人”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无论如何，他显然明白，如果类似的情形重复太多，会引起愤怒甚至怀疑：本来应该跟他有同样思维的人民委员几乎在斯大林的脚下暗中破坏。我想，莫洛托夫大概因此而难过：他掌握着同样的情况与情报，却得出了与“主人”意见不一致的结论。他当然想也不

敢想，自己是对的，而斯大林错了。当时，领袖周围的所有人都愿意无条件地承认其正确，有时甚至都不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可能是，他们真的相信斯大林。也可能是还记得，那些胆敢发表意见人最终的下场。

莫洛托夫对待自己的直接下属平和，冷淡而礼貌，几乎从未提高声音说话，并且从未用过粗话，而这一点当时在“领袖们”的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有时，如果某个年轻的外交官不能有条理地汇报驻在国的情况，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顿，前者会吓昏过去。那时，莫洛托夫用冷水喷这个可怜人，叫来警卫，把他抬出去到秘书处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在把他弄醒。不过，一般也就到此为止。闯祸的人惴惴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几天，然后返回自己的岗位，此后也往往会得到职务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某种宽容，因为这毕竟是缺乏经验的人，他自己亲自参与了挑选的过程，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这些人承担责任。任命不久之后再撤职，这样会被“主人”理解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工作中的严重不足。

不过，也有的时候，莫洛托夫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而强硬的措施。就这样，1939年8月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新任驻德国大使成了什克瓦尔措夫，此君以前是一家纺织研究所的所长，被区党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1940年11月，当莫洛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时，他首先召见了什克瓦尔措夫了解政治局势。可是后者的报告是那样的平庸，经过十分钟谈话之后，人民委员便叫他收

拾东西回家。过后不久，苏联驻德国大使被任命为杰卡诺佐夫，并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员一职。而尝到了国外生活甜头、苦于纺织行业平淡无味的什克瓦尔措夫，战争期间再三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国的危难时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经验”。这些便函当然直接进了垃圾箱。

如果由于行政系统造成的疏忽或者缺点，斯大林发出指示要求“惩办责任人”，那么就应该立即找到牺牲对象，甚至无须进行长时间调查。而那些引起领袖哪怕小小不满的人，则被无情地处置。

我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需要立即答复。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三天，美国方面什么也没有。莫洛托夫派我进行检查，看看电报是否在途中耽搁了。负责传递政府文件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密电司司长，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询，然后通报说，电报顺利到达了美方责任区的终点。接下来是美国人看管线路，由于从他们哪儿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所以应该认为，一切正常。不过我还是要求向美方问询。原来，在他们一方发生了故障，因此电报迟了两天才到华盛顿。考虑到战争时期，可能出现任何问题，于是我得出结论，没有发生事故。我这样向莫洛托夫作了汇报。“这是谁的错？”他严厉地问道。“显然，没有人出错，至少我方没有人出错……”“怎么是没有出错？那我给斯大林同志说什么？他非常不满意，下令调查并惩办责任人。可您却在跟我说，没有人出错。您这个臭知识分子！”我低头站着，无言以对。

“您干吗跟个木偶似的站着！”莫洛托夫怒气冲冲地喊道，“叫维辛斯基过来！”

我飞也似地逃出了办公室。

当时，维辛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但我们记得他是三十年代政治案件时期恶名远扬的总检察长。他可是能够找到责任人，我一边想，一边拨着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

维辛斯基很快就到了：二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秘书处。大家都知道，维辛斯基对下属十分粗鲁，让周围的人感到恐惧。但是，在上级领导面前却是极尽奴颜婢膝，巴结奉承之能事。甚至到人民委员的接待室他进来时像是谦虚的化身。显然，由于自己的孟什维克历史，维辛斯基特别害怕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后者甚至在众人面前骂他为“这个孟什维克分子”。虽然杰卡诺佐夫是第二副人民委员，而维辛斯基是第一副手，并且具体负责处理与英美的关系，可是经常可以看到，对我国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的问询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杰卡诺佐夫：交待任务写回电草稿，亲自签署批示电报，而给维辛斯基给一个副本，然后电报就发出去了。并且维辛斯基从来没有勇气提出抗议。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场时，维辛斯基更是异常恐惧。当这两个叫他去时，他进门时弯着身子，侧着身子，扎起淡黄色小胡子巴结地一笑。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跟着他进去。莫洛托夫要我把自己，就像他所说的，“毫无价值的调查”结果进行报告。这对维辛斯基是一个

特别的信号，即他应该拿出什么样的结果。当我再次说明，没有找出责任人之后，结束了汇报，莫洛托夫对维辛斯基说：

-----  
与莫洛托夫共事(2)  
-----

“斯大林同志要求进行调查并严惩责任人。这个任务交给您.....”

“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可以走了吗？”

莫洛托夫点了点头。我把自己的报告交给维辛斯基，他便无声地从办公室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这时平静地解释说：

“每次失误，一定责任人。电报传送只检查我们一方，那又怎么样！是谁立的这个规矩？应该检查线路全程。是谁制定了这个不完善的规程？可是您却说——没有责任人.....”

过了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密电司的司长被开除出党，丢了工作。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给的任务——找出并严惩责任人——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他经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

间来，他看见我半开的保险箱之后，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看看吧，这个臭知识分子心底外露，保险箱不上锁，桌子上乱七八糟，进来看看吧。哎呀，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啊！……”

-----  
苏波边境小站的故事  
-----

1934 年，我继续在“国旅”作导游。这年秋天，我被任命为苏联波兰边界一个小火车站“国旅”办事处的主任，为过往的外国旅客提供外币兑换，办理车票等服务。

到 1934 年秋天，外国游客明显减少了。来出差的外国人，也是由“国旅”提供服务，基本上都是苏联政府邀请来参加五年计划建设的实业界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帮助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美国人，这是第聂伯河上的第一个大坝，大型的水力发电站。我被指派陪同这样的一个团组。

我们下午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了扎波罗热。由于无法指望路上的正常饮食——餐车里仅仅供应淡茶加一块糖和大麦仁粥，国旅的餐厅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干粮”。一般里边有鱼子酱，螃蟹，火腿，奶酪，黄油，面包，煮鸡蛋，装潢十分漂亮的罐装果

酱，袋装茶叶和砂糖——商店里这些东西早就见不到了，可是，食品工业仍然在生产这些东西。我想，不可能说这些东西刚够给外国人享用。当然，国家高级领导人也享用这些食品。所以，生产出来的食品肯定要多得多。那么都到哪儿去了？当时，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实在是个谜。

由于在秋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基辅“国旅”的导游们各有各的办法。一些人去上进修班，另外一些人学习其他外语。也有人请假作笔译。我被任命为“国旅”舍别托夫卡分部的代理经理，它位于苏波边境，当时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从舍别托夫卡每周三次发运前往巴库的伊朗快车，乘客基本上是西方的商人，阿富汗羊羔皮商人，伊朗的石油工业家，贩卖地毯，鱼子酱的生意人等等。往来过境的有外交官，公司的代表，以及喜欢冒险的人。许多外国游客在苏联境内的旅行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波兰火车把一批批衣着光鲜的游客送到苏联边境。火车开进舍别托夫卡火车站月台的一侧。乘客在火车站大厅里经过边防和海关检查，之后走到对面的月台上，伊朗快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波兰车看起来非常的不体面：沙发座位早已经压坏，车窗玻璃很久没有清洗，车厢的油漆斑斑脱落。不过，服务人员却波兰小贵族似的衣着光鲜令人惊异：蓝色军服式上衣，大红腰带和武装带，带白鹰标记的波兰式四角制服帽，闪闪发亮的帽檐——这一切看起来十分堂皇。

我们的伊朗快车完全符合国际水准。它几乎全部由革命前比利

时造的卧车组成，外装饰仿红木，铜制，打得闪闪发亮的把手和拉丁字母的标记“卧车”。革命后最初几年，这类火车厢可以在国内线路上见到。车厢极其舒适：宽阔的双人包厢，带上下铺位。白天上铺放下来，成了沙发靠背。铺位上套着带长长流苏的淡蓝色套子。包厢里有一张折叠桌，和一张包着红缎子的椅子。黄铜把手、衣帽钩和架子赋予一种富贵漂亮的外形。每两个包厢之间有一个洗漱间，玻璃门是新艺术风格。里面有洗漱盆，布帘之后有淋浴，洗漱盆下面放着一个上釉描花的陶瓷夜壶。

“直达卧车”的列车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经过旧式训练的体面男性，态度殷勤、关心乘客与自尊心兼备。他们身穿褐色制服，带金质饰扣和镶条，戴同色的制服帽。他们煮出来的茶非常香甜爽口，一般用长条的薄面包干招待客人。火车到巴库路上走三天，每天早晨，列车员都要收拾床铺，清洁包厢，擦洗全部铜质的物件。快车上有一节食品饮料充足的餐车，服务员一个个更是彬彬有礼。整个车里能够感觉到井井有条，整整洁洁，纪律严明。这是从沙皇时期保留下来的训练有素，抑或是斯大林的铁道部长卡冈诺维奇的铁腕——只有猜测的份了。

我的任务，是迎接每一列波兰列车，给外国旅客提供方便，如果需要，办理用外汇支付的火车票，代办外币兑换——一句话，根据国旅的规章提供服务。我呆在边境的那段时间里，除了游客和商人之外，来自希特勒德国的难民越来越多——有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犹太人等等。他们通过各种办法越过德波边境，然后前往苏联

这个可靠的避难地。我接到指示帮助这些人，借给他们卢布，如果他们到的那一天没有快车的话，安排他们在舍别托夫卡过夜。我的办公室里有几个房间，这时就成了客房。有时也有老老少少一大家人，但大多数都是独自一人或者夫妇二人。晚上我请他们到我那儿坐或者去看望他们，我们一起谈到欧洲和德国的事情。虽然他们被迫抛弃家产，到我们这里时身无分文，但都很高兴，因为在苏联找到了第二个故乡。他们能想到，将来是什么样的遭遇吗？这个我无法料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最终被指控为间谍以及执行盖世太保的破坏任务，落到了集中营和监狱！ .....

十二月底，“国旅”舍别托夫卡分部的新任经理从莫斯科来了，于是我回到了基辅。我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下一节季节里将会有西班牙游客。城里依然闹饥荒，所以，“大陆”饭店的厨房在淡季发给我们的虽然伙食很少，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仍然是个帮助。食品卡——父亲的工作卡，母亲的供养卡和我的职员卡——仅仅能够买到最少和最必须的东西。不过，规定有的东西，在商店里一直都有。

-----

在白教堂迎新年(1)

-----

1935 年 1 月 1 日起，日常消费品的票证宣布取消，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直到 1940 年，大城市里的物资供应是正常的。事隔多年之后，我知道了真相。

新年快要到了，又一次无法好好过一回。但我跟我在工业学院的朋友安排得不错。他父亲是基辅附近一个古城白教堂市里面包厂的厂长——由于职务关系家境非常富裕。

面包厂厂长的儿子莫德斯特邀请来过 1935 年新年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俩共同的朋友，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格，他当时在基辅医学院上学。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都带上了各自的姑娘。莫德斯特的女友列娜在白教堂上过技校，她在那儿等着我们。格奥尔格邀请了尼娜，同校的女友，而我则邀请了克拉拉。共事几个月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和斯捷潘和他的女友一起，开着“林肯”到郊外兜风，一起去看戏，冬天一起去“迪纳摩”体育场溜冰。

1934 年 12 月 30 日中午，我们一帮人下了火车，走上了白教堂车站红砖大楼旁边的月台。天气寒冷，但晴朗，阳光灿烂。面包厂派了一辆三套雪橇来接我们。我们把东西扔在干草上，自己则坐在雪橇的两边。莫德斯特的家位于市区边上，面包厂旁边，路程相当远，所以乘雪橇一路走下来使我们非常开心。他家的房子周围的大花园里，高高的椴树结着薄霜。花园往下通向小河，园子里的一条林荫道成了滑雪橇的好地方。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这里玩。莫德斯特是一大家人。除了父亲，母亲，祖母之外，还有两

个妹妹，一个小弟弟。不过还是给客人腾出了两个房间。我跟格奥尔格住一间，另外一间里住了两个姑娘。

新年之前，全天都在准备年夜饭。姑娘们在厨房帮忙，我跟格奥尔格还有莫德斯特为炉子和壁炉劈木材，在河上凿冰，准备家常冰激凌。然后我们收拾长桌子，放好椅子。在我们来之前，莫德斯特的家人已经打扮好了新年松树。我们只剩下插接上烛台，给里边插上蜡烛。最后，派我们将吃的东西从厨房搬到桌子上。我绝对没有想到，面包厂厂长的工作还能够给人那些年代难以见到的如此的富裕。有烤乳猪，冻乳猪，火腿，各种各样的鱼，鱼子酱，鲑鱼，大篮子装的水果，甜酥糕，蛋糕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从黑市上弄来的，或者拿面粉、粮食、糖果等交换来的。饮料更是数不胜数！于是我又想，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还在继续生产着。可为何要藏在仓库里？

这两天我们既没有看报纸，也没有听广播。所以当莫德斯特的父亲下班回来告诉我们，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起取消所有的面包和其他票证，我们感到非常意外。据说所有商品都将敞开销售。一切都会十分充足。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种事。人民为购买最基本商品排大队而痛苦不堪。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很难想象，就可以直接走进商店，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1935 年的新年在莫德斯特家里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相互道贺，拥抱，接吻。虽然还不太相信好转，还是为了我们生活中的“新的光明阶段”而祝酒，当然也为斯大林干了杯，因为他像此前许诺的那

样，把我们带上了富裕之路。我们受的教育要感谢斯大林让我们拥有正常国家里人们应该拥有的一切。然后跑到花园里溜冰，点起了烟火，燃放了爆竹。然后又回到桌旁，喝香槟酒，跳舞。

这一夜始终也没能睡觉，况且元月一日是工作日，所以我跟克拉拉必须返回基辅。当我们快到六点的时候到达火车站时，面包店门口还排着队。我发生了怀疑，免票证是否会是个恶意的玩笑？

基辅的商店已经开门了，但旁边有许多人。乘着有轨电车在街道上走着，我发现，许多商店在饥荒年代里被封闭起来，最近几个月则搭着脚手架整修，现在橱窗都照亮了，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食品。有趣的是，排队持续了大约一周。顾客可以买任意数量的食品。起先人们成数公斤地购买香肠，奶酪，火腿，面包等等。但是，商店的存货却没有消耗殆尽。从仓库里不断地运来一批又一批新货。当人们终于相信，供应是稳定的之后，人群消退了。应该回家消化那些恐慌抢购来的东西。

此后，直到1940年，起码在大城市里，情况是正常的。战后过了几年，当1947年宣布了货币改革，并取消了票证制度时，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有最初一两周有排队现象。此后，由于食品不断补充，抢购潮消失了，于是商业恢复正常。农民重新获准饲养家畜，并扩大了房前自留地的面积。

在与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道，1935年和1947年的这种结果是如何达到的？当时，他不仅负责外贸，同时也主管内贸，所以十分清楚是怎么回事。“首先，”他解释说，“是厉行节约，同时扩大生

产，储备大量的食品和日用品。斯大林本人亲自过问，并严惩了玩忽职守的生产负责人。作了大量的工作把这些物资运送到目的地，修建了仓库和冷冻设备，保证了分送到商店的运输，尤其在一开始的高峰时期，当人们还没有相信市场稳定的时候。预先修整了商店，并装饰一新，动员售货员上专门的培训班。并且严厉警告商业工作人员，任何舞弊，隐瞒商品和投机倒把都会掉脑袋。最终不得不枪毙几个违法的人。但最主要的是，不能拖延供应，不要一点点放出来，而是一下子所有的工业中心全面抛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现在，我国某些研究者断言，当时仅仅供应了莫斯科和另外两个大城市。这是不正确的。1935 年夏天，我跟着旅游团到过许多城市。我专门进过许多商店，看看在卖什么。而最主要的是不要排队，也没有人专门到大城市来采购。

当然，当时有特殊的条件。当时有恐惧感和对那些违反商业条例的人进行残酷镇压。也可能采取措施限制外地人进城。但同时农村的情况也在改善。允许私人饲养大牲畜，鼓励经营自留地。而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在铁的纪律的压制之下，看不到别的出路，只有在公共土地上比从前干得更好些。

如果列举1935 年和1947 年间商店里出售的食品，饮料和商品，那么现在苏联人可能会不相信。木桶里放着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价格便宜。货架上摆着大块的鲑鱼肉和干鲑鱼，各种各样的牛肉大肉，火腿，乳猪，许多香肠品种的名字现在好多人叫不上来，奶

酪，水果，浆果——所有这些都不必排队，数量不限。甚至在地铁站里有店铺出售香肠，火腿，奶酪，做好的夹肉面包和各种菜肴。大烤盘上放着煎肉排和煎牛排。而在乡村，就像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热天里任何一家都会拿出一杯牛奶或者冰镇果汁，而且不愿要钱。

也许有人会说，那可是行政系统在运转啊！但是，这个系统仅仅是在强制和恐怖的压力下运转的。并且不应该忘记，在许许多多的集中营里，在种种非人的条件下，千百万被流放的人，像奴隶般劳动，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由这个强硬的调节体制来支配。

在一定额度内自有大牲畜，家禽和猪以及其他等措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1941至1945年艰难的战争饥饿年代过去之后，农民利用了这种机会，所以，虽然集体农庄的产品被国家拿得一干二净，始终还能有东西养家糊口，甚至还可以拿一些东西到城里来出售。这样，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城市里的供应水平得以维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直到后来赫鲁晓夫狂想要消灭城乡差别。

赫鲁晓夫断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能力供养全国居民，他首先砍掉了自留地，并要求大幅度削减个人饲养的牲畜。后来，又产生了荒谬绝伦的主意，要在农村修建城市类型的多层住宅，将农民从独门独院迁入楼房。就这样，许多农耕世家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再也没有可能饲养什么家禽家畜了。

这个冒进的结果很快便显现出来。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农产品

的产量开始大幅度削减。跟当局的盘算完全相反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营生之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并没有比以前干得更好。

-----  
在白教堂迎新年(2)  
-----

结果，他们无力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的食品供应，而自留地的产出急剧减少，在城市楼房里长大的农家子弟对土地没有感情，也没有学会照看牲畜的技能。长大之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逃进城市。农村人口迅速老化、减少。

毫不奇怪的是，农村居民在乡村衰败这个问题上与其说责难斯大林（因为，那些成年时期经受过强制集体化恐怖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不如说是在责难赫鲁晓夫，因为他剥夺了奶牛，使农村贫穷破产。

自从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什么集体化农业可以使苏联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美国，并且保障苏联居民富足的生活，并且像他肯定的那样，八十年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此后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注入了数百亿卢布的资金。成千上万台拖拉机，收割机拨给了集体农业。花费巨额资金开垦了大批荒地。结果如何呢？现在，我

们仍然被迫用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和其他食品，而在国内则被迫实行票证制度。

-----  
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1)  
-----

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装醉，演出了一场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闹剧。

所幸的是，这次冒险成功了。

除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外，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在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里还占了整整一层。那里也有人民委员的三间办公室：会议室里放着长条桌和几排椅子，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一般举行人数不多的会谈。然后是一间带小型洗漱间的所谓休息室。休息室内设有一张卧榻，可以在上面小睡，还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总是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南方的水果和一小碟核桃——这是莫洛托夫最喜欢吃的东西。新鲜水果每周几次用专机从高加索和中亚运来，并且不仅仅和平年代这样，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最艰难的时候，最基本的食品勉强能够维持军队，千百万苏联

人靠微薄的口粮吃得半饥半饱，克里姆林宫宴会和招待会上离奇的丰盛一直都使来莫斯科的外国人叹为观止。桌子几乎承受不了各种吃食和饮料的重量。红鱼子酱，黑鱼子酱，熏鲑鱼，淡水鲑鱼，鲟鱼，烤乳猪，乳绵羊和乳山羊，填馅火鸡，成堆的蔬菜和水果，成堆和烈性酒和各种葡萄酒，冰激凌蛋糕——按照斯大林的想法，所有这些应该使西方客人信服，我国的局势并不那么糟。

人民委员在铁匠桥的秘书处里，助理们的房间窗户朝着院子。这个房间跟后勤人员的房子挨着。每天早晨，经过我们门前，沿着走廊拿过去大暖瓶和食品篮子，这是预备着万一人民委员在这儿吃午饭。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也照此办理。在政府保卫部门特科的严密监视下，有专门的农场和肉联厂为高级领导人种植和加工专用食品。领导这件奥妙且被认为责任重大事情的，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主人”的大厨师伊格纳塔什维里。斯大林害怕有人投毒，因此千方百计地讨好他，最后给了他将军军衔。

在铁匠桥的那幢大楼里，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缝纫铺。人民委员的高级职员凭一种专门的票证可以在这里定做衣服。1942年，当时我已经作了莫洛托夫的助理，我领到了两张票，于是便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深褐色和一套细纹浅灰色。新衣服很快就作好了，一个春天的日子我穿了一套灰色西装去上班。收拾好给人民委员报告的文件之后，我进入办公室，看见莫洛托夫穿这同样的一套浅灰色细纹西装。我立即感觉到了这个巧合的难堪和不妥当。莫洛托夫相当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并说：“您真不该作跟我一样的一套衣服！”

这叫怎么回事？我们就像穿着制服去接待外宾……”

事情搞成这样，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裁缝铺里再没有其他浅颜色的衣料，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不是您的问题。那个蠢货裁缝朱拉夫斯基在给人民委员建议流行的衣料时，就应该想到的。”

午休时，我换上了深褐色西服，此后再也没有穿过那一套灰色西装。莫洛托夫也很少穿那一套条纹西装。也可能，就在那时，就开始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缝制专门的制服？

在跟莫洛托夫共事的那些年里，我仅有一次看见他非常激动。那是在1944年，瑞典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与芬兰的合约进行谈判。我跟此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知道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瑞典人来往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穿梭外交，从苏方的观点来看，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并且芬兰人坚决拒绝接受苏联的条件。

根据种种情况判断，当时苏联领导人真的想要解决与芬兰的冲突。正在准备在波兰的大规模进攻，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将在北方驻防的部队腾出来，在突击德军奥得河上和东普鲁士的工事之前，加强中央集团军群。与此同时，间谍情报显示，里宾特洛甫前不久去过赫尔辛基，试图说服芬兰人不要跟苏联媾和，并许诺追加军事援助。报告说，又有一批德国新式武器和军团到达芬兰。所有这些都会延长与芬兰的战争，这是莫斯科所不愿看到的。在最近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几封信函中，华盛顿也表示，愿意看到在对芬兰不太苛刻

的条件下解决苏芬冲突。苏方已经愿意放弃芬兰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依然坚持要移动边界线，给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这样便在总体上符合 1940 年 3 月和谈的条款。在这种条件下，芬兰的固执就完全不合时宜了。

已经记不得了，为何在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里举办招待会。来宾之中，有驻莫斯科的外交官，苏联领导人，红军高级将领以及瑞典代表团。起先的气氛是彬彬有礼，非常优雅。几个大厅里，一些客人围着放满饮料和菜肴的长桌吃东西，另外一些客人则手里拿着酒杯，站在一边说话。

我看见莫洛托夫跟土耳其大使一起进入红色大厅。陪同他们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里职位次于科西列夫，莫洛托夫的助理波德策洛普。他懂得法语，可以翻译那些不懂英语的外交官的谈话。因此，我可以利用空闲的几分钟吃点东西。

突然，从红厅里传来了喧哗声，听见有人大声嚷嚷，其中莫洛托夫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他结巴得很厉害——这意味，是什么事情激怒了他。

我赶了过去，进入大厅，看见美国、英国、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以及瑞典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围在人民委员的身边。莫洛托夫动作很大打着手势，这本身很少见，喊道：

“我们再也不打算忍受芬兰人的固执了！如果这些混账继续固执下去的话，我们会将他们捻成灰！我们将彻底摧毁！不要以为我们头脑简单！我们知道他们跟希特勒的阴谋勾当。没人能糊弄得了我

们！如果他们想打下去，他们会如...如...如愿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红军.....”

助理和警卫们试图劝阻大发雷霆的人民委员。有人在劝导他：“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很晚了，您还得回克里姆林宫去.....”“别拦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这些犟驴会为自己愚蠢的固执而后悔的。我们会收收收拾他们.....”客人们也许从来见过这种场面，惊讶小心地看着原来总是不动声色的莫洛托夫。我一开始也想，他可能喝多了，所以失态了。一切都是那么怪怪地。我们终于把他从客人那里挤开，弄到走廊，然后走向出口。他一边还在继续喊着骂芬兰人，当他被弄上车之后，还想要挣脱出来。

最终他在两辆轿车的护送下走了。各国大使随即立即离去了。他们显然想给各自的政府报告这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关于消灭芬兰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将我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情绪非常好，调皮地笑着。“您昨天出席招待会了吗？”他问道，并且不等我回答，继续说，“请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我开始大致重复昨天所见到的事情。“不对，”他打断了我，“照原样子说，不要删减。我说了些什么，大家的反应如何？”我不好意思重复他的粗口，但不得不几乎逐字逐句说了一遍。

“我以为，客人们都被惊呆了，甚至吓坏了。”我结束了汇报。

莫洛托夫非常满意。他放我走时说：“非常好，太好了。”于是我明白了，昨天那出戏是他特意演的，并且大半是跟斯大林协商

过，或者干脆是“主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莫洛托夫非常高兴，很好地完成了领袖交给的任务。他把瑞典人，然后是芬兰人吓坏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被震惊了。现在，他们将向赫尔辛基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任何人也不能怀疑苏军有能力快速解决芬兰人，甚至占领其全境。所以，如果他昨天的“爆发”被当真的话，那只会更好。现在芬兰人将会变得好商量些了。

果真，很快瑞典人通报说，赫尔辛基愿意进行认真的谈判，过了一段时间，芬兰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最终签订了和约。

类似的政治手段在过去的外交史上并非罕见，而按照现代的标准可能是冒险和不道德的。因为很清楚，如果莫洛托夫的威胁兑现的话，这会严重影响苏联与英美的关系。经过了“冬季战争”的血腥经验，斯大林毫无疑问地明白了，征服芬兰人并非那么容易。这里应该寻找这样一个原因，即在获得希特勒同意芬兰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后，他没有给芬兰准备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

-----

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2)

-----

莫洛托夫在已经退休之后，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绕过了芬兰.....做得很聪明，没有让她加入我们。否则会有一个长久的伤口.....那里的人非常执拗。那里，哪怕是少数人也很危险。那么现在可以略微加强关系。正像奥地利一样，没能将其变成民主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把伯克拉乌德给了芬兰人。要是我们的话，未必会给.....”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企图给芬兰和奥地利准备东欧“人民民主”的命运。但克宫的主子们没能做到。所以，如果芬兰人顶住莫洛托夫的讹诈的话，斯大林也未必会下令占领芬兰。但那样便会出现“丢脸”的危险，这也会是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已经被迫悄悄地将与库西宁的影子政府 1939 年秋天当着他，斯大林的面签署的不长久的“条约”藏起来。他以为，苏军占领了特里奥卡之后，整个芬兰都会处在他的手掌心里，但他失算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可以说带着高尚的目的冒了险：促使芬兰人尽快媾和。这出戏演成功了。虽然，也应该清楚的是，其时芬兰人自己也得出了结论，是该跟苏联谈判了。

-----

战前岁月的反差(1)

-----

从1935年起，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38年春天，我通过答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基辅一家大型军工厂。本来我这一辈子要制造武器的，但上苍却另有安排.....

1935年的头几个月里，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快到夏天时，完全正常了。虽然没能达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足水平，但大家感到呼吸自由了些，吃的也好些了。于是斯大林“生活好些了，生活轻松了”这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印证。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当生活轻松之后，工作也顺手了”，似乎也慢慢兑现了。与二十年代不同的是，不允许私人经营。但国营商业和服务也开始正常运转，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乌克兰政府从哈里科夫迁到了基辅。这件事不仅仅被看作是对古代斯拉夫历史中心的重视，同时也见证着苏联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加强，她不再顾忌资产阶级波兰这个近邻了。我们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三十年代初那些巨大牺牲并非枉然，斯大林最终是正确的，他大幅度地改变了国家制度，使她走上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的路子。

一个夏日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国旅的“大陆”饭店里，是一片紧张忙乱的气氛。一批陌生的，身穿便服，但明显军人做派的年轻人在前厅里布置着从市立美术馆借来的中国花瓶，插上新剪来的鲜艳欲滴的红玫瑰。旅馆的门僮们在铺地毯，在橡木楼梯扶手上打蜡。小商亭的女售货员在练习最迷人的微笑。最富有的外国游客也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跟从前不一样，这次也要求我们出示证件。

我一溜穿过前厅，来到服务处，问法因伯格，是怎么回事。“我们正在替哈里科夫来的贵宾准备豪华客房，”他压低声音说道。“他是谁？”“波斯德舍夫临时在我们这儿住一阵。给他的房子还没有收拾好。不过我建议你此事不要扩散。有外国人问，就说不知道……”

从那时起，跟高级领导人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搞得神神秘秘。虽然说，当时担任乌布共（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巴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德舍夫本人非常平易近人。他住在“大陆”的一两周里，我好几次在走廊和楼梯间碰见他。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有时还会问一问，游客都是些什么人，想看什么地方，喜欢不喜欢基辅等等。

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科西奥尔，留布切科，丘巴里，彼得洛夫斯基等——一开始就搬进了为他们预备的小楼。波斯德舍夫官邸的装修没有完工。这幢别墅位于里普基一带，正对着马利亚花园，紧邻我们家住的那栋楼。革命前，它属于糖厂的大老板扎伊采夫，它的建筑是巴洛克风格，十分雅致，轻灵。在我觉得，对无产阶级领袖来说，这有点太过奢侈了。不过，其他领导人的别墅与之相比并不逊色。譬如，担任乌克兰中央执委会主席，相当总统职位的彼得洛夫斯基住在一个宫殿里。这位老革命家，坐过沙皇的监狱，流亡期间生活难以为继，现在毫不客气地住进了这幢酷似苏格兰城堡的房子里——灰色的花岗岩，高高的尖拱窗，锯齿状的塔楼，正门口有一排大理石拱柱。乌克兰的领袖们用“别克”，“林肯”代步。斯大林用这一套资本家的生活方式腐化了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

们。可能，他们之中有人起先还对这些远离人民“公仆”生活的各种福利感到苦恼，但很快就弄明白了，拒绝会引起领袖的愤怒，他会刻薄地指责这些是“廉价的迎合取巧”和“假模假式的民主作风”。斯大林的特权系统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这些宫殿连同众多的奴仆并不属于“红色高官”。当他们还拥有“主人”好感的时候，他们能够使用这些设施。他随时可能——由于“不听话”，真的或者假的谋反——让他们一无所有。一般来说，他同时也会剥夺他们的生命。

波斯德舍夫当时还是党的市委书记，虽然很快就搬进了别墅，但依然十分平易近人。有时独自在自己的别墅旁散步。乘坐的不是进口车，而是带帆布顶棚的苏联造“小嘎斯”。在亨利·福特帮助下建设起来的高尔基汽车厂刚开始生产这种汽车。在波斯德舍夫的努力下，许多色彩鲜艳的花坛把基辅装点得十分美丽。鹅卵石马路铺上了沥青。在玛丽娅花园里，修建了一个“贝壳式”音乐厅，每到夏天的晚上，那里举行免费的露天音乐会。街头出现了许多贩卖各种吃食的小摊贩。在游廊市场里，“大陆”饭店附近以及各个城区开办了儿童咖啡屋，出售各种各样的冰激凌——草莓，果仁，巧克力，李子等等。

波斯德舍夫经常到各个工厂去，叫得出许多工人的名字，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受欢迎。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俗语：活要干得好，书记过来跑。这一切显然让斯大林有所戒备。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声誉，把这个看作一种危险的“竞争”。也可能是乌克兰领导层中波斯德舍夫的同事们暗中向“各族人民领袖”

报告了乌共（布）书记的“非正统”的行为。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在1934年举行的被斯大林称为“胜利者大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波斯德舍夫，还有丘巴里，科西奥尔等人作报告，要求用基洛夫——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替换斯大林做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基洛夫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选票。并且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更喜欢基洛夫，而不是斯大林。然而，基洛夫谢绝了担任总书记的提议。不仅如此，他把这些情况告知了斯大林。

“谢谢，”“各族人民领袖”表示了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事情……”他倒是真的没有忘记。十二月初，基洛夫被杀害。斯大林名字被划掉的选票被全部销毁。过了不久，开始逮捕那些斯大林怀疑“不忠”的“胜利者大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镇压也波及到了乌克兰领导层。

内战英雄，在远东战胜过日本人以及其他入侵者的波斯德舍夫第一个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消失是怎样发生的。负责人被紧急召往莫斯科。他在基辅（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首府）毫不怀疑地登上夜间快车的“国际软卧”车厢。途中列车只停一次。深夜，在米哈伊洛夫镇车站，几个身穿内务人民委员会制服的武装人员进入车厢，领头的人命令列车员敲开那个包厢门。门开了，出发前往莫斯科的领导人面对几枝黑洞洞的枪口。其他乘客静静地睡着，这时，“囚犯”被武装押送到车尾加挂的一节挂窗帘用铁条封死窗户的特别车厢。在莫斯科，注定要死的这个人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卢比杨卡（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楼，后为克格勃总部所在

地，现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译注）的地下室。波斯德舍夫之后，丘巴里也被送到这里。留布切科——他当时是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于是跟年轻貌美的妻子诀别，将自己锁在豪华别墅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稍晚些时候，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也被逮捕并枪毙。这发生在斯大林将自己的代理人赫鲁晓夫派到乌克兰之后不久。彼得洛夫斯基比较走运。他仅仅受了牢狱之灾。斯大林死后被释放，后来甚至得到了革命博物馆馆长的职位。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晚一些，而 1935 年夏天几个月真是非常幸福，光明灿烂。饥饿年代已经过去。生活预示着美好的前景。我们跟父亲一起凑钱买个一只小小的帆船——仅仅能够容纳四人。休息日里，朋友们男孩子女孩们顺风时可以沿着第聂伯河溯流而上走得很远很远，走过梅日格列和维石戈尔，那里的山丘上从前是符拉基米尔大公——后来的圣徒，他使罗斯皈依基督教——的宫殿以及有三百个嫔妃的后宫。在第聂伯支流杰斯纳河的河口，我们燃起篝火，烤肉串，焖土豆。我们把红藤的枝条扔进篝火，呼吸着芳香的烟味，它就像那熟透了的苹果的味道。每到晚上，在玛丽娅花园枝叶曼曼的椴树下，听着基辅交响乐团演奏的古典音乐。

我在“国旅”工作的最后一个夏天特别有意思。游客比 1934 年更多了，所以得陪着他们，在国内走很多地方。各个车站上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妇们出售着浆果，水果，陶罐里装着浆果汁，煮玉米，熏鱼等等。可以感受到集体化的震荡之后农村在

逐步复苏。在我们到过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哈里科夫，敖德萨等地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看来，国家终于进入了一个顺利的时期。当开始逮捕乌克兰领导人时，代替被捕的来了一批人，后来这批人也遭到逮捕，结果人们已经来不及记住自己一个个新任领导的名字，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这并未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暗淡无光。

-----

## 战前岁月的反差(2)

-----

也许，只有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内战英雄雅基被捕引起了我的疑虑，他最终与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有才干的红军指挥员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为雅基感到惋惜——他身材高挑，是个美男子，还非常年轻。雅基在里普基也有一幢别墅，所以我常常看见过，他乘坐一辆蓝色敞篷“别克”，在一个淡黄色头发美女的陪伴下从我们楼的窗户下驶过。很难相信，这个勇敢果断，为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贡献良多的统帅会成为“间谍”，“破坏分子”，“人民公敌”。

在“国旅”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从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休息日，而在国内旅行时实际上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在跟游客打交道。但

是，期待见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英国，美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印度等等，跟他们交谈，了解到新的东西，以及还有把我们国家介绍给他们——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满足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根据他们的愿望，我们安排同行聚会。有时甚至整天都得呆在法庭上，或者消防队里，翻译与作家，画家，音乐家，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谈话。也有许多次第聂伯河上的游玩。游客当中有许多的农艺专家和农场主们，我们将这些人带到戈罗谢耶夫森林，那里有一所新开办的乌克兰农学院。去那儿的一路上风景如画——数不清的急转弯，上下坡，湖泊和一丛丛茂密的野蔷薇。参观古老的修道院和教堂不仅对游客，而且对导游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其中许多的建筑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样子。

基辅近郊，位于库列涅夫卡的基里尔教堂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座教堂建于十三世纪，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拜占庭壁画以及镶嵌画上数百年的灰尘与烟黑，空白的墙壁和穹顶用当时最好的水彩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装饰。符鲁贝独创性的壁画《圣灵降临》在人的心灵深处引起震撼。教堂高高的围墙后面，有一所精神病医院，而为忧郁病发作所苦的符鲁贝，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他在医院的病人之中为基里尔教堂壁画创作挑选了模特儿。最终得到了一批具有极强烈心理影响力的肖像画作品。从穹顶上，十二个圣徒观望着访客。在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活动。对即将面临的惨剧——

导师耶稣基督受难，每个人都有个人化的感受。

当载着游客的意大利邮轮“尤里·凯撒”抵达时，对所有导游来说，敖德萨港之行就像是过节一样。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乘船进行环地中海和黑海旅行。基辅也是其中一站。需要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导游。由于基辅“国旅”人手有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行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青年人。

敖德萨之行兴奋而愉快。意大利邮轮极其奢华，乘客衣着打扮新潮，意大利菜非常异国情调，然后是乘坐完全由一等卧车组成的快车，在城里游览两天，然后返回到意大利邮轮上。也许，就在当时我最初强烈地感觉到，我国的生活距离西方有多么遥远。但这并不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的优越。当时我们以为，只有富人才能参加这种海上旅行，而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贫困交加之中苟且偷生。当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我们苏联人相信，我们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制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西方资本家所满足的那种奢华.....

随着游客流量的不断增加，导游人数也增加了。新来了一个懂得五国语言的季亚加·李普曼，他是个非常快乐聪明的小伙子，比我大五岁。但这并未妨碍我们交朋友。季亚加很快将我引入自己非常浪漫热闹的社交圈子，里面都是些非常有天分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等。他们之中一个漂亮姑娘瓦莉雅·库拉克娃非常引人注目。她会唱歌，弹钢琴，画画。她周围总是有一批崇拜者。季亚加夸口说，曾与她有过一段恋情，但我

却不相信：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可望而不可即。她父亲是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为乌克兰所有高级领导人治病，生活十分富裕。他们加在列瓦绍福斯卡雅街和路德街口有一套富丽堂皇的住宅，夏天则呆在梅日格列的别墅里。市里的房子里只剩下了瓦莉雅一个人，于是季亚加的一帮快乐朋友们经常在那儿聚会。瓦莉雅对任何人都没有钟情，但却喜欢揶揄自己的追逐者：譬如，客人到家里来，她却收拾箱子，肯定地说要去莫斯科。大吃一惊的崇拜者哀求她不要离开。然后又演出一个分别的场面，有人甚至掉了眼泪，然而最后她对大家宣布，说是开了个玩笑，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高高兴兴吃晚饭。然后，有一次宣布要出嫁了，请所有的人参加最后一个处女聚会，最后这也是个臆造。有一次，我们圈子里的人传说瓦莉雅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请我们去与她告别。在约定的时间里，一群哀伤的人聚集在门口。季亚加袖子上戴着黑纱，站在门口，请大家走近瓦莉雅卧室的阳台。

“这是死者的遗愿。”季亚加解释说，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们顺从地挤在人行道上，仰起头看着。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阳台上出现了瓦莉雅，她几乎完全裸着身子——只穿着便鞋和带面纱的黑色宽檐帽。

我们笑骂着跑进二楼，挤在客厅里。过了一两分钟瓦莉雅身穿黑长裙出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给大家沏茶。

现在年轻的一代，在书本上读到三十年代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以及血腥镇压，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是暗无

天日，极其艰难，充满了恐惧、苦难和泪水。这个对，也不对。恐怖残酷的镇压没有触及到的那些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人们看到情况好转时，都会寄希望此后的进步，并且认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大多数年轻人重新充满着热情，在工作，学习，开心，恋爱——一句话，活得很充实。

但是，我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记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做好准备来应付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苦练跳伞，也有些人参加自愿训练班，准备当飞行员。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加入了通信兵班。在这一行我已经略有所知，因为几年来一直都在自己动手作无线电收音机，此外，我的专业是电工。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这种制服很像德国共产党人的军便服。指导我们的是一个通讯团，于是夏天里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帐篷，参加野战演习。

1935 年九月，工业学院夜校四年级的课程开始了，所以必须转调作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国旅”。我被“列宁铁工厂”设计局接受为技工。我父亲参与设计的船坞已经建造完毕，于是在波多附近的江边开始建造客轮和拖轮。那是船身两边带推进轮的那种船。我的工作，是绘制推进木轮叶运转的那个机械的图纸。图纸画好之后，再交给女描图员进行复制。我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可爱，快活的姑娘佳丽亚。我跟她做了朋友，1940 年 12 月我们结婚了，就在那时，经过许多曲折和麻烦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

的一等秘书。

工作和学习占用了整个白天。时间过得飞快。只有在星期天，也是当时惟一的休息日里，可以休息娱乐。夏天我们玩帆船，冬天玩雪橇，滑雪，溜冰。

这几年开始了新一轮镇压。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被捕之后，许多技术专家，学者，作家，演员也开始消失。这架绞肉机仅仅触及到了我熟悉的几家人。所以，因此我当时一直觉得，在新的恐怖浪潮中由某种意义：因为它并未触及其他人。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也可能真的是有罪的？ .....

1938 年春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顺利地大学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被派遣到富于革命传统的基辅“阿斯纳尔”工厂，在国防企业名录中，它的编号是 393。那里生产火炮。我将来会作军械工程师。

-----

战前岁月的反差(3)

-----

然而，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

\*\*\*\*\*

## \*第五章 丘吉尔，你裤子的拉链开了

\*\*\*\*\*

斯大林需要知道对手的一切，甚至连丘吉尔丢弃在垃圾筐里的废字条也不愿放弃。这里讲述了 1945 年三巨头会晤期间的一桩趣事。

-----

斯大林与罗斯福(1)

-----

斯大林以为美国总统跟他本人一样，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无所不能。

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决定创设新杂志。

在那些我本人有机会接近观察的外国国务活动家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我国，人们把他看作一位现实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雅尔塔的一条主要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现代史上以及二战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充满魅力、反应敏捷、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在雅

尔塔，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所有在场的人都发现，总统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锐。

我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被委派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 1943 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的谈话。当时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在我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启程赴伊朗首都。我在基辅徒劳地试图找到自己的父母，因此被迫追赶代表团。我深夜起飞前往巴库，快到晚上才到达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乘飞机前往德黑兰。当天中午，我刚刚赶到苏联大使馆，便得知我马上要翻译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如果我的飞机晚到一个小时，那么我便会赶不上这次会见，不用说这会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因为每次会谈都是他自己挑选翻译。

当我进入与大会议厅相连的房间时，身穿元帅服的斯大林已经在那里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于是我赶紧道歉说稍微迟到了，并解释说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斯大林微微点了点头，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拿出一支烟，点上。他眯缝着眼睛，已经不那么严厉地看了看我，问道：“路上累不累？能不能翻译？此次谈话责任重大。”“能，斯大林同志。在巴库那一夜休息得很好。感觉良好。”斯大林走向桌子，漫不经心地将烟盒抛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已经熄了的烟卷。然后，慢慢摀灭了火柴，用它指了指沙发，并说：“这里。我坐边上。他们会把罗斯福用轮椅送来。让他坐在沙发的左边，您就坐沙发上吧。”“明白了。”我回答道，我已经不

止一次为斯大林翻译，但我从未听到他如此重视这类细节。也许，在会见罗斯福之前他有些紧张。

斯大林当然很清楚，对于经他的努力在苏联取胜的制度，罗斯福总统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对于罗斯福而言，斯大林帝国内部那些血腥的犯罪、专断、镇压和逮捕——摧毁农民的家业，导致千百万人饥饿和死亡的强制集体化，对那些被宣布为“危害分子”的高级专家、学者、作家的迫害，残杀杰出将领，所有这些都不能是什么秘密。斯大林政策的恐怖后果，在西方造成了苏联极其负面的形象。跟罗斯福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否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能否克服疏离感？斯大林不能不自问这些问题。

我想，总统也明白，在当时的局势下与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找到共同语言何等重要。并且，他处理与斯大林关系的方式，使得这疑心重重的东方暴君似乎相信了，国际民主社会愿意接纳他。在跟苏联领袖的第一次会谈中，罗斯福就努力建立信任的气氛。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他没表露出任何的紧张，小心翼翼，没有任何不自然的长篇大论。

斯大林也决定施展自己的魅力——在这方面他可是个高手。战前，我们的领袖很少接待外国政治家，所以也不具备相应的经验。但是，他很快弥补上了欠缺，1939年8月在会见里宾特洛甫时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希特勒入侵之后，斯大林直接参加了谈判。与霍普金斯、哈里曼、赫尔等人的谈话，与罗斯福频繁的信函来往使他有机会充实自己有关美国人的概念，并且操练出跟他们处事的一套

特殊方式。但是，从旁边终究能够看出，1943 年秋第一次会见美国总统之前，斯大林感觉并不十分自信。

是否正因为这一点，他这次关注要如何落座更好？显然，他不想把自己长满天花豆的脸过分暴露在灯光下？元帅服和带红色镶条的裤子仔细熨烫过，柔软的高加索皮靴（他平时将裤子扎进去）明光锃亮，脚后跟下鞋垫里加衬的垫子使他比平时高些。而与罗斯福的谈话，他是从典型的格鲁吉亚客套话开始的。总统在公馆里可感到满意？有没有什么事情疏忽了？他能否为总统作些什么等等。罗斯福加入了这个游戏，向斯大林敬了一支烟。后者回答说，习惯了自己的。总统也问道了“著名的斯大林烟斗”。

“医生不让抽了。”全能的领袖双手一摊。

“医生的意见必须要听。”总统用过来人的口吻说。

接着两位领导人互相通报了身体情况，谈了谈吸烟的坏处，户外新鲜空气的好处。总而言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挚友相见。

当斯大林应总统的请求谈到前线的状况时，他没有隐瞒乌克兰的困难局势，德国人占领日托米尔，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之后，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再次受到威胁。

而罗斯福也照样表现出了坦诚。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他提到了殖民帝国的问题。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

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罗斯福政府遵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当天美国国务院声明中的表述，即“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遵循这样一种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苏联对德国作战的事实，并不表示，在国际关系中它维护，争取或者遵循着与我们同样的原则”。

在战争期间，罗斯福对苏联，以及斯大林本人多次发表了友好的意见。但这里，我想，他仅仅对反希特勒联盟范围内的盟友关系、顶住了希特勒战争机器大规模攻击的英勇顽强的红军表示尊重。同时，从苏德前线的战事中总统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继续抵抗侵略的苏联人民，如罗斯福认为的，证明了体制的牢固性。如果这个体制能够坚持下来并维持到战后，那么再次企图摧毁它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可以共

处。但这些根本不意味着，罗斯福赞成苏联的现实。

斯大林的不信任也有其自己的原因。在16年的不承认之后，罗斯福建立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有关愿意向反抗希特勒侵略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声明，总统愿意给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所有这一些都可以列为罗斯福政府的优点。但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实践中，却也有不少事实，强化了斯大林对美国的怀疑。并且，在意识之中根深蒂固的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敌意，不断地使他保持警惕。

我多次有机会听到，斯大林借各种理由对莫洛托夫说：

“罗斯福拿国会来推诿。他以为我会相信他真的怕国会，因此不能向我们让步。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反倒拿国会来做挡箭牌。真是一派胡言！他是军事领导人，最高统帅。谁胆敢有异议？他躲在国会后面方便些。但他糊弄不了我……”

斯大林同样也不相信，当他抱怨英美报刊上针对苏联的不友好文章时，罗斯福和丘吉尔解释说，他们无法控制报纸和杂志，并且对他们，新闻界往往也不买账。所有这些，斯大林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狡诈，两面游戏。但他看到，苏方处于不利地位。每当我国媒体上出现小心翼翼的针对西方盟国政策的批评时（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军事供货不能保证按期进行，单独媾和谈判的传言等等），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进行抗议，向斯大林提出意见，因为这里是苏联官方新闻机构材料。

-----  
斯大林与罗斯福(2)  
-----

为了平衡这种状态，斯大林决定在 1943 年创办一份新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并且表面上似乎是工会组织在出版这份刊物。这家杂志的实际编辑是莫洛托夫，虽然在杂志的封面上是某个工会活动家充当主编。莫洛托夫委派我处理编委会会议的技术准备工作，于是我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莫洛托夫，往往是斯大林仔细地斟酌一些批评性文章。这样一来，对英美的抱怨他可以回答说，苏联政府对这些材料不承担责任，所以任何意见请提给工会组织。斯大林相信，这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操纵媒体的手法毫无二致。

早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就在争取与罗斯福建立联系。米高扬给我讲述了与此有关的一个情况。事情发生在 1935 年，在莫洛托夫的别墅，当时米高扬很快就要出发去美国购买设备。一个名叫库恩的美国人也在别墅——他是莫洛托夫妻子的亲戚。很快，斯大林来了。晚饭之后，他跟米高扬一起来到花园，并说：“这个库恩，是资本家。你在美国跟他见一见。他可以帮助我们跟罗斯福展开政治对话。”

抵达华盛顿之后，米高扬弄清楚了，资本家库恩拥有六个加油站，但是却不可能跟白宫有任何关系。库恩做中间人的事想也不用

想。同时，在会见亨利·福特时，后者主动向米高扬提议说，可以介绍他认识罗斯福。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立即将此事通报了莫斯科，但却没有接到答复，于是米高扬也没有见到罗斯福。我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这样做，须知斯大林曾经争取要跟罗斯福对话。

“您太不了解斯大林了，”米高扬解释说，“他可是指派通过库恩的。如果未经他批准利用了福特的帮助，他会说：‘这个米高扬比我们都聪明，干起了大事’。他便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想起来，用来收拾我……”

这件事证实了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的机警，也证实了多年之后在莫斯科流行的、专指米高扬的一句顺口溜：“从一个伊里奇到第二个伊里奇，没有梗塞，没有瘫痪”，意思是他在一个暗流汹涌的时代里全身而退——从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烈日涅夫。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有关美国的概念何等幼稚。他认为，既然库恩是个资本家，那么他就跟总统常来常往。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美国观，斯大林曾经分别向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建议派遣美军到乌克兰的苏德前线作战。自然而然地，他得到了拒绝，但令人惊异的是，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最怪异的还是此后不久罗斯福的一项动议。1942年元月12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跟刚刚到华盛顿的新任苏联大使李维诺夫谈话时说出了一个意见，即美军可以替换在驻扎在伊

朗、外高加索以及极圈外港口摩尔曼斯克地区的苏军，而苏军士兵可以被投送到前线正在激烈作战的区段。总统用一个独特的诱惑来加强这个建议：“美方，”他对苏联大使说道，“对于苏联在北方，挪威的某个地方，譬如纳尔维克，获得一个不冻港不会有任何异议。”罗斯福解释说，“为了跟这个港口联系，可以通过挪威以及芬兰领土划出一条走廊。”

从现代道德的角度看，类似的建议，况且挪威人和芬兰人都不知情，至少是厚颜无耻的。何况，当时纳尔维克以及整个挪威都被已经被德国占领。

苏联政府谢绝了美国的建议。莫洛托夫在元月 18 日的电报中，委托大使答复罗斯福，即苏联“现在和过去对挪威从未有过领土或者其他要求，因此也不能接受苏军占领纳尔维克的建议”。至于用美军替换在高加索和摩尔曼斯克的苏军，那么，这个“不具备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地方目前没有军事行动”。接着在电报中说：“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罗斯福使用美军进行的援助，其目标将是与我军并肩作战打击德军及其盟军”。

但是，美国并没有军队用于此目的。

所有这些事情，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快之感，并且使斯大林产生了新的怀疑。他将罗斯福的建议看作是想染指苏联领土完整。他记得很清楚革命后不久对苏俄的干涉，当时美军占领了我国几个地区。与此同时，这也看出了华盛顿靠苏联人流血保存自己力量，并且削弱冲突的两个主要参与者——德国和苏联的图谋。

我想仔细谈一谈对斯大林和罗斯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关键问题。

虽然我们的西方盟国对莫斯科在法国实施登陆的多次呼吁没有响应，但是，华盛顿从1941年秋天起就在研究这个战役的可能性。翌年春天，攻入法国北部的美国方案已经准备妥当。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时指出，在这个地区实施登陆，是对俄国战线最大的帮助。然而，此次战役实施却被置于两个条件之下：

如果俄国前线的局面令人绝望，也就是说，德军获得全胜，即出现了俄国抵抗不可避免崩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的进攻可以看作是为了共同事业的牺牲。

如果德国人面临危局。这份文件能够说明美国对于“第二战场”的设想：当苏联和德国有能力继续作战时，华盛顿更愿意袖手旁观。最主要的，是战争结束时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

哈里·杜鲁门（他当时是参议员）对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反应也很典型。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他说：

“如果德国人将获胜，我们必须帮助俄国人，如果俄国将获胜，我们必须帮助德国人，那么就让他们互相残杀的更多些吧”。

斯大林牢牢记住了未来美国总统的这段直言不讳的话。

1942年底，希特勒动员了庞大的军力，预备向苏联纵深发动新攻势。而我们的西方盟国依然无所作为，以减缓苏德战线上的局面。李维诺夫大使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于1942年1月31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出了问询：“在希特勒可能的春季攻势之前，为此他正

在积蓄庞大军力，已经剩下不到两个月了，并且如果我们希望在此时之前获得英美的援助，那么就必须马上向他们提出这一点。我们要么必须要求在大陆实施登陆，要么声明，我们需要多少飞机和坦克，敌人在这个或者那个方面有多少优势。”

2月4日，李维诺夫收到了如下答复：

“我们欢迎我们的盟国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但您知道，我们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已经三次被拒绝，所以不愿再遭到第四次拒绝。因此，您不必在罗斯福面前提出第二战场的问题。我们等待时机，届时，可能我们的盟国自己会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否对罗斯福发生了影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影响。无论如何，很快美国人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1942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向苏联政府首脑通报说，他认为有必要就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与苏联权威代表交换意见。他询问，苏联政府是否愿意派遣莫洛托夫到华盛顿来进行谈判。苏方立即表示同意。为了保密，此次访问以“布朗先生代表团”的代号进行。

莫洛托夫先行抵达伦敦，签署了英苏结盟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作战以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然后前往华盛顿。在跟罗斯福总统的谈话中，主要涉及到了西方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以及苏德前线的战事。

“如果，”莫洛托夫说，“盟国1942年能够从我方战线吸引哪怕40个师，力量对比会发生极大变化，对我方有利，并且希特勒便死定

了。”

听到莫洛托夫带着他并不特有情绪洋溢的声明之后，罗斯福总统问马歇尔将军：

“目前的准备工作是否足够，使我们可以告诉斯大林元帅，说我们愿意开辟第二战场？”

将军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总统郑重地说：

“请报告自己的政府，说他可以期待在本年内开辟第二战场。”

这样，总统，以及附和了他的丘吉尔，正式承诺实施登陆。此外，也确定了具体的期限。共同声明称：“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等问题上全面达成了协议”。

-----

斯大林与罗斯福(3)

-----

华盛顿和伦敦当时是否真的打算登陆？这个决定是否是个失误或者轻率，不过，这对于成熟的政治家而言是不允许的。当时，他们未必认为，苏联的抵抗力已经接近衰竭，并且做出“牺牲”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么很快便可以得出结论，即不必急于“牺牲”。

过了一段时间，当罗斯福和丘吉尔拒绝了给斯大林的承诺之后，总统感觉到困窘。因为在华盛顿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总统以军需品转拨到准备中的在法国的登陆为由，说明要大幅度削减苏联亟需的军品供应。当莫洛托夫问道，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供应削减了，第二战场也不会开辟，罗斯福再次向莫洛托夫保证，1942 年法国登陆一定会发生。大概，当丘吉尔自告奋勇在莫斯科执行如此不愉快的使命时——通报斯大林，入侵不会进行了——美国总统松了一口气。

有鉴于上述这些事实，值得援引总统的儿子艾略特写的书《用他的眼睛看》中的一节。它可以表明罗斯福对美国在战争中角色的理解。

“你想一想，”父亲对儿子解释说，“这是一场足球赛。譬如说，我们是坐在板凳上的替补队员。现在，主力队员是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英国人。我们被预定的角色，是在关键时刻加入比赛的队员……我想，我们会正确选择时机的”。

罗斯福跟儿子交流的想法可以说相当坦诚。

在我国的文献中，德黑兰会议就此做出的决定通常都被看作是苏联外交的重大胜利。并且，实际上，西方盟国终于确定了进攻的具体日期并且大体上做到了。三年以来独自跟希特勒战争机器作战的红军，终于得到了实际的援助。试问，美英同意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时，对甚至威胁离开德黑兰的斯大林坚决要求真的做出了让步吗？或者他们首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他们是否认为，美国计划

中规定的第二条——德国崩溃的局面正在来临？

当德黑兰会议召开之时，已经形成了决定。乘坐巡洋舰渡过大西洋前往伊朗首都时，罗斯福总统将自己最重要的助手召到军官室，把自己有关第二战场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苏军，”他说道，“距离波兰边境仅有60英里，并且距离比萨拉比亚仅有40英里。如果他们强渡德涅斯特河，这可能在最近两周之内发生，红军便到达罗马尼亚的门口了。”总统已经得出结论：该行动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他解释说，“必须占领尽可能多的欧洲领土。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南部归法国。美国应该派遣自己的军舰将军队运送到不来梅港、汉堡港，到挪威和丹麦。我们应该到达柏林。那时，就让苏联占领柏林以东的领土。但是，柏林应该由美国占领。”大约在同一时间，罗斯福下令预备空降兵团占领“第三帝国”的首都。

罗斯福与丘吉尔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不可继续拖延进攻，否则苏军可能大幅度推进到西方。但是，在这一点上也不无重大的分歧。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总统认为，通往柏林最短的路线是通过法国。不列颠首相则出于其他的考虑。他力争不使苏军在苏联国界之外推进的太远。达到此目的的最佳途径——便是通过巴尔干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方向进攻。

至于斯大林，他猜出了邱吉尔的图谋之后，多次声明说，对红军最根本的帮助是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

综合以上所述，我认为，德黑兰会议有关第二战场的决定中，最主要的不是协调进攻的日期，而是确定登陆地点。至于最终选择

了诺曼底——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立场一致的结果，并且这一点得到了苏联领袖的高度评价。

-----  
马歇尔将军与俄国飞行员(1)  
-----

斯大林对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抱有好感。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身边的德国谍报窃取了诺曼底登陆的绝密情报，但纳粹并未能加以利用，并且用 30 万英镑假钞打发了获得这一绝密情报的谍报员。

在陪同罗斯福出席德黑兰会议的军人之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特别引人注目。我是在 1943 年 11 月 29 日早晨三方代表团军事代表会晤时认识他的。伏罗希洛夫元帅预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之后，请我做苏方译员。

在此次会晤期间，讨论了英美军队在西欧进攻的时间表和地点等问题。罗斯福总统的幕僚长莱吉海军上将主持了会议。他首先请英国的布鲁克将军发言。

就在这个阶段，英国人更愿意在地中海地区组织战役的意图已经清楚了。布鲁克将军谈了很多关于在该地区的驻有大量英军，

以及指挥部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这些部队的愿望等等。同时他提到了可能在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地区组织战役。

在英国代表之后发言的马歇尔将军，以相当礼貌、但坚定的方式谈到了诺曼底登陆的优越性，指出，进攻诺曼底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法国南部的登陆予以支持。

伏罗希洛夫元帅也谈了类似的意见，当然他在执行斯大林的指令。

此后讨论了战役的各种细节问题，包括在太平洋战场的行动。但此次会晤廓清的最主要问题，是华盛顿和莫斯科有关诺曼底行动上的立场极为接近。

在会议的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斯大林听取了伏罗希洛夫的汇报，当然在自己的心头记住了马歇尔将军的话。

在全体会议期间，军事专家们被多次请来，以便使“三巨头”能够在这个或者那个具体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马歇尔将军的论据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让斯大林喜欢。将军把自己的想法表述得清晰明确，没有英国代表所特有的词义未尽和模棱两可。马歇尔将军始终一贯坚持通过英吉利海峡登陆优越性的立场也使苏联领袖印象深刻。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时，斯大林邀请马歇尔沿着苏联大使馆主楼花园的林荫道散步。我作为译员陪伴着他们。

起先，谈话围绕着刚刚结束的辩论。后来，苏联领袖指出，他喜欢马歇尔的报告，并且询问了他的职业生涯。

马歇尔谈及自己短时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战争快结束的几个月才参战，并指出，美国军人在战后最初和平年代里的境况并不好。当然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威尔逊全面和平计划的破灭，接着则是孤立主义时代的来临。马歇尔本该于1917年得到第一颗将星，但他却等了十八年。他在军队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加上甲状腺出了严重问题，他开始考虑打报告，转到国民警卫队——那是军事仕途失意者的最后归宿。然而，就在这时来了一道命令，任命马歇尔担任位于太平洋岸边、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兵营的司令官。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毕竟还是在军队里。

马歇尔以前的许多战友非常走运，在总参谋部和其他首脑机关获得了高级职位。而他仿佛是被遗忘了，连马歇尔本人也认为，温哥华兵营——这是他军人生涯的最后一站了。但是，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斯大林仔细的听着马歇尔的叙述，并不打断他。但这里，利用他的一个间歇，问道：“出什么事了？”

“这一天我终生难忘，”马歇尔继续讲道，“我给您仔细得讲讲这件事儿。1937年6月20日，星期天，早晨八点三十分，一阵敲门声把我叫醒。门口站着三个陌生人，他们头戴飞行帽，身着黑色皮夹克：疲倦不堪，没有洗脸，显然饿坏了。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三个人是苏联飞行员：契卡罗夫，巴伊杜科夫和别里亚科夫。他们当时进行跨越北极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的不着陆飞行，但由于燃料不足实施了迫降……”

“怎么，这之前没有发现他们吗？”斯大林吃惊地问。

“由于当时搜索设备简陋，加上美军人员训练无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他们认为温哥华兵营的阅兵场比较合适，所以便决定在那儿降落。我家的房子就在旁边。于是他们便来到我家了……”

斯大林被这个故事逗乐了。他发自内心地笑了，最后问道，接下来怎么着了。

马歇尔接着讲道，他把三个疲倦的飞行员安置在自己家里：好在他家有好几个卧室和浴室。快到中午时，午饭准备好了，可此时房前已聚集起了好几十号记者和电影摄影师。马歇尔非常恰当地把自己家的不速之客做了介绍，帮助他们应付了记者的采访，并对他们的回答做出了巧妙地解释，由此一下子变成了世界名人。很快，苏联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杨诺夫斯基和美国国务院以及军事部门的高官们来到了温哥华兵营。随后组织了这几位著名飞行员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表演，马歇尔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很快，首都的高官们想到了马歇尔将军，他被调到华盛顿，并于 1938 年初被任命为军事计划局的局长。由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仕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计划的创始人……

“您知道，在新岗位上我有何发现？”马歇尔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讲道，“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一年，美军在世界上只占第十九位，排在保加利亚和葡萄牙后面……”

“那么，我只能祝贺您工作成绩斐然，在如此短时间内把美军发展成如此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这样结束了这次有趣的会面.....

经过长时间辩论，德黑兰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实施登陆，同时由英美军队在法国南部空降予以支持。

此后，斯大林问道，何人将被任命为登陆行动的指挥官。

“这个人选还没有定下来。”罗斯福回答道。

“这样的话，登陆行动将一事无成。”斯大林断定。

“英国将军摩根负责登陆的准备工作。”罗斯福解释说。

“那么谁负责实施呢？”斯大林继续坚持问道。

“除了指挥官之外，我们已知所有将实施登陆的人员。”罗斯福歉意地说道，并感觉到了这个局面的困窘。

继续交换意见之后，斯大林表示：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误解。俄国人并不想要参与决定指挥官人选问题。但俄国人想要知道，这个指挥官将是何人。俄国人想使他尽快得到任命，可能的话，就在这里，并想要他既负责准备，也负责实施登陆行动.....”

德黑兰会议结束后不久，登陆行动的指挥官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斯大林接受了这个人选。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在会议期间在此问题上如此坚持，是因为倾向于马歇尔的人选。

与会各方约定对德黑兰会议的决定严格保密。为此采取了特殊措施。查尔斯·博林，会议期间的美方译员，回到华盛顿之后发现，

家里的电话被窃听。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参加德黑兰会议的所有人，根据罗斯福总统的一项命令，被置于特别监控之下。

但是，终究还是发生了泄密.....

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从德黑兰回到伦敦之后，将“三巨头”会议的决定详细通报给了英国驻安卡拉大使赫奇贝尔·休杰森爵士。在密电中，不仅有涉及土耳其的情报，这是十分自然的，还有其他重要的信息，其中包括登陆的日期。全部的情报，通过德国收买的间谍艾里亚斯·巴兹纳，休杰森爵士的贴身仆人落到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手里。因为他向纳粹党卫军的情报机构提供了盟国大量的重要情报，巴兹纳得到了西塞罗的代号。他将休杰森大使的外交密电拍照并转交给党卫军驻安卡拉的间谍头子摩西什。而爵士的疏忽大意令人惊叹，他往往将装着文件的黑色公文箱随意留在自己的卧室里。摩西什在其战后回忆录中谈到，整夜在暗室冲洗巴兹纳送来的胶片时，发现他手里有了德黑兰会议的纪录。

-----

马歇尔将军与俄国飞行员(2)

-----

希特勒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后来回忆道：

“西塞罗的情报在两个理由上十分珍贵。其一是，发给英国大使的德黑兰会议决定的简明概要。这揭开了德国战败之后盟国有关德国政治地位的意图，并且向我们显示了，他们之间有哪些分歧。但是，这份情报最重要之处在于，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敌人的行动计划准确资料。”

奇怪的是，纳粹头子们没有利用这个无价的情报。一方面，他们有怀疑：是否英国人为了蒙骗而将这些文件故意送上门来；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清楚西塞罗所获得情报的价值，因而不愿扩大知情者的范围，避免暴露情报来源。无论如何，德军指挥当局在考虑作战计划时，没有利用这些文件，并且他们干脆就不知道这些文件。1944 年 6 月 4 日拂晓，英美在诺曼底的登陆对德军指挥部成了真正的突然袭击。

可是，西塞罗本人在此次行动中也没能发财：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跟他清账的三十万英镑是假钞。

-----

在太平洋舰队(1)

-----

1938 年底，我被应征入伍，到太平洋舰队。

斯大林一纸命令，我当上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英文老师。

我的“学生们”记住了“老师”，最终，我被调到莫斯科的。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的世界大战的乌云越来越浓，但我们却尽量不去想它。基辅活跃的文化生活给人歌舞升平的感觉。外国演员经常来这里巡回演出。苏联音乐家、歌手、象棋运动员们在国际比赛上赢得了许多荣誉，于是，对我们密不透风的国界之外那个世界的归属感在增加。我们一班朋友们从不错过一场音乐会。索比诺夫、澳伊斯特拉赫、吉列里斯、科兹罗夫斯基、波兰女歌手艾娃·邦德罗夫斯卡雅—图尔斯卡雅、捷克爵士乐齐格列，以及观众喜爱的爵士乐手乌杰索夫等人的音乐会，一般都在克列夏季克街和亚历山大街角从前商人公会的圆柱大厅里举办。这里的街角，从前有一座亚历山大二世纪纪念碑。苏维埃政权的前几个月里，便炸毁了它，但留下了大理石的基座，浅浮雕刻画着俄帝国各族人民，以及碑文：“俄罗斯谢忱沙皇解放者”。

我们的传统习惯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改革创始人，一般都死在宣称自己是人民之“友”的人手上。1861 年取消了农奴制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民粹分子”投掷的炸弹炸死。俄帝国首相斯托雷平推行了土地改革，许诺给农民土地和兴旺的农场，却被狂热的革命分子射杀。在基辅歌剧院内，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所在包厢的对面响起的一枪，打断了俄国这位优秀政治家生命。斯托雷平被杀，不仅中止了大有希望的改革，反而使反动势力得到加强，最终导致了 1917 年的革命……

不祥的音调闯入每天的生活之中：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失败，暴君佛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武力扶持下在马德里登位，奥地利被合并以及希特勒凯旋进入维也纳，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讹诈以及慕尼黑阴谋……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也在急遽恶化。我当时在“阿斯纳尔”工厂上班。我的工作岗位在设计室的一张大绘图板后面，在季莫菲耶夫工程师领导的小组里。他对我十分关怀，帮助我掌握工作要领。但是，跟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乌克兰宣布了动员令。预备役军官，其中也包括季莫菲耶夫，被征召加入红军。他来看过我们一两次，已经身穿军服，神态端正，表情肃然。他对我们说，已经拿到派遣证，要到波兰边界的军区去。根据苏联与法国的协议，一旦发生入侵，我们应该共同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一切都在表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新闻媒体对希特勒威胁布拉格的报道，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在苏台德地区的挑衅，预示着纳粹分子将采取新的占领行动。莫斯科在乌克兰军区宣布了动员，以此证实已经做好准备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密切关注着慕尼黑会谈，并确信，假如希特勒不做出让步，苏联和法国将履行诺言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国人民，正如我所感觉的，心理上已准备好了这样做。并且我们也希望，最终德国法西斯统治会失败。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导演的歇斯底里的一幕却使西方列强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不允许苏联红军越过自己的领土。乌克兰的动员被取消，工程师季莫菲耶夫也脱去军装，由回到了“阿斯纳尔”工厂的设计

室.....

每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经过玛丽娅公园，望着展现在面前的第聂伯河左岸，浅沙滩，水淹的草地，远处地平线上与教堂，钟楼交织在一起的树林。难道那个时刻真的会来临，德国士兵真会占据这块陡坡，而我军则顺着这块草地退到很远的地平线以外，纳粹分子蜂拥而至，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或者被俘，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村庄被烧成灰烬？

我读过神秘的恩内斯特·亨利刚刚出版就轰动一时的名为《希特勒反对苏联》一书。作者在书中预言，德军将会短暂地占据苏联广阔的领土。但是，我所见到的却是，希特勒建立起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不无西方政治家的帮助。我已不能排除，一旦与德国交战，我们将承受巨大的损失。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个人而言也一样。基辅工业学院的夜校部设有军事教研室，我们大家在学习期间都被延期服役，而现在则要接受真正的军事训练。我们大学毕业后享有优惠：陆军一年顶两年，而海军两年顶四年。我们能在战前服完兵役吗？

1938年11月初，军事委员会的通知书到了。首先要体检，然后去征兵委员会报道。我体检没查出任何毛病。委员们只问了与个人简历有关的几个问题。在走廊里略微等了一会儿，我就又被叫了进去，我得知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并于本月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浪漫的大海一直都令我神往。但对征兵委员会的决定一点也没感到高兴。因为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被编入乌克兰军区的陆军部

队。他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服役，经常可以请假回家，不顾规定，换上便服，在熟悉的环境里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而我远在海参崴，这些都享受不到，并且我的服役期是两年，不象他们只有一年。我和佳丽亚也不得不长期分开。还有一点令人不舒服，命令我剃光了头去集合地点报名。

出发前的那段日子乱作一团：办理各种证明，领取车票，证件。与佳丽亚告别是那么难过。况且我还从没有离开过父母这么长时间，现在要离开他们真是很难受。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情不好。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使我预感到一种莫名的东西将会改变我的一生。我羡慕朋友们留在了乌克兰，但却根本没想到，他们几乎全部战死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如果我和他们留在一块儿的话，大概我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在集合点，我意外地遇到了两个和我一起毕业的校友——阿尔嘎沙·爱尔立贺曼和伊格尔·别里亚列夫。我们几个月没见过面，现在得知他们也被派往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在一起总会好一些。征兵办公室的人对我们进行了训示，并通告了报到地点，最后一次放我们回家。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了莫斯科，然后乘坐西伯利亚特快列车前往远东。

我们这些新兵只能依靠自己和手里那一点点钱。但我们仍然决定在首都呆两天。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并且说实在的，对我们来讲，过十天，还是十二天到达指定地点并没多大区别。

莫斯科的早晨阴沉而潮湿，这跟我的情绪差不多。站前广场上

挤满了人，雨稀稀落落地下了起来。我慌了起来。我们没有栖身之地，又不能住旅馆。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在基辅被军委会收去了，作为新兵我们应该不停留直接到达指定地点。

“也许，只好今天走了？”伊格尔犹豫不定地说，他显然像我一样有些胆怯。

“伙计们，别丧气！”阿尔嘎沙是我们中最有办法的一个，他提议说，“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手续问题。先到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确认车票，把箱子交到寄存处，然后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每个人的东西并不多：两床换洗的被子，几双棉袜子，路上御寒的帽子和体贴的父母事先准备的一份干粮。往远东方向去的火车都是从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出发的。当然首先要订好票。并且空着手在城里溜达总是会轻松些。总之一句话，阿尔嘎沙的建议被采纳了。

在莫斯科呆的这两天过的还真不错。我们参观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历史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我们在莫斯科饭店的餐厅吃饭，花钱买上等葡萄酒到这个豪华餐厅吃了一顿饭。

所到之处人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的光头，或许把我们当成在逃犯了。而我们尽管喝得略有些醉意，但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加入到保卫祖国海疆的队伍中去了，可以傲视周围的人。大剧院慈悲的票务员看了我们的乘车证，对我们非常同情——天知道要把我们派到哪里去，于是开了三张楼座的免费入场券。我们的一天在鲍罗廷的歌剧“伊格尔公爵”的乐曲声中结束。但最后只能在雅

罗斯拉夫火车站的地板上过夜，拿报纸作床单。

-----  
在太平洋舰队(2)  
-----

第二天早晨天气好了，我们在火车站的公厕里洗漱完毕，又去城里转悠。开往海参崴的火车下午发车。这回我们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旁的卖羊肉串的摊儿上吃的午饭，饭后很快就回到了火车站。

莫斯科到海参崴路上走了九天时间，期间的事情可以大书特书。我们所乘坐的车厢里面的条件，跟我所习惯的国际卧铺不可同日而语。车厢是敞开的，隔板上只是薄薄的床垫，睡上去很硬。我们这个隔间里——过道横着摆着两个上铺，两个下铺——还有一个新兵，也是去太平洋舰队的。他比我们都大，30 岁上才从列宁格勒船舶制造学院夜校部毕业，跟我们一样由于上学而推迟了服役。我们的新战友叫彼得，他用自家制的香肠款待我们，香肠是老家的人寄来给他路上吃的，他父母在老家的集体农庄工作。

到第三天，车厢里所有的人相互都认识了。在一些车站，停靠的时间长的话，乘客就跑到小卖铺或者道边的小摊上去打水，买吃的东西，然后在站台上转悠，等着列车鸣笛。再往前走，西伯利亚

有一段是单行线。有时在岔道口要等很久，给迎面来的列车让道。海参崴的早晨雾蒙蒙的很温暖。起初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像俄罗斯中部的省城。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很有特色。当时那里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有几条街看起来颇像纽约或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还有一家中国剧院。许多街头小贩向行人兜售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宫灯，折扇，奇异的象牙制品等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蔬菜基本上都是勤劳能干的中国和朝鲜农民提供的。其中许多蔬菜品种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

我在那儿服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驱逐中国人。很快他们就全都被赶走了，滨海区的经济由此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手工业衰落，中国剧院被封，蔬菜彻底不见了。从那时一直到今天，蔬菜基本上都是从乌拉尔和乌克兰运来的。

我们打定主意不马上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将行李交存之后，便出发去市里参观。由于我们身着便服，随处可见的陆军和海军纠察队并不注意我们。我们在最好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喝了一杯，庆贺抵达服役地点，看了一场刚刚上演的反法西斯影片《奥本海姆一家》，下午才到司令部报到。

值班军官教训我们没有从火车站直接来报到。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想到，从莫斯科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于是可以轻易地推测出，我们在城里逛荡了一整天。他叮嘱我们今后不要违反纪律，此后是简短的面谈，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们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程处。这时，专门管我们的军

士长米谢科也来了。他把我们四人领到位于列宁大街的红海军宿舍，按照海军的术语，宿舍被称作底舱。

在大楼一层的一间大屋里，放着十几排铺位，铺着军用被子。我跟阿尔卡沙的床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放个人用品的小柜。早晨，我们领到了红海军军服——常服、厚防水布工作服和礼服。整整两年里，底舱应该是我们的家。我们统共是四十多个有高等工科教育背景的年轻小伙子。每天早晨，米谢科带着我们排着队去上班，这样，我们身穿水兵服，在八小时之内作工程师，而下班之后，又重新变成普通水兵，排着队唱着军士长起头的歌。

米谢科关照着，让我们及时领到必需品，每周两次带我们去澡堂，每个月一次去理发馆。这里允许我们留头发，使人的情绪略好一些。与此同时，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兵们要求非常严格，认为这些人应该严加管教。

逐渐地，我们习惯了值班、因为每个小过失而被罚做班务，军士长非常喜欢的夜间紧急集合，以及少有的放假等等固定的程式。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这些休息日。渴望身穿崭新的军装美一美，在城里的主要街道列宁大街上逛一逛，观赏金角湾的美丽风景，以及样子别致、似乎剪纸一样小山包的侧影，它们围绕着城市，在远东出奇明净的冬夜天空下，横空出世一般。

如果外出的话，我们一般都要提早做准备。头天晚上，把裤子压在床垫下，使裤缝笔挺，擦洗水兵军服的铜扣，皮鞋打得锃亮。弄好无檐帽底上的绳箍需要特别的技巧——这样帽子戴在头上十分

好看。写着令人自豪的“太平洋舰队”字样的飘带要压得平平展展。最主要的装饰是蓝底带白道宽宽的水兵服领子。要想看起来像个久经风浪的水手，领子必须让它变成退色的，好像被海浪浸透、被热带的太阳晒焦似的。所以，领到军服之后，要马上把领子放到盐水里，让颜色达到所需要的程度。

太平洋舰队的俱乐部时不时举办冷餐舞会。我们尽量不错过机会。这里也有司令部各处，其中包括我们工程处的外聘工作人员：女打字员，女复写员，女秘书等等。一句话，献殷勤的对象是有的。跟我们同一路来的彼得没有花眼，很快就找到了意中人。我没情绪谈恋爱，而只限于跟漂亮的、长得白里透红的打字员玛沙之间柏拉图式的友谊，她成了我的舞伴，经常跟我一起散步。我们在俱乐部里迎接了新的1939年，装扮了新年松树，凑份子吃了晚饭，跳舞和抽奖等。然后，利用军士长不在的机会——他那天晚上在家过，在底舱里闹了一会儿。有人拿来了一瓶纯酒精。当第二年兵，有经验的小伙子们，教我们这些新兵对付这种暴烈的酒水：干完一杯，不吸气，喝一口水，然后再吃东西。我们大吃大喝，而值班的人站在哨位上，一旦领导突然出现便发出警报。大家都彻底放松了，插科打诨，说各种笑话和趣闻。“躲开啦！……”值班员向我们示了警。但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变得迟钝。我们奔向铺位，想盖好被子装睡，但是做得不老道，但最主要的，是在桌上留下了“犯罪”痕迹：没有喝完的酒精和杯子。

在门口，值班员试图挡住军士长的视线，大声报告道：“军士长

同志，底舱一切正常，红海军战士都在……”

但是，米谢科锐利的目光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起床，”他声音洪亮地下命令，“在一甲板集合！”

军士长指的是门口床铺之间的过道。我们不得不掀掉被子去排队，大家的样子十分滑稽：有人穿着内衣裤，也有人穿着水兵衬衫和工作裤。

“向右看齐！”军士长下着命令。

接着便是一顿臭骂。他真是骂得我们狗血喷头！他威胁要给每个人写一份报告，关到禁闭室去，发配到“岸上”去（好像我们的底舱在船上一样）。出完气之后，他接着讲我们的良心，数说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配的行为。他特别喜欢用这一点来压我们。最终宣布，明天，新年，所有人都不放假，给每个人派了额外的班务。有人要清洗底舱的地板，有人要清洗厕所，其他人清理院子等等。早晨，我穿好衣裳，拿着拖把和一桶热肥皂水，开始擦洗地板，一边不停地骂着鬼。对我来说，新的一年从未这样开始过！我没有想到，这一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变化。

元月份快要过去了，有一天军士长叫过我说，晚上八点我必须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事出意外，我忍不住问道：什么人为什么叫我去？军士长叫我别多嘴，快些准备礼服。

于是，我一边准备，一边一刻不停地想着，这个传唤意味着什么？两个月服役期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叫上司注意到的事情。我左思右想，只是事后才明白，这些猜测都离题太远。事情是这样

的。

如上文所述，我是1938年被征召到太平洋舰队的，也就在斯大林在陆海军的清洗开始后不久。一大批陆军高级将领被审判和枪毙之后，镇压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各个军区和海军。这个浪潮也波及到了远东，舰队的指挥人员全部被撤换掉。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他的参谋长伯格杰科海军上校，工程处处长工兵中校沃龙措夫到任之后发现，他们被要求学习英语。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潜在的敌手是日本。而美国可能成为潜在的盟友，最终事情也就是这样。因此，预计可能跟美国海军进行合作。这样，司令部指挥人员掌握哪怕最基本的英语知识也是好的。前任的将军们要么懂语言，要么吸引旧知识分子作教员，曾经学习过。教员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是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出来的，但不知何故没来得及撤到哈尔滨或者上海去，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当然，这些人在1937年之后全都被作为“日本间谍”关起来了。由于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放进司令部，新的指挥官开始在军人中寻找懂英语的人。叫干部处的负责人看一看，有没有合适人选，于是他注意到了我的档案。就这样，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不幸之上……

-----

在太平洋舰队(3)

-----

当我在指定时间，收拾干净服装整洁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时，所有这些情况我并不知道。司令部所在的大楼，是沙皇时期留下来的。深色橡木的墙壁，铺着厚地毯的走廊，值班警卫的军容和礼貌，宽大的，挂满油画的参谋长办公室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到了特别的激动。内心里有某种预感，似乎我现在踏上了一条诱人而神秘之路。

从桌子后面站起了一个身材沉重、但很年轻的海军上校。他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伯格杰科。桌旁的椅子上，坐着工兵中校沃龙措夫。

“参谋长同志，红海军战士别列什科夫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我精神抖擞一口气说出来，举手抬向帽檐。

伯格杰科随便吩咐了一声“稍息”，请我坐下。然后拿起一个黄色文件夹，开始翻阅。“这里写着，您熟练掌握英语，”他开始说话，“是这样吗？”

“是！”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一一作了解释。

伯格杰科又开始翻阅文件夹。从军装口袋里抽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洒过香水的手绢，抹过上唇。然后问道：

“您能不能教英语？”

“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我的专业是工艺工程师。”

“这个我们知道，可是您总记得，是怎么教你们的吧？”

“记得。”

“这样的话，显然您可以教其他人了。”

“我从未教过，但是，如果您有命令，我试一试。”

“这就对了嘛。现在有一条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司令员，参谋长和工程处长必须学英语——大洋的另一边是美国。明白了？”

“明白了，海军上校同志。”

“我们想，让您给我们教英语。”

“是的。”我回答道。

“那我们谈谈细节问题吧。”沃龙措夫说。

我当时便得知，每次课为两个学时，每周上两次课。每个课时付给我 25 卢布。如果有必要另外备课的话，我的顶头上司会得到命令，给我时间去市立图书馆。

我几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了司令部。我边走边想，我的生活中真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不再完全依赖于军士长，此外还能小挣一笔：在红海军战士每月 12 卢布津贴之外，我还可以再有额外的 400 卢布——真是太好了！

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备课。当然，熟练的英语知识，还有，我没有忘记是怎么教我的，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此外，我的学生也是非常认真。事情开始走上了正轨。过了不久，我买了一台“费德”牌照

相机，它是捷尔任斯基劳改营的犯人们按照德国“莱卡”公司的许可制作的。这个一下子使我变得非常受人欢迎。我不断地重温，生活是美好的，令人惊异的。其他更好的事情想也不能想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过了不久，库兹涅佐夫上将被任命为苏联海军总司令，去了莫斯科。很快，伯格杰科和沃龙措夫也随他而去。新任领导眼下看来顾不上学英语。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没有表示兴趣。

我重新落到军士长的手里，他当然绝不放过机会，在我身上捞回老本，不断给我额外的活计。从前上班的日子又回来了，仅有偶尔一次去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岛公干，才会有新鲜感觉。有时，在休息日，我们会到“十九公里”去，彼得大帝湾，这里天气转暖开始游泳。

国际局势迅速恶化。远东地区，日本的挑衅从未停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有关新的义务兵役期的命令颁布了。取消了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优待办法。另外，海军的服役期也延长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当五年的红海军战士。我感到灰心丧气。别里亚耶夫和艾尔里赫曼申请编入正规军干部序列。这样，他们会自动被授予军衔，以及相应的物质待遇。但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我。我在等待着……

八月底，来了一封电报。我被紧急召往莫斯科的海军总司令部。

## ----- 波兰问题 -----

波兰被西方和斯大林当作了一个缓冲地带，双方都在争取对波兰的控制权。

波兰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的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按照当时莫斯科的解释，苏联的立场整体而言是很明智的。斯大林多次声明，乐于看到复兴之后的波兰成为一个强大、独立、民主、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同时，他坚持承认 1939 年新的苏波边界，跟协约国 1919 年提出的“寇松线”大致相当。在这些条件下，莫斯科同意跟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丘吉尔在德黑兰提出的建议也大致类似。他提交供斯大林和罗斯福审议的表述如下：“原则上确认，波兰人民和国家的中心应该位于所谓的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本省。”

苏方支持了丘吉尔的建议。至于罗斯福，他原则上同意上述划线，但警告说，在 1944 年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之前，考虑到波兰裔选民的反应，他将避免任何公开的谈话。两位西方领导人也理解苏联政府让波兰作自己友好邻邦的愿望。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立场消极，事情毫无进

展。然而，到1944年夏天，出现了达成协议的可能。在跟美国大使哈里曼的一次谈话中，莫洛托夫提出了新的妥协方案，为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其内容是，由居住在英国、美国、苏联——没有法西斯色彩（以及实际上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中）、对苏联友好的波兰人组建政府。作为这样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的成员，他提到了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过学的兰格博士，领导过美国斯拉夫人大会的工会领袖科尔瑞斯基等人。米克拉伊丘克可以留任这个政府的总理。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给奥斯卡·兰格颁发了前往苏联的护照，他在那里应该参与讨论波兰问题，而讨论则应在丘吉尔和米克拉伊丘克前来莫斯科之时安排进行。

然而，在前往苏联之前，米克拉伊丘克决定访问华盛顿。见到罗斯福之后，他问道，波兰人应不应该接受苏联的方案。于是这里出了一桩怪事。前不久还在德黑兰同意了丘吉尔有关“寇松线”边界表述的罗斯福总统，却要米克拉伊丘克“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紧接着，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坦梯纽斯给波兰人解释说，目前，美国无法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回到自己基本道德原则上来，届时可以强有力地并富有成效地支持波兰”。

美国政府如此出人意料的转变，帮了波兰倒忙。在华盛顿取得的教导鼓舞了波兰流亡政府。米克拉伊丘克对奥斯卡·兰格达成协议的理由听也不要听。他决定不达成任何协议。而流亡活动家避开苏联政府准备的、未能成功的华沙起义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对我而言，迄今仍然不清楚，白宫建议米克拉伊丘克回避协议时，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似乎跟大选的考虑有关，因为，大选之后，华盛顿对波兰问题的兴趣明显减弱。就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谈判期间，米克拉伊丘克打电报给罗斯福，请求支持流亡政府的立场。直到11月7日，也就是总统大选结束之后，他才得到答复，并且也不是他所期待的内容。总统冷淡地回答说，他支持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达成的任何协议。有关边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提起，但是，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的“强硬”立场却被透露给媒体，于是美籍波兰人投了罗斯福的票。

当然，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1944年莫斯科谈判结局积极的情况下，事件会如何发展。同样不能排除的是，如果有关各方当时得以达成协议，由米克拉伊丘克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流亡政府便可以在苏军解放华沙之后，从伦敦迁回来，并且波兰人民可以避免许多动荡和牺牲，同时盟国之间的关系会少许多戏剧性。

-----

斯大林的秘密

-----

罗斯福总统多次警告斯大林日本将进攻苏联，结果这些情报并

没有得到证实，因此强化了斯大林对罗斯福的疑心。

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没有把日本即将进攻珍珠港的情报转交给美方。

在回绝了斯大林关于派遣美军到苏德前线作战的建议之后，罗斯福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对与苏联合作对付日本表现出兴趣。1941 年秋，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一封信，其中指出，根据美国政府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情报，日本打算在近期进攻苏联滨海地区。因此，罗斯福建议斯大林讨论有关在远东地区建立美国空军基地的问题。总统想了解，苏联领导人对于一个美国特别军事使团前往莫斯科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有何看法。同时，罗斯福还建议通过阿拉斯加和楚克奇向红军转运美制飞机。

美国有关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相当准确的。况且，柏林向东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促使日本政府加入对苏联的战争。这个问题也使斯大林感到担忧。但是，总统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怀疑。关键在于，苏联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的情报对局势有不同的说法，这渠道其中也包括苏联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驻东京，并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报告的副本是上报给莫洛托夫的，因此，很自然地，我在向人民委员报告之前阅读过。报告的内容是，在东京的领导层内部，在选择主攻方向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有一批人主张在苏联远东展开军事行动，另外一批人则坚持打击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向东南亚方向推进。在最后的几封电报中，佐尔格报告说，天平向

南方倾斜。最近，用拉姆扎伊为绰号署名的密码电报中，他报告说，必须等待对美国的打击，因此，起码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莫斯科可以不必担心日本的进攻。这使得斯大林将部分部队从远东抽调到莫斯科地区。1941年12月初，这些部队参加了首都保卫战，而在莫斯科，德国人第一次遭到了惨败。

在某一封电报中，拉姆扎伊更详细地报告了日本人的计划。他指出，日军很可能会打击美军在夏威夷群岛上的海军基地。这个情报上报给斯大林时，正当罗斯福总统仍在坚持警告苏联领导人，日本可能对滨海地区发动进攻。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没有将理查德·佐尔格的情报转送给罗斯福。为什么？可能，他以为，罗斯福会将这个情报看作是斯大林企图挑拨华盛顿参战，恰如斯大林将罗斯福的警告看作是白宫企图将克里姆林宫拖入对日作战。但我觉得，斯大林多半出于其他的考虑。他认为，日本的攻击越是突然，越是阴险，破坏越大，美国人民对法西斯“轴心”作战便会越凶猛。

调兵到苏德前线，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是个十分艰难的决策。他们被迫冒险。在这种局面下，罗斯福的警告以及共同对日采取行动的建議更需要小心对待。罗斯福警告莫斯科滨海地区即将可能受到威胁的努力是真诚的吗？或者是，当知道了日本即将打击美国领土之后，罗斯福想利用俄美在远东地区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协议，以便使日本的计划改为北方？斯大林的多疑，使得他得出一个结论，正如在与德国作战的情形一样，罗斯福希望避开日本的打击，并将其转移到苏联身上。也许，这样设想美国总统的动机根本就不公

平，但斯大林已经得出了结论。他拒绝了罗斯福总统有关在滨海地区为美军轰炸机准备基地的建议。斯大林同意美国特别军事使团来莫斯科，但却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如何将美方向苏联提供的歼击机投送到苏德前线这一个问题上。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斯大林得出结论，他正确地评估了罗斯福信函的实质意义。有趣的是，此后罗斯福数次警告斯大林似乎日本人正在准备攻击苏联。譬如，1942年6月17日，新任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斯坦利向斯大林转交了总统的亲笔信，其中称，太平洋北部，以及阿拉斯加地区局势的发展，不能排除日本对苏联滨海地区采取行动的可能。“如果发生类似的入侵，”信中说，“那么美国愿意使用空军对苏联进行援助，条件是苏联向美空军在西伯利亚地区提供合适的着陆场，当然，为加快行动的实施，必须认真协调苏联和美国的努力……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因此有理由授权给苏美双方的代表开始工作并拟定专门的计划。”

这封信也使斯大林警觉。他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并对美国大使解释说，当苏德前线仍在激战，德国师团向伏尔加和高加索高原推进之时，苏联政府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以避免增加与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显然，在得到此次交换意见的信息之后，罗斯福明白了，他无法推动莫斯科采取真的会使苏联远东局势复杂化的步骤。无论如何，8月5日，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信件，其中说，“我得到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可信的资料，即日本政府决定，目前将不采取针对苏

联的军事行动。如我所见，这表示，在明年春天之前，对西伯利亚进攻的已被推迟。”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不断询问，苏方何时可以加入美国对日本的战斗。并且，莫斯科哪怕是在原则上何时可以决定参战的问题。

斯大林很长时间没有对这些问题作任何答复。但是，在美国国务卿赫尔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做出决定，时间到了，可以使局势明朗化了。

1943年10月30日晚，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厅，斯大林为祝贺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工作结束举行了宴会。最长的一张桌子沿着一面墙，这边的窗户正对着莫斯科河。斯大林居中，他的右首是赫尔，左首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我作为译员坐在赫尔的右首。

宴会以许多人的祝酒词开场，其中大多数时间是斯大林在祝酒。在讲话的间隙，斯大林与赫尔谈的基本上是战争前线的局势，以及刚结束的这次会议的成果。时不时会说一些长句子，这样，我也来得及吃几口饭。

突然，我发现，斯大林在赫尔背后弯下身子朝着我，用一只手指示意我。我弯下身子，离他近些。这时，他压低声音说道：

“仔细听我说。给赫尔翻译如下内容：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且做出决定，在盟军打败德国，欧洲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对日作战。让赫尔将这个情况作为我方正式立场转告给罗斯福总

统。但是，我们暂时想保密。所以，您自己小声说，不要让别人听见。明白了？”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我小声回答说。

这个消息使赫尔万分激动。美国人早就在期待着莫斯科的决策。现在，美国政府获得了对华盛顿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权威声明。白宫将苏联对日参战与保存百万美军士兵生命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在 1945 年波茨坦会议期间也曾经使杜鲁门总统十分感兴趣。在得到斯大林确认苏联对日作战之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如此一来，他达到了会前给自己立下的最主要目标，并且他考虑的是，现在美国青年的生命可以保存。

为什么斯大林在 1943 年 10 月初次将这个决定告诉美国人？我想，这里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和德军在库尔斯克大败之后，红军飞速向西方推进。因此，甚至即便日本人得知了苏联的决定，其在滨海地区先发制人采取行动的 danger 微乎其微；其二，将对日作战的日期与战胜德国的日期联系起来，斯大林让华盛顿明白，在法国登陆越早，加速战胜“第三帝国”，苏联也就能够早日加入对日本作战。可以认为，正是这一点促使西方盟国做出了在法国登陆的决定。

-----

核子外交

-----

“曼哈顿工程”伊始，苏联便掌握了相关的情报。但美英领导人却决意独霸原子弹的“秘密”。

这不能不使莫斯科感到威胁。“冷战”缘此而起。

虽然在杜鲁门总统时期，原子弹才成为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其制造过程中，这个武器甚至在未经试验之前，已经对罗斯福总统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并且间接地在美国制定战后政策，其中也包括对苏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性，首先使从事建造工作的科学家们感到担忧。他们就原子弹出现的危险后果多次提出警告。然而，美国与英国的最高领导人最初显然认为，这只不过是新型且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而已。他们忽略了核弹制造者的警示，正如此后萨哈罗夫院士对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警告被忽略如出一辙。尤其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恼火的，是科学家们要求向苏联公开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当然，在历史上，某个国家与别国分享新式武器资料的事情，从来不曾有过。相反，任何类似的发明都被严加保密。但这里却是一种特殊情形。首先，核弹是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制造的，当时盟国之间广泛地交流军事情报和新式武器。雷达，复杂的通讯系统，导弹技术，新式坦克，飞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似乎是共同的财产。为什么原子弹是个例外？其次，不仅是

美国，而且有英国，也就是联盟的两个重要成员，知道建造核弹的工作，对第三方伙伴隐瞒，便是不祥之兆。其三，科学家们十分清楚的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武器。它的建造需要全新的方法，实际上，是全新的世界观。但是，这些新的观点在那种情况下能否产生呢？未必。因为过了几乎多半个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才开始打通道路。

虽然，由于保守原子弹的秘密，华盛顿和伦敦感到不自在，但依然决定不听从“幼稚”科学家的劝说。与战后对苏联态度有关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立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决定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所有这些，不仅仅关涉战时美国外交，而且涉及战后时期，同样也涉及“冷战”产生的原因。

我想，关键在于，当时美英领导人有这样一种信心：即核垄断将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从别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苏联，争取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让步。

这一点，从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对自己的任务如何理解这一点，也反映了出来：“从我开始负责这个工程之初过了两周之后，我已经确信无疑，即俄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曼哈顿工程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我完全不赞同国内流行的，什么苏联是英勇盟友的观点……当然，对此多次向总统做过汇报。”

那又如何？最高统帅并未宣布不同意自己的下属。

1943 年夏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协议指

出，原子弹是“战后世界上决定性的因素，并且赋予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以绝对控制力”。总统与首相承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任何资料。

必须提到的是，魁北克会晤，是为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以及“三巨头”首次德黑兰会晤做准备的期间举行的。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谈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几个大国维持和平的责任。在德黑兰，在与斯大林谈话时，罗斯福总统多次指出了战胜法西斯之后，作为维持和平，保障世界安全决定性因素的美苏合作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曼哈顿工程的背景下。罗斯福谈论到了有义务维持全面和平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但是，总统却避而不谈，这四个警察之中，其中仅有两个将拥有原子弹。

早在这个阶段，华盛顿和伦敦已经采取措施，封锁其他国家获得裂变材料的途径。1944年6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了监护宣言，其中指出，美国与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将合作以期建立对现有铀以及钍的储存的监督。接着，宣布了两国政府的意图，即“在各自司法管辖地区的疆界之内，以及其他两国政府、印度和缅甸自治政府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尽可能全面地监督铀及钍矿石的供应”。

丹麦物理学家尼斯·波尔——美国原子弹的建造者之一——于1944年采取最后一次尝试说服罗斯福总统，有必要向莫斯科通报有关制造新武器的工作。然而，9月中在自己的庄园海德园会见丘吉尔

之后，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一起确认不改变保密规定的决定。此外，两位领导人得出结论，即“不能信任波尔”。1944年9月19日签署的文件中，最后一段写道：“必须调查波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以免通过他发生泄漏情报，尤其是泄漏给俄国人。”至于波尔建议的实质，在这份文件的第一段有明确的回答：“建议让全世界（实际上是苏联——作者注）知道合金（原子弹的代号——作者注），以签署对合金，以及使用进行国际监督的协议，是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应该严格保密。”

在里瓦迪亚，1945年2月三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期间，罗斯福曾经询问丘吉尔，是否应该在此次会晤期间将曼哈顿工程的情况通报给斯大林。丘吉尔坚决反对，称这种建议“有伤体面”。罗斯福再也没有坚持。这样，为战后与苏联合作建立更加良好气氛的最后一次机会被错过了。

还必须补充的是，苏联领导人在曼哈顿工程的早期阶段，就从自己的谍报人员处获得了情报。也许，斯大林应该通报罗斯福，曼哈顿工程对他并不是秘密。应该认为，这也许会使我们的盟友困窘。但也许有可能促使他们讨论对原子弹以及原子能进行共同监督的问题。

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对美国人而言意义重大。美军正在太平洋地区苦战。盟军在西欧的局面也不轻松。雅尔塔会晤前夕，他们甚至请求斯大林提前开始苏军新攻势，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当时情况下，与苏联对抗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美国和社会舆论

强烈倾向于保存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罗斯福能够依赖这些情绪，对付极右势力的压力。

西方盟国的沉默，被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威胁。他委派贝利亚负责建造苏联核武器的工作。核军备竞赛便是这样开始的。同时，斯大林的怀疑，以及“他对战后可能合作的疑虑”进一步强化了。

-----

我奉调来到莫斯科

-----

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高级军官教授英语，这个简短的经历，后来直接把我送到了斯大林的身边：当时国内外语人才奇缺。

一般苏联人对1939年8月23日与希特勒德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与纳粹的协议使人感到有伤体面。从极端敌视到合作这个急转弯，由于多年的反法西斯宣传，在我们的意识里不能接受。

另一方面，不管这有多么离奇，与德国哪怕是短时期的关系正常化，也使人们感到轻松。战争的威胁如箭在弦上，西方民主国家对我们态度冷淡，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我们充满敌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武装挑衅，所有这些产生了孤立无援、不祥的隔绝之

感，兆示着新的牺牲和苦难。

消除法西斯进攻的直接威胁，使许多人产生了希望，即我国哪怕在短时间内可以置身战争之外。现在，当希特勒将自己凶残的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时，我们似乎可以指望，和平的喘息会继续下去。如果德国在西方开战，而且大家都认为，战争将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而我们将置身事外。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法国在几周之内即被打败，并且到 1940 年夏天时，几乎整个西欧都处在纳粹的统治之下。

此外，我国——当时惟一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可以获得不少好处。在互不侵犯协议签署前几天达成的苏德贸易协定，规定了向苏联供应现代设备和新技术，这对我们海军而言也是有好处的。正是这个情况，在我的命运中起了作用，把我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普通一兵推到了斯大林政权金字塔的最顶层。

当时，需要懂德语的人才。从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期，我的“学生”之中有人推荐了我——于是，我被召到了莫斯科。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深夜抵达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这里挤满了转车的乘客。长椅上挤着大人和小孩。单身旅客则头枕着简单的行李睡在地板上。我费了很大劲，才在一个候车室找到了小角落，我安顿下来过夜：铺开一张报纸作床单，装行李的包袱则作了枕头。当时，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

在石板地上睡觉当然不很舒服。此外，还得操心——被人偷走了写着“太平洋舰队”字样的无檐帽，或者从脚上脱走了公家发的皮

靴。并且，心里一直还在想着，在首都会有什么事等着我，干吗叫我到这儿来。

一大早，掸去灰尘，在站前盥洗室匆匆刮过脸，便出发前往果戈里路的海军人民委员部。我用自动电话上拨了预先给我的号码，然后在门卫室等待。过了大约10分钟，大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位打扮非常利落、身穿海军中校军服的中年男子。我飞快地站起来，行了礼：

“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

“稍息。”一个悦耳的低音打断了我。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感觉到，现在应该决定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坐下来，我们谈一谈……”

此人和蔼可亲的语调，客气的举止消除了我内心的紧张。我们在一张小桌子边上坐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跟我谈话的，是叶里扎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扎伊采夫，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且因为战功卓著被授予当时非常稀罕的红旗勋章。在卫国战争期间，扎伊采夫海军中校是海军人民委员部外事局的局长，所以，很自然地，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贝利亚指控扎伊采夫为英国间谍，并将他投入监狱。党的二十大之后才得以出狱，其时他已经疾病缠身，精神崩溃。

扎伊采夫用赞许的语调询问了我在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情况。我告诉他，入伍之前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在哪儿学的外语。当得知

我如何过了一夜之后，他说，在距离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警卫宿舍给我留了一个床位。他并解释说，有关我的具体任务，将在最近几天定下来，并建议我利用空余时间熟悉莫斯科。他当即给了我临时证件，这也是宿舍和海军总部的通行证，我可以在水兵食堂吃饭。很快，扎伊采夫再次叫我过去。这次，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里面的装饰是各种军舰的模型。这里我得知，我被借调到海军总部作外勤。

扎伊采夫接着介绍说，他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决定带我一起去。这次，扎伊采夫身着便装。他解释说，有时要执行一些任务，军装不方便。并且，现在我们两个都必须穿便衣。

“您当然没有合适的衣服了。”他半是询问，半是肯定地说道。

“是的，海军中校同志！”

“干嘛要这么正式！您必须习惯老百姓的角色。请按照名字父称称呼我。”

“是，叶里扎尔·亚历山大洛维奇。”

“这不，这样就好多了。并且可以不必说是。现在我们来办理您的装备。”扎伊采夫叫了车，于是我们出发去特种服装仓库。

扎伊采夫为我挑选了一套蓝色条纹西装，半打白色和浅蓝色的衬衣，几套内衣，手绢，袜子，黑皮鞋和一只不大的皮手提箱。所有这些外国货。

“明天晚上，”扎伊采夫说，“我们将要乘坐红箭去列宁格勒。您必须穿上便服，习惯新服装，带上箱子，22 点整到海军人民委员

部。”

-----  
斯大林给希特勒提供方便  
-----

斯大林愿意为希特勒提供任何方便，而“不来梅号”，便是这样一个机会。这也是我调到莫斯科之后，第一次执行秘密任务。

火车上，我们在“国际车厢”的一间双人包厢里。我以为，扎伊采夫一边喝茶，一边会告诉我任务的内容。但是，他只是讲了讲巴黎的事，然后就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给了我几个建议。我谢过之后，补充说，1934 到 1935 年间，我在基辅“国旅”做导游，这方面有一点经验。

“我知道，”扎伊采夫说，“所以我带上了您。”

从谈话之中，仅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见外国人。

在列宁格勒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海军上校纳乌姆·所罗门诺维奇·符卢姆金接待了我们。他大致介绍了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后的局势，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为保障苏联海上边境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在接下来跟符卢姆金的谈话之中，我大致弄清楚了出差的目的。原来，一艘德国客轮“不来梅”号应该抵达摩尔曼斯克港。这

艘船经营着汉堡—美国航线，并且恰好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抵达纽约。

“不来梅”号，以及同类型另外一艘船——“欧罗巴”号——是当时最先进，最舒适的客轮，跟英法的客轮成功竞争。当时，内燃机船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

英法对德国宣战之后，英国当局请求美国扣留“不来梅”号抵债。港口方面通知“不来梅”号船长阿列斯，称他的船被扣押了。但是，阿列斯船长却利用了美国人的疏忽大意。夜里，“不来梅”号悄悄离开了码头，驶出哈德逊湾，消失在大西洋中。英国人组织了追捕，但白费力气。后来才发现，“不来梅”号驶向北方，在浓雾之中幸运地避开了冰山，小心翼翼地沿着极圈行驶，到达苏联的领海。在接近莫尔曼斯克时，阿列斯船长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与柏林联系上了。柏林向莫斯科求援，并很快获准让德国班轮停靠苏联港口。

当“不来梅”号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我们跟扎伊采夫、摩尔曼斯克港口负责人以及地方政府的代表已经在栈桥上等候着。排水量三万四千吨、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湾的庞然大物，停歇在锚地。我们乘快艇跟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代表赫尔瓦特女士一起来到船舷边。舷梯放下来了，我们登上了主甲板。

阿列斯船长对摩尔曼斯克港提供了躲避的机会表示感谢，用桶装冒着泡沫的啤酒、可口的灌肠和腌白菜招待我们，然后安排参观客轮。豪华的餐厅，音乐厅，吸烟室，游泳池，带着一排排躺椅的露天和封闭的甲板，运动场，以及设施齐全，装修典雅的客房——这

些舒适说明了对旅客特别的关心。但是，船上并没有旅客。可是，船员几乎有一千人。在为准备后送办理手续期间，船员们留在船上。晚上，快艇将“不来梅”号的船员送上岸，这样，他们可以在摩尔曼斯克的国际俱乐部消磨时间。类似的俱乐部几乎在苏联各个港口都有。

我们也去过几次摩尔曼斯克国际俱乐部。那里的气氛非常有意思。国际俱乐部的常客，是进入摩尔曼斯克的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等国船上的海员。虽然俱乐部里有一个小型阅览室，里面的桌上放着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苏联建设》等杂志，以及“国旅”的广告小册子，主要的娱乐是喝酒、跳舞。举止放肆的当地女郎点缀其间。打架的事也经常发生，这时，经常在俱乐部执勤的海军纠察队便会礼貌但坚决地将打架者分开。造访俱乐部，可以有机会结识海员，跟他们喝啤酒聊天。对于掌握德语英国的我来说，开始这种话头毫无困难。任何一个海员都会讲其中的一种语言。我也帮助不懂外语的扎伊采夫在俱乐部聊天。中立国对战争的态度，海员们可能掌握的情况，英法对德采取积极军事行动的准备等等，他都感兴趣。每次回到旅馆之后，他都会将所有这些仔细地记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

终于有一天，在栈桥上出现了两列硬卧专列。其时，德国海员名单已经拟定，旅行证件也办理妥当。除了船长阿列斯，他的两个大副，以及一小批轮机工和海员之外，其他所有人都离开了“不来梅”号。后送的海员被安排在各个车厢里，此后，两个专列分别出发

了。扎伊采夫委派我将德国海员送到边界，自己则回了莫斯科。我乘坐第二辆专列，帮助车长跟德国人交流，并且自己也努力作个殷勤的主人。我从一个车厢转到另一个车厢，询问身体情况，排解餐车里的误会，于是一路上跟许多海员交了朋友。这种交流，也是很好的语言实践。

“不来梅”号直到十二月中留在摩尔曼斯克，后来，在极夜的掩护下沿着中立国挪威的海岸驶往德国领海，并且回到了自己的注册港——汉堡。在这里，这艘船被改装为浮动医院，但它作为医院船服役的时间很短。不久，它便被英国空军击沉。

在摩尔曼斯克掩护“不来梅”号是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后，苏方向德国提供的第一次重要帮助。总体而言，与苏联改善关系，使希特勒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

“丘吉尔，你裤子的拉链开了”(1)

-----

斯大林需要知道对手的一切，甚至连丘吉尔丢弃在垃圾筐里的废字条也不愿放弃。

这里讲述了 1945 年三巨头会晤期间的一桩趣事。

英国工党政府外相与斯大林在厕所的有色笑话。

1945 年 2 月 4—11 日之间，在克里木举行的“三巨头”第二次会晤，标志着反法西斯联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将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也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新姆菲罗波尔附近的沙卡机场乘车前往雅尔塔，也使总统亲眼看见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占领的苏联土地上破坏的规模。我觉得，当时他非常诚恳地对斯大林说，他对纳粹分子变得“更加残忍”了。总统还强调说，胜利之后，美国应该首先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如果罗斯福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就会向我们提供美国设备，美国专家会帮助我们掌握新机器，而两国的关系也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并且，当时在里瓦地亚，与斯大林单独会谈时，罗斯福总统继续谈到了未来的计划，他似乎是从苏美战后可能合作出发的。斯大林同样对这种可能表示了欢迎。

整体而言，雅尔塔会议的气氛是良好的，这也促成了在日程的各个问题上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接近结束，联盟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出现。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罗斯福多次指出，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反对美国与苏联战后合作的力量也会活跃起来。因此，总统一一直在推进战后建设的设想，加快了制定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行动原则。

当时，三位领导人一致声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三大国的一致，保障三国共同维护持久和平的机制。

他们是否相信了这种可能？或者他们郑重宣布的目标跟他们的真实想法远非一致？

斯大林满心疑虑地接受了英国人提出，并得到美国人支持的、新的国际组织安理会投票规则的表述。他坚持保留“否决”权，于是，雅尔塔会议之后，就互相可以接受的程序达成了协议，苏方将此看作华盛顿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在战后发展关系的迹象。

有关雅尔塔会议，现在已经写了很多。那里讨论过的问题，以及做出的决定，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是，在雅尔塔似乎发生了对欧洲的分割。这完全不对。当时谈的是对德国的分割。并且，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坚持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小国家，而在这一次态度则相当软化。

苏方对分裂德国设想的现实性表示了怀疑。结果是，在雅尔塔决定，将此问题转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此后，这个问题从议程撤掉了。至于其他的东欧国家，除了此前提到的波兰问题之外，在划分势力范围这个意义上根本就没有谈到过。

有关领土问题只是决定把盖尼科斯别尔克以及东普鲁士与此接壤的地区转交给苏联，另外达成协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条件的（把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交还苏联）。

有趣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两位都把这次会议当成是权力平等的典范。罗斯福总统说它是美国历史中，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宣布说此次会见应该勾画出单方面行动，封闭性联盟，实施影响的范围体系的轮廓。总统还讲到，所有这一切将被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所代替，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能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

我认为，雅尔塔的经验，当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所建立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在处理国际事务以及苏美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能够引起巨大变化并朝好的方向发展。显然，雅尔塔开辟了通往这一切的道路。不管怎么说，莫斯科是这么感觉得。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三巨头”会议上气氛异常紧张。但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像我此前提到的那样，作为翻译不仅要口头翻译领袖之间的交谈和主席团会议的争论。还要编纂所有会议和会面的备忘录，准备起草发给莫斯科政治局成员和驻华盛顿、伦敦大使的电报文稿。此外还要负责翻译代表团之间交换的备忘录和留言。有时忙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德黑兰会议期间，有一次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和丘吉尔进便餐。那时翻译的位置不像现在是在领导人背后，而是在桌旁第一排。服务生给翻译的盘中上了所有异常讲究的饭菜。那一天我没来得及吃早饭，加之前一天晚饭也没吃，所以非常饿，但仍然顾不得吃，老是忙于翻译席间的闲聊。但当一份最好吃的菜上了之后，我不能自制，趁没人说话，赶快切了一大块，很快塞到嘴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要问丘吉尔问题。我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再把它吐回到盘子里，只是哼哼唧唧地说了些什么。

斯大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严厉地盯着我低声埋怨道：“你怎么搞的，难道是让你来这儿吃饭的吗？你在这儿是翻译，是工作来的。真不像话！……”好在罗斯福、丘吉尔对此反应很诙谐。两个人大笑

了起来。斯大林跟着也笑了，这下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从此之后在正式宴会上我再也不敢吃东西了。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有这么一件事。当激烈辩论有关开辟第二战线的问题时，许多人都发现，艾登给丘吉尔写了一个小纸条。首相读了纸条，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又交给了艾登。后者读了丘吉尔的纸条，把纸揉成一团，扔到了旁边的废纸篓里。会议结束，与会者都散去了，斯大林让我搞到那个纸条并向他汇报，纸条上写的什么。显然，他认为纸条上所写的会涉及英国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我和斯大林保安部队的一名军官一起找到了那张纸条，并迅速拿着纸条去找斯大林，当时他跟莫洛托夫一起在使馆的花园里散步。我打开纸条，读了出来：“温斯顿，您裤子的拉链开了。”接下来是丘吉尔的手笔：“谢谢。老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的。”斯大林乐坏了。1945年夏天，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失利。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了他的职务。和他一起前来波茨坦的新任英国外相，英国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恩内斯特·贝文。有一次在洗手间(有时翻译也要陪同自己的上司去洗手间)，贝文站在离斯大林的小便池不远，开玩笑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公厕是惟一地方，只有在这里劳动人民才能够用双手掌握到生产资料。”斯大林狡猾地笑了一下，也开玩笑道：“在社会主义世界也一样。”

我和扎伊采夫到摩尔曼斯克出差的报告得到了海军总部的批准。接着，我又有新任务——去基辅，归第聂伯军区舰队调遣。

能够到基辅，真是让人高兴。已经有一年多我没有去那儿了，

而现在可以见到父母，跟朋友们重聚。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按照命令的规定，我不能见任何人，必须立即赶到舰队司令部，那里会给我详细的说明。此外，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我也必须穿相应的服装。此次我应该身穿海军军服，但不是我在舰队服役时的红海军战士服装，而是海军上尉军服。连同制服一起发给我的证件上写着海军上尉。不过，有人立即告诉我，军衔仅仅是此次出差期间有效。

火车于清晨到达基辅。站前广场上空荡荡的。我看见了如此熟悉的车站大楼的正门，是现代乌克兰巴罗克风格，于三十年代建成。下着雨，感觉很冷。接送外国游客时，我到过这儿多少次啊！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僻巷，每个通往站台的过道。并且，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阳光明媚的夏日，鲜艳的黄色无棚大客车，衣着鲜亮而快活的少男少女们来到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

一台淡绿色“嘎斯”开了过来，帆布顶棚被雨水淋成黑色，于是，无忧无虑的1935年夏天的景象消失了。我坐在后座上，竖起风衣的领子，将帽子压低，以免有人认出来。

位于波多拉的司令部在等着我。他们向我通报了出差的目的。两天前，舰队沿第聂伯河逆流而上，然后抵达普里毕亚蒂的波兰边界。而我们——一小批水兵，其中也包括我——几个小时之后，也应该乘快艇沿着同样的路线进发。

-----  
“丘吉尔，你裤子的拉链开了”(2)  
-----

9月17日，连同其他红军部队，我们越过了苏波边境，并向宾斯克方向进发准备参加占领这个城市。

在拿给我们看的秘密文件中介绍说，红军执行苏联政府的命令，应该保护居住在波兰东部各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居民。对我们解释说，虽然红军陆军部队和海军在前波兰领土上是解放者，他们必须坚决镇压波兰白匪的任何抵抗。文件中最后指出，苏军的前锋部队，本着与德国新关系的精神，将与德军部队在相应的战地地图上所表示的界线战友般相遇。

对我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我国会成为希特勒德国打击波兰的军事行动的同谋。不过现在清楚了，为何派我参加这次行动。原来在某个预先协商好的界线上，我军与德军将有“战友式”的相会，于是再次用到了我的德语。而且，此次出差的秘密气氛现在也可以理解了。

早在9月17日拂晓之前，第聂伯区舰队的海军重炮海防艇和快艇逆流而上，抵达普里毕亚蒂，并越过了边境。由于没有意料到我军入侵，波兰边防军首先开了火，但很快被舰队的炮火压制住。此后，与受德军逼攻向东撤退的波兰部队有过几次交火。但是，波军

的抵抗没有组织，十分软弱。并且，我方的传单和无线电广播宣称，投降者将会得到和平、善待并被很快放回家。实际上，大多数波兰俘虏未能与家人团聚，而进了集中营，其中许多人遭贝利亚的刽子手屠杀。

如果不算几个轻伤的话，我军几乎毫无损失便到达宾斯克。在往前走，河水太浅，只能使用小型快艇。并且，距离我军应该与德国人汇合的界线，仅剩下了几公里。

这次汇合就像是“战友”相会。我军和德军指挥员相互道贺，为各自的“领袖”干杯。行动结束之后，在宾斯克、布列斯特等其他地方苏德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红军和德军将领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的检阅了部队。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指示，这种事便绝不可能发生。毫无疑问，苏德两国政府预先就波兰领土上的分界线达成了协议，并且很可能这个协议是在希特勒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期间达成的。

在二战开始五十周年之际，围绕着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件如何评价，展开了激烈争论。

关于希特勒与斯大林“分割波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两个独裁者“不道德阴谋”的文章连篇累牍。但是，作为 1939 年秋天事件的见证者，我无法忘却那些日子里，充斥着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气氛。所到之处，人们用鲜花、面包和盐的欢迎我们，拿出水果、牛奶来慰劳我们。一些小型私人咖啡厅免费招待苏军军官。那些感情绝不是装出来的。人们认为红军可以保护他们免

遭希特勒的迫害。在波罗的海沿岸，情况也类似这样。许多人逃离了德军占领区，到红军控制区寻求庇护。

-----  
帕布斯夫人推心置腹的一席话(1)  
-----

里根总统的助理帕布斯坚决反苏，但是，当年他们一家人是难民。而我曾经帮助过他们。时隔多年，我们在一个著名学府的研讨会上唇枪舌剑！

记得是在八十年代，有一次，在波士顿附近的威斯利学院举办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我应邀发言。我的辩论对手，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帕布斯教授，后来他做过里根总统的助理。

在论坛上就美苏关系问题发言的邀请，是该校主持俄国中世纪史，其中包括伊凡雷帝时期历史的尼娜·图曼金娜教授发来的。据尼娜后来向我介绍，她出身于彼得堡的大工厂主家族，拥有几家通心粉工厂，并以属于“皇室供应商”而自豪。但主要的收入，却来自垄断了俄军通心粉和其他面制品的供应。革命之后，图曼金家族移民国外，尼娜出生在美国。“五十年代，当我第一次到苏联，来列宁格勒大学就读时，”尼娜回忆说，“马上按我手里的地址去寻找，想看

一看家族的工厂是什么样子。跟我熟悉的照片相比，外观上基本上是老样子，只是年久失修的主楼大门上面挂着一个新招牌红色通心粉工厂’。父母告诉我，我们的产品享有盛誉。不过，学生食堂里我吃过的通心粉味道蛮不错的.....”

尼娜邀请帕布斯，则因为早先听过他关于伊凡雷帝时期的课程。

讨论之后，安排了晚餐，我跟自己辩论对手的妻子坐同一张桌子。跟帕布斯夫人的谈话最初彬彬有礼。然后，我们说起了论坛的题目，这里，我从她那里听到了出乎意外的一句话。她对自己丈夫谈到苏联时措辞尖刻表示了遗憾。我对她说，由于熟悉帕布斯教授的观点，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我总是感到不自在。”帕布斯夫人坚持说。“这是为何？”这个坦白真使我非常吃惊。

她解释说：

“我一直非常感谢红军，1939 年救了我父母一命。当时，我还很小。我们住在华沙，所以当德国入侵波兰时，逃往了东部，到了宾斯克，白俄罗斯西部的红军控制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的官兵对我们及其他难民有多么好。给我们饭吃，安排住宿。然后，苏联政府帮助我们转道维尔纽斯——当时的立陶宛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父母跟美国的亲戚通了信。这样，我们到了这边。如果不是红军，我们就完蛋了。留在华沙的所有亲戚，都被纳粹分子屠杀在犹太人区。里查德也是通过波罗的海国家逃出波兰的，但是，他不喜

欢回忆这些……”

当时，在宾斯克等其他地方，我们的确帮助许多人逃离纳粹虎口。由于掌握几门外语，我被留在西乌克兰从事难民事务，在利沃夫他们人数非常之多。譬如，当时我们帮助了美国著名小号手艾迪·罗兹内，希特勒入侵波兰时，他和自己的爵士乐队正好在波兰巡回演出。他愿意转道苏联，并且最初一段时间演出效果不错。我们也帮助世界著名的女歌唱家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在利沃夫安身。我们努力减轻许多其他难民的不幸。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料想到，在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人之中，会有未来美国总统助理的家人。

这些难民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帕布斯教授和他的夫人成了美国公民，进入了所谓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而艾迪·罗兹内和他的同伴们却不得不饱尝位于马加丹边疆区首府附近克累马集中营生活的种种美妙之处！在那里，他被迫用自己优美的演技愉悦集中营的头目们。

见到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对我是很特别的一件事。1937 年春天，她曾经来基辅巡回演出，在从前的商人公会大堂举行了几场音乐会。我带着一束红玫瑰，跟其他年轻的崇拜者一起挤到后台，并且把花送到了她的手中。奇怪的是，她记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一刻，因此，在利沃夫见到我之后，非常高兴。我弄到了第一排的票之后，请她观看红军战士的业余文艺演出。这对我而言，这实在是太轻率了。因为，当走近自己的座位时，我们发现旁

边坐的是利沃夫的国家安全首脑谢罗夫。他欠了欠身，用厚颜无耻的嘲笑表示了问候。她略微一点头，然后，熄灯之后，在我耳边悄声说：

“有人曾经介绍我认识他……我怕他。”

幕间休息时，跟其他观众一样，我们在近邻演出大厅的前厅溜达。还没来得及走两圈，就见一个身穿内务部队军服的年轻军官走到我们跟前：

“抱歉，”他对我说，“谢罗夫将军请您过去一下。”

我向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道过歉之后，便跟着这位军官走了。我们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走进了一间小屋。居中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各种饮料和冷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工作人员在围着桌子吃喝。谢罗夫将军站在一边。

“将军同志，您好！”

“您跟夏娃图斯卡娅有什么关系？”

我解释说，我是两年前她在基辅巡回演出时认识的，而现在偶然在难民之中遇见了她。

“这样的话，您必须立即结束这种交往！”将军严厉地命令说。

“为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并且按照您的军阶不该向我提问题。”

当时，要是他知道，跟他说话的不是海军上尉，而不过是个普通战士，他会将我关禁闭的。但我并未退让：

“我不明白，在她困难的时候保持这种老关系有什么可指责

的？”

“既然不明白，那我解释给你听：我们打算与她合作，所以任何人都不得插手。明白啦？”

“明白了，将军同志。”我回答说，并且感觉到这事将对我不利。

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将歌唱家送回饭店，并答应最近几天给她打电话。但我并没有做到。

谢罗夫将军没有局限于仅仅跟我谈一次话。次日，我接到了莫斯科首长发来的密电：停止跟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的一切接触。

我不知道，谢罗夫将军与夏娃·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合作”的意图最终是什么结果。很快，她被送往基辅，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保尔·苏多普拉托夫在《特殊任务》一书中写到，谢罗夫跟邦德罗夫斯卡娅—图斯卡娅有恋情，而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知道之后，教训了他一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谢罗夫粗鲁地要求我停止与她之间任何交往，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之后，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局势开始逐步恶化。这跟斯大林加快新领土苏维埃化的决定有关联。开始了没收富农财产，强制集体化，取消私人企业和手工作坊。尤其是，将卢布与金兹罗提等值的做法，对当局居民是个打击，因为后者的实际价值要高得多。苏联的物价比西部各地区高出许多。譬如，手表在莫斯科

的价钱是 300—400 卢布，而在利沃夫只有三十兹罗提。其他许多商品的价差也大致如此。结果，在短短几周之内，商店里的东西被一抢而光。我方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潮水般涌进新解放区，将莫斯科短缺的东西全部买走。小店铺和手工业者破了产。很快，所有东西，包括食品的价格飞涨，而当地居民的工资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并且用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译注）支付。

所有这些，很自然地引起了抗议。爆发了大学生示威。不满情绪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但是，由贝利亚的暴吏谢罗夫将军负责的国家安全机关，却将这些基本有理的抗议活动宣布为反革命、反苏联的暗中进攻。接踵而来的逮捕，残酷迫害参加示威者，驱逐出境等等，使局势更加紧张。

当时，由于处理与难民有关的各种事情，我数次去过谢罗夫将军的部门。一般而言，在解放区，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都占用从前属于宪兵的房子，对于仇恨波兰特务机构的许多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说，这一点显得不祥。显然，使用这种房子的确比较方便，因为那里有地下监牢。然而，从政治角度，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侮辱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可是，谁还会想到这些细节！

-----

帕布斯夫人推心置腹的一席话(2)

-----

而且，在谢罗夫的机构里，我曾经看到过一些被打得浑身是血，大学生制服被撕烂的年轻人。他们在半昏迷状态中躺在地上。显然，地下监牢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谢罗夫暴政的受害者不断地从侦查员的办公室被拖出来扔在走廊上。

1939年9月，人们用鲜花、面包和盐，像胜利者一般迎接了苏军战士。到了1940年秋天，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已经开始欢迎德国人了。由于1939年底和1940年的粗暴残酷作法，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迫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对付本德罗夫分子。尽管有加快苏维埃化，1939年底的利沃夫地区，依然保留下来了“往日奢侈的残迹”。在我住的“乔治”饭店里，餐厅有一支庞大的爵士乐队，经过严格训练的服务生送上波兰和法式菜肴。每天晚上，大百货商店屋檐下的“鸽子窝”咖啡店里，坐满了人。而喜欢异国情调的人，则可以拿一杯香槟，坐在昏暗的“小曲”夜总会里，那里的墙壁、包厢、椅子都包着深红色缎子，半裸的女舞蹈演员与演唱法国罗曼斯的歌手轮流上台献艺。不过，商店里已经是空空如也，而在大玻璃屋顶下的市场里，全天都在热热闹闹地买卖各种最时髦的玩意儿，虽然是投机价，但还是比莫斯科便宜。

当时的利沃夫，还可以夸耀的，是活跃的文化生活。许多小型画廊里挂着现代油画作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展览会等等，这些事物都吸引着观众。波兰的许多著名剧团，为了免遭纳粹毒手，纷纷逃

往东部，现在都落户在利沃夫。无怪乎当时一支波兰小曲《只有利沃夫》非常流行.....

当时，也有不少瑞士、挪威、丹麦的剧团，在波兰巡回演出，却碰上了战争。我们帮助其中许多人取道苏联回国。

我在这种独特、梦幻般的气氛之中，呆了不长一段时间。莫斯科来了一道命令。那里在就新的贸易协定跟德国人进行紧张谈判。参加谈判的，也有海军的代表。作为翻译，我派上了用场。

-----  
与父母重逢  
-----

1940 年的新年，我与父母亲短暂相见。不曾想，这次跟父亲的分别成了永诀。

五十三年之后，我才找到了他的墓地.....

三十年之后，我才得以再次见到母亲。

1940 年初，我第一次去德国公干，这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回莫斯科途中，我在基辅作了逗留。这次可以多呆几天。利用这次机会，我想跟父母和朋友们一起过1940 年的新年。

基辅似乎用一个阳光灿烂、天气寒冷的早晨迎接我。车厢窗户外面闪过的，是童年起非常熟悉的名称——伊尔本，密林、水，沃伦信号站。基辅火车站终于到了。在月台上看见父亲时，喜悦的心中一阵发紧。他曾经在信中写到，身体不大好，但还是来接我。父亲老了许多，从前漆黑的头发现在全白了。他穿了一件旧的夹大衣，戴着一顶老式的，革命前的工程师制服帽。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自在。在利沃夫，我置办了一些好衣服，所以从“国际”车厢出来时，可以说是衣着入时。我身穿时髦的、带毛皮里衬的斗篷，头戴英国细呢子礼帽，浑身上下散发着日本男用香水的气味。在拥抱和亲颊礼之后，父亲甚至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在他看来，我这副行头在挤满车站的灰色人群之中显得太招摇，与周围的环境太不相称。但是，到家之后，父亲很快就释然了，然后我们在一起过了几天好日子。

久别之后回家，实在让人高兴。妈妈作了一顿乌克兰风味的年夜饭：蜜饭，甜羹，家常香肠，面筋火腿，填馅狗鱼，当然还有她的当家菜——“细麻花”，一层一层之间夹着香气扑鼻奶油的脆生生的“拿破仑”蛋糕。

新年夜，我们一帮朋友们聚在了一起。新鲜的松树枝散发着针叶的香味。烛光闪烁。父亲的家酿酒在水晶杯里呈现出琥珀色。我们的老搭档三重奏——父亲拉小提琴，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科·费比赫拉大提琴，我弹钢琴——也有节目。在那遥远的三十年代中期，夏天温暖的傍晚，行人每每会在我们家窗户旁的椴树下驻足，听我

们自办的家庭音乐会。

这一次我们又重逢了。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安详！我想起了在德语学校背得烂熟的赞美诗“寂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

我跟父亲之间一直不大亲近。他整天都在上班，而夜里还要绘图，挣钱补贴家用。他是个熟练的绘图工，旧彼得堡教育出来的出色工程师。而我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工业学院的夜校部上课，在“国旅”上班。休息日也是各过各的。但是，在1939年最后的那几天里，我们变得十分亲密。所以，1940年新年那一天的分别令人万分痛苦——我们俩似乎都预感到了，这将是永诀……

我出差的这段时间里，莫斯科的生活明显地困难多了。城市看起来脏乱不堪，在有些地方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由于我们在苏芬战争中的失利，首都的情绪非常压抑。斯大林过度自信，企图一下子打败执拗的芬兰人，结果却成了一场血战和耻辱的原地踏步。他被迫动员新的部队来突破敌人的防线。军用物资占用了各种交通工具，结果城市的供应立即受到影响。

我在阿尔巴特街与威斯宁街的角上军官宿舍里分到了一个床位。小小的房间里住了四个人。不过，在纽霞大婶的照看下，倒是很干净，很暖和，也很安静。走廊里有一个热水器，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煮茶的一应用具。

我的同屋原来都认识。他们马上给我介绍了莫斯科生活的种种难处。

跟德国人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谈判接近了尾声。谈判是在外贸人

民委员部的大楼里进行的。我们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小组每次也到这儿来。我们跟什努列率领的德国代表团认真地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也在组建苏联采购委员会，准备去德国监督协定的实行情况，验收德国提供的物资。我也被列入委员会的名单，显然是由于我在太平洋舰队工程处的工作经验，最主要的，当然是我通晓德语。

1940年2月11日，新的贸易协定终于签署了，于是，我们很快就出发前往柏林。率领采购委员会的，是苏共中央委员，造船人民委员部委员特沃祥，他与政治局委员、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甚至大家认为，与斯大林本人关系密切。

-----

罗斯福临终前的一封电报

-----

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某种信任关系。

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前竭力争取保持这种关系。

但他去世之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

在罗斯福临终前的几周里，英美的代表在伯尔尼与盖世太保驻意大利的头目、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进行谈判，这给罗斯福与斯

大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参加这个谈判的还有美国驻瑞士情报负责人阿伦·达拉斯，因此使谈判具有特殊的性质。虽然伯尔尼谈判2月中就已经开始了，但哈里曼大使直到1945年3月12日才将这种接触的有关情况通报给了莫洛托夫。

斯大林对这个谈判做出了激烈反应。他将这个看作是西方盟国背着苏联与德国人单独媾和的企图。苏联政府有关让苏军代表参加谈判的要求被驳回了。

由于事情可能演变成一桩丑闻，于是惊动了罗斯福。3月25日，罗斯福的亲笔信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在信中，罗斯福援引哈里曼与莫洛托夫就此事的信件来往，试图说服斯大林，“由于误解，跟此事有关的事实未能正确地转告给您”。罗斯福在信件的结尾以和解的语气写到：“...我希望，您会向苏联有关负责人解释清楚此事的愿望和必要性，即为何我们急于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以便促成在战场上对抗美军的任何敌军的投降。”

3月29日，斯大林通报美国总统，说他不仅不反对，相反地，完全赞成德军在任何战场上的投降。“但是，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我才能同意与敌人谈判，”斯大林继续说，“即如果这类谈判不会导致敌人境况的改善，如果能够排除德国人耍手腕并且利用这个谈判将军队投送到其他战场，首先是苏联前线的可能。”

斯大林掌握的情报是，在伯尔尼谈判的掩护下，德军统帅部开始将部队从意大利投送到苏德前线。事情变得严重了。1945年4月1日，罗斯福对莫斯科的激烈反应做出回应。他在信中写到，围绕着

与德国人有关其在意大利的部队投降问题的谈判，“已经造成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担忧和不信任的气氛”。

不能排除的是，罗斯福总统可能不知道伯尔尼谈判的全部细节，而且被隐瞒了事情的根本。现在，有不少关于美国情报部门的各种秘密“倡议”。譬如，1934年10月份，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美国特工特奥多·A·莫德在土耳其会见了德国大使冯·巴本并向他转交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应该成为美英德三国政治协议的基础。其中，表示愿意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包括波兰，波罗的海和乌克兰等的霸权。

这份文件的作者提议肢解苏联，并将其部分领土移交给德国。而德国人则许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东方开辟战线。

当罗斯福了解到这些之后，便禁止继续进行试探，并下令收缴了莫德的出国护照。然而，甚至在此后美国情报机关与敌方密使的秘密接触从未中止过。

罗斯福给斯大林有关伯尔尼事件的最后一封电报，是1945年4月13日送达莫斯科的，也就是总统去世之后的第二天。电报中说，这件事情“已不再新鲜，没有带来任何益处，并已成为过去。无论如何，不应该相互不信任，所以，类似的小误会今后不应该再次发生。我相信，当我们两军在德国建立接触，并联合进行完全协调一致的进攻时，纳粹军队将会崩溃。”罗斯福通过这个类似临终遗书的信件强调了信任关系的重要意义，尽管有各种困难，但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信任的成分还是可以观察到的。要

是罗斯福活得长一些的话，那么，有可能战后时期的关系会更更好一些。不排除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存在信任的前提下，可以避免走极端，以及“冷战”的危险对抗。罗斯福过早辞世，杜鲁门入主白宫，引起了苏方相应的反应，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

\*\*\*\*\*

## \*第六章 斯大林曾经打算流亡印度

\*\*\*\*\*

斯大林死后多年，米高扬透露出了惊人内幕：新疆军阀盛世才几乎成为苏共党员。苏联前外长因为跟美国人来往密切，最后被斯大林下令悄悄处死，安排车祸原来是“领袖”的专长。

-----

斯大林与丘吉尔

-----

反共老手丘吉尔迫于情势，与斯大林进行合作。

西方盟国出于自保的考虑，决定推迟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自

告奋勇到莫斯科，把这个决定亲自通报给斯大林。

两个对立世界代表的会见充满了火药味.....

斯大林与丘吉尔第一次会见时，局势相当不妙。英国首相抵达莫斯科，是为了通知苏联政府首脑，西方盟国决定放弃两个多月之前所作的关于 1942 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这个义务是莫洛托夫 1942 年 6 月访问伦敦和华盛顿时，以正式联合声明的方式表述的：“有关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紧迫任务方面双方达成了协议，”——公布的文件中是这样写的。

对苏联而言，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虽然希特勒的“闪击战”未能奏效，而 1941 年 12 月德军在莫斯科郊区的失败，也显示了红军有能力重创侵略者。但纳粹德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实力。如果没有第二战场，这样德军可以于 1942 年春天之前在苏德前线集中庞大的军力。在南方，德军在夏季迅速推进到了伏尔加和高加索。苏军部队经过血战后，被迫向敌人让出一块又一块地盘。莫斯科担心希特勒军队对防线有新的突破。

抵达伦敦之后，莫洛托夫向丘吉尔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红军在 1942 年坚持不住，英国将作何反应。首相回答说，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联军最终将会占上风，但补充说：“不列颠人民和军队期望着尽快与敌人厮杀，并用这种方式帮助勇敢的苏联军队和人民。”这样的声明当时可以解释为，英国政府准备将部分德军师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莫洛托夫与艾登当时签署的苏联与联合王国关于结盟和在欧洲对德国及其轴心国作战，以及战后合作与互助的条约，是双方采取

联合行动反对共同敌人的重要义务。

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以及总统关于在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坚定承诺，更加鼓舞了莫洛托夫。终于初露曙光的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鼓舞了前方的将士和后方的劳动者。胜利的信心恢复了，给人们补充了新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被无休止的失败和撤退弄得十分沮丧。现在，他们即将受到新的精神上的打击。出发前往莫斯科时，丘吉尔不能不考虑所有这些情况。

1942 年 8 月 12 日下午，像往常类似的场合一样，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聚集在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中央机场。在迎接的人当中，还有红军总参谋长沙博什尼科夫元帅。天气很热，没有一丝风。所有人都呆在这个小机场的遮阳棚下。空气中弥漫着热烘烘的艾香味，听得见蜜蜂的嗡嗡声和小鸟唧唧的叫声。但是，这幅外表上安静的景象却不能使在场的人无忧无虑。这场残酷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年，苏联人民事实上在单独对付强大而残忍的敌人。集中在机场的文武官员直接负责组织抵抗希特勒侵略者。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情况糟到了极点，所以都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天空，等待来自英国的贵宾。他为什么要进行突然访问？他在公文包里带来了什么？

天空出现了一个黑点。它画着一个大半圈，迅速扩大，很快便显出了飞机的外形。在屋顶上划过之后，飞机触到了混凝土跑道，稍微减速之后，开进草坪。飞机平稳地移动着，穿过绿地，停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飞机显得非常笨重，机身几乎要挨到地面。我等着飞机舱门打开，然而飞机腹部的一个盖子却打开了，一架小梯子伸到草地上，沿着这架梯子，丘吉尔穿着笨重皮靴和皱巴巴裤子开始下飞机。他双腿蹲下，以便让庞大的身躯从机舱里出来。这就是丘吉尔的脑袋。他用手扶着帽子，小心地四周看了看，似乎在判断局面。此事可是非同小可！他第一次身处布尔什维克的国度，“十月革命”之后他曾经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组织协约国以武装干涉来对付它。何况，他这次使命远非愉快。

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时，他将要解释，为什么曾经许诺的在法国的登陆被取消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斯大林如何看他。作为古老而骄傲的马尔伯勒家族的后裔，丘吉尔并不在乎这个贫苦鞋匠的儿子、半吊子中学生、血腥独裁者的意见。苏联报刊没有全部转述他丘吉尔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当天的广播讲话。苏联人民仅仅了解到，英国准备支持她抗击希特勒侵略者。但是，斯大林当然知道讲话的全文，包括其中有一段说“纳粹制度与共产主义最坏的特点毫无二致”。没有人像他丘吉尔这样，在二十五年期间一贯地反共。丘吉尔没有收回自己曾经说过的哪怕一个字。

斯大林把丘吉尔这些话都当作了耳旁风。此外，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自己第一次讲话中称，大不列颠进行帮助的意愿，在“苏联各族人民心中只会唤起感激之情”。况且，丘吉尔本人也认为，并不止一次地给自己的同僚讲起过，现在

不是思考苏联体制、共产国际的时刻。应该向深处困境的国家伸出援手。

斯大林毕竟在战争中坚持了一年。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始终在消耗着德国的战争机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俄国人丧失信心。俄国人的抵抗是英美迫切需要的。这可以使英美积蓄力量，在适当的时刻打击希特勒.....

丘吉尔走出机舱时，莫洛托夫已经站在了他面前。他们像老友般相互致意。人民委员向首相介绍了沙博什尼科夫元帅。丘吉尔立即说明，无法向元帅介绍英国的军事专家，因为他们乘坐的飞机从德黑兰飞出之后，因为故障被迫返航，所以，英国军事负责人与外交部常务次长卡多冈只能明天抵达。跟丘吉尔一起抵达莫斯科的，还有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曼。接机的人们认识他，上次他来过莫斯科。英国首相在麦克风前发表讲话，赞扬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希特勒的入侵，承诺将予以支持，并表示相信，盟国的共同努力最终将粉碎纳粹。

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和苏联国歌。丘吉尔和莫洛托夫检阅了仪仗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纹丝不动地站着，只是头部随着首相的背影转动。丘吉尔仔细审视着他们，似乎想要证实他们是否坚强。

丘吉尔从机场被送到专门为他准备的、位于贡采沃的官邸。哈里曼被安排住在奥斯特罗夫街的一幢别墅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入住“民族饭店”。丘吉尔对别墅的舒适大为感叹，这是他在遭到围

困的莫斯科没有料到的。当时为他预备了浴缸和热水，在经过令人疲倦的长途飞行之后，他在浴室里边呆了好长一段时间。餐厅已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宴。经过严格训练的侍应生、各种花色的冷盘、红黑鱼子酱、冷乳猪肉、高加索式、俄式和法式菜肴、葡萄酒、各种烈性酒和清凉饮料、昂贵的餐具——所有这一切，保守党领袖在布尔什维克国家都没有预料到。为了以防万一，他甚至从伦敦带来了三明治，想着克里姆林宫里的人肯定吃不饱。后来，他把这些告诉了斯大林，并承认说，他根本没有指望得到如此丰盛的款待，所以在飞机上先吃了几个夹肉面包，结果把胃口倒了。事后，斯大林在一个小范围里谈起这件事时，说道：

“丘吉尔真是个伪君子！他想让我相信，他这种体质在伦敦就靠着三明治……”

莫洛托夫则说，1942 年春天在英国首都丘吉尔请他吃午饭，除了麦片粥和咖啡之外，没有上其他任何东西。“维亚切斯拉夫，这就是廉价的民主游戏。他简直愚弄了你。”——斯大林肯定地说道。他不能想象，在某个别的地方领袖可以与自己的人民共患难。

丘吉尔并没有多少时间欣赏官邸的美仑美奂。当天晚上，他便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场谈话。

-----

“别怕德国人！”

-----

当斯大林得知英美拒绝于 1942 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之后，非常震怒。他教训英国人不要害怕德军。

其实，在内心深处，斯大林最恐惧的事情，就是与希特勒发生正面冲突。正因为如此，希特勒的入侵才打得他措手不及。

七点刚过，丘吉尔的汽车越过红场，经斯帕斯门驶入克里姆林宫，停在了人民委员会正门口门廊下，斯大林一般经过这里进入自己的办公室。陪同英国首相的，有阿维列尔·哈里曼，英国驻苏联大使阿其巴里德·克拉克·库尔和译员登禄普。巴甫洛夫作为苏方正式译员在门口迎接了一干人，将他们引入二楼，沿着走廊进入苏联政府首脑的办公室。客人到来之前不久，我也被叫过去作记录。我的出现，也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表示外国人马上就到。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中断了他们有关英国首相来访的谈话。我只听到了斯大林的最后一句：

“别指望有什么好事。”

他看起来脸色阴沉，神情专注。他身穿往常的那件半军服式制服，扎到高加索高筒靴的裤子很久没有熨烫了。

门开处，丘吉尔肥胖的身子出现在门口。他停了一下，环视四周，目光扫过挂在墙上的著名俄国将领的画像——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库图佐夫、苏沃罗夫，以及放大的列宁像，最后停在斯大林的

身上。后者僵立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仔细地打量着这位海外来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一刻，斯大林想了些什么？这个从未掩饰过对斯大林体制不友好态度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光临克里姆林宫，他是否感到了满足？

当然，只是危急情况才能使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在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大不列颠的局势令人绝望。丘吉尔本人认为纳粹占领英伦三岛是可能的，并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将从加拿大领土上继续作战。

苏德武装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伦敦松了一口气。这场冲突的时间越久，那么英国避免入侵，最终忝列胜利者的机会就越大。但他丘吉尔也不要昏了头——俄国人不会如此轻松就打能赢。他也得要拼命，也得要流血。如果他想就第二战场的问题讨价还价，那就应该向他表明，这对不列颠也孕育着危险。

斯大林保持着严肃的表情，慢慢地沿着地毯向丘吉尔走过去。他有气无力地伸出手，丘吉尔则用力地握了握。

“欢迎您到莫斯科来，首相先生。”斯大林闷声说道。

丘吉尔绽开微笑，充满信心地说，他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俄国，并会见她的领导人。首相的微笑让我觉得十分做作，无法掩饰他的神经过敏。我有机会多次观察到外国访客会见斯大林时类似的反应。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他看作残忍、血腥的暴君，谴责过他残酷的毫无人性的统治。但是，跟他接触时，许多人却不能摆脱某种景仰之情。也许，他对自己千百万臣民所拥有无限

权力的感觉，而不论这种权力是如何得到的，在“各族人民领袖”周围制造了出某种光环，不由自主地唤起某种卑躬屈节。也可能，这是在恶魔面前恐惧感的无意流露。斯大林善于扮演殷勤主人的角色，他具有迷惑谈话对手的能力，使人愿意与他一起寻找共同语言。

斯大林请大家在铺着绿呢绒的长条桌旁落座。他自己坐在顶端。丘吉尔坐在他的右手，哈里曼在左手。其他人在两边依次坐下。在问过丘吉尔的身体情况，路上的辛苦和安排的官邸是否满意等几个礼节性问题之后，斯大林转入了正题。在自己阴沉的外表之外，他加上了更加阴沉的有关前线战事的叙述。

“作战部队的消息是不利的。”他开始说道，“德国人投入巨大力量向巴库和斯大林格勒推进。难以保证，俄国人会顶住他们新的攻势。红军在南方无法阻挡德军的进攻……”

丘吉尔显然想为自己的对手鼓气，指出，没有足够的空军，德国人未必能够在沃罗涅日及其以北地区展开新攻势。

“这不对，”斯大林反驳说，“由于战线太长，希特勒完全有能力抽调 20 个师，组成强大的突击兵团。为此目的，二十个师，再加两三个装甲坦克师足够了。考虑到希特勒目前掌握的军力，他不难抽调出这些部队。我以前完全没有料到，德国人能够从欧洲各处抽调这么多的部队和坦克……”

这已经是对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直接暗示了。丘吉尔无法再拖延声明，他正是为此而来莫斯科的。

“我想，您是要我转到有关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吧？”英国首相问道。

“这将是首相的意愿。”斯大林含糊地答道。

“我来此，用最开诚布公的方式谈现实的东西。让我们像朋友一样说话吧。我希望，您同意这一点，并且同样愿意说出您现在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https://goo.gl/C6xxGf) 看 [禁书](#) [禁闻](#) [禁文](#) [禁网](#) [禁片](#) [禁歌](#) [禁曲](#)

“我愿意。”斯大林声明道。

丘吉尔首先提到，莫洛托夫前不久在伦敦和华盛顿访问期间，讨论过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然后他开始论述，称部队和登陆装备不足迫使英美得出结论，他们无力在 9 月份采取行动，虽然这对于登陆而言是天气最佳的月份。此后，首相开始列举充实西方盟国决定的详细计算结果。

斯大林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用一个问题打断了对方的话：“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第二战场今年不会有了？”

“可是，您理解的第二战场是什么？”丘吉尔问道，他明显地在拖延令人不快的解释。

“第二战场，我的理解是大部队在年内攻入欧洲。”斯大林不无愤怒地答道。

“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人做不到。但是，他们认为，第二战场可能在另外某个地方开辟。在法国海岸的战役，在今年之内将会带来更多的害处，而不是益处，并且可能会对 1943 年大规模

战役的准备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担心，这对您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但我必须声明，即如果战役在年内能够极大地帮助俄国盟友的话，我们将愿意承担任何损失，以吸引开敌人的兵力。但是，如果这个行动不能够吸引开任何敌军，那么它便会破坏未来战役的前景，因而，这便会是个大错误……”

丘吉尔请哈里曼谈谈自己的意见，后者立即附和了首相的立场。显然，罗斯福总统也放弃了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斯大林说话了，他慢慢地说出每一个字，带着故意加强的格鲁吉亚口音：

“我对战争持另外一种观点。不愿冒险的人，便不会赢得战斗。英国人不该害怕德国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超人。为什么你们这么害怕他们？部队要想成为真正的军队，那么它就必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部队在未经战争检验之前，谁也不能说出，他们所值几何。现在，开辟第二战场，正好给了用火来检验部队的机会。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只会这么做。不应该仅仅害怕德国人……”

丘吉尔认为这番话是侮辱人。他喷着雪茄烟，激动地开始说道，1940 年英国单枪匹马地面对了希特勒入侵的威胁。这样，他相当明显地暗示，当时莫斯科与德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英国首相接着说，然而，英国人却没有动摇，而由于英国空军的成功行动希特勒也没有下定决心登陆。

但是，这段激烈冗长的话却没能打动斯大林。他提醒说，虽然英国的确单独对抗了德国，可她无所作为。英国没有立即帮助波

兰，对希特勒占领挪威和丹麦未作任何反应，1941 年春，巴尔干战役期间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没有积极干涉，只有英国空军采取了行动，但这并不够。在通知斯大林 1942 年法国北部不会登陆之后，丘吉尔补充说，“我认识到，有关第二战场我所说的一切对我们的俄国朋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见到您本人，而没有通过大使或者采用通讯的方式.....”

当时，在给伦敦的信中，丘吉尔表示相信，尽管这是个打击，俄国人“不会停止与敌人的战斗”。

然而，此时此刻的斯大林尽管外表十分平静，但却没有排除大难临头的可能。

-----

斯大林更喜欢印度

-----

作为战争可能的结局之一，斯大林曾经考虑一旦战败，流亡到印度去。从那里发号施令，指挥留在国内、转入地下的党组织。

我是这个秘密的惟一知情人。

1942 年的那个令人焦心的夏天，德军向伏尔加和北高加索不断推进，其精锐部队则依然呆在通往苏联首都的要冲部位。空荡荡的

莫斯科市内是一种令人产生错觉、不祥的寂静。天气异常温暖，阳光灿烂，所以，莫斯科的林荫道铺满了厚厚的绿色。

外交人民委员部依然留在古比雪夫，但有一小批人，其中也包括我，于去年 11 月被调到莫斯科来，落户在位于铁匠桥属于外交部的一幢又老又旧的小楼里，其中有几个房间作了宿舍。我只是在那儿过夜，工作时间全部都呆在克里姆林宫。大约在早晨五点，斯大林一般这时回家，我们，莫洛托夫秘书处的人，才得以结束自己的几乎是一昼夜的工作日。

在寂静的清晨，披着色彩斑斓伪装色的克里姆林宫墙在斜阳的光束下被染成了金色。我穿过空无一人的红场和猎人市场走向铁匠桥，似乎很难相信，现在，在我们的土地上正在打仗。但这个意识一直存在。因为，全部的时间都被那些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填满了。特别是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这几天里。

伦敦和华盛顿拒绝前不久有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而不是如罗斯福与莫洛托夫五月份他们在美国首都会见时所说的，从俄国前线吸引至少 40 个德军师，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应。

现在，在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争吵之后，斯大林外表上显得很平静。他邀请英国首相到自己的家中之后，不断地开着玩笑，扮演着一好客主人的角色，他想让人相信，胜利最终将属于对抗纳粹的人民。

不列颠首相可是说是满头雾水。为什么会见的最初几天如此刻

薄，甚至粗鲁的苏联领袖突然成了殷勤的化身？最终，丘吉尔找到了十分有趣的解释。

“我想，这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在他的日记中读到，“他（斯大林）的委员会或者委员们没有像他一样接受了我带来的消息。可能，他们的权力比我们推测的更多些，而知识更少些。所以，他似乎想庆祝一下，也趁便放松一下。”

这段话显示，伦敦对于苏联领导层实际情况的概念是如何的模糊。斯大林根本就是权力无边的主子、不容置疑的权威。

当然，斯大林不会不明白，西方盟国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之后，我国的局面有多么困难。但是，他也认识到无论如何保存反希特勒联盟有其必要性。对西方盟国的立场进行激烈批评之后，他明白了，他无法改变其决策。为了避免全面破裂，斯大林决定做出一个和解的姿态，邀请外国贵宾到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此前他从未这样做过。

这一年间，红军且战且退，经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但最终还是减缓了敌人的推进。同时，在乌拉尔以东地区，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企业、以及从西部地区连同工人一起搬迁去的工厂，正在制造新式的、比德国更好的武器。许多地方由全体男性人口组成的补充兵力，正在组建新的师团。大后方正在训练新兵，培养指挥人员。

但是，谁也没有把握，在这些新鲜力量成军之前，在苏军做好准备进行大规模反攻之前，战线会不会崩溃？

罗斯福关于从苏联前线吸引 40 个德军师的决策，原本可以使局面得到缓和。西方盟国承诺 1942 年在北非登陆而不是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对苏联的局面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斯大林预见到了，并且他把这一点告诉了丘吉尔。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丘吉尔在谈到英美军队准备不足，以及数量不足时，如果没有过分渲染的话，那么诺曼底行动真的有可能成为一场灾难。

无论如何，在既成的局面下，我国只能依靠自己。应该说，正是这一点促使苏联领导者说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我无意中成为其见证者。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与丘吉尔的一次谈话于凌晨三点结束之后，我的同事巴甫洛夫被派去送英国首相到他住的官邸，即所谓的七号国家别墅，而我则必须为致华盛顿的苏联使馆起草电报文稿。电报一般由斯大林签署。

我的第一稿他不完全满意，所以，在提出几处具体的意见之后，他要我坐在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条桌一端，将文本誊写一遍。当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斯大林一边沿着花纹斑斓的地毯走来走去，一边抽着烟斗。莫洛托夫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跟丘吉尔谈判时，他就坐在那儿。

就在当时，我从我们的领袖嘴里听到了，在此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流亡政府清单上的新成

员，”斯大林低沉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推进到乌拉尔以东，这就会成真……”

“但这等于死亡，”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应道。“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值得思量一下，有哪些可能的方案。丘吉尔可说过，一旦纳粹占领英国，他的政府将从国外，譬如加拿大，与敌人继续作战。” 斯大林走近沿着墙壁卷起来的布幔，拉动绳子，展开了东半球的地图。

“一旦德国战胜苏联，这样日本也会参战，”斯大林继续说道，“这意味着法西斯轴心国得到极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何英美将更多地需要苏联人民和我党的帮助。去年底，当敌人逼近莫斯科时，我们建立的地下党委还没有解散，正在为全面的游击战做准备。我们的人民相信党和它的领导，并将执行我们的指示，即便这些指示来自远方……”

斯大林用自己有力的右手划过苏联，继续说道：

“当然，我们不必重复伦敦之行，那里已经有一打以上的流亡政府。我昨天不是偶然地告诉丘吉尔，已经去过了伦敦，与列宁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我来说，去一次已经足够了。但是，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地方……”他接着轻松地用烟斗划过巨大的次大陆。

听到的一席话使我震惊万分。但我做出一副专心工作的样子。我飞快地写完了电文，然后毫不拖延地离开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没想到在这里突然我会听到如此可怕的建议。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偏爱印度。他是否认为，远离伦敦的英国政府他更方便些？或者他以为，在这个沸腾的殖民地印度可能出现革命的形势？ .....

须知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呆在瑞士，把自己看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们愿意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只要那里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些国家可以是德国、法国、英国、甚至美国。但情况是，俄国，按照列宁的说法，“孕育了革命”，所以布尔什维克赶到那儿，领导革命.....

或许，斯大林依然相信开始于“第三世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起这个离奇的计划。莫洛托夫显然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这件事情，他将它带进了自己的坟墓。

-----

杰卡诺佐夫的秘密使命

-----

斯大林曾经幻想着与希特勒单独秘密媾和，他派苏联副外长与希特勒的特使秘密会晤，企图割地求和。但希特勒似乎并不为所动。

然而，战局的变化很快就使斯大林处于有利地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

1942 年 9 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委员杰卡诺佐夫突然消失了。我是偶然知道这个情况的。莫洛托夫要我弄一份关于美国通过波斯湾向苏联供应武器和其他材料等的详细清单。由于杰卡诺佐夫负责整个区域，我用克里姆林宫内线给他打了个电话。

一般当头儿不在时，电话由他的副手伊利亚·切尔诺舍夫接听。但这次我听到了秘书泽娜的声音。她告诉我，杰卡诺佐夫，还有切尔内舍夫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她不知道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在柏林跟杰卡诺佐夫共事期间，我跟他有深交。所以，我决定了解一下，他是否在家。从厨师（厨师平常也看门）处知道，杰卡诺佐夫到某地去了。我不得不向中东司司长卡夫塔拉泽求教。他也不知道杰卡诺佐夫没上班的原因，但给了我需要的材料。

向莫洛托夫汇报他感兴趣的问题时，我顺便提到，跟杰卡诺佐夫联系不上。人民委员没有任何反应。他当然知道点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杰卡诺佐夫出现在莫斯科，但是我们对于他不在的原因却依然一无所知。

多年之后，伊利亚·切尔诺舍夫告诉我，1942 年中杰卡诺佐夫执行了什么样的使命。原来，在那个令人不安的夏天，斯大林另有一个更加机密的计划。

我跟切尔诺舍夫相识多年，一起在杰卡诺佐夫的秘书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切尔诺舍夫是我的副手。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切尔

诺舍夫是我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参赞。大使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非常器重他，并推荐他到联合国担任秘书长助理。六十年代，切尔诺舍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巴西大使。在这里，他的生命凄惨地猝然中断。一次，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游泳时，他遭到了鲨鱼的袭击。他的尸体最终未能找到。

在我们谈论杰卡诺佐夫的秘密使命之前，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有关战时军事外交的专著，所以切尔诺舍夫明白，我的问题不是无聊的好奇心引起的。此外，他也知道，我永远不会让他为难。

表面上，那只是外交人民副委员秘密访问瑞典，了解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情况。但是，甚至连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大使都不知情，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跟希特勒的密使什努列特使举行秘密会晤。杰卡诺佐夫认识后者，战前他们在柏林经常见面。我记得，1942年间，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多次提到过1918年与德国人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宛和约。同时，他总是强调，列宁不顾托洛茨基和其他同事的反对，签订了和约。列宁本人称这个和约是“卑鄙无耻的”。

斯大林总是在说，列宁一贯正确。拒绝和平意味着丧失一切，而接受和约则可以使布尔什维克保存最主要的东西——权力，即便是在被割去一大块的俄国领土上的权力。由于担心局面可能会更糟，斯大林显然没有排除与德国在苏方做出某些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和解的可能。按照切尔诺舍夫的话，当时会谈的内容，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

归还给罗马尼亚，以及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等。

切尔诺舍夫不能解释，有关此次会见的建议是如何转交给柏林的。无论如何，希特勒的密使在约定的地点等待着苏联代表。显然，协议是通过某个中立国，譬如瑞典，经过特殊渠道达成的。

后来，我考虑了很久，是什么促使了斯大林向德国人提出这种交易。他是否认为，1942 年夏天的局面是灾难性的，因此足以证明如此冒险的一步是有用的。或者他自己已经接近于惊慌失措？那时我经常见到他。他经常看起来是信心十足、非常平静。但是，他也非常善于控制自己……

在德军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的条件下，这些建议又有多么现实呢？斯大林的诱饵能否让希特勒上钩呢？

1941 年 6 月 21 日，在纳粹入侵的前一天，斯大林试图阻止希特勒，许诺“研究德国可能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让希特勒明白，自己愿意让步，但元首却没有做任何反应。6 月 22 日前夜，当我跟杰卡诺佐夫到达官邸时，里宾特洛甫甚至拒绝接受来自莫斯科的信函。那么希特勒现在有必要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吗？斯大林是否有些轻信？

我认为不是的。斯大林从早年起便表现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显然是从下列情况出发的：希特勒必须明白，他与英国还将有一场大战，而主要的，则是美国，其时正在展开庞大的军力。为了准备好与美国作战，非常重要的，是尽早打垮并占领英国，这样，美

国人便不能在那里建立基地，用于在法国北部登陆。但是，要想处理英国的事，希特勒必须将大部分部队从东方抽调回来，在此之前，要么彻底打败苏联，要么，如果战事拖延下去的话，与克里姆林宫达成某种交易。而斯大林正是向他提出这个交易……什努列特使答应立即向希特勒汇报斯德哥尔摩会谈的实质内容。但柏林一直在沉默。当时，德军向东部的推进慢了下来。很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鲍卢斯元帅的希特勒第七军大败。此后，德军一直在向后撤退，虽然往往经过激战。

斯大林的这个1942 方案彻底失去了意义……

-----  
“上帝会保佑你们”(1)  
-----

斯大林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英美的决定，所以换了幅面孔，与丘吉尔玩起了“友谊”游戏。

但丘吉尔的访问，给两人的关系之中留下了很深的不信任的气氛。

斯大林谈笑间提到强制集体化期间被镇压的农民人数高达千万。

丘吉尔讲述的英美军队 1942 年在北非登陆的计划稍微缓和了气氛。斯大林甚至认为这次战役有某些积极意义。可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圈子里，拒绝在法国登陆所引起的苦痛，直到丘吉尔访问结束前夕，都占了上风。甚至在斯大林为了庆祝客人来访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举行的宴会结束之后，这种气氛依然没有改变。丘吉尔声称疲劳，没有出席传统的晚宴之后的电影晚会，在克里姆林宫内部被看作是盟国之间关系不睦的标志。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斯大林来了个急转弯。他明白，已经无法改变任何东西，无法迫使英美履行有关第二战场的承诺，并且关系的继续紧张只会带来不利后果。尤其不能不考虑的是，盟国之间关系失和的消息可能会透露出去，会被戈培尔的宣传所利用。斯大林决定，既然已经无可作为，那就必须和解，只能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三大国的一致，表明他们愿意合作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何况在北非的登陆，如果最终会发生的话，不可能不使德国人的局面变得困难，也许，会迫使他们从苏联前线抽调部分军队。总而言之，继续与丘吉尔争吵，已经没有意义。用这种方法改变不了事态。

8 月 15 日，丘吉尔飞离莫斯科之前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谈，真可以说是亲切友好。斯大林殷勤好客，周到仔细，一开始使丘吉尔惊讶万分。但是，很快他也加入与克里姆林宫主人玩“友谊”的游戏。他们谈了很多，斯大林再次强调了盟军在北非登陆的重要意义，这样使人明白，他容忍了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且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

“上帝会保佑你们。”

“上帝当然在我们这一边。”丘吉尔表示同意。

“那么魔鬼当然在我这边，我们协力战胜敌人。”斯大林接着话题，暗示着丘吉尔从前曾经声称过的，他愿意与魔鬼结盟，如果魔鬼将对德作战的话。

然后，丘吉尔提醒到，他曾经通过克利普斯大使就德国准备入侵俄国向莫斯科示警。斯大林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说，他一直在提防侵略，但以为可以将其拖到 1942 年春天。他可不会承认，他曾经在维辛斯基与克利普斯的谈话记录上亲笔写道：“英国人的又一次挑拨离间”。

谈到战前时期，丘吉尔表示同意，1939 年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英法代表团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并且没有签署重要协约的足够授权。斯大林大致谈到了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与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谈判，以及，有一次在跟德国外交部长谈判期间，帝国首都响起了空袭警报。

“你们为何要轰炸我的维亚切斯拉夫？”斯大林用开玩笑的口吻问客人。

“我一直认为，永远不应该放过幸运机会，”不列颠首相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

时间已经接近半夜。丘吉尔次日凌晨应该出发去飞机场。但斯大林却不想放他走。

“我们为何不到我克里姆林宫的家中去喝一杯？”斯大林问道。

“我从不拒绝这类建议。”丘吉尔同意了。

这样，他们立即沿着克里姆林宫的过道，出来到了一个小院，穿过一条马路，来到了斯大林的家里。英国首相称之为“简朴和大小适当的”：有餐厅、客厅、办公室和一个大的卫生间。斯大林没有告诉客人，从前这是布哈林的房子。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丽卢耶娃自杀之后，他们换了房子。

邀请丘吉尔到自己的家中，斯大林给了他特殊的关注。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政治家有幸获此姿态。毫无疑问，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强调，虽然由于第二战场的事情发生了冲突，他依然珍惜与大不列颠的合作，以及伦敦愿意将苏联看作平等的伙伴。为了更进一步强调对英国贵客的好感，使这个晚上更加亲密些，他叫来自己的女儿——还是中学生的斯维特兰娜，充任女主人在桌旁张罗。过了一段时间，莫洛托夫也出现了，他的任务是席间劝酒。他开始说出各种祝酒词。

“莫洛托夫有一点是天生的，”斯大林快活地说，“他是办宴会的专家，他本人也很能喝……”

桌上不断捧上新的菜肴和各种饮料，丘吉尔明白了，这将是一顿丰盛的、长时间的晚宴。

在许许多多的话题中，也说道了苏联的集体化问题。“请告诉我，”丘吉尔问道，“目前这场紧张的战事对于您本人也是如此困难，就像集体化的负担一样？”

“呃，不，”“各族人民领袖”回答道，“集体化政策是一场艰难的

斗争.....”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你们必须打交道的，不是一小批贵族和地主，而是百万计的小地主.....”

“是上千万的，”斯大林挥着手，感叹道，“这是非常恐怖的。持续了四年。但这对俄国是绝对必须的，要想避免饥饿，给乡村提供许多拖拉机.....”

斯大林所说的集体化期间被镇压农民的数字，与最近苏联报刊中提到的数字大致吻合。如果承认，大约一半人从祖居地被赶走，在国内流离，后来加入集体农庄，或者新建的工业企业，那么死亡或者被杀的人大约在500万人左右，跟大多数研究者认同的600万的数字差别不大。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最勤劳的、最有本领的、最能干的庄稼人和牧人，他们都有一份家产，正因此他们才积极抵抗没收财产，为此而失去了生命。可以理解的是，经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之后，我国迄今无法摆脱农业危机。农村到处是拖拉机，但却失去了土地真正的主人，不能养活全国的人口。

“那么，他们都是富农？”丘吉尔问。

“是的，”斯大林回答说，稍微停了一下，他重复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必需的.....”

“他们最后怎么啦？”

“怎么啦，”领袖似乎想回避，“其中许多人同意跟我们走。有些人我们在托姆斯克、伊尔库茨克和北部地区给了土地。但他们在那里没能呆得住。当地居民不喜欢他们。最终，他们被自己的雇农给

收拾了。”

当然，既不是当地居民，也不是雇农，而是人民内务委员部的特别小分队消灭了不幸的农民——强制集体化的受害者。丘吉尔相信了斯大林的一面之词？他一句话也没有反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仅仅写道，听着斯大林的解释，想到千百万的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他禁不住打了个冷颤。

斯大林和丘吉尔在一起呆了大约共七个小时。午夜三点过后，英国首相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八月十六日凌晨五点三十分，他的飞机从莫斯科中央机场升空，飞往德黑兰。

英国首相的访问结束在和解的，甚至友好的调子上。在立即发表的共同声明中说，“谈话是在热忱、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再次证明了苏联、英国、美国之间存在着密切合作与谅解，完全符合他们之间现行的结盟协议。”

但是，西方大国拒绝于 1942 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在莫斯科始终留下了不快之感。斯大林对丘吉尔的不信任也保留了下来。1942 年，通过北部路线向苏联供应的军用物资被大幅度削减之后，这种不信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1943 年 11 月到 12 月之间，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没有像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那种程度的信任。实际上，丘吉尔提出了斯大林完全满意的波兰向西部推进，以及按照“寇松线”划定苏波边界的思路。但是，英国代表团首脑拼命抵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决定，用尽各种办法鼓吹通过巴尔干推进。斯大林猜透了丘吉

尔的意图，原来他不愿放红军进入东欧。甚至当苏联代表团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争取到了在法国北部登陆，丘吉尔仍然企图将土耳其拉入战事，以此破坏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

-----  
“上帝会保佑你们”(2)  
-----

不列颠首相的盘算是，在土耳其对德宣战之后，德国人会进攻伊斯坦布尔，并且可能占领之。届时盟国除了采取紧急措施拯救土耳其之外，别无他法，而在法国的登陆自然而然会被放弃。与此同时，在巴尔干开始的军事行动，则正是丘吉尔所想要的。丘吉尔从德黑兰回来的途中会见了土耳其总统伊斯梅特 伊涅纽，但后者并不愿对德宣战，所以，英国首相的巴尔干冒险彻底破了产。

1944 年夏天，在制订未来国际安全组织宪章的杜巴顿—伊克斯（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代表团的立场也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怀疑。英国人在把美国人拉到自己一边之后，提出一项建议，要几个大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出现涉及到他们的争议时不要投票。由于当时苏联是惟一的非资本主义大国，可以推断，在这后面隐藏着一个企图，即向苏联强加它无法接受的来自国际组织的决

定。因为，美英在这个组织里拥有绝对多数，他们随时都能够用来对抗苏联。苏方最终保住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但斯大林当然没有忘记，伦敦曾经企图将苏联置于易受打击的地位。

-----  
划分“势力范围”(1)  
-----

丘吉尔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内容是一份十分肮脏的文件，即战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比例。

双方用一个一个的百分比，便决定了这些国家数千万人的命运。

1944 年 10 月，在苏联与英国领导人的关系中似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丘吉尔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主要议题是波兰问题。英国首相竭力使苏联政府首脑相信，他将尽最大可能，说服在伦敦避难的波兰流亡政府接受苏联的要求。这可以使得最终达成互相可接受的协议，并创造条件，使改组之后、愿意与苏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按照“寇松线”承认苏波边界的波兰政府，在红军解放华沙之后，迁到华沙来。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地说，这样一来，波兰的发展可能会按照芬兰和奥地利的方式走，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而，在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米克拉伊奇科也呆在

苏联首都，但他却未能利用时机与苏联领导人达成协议。英国首相声称将尽力建议波兰流亡活动家与莫斯科达成协议时是否诚实，或者他像美国人一样，在幕后的谈判中建议米克拉伊奇科不要让步？然而，我觉得，斯大林当时更愿意相信丘吉尔。无论如何，当时，莫斯科谈判期间毫不拘束的气氛透着相互信任。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首相开始的一个话题，直到现在还引起历史学家和记者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因此，尽可能详细地重现1944年10月9日在斯大林办公室发生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哈里曼是美国驻苏联大使，所以罗斯福委托他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谈判中作观察员。同时，总统在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强调说，哈里曼不应该参加谈判，美国将不认为自己与此次会谈期间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有任何关系。所以，哈里曼没有参加所有的谈判，虽然英国首相让他知道发生的一切。

这里所说的那次谈判期间，不仅没有美国大使，甚至没有陪同首相来访的英国外相艾登。苏联和英国领导人只带着翻译进行了单独会谈。

丘吉尔开始说，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澄清几个问题，有关这些问题两国领导人最近一直在通信。

“我愿意讨论任何问题。”斯大林说。

“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谈，”丘吉尔开始阐发自己的思路，“其中一个希腊，另外一个罗马尼亚。就这点，英国人并无特别的

担心。不列颠应该是地中海的一个大国，所以，我希望斯大林元帅承认我们对于希腊的发言权，因为我愿意承认斯大林元帅对罗马尼亚的发言权。”

斯大林对英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并表示，如果英国不能控制地中海的话，它将会有大麻烦。因此他同意，即丘吉尔在希腊有发言权。

“我以为，”英国首相接着说，“我们必须用外交术语表达这些东西，避免使用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表述，因为这样会使美国人认为是不体面的。一旦我跟您达成谅解，我会跟总统解释明白的.....”

斯大林提到了罗斯福的愿望，即此次会谈的任何决定将被认为是“初步的”。

“但是我跟您之间说，”首相接着自己的思路说，“美国为自己夺得了太多的权益，给苏联和大不列颠留下很有限的机会。我们之间可是有互助条约的.....”

在这个表示信任和不无潜台词的交换意见之后，丘吉尔说：

“我这里有一份非常肮脏的文件，其中包含着伦敦某些人的想法。”丘吉尔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四叠的纸片。将纸片在桌上展开之后，他推给了斯大林：

文本无须翻译。纸上内容的仅有几行：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10%

希腊

大不列颠.....90%（与美国协商）

俄国.....10%

南斯拉夫.....50%

匈牙利.....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25%

斯大林仔细地看了一遍数字，从青铜杯子里拿出一枝自己喜爱的红蓝双色粗铅笔，在右上角划了一个不大的蓝色对勾。然后，一言未发，推回了纸片。

随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停顿。丘吉尔首先打破了沉默。

“将来会不会认为这是厚颜无耻的，我们如此简单就决定了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问题？最好让我们烧掉这纸片吧.....”

“不，留在你那儿。”斯大林说。

丘吉尔折起纸片，藏进自己的口袋。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就这个无言的场合已经写了很多。苏联官方断然不同意将其解释为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苏联的高层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与帝国主义的大不列颠进行此类可疑的交易”，因为这“将会与苏联列宁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矛盾”。我本人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类似的理由。无法接触苏联档案材料使得非

常难以弄清真相。在苏联外交部1983年公布的题为《1941—1945年卫国大战期间的苏英关系》文件汇编中，根本没有收入斯大林与丘吉尔1944年10月的谈话记录。虽然，此次谈话之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可能存在着某个秘密协议，但却很难做出最终判断。

现在，情况明朗了。

根据上面所述的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即在丘吉尔向斯大林展示自己的纸片之前，显而易见，他们二人倾向于确定双方在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优先影响力。莫洛托夫次日与艾登的会谈更能说明这一点。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我方的译员是巴甫洛夫。他的记录同样没有收入前文提到的苏联外交部文件汇编，但是前不久这个记录却在西方公开发表了。

莫洛托夫援引了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向英国同行声明说，有关比例的建议值得注意。

“能否达成这样一种协议，”莫洛托夫继续说道，“即不仅保加利亚，而且还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比例都为75比25？”

“但是这比此前谈到的要差好多。”艾登反驳说。

“那么，保加利亚就按照90比10，南斯拉夫为50对50，而匈牙利另行商定……”

“我们同意您有关匈牙利的建议，但想在保加利亚拥有更多的影响。”

“如果匈牙利的比例为75对25，那保加利亚也保持这个比例吧。但是，南斯拉夫应该是60对40。这是底线，我们不能走得太

远。”

艾登建议在保加利亚的比例为 80 对 20，但却继续坚持要 50 比 50 的比例对南斯拉夫。莫洛托夫则声明，如果接受英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那么对保加利亚应该是 90 比 10。同时他补充说，在建议对南斯拉夫按照 60 比 40 时，他的意思是，苏方对海岸线没有兴趣，他想在国家中部有更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在这场辩论中根本没有被提及。可见，苏方没有反对英国最初的建议。

被讨价还价所累的艾登，最终声明，他对数字不感兴趣。他理解苏联对在保加利亚的利益关心，并且英国愿意同意这一点。至于南斯拉夫，不论铁托与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能否达成协议，重要的是盟国必须在那里推行同样的政策。

在丘吉尔别墅的晚宴上，艾登汇报自己与莫洛托夫的谈判时说，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他没有牺牲不列颠的利益。然而，似乎在原则上已经就东欧的势力范围达成了协议。

次日早晨很晚醒来后，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床上消闲自在的丘吉尔，口授了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在其中说明了有关比例关系的协议。显然，他感到了不自在，因为交易是背着罗斯福进行的，他向前来看望首相的哈里曼看了信件的草稿。

美国“观察员”坚决反对发出这样一封信，声称总统将会非常不满意所有这一切。

哈里曼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丘吉尔的清单中，一切也是从此开始的，美国的份额标示得十分模糊，这当然不会使华盛顿感到满

意。丘吉尔听从了哈里曼，最终没有发出这封信。而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签署的发给罗斯福总统的联名电报中，仅仅提到：“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更好地协调对巴尔干国家的政策，其中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

-----  
划分“势力范围”(2)  
-----

至于土耳其，提到它，是由于斯大林与丘吉尔就海峡制度交换过意见。同时，英国首相对苏联领导人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使其对苏联有利的愿望持谅解态度。

海峡问题使斯大林无法安宁。他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西方盟国承诺战胜敌方联盟，其中也包括土耳其之后，将达达尼尔和波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君士坦丁堡移交给沙俄帝国。而斯大林在吞并了波罗的海，本萨拉比亚以及波兰的一部分之后，对海峡依然是梦寐以求。他向希特勒提出过这个要求，却毫无结果，而现在则指望借助反法西斯联盟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算计最终落了空。斯大林终究未能得到海峡。

此后，希腊发生的事件，即英国人相当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人

领导的抵抗队伍，可以使我有理由认为，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得到了遵守。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人的求援呼吁装聋作哑，平静地注视着伦敦对他们采取的镇压措施。照样地，丘吉尔对佛林·奥菲斯有关对罗马尼亚局势进行积极干预的要求不加理睬，这里，按照英国外交机构的意见，莫斯科施加了粗暴的压力。从莫斯科协议的角度看，后来西方大国开始干涉匈牙利事件时，斯大林的愤怒也可以理解。

-----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1)

-----

斯大林做出种种姿态，向丘吉尔示好：亲自到英国大使馆出席宴会，陪同丘吉尔到大剧院看戏，为丘吉尔设家宴，亲自到机场送行等等。

但丘吉尔却不为所动，他坚持认为，苏联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便是武力。

英国首相在苏联首都期间，斯大林给予的十二分尊敬，也可以证明与丘吉尔达成的协议使斯大林感到完全满意。斯大林不仅再次邀请丘吉尔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家里共进晚餐，而且整个举止异乎

寻常。记得，当斯大林接受了丘吉尔的邀请与其在大使馆共进晚餐时，莫洛托夫秘书处，尤其是索非亚沿岸街（后来的莫里斯托列兹沿岸街）的英国大使馆里是何等的忙乱。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前“各族人民领袖”从未去过任何大使馆。莫洛托夫早早派我送去主客名单，以便让大使馆准备请柬。我方出席晚宴的，除了斯大林，还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维诺夫，卡冈诺维奇等人。

莫洛托夫带着我跟巴甫洛夫，比其他人早到了。我们站在迎客的丘吉尔身后。不知为什么，莫洛托夫想到要介绍我，叫着我的名字，他说道：

“你们没有听说过他吧？没关系，很快就会听到的……”

他想说些什么，我始终未能了解。也许，想把我从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职位推到某个更高的岗位上，或者转到驻外的高级外交职位上，并且他想让在场的高官们注意到这个尚不为人知、却已经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年轻人。不管怎样，可能是由于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这些都与我无缘。对此下面有专文交待。

在宴会开始之前，侍者分送饮料，交谈的气氛非常热烈。丘吉尔在人群中串来串去，一边跟客人们说一两句话，而我和首相的译员比兹跟着他。巴甫洛夫则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身边，一批英美的外交官围着他们。走近人民交通委员卡冈诺维奇的近旁，首相问道，他如何使俄国的运输系统高效运转的。“如果机车司机不能完成任务，我就这么处理他。”卡冈诺维奇咧开嘴巴大笑，然后用大拇指横着划过咽喉部位。

应该承认，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敌机轰炸、机车车辆、燃料和熟练技工严重不足的条件下，铁路运输虽然非常紧张，但也经受住了考验。但我想，支配铁路员工的，不仅仅是恐惧，而且是对前线 and 后方所承担义务的理解。

正在宴会进行的时候，听到了礼炮齐鸣：莫斯科在向占领了匈牙利城市塞盖德的红军致意。丘吉尔在莫斯科期间，多次目睹了莫斯科人的欢呼。人们聚集在红场上庆祝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苏联军队解放了里加，逼近了东普鲁士。在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正在朝莱茵河推进。所有这些，造成了昂扬的情绪，这也影响了在英国大使馆那次令人难忘的晚宴上的气氛。

丘吉尔兴奋地说起了自己前不久的意大利之行，以及那里的人民如何热情地欢迎他……

斯大林给首相泼了点冷水，他指出，同样的那些人前不久在颂扬墨索里尼。丘吉尔不喜欢这些，所以他把话题转移了。

丘吉尔开始论述，三大国在战后保持合作关系是如何重要。他是真诚的吗？我想，这不见得。因为正是 1946 年他在伏尔顿的那篇演说，事实上第一个宣布了“冷战”的开始。但是，1944 年，当苏联承担着对希特勒作战的主要部分，重要的是使斯大林相信，他已经被接纳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伙伴。

“在我们的士兵在无数战场上为之流血的未来世界里，”英国首相的讲话意在载入史册，故而十分激扬，“我们三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正在向全人类展示，不论在战争，还是在和平时期，我们都将忠于

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的原则。这也是为何我如此重视复兴的波兰与苏联之间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

“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斯大林突然打断了丘吉尔的宏论。

英国首相一下子哑了。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所谈论的是教皇不仅仅在波兰，而且是在全球范围的精神影响。但是，斯大林再次表明了，他只尊重实力，将丘吉尔从九霄云外拉回到地面上。

还涉及到了南斯拉夫问题。斯大林警告说，按照铁托的意见，黑山和斯洛文尼亚人决不会同意跟国王彼得和他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合作。艾登说，彼得国王涵养非常之好，而丘吉尔则补充说，他非常年轻，还可以积累经验。

“他多大了？”斯大林问道。“二十一岁。”艾登回答说。

“都二十一岁了！”斯大林激动地叹道，“彼得大帝十七岁就开始统治俄国了……”

我们的领袖经常提到俄罗斯帝国的沙皇统治者。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哈里曼在战败的“第三帝国”首都火车站迎接苏联代表团时，询问斯大林，他作为胜利者来到柏林是否感到愉快。

“亚历山大沙皇都到了巴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这是句玩笑话，抑或是这里有着某种隐秘的意思？法国解放之

后不久，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来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之后，问他：

“戴高乐要求抵抗运动成员向当局缴出武器。我们怎么办？”

“把武器藏起来！”“各族人民领袖”回答说，“可能你们还能帮着我们呢。”

斯大林是什么意思？他是否在担心，从前的西方盟国将对苏联开战？或者他自己期望将红军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话题又转到了英国下年即将进行的议会大选。斯大林想奉承丘吉尔，便说道：

“我毫不怀疑，保守党人将会获胜……”

在波茨坦会议上，与出发前往伦敦的丘吉尔告别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当首相对自己能否重新回到蔡奇利耶霍夫，或者艾德礼将会替代他表示出疑虑时，斯大林坚定地表示，胜利者不会输，并且选民会支持作为战时领导人的丘吉尔。这是什么——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情报不足或者只是想给丘吉尔说些好听的话？

丘吉尔造访大剧院也被安排得十分排场。大厅用英苏两国的国旗装饰。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当丘吉尔出现在中央“沙皇”包厢时，观众向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并且，这一次斯大林破了自己的规矩，也来到了大剧院，不过比英国首相晚到了五分钟。他从包厢深处走到丘吉尔身边，这时，事先经过挑选的观众看见两位领导人之后，变得更加热烈。斯大林稍微停留了一下，便退到了后面去，以便让掌声对着首相一个人。欢呼在继续。丘吉尔发现了

这个谦恭的姿态，转过身去叫斯大林过来。后者重新走近包厢的栏杆，这又使观众爆发出新的雷鸣般的掌声。

灯光慢慢暗了，大厅里响起了前奏曲。当晚的节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芭蕾舞“吉赛尔”第一幕，第二部分是红军歌舞团的演出。

幕间休息时，在与中央包厢相连的一个小厅里，准备了简单的便餐：冷菜，鱼子酱，乳猪，伏特加，白兰地和葡萄酒，甜点，水果，茶和咖啡。席间的气氛非常轻松。宾主互相祝酒，开玩笑，讲笑话。不知是谁，在谈到“三巨头”时，将他们比作圣三位一体。斯大林接着这个玩笑说道：

“如果是这样，那么丘吉尔先生当然是圣灵了，他总是飞来飞去的……”

饭后，丘吉尔和艾登请人带他们去卫生间洗手。第二幕开始的第三遍铃声响过，贵宾却没有回来。斯大林开始着急，派我去找他们。当我们回来之后，艾登发现了斯大林询问的目光，就解释说：

“关于波兰问题首相在那里有了一些想法。我们只顾了讲话，没有听见铃声……”

这个解释把大家都逗笑了。回到包厢时，情绪更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和艾登到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家里出席晚宴。在门厅迎接客人时，他指了一扇门说：

-----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2)  
-----

“这是卫生间，如果想讨论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你们可以在这儿洗手.....”

每次会见丘吉尔，斯大林总不放过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好感。也许，他认为英国领导人终于愿意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与苏联发展关系，愿意将他斯大林看作平等的伙伴。当时丘吉尔所作的许多声明和姿态，似乎在不断证实这个结论。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丰盛的晚宴之后，两位领导人单独呆在一间不大，但非常雅致、绿色调的房间里，它与举行宴会的叶卡捷琳娜厅相连。当时英国贵宾的态度十分软化。呷着白兰地和咖啡，抽着巨大的缅甸雪茄，丘吉尔不止一次地自怨自艾，请求斯大林不要为了英国曾经参加过对年轻苏维埃的干涉而记仇。

“谁提起旧事，就让他滚蛋。”斯大林和解地说。

“可是您能不能原谅我本人曾经亲自组织协约国的征讨？”丘吉尔继续坚持道。

“不该由我饶恕您，”“各族人民领袖”宽宏大量地答复说，“让上帝宽恕您吧。”

10月19日早晨，当丘吉尔准备出发去机场时，给他送来了两个

大纸盒子，还有斯大林的亲笔便函。盒子里面装着两个图案精细的花瓶：其中一个给首相夫人的，上面画着“舟中舵手”，第二个称作“挽弓射熊的猎手”。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隐秘意义？丘吉尔夫妇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通信中，把斯大林称作“老熊”。只是，克里姆林宫的主子怕是不得而知的了？

我早早出发到机场送丘吉尔。天气非常糟糕，突然变冷了，下着小雨。机场的遮阳棚容不下所有的人。政府保卫部门军人和便衣人数之多使我惊讶。但是，没过五分钟，便明白了，这样的保安措施是为什么。一大串汽车停在了阳棚前。从第一辆和第三辆车上跳下来了身穿长军大衣的军官。其中一人打开了第二辆的车门——我们看见了斯大林。他身穿绿色带肩章的风衣，戴着元帅帽。从风衣下看得见带鲜红镶条的裤子。斯大林出现在机场，是他想最后给丘吉尔的又一个非同寻常的殷勤姿态。

英国人还没有到，但是，斯大林拒绝走进房子，站在雨中等着。丘吉尔一行终于出现了。跟他们一起，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也到了。

看见斯大林之后，丘吉尔感到惊喜。两位领导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后英国领导人决定照样做出一个客气的姿态：邀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观自己飞机的座舱。座舱的设备装饰非常好。斯大林不禁感叹说，现在他明白了，为何首相如此喜欢周游世界。

1944年12月底，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与丘吉尔保持密切关系的努力。当时，英美军队在阿登地区处境艰难。德军使用大兵团反攻，

将盟军逼向西方。出现了战线崩溃、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部被歼的危险。丘吉尔吁求援助。他派遣空军元帅特德前来莫斯科，要他向苏联领导人描述盟军所处的绝境，并弄清楚，红军能否提前展开冬季攻势。“西方正在激战，”丘吉尔向斯大林通报说，“我们能否在元月份之内指望俄军在维斯杜拉河地区或者其他任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我认为事态紧急。”

苏军指挥部当时没有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天气情况极为不利。攻击提前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和伤亡。但斯大林决定向盟军展示“善意”，并且提醒对方，当 1942 年夏天红军处境困难时，英美并没有驰援。“考虑到西方战场我们盟军的处境，”他给英国首相的电报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加速完成准备工作，并不顾天气情况，不迟于元月中在中央战场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您可以不必怀疑，我们将做任何可能做到的一切，向我们强大的盟军部队提供援助。”

这个承诺兑现了。一月十二至十五日，红军在 700 公里的正面向西推进。截至到二月一日，红军在主攻方向上推进了 500 公里，解放了华沙，来到了奥得河，即德国的新国境线。截止到二月四日，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红军距离柏林只有 60 公里。盟军距离他们还有 500 公里。

在利瓦地雅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感谢斯大林帮助了艾森豪威尔，并通报说，阿登地区的局势已经改观。但是，雅尔塔会议上，讨论重要问题接下来的进程却显示，斯大林与英国领导人达

成“互谅”的希望落空了。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上，在波兰问题上，在联合国宪章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和对立。与倔强的保守党领袖相比，斯大林更容易与罗斯福相处。

就在打败德国的前夕，英美与希特勒密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秘密谈判，使局面暗淡。

就这件事，正如前文所述，在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信件来往之中有过激烈争吵。但克里姆林宫认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并且，丘吉尔避而不答并非没有缘故。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感觉到，杜鲁门总统，其对苏联的敌意态度早已经不是秘密，认为丘吉尔是真正的同道。在波茨坦用原子弹讹诈莫斯科的图谋尤其使斯大林警觉。对这个威胁，斯大林采用对东欧国家施加强大压力作为回应，结果，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激烈反应。丘吉尔在伏尔顿的演说受到杜鲁门的称赞，显示斯大林与丘吉尔“合作”的希望不过是幻想而已。

此后，从一系列文件中显示了丘吉尔的真正立场。

丘吉尔的私人医生摩兰爵士回忆了 1946 年跟自己著名病人的一次谈话，当时美国依然独霸着原子弹。

“我们不应该等到俄国做好准备的时候，”英国前首相说，“我认为，他们获得这些核弹还得七年。美国知道，俄国百分之五十二的机械工业企业在莫斯科，并且可以使用一颗炸弹摧毁它。这也许意味着三百万人的死亡，但对他们（美国人）而言，这根本无所谓（他微微一笑）。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性建筑，譬如克里姆林宫

的被毁。”

1948 年，在与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谈话时，丘吉尔指出：

“现在是最恰当的时机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退出柏林，不离开东德，我们将从地球上抹掉他们的城市……他们唯一能够接受的语言，便是武力的语言”。

-----  
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流产的合作  
-----

斯大林向美国人建议两国情报机构互设代表处，定期交换情报。实际上，这是罗斯福的想法，只不过斯大林“偷听”到了，决定“先发制人”。

罗斯福出于大选的考虑，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战争年代，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与来访的美国人士会见。这里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其中有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怀登·威尔基，前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美国商会主席艾里克·詹森，美国战略署（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主任威廉·多诺万等等。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美国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苏联领

袖认为，与他们进行哪怕简短的谈话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多诺万的莫斯科之行便十分有趣。

1943年11月中，威廉·多诺万为了处理自己机构的事务到了当时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多诺万从那儿来到伊朗首都，赶上了“三巨头”德黑兰会议的最后几天。会议结束之后，他跟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一起，乘坐轰炸机改装的美国大使专机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的最初目的，是苏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就纳粹德国的局势交换资料。

莫洛托夫派杰卡诺佐夫跟我代表外交人民委员，代表内务人民委员到机场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我在柏林时期的同事萨沙·克罗特科夫，他当时从事对外情报工作——在伏努克沃机场迎接多诺万。

威廉·多诺万完全符合美国人给他的译号“野牛比尔”：他身材胖大，体壮如牛，说话大嗓门，非常活络，从一见面，他好像认识我们几个很久似的。虽然他在飞机上呆了一夜，但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疲劳。当杰卡诺佐夫问他，中午去见莫洛托夫有没有困难时，多诺万回答，他愿意现在马上就去。多诺万在哈里曼的陪同下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我翻译了这次谈话。

在相互问候之后，多诺万讲述了自己来访的目的：在目前局势下，即美国与苏联是盟国，并且正在与共同敌人激战，必须动员所有的资源加速胜利。秘密机构获得的情报在这里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多诺万，高度评价苏联的情报机构，并且认为，美苏两国情报

机构之间交换资料，将有助于盟军在前线作战。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感兴趣，并说，多诺万应该与苏联有关机构实际讨论这个建议，此后可以做出相应的决策。

就在这时，莫洛托夫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进来。他身穿元帅服，右手拿着那个无时不有的、熄了火的烟斗。我们从铺着绿呢绒的长桌旁边站了起来，由于事出突然，多诺万竟然一时语塞，但莫洛托夫显然知道斯大林要来。他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多诺万终于说得出来话：

“我非常高兴，能够荣幸地见到您，斯大林元帅……”

“请坐，”斯大林请我们大家坐下，自己坐在了桌子中间，“我多次听说过您，多诺万先生，所以决定利用您来莫斯科的机会，亲自与您结识。听说，您负责的那个机构，干得非常出色……”“我也想说说，”多诺万连忙回应，恭维道：“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正因为如此，我向莫洛托夫先生建议，安排两国机构之间交换情报……”“为何我们不采用固定的方式进行这种合作？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这些机构的代表处？”斯大林提议说。

多诺万转向哈里曼，似乎要他第一个回答苏联领袖的建议。

稍事停顿之后，哈里曼声明说，他认为这个意见是有益的，并表示支持。多诺万迅速附和了美国大使的意见。

奇怪的是，在如此微妙的问题上，两个美国人未经与华盛顿的事先磋商就表示了同意。从哈里曼的回忆录中我们现在知道，在德黑兰时，他跟罗斯福总统讨论过类似的想法，并得到了总统原则上

的同意。哈里曼了解苏联对秘密的癖好，他考虑了很久，采取何种方式向莫斯科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出人意料主动提议，大大减轻了大使的任务。但也可能，“主人”决定先发制人，并以此证实苏联情报机构神通广大。因为，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尽最大努力使总统免遭窃听，但是，在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罗斯福下榻的房间里，克格勃的“小甲虫”一直在正常运转。每天早晨，我替莫洛托夫连通行证一起，领到一叠克里姆林宫专用“直纹”纸打印的谈话内容，上面用笔补写着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每个人的姓名。同样的文件也送给斯大林，所以，他当然知道哈里曼与罗斯福有关美苏情报机构可能合作的谈话.....

在这个问题原则上解决之后，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又呆了一会儿。多诺万接着讲述了自己的印度之行，以及在当地民族主义圈子里十分流行的日本宣传口号：“亚洲人的亚洲”。在这个旗号下，某个辛格少校领导了印度民族军，向英国人宣战。斯大林仔细地听着，也许这时回忆起了现在已经失去意义的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多诺万与内务部的领导举行了会谈。双方顺利地达成协议，即在对方的首都建立特别代表机构，由一名军官以及几个技术性人员组成。

哈里曼和多诺万非常兴奋。但是，两个月之后，罗斯福总统抛弃了这个想法。哈里曼认为，这是白宫幕僚长莱盖海军上将背后捣了鬼，后者根本就不喜欢他。

实际上，总统只不过改变了主意。1944 年到了，这对于罗斯福而言，是第四个新的大选年。在已经展开的激烈的竞选期间，克格勃一中情局的合作协议，可能被罗斯福总统的对手巧妙利用。

-----  
米高扬谈李维诺夫之死(1)  
-----

斯大林死后多年，米高扬透露出了惊人内幕：新疆军阀盛世才几乎成为苏共党员。

苏联前外长因为跟美国人来往密切，最后被斯大林下令悄悄处死，安排车祸原来是“领袖”的专长。

我最初感到万分惊讶，为何中国的新疆省在外交部的登记册上被单独列项，并且归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负责。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个省事实上是莫斯科在控制。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当时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阿普列索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跟新疆的统治者“督办”盛世才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使后者将中国的这个省变成为苏联的一个区。盛世才多次携家人来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见到了“各族人民领袖”。有一次，“督办”请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

“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

于是，这位“督办”真的把自己看作苏联的人，他曾是位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这个交易当时属于高度机密。

斯大林高度评价了总领事阿普列祥在新疆的活动，给了他各种荣誉称号，赞扬他能够在这个省的大众之中培养对苏联的好感。稍晚些，米高扬告诉我，当我们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改变，新疆被归还给重庆之后，斯大林在一个小圈子里说过：“阿普列祥知道得太多了。”这是一个信号：有功劳的总领事失宠了，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但这次，“主人”想避免多余的动静。他决定悄悄除掉阿普列祥。此后，事情便按照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式发展。

从乌鲁木齐回来例行休假的阿普列祥出发去了阿布哈兹。在那里，在山道上，出了车祸，于是阿普列祥死了。“领袖”周围的任何人都怀疑，车祸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杰卡诺佐夫曾经几次去乌鲁木齐见“督办”，那里已经是新任总领事巴库林，典型的党务人员。在他的任内，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副人民委员的一次次旅行于事无补。

很快，蒋介石用自己的方式惩处了“督办”，下令将他砍头，将新疆彻底收回。

后来，我跟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有过几次保密谈话。

这些谈话，似乎是偶然进行的，也就是当我每次就一些具体问题找他时，在问题解决之后，他一般会请我呆一会儿，坐一坐，叙叙旧。通常，他会要来茶和小面包圈，我们面对面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开始讲述某个与斯大林有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六十年代，当时米高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子上，他的秘书会预先告诉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给我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所以，我尽量在所给的时间之内办完事，然后马上准备开溜。所以，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留我的时候，我会借秘书的话。而他则带着滑头的微笑说：

“那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并且他们可以等嘛。”他似乎以此在强调，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职位的礼仪性质。

当我最终走出他的办公室时，守在接待室的访客们恶狠狠地看着我。

这里想讲述的那次谈话，特别长，并且十分坦率。这是在 1972 年，米高扬被解除了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当时，我担任主编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准备刊登米高扬回忆他三十年代中期出访美国的一篇文章。我找米高扬讨论编辑部提出的几处细节问题。跟文章有关的问题解决之后，米高扬像往常一样，请我坐一坐，“叙叙旧”。这次他回忆了李维诺夫和契切林。“李维诺夫，”米高扬开始了自己的叙述，“是个聪明而且精明的外交家，斯大林对他不错，当然，只是在某些时间之前。可是，莫洛托夫根本就容不下李维诺夫，当斯大林夸奖后者的时候，

莫洛托夫妒忌他，并且想方设法于三十年代末除掉了李维诺夫，虽然李维诺夫还能够给国家和党做许多工作。莫洛托夫也不喜欢契切林。正是他说服斯大林除掉契切林的。并且斯大林本人对契切林也不满意。遗憾的是，这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本来可以作譬如外交部副部长或者部长顾问。可是他却呆在科利亚兹莫的别墅里，弹钢琴，早逝于忧郁病和无所事事。不过终究是善终。李维诺夫的命运要更加悲惨.....”

最后这句话使我警觉。“更加悲惨的命运”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病死在自己的别墅里。这时，米高扬接着说：

“实际上，在打算与希特勒签约时，就已经决定要换掉李维诺夫。他一个犹太人，并且是在国际联盟，以及在整个国际舞台上体现我国与希特勒德国斗争的这么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长）的职位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但是他可以继续作副人民委员。他的经验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莫洛托夫却想方设法使他被彻底解职。莫洛托夫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因而不愿在身边有一个比他更有经验，更熟悉的人。结果，1941 年秋天之前，李维诺夫被解职。只有当我们的情况非常糟糕，当斯大林拚命捞每根稻草的时候，他决定利用李维诺夫的经验，派他到华盛顿作大使。李维诺夫在那里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以说，是他在危难时刻救了我们，争取到将租借法案扩大到苏联，筹借到了十亿美元。现在可以轻松地说，租借法案没有什么意义。但 1941 年的秋天，我们已经输光了，因而，如果不是租借法案，如果没有武器、食品、军队的冬

装以及其他装备，事态的发展还真不知会怎样呢。所以，这里有李维诺夫的功劳，他利用罗斯福和其他美国人士对他的好感，安排了军品供应，正如他当年争取了美国承认苏联和建立外交关系一样。可是，一旦事情安排妥当，莫洛托夫就开始了与李维诺夫的倾轧，结果他被从华盛顿召了回来。我想，不应该这样做。李维诺夫还能有用，因此，不应该用一个平庸的、缺乏主动性的人替换他。回到莫斯科之后，李维诺夫虽然形式上得到了外交副人民委员的位子，实际上已经靠了边，后来干脆被解职退休。并且他死得很惨。他死的那场车祸，并非意外，那是斯大林背地里安排的……”

我从未听到过的关于车祸的说法，所以感到万分震惊。我感叹道：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这不可能，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但我立即道歉打断了他。

米高扬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非常熟悉那个地方，离李维诺夫的别墅不远。那里是个急转弯，所以，当李维诺夫的车拐弯之后，路上横着一台卡车……所有这些是事前安排好的。斯大林是干这一行的高手。他把内务部的人叫来，当面布置任务，然后就出了车祸，最终斯大林想除掉的那个人死了。类似的情况有不少。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赫艾斯，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等等一批人都死于这种车祸……”

“斯大林有理由惩罚李维诺夫，”米高扬继续说道，“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当时李维诺夫基本上已经靠了边，住在别墅里。来莫斯科

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一般按照老习惯利用机会，经常看望他。他们的话题各种各样，其中也包括了政治.....”

“其中的一次谈话中，美国人抱怨说，在许多问题上苏联政府立场十分固执，美国人跟固执的斯大林很难打交道。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不必感到无望，这种固执也有某种限度，因此，如果美国人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苏联领导人也会让步的。这次，以及李维诺夫的其他谈话都被窃听并记录。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我也读了这个报告。李维诺夫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实质上，这是叛国罪，变节。李维诺夫向美国人提建议，如何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以损害苏联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先，斯大林想审判并枪毙李维诺夫。但后来决定，这会引来国际丑闻，使盟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所以，他一直拖着这件事。但他没有忘记。他根本就不会忘记这类事情。因此，多年之后，斯大林决定不显山不露水地执行自己的判决。结果，李维诺夫死于车祸.....”

-----

米高扬谈李维诺夫之死(2)

-----

考虑到米高扬给我讲述的这一切非常重要，我问道，我能否，当然是援引他，在自己的某本书里使用这段话。“我希望，”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说，“如果能够走到这个时期的话，我将来亲自有机会把这一切讲出来。但是，如果我来不及的话，那么您可以根据情况和理性的考虑，使用这个信息。”

回到编辑部之后，我立即把米高扬的谈话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这些年来，记录稿一直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现在，当我公开这段话时，我没有违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意志。

至于事情的实际情况，我想，没有理由对米高扬那番话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斯大林血迹斑斑的受迫害者名单上，又添上了一个蒙难者，揭开了又一个残忍的犯罪。

我想补充的是，关于李维诺夫从苏联驻美大使任上被解职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质在于，在莫洛托夫 1942 年春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期间，西方大国，正如前文所述，承诺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后来又拒绝履行诺言。这在英美社会各界引起了愤怒的浪潮。在美国举行了各种示威、游行等等，其中邀请了李维诺夫前往演讲。自然地，他批评了美国政府的行为。在跟斯大林的某次谈话中，美国大使哈里曼表示，罗斯福总统对苏联大使的类似讲话不满意。哈里曼补充说，大使不应该批评所在国的政府。

这看起来，是宣布了李维诺夫为不受欢迎的人。对于本来就不喜欢李维诺夫的斯大林来说，找到了召他回莫斯科的借口。可能，如米高扬所说，莫洛托夫的倾轧也起了作用。同时，美国人将大使

赶出去，也刺激了斯大林。显然，华盛顿认为，为了接替李维诺夫，将会从莫斯科派一个职位更高的人。但这里，斯大林决定要给美国一个难看，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将大使馆的参赞安德列·葛罗米柯提升为大使了事。

-----  
故宅瓦砾场(1)  
-----

我费尽周折回到基辅，家里却是一片狼藉，父母亲早已经不知去向。

我回到莫斯科，马不停蹄地赶往德黑兰。

这件事情暂时似乎过去了，但最终还是被贝利亚所利用.....

1943 年 11 月 6 日，红军解放了乌克兰的首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即请莫洛托夫批准我飞一趟基辅，以便弄清楚父母的下落，因为从希特勒军队占领基辅之后，我便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去吧，”莫洛托夫说，“让科西列夫了解一下，什么时候情况允许，并跟军方谈妥，让他们用顺路的飞机带您过去。当然，1941 年您没有采取措施及时疏散他们，是太轻率了。”

此前，我曾经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过，事情是怎么回事。从德国回来之后，我立即告诉了父母，后来我们经常通信。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没有人料到德国人会占领基辅。在信中能够感觉到父亲的信心，即乌克兰的首都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的。跟我一起离开柏林的图比科夫将军，在西南方面军获得任命，做了守卫基辅的方面军参谋长。我请他在必要时关照一下父母。我从他处得到的惟一音讯是，一切正常，叫我不要担心，因为基辅的防御坚固，牢不可破。那是不可饶恕的太过自信。事件的发展比预料要快。古德里安的坦克师团迅速从两侧包抄基辅。在某个时刻，还有可能将部队带出包围圈。那样的话，图比科夫就有可能在最后一台车上安排我的父母。指挥部队的基尔博诺斯将军哀求大本营批准有秩序地撤出乌克兰首府。但是，斯大林禁止撤退，并要求部队拼死抵抗。成千上万的官兵陷入包围，牺牲或者被俘，而不是撤退、在别的战场继续战斗。当希特勒的坦克冲进方面军司令部时，基尔博诺斯和图比科夫开枪自杀。我跟亲人的联系就此中断。

1943 年 11 月 11 日，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去基辅，机上为我找到了一个位子。我准备了一些食品——面包、黄油、腌猪油、香肠，把所有东西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考虑到部分路段可能要步行，给我办了一张由外交人民第一副委员维辛斯基和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签发的通行证，要求各军政机构向外交人民委员助理别列什科夫在基辅出差期间提供各种协助。

莫斯科快到 11 月的时候，天气已经变冷了，所以我决定穿上毛

皮大衣。这是我从德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寄卖店买的，因为我的全部冬装都留在了柏林。这件毛皮大衣非常奢华——这样的衣服在革命前的俄国只有富人才穿得起：结实的黑色厚呢子，缝着貂皮围脖，海龙皮领。跟大衣一起卖的还有一顶黑色缎子底的海狸皮帽。这两件一套，跟沙里雅宾著名画像上的一模一样，价钱非常便宜——总共1100卢布，而当时我的月工资是1800卢布。有意思的是，当时莫斯科的寄卖店里塞满了这样的毛皮大衣和女大氅。提前从首都疏散走的人们，卖光了带不走的东西。原来，在革命、内战和三十年代的饥饿之后，莫斯科的居民手里还剩下不少财产。

但是，我随身带着如此奢华的大衣，却是一个错误。飞机在第聂伯河的左岸布罗瓦雷着陆之后，我一路上搭各种卡车、马车、或者步行走在难民、一队队受伤的散兵、走出森林的游击队员、甚至那些绝望的、衣衫褴褛、被战争变成居无定所的人流中。我一副发国难财暴发户的样子，往往引起敌视，因此每个手里有枪的士兵，或者头戴扎红带子的高加索皮帽、身穿用机枪子弹链交叉扎着的棉短大衣的游击队员，都认为有职责拦住我，检查证件。我手里的证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产生必要的效果。但也会有某些人怀疑其真实性，拖着我去找“大官”进行检查。我应该说，许多人对我的上司怀着巨大的敬仰。看到证件之后，会问道：

“您真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助理？”……并且会尽力帮忙。然而，无休止的检查终究用去了许多时间。晚上9点左右，我才来到了第聂伯河岸边。在浅沙滩，到处弃置着被打烂的、

扭曲的武器装备——德国的和国产的，房屋烧焦的框架冒着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满月照亮着前不久这场苦战的景象。基辅著名的链桥无助地耷拉了下去。钢质拱桥掉进了河中。砖桥墩孤零零地竖着，就像大地测量标记一样，向对岸渐渐远去，消失在迷雾之中……我回想起，1920年我们跟父母亲也是在这个地方，在12月的严寒里，看着被波兰人炸断的链桥架在冰层中凸出。我们一家在内战翻腾着的国家里，从我出生的饥饿的彼得格勒，前往似乎是幸福的乌克兰，基辅是这条漫长、艰难旅途的目的地。当时我才4岁，这番折腾之中的许多场景，就像断桥的那个画面，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记忆，而现在则分明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艰难地在冰上走着，费力地爬上结了冰的金属梁。当我们经过新的漂泊，于1923年重新回到基辅之后，链桥当时刚刚开始修复。我的父亲也参加了，桥的梁是在“布尔什维克”工厂用连接件接起来的，后来父亲做了这家厂的总工程师。可是现在，二十三年之后，我重新又站在链桥的废墟旁边。我们的人民承受了多少苦难，多少回周而复始地修复遭到破坏的一切！我问旁边走过的士兵，怎样才能过河。

“往下走，两公里左右，有浮桥渡口……”

这不，终于到了轧平的、通往渡口的大道。汽车川流不息。岸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片汽车等着过河。浮桥在水浪中摆来摇去，在满载的卡车的重压下嘎哑地呻吟着。我在其中一辆上找了个位子。这不就是第聂伯河的右岸，实际上，我已经在基辅了。车队向左转了。我跳下车箱，朝右走。这附近应该有“弧形转弯处”，——弯弯

曲曲通向大寺院修道院的公路。

温暖的夜晚，周围是湿润的树叶和树皮的气味。寂静和荒无人烟使我感到大吃一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死了。穿着毛皮大衣很热，所以我脱了它。上到山上，顺着马利亚花园走着。草地上是厚厚一层没有打扫的树叶。沿着人行道——是稍微枯萎的菊花。不知是谁在围城里种的。这是利普基，当年基辅的贵族区。看不到任何破坏。

我沿着“阿森纳尔”工厂的围墙走着。1938年，我从这里去了太平洋舰队。右手是忠于彼得大帝的伊斯克拉和科丘贝纪念碑的底座。革命之后，纪念碑被拆毁并拿去回炉，在其底座上竖起了“马可沁”机枪以纪念阿森纳尔工厂工人的起义。德国人没有动这机枪。这是如此熟悉的地方！我从这儿走过多少次去“阿森纳尔”上班！这不是红军之家吗，从前的军官俱乐部，再往前，一幢别致的、全白色、像块砂糖一样的房子，那是糖厂主人扎伊采夫的别墅。三十年代，那里住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战争开始之前按照斯大林命令被枪毙。

在列瓦绍夫街的拐角处（改名为卡尔·利普内赫特街），是从前的波兰总领事馆的大楼。我此后还得回忆起它，回答莫洛托夫与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有关的问题。我向左拐，走向学院路方向。在那儿，在十字路口，就是我的家。等着我的是什么？在透明的月光下，我如此熟悉的街道显得陌生，甚至敌意。几天之前，在这个人行道上走着纳粹分子。现在他们已经无踪无影了。

城里没有电，但我却希望在位于一层的我家的房子里，某个窗户里闪烁着烛光。然而，玻璃后面是地狱般的黑暗。我在门口停下来。门敞开着。旁边的墙上粗大地写着一行“已检查——无地雷！”用颤动的手指敲了敲窗户玻璃——我们家的老暗号：三下，三下，两下。没有回应。走近第二个窗户——那里是父母的卧室。再次敲了敲玻璃。还是没有回应。进到楼里。短短的走廊，两级台阶往上，便是人造革包着的门。机械地按着门铃。没有铃声——没有电。我敲着门——但人造革下面是厚厚一层棉絮。敲门框，先是轻轻的，再用力敲。没有回应。一拉把手——门便开了。我喊着母亲，父亲。无人回应。走入门厅——我随身带着一把小手电。进入客厅，照着墙壁，地板。光线照亮了肆意破坏的痕迹：被劈下来的钢琴盖子仍在墙角，被劈开的没有画布的画框，橱柜的玻璃打碎了，到处是粪便——已经风干了。这意味着，住户离开房子至少有几个星期了，并且，德军士兵，或者在短暂的无政府时期无法无天的盗贼逃跑之前，有过一番肆意纵行。

-----

故宅瓦砾场(2)

-----

进到睡房——这里也有过同样的浩劫。我的房间里也好不了多少。我精心收藏的书，从书柜被扒拉到地上。书已经不多——大部分都消失了。

我用笤帚清理出一块地面，铺开报纸，上面铺上我那奢华的毛皮大衣，想睡一觉。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但睡不着。这几个小时的震撼太强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母早已不在这里了。难道他们遇难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毛病。他可能承受不了纳粹占领时期遭受的新困苦。但妈妈远非年迈之人，她总是精力充沛。她完全可能保全下来。如果她被赶出家门，那会给我留下信息的。早晨，天亮之后，开始仔细搜寻，在床和家具下摸索，探究窗框和家门框。可能，那里会划出点什么，好让我猜透这个谜。一无所获之后，便到城里去找。找遍了所有留在基辅的熟人。有人看见过父亲，有人看见过母亲。但这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活着。心里一阵轻松。但他们在哪儿呢？

渐渐地，我开始有把握了，也就是父母亲不在城里，并且他们根本不在战线我们这一方。他们是被德国人带走了，或者是自己决定去西方了，因为他们知道在占领区呆过之后，苏联政权回来之后会有大麻烦？实际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脚底下现在有了一枚定时炸弹。我知道我们的习惯做法，因此十分清楚，我早晚会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会，然后被安排在某个不显眼的机构里，并且更坏的结果是，被发配得远远地，或者“找一个什么事”，干脆被清除，因为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这样的人，斯大林是不

会让他活在世上的。

后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了不让我冒险，更换了姓氏，用了母亲娘家的姓。虽然他们生活经验多多，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十分幼稚。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眼线，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这点小把戏。而在后来，父母的这种“防备措施”只不过更加挑动了贝利亚。

当我明白父母找不到之后，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每次，遇到“险情”时，我不知为何总是很平静。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时，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某个车站上，拥挤的人群把我和父母挤开，我一个人被丢在了月台上，眼看着贴满难民的火车车厢晃过眼前，将父母带向不知何方。后来，当我长大些时，嗓子里的一块脓肿使我窒息，我同样平静地听到有人对父母说，“自己保重吧，他活不到天亮的……”天亮之前，脓肿自行冲破，于是我活过来了。

但是，我心头却十分沉重。这既是对父母的担心，也是明白必须尽快向莫洛托夫汇报这件事情。然而，想离开基辅并非易事。没有定期的航班，于是必须等着搭顺路的飞机。我手里的证件帮了大忙。警备司令给了我一部“威利斯”，把我送到左岸，布罗瓦雷，到了苏联英雄拉盖耶夫将军指挥的空军部队驻地。他有一架运输机，不定期飞往莫斯科。但是，天气却不适于飞行：低云，大雾，甚至歼击机都停止了战斗出航。

拉盖耶夫请我到 he 住的农舍里。每天，我跟他下棋到深夜，喝着女主人用甜菜作的家酿酒，然后在正房的小铺上睡觉。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这种无奈的滞留使我着急。我知道，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莫洛托夫可能在我回去之前离开莫斯科。此外，我知道，这件事汇报得越早越好。如果从其他途径知道了，那结果可能是在企图隐瞒真情。而这一点，按照当时的规矩，是最大的罪过。

天气没有好转，但有消息说，库尔斯克地区的云层散开了。我当然不能告诉拉盖耶夫，为何在我们代表团出发去德黑兰的特定日期之前回到莫斯科如此重要。但是，他感觉到事情十分紧急。于是自作主张派了一架歼击机，把我送到库尔斯克附近的军用机场。次日，我从这里飞往莫斯科。

我紧赶慢赶，还是迟了。莫洛托夫已经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一起两天之前乘火车前往巴库，再从那儿飞往德黑兰。同时我得知，我的外交护照已经办妥，并且当天夜里有一架运输机从伏努克沃机场飞往阿塞拜疆首府，机上为我预留了一个位子。这样，我跟任何人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一天之后便抵达了伊朗首都。我打定主意，在完成自己最后一次翻译任务之后，在德黑兰会议结束时把所有情况告诉莫洛托夫，以便不影响工作。开会的日子里，参加全体大会和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的双边会谈，翻译“三巨头”的席间谈话，作记录，准备各种文件，总之非常忙碌，差不多会忘记自己的事。但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想象着自己的“被逐出乐园”将如何发生。

会议结束之后，我国代表团分乘几架飞机回到了巴库。从这儿

乘火车往莫斯科。我在莫洛托夫的车厢里，利用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他讲了，在基辅未能找到父母。出乎我的意料，莫洛托夫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报告。

“您及时报告给我，这样做很对，”他稍事停顿了一下说，“这种事不能拖。他们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了基辅？”“我不清楚。也许是被德国人赶走了？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一点也不能排除。我想，他们是会找到的。那么您继续工作，并且再不要跟任何人讲什么。告诉了我，这就足够了……” 于是，我继续工作。我照常被叫去翻译斯大林的谈话。1944 年春天，我被列入参加在杜巴顿伊科斯制定联合国宪章草案的苏联代表团，这样，我在华盛顿工作了几个月。我以为没事了。

但是，这不过是我的想当然而已。

\*\*\*\*\*

## \*第七章 中国“百花齐放”亲历记

\*\*\*\*\*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

科，以及世界各地.....

-----

贝利亚的报告(1)

-----

贝利亚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其卧室的笔记本里，记录着500多个供其发泄淫欲的女性名单。

他一直在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了”。

莫洛托夫请斯大林在我的工作调动文件上签字，而他的前四位助理，有三位被枪毙，第四位从卢比杨卡监狱的电梯井跳了下去.....

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在各自机构的办公室之外，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公用住房。这些房子位于人民委员苏维埃(即苏联政府——译注)大楼的二层。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只不过在不同的走廊罢了。距离“主人”最近的是贝利亚。1941年10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员会疏散到了古比雪夫市，当时所有外国的外交代表机构也都搬到那儿。贝利亚却去了高加索为军队安排石油供应。实际上，他可能是想远离莫斯科，躲过危险时刻。

1941年12月上旬，我和巴甫洛夫被莫洛托夫从古比雪夫召回到莫斯科之后发现，我们的房间已经被占用了，而贝利亚的办公室依

然空着。莫洛托夫要我们暂时先在这间办公室安顿下来。

我们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他不太乐意地执行了莫洛托夫的命令，为我们打开了空置的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完全没有使用过，收拾得一干二净，既没有文件夹，也没有一片纸，似乎主人根本不打算回到这儿来。但电话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克里姆林宫内线和政府长途电话。

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我们禁不住诱惑，对法力无边的斯大林秘密机关头子的房子进行了一番检视。

访客首先进入接待室，这里有警卫。右边的门通往秘书办公室，那是两间不大的房间。左边的门通向宽敞的会议室，这里有一张长桌子。后边是首长本人的办公室，连着一间起居室。再往前是卫生间和一小间类似厨房的房间，有自来水和煤气灶。莫洛托夫本人的休息室比这要简单的多，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和斯大林，以及其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有住房。当莫洛托夫生病而又有紧急公务需要请示时，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苏联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之后，革命领袖们搬进去的房子相当难看，屋顶低矮，房间窄小，家具都是革命前的旧货。以前这些房子住的，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宫当差的，以及沙皇偶尔到旧都来时为其一家人服务的差人。

年轻的革命领袖们十分简朴，因此沙皇前任差役的房子已经使他们很满意了。

但是，从第比利斯奉调来到莫斯科的贝利亚却没有搬进这种房

子。传说似乎他说服了斯大林，要求作为国家安全机构的首脑最好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以防发生敌方突袭或暴动时可以负责救援政治局成员。不管怎么说，“主人”允许他在卡恰罗夫街和花园环线交叉口处占了一幢别墅。结果是，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时间都呆在克里姆林宫，而贝利亚本人却拥有一定的自由并不受监督。贝利亚利用了这一点，用自己的亲信组建一个小队，专门在大街上寻找漂亮的年轻妇女和姑娘。这些人行动起来完全无所顾忌：汽车停在毫无防备的女人之前，身穿国家安全机关制服的军官和颜悦色地以有重要事情为借口请她上车，车门关上——就这样，贝利亚淫欲的又一个牺牲品被带到别墅的内院。通常，女人会先被带到餐厅招待吃喝，然后留下她一个人呆着。

受害者一般不会困惑很长时间。画像上非常熟悉的、活像癞蛤蟆似的那人出现在房间里，戴着夹鼻眼镜，身穿浴袍。贝利亚向女人提出那个要求，如果女人不同意，便强奸了事。护送女人出别墅的军官则会警告女人，如果“泄漏机密”，她本人和家人就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只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人们才开始谈论。

贝利亚在这方面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他的卧室发现了一本记录，上面写着五百多名受害妇女的名字。

然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发现了最高领导人现行“住房制度”中的危险。所有政要随时都可能成为身处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贝

利亚的阶下囚。因此，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员迁出克里姆林宫，在列宁山上为他们建造了高级住宅。但是，领导们又很快从那里迁了出去。空置的高级住宅似乎成为领袖们“出”克里姆林宫的纪念物。

斯大林时期，最高领导人的住房根本不成问题。克里姆林宫内的房子，只要他们还在位，是配给每个人的。如果某人在斯大林那儿失宠，那么莫斯科的房子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失宠的领导人首先会被投入监狱，然后很快会升天。同时，他的家人会被发配到克累马集中营（位于苏联远东，雅库梯亚境内——译注）。

斯大林死后，情况有所变化。失位的领导人不再被枪毙，但必须搬出位于列宁山上的高级住宅。当时便有这样一个设想：设立特别建筑局，在首都最好的区段建设豪华的高级住宅楼，这样，在位的领导人都可以入住。若降职或者退休的话，也不必搬出这些专门按照其趣味和要求建造的房子。

这便是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住房问题历史的简单回顾。

在贝利亚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惟一令人满意的，是经常有热水的卫生间，还有政府长途电话。有时我们必须与留在古比雪夫的维辛斯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英国处和美国处联系，询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有时我们俩甚至还可以与各自留在古比雪夫的妻子通电话。有一次，正在通话当中，我发现有人接入。我与妻子佳丽亚简短告别后，挂上了电话。很快，政府专用长途电话响了起来。

“喂.....”

“你有什么权力使用首长的电话？”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能不能先通报一下？”

“我没时间跟你客套。谁批准你进入这间办公室？你是谁？”这个声音威胁道。

我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想示弱，因为我是合法地呆在这里的。

“请先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使用政府电话线？”

“我是谢罗夫将军。我负责政府通讯。我接到报告，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政府线路进行私人通话了。”

我的确曾经两次有私事打电话到古比雪夫。佳丽亚当时怀孕不久。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就要出生了。佳丽亚身体非常不好。我在为她搞各种药，有时顺便捎过去一些能买到的食品，用电话通知她具体带东西的人，以及询问身体状况等等。这样的通话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所以我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就像上次在利沃夫一样，我再次碰上了谢罗夫将军。他肯定已经忘记我是谁了。因此我答道：

“我是别列什科夫。如果记得的话，我跟您曾经在利沃夫见过面。贝利亚同志不在时，我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命令在这里办公，我是他的助手。您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现在古比雪夫，所以不知道情况。”谢罗夫慌里慌张地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然而，我想他肯定将这起“事件”报告给了贝利亚，并且，如果莫洛托夫事先没有将我们搬进他办公室的问题与贝利亚协商的话，他会给我们提醒的。所以，当我们最终在莫洛托夫办公室隔壁得到自己的房间时，实在是太高兴了。

表面上，在我们偶尔打交道的时候，贝利亚对我很客气。参加德黑兰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中，正式成员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但是，与他们一起呆在苏联大使馆的却还有贝利亚。每天早晨出发到举行全体会议的大楼时，我都能看见，贝利亚坐在装有深色玻璃的“别克”车里，竖起风衣领子，将细呢礼帽压在额头上，巡视大使馆的院子，只有夹鼻眼镜的镜片偶尔反光。一次，我与他在餐厅旁的警卫室附近偶然相遇。他和气地与我打过招呼，询问了会议上的一些情况，然后重复了日前在军事专家会议上伏罗希洛夫所说的斯大林喜欢我，因此我应该利用他的好感考虑自己的前程之类的话。我谢过他，并回答说，我非常重视自己目前的工作，并没有奢望其他东西。

-----

贝利亚的报告(2)

-----

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座位的次序一般是，斯大林居中，他的右手是主客，然后是翻译，其身后是贝利亚。这样，我便时不时地与国家安全首脑并坐。他几乎从来不动食物。但是，每次席上都会给他准备一盘小红辣椒，他就像是嗑瓜子那样一个接一个送入口中。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小辣椒，我将它放送到嘴边，就感觉到人整个似乎着了火。贝利亚笑了，并且坚持要我吞下去。我不得不做出样子，而后悄悄把辣椒抛在桌下。

“这很有用。男人每天都要吃一盘这种辣椒。”贝利亚用教训的口吻说。

他每次都要问，我为什么那么瘦。

“我的体格构造就是这样的。”我回答道。我当然不能说，我们每天在克里姆林宫卫兵食堂吃的两根小灌肠，无论如何也不会增加我的体重。

总而言之，每次有贝利亚在场我都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他随时都会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记得那是 1944 年秋天，我向莫洛托夫汇报华盛顿来的一份电报。人民委员一边听着，一边继续看桌上的文件。然后，他盯着我问道：

“1934 年你在波兰驻基辅领事馆干了些什么？”

我一下子张皇失措，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莫洛托夫盯着我。我明白了，必须马上回答。

“在波兰领事馆？”我开始回想，“我的确去过那儿。当时我是基

辅国旅的导游。游客一般经波兰回国。我收起他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办理过境签证……”“这个我们知道，”莫洛托夫冷冷地说，“但是，这里谈到的造访波兰领事馆，并不在旅游季节，而是迟些，是秋天的事，并且你也不是从正门进去，而是走了后门。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

想想看，这已经都过去了十年。在这期间基辅遭到占领，解放时有过激战。古老的克列夏季克街遭到破坏，圣母升天大教堂被炸毁，不计其数的艺术珍品被烧毁，成千上万的基辅人牺牲。而 1934 年监视过我的某个人写的东西保存了下来，现在成了一个危险的物证。

“我去找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前是国旅的汽车司机，所以我经常跟他一起载着客人在市内游览。后来他转到领馆工作，当然是经过有关部门的推荐。我偶然在街上碰见了，他请我去车库坐了坐。我们坐了一会，聊了聊会天，抽了根波兰香烟，喝了杯德国啤酒——就这些了……”

莫洛托夫的目光稍微缓和了些，后来他说：

“我接受你的解释。因为这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你去波兰领馆的事。你可以走了。”

我似乎很幸运。因为我完全可能被宣布为混进圣地——斯大林办公室的“波兰白匪间谍”。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叹，这世界真小。波兰驻乌克兰领事是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的父亲。

如果当时对我立案，强迫“承认”的话，结果似乎是老布热津斯基策反了我。

然而，与莫洛托夫的谈话并不是没有后果。1944 年是在胜利的礼花中结束的。当时我们已经住在莫斯科维亚街的一套两居室里。房子是 1944 年春天，我的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前分到的。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保姆，这对佳丽亚非常重要，因为她不想放弃塔斯社的工作。1945 年新年我们决定在家里过。来了许多朋友和同事，非常热闹。客人们在凌晨才散去。

1 月 1 日，在人民委员秘书处值班的是巴甫洛夫。他从我家直接去了克里姆林宫。而我当天休息。我们整理好房间，出去到街上逛了一会，带谢尔盖玩了玩雪橇，便早早睡下了。元月 2 日的凌晨大约三点，电话响了。莫洛托夫紧急召我去克里姆林宫。我毫不迟疑，叫了车，几分钟之后便进了秘书处。我向在场的人问了新年好，但很快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做声，表情阴沉。像往常一样，我想不经通报见到人民委员，但是科西列夫请我稍候，自己进了首长办公室。这一切都有些怪异。科西列夫终于回来，非常正式地对我说：

“别列什科夫同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罗维奇正在等您。”

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些一下子让我感到很陌生，包括有一张长条桌和几排椅子的接待室，还有人民委员的办公室，似乎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不曾每天来过这里。

莫洛托夫，就像 1940 年我第一次看见他一样，低头看文件，桌

上是一盏绿色灯罩台灯。

我停在屋子中间，手足无措。

莫洛托夫抬起头来，定睛看着我。最终他打破了沉默。

“走近些，请坐。”

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心里七上八下：我做错了什么？但我已经明白：出事了。“你最近没有父母的消息吧？”莫洛托夫问道。

“43 年 11 月去过基辅之后，我向您汇报过，在那儿没有找到他们。可能，他们死了或者被纳粹赶到德国去了，许多基辅人都是这样的。最近我也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可是贝利亚认为，他们是自愿去了西方。”

“他有证据吗？”“他有自己情报人员的报告作证据。贝利亚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再次提到了你与波兰领事馆的接触。结合到你父母的失踪，他认为，出现了新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因此，他提出你不合适继续目前的工作……”

莫洛托夫停了一下，考究般地看着我。我似乎僵住了。贝利亚的“进一步调查”意味着什么，不难明白。也就是说，贝利亚本人曾经建议我利用斯大林的好感认真对待大好前程，而现在我的前程全在他的手里了。我突然感到很漠然：一旦事情发生了，再努力争取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时，莫洛托夫接着说道：

“我跟斯大林同志商量过您的事情。他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下

您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在最高层的身边。您必须马上将所有文件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在没有决定您的问题之前，必须呆在家里。再见……”

完了。我就像在云雾中，摸索着走了出来，机械地打开了保险柜，取出了所有的文件夹，列了一张清单，我跟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们两人甚至没有告别，一下子就消失了。

留下我一人在房间里。我坐在凳子上，努力地想理清纷乱如麻的思绪。我穿上了自己带着人民外交委员顾问将军肩章的制式大衣，戴上有帽徽的高顶帽，然后走向出口。

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大门口，值勤军官拿过我蓝色的小本。它可以使我通过任何一道门进入克里姆林宫，非同寻常地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

“我奉命收回您的通行证。”

这句话似乎永远彻底地关上了我身后通往过去的大门。

我一言未发，来到了红场上，然后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我不能马上回家。就像梦游患者一样，我在空旷的大街上走了几个小时。妻子上班之后，我才回到家里。谢尔盖睡着，保姆在厨房里忙活。家里我不能呆。每天，我都出去在城里逛游几个小时。整整两周，没有任何消息。前不久的同事和许多“朋友”一阵风似地都吹跑了。夜里，我等着敲门声——因为贝利亚许诺要进行“调查”。

最终，1月17日，电话响了。是请我去《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编辑部。我松了一口气。我跟这家杂志打过许多交道。有段时间

莫洛托夫曾是实际上的总编，他托付我为编委会准备材料，看文章，给编辑部转交清样和版式的修改。我也非常熟悉副总编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列昂捷夫，他负责杂志的实际工作。

他非常亲切地迎接了我，让我坐在自己办公室小桌前的椅子上。

他说：“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斯大林同志签署的决定的抄件。那上面说，您不再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职务，转调到《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工作。事实上，我此前已经知道了这个决定，但还是想等到正式文件，然后再请你来。”

-----  
贝利亚的报告(3)  
-----

我感谢了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告诉我的情况，并说，虽然没有经验，但将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

列昂捷夫抢先说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我向您转告一些想法。他建议在私下场合尽量不要谈及您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不要谈您在他的秘书处的作品内容。非常简单：您在人民委员会工作过，就行了。要避免与以前因公交往过的外国人有任何接

触。如果要发表文章，请使用笔名。”

我明白了，莫洛托夫给我这些忠告，是为我免遭贝利亚的迫害。我应该尽量不显眼，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传媒上，以免再次提醒那个没有完结的“调查”。

“现在谈谈您在编辑部的工作，”列昂捷夫继续说，“现在已经决定，我们的杂志要出英文和德文版，因此莫洛托夫提议您一开始先负责这两个版本的工作。您看如何？”

“好的，这似乎比较接近我的能力。非常感激地接受这个建议。”

“我想，您不需要刻意避免作者的身份……当然要用笔名。”列昂捷夫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向莫洛托夫表示了谢意。他并不常保护别人。在死囚的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容易。“B M”这个缩写——维亚切斯拉夫 莫洛托夫——多次与同样的一个批示“B M”意思是“极刑”，即枪毙，一起出现。在我之前，莫洛托夫的四个助理已经死了：三人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院里被枪毙，第四个人受不了酷刑，从卢比扬卡的电梯井里跳了下去。莫洛托夫没有保护他们。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决定救我一命，甚至为我的未来给了指示。我想，他甚至与斯大林谈妥了，在我转调到杂志工作的决定上有“领袖”本人的签字。显然，这一点挡住了贝利亚的“调查”。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被枪毙之后，这期间已经过去了十年时间。在段时间里，我们从未有过接触，但莫洛托夫还是想着我，并去掉了

我身上“不可靠”的标记。然而，在这些年里，他本人也曾经命悬一丝。

-----  
波莉娜还活着！  
-----

贝利亚亲自动手，用铁链严刑拷打苏联副外长，逼着他承认是英国间谍。

苏联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大着胆子问斯大林：为什么要逮捕我的妻子？得到的回答是：他们连我的亲戚也全都给关起来了……

贝利亚对莫洛托夫悄声说：你的妻子波莉娜还活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马伊斯基二战期间担任苏联驻英国大使。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我们曾经见过最后一面。他基本上一直住在位于莫斯科郊外莫仁卡的科学院别墅里。

我是在一个暖和的夏日去看他的。他住的房子位于花园的深处，花园精心养护，花坛里鲜花如画，地上玫瑰盛开。只有花丛中间飞来飞去的蜜蜂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还有远处一颗高高的松树枝上啄木鸟的叩击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马伊斯基坐在外廊上的轮椅里，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大开本旧

书，腿上盖着一条色彩鲜艳的苏格兰呢毯。服务员送上来了马林果酱和茶水。马伊斯基自己动手把茶沏到薄瓷茶杯中，把果酱放到小盘里。

通常，我们的谈话总是从回忆遥远的战争年代开始的。我最早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认识他的，那是1941年12月下旬，他陪同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到达莫斯科。他们从苏格兰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再换乘火车直达目的地。在前不久结束的莫斯科战役中，我军首次大获全胜。但在首都周围依然有希特勒的“别动队”在活动。艾登和马伊斯基身穿白色高领短皮大衣，戴着毛茸茸的帽子。那年的冬天很冷，所以他们从伦敦出发之前准备的行头刚好适合。从此后，我跟马伊斯基在莫斯科常常见面——包括在丘吉尔来访，1943年秋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期间，以及此后马伊斯基回到莫斯科，作了副外长之后。但后来我离开了外交部，而马伊斯基则身陷卢比扬卡。“实在是太恐怖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带着轻微的距离感回忆道，“贝利亚亲自审问了我。他用铁链，短鞭抽打我。他要我承认一直在为军情局工作。但我最终还是招认了，说早就当了英国间谍。当时我想，如果不被枪毙，便会流放，让我安生。但我被一直关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审问从未间断。我从其中很快明白了，这里不仅仅事关我本人，贝利亚在准备干掉莫洛托夫……”

早在1940年底，莫洛托夫的地位已经不稳。维辛斯基接替了他的外长职务。莫洛托夫的妻子也已经被捕——波莉娜曾经主管香料工业，她作了许多工作，使得苏联的妇女终于有了女性美。传说她

是以色列的间谍。苏联积极参与了以色列的建国，两国建交之后，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是高达·梅厄。她与波莉娜曾经是中学同学，因此在莫斯科见面时已是老朋友了。她们经常互相走动，很多时间都呆在一起。这使得贝利亚有理由说服斯大林，称波莉娜早就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工作。所以，尽管莫洛托夫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他的爱妻却被投入卢比扬卡的地下室。据称，莫洛托夫曾经大着胆子问斯大林，为什么逮捕波莉娜，得到的却是一个半开玩笑的回答：

“我一无所知，维亚切斯拉夫，他们连我的亲戚全都给关起来了……”

的确，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斯瓦尼泽和第二任妻子阿里卢耶娃几乎所有的亲戚，要么坐过牢，要么已被枪毙。对于全能的领袖这个“玩笑”话莫洛托夫无以为答。何况，我们的主席加里宁和“主人”的主要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都坐过牢。后来，莫洛托夫说，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走廊里遇见了贝利亚，两人走近后，贝利亚在他耳边轻声说：

“波莉娜还活着……”

莫洛托夫能够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爱妻就在贝利亚的牢狱中！莫洛托夫还回忆起，就在斯大林刚刚死后，贝利亚客客气气地将波莉娜送了回来，他是多么幸福。当时，马伊斯基也被从牢房带到了贝利亚的办公室。那里的桌子上放着一盘水果，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只酒杯。贝利亚当时客气至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他对嫌疑人说道，“看看您都往自己身上

揽了些什么呀？您怎么会是特务呢？这真是胡说八道……”

马伊斯基对当时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他认定，这是斯大林总管的又一个狡猾的圈套。他想，如果说自己不是特务的话，一定会挨打的。

“不，拉夫列基巴甫洛维奇，我是特务，英国人招募了我，这是真的……”

“您别说这些傻话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根本不是什么特务。这是他们在诬陷。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挑拨离间者会得到惩罚。而您现在可以直接回家了。”

马伊斯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在考验人，并且马上就会开始嘲笑他？

一个军官走进办公室，将嫌疑人进牢房之前收走的衣服物品放在他的面前。

贝利亚将马伊斯基让进卧室换衣服。

“这样了，”贝利亚向马伊斯基伸出手来说，“请您宽宏大量，原谅吧，这是个误会。车下面在等着您……送一送。”他对军官吩咐了一句。

在斯大林死后和贝利亚被捕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贝利亚将自己打扮成揭发者，指控自己手下人滥用职权，越权，残酷对待人犯。为了推脱自己，他匆忙逮捕并枪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侦查部门的负责人柳明和其他刽子手。

但是，当时，为了捏造“莫洛托夫英国特务案”，马伊斯基和波

莉娜却是有用的。从马伊斯基讲述的贝利亚主持的审问中，大约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情景：

莫洛托夫似乎在其 1942 年春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期间被英国人招募。当时巴甫洛夫担任他的翻译。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安全军官。他们乘坐临时改装的苏制远程轰炸机先飞抵苏格兰北部，然后换乘夜间专列快车从格拉斯哥到达伦敦。为了安全起见，苏联代表团的代号为“布朗先生使团”，安东尼·艾登在机场上迎接了他们，也由他陪伴客人抵达英国首都。莫洛托夫与艾登一样，各有一节高级车厢。车厢里，除了部长专用的宽敞包间之外，还有翻译和警卫的单间卧房。深夜，艾登带着自己的翻译来到莫洛托夫的车厢。他敲了敲人民委员的门，门开了，他们二人走了进去。

当时，我们国家有一条严格规定：任何人，甚至政治局委员，必须在至少有一名，最好是两名苏联“证人”在场方可与外国人进行谈判。这种“证人”一般由翻译充任。但是，当时莫洛托夫却跟艾登及其翻译单独呆了近一个小时。他们谈了些什么？只能是“串通”。这个情况当时即被随从中的某人记录了下来。在某个时刻，相应的报告一直放在贝利亚的文件中。现在，它成为“证据”，即就在当天夜里艾登招募了莫洛托夫，使后者成为英国军情局最有价值的谍报员。正是当夜在夜行快车里进行的那场谈话的“机密性质”，可以解释为何莫洛托夫严重违反了斯大林有关不得与外国人单独相处的严格规定。

多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内部享有

很高的威望。虽然斯大林早已经不再拿自己周围人的意见当回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必须要考虑社会舆论。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虽然有某种意义，但仍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因为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在监狱里。所以，在最后几年，斯大林在一步步地破坏莫洛托夫的威信。在中央全会上，以及其他更小范围内，他谈到了莫洛托夫的“错误”，谈他没有顶住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向西方“投降”等等。与此同时，他逐步将莫洛托夫往后推，把他排斥出政治局。为了最后的打击，逮捕和宣布此前的亲密战友是特务和人民公敌，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然而斯大林之死，止住了这次打击。

在最后的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住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卡的别墅里，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敬三杯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莉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当有人问道：“怎么可以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莉娜，并且差点害了您本人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如既往：“斯大林是个伟人……”

-----  
《新时代》杂志(1)  
-----

一个普通刊物改名，也要斯大林亲自批准。

“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恐惧，他担心上百万到过西欧的苏军官兵们会像十二月党人一样发动起义。

斯大林再次开始逮捕、迫害，将国家再次置于残酷恐怖与极端排外的窒息氛围之中。

截至到1945年3月份，翻译和编辑的挑选已经完成，我们开始准备出版《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英文和德文版。不久又决定出版法文版。我是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编辑，但我的法文知识不足以保证翻译的质量和正确性。我不得不另外寻找合适的人选。外交部推荐了切格达耶夫，他在战前曾在苏联驻法国使馆工作过，法语流利。

在打败德国以及战争在欧洲结束之后，我们杂志的名称过时了。写着《战争与工人阶级》的封面无论如何不适应已经开始的和平时期。列昂捷夫要我们大家都想一个新的名字。

很快，我们拟出的各种各样的名称形成了一个清单。讨论的结果，其中的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再次形成了一个清单，列昂捷夫转给了莫洛托夫，后者则转给斯大林定夺。

应该说，我们的思路集中在仅仅几个非常表面化的名称上。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方案：《和平与工人阶级》、《国际生活》、《国际综述》、《国际事件潜望镜》、《世界轨道》、《政治与生活》等等。我们等待答复的时间大约有两周多。新一期的出版日期一天天接近，编辑部里大家都十分着急，因为都看到了战后保持旧名称

的不妥。

终于，信使出现在我们位于卡拉什街的编辑部（后来，这栋别墅成了日本大使馆）。他带来了有五个火漆封印的大型红色信封。我们都知道，这来自斯大林的秘书处。签收之后，列昂捷夫剪开信封，取出了写着我们建议的那张纸。在右下角有“新时代”几个大字，和斯大林签名的缩写。我们的方案，没有一个让“领袖”满意，所以他自己给杂志起了名。

问题解决了。但是，“主人”的选择却使列昂捷夫左右为难。当时，许多人对革命之前极端反动的、由黑帮分子苏沃林出版的报纸《新时代》记忆犹新。列宁曾经用各种骂名与其进行过激烈辩论。大家都知道，列宁与自己的对立面辩论时善于使用各种激烈的修饰词和标签。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是美籍俄裔阿姆菲加特洛夫。记得有一次，他找到我，骄傲地对我说，他祖父的名字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到。出于好奇，我查阅了《列宁全集》中提到美国记者祖先的那一页。原来，列宁称呼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娼妓阿姆菲加特洛夫”。这位引起了列宁辩论怒火的作者，大部分文章就发表在《新时代》上。同时，让我们总编特别恼火的是，这个苏沃林报纸的编辑和他是同姓，也姓列昂捷夫。

我们已经订制了俄文、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而列昂捷夫的疑虑更重了。他不能违抗斯大林，同时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类似不能释怀。将来，当杂志出版之后，一旦有人向“主人”提醒到这个不巧之处，斯大林的怒火一定会降到编辑部头上，他会问：为什么没有预

先提醒。

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列昂捷夫最终还是下决心向斯大林报告。这在技术上非常简单，因为编辑部里就有连接克里姆林宫的直拨电话。这个电话响起来时，一般斯大林本人接听。但是，惊动领袖，并且怀疑他的决定这可非同小可！

斯大林听完了列昂捷夫的想法，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样的，当时是一个新时代，现在是另一个。战争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了。敌人被打败了。我们的周围都是朋友。新的时代到来了……”

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列昂捷夫的疑虑烟消云散。

在那一刻，斯大林是否真的相信，新时代已经到来，与西方列强的合作关系可以保持下去，在国内也将不再追寻“敌人”，苏联和全世界的好时光已经来临？国家辽阔的土地上一片废墟。千百万人蜗居在土屋里，物资匮乏。并且还要完成加入对日作战的承诺。但这被看作一场短暂的战役。最主要的，是尽快为居民创造基本生活条件，重建遭到破坏的一切。也可能，当时斯大林相信，美国人将会帮助我们。也可能，他已经打算节制自己的胃口，进行妥协？因为，刚刚入主白宫的杜鲁门使人相信，在国际事务方面他打算继续罗斯福的方针。

前不久的盟友间关系紧张，这是谁的责任？西方的某些研究者认为，反希特勒三大国联盟的所有领导人在同等程度上都已经对继

续这种盟友关系不感兴趣了。在我看来，战争刚结束时，苏联领导人极力在保持信任气氛，然而在一系列情况下却又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这种气氛。这里的原因是，斯大林的疑心太重，他倾向于用“上一场战争”的概念进行思考。他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在苏联周围有几个国家建立一个地带，而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他可以完全放心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英美相应的反应。但是，那里也并不大关心保持良好的气候。杜鲁门对前来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莫洛托夫进行粗鲁攻击，使斯大林有理由认为，美国新政府正在放弃罗斯福的政策。此后在波茨坦，杜鲁门企图用原子弹讹诈苏联，在莫斯科制造出了一种受到严重威胁的气氛。由此，斯大林的行动在西方被解释为苏联威胁。对抗开始加剧，“冷战”展开，并有演变为“热战”的危险。

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作为回应，苏联也展开了更残酷的反帝斗争。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合作斗争中形成的相互好感依然存在，而双方却都在让各自的人民准备对抗。正是在四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发起了与“世界主义”和“崇拜外国”作斗争的宣传运动。我觉得，这里企图达到两个目标：驱使人民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侵略者”，在国内重新制造恐怖气氛。

我想，是“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不得安宁。在 1812 年的卫国战争期间，数十万俄军官兵到了巴黎。沿途他们了解到了西欧各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条件，与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有天壤之别。他们感

受到了甚至在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依然处处散发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俄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这些，并带回了彼得堡。几年之后，参议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现在，成百万的苏军官兵到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走过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土地。他们看到，甚至在五年战争的破坏和希特勒的占领之后，那里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暗淡无光，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比苏联人活得好。不仅仅在东普鲁士，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农家的地窖里挂着整块火腿，还有香肠和奶酪。身处斯大林国家农奴制下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早就不记得这些东西了。所以，令“各族人民领袖”非常不安的是，当他禁锢在隔绝和无知中的这一大批人回到家里，并开始比较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情况也使他不安。战争期间，许多人克服了自卑综合症，和党组织灌输的等待上级指示的无条件反射。甚至普通士兵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往往必须自行决定作什么和怎么作，根据情况采取行动。这等同于斯大林一直企图在自己的臣民心中打消的自由感。这也促使人们克服了恐惧感。可是，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恐惧感之上。如此一来，出现了对体制的威胁。必须拯救这个体制。

于是，官方的新闻宣传开始诋毁所有“外国”的东西，甚至旧俄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法式面包”被改名，成了“城市面包”，列宁格勒十分著名的咖啡馆“诺德”被改为“北方”。在所有地方都要有“本国优

先”。任何没能体现本国优先的东西，就应该受到排斥。遗传学和控制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任何人，只要他胆敢正面评价西方的某个发现，会立即被贴上“世界主义的丧家之犬”，以及在“外国事物”面前奴颜婢膝的标签。那些曾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生活过的人，遭到了怀疑。在各种表格上专门加入了这一栏。似乎当时人们是自愿呆在德国人那儿似的，因而是他们自己的错，而许诺在敌人的领土上消灭侵略者，而后造成红军撤退到伏尔加和高加索的苏联领袖们，则与此无关。数十万人被捕，由于“领袖”的意志在战争最初几天未能撤退，陷入大包围的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又开始了随便抓人，许多无辜的人被立案调查，先是“列宁格勒案”，此后则有“医生投毒案”。

-----  
《新时代》杂志(2)  
-----

斯大林可以满意了。他又一次将国家置于恐怖之中。但是，这个成就最终反过来对付他自己。当他临死时，居然无人可以帮他。因为他所有的主治医生早都被投入监狱。

-----  
斯大林之死  
-----

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

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年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帅，总司令，“各族人民领袖”，正处在成就和荣誉的顶峰。

斯大林之死，我感受到十分难过。因为，对我而言，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创造了我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属于直接接触他的少数人之一，曾经坐在他身边，认真倾听他说出来的每个词，努力将他的意思连同全部的语气和音调传达给他的谈话对手。被他排斥之后，我甚至没有感到

难过。与我国人民，全人类所承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够赢得他的留恋？我也没有伤心，虽然我知道，这个孤独、病态般疑心重重的人，连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根本都从不曾有过留恋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他收留的孤儿。我曾经相信，那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像宝贵的遗物一样，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使我能够在他的身边工作。那四年时间恰似一个瞬间。

苏共二十大沉重地打击了这些观念。当我最早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不愿相信那里面所讲的一切。但是，一旦深入细节，在脑子里检视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见证，我觉得自己被那个已经推倒的偶像严重欺骗了。

党的二十二大我已经能够比较平静和清醒地接受：我们所有人，包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成了一场大骗局和大蛊惑的受害者。幼稚的大众相信了那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神化的对象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当我开始回忆战时见证过的人和事时，我对自己所听到、所看到的尽量保持客观：避免多余的感性，严格尊重自己所理解的事实。

现在，当我们面临着新的一波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风潮时，当他建立的体制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出来时，我认为，在谴责和痛斥斯大林时代的血腥事件时，客观地讲述所经所见的人事也同等重要。

根据我的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杰卡

诺佐夫的第一次降职也是这个原因。而战争结束之后，他引诱了与莫洛托夫常来常往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这次，斯大林没有保护自己的亲信。杰卡诺佐夫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并且被从人民外交委员部解职。

但是，正像我们这里“任命制官员”一般情形一样，没有让他落得太低：他得到了无线电委副主席的位置。不久，他又开始新的升迁。他的一个朋友——梅尔库洛夫，苏联境外资产总局的局长，将杰卡诺佐夫任命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外资局不仅仅管理着战后我国得到的庞大的战利物资，并且事实上鼓励了在东欧国家进行的有组织抢劫。从那儿，整栋的别墅和宫殿为高官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运了回来——先分解成块，而后在莫斯科郊外装配起来。置于汽车、雕塑、名画那更是不在话下，一般这些东西都是用整列的火车装运回来的。战后某些无产阶级官员之间出现的所谓“个人收藏品”的源头正在这儿。资产局的行动为战后东欧国家的后续发生的灾变播下了种子。

但是，资产局并不是杰卡诺佐夫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阶梯。

斯大林死后不久，贝利亚任命他为格鲁吉亚克格勃的主席。1953 年夏，他和贝利亚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其中也有提拔过杰卡诺佐夫的梅尔库洛夫。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他们，并且判处死刑。同年12月，判决被执行。

这个案件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向被告所提出指控的细节和实质内容。据说，杰卡诺佐夫似

乎按照贝利亚的命令组建了“枪手”小组，并将其秘密派遣到莫斯科来参加贝利亚准备的政变。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五十年代之前，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一旦斯大林去世，必须尽最大力量不使贝利亚在党内占据主要位置，否则党会完蛋。我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他会将国家的发展转到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贝利亚被捕之后，传说他打算解散集体农庄，建立个体农场。阴谋分子们似乎被指控赞成在苏联建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公司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出生在离苏呼米不远梅西午里小村的贝利亚，特别关照过这个城市，当时开始建造一条新的华丽的沿岸街，在“斯大林山”上修建娱乐设施。所有这些，如人们所说，为了使苏呼米湾变成“阿布哈兹的尼斯”，“高加索的里维拉”，将其“预售”给外国资本用于建造国际饭店和赌场。在党员秘密会议上宣读的中央委员会有关“贝利亚案件”的秘密信件中说，贝利亚企图将苏军撤出奥地利，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向铁托派去了密使。当时，在 1953 年，这一切被描绘成可怕的谋反，其谋反小集团的成员被枪毙是罪有应得。

然而，1955 年就已经与奥地利签署了国家协定，外军，其中包括苏军全部撤出。同一年，赫鲁晓夫亲自去见铁托，并对他声明说，因斯大林挑起的与南斯拉夫中断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传说中对阴谋分子指控中的许多问题，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结果似乎是，我们在四十年之前曾经有机会重建农

场经济！也许，这完全有可能解决至少一个问题——粮食问题。那个领导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许诺超过美国的赫鲁晓夫，不仅仅剥夺了农民甚至在斯大林时期都保留着的微不足道的家产。

当然，贝利亚是个嗜血的刽子手。令人恶心的暴虐之徒，强奸犯，淫棍。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手同样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在贝利亚之前，有亚戈达、叶若夫，以及成千上万无名的刽子手。他们毫不犹豫地枪决无辜群众，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带着虐待狂般的快意折磨斯大林镇压期间上百万的受害者。所以，应该将贝利亚案件的材料彻底公开，让世人了解，是否有过争夺权力的上层斗争，或者其中夹杂着有关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原则性分歧。

-----

维也纳之行(1)

-----

《新时代》杂志社的福利远比莫洛托夫秘书处好得多，但被逐出“领袖”身边的事实却噩梦一般纠缠着我，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莫洛托夫亲自指示我，以记者的身份去维也纳面见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前德国总理约瑟夫·维特，这个活的历史向我透露了苏联与西

方和解的秘诀，以及列宁当年与德国签署合约的秘闻.....

回顾我在《新时代》编辑部的最初一段时间，必须承认，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很快，我被列入编委会，并被任命为编辑部的责任秘书。各个外语版本都有了编辑，我的任务只是对他们进行一般的监督。责任秘书的职能范围很广——从纯粹属于记者的事情、编务一直到人事、财务等等。在经济方面我没有理由抱怨。因为以作者身份发表文章，还有稿酬。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47 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被欺骗的一代》——内容是英国青年的现状。我们当时非常同情英国男女青年的困难，但是却没有想到，事实上我们的几代人同样也被欺骗了，终生都在被灌输什么再过三两个五年计划，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就会到来，资本主义国家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等等鬼话。

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可当时我对自己的第一部，并且被译成英文的大作非常自豪。

编辑部指定由某个特别食品基地保障食品供给，给编委会的每个成员规定的份额花样多，质量好。在这个意义上，在杂志社远比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好得多。但我并没有满足感。心里对过去的回忆，对于国家大事虽然是间接的参与，以及，我毫不隐瞒，接近“领袖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的特别感受依然鲜活。每天夜里，这些感受在诱惑我，但大部分时间噩梦在纠缠着我，在梦里，光明与跌落到无底深渊交织在一起。在多少个不眠之夜，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被“领袖”召见之前脑力勃发的那一个个无可比拟的瞬

间。似乎就在我眼前，那个密藏心头、通往他办公室的走廊消失在迷雾之中。这不是吗，我走过哨兵，他向我行礼。这不是吗，这就是那扇门，像往常一样，伏拉西科将军在打盹。我开门，但是，门不听话。伏拉西科长身而起，用一只手拨开我。从深处传来的声音说：“您绝对不能进去！”地板在我脚下裂开，我飞速跌入深渊……每天夜里，“被逐出天堂”的场景以各种变化重复出现。

多年以来整夜工作到早晨的习惯，使我不能按时回家。当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编辑部收到的塔斯社新闻简报，英美国家的报纸。那上面时不时会出现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们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一切在不断地提醒着，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应该扔开这些报纸，不要看见它们，但手就像伸向发痒的伤口般伸过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们，当年是我接受了他们，当时他们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里迈出最初的几步，可现在都成了总领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对我而言这条路却永远关闭了。他们毫无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乐的胜利日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我，没有一个人打过电话。而前不久，所有人争先恐后地请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两个海军的战友带着香槟酒来编辑部看我，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红场，那里到处是狂欢的人们。

特别难受的，是读到从雅尔塔会议发来的报道。似乎就在昨天，会议的参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克里木，进入拉瓦地宫，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话。四年

来，我已习惯于一个念头，即在这些场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万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么是翻译？没有他，谈判的参加者就像聋子哑巴。翻译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发现，需要他仅仅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而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个人。人消失了，但专业人员还在，但已经是另一个的躯壳。从前的那个从未有过，并且无关紧要。

理智上我能理解，但无论如何不能释怀。触及伤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断：我根本不仅仅是翻译，并且还是外交部长助理。不过，我虽然勤勤恳恳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个职位上作用有限。我当时过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们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抛开我。我记得“领袖”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没有不可替代的人”。许多比我更有才华、国家更需要的人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遭到肉体上的消灭。我还活着，并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内心骄傲的小虫子在继续吞噬。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我感觉到浑身酸痛，冷漠的粘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三十岁的我觉得自己衰老、无助。

我夜间的失眠使家庭生活变得复杂。1947 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无可挽回地走向离婚。此后，有近乎于疯狂的迷恋，有不断的吃醋，和解和爆发。不过这些心灵上的创痛治好了病症，并压制了对“失乐园”的思念。

1953 年 3 月，当斯大林死后，我像千百万苏联人一样，哀悼了

他，但已经没有了被无辜开除的情绪。

在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不久，1954 年 4 月初，在我的单身汉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科西列夫，他的声音我已经十年没有听到了，若无其事地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马上来一趟……”

“领袖”死后，不久前还命悬一丝的莫洛托夫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由马林科夫担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贝利亚，同时担任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被委以党中央书记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认为并不重要。

最近几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几座类似克里姆林宫塔楼那样的高层建筑，斯大林非常喜欢。在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其中的一栋里，搬进了外交部。为我准备的出入证放在大门口值班员处。我一方面激动，另一方面却不理解部长突然约见的原因。我来到七楼，这里是他的秘书处。我想，外交部从铁匠桥搬过来很好，并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宫我所熟悉的办公室接见我。否则的话，我的心里又会酸痛。在这里，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一切都不一样。

当进到秘书处时，科西列夫要我直接进到办公室，部长正在那里等着我。

莫洛托夫还是那样坐在桌子后面，向我点头问好，并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里毫无二致。几乎这期间并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还见过他。他既没有问我的身体情况，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直截了当地说：“明天，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将在维也纳开幕。我们想派您去执

行一项任务。据信，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前总理约瑟夫·维特将出席会议。您必须结识他。最好作为报道会议情况的《新时代》记者前去。您将以这个身份向维特作自我介绍，请他就保卫和平运动为题接受采访。但我们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我们正在重新评估国际局势。我们有被隔绝的感觉。所以应当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局面。制订新的欧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维特在1922年的拉巴罗时期，积极看待与苏俄的合作。有关我们如何解决欧洲问题，其中也包括制定对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谈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我的意思。”

“是的。我会尽力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听着莫洛托夫说话，我一边在想：我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某种转折。他当然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外交部的任何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决定了叫我来。也许是因为我还有战前与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最近几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务和外交部机关之外。可他本人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给了我。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事跟出国有关。不过，当时在奥地利驻有苏军，可那里也有美英法的部队。而维也纳在四个占领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奥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个方向，包括西方。在当时，这种出国，尤其考虑到我的情况，是特别受信任的信号。并且现在是多年没见我的莫洛托夫对我表示了信任。这事，以及他事实上使我免遭贝利亚的毒手，让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毫无怜悯之心、以自己坚不可摧的“坚强”而自豪

的人所不常见的。他从来不曾软过心肠。但是，我还是在想，改正对我不公的时机到了？可能是由于那些对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不公正而态度软化了？

-----  
维也纳之行(2)  
-----

“当然，维特不必知道您带着政府的任务。”莫洛托夫解释说，“只需作一个暗示，即莫斯科的重要人物想了解他的意见，将会尊重他的意见。回来之后，向我提交一份详细报告。现在会给您发一个到奥地利的有效证件。明天早晨出发。维也纳的旅馆已经订妥。祝你成功。”

“谢谢对我的信任。”按照我们的老习惯，我对党表示感谢，即便她——这非常少见——仅仅是在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们的体制有时真的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运行！我刚刚从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出来，科西列夫就将贴着我的照片、带国徽图章和出境签证的一本深红色小本交到手上。原来，这些年来，我的档案一直保存在秘书处，这里面有几张照片。同时我领到了机票。

飞机早上七点从伏努克沃机场起飞。我甚至来不及给编辑部说

一声。但后来才知道，列昂捷夫从莫洛托夫那儿知道了全部情况。

大使馆事先得到密码电报通知，派人在机场接了我。我住在被苏军司令部没收的“帝国”饭店里，它由经济部队管理，一切都是马马虎虎。在德国占领时期，这曾是一家豪华饭店，现在的样子令人失望。两部电梯中有一部趴了窝，房间隔三差五整理一次，水池和浴缸里是损坏的水龙头长时间滴水的留下的水渍锈。餐厅和咖啡厅关张，甚至没有办法烧水煮茶。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经过不许出国的十年之后，我来到了维也纳，并且肩负政府的重托。

晚上，我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开幕式。会场旁边的休息室里挤满了与会者，客人和记者。到处散发着新鲜咖啡、昂贵雪茄和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香水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我们尚未见过的“夏奈尔5号”。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有当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在那儿，我见到了罗素、约利奥-居里、伊利亚·爱伦堡，当然还有约瑟夫·维特。我决定不着急，不必过早操办自己的采访，而是先在陌生的环境里搞熟悉了，并且跟尽可能多的与会者建立联系。

我在这里遇见了当时非常风行的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在基辅时我们就认识。战争一开始，他就成了前线记者，但常来莫斯科，因为他的妻子、波兰作家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波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她身材庞大、年纪已经不轻、身穿军便服，骑兵马裤，足登高筒长靴。跟她在一起，科涅楚克显得小巧而年幼。当时，在

前线流行着这样一首四句歌谣：

来了一份电报，措辞激烈，  
指挥部里，有人心里颇为紧张。  
来人是旺姐·瓦西列夫斯卡娅，  
她可是——科涅楚克的妻子。

战争快结束时，科涅楚克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斯拉夫国家事务的副委员，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参加部委会。他一般坐在长桌的顶头上，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寡言。莫洛托夫则带着滑头的讥笑说：

“这个科涅楚克坐在这里，观察着，随后会把我们写进戏里去呢……”

在维也纳，上午和下午举行会议，晚上安排有文艺节目。市政当局的代表邀请我们到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后宫诱逃》，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以及政治性的夜酒会。我记住了那里上演的一个小型剧：舞台中央，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坐着一个演员，服装十分特别——左脚穿着红军的淡绿色军裤，扎在厚军靴里，右脚上则是美军军靴和高尔夫球裤。一边的胸襟、肩章和袖臂是英国式的，另外一半则是法国式的。一个戴阿尔卑斯帽的奥地利人跑进舞台，喊了声什么，演员的一部分身子，譬如说苏联的脚，有所反应，而整个人则身子坐在椅子上，保持不动。然后又跟美国脚、英国胳膊和法国胳膊重复了同样的事情。部分身体各自活动，但身穿四种军服的士兵却原地未动。最后，又一次跑进来的奥地利人绝望地大声

喊道：“中国人来了！”这时，坐在椅子上的士兵跳了起来，在笑声和掌声中跑到幕后去了。当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奥地利人急于摆脱四国占领的愿望。

有一次，苏军政委邀请驻会记者到自己的官邸观看攻克柏林的纪录片。在休息期间，安排了有冷冻伏特加和各种冷菜的招待。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侍者送来各种饮料。我仔细看了一眼，竟意外地呆住了。他原来是拉克莫夫——战前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的厨师。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能够相遇，相互拥抱互吻，因为我们已经十三年未见了！我们一起回想起，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6月底，曾经一起被扣押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内，我跟拉克莫夫一起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安排早餐，后者曾经帮助我跟萨沙·克罗特科夫离开使馆与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会面。

约瑟夫·维特立即回应了我为《新时代》杂志作采访的要求。我们在他下榻的“大使”饭店见了面。这里跟“帝国”饭店完全不同，到处是奥地利员工保持的标准环境，到处闪闪发亮，前厅有地毯和植物装饰，电梯旁则是身穿制服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侍应生。他用无声的快速电梯将我送到需要的层次。总体而言，奥地利人在战后几年里已经安排好了生活。在装潢十分漂亮的商店里，商品和食品的丰富使顾客高兴。咖啡屋和街上的人们穿着考究得体，甚至可以说很新潮。到处都是鲜花。汽车当时还很少，但城里到处都是相对便宜、非常时髦的摩托车。年轻小伙子和头发搭在背后随风飘扬的姑娘们成为维也纳一景。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透过维特房间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圣斯捷潘大教堂色彩斑斓的高顶。客气的主人要了咖啡，我们在矮圆桌旁的藤椅上坐定。谈话首先涉及的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维也纳会议。维特就保卫和平和参加这一运动的著名人士的意义谈了很多。与此同时，他对于运动未能取得群众性而表示了遗憾。这也是为何各国领导人能够忽视裁军的呼吁，并继续军备竞赛的原因。新闻界本来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眼下新闻报道更多地歪曲，而不是阐明争取和平运动的目标。维特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复杂的，“冷战”束缚了欧洲，她目前依然未能从第二次大战中恢复元气。这里，我得以十分恰当地提出最主要的问题。

“我想，”维特说，“欧洲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德国问题。现在，有两个德国。而我认为，华盛顿不会接受你们的任何有关邦联或者其他另外的两个德国的联合形式。美国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西部，并不会放弃它。你们现在与波恩的关系非常糟糕。你们的宣传把阿登纳描绘成为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新法西斯分子。这在实质上是错误的，并使事情复杂化。事实上，阿登纳本人在过去曾经是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他远非如此单纯的人物。当然，他是反共的，但同时也是德国独特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友谊成了他的包袱，他想与莫斯科展开对话。但是，贵方也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那么，总理阁下，按照您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联手里有几张重要的牌。首先，这是数十万战俘，这些人的

命运令德国人担忧。战死在苏联领土上德军士兵的墓地问题也同样重要。当然，它更多地带有象征性的意义。许多的墓葬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种姿态，在道义上，这对阿登纳十分重要。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第二个德国，在波恩它依然被看作苏联的占领区。这里有家庭团圆，财产争执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想，你们应该试探与西德建立关系的可能。可以先从战俘归国的问题开始。平行地可以探讨在莫斯科与波恩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一旦在首期接触期间有了进展，阿登纳便会准备访问莫斯科，这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都将是一件大事。”

这些看法我以为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譬如，解决战俘问题的时机早已成熟。从被俘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最近一段时期，我见过其中的许多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巴甫什诺村，建有各种作坊，掌握各种民用专业的德国战俘，裁缝、木匠、钳工等，在那里干活。各个机关，其中也包括我们编辑部里，发放票证，凭票可以在这些作坊定做许多东西。有的人甚至购买了整套的厨房或者餐厅家具、卫生洁具、木雕等。我定做了两套西装，并且质量非常好。在试衣的过程中，我们跟裁缝用德语聊了一会，后来跟他交上了朋友。

-----

维也纳之行(3)

-----

总体上，这些俘虏的生活不错。他们按照各自的专业工作，精神饱满。由单独的房屋组成的小村里，环境良好，有俱乐部，运动场，花坛，细黄沙铺设的道路两边种着小树。与战时在德国苏联战俘的非人条件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但是，在经过如此长期的俘虏生活之后，他们渴望回到家乡，而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维特先生，您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有何看法？”

“首先，你们应该打破孤立和敌意的包围圈。在战后年代，敌人的形象在西方人深入人心。应该努力用相应的行动来展示并证实，苏联对西欧不构成威胁。首先应该解决所有占领军撤出奥地利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恢复战胜国外长磋商机制。印度支那虽然遥远，但那个地区冲突的解决将促进欧洲局势的正常化。法国人在那里陷进去了，他们想尽可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你们的中国朋友可以有所帮助。最好当然是组织一个有关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借助这样的会谈，各大国主要政治人物之间可以建立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目前许多问题有待于苏联采取主动。”

我得到了一整套的建议。我有东西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但还想跟作为过去重大事件见证人的维特谈一谈。在我面前的正是活的历史！拉巴罗……1922 年春，契切林带着列宁签署的授权前往直意大利与协约国领导人谈判。盟国要求他们尚未正式承认的苏俄政府支付

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只有这样才会谈到承认。契切林坚决反对满足这些要求。在谈判者身后隐约可见战败国德国的影子。重要的政治家之间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英国首相洛德 乔治，法国外长巴图，德国总理维特，德国外长拉特瑙。操熟练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契切林也在进行非正式会谈。西方列强企图将苏俄孤立起来。但契切林有所突破。他向被英法虐待的德国提出诱人条件。德国外交部负责东部事务的马里察说服拉特瑙接受苏俄的条件。维特也表示同意。1922 年4 月16 日，签署了拉巴罗条约。德国与苏俄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迅速得到恢复。

我问维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的局势的确非常紧张。全部的问题在一夜之间谈妥，黎明之前签署了条约。它具有爆炸性。英国和法国人非常愤怒，要求撤销协议。我们的情况也不轻松。埃伯特总统倾向于跟西方盟国达成协议，因此我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他。但整体而言，这是个好的、正确的条约，它使德国松了一口气。”

“总理阁下，您在我国受到尊重，正是与您本人在签署拉巴罗条约中的作用有关。”

“那么，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们告了别，然后我前往“帝国”饭店，以便将这次谈话详细记录下来。

回到莫斯科的次日，我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与约瑟夫·维特的见面，并将谈话的记录交给了他。

莫洛托夫快速看了一遍之后说：

“我以为，您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有什么打算？是不是想回到部里来？”

我没有信心是否会得到类似的建议。但以防万一还是仔细考虑过一遍。现在，记者的工作完全能够使我满意。这里也比外交部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性和表现主动性的机会。无论给我什么样的职位，在经济意义上编辑部要好得多。更何况在经过多年的被贬之后重拾旧事似乎不太愉快。我谢过他的建议，并说愿意继续作记者。“您自己定吧。”莫洛托夫没有坚持。

我需要在杂志上发表有关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报道和对维特的采访。但迄今为止，我一直用的是笔名，而去维也纳以及向维特自我介绍则用了真名。所以我不得不请示莫洛托夫怎么办。

“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他果断地说，“再没有必要用笔名了。”

莫洛托夫不再为我担心了。贝利亚已经被枪毙。可是，莫洛托夫熟知我们官僚的习性，认为有必要再保护我一段时间：他将我列入了1954年印度支那问题维也纳会议和1955年夏维也纳高峰会议记者组的名单，以及1955年“冷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七人记者组。

接下来一切便自然而然了。

至于维特的建议，他所谈到的许多东西得到了实施。1954年在柏林举行了两个大国的外长会晤，当年夏天举行了印度支那会议。接着，1955年与奥地利签署条约，占领军撤出其领土。此后，阿登

纳访问了莫斯科，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战俘回国.....

-----  
在北京(1)  
-----

蒋介石政府的顾问鲍罗廷亲口向我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秘闻，以及有关周恩来的个人情况。

由于我采访的名单将周恩来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剧院里会见我。

我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出版。

回到莫斯科，一位惊人美丽的姑娘打破了我对女人的特殊原则。

筹办《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外文版，是从寻找高水平翻译开始的。莫斯科有两个机构里的翻译人才较多：后来改名为《进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部。这家报纸的俄文版仅出几份，为的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监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MoscowNews》——以为它只有英文版。该报的主编是鲍罗廷——

——我正是找他咨询。

我刚开始对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无所知。鲍罗廷和他的员工们态度友善，随时准备帮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奥妙之处，结果我实际上在《MoscowNews》实习了几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报纸的编辑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维街的同一栋楼里。

我跟鲍罗廷成了好朋友。对我而言，与他交往特别有教益，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得知他就是那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鲍罗廷。当时，他是我们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顾问，在调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他们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政府搬到重庆之后，鲍罗廷也到了那里。他的官邸紧挨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处。

鲍罗廷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儒雅的领导者，理性、平和，同时又坚定，顽强。从鲍罗廷那里，我得知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那时中国的两位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蒋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谈判，逮捕了他并打算枪毙他。中共领导明白，国民党的内讧将会弱化抗日斗争，所以，虽然共产党人受国民党之害不少，但认为不能除掉公认的国家领导人。这件微妙的事情交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这边，周恩来与二位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实施自己的意图，为了中国的前途释放这个囚徒。最终，将军们同意了释放蒋介石。

鲍罗廷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事情，培养了我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后，才知道鲍罗廷被捕了。他被宣布为日本特务，后来就失踪了。

多年之后，我因为记者的事务到了中国。除了其他城市，我还去了重庆。那里就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周恩来和鲍罗廷的总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日用物品。这里还有鲍罗廷身穿制服、镶在铁框里的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勇毅，眯缝着眼睛，面带微笑。我记住的他就是这个形象——一个忠诚的战士，遭到斯大林刽子手毒害的许多人中的一个。

我还去过西安。蒋介石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城里，而是在离城四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华清池、有温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骊山脚下，有一个异国情调的花园，而在池边耸立着明皇的宫殿，住着他的妃子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贵妃亭旁边有一排房子，蒋介石就住在那儿。夜里，将军们决定逮捕他。蒋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开始了对射。听到枪响之后，蒋介石跳出窗户。他企图爬上山崖，却卡在了石缝当中，就在那儿被抓住了。

1957年初，作为《新时代》的记者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之后，我立即请外交部帮我安排采访某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我没有指望会见到毛泽东，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元

帅。信发出去之后，我便出发去旅行。参观完重庆之后，突然想起了与鲍罗廷的谈话，非常想见周恩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答复。在出发去满洲里之前，我决定在首都再呆几天，并且在饭店订了两张（我自己和翻译）看京剧的戏票。

剧场与平常一样是爆满的。开演之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检票员从一个巨大的茶壶里给观众沏茶。我们的座位是右边起第五排。但是，我发现自己右手边一个座位空着。灯熄了，剧场里只有舞台脚灯微弱的灯光。这时，一个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我只能看清，这人跟剧场里的观众一样，身穿类似军服一样的中山装，同样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观众的脸。我斜眼看见，旁边这个人非常像周恩来。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剧场里会惊动起来的。人们会开始鼓掌、呼喊。何况他如何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到剧院来——没有警卫，没有特设的包厢，坐在普通观众之间？但我还是弯腰问身旁的翻译，坐在旁边的是何许人也。他立即答道：“这是周恩来。”

我感到震惊。观众们紧张地关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们一点也没有因年轻的共和国著名而且受人欢迎的领袖、国务院总理的在场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被猴王与怪兽的搏斗，一个名叫杏花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被强盗劫持等情节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演员的噱头，一边想着，中国领导人坐在我身旁该如何解释？我能够与他谈话？幕间休

息时他会呆在这里，或者像来时一样消失在暗色中？

大幕放下，灯光亮起了。中国的剧院里一般没有前厅。幕间休息时，观众直接走出剧院。剧场里很快就空了。甚至没有人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我马上想到：没人认出他来！周恩来继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紧张。怎样跟他开口？从何开始？

没等我下定决心，他转过来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说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他当然知道我的一切。因为我事先在饭店订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边，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须有个话题来开始。当时，我已经做了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了已经半年。我这样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

“你们的总编是谁？”

我回答说，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为总编，而在此之前，从杂志创办之时起，他一直是副总编。

“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经济学家。我很熟悉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东方干部学院听过他的课。请转达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一定。谢谢您。”

“您知不知道，鲍罗廷还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提出来时，仍然浑身一震。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悲惨遭际？我讲述了我们在《MoscowNews》编辑部的多次相见，讲他对重庆工作的回忆，以及他给我谈及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

“是的，当时很困难。如果他们杀了蒋介石，中国又会重新开始内讧。而日本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并且对我们共产党会造成不利的局面……鲍罗廷到底出了什么事？”

“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许多人一样消失了。”

“可惜，鲍罗廷真的太可惜了。他是个好人，诚实的朋友，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跟他多次遇险。他无畏，性格坚强……”

斯大林的绞肉机消灭了多少性格坚强的好人啊！我们谈到幕间休息结束为止。但第二幕之后，周恩来还没有走。开始讲述在中国建设新生活如何困难。

“我们这里，”他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过匈牙利事件……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都有过严重的骚乱，参加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当然，我们自行处理了这些事。但是，仅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既在匈牙利，也在波兰，东德和我们中国。在领导与被领导者间的关系中发生了问题，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矛盾——在党与人民之间，在党内……”

-----  
在北京(2)  
-----

周恩来说，他跟前不久由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周恩来继续说道，“对此十分轻松。‘你们的紫禁城，和我们的克里姆林宫外面都是高墙，’伏罗希洛夫说。可我回答说，这些墙并没有能够保护中国的皇帝。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没有不满意。”

总理问我到过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我说，在东北我想参观大连和旅顺，此后想去南方看一看，云南省，海南岛。另外还想到中国原子能基地的兰州去看一看。但我发现，这些地方不大愿意放外国人进去。

“我会过问您的行程。我认为，您的要求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

的确，他信守了诺言。在此后的行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后，灯亮了，但观众无人动身。

周恩来站起来，握着我的手，祝愿在中国旅途愉快，此后便走出了剧场。只是现在，观众似乎明白过来了，开始离开剧场。他们都知道，并且看见了，我们在两个幕间休息时在谈话，但是没有人作任何表示，没有任何动作，任何声音妨碍我们的谈话。

后来有人对我解释说，周恩来经常去看戏，坐在池座的观众中间，所以北京人都习惯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规矩，所以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打算到剧院去，那么票子

事前会发给可靠的人。他们乘车到专门的入口，乘专用电梯上去。而他们所在的包厢装饰得严严实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剧场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包厢旁边的小厅里，预备有各种吃食、甜点和饮料等。与哪怕是经过挑选的观众，从未有过任何交流。穿制服和便服的安全官员到处走来走去。周恩来身旁没有看见警卫，这使我感到不安。安全机构的人肯定在附近。但他们的举止使人绝对看不出来。

次日，外交部新闻司通知我，朱德元帅将接受采访。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必须保密的。

好奇心始终困扰着我，为何他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当地的几个中国通的解释是，由于我的单子里总理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因此他要用独特的中国礼节来弥补自己不能接受采访。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我想，是否周恩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鲍罗廷的敬意？

在中国呆了将近半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跟总编列昂捷夫讲妥，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在打字机上敲出旅行札记。

有一次，出得办公室，给热水瓶灌开水时，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

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

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

-----  
“百花齐放”  
-----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

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

“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 1956 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

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

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

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

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共

产党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

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

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麼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

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害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共产主义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

-----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

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内森·洛克菲勒当着我的面按了一个按钮，世界上最早的电视雏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为了跟英美军事代表团的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将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义请我转告莫斯科美国将从越南撤军的步骤与要求.....

1944 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便结识了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顿—伊科斯庄园里，苏联、美国、英国三大国举行了反法西斯联盟会议。会议上，

研究了国际安全组织，也就是未来的联合国的宪章。

我当时担任由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我们与英美代表团的秘书——安吉尔·希斯和格莱德文·杰布密切合作。由于在会议上，大量的问题中间涉及到拉美国家，其中包括阿根廷参加未来组织的问题，担任罗斯福总统中南美问题助理的内森·洛克菲勒出席了数次会议。

会议的日程十分紧张。但是，每逢星期天，主人总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游览和娱乐节目。有一次，在会议闭幕前夕的一个星期六，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梯纽斯宣布，这个周末洛克菲勒家族邀请与会者参观纽约。

“晚上六点，”斯特梯纽斯说，“我在机场等你们.....”

我们升空时，太阳还没有落山。飞行高度很低，所以下面可以看清楚从巴尔的摩绵延到纽约的庞大工业区：这里曾经铸造了战胜共同敌人的武器。一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拉加地亚机场。我们被安排入住“沃尔道夫·阿斯托丽亚”，这是当时纽约最豪华的饭店。

刚刚在客房安顿好，斯特梯纽斯邀请我们到这家一个名为“星际之巅”的大餐厅吃晚饭。大厅的里面乐队在演奏，女歌手热烈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

晚宴非常考究，但夜间的节目并未结束。

夜里11点，斯特梯纽斯又出现在饭店，邀请我们到一家名为“钻石马掌”的俱乐部去。厅堂面积不大，用金色红金丝绒装饰，宽阔的舞台上五光十色，穿插着十分轻佻的表演。显然，我们的主人是

这里的常客。起码，门僮，领班，侍者等人都非常熟悉他。我们在俱乐部坐到了深夜。

第二天是游览市容：帝国大厦，华尔街，纽约交易所，博物馆等等。晚上，我们出发到第五大道，参观庞大的摩天大楼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成了已经十分熟悉的内森的客人。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除了我们几个代表团之外，还有一批美国的贵宾。

主人迟到了。这时，经理请我们到各色饮料齐全的酒吧。气氛无拘无束，只有身穿带金银边饰的侍者保持着正式气氛。突然，经理拍了几下手掌，高声唱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内森·洛克菲勒……”

内森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大厅，看起来与众不同：淡棕黄色头发，晒黑的脸上线条分明，有点像北美印地安人的长相。他向众人鞠躬，与各个代表团团长握手，并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而后走到斯特梯纽斯旁，开始跟他说话。

内森·洛克菲勒的穿着非常随便：上身的深棕色西装穿在他身上大得像口袋，西裤的膝盖处皱巴巴，大概好久没有用过熨斗了。可是他本人一点儿也没有不好意思。他无拘无束，然而在场的许多美国人对他表示了关注。

我走近内森，感谢他邀请我们参观纽约，并请他讲一讲洛克菲勒中心。他建议我们登上摩天大楼的顶部，以便得到这个独特建筑物规模的有关概念。原来，内森本人直接参与了他的建设。

“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当我们走向电梯时，内森说，“三十年代初开始建造 70 层的摩天大楼，当时我刚满 24 岁。不过，我已经有一些大型建筑的经验，但这里有自己的复杂性：大楼在交通繁忙的市中心建造。我们家族买到了曼哈顿的这片土地，但不能越出它的范围。建筑工地周围街道通行车辆的部分，包括人行道，必须由行人和车辆自由通行。必需的材料和金属件夜间运进去。最终，建设按期完成，并且在第一个演季无线电城音乐厅接待了观众。”

走出电梯，我们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内森打开了一扇金属门，在我前面沿着陡峭的金属楼梯走上了摩天大楼的顶部。我走到边上，停在栏杆旁。从这里展开了一幅梦幻般的景观。底下是巨大的、闪烁着七色彩虹的灯火。空气是透明的，因此可以看见在街道狭窄的缝隙间汽车的红黄色灯光在运动。左边，在透明的月光下，是像针一样尖尖的“克莱斯勒”大厦，前方在深蓝色的天空下升起的是庞然大物帝国大厦。在往前，在哈德逊和伊斯特河两条银带之间，是弯弯曲曲灯火辉煌的百老汇，在它的尽头可以看见华尔街上老摩天大楼的侧影，在大西洋上闪闪发光的月色道路的背景下，层层错错地竖着。

在顶层散了一会步之后，走了下来。在电梯里，我终于向内森问了那个使我十分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向他这样富有的人，穿着如此随便？

“是这样的，”洛克菲勒回答说，“没有一百万的人，当然必须认

真注意自己的外表，而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则可以允许自己有某些怪异……”

当我们回到大厅时，经理立即走到洛克菲勒跟前并问道，是否可以开始参观中心。他点头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无线电城”。首先给我们看了录音师、灯光师和电影放映机的场地，然后带我们到了后台，这里，美女“罗赛特”演唱组正在进行下一场演出的排练，她们一个个浓妆艳抹，但在近处看起来远不像从观众席上那样好看。斯特梯纽斯与洛克菲勒一起尽地主之谊，向我们介绍了芭蕾舞群舞的负责人，原来他来自敖德萨，俄语流利。

看过舞台设备之后，我们又去看了无线电台，这里没有任何特色。然而，旁边的房间却使我发生了兴趣。内森解释说，这是试验电视台。我们跟着他走过隔墙。那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带暗淡玻璃屏幕的方盒子。内森按了一个按钮，这个窗户开始发出淡蓝色的光亮。过了几秒钟，在这个神秘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人影，轮廓迅速清晰起来。这原来是斯特梯纽斯，以及与他谈话的英国代表团团长亚历山大·卡道冈。往隔墙上面一看，我在相连的房间看见了他们，并且他们所有的动作都重现在屏幕上。此前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电视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它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的普通用品了。

从此往后，每次我来到美国时，经常与内森·洛克菲勒见面。

在纽约州州长任上时，内森常常请我到他的官邸。战后过了许多年，有一次，在一个明媚的夏日，饭后我跟他坐在他位于奥巴尼

家中的阳台上，一起喝着卡布其诺酒，回忆过去的事情。我给他讲述了与我们在杜巴顿—伊科斯代表团有关的趣闻。当时，为了跟美国代表团的高级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将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罗基奥诺夫从“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这个故事，作为“各族人民领袖”古怪行为之一的见证逗乐了内森。

时间飞逝而去。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坏时好，但是我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会面，有时可以相隔几年，一直是稳定和得体的。

水门丑闻的结果，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下台。福特入主白宫，而内森·洛克菲勒则成了美国副总统。其时，我已经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主办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当了五年的主编。1974 年秋到达华盛顿之后，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是否跟从前一样给内森打电话，或者不必惊动美国副总统。我征求了多布雷宁大使的意见。他说我应该自行决定该怎么办，但表示相信，副总统找不出时间来见我。

最后我还是打了电话，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得知，内森·洛克菲勒当天下午三点在白宫旁边的独立宫见了面。

-----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2)

-----

就像以前多次一样，见面是无拘无束的。只是在一开始，有了一个正式的“照相程序”（这张跟美国副总统的照片稍后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给我）。此后，身穿海军陆战队礼服的侍者送上了茶点和一小杯烈性甜酒。

谈话像往常一样，从各自的身体状况开始，然后交换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新闻。难以避免地谈到了越战，那里美国人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失败。

“我应该告诉您的，”内森强调指出，“我们坚决打算撤出越南。但北越军队向西贡施加的压力，造成了我们撤退的困难。我们不打算就此事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我们也在极力争取避免采取强大回击的必要性，这样只会拖延战事。但是，由于早就认识您，”洛克菲勒强调说，“我想以私人的方式向莫斯科转告一个意愿，请转告你们河内的朋友们，让我们安排有秩序地撤出大使馆，以及我们的越南朋友，这样使我们能够适当地结束越南这段历史。”

我拿出“外交官”的分寸，对内森说，非常理解他的意思，但是，由于跟政府没有直接的联系，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们接着聊了一会，然后便告辞了……

当然，就在当天，我的备忘录被用密电发往莫斯科。只是到现在仍不知道，洛克菲勒的呼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我们的越南朋友是否考虑了他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美国人最终离开了西

贡，越战结束了。

一段时间之后，我接到了老朋友内森·洛克菲勒不幸早逝这个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

-----  
明尼阿波里斯的预言  
-----

“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用放大镜在地图上，找出了我可以去一所大学讲学的路径。

回绝了阿富汗司法部长的任命，熟悉阿明的阿裔美国法学教授告诉我，阿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背景，他在阿推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苏联像美国当年陷入“越战泥潭”一样陷入阿战。

对驻美的苏联外交官而言，“冷战”期间在美国的旅行并非小事一桩，当然，对驻苏的美国外交官也一样。许多城市 and 地区是“不开放的”，甚至到“开放”城市的旅行也需要国务院的特许。有时，城市也许是“开放的”，但附近的机场和公路却是“不开放的”。

我就曾经遇到这一次这种情况，当时我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一秘，1979 年夏天应邀到明尼阿波里斯大学讲学。在收到我的申请之后，国务院认为，虽然明尼阿波里斯对苏联外交官开放，但

周围的道路和机场却是不开放的。但是，邀请单位并不打算取消我的这次讲学，自行坚持要求国务院找出可以使我成行的办法。此后，专程到华盛顿处理此事的大学代表告诉我，他们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将地图摊开在桌上，借助放大镜，终于发现明尼阿波里斯市周围的红线并未合拢，而在缺口处正好有一条铁路线穿过。这也许是监督人员的疏忽，没能将红圈画圆，但这却使我有可能乘火车抵达明尼阿波里斯。实际上，在这条荒废的支线上旅客列车在离城最近的车站每天仅通过一次，并且在凌晨四点。

我不得不先飞到开放的罗彻斯特市机场，然后乘汽车到荒无人烟的小站“红翼”，等待这趟火车。

我的讲课很成功，课后，我应邀与该校教授们一起共进晚餐。席间我的邻座是一位中年东方人。我们攀谈了起来。我的邻座告诉我，他是阿富汗人，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该校教授法学。当天早晨已经知道，塔拉基在喀布尔被杀，阿明成为阿富汗新总统。自然地，我与邻座的话题——他名叫阿赫麦德——转到了这些事件。

“我很熟悉阿明，”我的邻座说，“他也在美国上过学，曾是阿富汗留美学生组织的主席。我们大家都清楚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新交在革命和塔拉基掌权之后没有回到阿富汗。

“曾经给过我司法部长的职位。但是，在了解到新政权上层的争

斗之后，我回绝了，并决定暂时留在美国。”

“我喜欢塔拉基。他似乎是个著名学者，可惜他死了。现在会怎样呢？”

“我毫不怀疑是阿明组织了这起谋杀。”阿赫麦德说，“我还可以预测，现在会发生什么。他会将你们拖入阿富汗的战争。”

“我们如何以及为何要这样作呢？”

“您有没有想过，阿明从中央情报局领受了这样的任务？接下来，阿明马上会将自己打扮成莫斯科的忠诚朋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他会在国内开始加速社会改造，而这个国家依然生活在古老的教规和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之下。建立“集体农庄”，没收大多数阿富汗人看作自己善主的地主领地，限制宗教自由，甚至试图过早地改变阿富汗妇女的地位——这一切就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也许，阿明的“改革”将会引起这个国家非常脆弱的行政机构内部分裂。将会开始逮捕那些阿明认为在“消极怠工”的人。同时，阿明会请求莫斯科派遣顾问进行援助。来自“不信神国家”的人将会进一步增强反对阿明制度的力量。届时喀布尔会向你们发出新的呼吁：派遣军事专家，此后是派军队。而克里姆林宫内部则未必会想起英国人“征服”阿富汗的厄运，和阿富汗人民抵抗域外奴役者的力度。你们的军队会很快进入，而你们也会在阿富汗得到自己长期和血腥的越南。可以设想，白宫内部将会如何高兴？对付“罪恶帝国”的说辞将会获得无限可能……”

对这个趣味盎然的阿富汗分析我以外交官的沉着回答说，虽然

阿赫麦德的分析听上去有先见之明，但这些未必会兑现。

但是，回到华盛顿之后，我把此次与阿赫麦德的谈话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多布雷宁大使。他的反应相当特别：

“你怎么能够让我把这种东西传到莫斯科去？昨天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阿明，拥抱了他并且许诺在阿富汗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会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这样，我拟好的密电始终没有发出。可是即便克里姆林宫收到了，事情的进程会改变吗？就凭我国当时老朽昏庸的领导，1979年12月开始在阿富汗血腥的冒险未必会被制止……

1983年，当我结束自己的外任回到莫斯科时，向当时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负责人阿尔巴托夫也讲述了此事，他嘱我就此为安德罗波夫写一份详细报告，其时后者在勃列日涅夫死后已经成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不久，阿尔巴托夫告诉我，安德罗波夫认为这个信息有意义，并对它未能及时上报表示了遗憾。

然而，我再次自问，它会改变什么吗？毕竟安德罗波夫当时说话算不了数。

-----

永不愈合的伤口(1)

-----

作为苏联驻美国的外交官，我刚上中学的儿子却给里根总统写信，要求政治避难！

时值“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各大小媒体的歇斯底里毫无限度.....

为了我的儿子不被秘密送回苏联，里根总统亲自下令关闭美国的出境通道！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我的家庭跌入了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的漩涡。

狂徒的子弹撕裂了我儿子的生命，仅留下了一岁半的孙子，这是苏联解体之后。

此外，我还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是叶利钦总统的翻译。

“人的一生，绝不是坦途”，这是俄国民间智慧。每个人都会有沉浮苦乐。一个人的生活之路越长，便会愈加相信，每个顺利的时期之后命运一定会带来新的考验。

我差不多活过了这多事和血腥的世纪。在这期间经过多少事件！但人的天性，却在回顾往事时，首先想起来的，是风和日丽，虽然有不少的风暴急雨，乌云密布。正如许多国人一样，我本人曾经不只一次坠入深谷，而后似乎又一次开始新生活。所以，似乎可以原谅和忘却许多事，拿出勇气获得平衡。但是，有些伤口却在不断滴血，因为我们终究无法复活死者。

当我在华盛顿的“亚当姆斯”饭店奇迹般躲过了打劫者的子弹之后，似乎这是幸运再次垂青我的家庭。我继续自己苏联驻美国大使

馆一等秘书的工作，代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这使我有许多机会与美国学术界建立广泛联系。美国各地的同行经常邀请我讲座或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与妻子瓦列莉娅，或者她自己喜欢自称列拉，我们到过许多州，建立了友谊，并且尽管有各种过度渲染的“冷战”因素，到处遇到了好感和热情款待。我们争取不漏过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和纽约林肯中心的每一个新剧目的演出，看了许多的新电影——当时有过不少的好影片。

我与列拉唯一的儿子，出生于 1967 年的安德列，在使馆的中学上学，课余时间与美国伙伴呆在一起。我们的房子不在用高墙与外界隔绝的使馆内，而是在首都绿茵茵的郊外切维切斯，在一幢美国人的大楼里。与当地伙伴的交往帮助安德列很快掌握了语言。但这种交往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其中，我们对他热衷摇滚乐表示担忧，虽然他与同龄的孩子没有两样。在新年之前我们送给了他一把吉他，不久他已经弹得有模有样了。

在我们家住的楼旁边有一个公园，每逢星期天那里会爱好者举办的音乐会。安德烈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苏汉，黑发，25 岁左右的东方年轻人。安德列其时已经满 16 岁，因此列拉非常惊讶，这二人之间何以有共同之处。安德列解释自己与苏汉的交往说，他们都喜欢摇滚乐，并都喜欢当时青年人的偶像麦克贾柯尔。

记得，有一次，这是在 1983 年的 8 月初。我像往常一样 12 点左右开车回家吃午饭。将汽车泊在地下的停车场，乘着列拉准备午饭的时候，我打算上到楼顶游泳池。穿浴袍时，听见隔壁房间里安德

列的声音：

“爸爸，给我车钥匙，我想去拿放在车厢里的磁带……”

“钥匙在门厅的小桌上，赶快上来，一起游游泳……”

从这幢 20 层高的大楼上，可以看到城里的美妙风景，以及地平线那边的绿色山丘。游泳池边放着藤椅和躺椅，地面铺着花花绿绿的橡胶毯。在阳光下呆了一会，然后游了一会，没有等到安德列便下楼回房了。

“为什么安德列没有来呢？”我问列拉。

“难道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吗？他没有上这儿来。去车库看看，他可能在听那个麦克·贾柯尔。” 在车库里，我在泊车位置没有看到汽车。也许，安德列刚刚学会开车，他想玩会车，然后停在另一层？走遍了四层的车库之后，还是没有找到他。

安德列在哪儿？他会不会出事？车库的大门自动开关，汽车进来时的缝隙足以使坏人潜入。发现男孩之后，他可能将其捆起来，推入后货箱，然后驶出车库。这种事情曾经有过，但我不愿往坏处想。我走出门外，绕楼一周，又走了几个街区，但是安德列和汽车都无影无踪。

回到家里，我问了列拉，安德列有没有回来。她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会去哪儿，那辆庞大的“奥尔斯摩比”又会到哪儿去？它可是用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资金购买的。不过，汽车有保险，如果它被盗，钱还可以收回来。

最重要的，是安德烈怎么啦？

我们一口饭都没有动，作了各种猜测。我们翻看了安德烈的记事本，偶尔找到了苏汉的电话号码。也许，他知道些什么？我拨通电话之后，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我是苏汉。”

“非常抱歉打扰你。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最近见过他吗？”

“是的，我见过他。”

“问题是，他现在不知去哪儿了。我的车也不见了。他会出什么事吗？”

“我今天见过他。他好像打算去纽约……”

这真是胡说八道！我们一家三口前不久去过纽约，所以我没有计划再次去那。把这个情况讲给了苏汉。

“这可能是安德烈的幻想。非常遗憾，我帮不了你们。”

如果安德烈坚持自己可以开车到纽约，又该怎么办？我听说，麦克·贾柯尔将在那里举办音乐会。可是，安德烈没有驾照，他勉强能够开动汽车，根本弄不清楚复杂的路线。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的道路大多是收费的，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在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先不打电话到使馆引起恐慌，而是先找当地警局。十多分钟之后，来了一位交通警。我解释了情况，并告诉他，尽管这不大可能，但安德烈现在可能正在通往纽约的某条路上。

“他多大了？”警察问道。

“十六岁……”

“噢，这个年纪的人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他们脑子里有时会有些怪念头。不要担心，我们会很快找到他的。您的车很容易发现，您是外交牌照。有特别巡逻队观察这类车子。您还来不及回头，我就会把您的小逃兵送回来……”

他满有把握，这使我们打起了精神。真的，像我那样的车子不难找到，何况驾车的是个男孩子。但是，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而交警并没有打电话来。又等了一个小时，我又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我们正在办理您的事情，”他回答说，“不要着急，会通知您的……”

列拉已经彻底失神了。不得不通知我们的领事。那边当然会惊慌：苏联孩子失踪了！领事说，马上到我们这儿来。要我们不出家门。又过了一个小时。显然，大使馆的领导们讨论了别列什科夫家里的“意外事件”。

领事最终还是来了。

“安德列回来了吗？”他在门口精神抖擞地问道。

知道了安德列还没有回家后，他开始安慰我们，列举了各种类似的、顺利解决的事例。列拉讲述了安德列与苏汉有些怪异的交往，以及后者推断，安德列可能驾车去纽约。

“让我跟这个苏汉谈一谈。”领事说。

我拨通了熟悉的号码。一个女人声音答了话。“我能否跟苏汉说几句话？”

“苏汉已经也不在这儿住了，他出国了。”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这很奇怪。”领事说，“如果苏汉真的跟安德列的失踪有关，那么就大事不妙了……”

这一点不用他说我们也明白。为什么警察到现在不能查清楚安德列的所在？为什么外交牌照的汽车没有被发现？要不这苏汉是个强盗，劫持了安德列做人质，将他连人带车藏在了什么地方？或者，是些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大使馆的工作日结束了。领事跟我们一起又呆了一会，告别时，要我们如果得到什么消息，立即给他打电话。

剩下我们两人，完全不知究竟如何是好。我尽量安抚列拉，虽然我也明白，我们倒霉了。我们的打算全都被打乱了。

-----

永不愈合的伤口(2)

-----

我在美工作的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安德列也将从使馆的八年制中学毕业，应该在莫斯科升入九年级。由于美加研究所还没有物色到接替我的人，我们已经定下来，八月底列拉和安德列回莫斯科，我留下来在华盛顿等待接任者。我已经替他们订了机票。可现在这

一切都悬在了空中。我们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大约夜里两点，电话铃响了。

“我在这儿，在大堂里。你们下来吧，”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是安德列，”我急忙告诉列拉。“教训他一顿.....”

安德列站在大堂里，有些失神，并且我觉得眼睛有些浮肿。

“汽车在门口.....我开不进车库来。”

我们出来走到“奥尔斯摩比”跟前。似乎一切正常，只是速度表上显示，在最近12个小时里，汽车跑了几百英里。看见他可怜的样子，我什么也没有问安德列，泊好汽车，上楼回到家里。列拉，她忘记了要“教训”，扑上去亲吻拥抱儿子。可他站着，不做声，无动于衷。我最后问他：

“是不是说说，你到底怎么啦？”

“最好明天再说。给我水。”

他一口气喝了两大杯水，用手背擦干了嘴唇，很勉强地说出来一句话：

“我困死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衣服都没有脱，一下子就睡着了。

那一夜，我们当然是一眼未合。我给领事打了电话。他也没有睡。他的一句话使我感到刺痛：“我们希望，这事就这样结束.....”

早晨，无论我如何查问，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要么故意不回

答，要么坚持说，什么也不记得了。列拉和我本来应该去上班了，可是能不能把安德列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得不带上他。将儿子送到使馆的小餐厅后，我上到二楼，向奥列格·索科洛夫通报情况，大使多布雷宁在莫斯科期间，他是临时代办。

奥列格也对于此事是否会这样过去，表示了疑虑。实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个失踪的苏汉的结识，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车，还有安德列怪异的举止……

我们决定，为以防万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苏航有班机飞往莫斯科。我们跟奥列格关系相当好，我觉得，他在诚心诚意地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

电话响了，奥列格拿起了听筒，但是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在变。他用感叹词作答，挂上电话之后，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纽约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的莱斯里·盖博。他刚刚拿到了安德列写给里根总统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请求在美国避难。这封信将在报纸的晚间版上刊登出来……”

我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但这种打击实在是出乎预料。那时，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里根把我国斥为“罪恶帝国”。并且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即便他还是个孩子，向美国总统请求政治避难！这对于那些“冷战”斗士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安德列跟我什么都没有说？

也可能，这只不过是挑拨离间？不过，骚扰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突然之间，我的儿子成了一桩丑闻的对象，况且在这种情形之

下，美国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将是毫无限度的.....

奥列格打断了我苦痛的思绪：

“我想，最好你们全家马上搬到大使馆生活区来。记者和穿便服的家伙们很快会到你在切维切斯的家里去的.....”

我的脑子一下子还不能消化我们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后果。就向在云雾中一样，我下到小餐厅，安德列正在那里安静地喝着可口可乐。很难不跟他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必须平静，这样才能弄清所有情况。首先得去新闻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儿的《苏联生活》杂志社工作。然后赶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赶到使馆去。

我和安德列走到车旁。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你真的给里根写信啦？说实话。”

“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国。我不喜欢在莫斯科的生活。这里好玩多了。”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啦？”

“开车去纽约，想去找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拿了妈妈放在床垫底下的钱缴路桥费。实际上，全程都有巡逻车跟着我。警察冲着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没有拦我。”

“你看他们是否知道你的打算？”

“也许。但是，在纽约他们不见了，而我迷了路，吓坏了，后来决定回家。”

“你要这些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中学毕业，上大学，受教育。然后再来这里工作的。”

“可是谁会放我来这儿？这会是惟一的机会。”

“你在这儿没有专业，没有受过教育，谁会用得着你？他们自己的失业者也够多的了！”

“我想试一试。要么成功，要么死了。这比在家里混日子强多了。你运气好，你可以到这儿来。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的。”

“可是你想没有想过妈妈和我？”

“想过，所以才回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也是这个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剧，“冷战”冲突的产物。由于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进行竞争，我们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老一代的人，经受过艰难的岁月，可以继续忍受，坚持英国人的说法：“不管对与错，这是我自己的国家”。但是，甚至我们这些人，也喜欢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里，伤心于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辈。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组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公开地谈论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能容忍这些颠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处国外时。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却难得多。从学校给他们灌输的，是应该讲真话。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套。

安德列对于假话和虚伪那一套的反感特别强烈。

有一次，大使馆中学的八年级学生要画一幅画，反映苏联维护和平的斗争，安德列画了苏联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国生活的

作业，则用了这样一幅画：饭桌上是一张《真理报》，报上是一瓶伏特加。

学校的校长，此人每逢革命节日都要写诗颂扬祖国，顺便也颂扬一番多布雷宁大使，对安德列的画大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释。我试图让孩子明白事理，可劳而无功。

“爸爸，”儿子回答说，“可这是真的呀。在学校教我们要做诚实的人……”

接上列拉之后，我们迅速收拾了必须的物品便很快来到使馆区，这里临时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正如莱斯里·盖博所警示的，安德列亲笔写的信件当晚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第二条早晨则上了《华盛顿邮报》以及美国的其他报纸。不知为什么，签名不是“别列什科夫”，而是“别尔什科夫”。我拿报纸给安德列：“仔细看，这是你写的吗？”

这次他没有抵赖。

“那为什么姓氏写错了？”

“我发慌了，弄错了……”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我对他说，我明白，一旦对他动粗，他就不再会开口。

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但是，事先我必须说服安德列放弃留在美国的企图，并且要他坚决答应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这之后，我才能向使馆领导提出行动计划。我提出了各种方案，安德列不说话，只是仔细听着。

“记着，”我警告说，“我们可以体面地解决这事，只有跟你谈妥所有的细节，并且只有你信守诺言，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同意。”

“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们再谈。那现在去睡觉吧。”

我们及时离开了位于切维·切斯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新闻”社的代表告诉我，在底层的大堂里和走廊里挤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等着我们出来。如果我们在那儿的话，我不得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不知道如何从这种局面下脱身。如果美国政府拒绝安德列出境，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清楚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什么？我们自己走，留下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或者跟他一起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出国不归者”？这可是1983年，早在“改革”开始之前。的确，勃烈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国内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旧的教条基本上仍然有效。何况在当时，无论我，还是列拉从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走这一步。此外，我与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还在莫斯科。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在外交部工作。他会出什么事？我们在莫斯科有许多朋友。我的书用苏联各族的语言，并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版，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读者。不，我们当时不能留在美国。如果安德列在美国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会两个人回到莫斯科。现在，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可当时，向许多苏联人一样，我们曾是理论的囚徒。

-----  
永不愈合的伤口(3)  
-----

整个晚上，电视新闻节目里，有关“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写信给里根总统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以及政府打算满足申请的新闻作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时，加上一段背景画，上面是镰刀和锤子在追逐一个跑着的男孩。

这起事件中的许多环节显然十分古怪。信是在他失踪前一天发出的。白宫和《纽约时报》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邮件。安德列的两封信如何能够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里分别到达收信人，被人拆阅，报告给里根总统，并准备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是什么人专门将这两封信送给收信人的？什么人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丑化安德列的父亲？可是，我在苏联大使馆里的位置并不高。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我曾经在美国走过许多地方，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讲课，阐述苏联就这些或者那些国际问题的立场。从我的书里许多人了解到，四十年代我曾经作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助理，斯大林的私人翻译。而这个苏联外交官的儿子爱上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愿回家。如何可以相信苏联的宣传家，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第二天早晨，我跟安德列进行认真的谈话。使馆的领导，特别是克

格勃的驻馆负责人坚持认为，安德列要否认信的真实性。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儿子，必须这样作。他同意跟我们回到莫斯科。出发到使馆之前，我问他：

“我能不能确信，你不会糊弄我？”

“是的，爸爸，我答应了，会守信的。”

这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是援引安德列八年之后写给《华盛顿邮报杂志》（1991年10月27日）的关于1983年8月时间的片断。夜里开车到达纽约之后，他迷了路，非常害怕，并决定回家。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在干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不认识一个人。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在这儿找到工作吗？我住在哪儿？我一直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自己从未一个人呆过。我的父母——我如此爱他们！我们的争吵是那么傻。在我的心里，我最爱我的父母。只是现在，当我一个人呆着时，我才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没有他们我不能生活。为什么我没有先考虑他们？他们会出什么事？他们会在蒙羞之后回到俄国？大家都会斥责他们。并且没有我他们会怎么生活？他们也爱我。我的父亲工作太多。他在努力使我的生活容易些。他在尽力帮助自己的国家。他的讲座在美国——是苏联宣传的黑暗中一束亮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会毁坏他的一切。我的妈妈——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不管她怎样骂我，不管我跟他怎样争吵——她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事先没有想到这些……我必须回去。”

这个片断我作为一项证据来列举，即在我的说服之前安德列在

内心深处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他自己已经决定了要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

在使馆高级领导会议上，我们详细地研究了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建议立即在使馆生活区举行有安德列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声明，打算跟父母一起回家。这会立即缓和气氛。此后，安德列和列拉飞往莫斯科，我留下来等待替代者。最主要的——是在媒体上的宣传活动开始之前尽快解决此事。

但我的同事没有支持我。可是如果安德列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想留在美国，那该怎么办？我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不必担心这一点。他们决定为自己留后手，向莫斯科请示。

不巧的是，多布雷宁大使刚好不在。我想，他会当场决定此事的。而向莫斯科请示，等于把我们家的问题转移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当时被吸进“冷战”漩涡的国家关系领域。

结果，安德列立即离境可以结束这起事件的时机被错过。莫斯科的答复拖延了几天，其时，针对安德烈的宣传活动却已经全面展开。

在使馆生活区上头昼夜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用探照灯将整个地方照亮。大门口挤着记者和大批的群众。正对这大门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横幅“给安德列自由”。通过扩音器喊的也是这个要求。“安德列事件”成了每日电视新闻的头条。美国总统助理埃德文·米斯宣布，根据里根总统的命令关闭美国的边境——这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措施。每天晚上，所有的电视频道播放着八面威风的律师们的辩

论——如果美国允许将安德列带回苏联，等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刚刚从莫斯科移民到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萨摩斯，手持苏联刑法典，言之凿凿地说，不光是安德列，而是别列什科夫一家都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所有这些，安德列每天都看见听见。我不得不一次有一次地问他，在回家的决定上有没有动摇。但是他表现很坚强，说：“不管怎么样，我会信守诺言。”

我安慰他，让他相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自己明白，各种麻烦没有完全排除。应该说，美国的恐吓宣传活动对使馆的一些员工见了效。有人建议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改名换姓，搬到外地的小城，尽量不要抛头露面……

过了几天，国务院“受总统委托”正式通知大使馆，称美国移民当局坚持要求将安德列移交给他们以便核实他的意愿。大使馆代表关于安德列想跟父母回家的声明，没有起作用。当局坚决要求交出他来。

最终，莫斯科同意了举行记者招待会。此后，与国务院达成协议，一旦安德列确认自己回到祖国的意愿，我们一家可以立即离开美国。

就这样，在使馆的俱乐部里挤满了记者。其中有我的朋友莱斯里·盖博。也有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使馆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主持记者招待会。安德列表现很好，回答问题十分简洁，重复了好几次要跟父母一起回莫斯科。

记者招待会之后，由奥列格·索科罗夫和克格勃驻馆负责人、以及美国国务卿的两名助理陪同、在警察摩托车队护送下，我们前往达拉斯国际机场。全程都为我们开了绿灯。刺耳的警笛声时不时响起来。

机场大楼的所有阳台上，挤满了文字、摄影、摄像记者。他们显然在期待着某种轰动性的东西。海湾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机在跑道上已经等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未能马上登机。

大使馆的同事们跟我们告别之后，国务卿助理理查德·贝特将我们跟安德列带入一间装饰非常漂亮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三个阴沉的陌生人坐在那里。我们被邀请坐在桌子前，他们的对面。其中一个人提问。另外两个人在作记录。可能他们是心理专家？显然，委派他们来，是要检查一下，安德列是否处于某些药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觉决定离开美国。可能，当局以为，如此隆重的、几乎是“总统式”的送行会冲昏安德列的头脑，他会在最后一刻又想留在美国。但是，这里安德列表现得十分坚定，很快我们被送上了飞机。

我们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领事的机票被登记在头等舱。我担心，其他的旅客会因为航班耽误时间太久而对我们持敌意态度。可是当我们一千人进入机舱时，却响起了友好的掌声。乘客当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当然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和好感：毕竟我们是胜利者，争取到回到家庭的怀抱。“波音”机长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实质的：一瓶香槟酒和一罐黑鱼子酱。

飞机刚刚升空，我们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原来，飞机上的记者多过一打。对于我们免打扰的请求根本无人理睬。他们用各种问题来烦安德列，照相机的闪光灯使人目眩。最后，可怜我们的机长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风一样把我们隔起来。

在巴黎，我们立即转乘苏航直飞莫斯科的班机。但是，在布尔热国际机场上，上这架飞机并非易事。那里也有一大批记者在等着我们。他们试图把我跟安德列分开，所以我们一下子远离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没有人扶她站起来。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图在最后一刻把他跟家人分开。四面八方都是标语：“安德列，你还在自由世界。请选择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亚。”没有人为父母考虑。

-----

永不愈合的伤口(4)

-----

终于到达半空的飞机上，安德列躺在三个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

在舍列梅杰沃，这里同样也有外国记者，我的儿子谢尔盖和我的朋友们来接机。他们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伏龙芝沿岸街的家

里。在西方，围绕着我们一家又热了一阵，后来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失事的南韩航空公司007航班上去了。

虽然当时苏联的局势在逐步改善，我还是发现，“以防万一”，我的书从图书馆和书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来。我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在一部有关战争年代外交的新的电视纪录片中，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我的采访，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紧急剪掉了。小心的人们在等待，不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

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是忠实的。特别是阿尔巴托夫帮了大忙，他跟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关系非常好。

很快，我被任命为《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的主编。我的书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并且书也出版了。1985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向人民说明，我们国内的情况一团糟。“改革”开始了。

1986年初，我被派往美国短期出差。这是彻底的平反。

安德列很快中学毕业了，上了航空工业学院。毕业之后，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试验员。但是，生意吸引着他，因此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结了婚，1990年春天，他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了。有一段时间，安德列与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儿出差去过几次。

1993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资公司的副总裁，销售钻井设备。他幻想着能够有大的成就，他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当他自立之后，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静地住在达恰，读历史小说，随意

写点东西：他会照顾我跟列拉的。

但是，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这发生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弹撕裂了我们儿子的生命。当时他年仅26岁。安慰我们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孙子小丹尼尔，那年他才三岁半。

感谢命运，我的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阿列克赛。

谢尔盖使我高兴的是，他沿着我的足迹走：我曾经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翻译，谢尔盖则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翻译。并且谢尔盖的女儿，我的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同声翻译。

阿列克赛更喜欢我的第一个专业——工程师。他有一双巧手。他可以做出任何的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卡嘉和儿子别佳。

-----

父母的墓地(1)

-----

“斯大林专职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这就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

而在当时的美国，有亲戚在苏联也断送了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有多少亲情被意识形态的巨磨碾碎？

53 年过去了，一束白菊和一束红玫瑰让我找到失散了半个世纪的妹妹。难道这是父母在天之灵的庇佑？

我一直想找到父亲和母亲的下落。但是，我搜寻的全部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别列什科夫一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却一直觉得他们还活着。我设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应该从我在西方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在西方出版并在报刊中得到评论的书认出我来。此外，他们可能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看见我。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我呢？显然，他们认为，在“冷战”和激烈对抗时期相互之间最好不来往，尤其是在斯大林身边工作。我的父母可能还活着，这一点不仅从贝利亚调查我的企图中得到证实，此外，在 1945—1954 年间不放我出国，只是根据莫洛托夫的亲自推荐我曾经到维也纳、日内瓦和美国出差，但此后的 1954 至 1955 年间苏共中央境外干部处再次关上了我前往西方的路，仅仅偶尔在米高扬的坚持下“铁幕”为我略微开启。

与此同时，时不时有一些微弱的信号传给过来，我将其看作是来自父母的消息。1955 年，我本人 10 年来首次参加鲍里斯·波列沃伊率领的记者作家七人代表团出访美国，他们每个人都获赠许多纪念品：各种书、小册子、明信片、旅行指南等等。我最初没有注意到，在送到我下榻的洛杉矶“大使”饭店房间有关加利福尼亚的画册中，有一小本书是我儿时最喜爱——德国作家卡尔·曼关于美国印第

安人的《维耐通》。只是在事后我自问，如果不是亲人，会是什么人寄来这本书呢？而最近我才打听到，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到“大使”饭店附近来，混在围着“红色记者”的人群中，并且戴着墨镜，否则我会认出他们来，为的是看一眼他们的儿子与同事一起坐进大型房车。看见我就在身旁却害怕显身，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几年过去后，在《新时代》杂志众多的外国读者来信中，有一封信来自瑞士的诺尔女士。她请我们给她寄一本卡明斯基医生有关理疗方法的书。我立即回想起，20 年代卡明斯基曾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正是他采用水疗法为儿时的我治过病。为什么这个瑞士女士会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信封上的地址写着：露伊莎 别列斯，日内瓦疗养院。通过这位女士我应该转交卡明斯基的书。我完成了这个使我万分好奇的请求。

几年之后，又一封来自日内瓦的信，还是同样的回信地址。这一次，这位诺尔女士未提到我的名字，却在信中罗列了我童年的时代的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只有我的母亲才知道。1966 年在德国出差时，我第一次写信给日内瓦，询问诺尔女士何以得知这些细节。我也请她告诉我，是否知道我父母亲的情况。

两年之后的又一封来信更加详细地写了过去岁月的细节，但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诺尔女士打算 1969 年夏天呆在瑞士，并且可以按照原先的地址给她回信。

1970 年列宁诞辰 100 周年之际，苏联记协组织了数个赴瑞士参观团，寻访 1917 年革命之前列宁流亡的地方。我和妻子也参加了其

中一个参观团。

1969 年初夏抵达瑞士之后，我们马上前往疗养院造访露伊莎·别列斯，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我可以跟她用德语交谈。她说，诺尔女士经常过来拿信件。我们将自己饭店的地址留下，并请求转告诺尔女士我们已经到访，然后便加入参观团去寻访“列宁的足迹”。

第二天早餐之后出得饭店，我们在门口遇见了一位穿着优雅，满头银丝的女士，我当时一下子未能认出是自己的母亲：离别的三十年完全改变了她的外貌。见面使人非常激动，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三人找了间咖啡馆坐定之后，才终于能够开口说话。妈妈告诉我，父亲五十年代末去世了，我妹妹在占领期间失踪。妈妈曾经上专门的训练班，所以作过美容师。现在已经退休，虽然不算富裕，但有钱可以到处旅行，这已经成为她的爱好。

当时，我问不出口，为什么她姓诺尔，我想着可能父亲去世之后她改嫁了。我妹妹失踪的情形她也没有细说。当时，我对于她的各种说辞有所怀疑，但感觉到她认为有必要隐瞒什么，因此也没有加以深究。开始写这本书时，决定不提到妹妹，只是认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免得使她难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人小心翼翼，避免为自己的亲人招祸。对我们而言，海外关系，正如对西方的许多人有亲属在苏联一样，都会带来麻烦。

看见母亲的拘谨之后，我也不再询问，她用哪国护照周游世界。当时觉得，她可能有某种发给迁徙人士的证件。

也许，知道我的工作地点，为了保护我，父母亲改换了姓名。正因为如此，我通过红十字组织的寻找他们的努力始终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周围有许多人，同样流落到西方，认识我父亲，并且会向贝利亚的谍报人员揭发他们的“小计谋”，并且显然是这样的。我想，克格勃早就掌握了我所不知道的一切。

在我此后几次出国期间，我与母亲数次会面。后来，直到八十年代初又没有她的任何音讯。

有一天早晨，来到编辑部之后，我在自己办公室的桌上发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女秘书告诉我，信是在我到之前一位先生送来的，但没有说自己的名字。打开信封，我掏出了母亲工整的笔迹写满的几张纸。心中充满了激动和不祥的预感，我请秘书不要打扰我，关起门来开始读信：

“.....当这封信到达你那里时，我将已经不在人世。因此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此前不敢说的情况。是你中学时代的好朋友米海里帮助我们到西方的。他当时是德国海军军官。他在短期休假期间前来找你。我们告诉他你失踪了。父亲病得很厉害，走路十分困难。我们面临饥荒。米海里看见你父亲的情形——他被经常发作的心脏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折磨得不成样子——便自告奋勇帮我们搬到巴伐利亚佐霍夫市他母亲家去住。过后不久，战列舰第尔彼茨号被英国空军击沉，他也牺牲了。后来不久，我们顺利地来到了美国。刚开始我们的日子很苦，但慢慢便安顿下来了，取得了美国国籍，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栋小房子，并一直住在那里.....”

原来，这就是我母亲精心掩饰的事情。即他们成了美国人。现在的人也许会问，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斯大林前任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那又如何？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本人宣称，她是如何高兴和骄傲她获得了美国国籍，而她的女儿，斯大林的孙女，生下就是美国人。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柳芭·勃烈日涅娃、勃烈日涅夫的侄女，住在加利福尼亚，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旧金山都有房产，又当如何？

现在这些看来是稀松平常。在当时，在斯大林时期，有美国父母等于宣判死刑。在美国也一样，在麦卡锡时期，“抓妖魔”和反共歇斯底里时代，在苏联有亲戚可以断送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母亲在信中提到最后一段时间跟父亲住在加利福尼亚，以及寄到“大使”饭店卡尔·曼的那本小书，促使我在洛杉矶地区寻找他们的踪迹。

1991年9月，我应邀来到位于洛杉矶附近的大学城克莱门蒂学院讲学。1992年春，我开始寻找父母亲的墓地。很快就查明，本地东正教堂的牧师认识他们，而他们就安葬在洛杉矶市中心的鹰林墓地。现在不难找到墓地了。他们的遗骨安葬在绿色小山包上的一棵百年古松下，花岗岩墓板覆盖其上。他们漫长苦难的人生之路在这里终结。我将一束白色菊花带到墓地，却看见了墓碑旁边的一束新鲜玫瑰。

---

## 父母的墓地(2)

---

谁人放的花，谁在照看墓地？公墓办公室的人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是五十三年来我没有见过、杳无音信的妹妹。她有一大家人：儿女、孙子，并且已经有了一个重孙女。我妈妈保护的正是这一家人，杜撰出妹妹失踪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残酷、悲惨和血腥的世纪里，有多少家庭不得团圆？又有多少亲人害怕相见，不愿被意识形态的巨轮碾碎？仅仅少数人得以体验久别重逢的喜悦.....

---

## 后记

---

我一岁半时，沙俄帝国覆灭了，当这本书完稿时，苏联早已经灰飞烟灭。

当苏联帝国覆灭之时，我的孙子也是一岁半，等待他的将来会

是什么.....

我的叙述，始于苏联社会建立伊始，当时内战是腥风血雨，国内满目苍夷，人民流离失所。当结束这本书时，我看到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那个国家正在崩溃、消失。

在 70 多年期间，苏联对全球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其周围的世界里唤起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有人赞叹地球六分之一的居民勇气，因为他们竟狂妄到认为可以建立“理想社会”并向其他人提供可资效仿的前例，也有人谴责、拒绝、完全不接受这场前所未有的试验的基本思想，只因这种试验，是“克里姆林宫幻想家”在人民的活体上进行的。

苏联政权的灭亡，恰如其在本世纪初的诞生一样震撼了世界。一样地，有前苏联各族人民的苦难，一如莫斯科所诱惑或强加“社会主义模式”的其他国家人民的苦难相随其中。

贫困、绝望、对“光明未来”的失望、充满人民心中的空虚与无助，所有这些在前苏联的各个角落以暴力的可怕形势浮出表面，并完全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兄弟相残的全面内战。

正如 70 多年以前，“红色十月的孩子们”祈望“美国赈灾署”在苦难的俄国发放进口肉罐头和罐装牛奶一样，现在我们的下一代也依然只有期望来自西方的援助。

1991 年 8 月，用莫斯科满街的坦克“强化十月革命思想”的流产政变之后，苏联土崩瓦解，并于 1991 年 12 月底消失了。而这一切在此前不久无人能够想象得到。可是沙俄帝国 1917 年的灭亡也是同样的

迅疾。导致沙俄灭亡的因素和现在苏联崩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还是有某种共同之处：依靠武力和恐惧、迫害与虚假宣传的国家体制，一旦恐惧感消失，普通民众能够了解真相便顶不住内部的压力。

所有这些在此证实了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稳定靠镇压机关无法达到，不论这个机关的运转如何灵敏。稳定同样不能单靠武力。任何稳固的国家体制基于社会意见一致的程度之上。无论在沙俄，还是在共产主义的苏联，起码在其最后几十年里，这种一致并不曾有过。因此，一旦旧的架构开始崩坏，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加固这个人造的构造了。

回首往事，回首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的自己见证或参与过的历史事件和灾变时，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自己活到了矛盾重重、甚至是非凡的“苏联时代”的终结，毫无疑问，这个时代将作为建立公正社会的又一次大胆而失败的尝试载入史册。为了这个理想，千百万人自觉不自觉地付出了生命。正如奥斯卡·怀特曾经说过的，如果一个人为了理想付出了生命，这完全并不意味着他是为了正义事业而死的。我们的经验中，有着太多的牺牲、太多的破坏、身心两面太多太多的痛苦和损失。与此同时，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希望、热情和献身精神——不为自己，而是为下几代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过。

同时，我们的生活中终究也有所建树：虽然存在大量半途而废、失误和错误，但还是消灭了上千万人的文盲，实行了全民教

育，免费的高等教育，免费医疗，而沙皇治下边远地区当时的某些落后民族接触到了本国和世界文化的成果。

我们的牺牲并没有白费。社会发展不会停留在“先进技术”、“信息社会”等等现代资本主义的成绩之上。进步的人们将来依然会为改进生活而奋斗。而我们国家的经验，我们的成与败可以给人类未来的路途充当标志。

在沙皇制度废墟上建立新的社会体制需要巨大的牺牲。帝国的残余当时对新政权进行了武装抵抗。现在，行政命令体制及其代表同样也会拼命扼杀新生活的萌芽。他们的破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制造了改革者个人的悲喜剧以及从政治舞台的退出。然而，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如果俄国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正在成长中的民主遭到失败的话，这不仅仅对我国人民，对全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大悲剧。唯有希望发达国家不再重犯世纪初的错误，当时在二月革命之后他们迫使临时政府继续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而没有援助饥饿和被前线失利所折磨的俄国，结果造成了俄国民主制度的失败。

现在，正像从前那样，西方傲慢的野心可能使俄国脆弱的民主处境危险。北约向俄国边境缺乏策略的扩张正在给那些得到贫困群众支持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以口实。

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过渡已经在国内制造了譬如犯罪和酗酒滋生，一小批超级富人和千百万贫困人口之间差别巨大，官员腐败以及宠臣当道等等许多丑恶现象。

如果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俄国目前正在上演的悲喜剧漠然处之或者仅限于口头表达好感，继续将俄国看作是原料供应地，那么他们可能会大大地失算。俄国内的核武器和大批核电站的后果，可能会比1918—1921年时期的内战和干涉要可怕得多。

我愿意相信，我国各族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不会为苏联消失之后替代出现的问题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当我一岁半的时候，沙俄帝国灭亡了。苏联帝国覆灭之时，我的孙子丹尼恰好也是一岁半。但愿他不会经见我们这代人所受过的这一切。一般俄国人在城市郊外夏季住的房子，旧译作“别墅”，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别墅，西文均采音译，为Dacha——译注。

图注：

A

1.苏斯洛夫(70-8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译注)与斯大林握手。1952年。

2.第一排：从左至右-什基里亚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斯大林；

第二排：从左至右-日丹诺夫，马林科夫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期间，1938年

3.米高扬、赫鲁晓夫、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一起走向列宁墓主席台，40年代末

4.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盟国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1945年2月

5.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从左至右）在莫斯科的图什诺机场观看航空表演，40 年代末。

## B

1.胜利阅兵开始之前：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加里宁，1945 年

2.斯大林与女儿斯维特兰娜

3.贝利亚的妻子-尼娜

4.斯大林与冯·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1939 年8 月

5.沃兹涅先斯基、贝利亚、马林科夫、斯大林、布琼尼与战友们在一起

## C

1.奥尔忠尼启则

2.基洛夫

3.贝利亚-契卡工作人员

## D

1.波茨坦会议期间，邱吉尔临时回到伦敦参加选举，斯大林与杜鲁门等人在休息。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别墅里无拘无束的气氛。

2.瓦列金 别列什科夫，1998 年

## E

1.希特勒在新的帝国办公厅。柏林，1939 年。

\*\*\*\*\*

\*连载已结束,谢谢关注

\*\*\*\*\*

\*\*\*\*\*

\*

\*\*\*\*\*

声明: 本电子书仅供读者预览,请在下载24 小时内删除, 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